成都掌故

典藏版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掌故

典藏版

CHENGDU ZHANGGU

ISBN 978-7-5614-3693-6



定价:50.00元

成都掌故

CHENGDUZHANGGU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编

典藏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技术设计:罗　光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掌故：典藏版／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614－3693－6

Ⅰ.成…　Ⅱ.成…　Ⅲ.成都市－地方史－史料　Ⅳ.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2887号

书名　成都掌故(典藏版)

主　　编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3693－6/K·29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40 mm
印　　张　30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此书无本社防伪标识一律不准销售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 序　林文询

• 《成都掌故》(典藏版)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朱树喜
副主任　王民平
编　委　朱树喜　王民平　夏晓惠
龙瑜生　戴小青　王光明
赵述卿　龚　键　肖　平
吴泽地　张　利

• 《成都掌故》(典藏版)编辑部

主　　编　龙瑜生
常务副主编　戴小青
特邀副主编　肖　平
副 主 编　吴泽地　张　利
编辑、编务　谭　听　黄　涛　徐　洁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封面题字　马识途

编纂委员会

主　任：朱树喜

副主任：王民平

编　委：朱树喜　王民平　夏晓惠
龙瑜生　戴小青　王光明
赵述卿　龚　键　肖　平
吴泽地　张　利

编辑部

主　　编：龙瑜生

常务副主编：戴小青

特邀副主编：肖　平

副 主 编：吴泽地　张　利

编辑、编务：谭　昕　黄　涛
徐　洁

《成都掌故》（典藏版）序

三星古蜀地，金沙老成都。那些气象峥嵘、惊世骇俗的青铜神器，精美绝伦、飘逸凌虚的金箔神鸟，无声地诉说着这方土地不可思议的远古文明。而两千年前，偏于华夏西南一隅的成都，竟然又能凭借天之厚、地之利、人之智勇忠义，鼎足天下，雄风浩荡千秋史。到一千多年前，当诗仙太白纵酒高歌“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时，它已以“一扬二益”之美誉领大唐之风骚……长河漫漫，星光闪耀，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古至今，不知涌现过多少名垂千古的俊杰名流，上演过多少回肠荡气的精彩故事，留下了多少瑰丽华章以及难解之谜。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无异于面对一座座斑驳的历史丰碑，一部部厚重的人文大书。这是我们成都人的骄傲，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财富。

云过秦岭，万顷峥嵘倏尔化柔波；月笼锦江，百代繁华恍然演南柯。威武雄壮的历史形态之外，成都又是一座充满生活情趣、极富人文色彩的城市。四川人特有的智慧聪敏、乐观机趣，热爱生活且又善于创造开拓，在作为都会的成都更是得以集中体现。明清以降，尤其是民国年间，以至当代，市井里巷，三教九流，又不知诞生过多少风云人物，流传着多少脍炙人口的逸闻趣事。历史上那些彪炳史册的文臣武将、轰烈大事，辉耀长空的文坛泰斗、千古绝唱且不用说了，只近代的那些草根奇人、梨园精英，以及百姓大众创造、参演的各种民俗风情，便把成都这座城市滋润得有声有色、韵味津津。不要小看了这声、这色、这味，实质上这就是一座城市、一方地域的文化特色和底蕴的生动体现。所谓天府之都，滋润之都，不仅是这里的天滋润、地滋润、生活滋润、口舌滋润，更在于这里的人的性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也是滋润的。本书收录的民间流传的大量逸闻故事，便是很好的印证。

热爱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历史文化吧，这里的一街一巷，



都布满了历史的脚印；一栋一梁，都诉说着斑斓的故事；一木一石，都焕发着人文的光彩。难怪在最近发布的中国社科院的全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将最具文化独特性和吸引力的桂冠戴在了我们成都的头上。阅读此书，你将更加深信此言不虚。

作为一个普通的成都市民，我深深感谢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的文化工作者们，他们慧眼识珠，看到了这些散布、流传于民间的逸闻故事的宝贵价值，并通过辛勤的组织工作，披沙沥金，将它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汇集成册，雕琢成器，奉献给广大成都市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更要向搜集、整理、写作这些文章的同仁们致以深深的敬意。都知道四川人历来崇文尚智，机敏聪慧，擅长把龙门阵摆得来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而成都人更是个个口舌伶俐，妙语连珠，所道所说绕梁缠栋，极富情趣。从历史中挖掘珍宝，从民间汲取滋养，本书的作者们，用他们的知识才具、生花妙笔，又为这些故事增色不少，使人披卷读来，大快朵颐。为历史树碑立传，为故园增光添彩，这真是功德无量之事。且藉此表达我的崇敬之心，不敢妄称为序。

林文询

2007年3月25日

目录

街巷漫忆

成都街名趣谈 …… 陶亮生 3
成都街名琐记 …… 陶亮生 6
逗街——成都街名联趣 …… 曾炳昆 38
遥忆当年春熙路 …… 陈伯为 40
青莲巷 …… 刘西源 42
双栅子 …… 刘西源 44
科甲巷和真假石达开 …… 李金彝 46
十里新街话“安乐” …… 梦 弼 48
华兴街上的“鸦片战争” …… 宫鸿文 53
抗日时期的祠堂街 …… 潘清雍 安德才 57

人文故迹

成都史话 …… 李金彝 69
皇城和康公庙 …… 廖上柯 74
成都皇城史话 …… 李思梳 吴绍伯 75
支矶石 …… 郑光福 82
大圣慈寺话沧桑 …… 王治平 84

几番兴废话金河 …… 夏顺均　李思楨　87
望江楼和薛涛 …… 李思楨　90
卓文君在哪里卖酒 …… 黄书冠　94
蜀州和陆游 …… 秦宽荣　97
文殊院轶事 …… 谢荣才　100
能海法师和近慈寺 …… 徐伯荣　104
诸葛亮在成都的府第 …… 陶元甘　106
诸葛亮和武侯祠 …… 李金彝　109
成都的诸葛亮祠庙 …… 陶元甘　114
丞相祠堂话古柏 …… 吴天畏　117
武侯祠后殿的铜鼓 …… 汪　潜　121
漫话八阵图 …… 成　观　124
是陵园又非陵园——漫话惠陵 …… 吴天畏　128
成都的黄忠墓 …… 郑光福　治　平　131
春流绕锦城 …… 熊达成　133
九眼桥杂谈 …… 丁晨滨　137

锦城风物

湖广填四川后的成都风情 …… 一　苇　141
锦春楼三绝——贾瞎子、周麻子、司胖子 …… 李思楨　马廷森　144
高把戏 …… 张达夫　148
把妖精钉起示众　记雷耀山的面塑 …… 晓武搜集整理　150
西蜀怪人　糖画圣手 …… 任吉祥　任光灵　156
理发史话 …… 廖上柯　162
龙狮斗 …… 刘西源　167
百花潭畔赏“百花” …… 高华敏　180
文绝书妙　美不胜收——观赏成都武侯祠书艺 …… 田旭中　184
千古众香城 …… 郑建邦　188
竹枝词与成都传统群众文化活动 …… 肖　吴　190

观成都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出驾 …… 白景纯 195
少城春秋 …… 戴盛昌 200
成都风情小拾 …… 龙在天 206
古蜀名产集萃 …… 冯一下 211
旧城拾零 …… 晓 枫 219
游百病 …… 方礼平 221
异代升堂宋两贤——杜甫草堂为何配塑黄庭坚和陆游 …… 周维扬 224
杜甫为何不吟青羊宫 …… 陶元甘 227
旧蓉城市民日常生活漫忆 …… 崔显昌 230

梨园夜话

川剧圣人——康芷林 …… 刘宗林口述 傅伯林整理 243
天籁并未疯 …… 周芷颖 255
四川梅兰芳——阳友鹤舞台生活片断 …… 刘双江 257
当头棒 …… 金 汤 赤 叶 261
戏状元岳春 …… 邹趣涛 274
成都滑稽大王——曾炳昆 …… 刘墨雨 279
钟晓帆“脱靴” …… 老 沈 281
一代宗师——李月秋 …… 刘墨雨 282
身带三宝 无人可敌——记成都评书艺人张锡九
…… 鄢定高 周少稷 284
清代戏曲大师魏长生 …… 蒋维明 289
周企何传奇 …… 陈国福 296
杨淑英学艺记 …… 蒋维明 307

楹联趣事

成都武侯祠的一幅楹联 …… 肖雪生 315
赵藩与诸葛亮殿名联 …… 周芷颖 317
武侯祠名联和岑春煊 …… 市　仁 321
草堂名联轶事 …… 濮禾章 326
锦城旧联轶闻 …… 陈雁翠 328
何绍基一联赞草堂 …… 李国瑜 330

西蜀人物

五老七贤 …… 张达夫　吕　钟 335
丁宝桢与四川 …… 廖上柯 337
女诗人薛涛 …… 李思桢 343
杨状元的故事 …… 刘先觉等 349
文坛怪杰刘师亮 …… 金　戈 353
徐子休先生二三事 …… 静　远 355
刘湘返里 …… 郑守铭 357
刘文彩轶事五则 …… 郑守铭 360
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记成都人尊敬的郑火神 …… 唐步祺 367
成都的花状元 …… 思　甫　柳　涛 374
医林名医奇闻 …… 李兴玉搜集整理 377
花蕊夫人之谜 …… 王　英 381
坐久香风入画栏——了觉禅师暨昭觉寺开山祖师 …… 郑建邦 384

成都旧闻

成都的袍哥组织 …… 杜　宇　389
漫话旧成都的娼妓 …… 杜　宇　397
保路死事纪念碑 …… 周芷颖　王泽枋　405
成都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 …… 路　斯　408
拆城门的风波 …… 硝　烟　410
黄金梦——锦江淘江公司挖金银的故事 …… 吴绍伯　417
扑不灭的怒火——成都教案 …… 陶　一　421
梦断洋场——记川剧首次赴上海演出 …… 刘宗林口述　傅柏林整理　431
玄奘灵骨的纠葛 …… 王治平　440
藏经楼上的秘密 …… 李金彝　443
冯汉骥与王建墓的发掘 …… 马文彬　449
桥是弯弓塔是箭 …… 刘西源　453
尹昌衡杀赵尔丰 …… 蒋维明　456
跑警报 …… 刘西源　461
抓壮丁 …… 游力行　464
刘湘拍卖皇城 …… 曾成志　467

街巷漫忆



成都街名趣谈

◎ 陶亮生

街道的命名，不一定都出自政府机关，多是约定俗成。因为它能标榜出街道的特点，有代表性，便自然而然地喊开了。像提督街、督院街、总府街、学道街、盐道街、藩署街，是以历史上的官府衙门的所在地而得名；羊市街、棉花街、草市街、石灰街、盐市口、牛市口，则是以过去各项市场所在地命名而流传下来的；以庙宇祠堂命名的则有文庙前街、文庙后街、城隍庙街、灵官庙街、康公庙街、骆公祠街等；以名人府第或轶事命名的有君平街、状元街、子龙巷、诸葛井街；双槐树街、拐枣树街、竹林巷、三倒拐，则取名于它的地点特色；支矶石街、天涯石街，来源于历史古迹。街道本身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桑转换，原来的作用早已消失了，但是街名犹存。硬性用某种手段来更改它，往往是通不过的。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破四旧”而被改换的街名，不是都被拨乱反正了吗？人民之所以留恋老街名，不仅在于习惯难改，还因为通过街名，能考出许多有趣的历史掌故来。

明末清初，四川几经动乱，大军云集成都，少不得要办理军需后勤，于是开辟了骡马市场，从而有了骡马市街。洪承畴进驻成都后，他统领下的来自南方的步兵驻扎的营盘，被叫做大福建营、小福建营；而来自西北的骑兵的驻地，被称为宁夏街。

有了线香街，便可得出历史上不独福建人会做线香，四川也有线香作坊的论断。线香街在清代初年，曾改为代书街，这一街名的变更，又可以考证，做线香这项手工技术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年代中被摧毁失传了。代书，是一种职业称呼，专代人书写讼词的人叫代书。这种人又常被人鄙称为讼棍，因此名称很不雅致，几十年前，它又恢复了线香街的原名。

过去的街道，都没有挂街牌，街名传来传去，发音吐字不准，造成以



讹传讹，以致闹出了不少笑话。珠市街本是猪市街，鸡市巷传成了鸡屎巷。浆洗街临南门大河，因有河水之便，开设有许多浆洗坊，从而得名，一度却被误称为江西街。洗足河街大家都以为那里距城壕不远，可以洗足。其实，“洗足”是“犀角”之讹传。因为那里原有一个突出的沙湾形似犀角，因而得名。老古巷被讹传为老虎巷。沟头巷是成都市区内九条排水大沟的头一条所在地，因而被称为沟头，却被讹传成狗头巷了。

我住在上升街，出西口便是后子门，后子门这三个字可真是费解。明初，蜀王朱椿在成都修了一座王宫，一般都叫它皇城，它的前门也叫天安门，后门叫做厚载门。乾为天，坤为地，天高地厚，大覆地载，所以号称厚载门。后来“厚载”讹传成“后宰”，宰是宰杀的意思，太不吉利，便被定为后子门了。

后子门附近有九思巷。“群子有九思”语出《论语》，九思巷是个很典雅的巷名。可是这条巷子与“九思”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也是被传错了。清康熙年间，年羹尧任四川巡抚的时候，把少城修成满营，分驻防荆州的满蒙兵二万五千人来成都镇守。他为了避免满人和汉人发生冲突，奏请清廷，从西北搬迁来一批回民，安置在西御街口到羊市街一带，以造成一个缓冲地带。为尊重回民的宗教习俗，除在皇城外设牛肉市场买卖牛肉外，还修建了10所清真寺，从南往北数，为八寺、九寺、十寺。至今八寺巷之名尚存，羊市街十寺之庙还在，界于其间的九思巷无疑应是九寺巷。

布后街附近有脚板街，民间传说过去这条街上有块石头，上面有偌大的一个脚板印，便以脚板命街名。关于脚板印的来历，有两种传说：一说远古时代四川是一片汪洋，有神仙下凡，在这块石头上踏了一脚留下脚板印，从此汪洋变成了大陆；一说张献忠率领义军攻陷成都，在此街上下马休息时留下了脚板印。到清朝初年，这块石头被打碎了，脚板印化为乌有，脚板街名却保留下来。其实这条街本名是爵版街，它挨近藩署街，因这条街上有藩署下属的爵版库而得名。爵版是当时印制文武官员晋见、拜客用的大红绢纸套泥金名片的木牌，上印持片人的官职、学位、籍贯、简历等，起到身份证和介绍信的作用。这种印制泥金片子的木版，由爵版库统一制作、印制并严格保藏。由于叫顺了嘴，爵版便演化成脚板了。过去有位林山腴先生住在此街，为了给此街正名，请蒲伯英先生手书一副门联：

天爵乃尊，滋冥自贵；
大版为业，传颂无穷。

把“爵版”二字分嵌在上下联文中。无奈众口难违，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成都有一街一巷，都住过状元，也都在街名上闹过笑话。杨（升庵）状元的府第，在今天的状元街内。其实这座大宅，本是杨升庵的父亲、明朝的名宰相杨廷和修建的。宰相官位一品，状元是最高学位。人民不以官职而以学位命街名，除了说明升庵的威望高于乃父，也可见高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后来不知怎的人们把“状”字读成“转”字，呼成转元街了。什么转得最圆？磨子转得最圆，竟又一度演化成磨子街了。

清光绪乙未（1895）年，成都又出了名骆状元，名成骧，字公骝。在他参加殿试的前一年（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吃了败仗。他把一腔忠愤之情发泄在殿试策的大卷上。清德宗载湉（即光绪皇帝）钦点他为头名状元。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他以教书维持生活，家住陋巷，房子也小。军阀在成都打巷战时，士兵“打启发”（即抢劫财物），还将他家的柴草抢光。群众把他住过的这条巷子叫做骆状元巷。数年前，我偶过此巷，见街牌竟写成“落酱园巷”，岂不是笑话？

开篇时我说过，街名多是“约定俗成”，但也有例外，那便是猫猫巷改成将军街、刀子巷改为多子巷的事。这两条巷子，都在少城内，是封建军阀硬改的。原来猫猫巷，巷口有一石柱，柱顶刻有虎头。四川人称老虎为猫猫，猫猫巷之名由此而得。军阀杨森在巷内占了一所宅院。这位督理大人，嘴巴尖，又长了两颗突出的门牙，形似耗子，人送绰号“耗子精”。猫是专逮耗子的，“耗子精”住进猫猫巷，实在太危险了。于是手握兵权的督理大人，把猫猫巷改为将军街，既光辉，又有安全感，实在两全其美。

刀子巷因过去为满营开炉铸造刀剑而得名。刘湘在巷内修造私宅之后，恶“刀子”二字于己不祥，加之他的长、次二子早年死去，膝下只有一儿一女，而女儿是不能继刘家香火的，在怕挨刀和望多子两种感情交织下，为避讳和祷祝，硬将“刀”字改为“多”字。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多子巷之名似乎不合时宜。但也无须再把它改成“独子巷”，就让它和将军街一起，作为历史陈迹、掌故、笑谈留在那里，又有何妨呢？



成都街名琐记

◎ 陶亮生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便听说成都全城有 36 条大街、72 条小巷。七八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区的扩建，今天面对成都市地图，街道之多，已数倍于往日了。成都在西汉末年，便是国内五大都市之一。且蜀人好文，闾里题署，皆有考究。随着人世代谢，古今变迁，街名也有所变改。拙文拟就成都街名的来由，根据历史明文记载或父老传说，作一简介，不仅使后生能“数典”，亦可给旅游资“谈助”，更可供正在全面展开的地名普查工作以参考。

统观成都市的街名，我们不妨把它们划分为以下各类：祠庙堂所类、衙署兵营类、姓氏家族类、市场作坊类、桥梁水系类、地貌风物类、经传词语类、祈祥祝愿类、名人遗址类、方位字序类以及新旧民主革命词汇类等。

祠庙堂所类

凡以祠、庙、堂、所命名的，我们称它为祠庙堂所类。

一、文庙街：全国普遍修建文庙，专祀孔子，始于唐代。唐以前，则皆奉祀周公。汉景帝（公元前 156 年—前 141 年）时，文翁（本名文党翁，江西人，汉代人修史，省略“党”字，于是以文翁之名流传）为蜀郡守，创建周公礼殿，为保护书籍，用石料修筑，号称“石室”。此殿历两汉、三国、西晋各代，东晋桓温伐蜀时，都还亲自看见过。这条街原名文翁坊，是以街口立有纪念文翁的牌楼而得名。后经战乱，殿毁而坊亦圮，唐人于其故址建孔庙、兴学宫。学宫各代相承，清代为锦江书院。清末改学堂，为成都府中学。辛亥革命后，称成都联合中学。之后，改为石室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成都市第四中学。文庙迄今未毁尽，现以文

庙的方位，分为前、后、西三街。

二、文圣街：成都古时为蜀都，设郡守。唐玄宗幸蜀，升为南京，郡守也随之升为京尹。同城又设成都县令。到了宋代，又将广平县衙移入城内，改广平县为华阳县。从此，成都城内便有一个郡（后又改为府）衙和两个县衙。郡有郡学，县有县学，郡、县又各建自己的文庙，郡守、县令各率其直属的学生到郡、县文庙内祭奠孔子。这样，成都便有三座文庙。成都东南属华阳县，文庙建在石室巷（旧名何公巷，因明朝成都教授何公夫妇殉职，在学署内掩葬而得名）口。成都西北属成都县，文圣街便是成都县文庙所在地。

令我不解的是白家塘辖区还有一个文庙街。文庙因系大祀，不像佛庙道观，可以随便修建。成都是一府两县所在地，只能有三座文庙，为什么多出一个文庙街来，有待实地考询。

三、武圣街：神是人封的。武圣和文圣一样，亦随朝代的变迁而变换。在唐代，对武将的祀典，以姜（尚）太公为首。南宋孝宗（公元1163年）以后，供奉岳（飞）忠武王为武圣。到了清代，不再供奉岳飞了，改祀关（羽）壮缪侯。但公道在人心，关羽虽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流行而受人敬仰，而岳飞更以光复中华的民族英雄而受人尊崇。进入民国，关、岳并祀，在南门二巷子立关岳庙。与文圣街接近的武圣街，是专祀关羽的关庙。

四、大慈寺街：学佛人多言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但无充分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是年，唐肃宗迎其父玄宗回长安，这座佛庙是肃宗敕建的。匾额御书“大圣慈寺”四字。规模极大，占东门小半城。旧时传说，此处原是佛寺，肃宗虽在甘肃灵武即皇帝位，而削平“安禄山之乱”则是以成都为复兴基地，想当然是受佛力的庇护。于是将旧寺扩建，并御题匾额，希后代加以保护。其后，果然生效。他的后人唐武宗李炎崇道教、灭佛教，史称“会昌灭法”，因大慈寺的匾额是他先人御笔，不在除毁之列。直到宋朝，房屋甚多，竟成了大市场，壁书、壁画更使海内名流倾倒。寺庙大部毁于战乱的明朝末年，文物壁画也随之付之一炬。今天尚能看到的殿宇，是清康熙（公元1662年—1722年）年间重建，其规模已远远不能与昔日相比了。

五、喇嘛寺街：清时，班禅、达赖每年要遣使向中央政府进贡，路经



成都即住此寺中。尼泊尔、不丹、廓尔喀的使者路过成都，亦在此寺接待。寺中所奉之佛为宗喀巴，非释迦牟尼，与西藏、青海、蒙古相同。

六、和平街：旧名骆公祠街，再前为子龙塘街，相传为蜀汉赵云故第所在地。我曾亲见塘坎砌青石，大书“汉赵顺平侯洗马池”八个字。池上有亭馆假山，种梅树百株，为当时士大夫宴集之地。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欲取西蜀，清廷擢升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四川总督，辅以湘军系统的文人刘蓉来川统摄，率军消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骆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拜协办大学士。他死后，有人在子龙塘侧建祠（相传骆死之夕，有陨石坠子龙塘），遂改街名为骆公祠街。骆秉章是个大刽子手，将该街改为和平街是顺乎民心的。但是，若把它恢复为子龙塘街，以纪念蜀汉名将赵云，一定会更受群众欢迎。

七、康庄街：旧名康公庙街。元末，战乱中，省城残破极重。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十三子为蜀王，先遣一姓康的太监来成都修造藩府，积土垫地，烧砖筑城，耗财甚多。太祖误认为他吞蚀公款，处以死刑。等到诸藩就国之后，各个藩府年年都在闹培修费，唯独成都没有这项报销，并且雨再大也不受水淹。这才发觉康太监修的蜀王府，奠基的工夫用得深，钱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却可一劳永逸。于是，特为康太监建祠，以示昭雪。这个掌故据说庙内有碑文记载，我不曾见过，通志似亦未有记载。民国时庙毁，街名也因之而易。

八、鉴华寺街：相传彭州市鉴华山有一个学佛的人，心极慈悲，乘驴行而不施鞭策。成正果后，善男信女为他立庙，号“鉴华祖师”。成都亦立了庙，在东较场附近。清末，该庙被军队占为兵营，哥老会众又在外东三官堂街购地新建一庙，石柱为楹，以为奉祀。成城中学创办时，租其正殿为礼堂，至今如故，这就是现在的成都第十九中学。

九、三官堂街：三官堂为道观，亦称“三元宫”。道家以天、地、水府为“三元”，又号“三官”，街以建三官堂得名。至于三元巷则是科举时代，希望出状元、会元、解元，乃祝愿之意，与神庙无关。

十、五岳宫街：“岳”为山之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汉文帝名刘恒，汉代人避讳，改称常山），中岳嵩山，合称五岳。古代以三公之礼，祭五岳之神，所谓“五岳祭秩皆三公”（韩愈诗），那是很庄重的。是街为五岳宫所在地，今庙毁街存。

十一、纯阳观街：纯阳观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唐末，进士吕岩（洞宾）弃官学道，道号“纯阳子”，取道书“有一分阴气，不得成仙；有一分阳气，不得成鬼”之意。初仅邯郸有吕洞宾祠。清末慈禧专权，满汉文武大臣及国人皆以为非。慈禧乃假托自己系纯阳下凡，应享受万民烟火，一班谄佞之臣也纷纷上书大拍马屁。于是慈禧下令全国大中城市皆修“纯阳观”，列入祀典，则遍天下都有纯阳观了。成都的纯阳观规模甚大，占地四条街，有房产上百间。

十二、城隍庙街与城隍巷：祭祀“水”与“庸”（与墉同）的典礼，《礼记》有记载。“水”即隍，即池；“庸”即城。古代的城墙濠沟，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御工事，所以古人造神以祀之，称城隍。成都有二座城隍庙。郡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在东大街，街未以庙命名。成都、华阳两县各有各的城隍庙。城隍庙街的城隍庙属华阳县，成都县的城隍庙所在地则称城隍巷，以示区别。

十三、报恩寺街：即宋公桥街，又名茗粥街。明朝初年的大文学家宋濂（字潜溪），曾经教过太子和诸王读书，他是宰相李善长的亲家。后因李善长出了祸事，宋受株连，判为死罪，后得到马皇后的解救，谪贬四川夔州，不久遂死。蜀王是他的学生，他将宋濂的尸体迎来成都，葬于静居寺侧，并改静居寺为报恩寺（又称潜溪祠）祭祀宋濂，以表学生报答师恩的诚意。清代，为华阳县的书院，号潜溪书院；有小桥，称宋公桥。桥头有不少慈善人家施茶、施稀饭，故人们又称之为茗粥街。

十四、昭忠祠街：昭忠祠是清代专祀内外各战役中死去的文武官吏的祠堂，经朝廷批准，才能入祠。

十五、忠烈祠街：忠烈祠建于民国初年，是专为纪念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而设的祠堂。当时的军政府设有“稽勋局”，负责调查审核，合格者才能入祠。该祠由专制时代的“会府”改建。会府是省城的大官们聚会朝拜皇帝的地方，供奉着木刻九龙牌位，上写“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十一个金字。是街旧称会府街，后改称忠烈祠街。

十六、奎星楼街：中国的旧星像家说，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一共有五个星点，经常疏散排列，如五星相聚，则为文教昌明之像。又说，北斗七星，第一颗称魁星，所以科举时代中了状元，谓之“大魁天下”。“奎”与“魁”读音相近，于是奎宿与魁星也分不清了，奎星楼、魁星阁





也成了一回事。“魁”从斗、鬼声，是谐音字，于是世俗塑造的魁星佬，都是凶神恶煞的鬼像，还手持朱笔，摆出一副点状元的架势呢！

十七、惜字宫街、字库街和字库巷：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予焚化。可见敬惜字纸的风气由来已久。惜字宫是供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仓颉的庙宇。焚化字纸，特别设有字库。惜字宫街、字库街和字库巷，皆因此得名。

十八、放生池街：佛教徒讲究放生，以修来世。他们购地凿池，将水产动物放生于池内，让它们自由成活。放生池外，筑墙高隔，前面的街墙上有石刻对联：“放乎中流随物性，生之者众见天机。”池上亭榭的联文是：“倚芰夏尤佳，森森漫漫二十亩；龟鱼晓无数，堂堂策策百千头。”池今已平。

十九、黉门街：黉门是学宫。旧时称士子考上秀才为“身入黉门”。清末停科举，两湖总督张之洞怕传统的国学从此衰废，奏请清廷的文化较高的省份创办“存古学堂”一所，取秀才应考，八年才得毕业。四川省在成都南门外买得杨昭勇侯赐第为堂址，招生开学，命这里为黉门街。民国改“存古学堂”为“国学院”，街亦易名为国学巷。

二十、慈惠堂街：慈惠堂创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堂门有泥金大匾额，书“慈惠堂”三大字，是省会办的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的基金，政府每月有津贴，收养孤贫四百余人，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1925—1926年，慈惠堂改官办为绅办，于是恭请“五老七贤”中的尹仲锡先生为总理，全权负责承办。尹承办二十多年，采取措施变单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在原来的基础上，创造出价值百万元以上的财产田八千亩，街房无数。抗日战争中，纳养沦陷区的难民、难童以及弃婴达八千余人，尹先生劳瘁至死。之所以把这条街列入以祠庙堂所类，是因为慈惠堂创立以前，是一道观，庙内塑有灵官神像，俗传极为灵验。凡遭纠纷事件，官府若判不明息不了的官司，只要说一声到灵官神前赌咒，无理的人惧怕神仙显灵，便默默认输了。

二十一、帘官公所街：科举时代，各州县学子赴省城考举人，谓之乡试。明朝初年的正副考官，是聘请名士担任，官职高低，在所不计。以后认为这样不够威严隆重，便由皇帝钦差大主考、副主考，赴各省主持乡试。虽然主考官不管行政事务，专阅试卷、决定取舍，但是像四川这样的

大省，有一万多名考生，连试三场，各作文十三艺，如此大量的试卷，断非两位主考官在个把月内可以看得完的。这就必须有同考官先行分阅，选拔优异的文卷上呈，谓之“荐卷”。正副主考再就“荐卷”审阅，然后会同公议，择优录取。这些同考官，是从外地“实缺知县”中，选择资历高、负有文名的人，临时调来当差的。到省城时，便招待在帘官公所内，由总督对他进行一次考试，从中选取内帘官十三房，专阅试卷。外帘官无定额，负责办理收卷及校对、誊录（考生的本卷初不直呈，必由外帘官雇人誊抄一道，以免考官从字迹上认出是何人的试卷而徇私舞弊）等事务。那么这些考官为什么称为帘官呢？因为考官进场阅卷以后，便垂帘与外界隔绝，免生弊窦，因而称为“帘官”。帘官公所用现代话说就是接待考官的招待所。

二十二、燕鲁公所街：河北省简称燕（亦称冀），山东省简称鲁。燕鲁公所是这两省合建的会馆，规模较大，式样也好。清代，皇帝派来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到成都，地方行政官员为他洗尘、饯行和做生，都在这里举行。迎、送倒容易理解，为什么还做生呢？未必每科的正、副主考官统统都生在那一个月内吗？这里面有个公开的秘密。那时，凡是钦差大臣，不管是从成都过路，还是专程来省内查案，公毕回京，地方上的大官们都要送他点礼，塞他点包袱，望他回奏时说些好话，这叫“包荒”。那么，只管审卷衡文的主考官，不问政事，地方官怕他什么呢？怕就怕在他官衔上带有“钦差”二字。他虽不问政事，但回京后必然要向皇帝销差。万一皇帝随便问起：“你们把某省的民情吏治所见所闻奏来我听。”这中间是否公道正直便难说了。所以，便借做生为名，馈送寿礼。据说每人所得也不过几百两银子，但比过年时给灶王爷敬麦芽糖，请他“上天言好事”所花的钱要多得多了。

二十三、江南馆街：前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归一个总督管辖，称谓“江南总督”。因江苏并不在长江之南，又改称“两江总督”。但江南之名，流传既久，所以三省人合建的会馆仍叫江南会馆。开始时，三省会馆各了各，这条街便叫三道会馆街。以后合为一所，统称江南会馆，街也因馆而易名。过去本省的人不能做本省的行政官员（武官则可），叫做“避籍”。人死外乡，必归葬故里。一时不能归葬，只好将灵柩停放在会馆里，有的停放达十年之久。所以经常有会馆闹鬼的传闻，而又以江南馆最



其。各个会馆都要选本省历史上乡望最高者当神供奉，有的不只一尊，如山西馆供关羽，燕鲁公所供孔、孟二夫子。而江南会馆的神位极多，戏台多达7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冠军”。光绪（1875—1908年）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特遣人从江苏昆山训练一些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井口而笑之义。这个班子以后便永远留在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二十四、湖广馆街：即现在的总府路。新中国成立前的智育电影院，就是这个会馆改建，今为王府井百货大楼。

二十五、陕西街：为陕西会馆所在地。清代以来，四川的大商业，多由“陕帮”垄断，财力雄厚，会馆宏大，街道也宽。今馆废。

二十六、贵州馆街：贵州省以贫瘠著称，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说，所以会馆也小。后来贵州人李世杰、丁宝桢先后任四川总督，为了争体面，对旧会馆扩而大之，戏台、耳楼都盖得很精致。辛亥革命时，巡防军哗变，四川藩库所存的几万两白银遭乱兵洗劫。军政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经费无着。川剧名旦杨素兰，捐田六十亩助军。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曾颁发勋章（嘉乐章）表示奖励。杨素兰受勋之日在贵州馆演出《游园》。尹都督多喝了几杯，竟将杨拉下台来，迫其伴酒，台上台下，一片喧闹。警察总监杨维认为尹昌衡失仪，扣他一个月的薪俸，作为处罚。

二十七、天祥寺街：天祥寺供奉的是文天祥。广东沿海一带，是文天祥抗击元军之地，蜀人也建寺庙祭祀，让人们怀念浩然正气的人物，如苏东坡所说：“其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无乎不是。”祀文天祥的祠庙，北京和外地称“文丞相祠”、“文信公祠”，或“文忠烈公祠”，唯独成都直呼“天祥”，更显得亲切。

二十八、四圣祠街：此街建有曾参、颜回、子路、子由庙。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实行侵略，毁祠建教堂、开医院。光绪年间的一个端午节，有人在东较场撒李子，说是吃了这李子必能生儿。一些无知妇女争相抢食，人便越涌越多。此时洋人杀了中国娃娃的话在群众中传开了，激起公愤，齐奔教堂，连同医院一齐捣毁。这就酿成了“教案”。总督参官赔款巨万，道歉再三，另兴土木，规模胜前。虽经沧桑巨变，人们仍以四圣

祠呼街名，足见民心不可侮，众志不可夺。

二十九、川主庙街：各省各地皆有“土主庙”，奉祀开辟本土有功的或附会与此地有关的名人。四川许多地方奉大禹为“川主”，重庆为古巴国，祀巴满。成都的川主庙则祀李冰。

三十、小关庙街：成都的关庙不少，少城内更多。在大城除山西馆奉关羽外，还有老关庙和小关庙。过去军人强占庙产变卖，把老关庙卖给豪家建宅第，改老关庙街为玉泉街，取《三国演义》“关云长玉泉山显圣”之说以留痕迹，故今仅有小关庙街了。

三十一、玉皇观街：原是道家的庙宇，供玉皇大帝，很宽广。清末办学，往往利用庙宇改建。“客籍学堂”就是利用这所庙宇改建的。当时各省的府州县都在办学，学生各以其籍贯就学。省城的大官都是外省人，所以特办一所客籍学堂，收少爷公子们读书，后来改名“宾萌学堂”。“宾萌”二字出自墨子，“宾”训宾，“萌”训民，较“客籍”典雅。这个学堂民国初年停办，又在此地创办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后迁到少城西胜街新校舍；此处又办宾萌公学。宾萌又停，改办尚志学院。现在是成都市二中的校址。

三十二、马王庙街：马王庙在成都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庙门首有一副很精彩的对联。联文是：

卜王道其昌乎，歌天马来从西极；

此房星之精也，有苍龙见于东方。

三十三、文殊院街：旧佛院毁于明末战乱，清代逐渐恢复。清末罗思举任四川提督时，以护法神自任，募款大修，48根大石柱从淮州（金堂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狭窄不能通过，在北门城墙拆豁口，才得拖入城内。文殊院石幢上刻有罗思举的名字，因风化看不清了。这座庙可算是成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佛庙。

三十四、三圣街和三圣祠街：四川人崇敬刘（备）、关（羽）、张（飞），偏州下邑都建有庙。省城旧时还有三义庙，在提督街，也是奉祀刘、关、张的。

三十五、张爷庙街：张飞是杀猪匠出身，出自宋人平话。《三国演义考证》一书，更有详细记载。所以各乡县的屠宰行业，都建有张爷庙，专祭张飞。成都的张爷庙也是屠宰业所建。

三十六、坛神庙：旧时里巷，经常有“庆坛”（庆乐坛神）之典，男





觋、女巫，持幡跳掷，以湖南一带最盛行。坛神庙与其它庙观不同的是，庙内没有塑神像，用大红纸一张，写了一些神名。据说祖师为赵公明，出自《封神榜》，所以有赵玄坛之称。

衙署兵营类

凡以官衙、厅署、军营、官邸命名的街道，可以划入衙署兵营类。这类约有 40 余条。现仅一孔之见，择要简介如下，不当之处还望贤者教正。

一、督院街：明、清制度，一省总揽民政的最高官员，称为巡抚，别称抚台、抚院、抚军、中丞。明代的巡抚是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虚衔，故又称部院、都督。明朝住成都的巡抚办公地点在将军衙门（现人民公园西侧），当时叫督院。清代，顺治初（公元 1653 年左右）设四川巡抚，先住皇城（现人民南路四川科技馆处）。雍正九年（1731 年）设四川总督，督府初设重庆，后迁成都南府街设总督行署。总督系地方最高长官，别称制军、制台，管一省或两省的军民要政。四川有了总督，巡抚一职便觉多余，不久四川总督兼巡抚的衙门由南府街迁城中偏东南位置新建，街因总督兼巡抚所在（现省人民政府）而得名。这条街，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见证。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成都郊区红灯罩起义领袖廖九妹（廖观音）从仁寿起义，攻破成都南门，杀到督院街，差点攻进督部大堂，震撼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宣统三年（1911 年），四川人民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总督、大刽子手赵尔丰于 9 月 7 日在这条街上，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保路死难”事件。辛亥革命中，赵尔丰又在这条街上被抓到皇城砍了脑壳，宣告了满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彻底垮台。四川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通电由这条街发出。20 世纪 30 年代四川军阀混战时期，走马灯似的督军下野、督办上台，闹得乌烟瘴气，无不以抢夺这条街为目标。1947 年 12 月 28 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高喊“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冲进伪省政府，占据一天，面对面斗争了国民党的鹰犬严啸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气焰。1948 年 4 月 9 日，在这条街上又爆发了伪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屠杀进步学生的“四九”惨案。几百年来，这条街岗哨林立、刀枪耀眼，阴森得很。1949 年底，光明降临成都，督院街终于建

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保存这条街名，不仅它是中国漫长历史的见证，也是进行历史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

二、藩署街：因街有藩台衙门而得名。明、清制度，主管一省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叫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即上承天子命令宣布政教，下喻黎民，权力仅次于巡抚。民间视之如同诸侯，故称布政使司为藩台。明朝在四川的藩台衙门在城北武担山前，故其旁至今仍留着藩署街地名。清代仍在旧址建藩署衙门，康熙六年（1667 年），迁城西将军衙门处，现院内两棵大白果（银杏）树，就是当时种植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将军衙门一带划入少城，居住满蒙官员兵丁，藩署迁至城中书院街附近新建，占地甚广。在其旁不远处，又建臬台衙门。清制，主管一省司法的衙门叫提刑按察使司，简称臬司。主管官员叫按察使，简称臬台。“臬”是“圭臬”即标准的意思，意为量刑用法以此为准绳。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深很深，位置在春熙路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处，深达半条街。藩司、臬司统叫两司，但只有藩署街名留传下来。

三、藩库街：藩台既然主管官吏钱粮，就得有相应库房收藏版籍图书、钱粮布帛，故在藩署街之北建广济库，设布库大使，司出纳，号藩库厅，街亦因此得名。明、清制度，一省首府收藏的银钱粮布，应保证全城闭城三月不闹饥荒，所以全街都是风火高墙库房和厅官衙门、库丁营帐，由此派生得街名。清代晚叶，外强勒索、割地赔款，四川每年上万银两由此汇聚递解押京。辛亥革命时，曾在此街发生清兵入城抢掠藩库纵火事件，附近居民亦被洗劫一空，造成“打启发，抢藩库”惨案。

四、总府街：明、清制度，一省最高长官叫巡抚，但遇有军事行动时，常跨省行事，故在几省巡抚之中任命一名为总督（仍兼本省巡抚）。军事行动结束，总督之职撤消。清初，四川未设总督。康熙年间，为筹划进兵西藏，曾暂设总督兼四川巡抚，在巡抚衙门之外另建总督衙门（现东风饭店位置）。不久，总督之职撤销，街名留存。

五、提督街：明、清制度，省以下的武将官阶从上至下为：提督、总兵（镇台）、副将（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副把总）。提督是一省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归总督和巡抚管辖。但在战乱之际，有兵则有权」如清乾隆（1736 年—1795 年）时，岳钟琪任四川提督，就署理过总督。清道光时（1820 年—1851 年）杨遇春亦以提督衔实





授陕甘总督。武人有此大权，衙门也就崇宏壮丽，守卫森严。像提督街，街面宽阔、马道、箭道、辕门、旗杆，井然有序。提督衙门在辛亥革命后已废置，改为“中城公园”，后又改为“中山公园”，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沦为兵勇烟娼会聚之所、投机倒把市场和枪毙人犯的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填平废坑，栽培花木，改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六、中山街：这条小巷与辛亥革命并无关联，其南之提督衙门改为“中山公园”，这条雀市小巷也改为“中山街”，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七、指挥街：明代在各省省会设有“卫都指挥使”，衙署叫指挥使署，职责是募集、演练兵员，保卫省城治安，类似以后的警备司令。街因衙门得名。清代废除卫都指挥使，街名沿用。

八、前卫街：明初，朱元璋分封儿子们到各地任藩王，监督当地军政官员，王位世代相袭。朱椿分到成都，号蜀王，住皇城。王府卫队共有五卫，前卫队驻扎在这条街，因此得名。

九、学道街：明代主持一省学政和考试的主考官称学政，又叫提学道、学院、学台，到清代，为尊重教育，将学台职称更名为“钦差提督学院”，名义在一省百官之上。但因无军政实权，实际担任此职的官阶品位又在巡抚之下，其渐渐也就靠边站了。其衙门名提学署（位置在现四川省教育厅处），街因此得名。这条街及附近的古卧龙桥、青石桥等街，自宋以后千多年来，都有木版印刷书店开设，前门卖书，后门设厂（木版刻印拓片成书）。全川以至云南、西康、贵州等地需要经史子集一类书籍，大多由此街印出运送。一进此街，便有薰薰学风之感。

十、盐道街：明、清制度，对盐、茶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因产地稀少或产量集中，为生产必需，概由商产官销，价格划一，远赔近赚。四川自贡产盐、蒙山产茶，盐需供应全川乃至西南，茶则包销康藏，所以设有相当于道台级的盐茶道衙门。这座衙门是清雍正（1723 年--1735 年）时在宋代转运司的西园故址上修建的，名盐茶道署，后焚于火，乾隆七年（1741 年）时重建。由于这是只赚不赔的大肥缺，每年过手费用甚巨，因此，官衙修得特别讲究，高屋重阁，修竹葱茏，幽径深墙，劲松苍翠。其址现为盐道街中学。

十一、正府街：成都府知府衙门所在地。知府管辖十六州县，即成（都）华（华阳，今华阳与双流县一带），简（阳）崇（崇宁，今新都区与

广汉一带），汉（广汉）、温（江）郫（县）崇（崇庆，今崇州市），新（新繁，今新繁镇与新都区一带），灌（灌县，今都江堰市），新（津）新（都）彭（彭县，今彭州市），双（流）什（邡），金堂十六县。当时没有市政府一级机构，各省省城，都有首府首县。成都府和成都县、华阳县即为四川的首府首县。府县本身已有不少事要办，每天还得承办总督、巡抚交下来的军政事宜，所以在清朝，每天一早，天还未亮，成都知府，成都、华阳知县，就带着人夫轿马飞奔上院（指总督衙门，位置偏南，故又称南院），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挑着衣服箱子、伙食担子，以备添衣进餐。原因在于见总督之后，要承办之事可能甚多，就在督院签押房办公，到深夜才能回衙。成都府本身的内外公务，则由辅佐知府的同知、通判等承办主稿、问案事宜。成都、华阳两县的事，则由辅佐知县的县丞、典史等官员承办。即使这样，府县之事繁杂，仍忙不过来，于是成都府又设立办事处，故除有正府街的府衙门外，另在东府街、南府街、西府街设立府衙（止府街偏北，故不设北府街）承办公务。遇到重大案件，辅佐官员承办不了，才提交知府判断。在旧时，有的人在府衙打了几年官司，过堂若干遍，直到判决下来，还没见过知府呢。

十二、署前街：因街北有明代藩署衙门（武担山处）而得名。街内有明、清时的成都县衙。县官是七品芝麻官，比不上声威显赫的二品官总督，故有官衙而无街名，可见封建等级观念何等浓厚。成都县衙位置原为汉代大文学家扬雄故宅，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八一小学。街东与正府街相邻，正府街东口为华阳县衙署，原为五代前蜀王衍（920年左右）飞鸾阁故址，在明代是通判署，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为华阳县衙署。清代有民谚："正府街，成都府，成都、华阳两衙署；喊冤递状一通鼓。"意思是相邻两街，三座衙门相连，在一处击堂鼓，三处都能听到。

十三、厅署街：明制，中央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第一把手，称为尚书，俗称堂官；每部有两员副手，称为侍郎，俗称厅官。坐堂议事时，堂官居中，厅官坐到左右。到省、府、州、县，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称为正印官，俗称正堂；辅佐官员称为厅官，俗称右堂。这类小官也有衙门，距正堂官衙不远，故以厅署衙门命名，街也因此得名。

十四、都司巷：都司是清代武将的职称。成都都司的任务是管理治安，负责侦缉盗贼，扑灭火灾。街因有都司衙门而得名。又一说都城隍上



任，走到这里，五更鸡鸣，故在此修有都司庙，留下都司巷街名。

十五、将军衙门街：清朝的军事重地，都驻扎有满蒙八旗军队，设都统或将军统慑。将军品位，高于都统，非满蒙大员不得被任命。清初只在四川设副都统，节制满蒙八旗兵，衙署在今商业场街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四川疆域辽阔乃改设将军。成都将军，还掌管松（松潘）建（建昌即西昌）镇的文武之权，负责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政事宜。将军对四川、成都的军政事宜虽不具体过问，但朝廷对将军的信任，一般是超过由汉族人员担任的总督、巡抚的。但到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后，满旗官兵耽于逸乐，不能抵御。当时，四川将军兼总督完颜崇实（现杜甫草堂留有他写的匾额），自认才干不如来川督命的汉员骆秉璋，于是自甘专任将军，将总督之权委之于骆。自此，将军一职，直到清朝灭亡，都是闲职。将军的官衙，称将军衙门。

十六、马道街：在城东、南、北，原有6条马道，供马队走马练习之用。现在的马道街，原名平安桥南街，靠近城中西华门处。清朝各大衙署最初都在城池西南角的少城。文武官员上衙均骑马（后文官才改坐轿），这条街乃进出少城必经之地，故名马道。辛亥革命后，城市人口增加，其扩建为街道，取名马道街。清代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时，各县武生到省城赶考，也在这里骑马、射箭、举石、盘刀，总会吸引很多人赶来观看，热闹非常。

十七、走马街：街的拐弯处是清代都督衙门，城北、城西官员上督院的马队在此街停下，官员下马晋见都督后，徒步回来在此上马，因而得名。

十八、城守街：清制省城治安警卫事宜由游击办理。游击在武官品位中，高于都司。所辖兵丁，白日在街上巡逻，夜晚守护城门，类似武装警察，职权甚大，可以入民宅搜捕罪人。游击衙门又叫城防守御衙门（现四川省图书馆后门位置），街亦因此得名。

十九、东、西马棚街：在少城内。原系四川将军统率满蒙骑兵养马之地。棚为篾棚，高大宽敞，无一住户。现在街房，均是辛亥革命后陆续修建的。

二十、较场坝街、点将台街及东、南、西、北较场：这些地名顾名思义为驻扎军队的地方。清代以前，城内驻军均在东、南、西、北较场，官衙兵署仅有少量兵丁。较场内除官兵营帐住房外，主要陈设刀、弓、石及

马，供练习武艺之用。因此，较场均系开阔平地。清代中叶，枪炮装备到军队，东较场即辟为靶场。为适应野战，在城外设有较场坝临时军营和点将台。这些永久性设施为街名奠定了基础。成都又系省会首府，驻军较多，故较场坝、点将台地名不止一处，街名则各限一条。

成都四个较场，历史悠久，都有不少可传之事，甚至可以写出专著，介绍沿革和佳话。

东较场，在城东北角，靠近四圣祠教会医院（现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成都人民曾在此爆发过打李子逐洋人的反帝教案（参见《成都风物》第二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抗日战争前后，蒋介石为掩强拉民夫补充兵员的罪名，在此设立过戒（大）烟所。表面上是集中吸大烟游民戒烟，实际上派兵到城乡拉丁捆绑押送到此，再集中外调。壮丁们在此绳捆索绑，日食两餐稀饭，睡稻草地铺，常遭毒打，惨不忍睹，多次发生壮丁半夜偷偷跳下城墙摔死摔伤的惨剧。

南较场，在城西角。李劼人著《大波》中，曾生动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前在这里开运动会，学生与士兵、警察发生争执，大打出手的事件。

西较场，在城西角，与南较场相邻。横贯成都的金水河流经营地前面。自明代抗倭名将谭纶主蜀督兵疏浚金河之后，以兵丁协助民工疏浚金河、御河即成惯例。在清代，每遇夏季暴雨季节，西较场军队要昼夜守护通惠门水门，安放闸板，防止江水淤灌成都。这在以鱼肉百姓、吸民脂膏的清兵来说，算是唯一的不逆民意的好事。在西较场，还另有一趣事：1918 年，四川人民备受军阀割据之苦。当时贵州人戴戡任四川省长兼督军，统带黔军压抑川军。川军不服，在成都西较场掀起打戴戡的浪潮。戴的黔军驻在皇城，自恃有子弹库、丰裕仓，可资防守，为开阔射界，放火把皇城周围的后宰门、皮房街、顺城街一带烧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为惩罚戴戡，川军在西较场城墙上架炮，一炮打中皇城子弹库，摧毁戴戡赖以恃强的依据。戴只好弃城逃跑，自杀于仁寿秦皇寺。戴戡的炮兵也曾轰击过川军营地，但命中率极差。当时有首竹枝词嘲笑说："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北较场，在城西北角。场内武担山，是有名古迹。公元前 3 世纪往上，统治西蜀的是奴隶社会的开明王朝。开明王曾娶甘肃武都女为妃。王妃来成都后不服水土，不久便香消玉殒。蜀王命武丁（劳役奴隶）到武都担土回来



为其垒坟为山，故名武担山。山上立有开明石镜。这座青冢和石镜，两千多年来，曾引得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著名文士诗人留下不朽的诗篇。开明石镜虽在宋代以后湮没，山仍屹立。现山上有六角七层石塔，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曾登临高塔，俯瞰蓉城胜景。

北较场在公元前3世纪的开明王朝时期，是成都城的墓葬区。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蜀同建成都大城，这里仍未划入城内。以后各代，成都历经扩建，北较场才划进城内，成为兵营。1934年，蒋介石借口围追堵截红军，军政势力打入四川，在此建立黄埔军校分校，北较场成为训练军官的大本营。

二十一、马镇街：清军马队、八旗骑兵驻在少城，但汉营马队和往来公文传递的驿站马队，却集中在城东的城墙内侧（辛亥革命时期这些地区，如东较场、城隍庙、马镇街等均已建起街房），管理马队的机构衙门在今第五中学，街亦因此得名。

二十二、武城大街：守备成都的游击、都司衙门（相当于现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均在城中，设分理机构于此街，故名武（装）城（防）大街。

二十三、教练所街：清末，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二十四、锦官驿街：此街系通往川东驿站的起点。走山路第二站为龙泉驿，走水路则为二江驿（现中兴场附近）。成都古名锦官城，故名锦官驿。又一说为唐朝监造、检验蜀锦衙门所在地在此街，发往外地的蜀锦由此起运，故而得名。西蜀产蚕缫丝由来已久，《淮南子》说蜀字与蚕状相类，春秋前古蜀王有名蚕丛的，公元前8世纪至5世纪，古蜀国的蚕丝业已很发达，并远销中原大地和东南亚。成都南郊的锦江，江水清冽，濯锦尤艳。唐代建锦官城（在今南门万里桥外右侧），设锦官监制蜀锦，城内设锦官衙门。

二十五、红照壁街：在城中。其北为皇城。明代皇城有垣，御河围绕城墙。皇城正南门御河上有金水桥3座（现人民南路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处），故名三桥正街。桥前空地，为文武百官到皇城朝拜藩王停轿驻马之处。此地立有赭红照壁，作为皇族标志，每岁要上赭泥以示吉庆。街名因

袭地名而来。大照壁于1927年拆除，街名犹存。

二十六、大、小福建营，宁夏街：清初，清军福建、宁夏籍士兵奉派入川，扎营于此，街名得以流传。

方位字序类

凡以方向定位、数字序数命名的街道，我们归为方位字序类。以序数、方位命名地址、街道，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少数有某种纪念意义外，大多数约定俗成，以顺口的序数和所在位置的方位命名。成都的序数街道，有30余条；以方位命名的，有40余条。有些街，可以顾名思义，了解含义，如东、西丁字街、三倒拐街、四方村、五世同堂、八里庄等，不需一一阐释。这里，仅对一些概念易于混乱、望而误解的街道命名，作一简略介绍。错误之处，尚望读者教正。

一、一水巷：在城东，因临近南河，为供给城内饮水，旧时有水车、水担由此出入，源源不绝，故以命名。明代在街口，设有铁铸水门，以备关城防御之用。同此巷命名含意相同的，还有二水巷、水巷子等。

二、一环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人民政府逐步沿成都城郊四周修筑了环行公路，命名为一环路。沿公路两侧建成栉比鳞次的新兴工业区，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二环路、三环路亦以此类推。

三、东、西二巷：在城中四川省科技馆后门外，原皇城后门名为后载门，门外由南向北为回民聚居小巷，使名东、西一巷，二巷……清代中叶，小巷合并成街，唯东、西二巷仍存。

四、三多巷：旧时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祝颂之词，语出《庄子·天地》篇。以此命名为祈祥祝愿住户平安如意，多福多寿。与此命名相同的还有三多里。

五、三桂街：以街中植有三株桂树命名。

六、三圣街：旧时供奉刘（备）、关（羽）、张（飞），建有祠庙，街亦得名。另有三圣祠街，为道教建立的供奉三霄（云霄、琼霄、碧霄）娘娘祠庙所在地。

七、三元街：由此派生出三元正街、横街、河街和三元巷等。因清代



在此有道教的三元宫而得名。道教称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为上、中、下元节；又称天、地、水为三元，为万物之宗，故立宫祭之。现庙废街名犹存。

八、四维村：旧时以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纲，又称“四维”，为道德观念。语出辅佐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管仲之《管子·牧民》。

九、三道街、四道街：在少城长顺街旁，原为满族兵丁胡同，依顺序为一、二、三、四……道街，现只存三、四道街名称。

十、五福街、五福村、五世同堂街：旧时以福、寿、富、德、治终命（不遭横死）为五福，以此命名表示祝愿祈祥。五世同堂街的得名源于清代乾隆时此街有张姓之人，老少五代同堂，乾隆认为这是吉庆，亲笔题词；四川地方官吏前往祝贺，赠有“百岁老人”匾额。街亦因此得名。

十一、九如村：诗经《小雅·天保》中有“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中连用九个如字，有祝贺福寿延绵的意思。

十二、九思巷：原名九寺巷。《论语·季代》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指待人处事应有的品德，以此命名含有君子自谦和警己之意。

十三、九龙巷：九龙壁是旧时皇帝发源、巡幸、驻足地点的一种建筑，是天威皇权的象征。北京故宫就有九龙壁。佛经上也有龙生九子，领管天下水系的说法。集九龙于一壁，更是显示皇帝是“真龙天子”的标志。有人望街生义，以为这里距皇城不远，大概过去建过九龙壁。成都从来不是中央天子登基之地，更未成为统领全国皇族的首都，故从未建筑过九龙壁。这条街不在皇城内，得名与皇帝、皇族无关。皇城在明代住有藩王，但限于封建礼制，不敢建龙壁。在清代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重建成都定街名时，以传说在金河、御河之水下，有龙潜伏，守护御河之龙在九龙之中又数老九，故命名御河旁的小街为九龙巷。另一说，在此街原有九壁村，命名时沿用九壁之名。

十四、十一街：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人口激增，南城外扩建，按序数命名有十一街、十四街、十五街、十七街，并派生出有对应名称的巷等。

十五、十二桥街：在城外西南角。1935年前后，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将南打金街口城墙拆除，城外坟地铲平，跨江建有十二桥格的木

桥。桥虽不大，却要大吹大擂记功，在桥头刻石题字，说扬州城外有二十四桥，流韵于唐宋文人之笔；今建此桥，仅得其半，亦可平分扬州明月，故号十二桥。桥头新建街道命名为十二桥街。

十六、东城根街：打开成都地图，会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在城西会有东城根街，城中会有月城街，东、西顺城街；再一查，西城还有东城拐街、东瓦街等；东城又有以西方命名的街道，南、北城有的街的方位又名为北、南。这就应联系八九十年前的成都城市规模才能谈得清楚。20 世纪初，成都四周有高壁城墙，以后陆续拆除，现仅新南门留有一段明城作为重点文物古迹保留下来，但其规模可以从地图上见其端倪，其轮廓大体是正方形，有“穿城九里三”的说法。在靠近城墙处命名街道时，自然有的就与城字沾上了边。城中心以现省科技馆为中心，筑有面积约 3～4 平方里的皇城，内有宫殿，外筑城墙，沿城墙就有顺城街、月城街等街名。成都城内西南角，又筑有满族官员兵丁居住的少城。沿少城城墙就有了东城根街等街名。沿皇城、少城有金河、御河及城内排水大沟等流过，于是就有了东、西华门街，东、西御河街，金河街，东、西龙须巷，东、西沟头巷，西城角边街，西城巷等名。正由于成都是城中有城、城墙多，依城为名的街也不少。

十七、东、北通顺街：在城北靠原城墙处。旧时，城墙外是开阔地，不许建屋架房，再外是护城河，河外再建街道住房。城墙内也是一片开阔地，便于守卫城防时聚集兵士、储存兵器弹药粮食，设立营帐锅灶。辛亥革命后，靠内城墙一带逐渐为市民建屋占据，堵塞交通，后拆房辟街，故取名通顺街。

十八、青龙街：古代神话传说，仙人居住天空星宿上。在北半球东方，有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共七个星宿组成龙形的东方天神。古代又把青、赤、黄、白、黑称为正色，代表东、南、西、北、中央五个方向。所以，东方为龙，称为青龙。后代道教把青龙、白虎、朱雀（红鸟）、玄武（黑龟或龟蛇合体），合称四方之神。又按《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因此，左边方位一般是以青龙作为代号。传说前蜀皇帝王衍在乾德元年（919 年）在成都城内西北角修有亭台楼阁，常住其内。由于他是皇帝，住地外面可以用四方四神命名，故取了青龙、白虎等地名。以后街道多次遭受兵燹，白虎街





名似为不吉，故宋以后续建城市时未予恢复，仅青龙街留传下来。另一说为：过去在墨池（现十三中学）附近，有人见青龙从天而降，至墨池化为美女，因建龙女祠以为纪念。后此街命名为龙女祠街，现又改为青龙街。

十九、东华街：位置在皇城东华门处。皇宫各门名称，均按一定礼制定名，东方日出为华，所以取名东华门，街依门而定名。

二十、千祥街：原名监墙街，因旁边为署前街，为明清时代的成都县衙及其监狱。居住于此的人嫌街名不吉，谐音千祥，得以留名。祥，表示吉祥、吉利；千，泛指多数。类似的还有万福街，取其吉利多福之意。

市场作坊类

凡以街内集市、作坊命名，或集市、作坊不集中但有典型意义而命名的街道，我们归之于市场作坊类。

以集市、作坊为特征命名的街道，大概从城市一建立就有了。成都古代养蚕缫丝，进行交换，就有了蚕市和随商品生产发展而兴起的药市、珠宝市、香料市（唐朝时这些市场在东风路一段）、织锦市（在现南门大桥）等。城市的发展，人口稠密，交换频繁，集市随街或在空旷场地进行。这些地方叫顺了口，街名约定俗成。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屡遭战乱破坏，清康熙年间陆续修竣完善，人民休养生息，集市、作坊得以兴起，至今仍留有七八十条以集市、作坊命名的街道。其中，有的定名于清代以前。现择其要简介于下。

一、青羊肆街：现名青羊正街。这是成都较古老的一条街道。肆，就是铺子、商店集中的市场。两千多年前，成都是以青羊肆为中心的城市。公元前316年，在青羊肆东北方向建筑成都城市，青羊肆成为郊区。唐代，浣花溪一带遍植梅树，是有名的风景区。唐末僖宗为避黄巢起义逃到成都时，青羊宫被神化为道教老祖太上老君李耳（名聃）升天发祥地而得到渲染、神化，街名一直流传下来。

二、骡马市街：四川古代所用之马，多来自建昌（越西、西昌一带），称“笮马”。马体瘦小，能行山路，适合四川多山地区使用。成都马市在城四郊，不在城内。蒙古人占成都后，甘肃、内蒙马膘肥体壮，用场不大，在市区内辟了不少地点养马。清代初，成都驻有满蒙八旗兵丁、陕、

甘、宁、蒙马群骤增。为适应满族贵族买马需要，在少城外，皇城后门处设骡马市场。康熙、雍正年代之后，四川无大战乱，马队作用减小，马市迁到城外，但街名犹存。相邻的羊市街，则因皇城后门为回族集居地而开设羊市，地名留存下来。

三、笔贴式街：原名玉石街，系出售玉石珠宝商聚居地区。笔贴式系清代官职名称，在中央一级的品位相当于汉制的翰林（即与状元同科殿试中选的举人，后被授予的职务）。在各省省城，这一职务品位照例要低于翰林。其任务是将满文译为汉文，或汉文译为满文。满清入关之前在东北立国，设立此职，翻译官方文书。清统一中国后，各地皆设此官职。成都的笔贴式衙门设在此街，故而留名。当时，各地官衙文书，凡有重要军机要事，皆送这里，翻译之后再送京城。以后，满人逐渐汉化，满文不甚流行，到清代中叶，译文只限于送皇帝直接批阅的呈文，才经过这里译为满文，其余送中央各部文书均用汉文书写，拿到这里盖一个三角形小章，即可发出。

四、炮厂坝街：火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发明用火药、石头、铁片拌和的地雷。明末荷兰人侵入中国，使用了引燃火药的铁制的大炮，明史称为“红夷大炮”，源于当时称为“红毛国”的荷兰。清代，在成都造牛耳大炮，留下街名。清朝末年，旧成都号称“两根半烟囱”，指全城没有工业，烟囱少见，其中一根就是炮厂的烟囱。这根烟囱日夜喷吐黑烟几十年，因为不管是清廷，还是随后踞厂称霸的各路军阀，都需要枪炮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啊！

五、暑袜街：在19世纪末，织布机和洋商倾销织布入中国前，中国人的穿着，有钱的穿绫罗绸缎，无钱的穿手工织布。脚上，有钱的穿毛袜、布袜；无钱的在喜庆日子用裹脚布、穿布鞋，平时只穿麻鞋、草鞋，不穿袜子。明代，中上层人士习惯穿羊毛袜，柔韧合脚，温暖舒适。这条街集中了卖毛袜的商店，夏天则卖油灯布袜。油灯布又名云绸，质轻细腻，轻巧凉快、加工方便，价格不贵。四川天暖，冬袜穿用时间较短，夏袜穿着时间较长，因此，街道得名暑袜街。清末，洋袜（机织线袜）入境，传统衣物大受冲击，这条街的袜铺（大多厂店不分，店员即制袜工人）逐渐倒闭。辛亥革命前，暑袜店已然无存，街也被叫成“水花街”了。“水花”含意，据说在靠三义庙处有一眼井，能通大海，井内常冒水花，故而得名。



六、线香街：线香，指无骨燃香，药料拌合搓成如火柴粗细的香，为区别敬神祭鬼用的竹芯的燃香，故名线香。这条街手工作坊所产线香，系指类似现在盘旋成盘状的线香，用以敬神祇，驱臭气，避蚊蝇，点燃一盘、满室生香。明朝此街就有线香作坊，明末战乱，街成废墟。清代有福建籍士兵钟姓者流落此街，开设线香作坊，因而得名。后一度改为“代书”街，因拐弯的正府街，以前为民国省法院所在地。打官司需写状纸，而诉状又有一定的格式，一般人写不了。就有一些人，专门或业余在此街开设代写状纸的小店或字摊，帮人写状得些钱财。这类人中，亦有专门代写代打官司的讼棍，故取名“代书街”，不久又复原名。

七、椒子街：系东门外靠北一条小街。街名来历，传说有二。一为街内有棵油兰树，果实名山胡椒，可以入药，故名椒子街。二为宋代以前，全国通用货币，最早为实物交换，后为贝壳、骨牙、石料等作为交换媒介。春秋（公元前776年—前476年）时诸侯各国以铜铸币，与金银同为流行货币，以后又有了铁币。但钱币重量重，不易携带。宋代（960年—1279年）张乖岩帅蜀时，用兑票形式，以布印字代钱流通，称为“飞钱”，又名“交子”，即作交易用的筹码。后以纸印的飞钱也叫交子，这在货币史上是一重大革命，交子是世界用钞票的鼻祖，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使用的流通纸币。这条街位置在进出成都的咽喉，货币钱庄较多，招商旅店不少，使用“交子”普及，故名“交子街”，讹音“椒子街”。

八、紫泉街：这条街街名演变甚大。因靠近椒子街，临近锦江，取水方便，并有制纸手工业作坊。纸制出后，用以印“交子”。汉代王莽曾发行铜币，称为“泉货”。“交子”又叫“纸泉”，不叫“纸钱”。因以草纸打孔的纸钱用来焚烧以追荐亡人在阴曹使用，为避不祥，故纸币不叫“纸钱”而叫“纸泉”。是否如此解释，因明末战乱城毁，无以为考。到清代，这条街系郊外墓葬区及猪牛市场，又脏又臭，住户不多。后住户增多，扩成市街，常遭火灾。为取吉利，四川人翰林顾汝修将这条街取为罗泉街。罗读纸，即香草。定名时，取罗压臭，取泉压火。罗字不好认，谐音为芷，故一度命名为“芷泉街”。芷字也不好认，又谐紫，留名紫泉街。顾汝修曾任过驻越南使节，出入府廷时，身后有人撑打黄伞，以示中华象征。他在成都居住的街，取名为黄伞巷。

九、珠市街、珠宝街：稍微留心成都地图，可见珠宝街、珠市街、金

丝街、银丝街、白丝街等出售贵重首饰、生丝的街道，都集中在成都北门大街附近。寺庙道观也多集中于此。进入北门，就有真武庙（北大街）、火神庙（酱园公所街口）、五岳宫、白云寺、喇嘛寺、狐仙祠（通顺桥）、文殊院、灶君庙、如是庵、文庙（白家塘街）、楞伽庵等，都在北门几条街内，几乎一街一所寺庙道观，甚至一街两座庙宇。由此可以想见，清代成都北门是何等繁华，买卖货物和赶庙会是多么吸引人。这与城市建设有关。明末清初，成都系一片废墟。清初的四川省省府设在阆中。康熙初叶（1662年）成都知府龚应熊着手建筑成都。因帝王居住北京，帝王派出使节到四川来，经川陕栈道从北门进入，所以在北门外天回镇建有“迎恩楼”。市内则先建北门入城大道。为给外人留下成都繁荣富庶的景象，北门就建了出售金银饰物、珠宝玉器的商店和吸引游人的寺庙道观，然后再陆续向城中发展。不过，珠市街最初确系猪市，其旁有米市（新开市街）、草市（街）、锣锅（巷）市场等。著名作家巴金的祖父李浣云，住在通顺街，深宅大院的后门，是东猪市。他认为不洁，出资在此修了不少独院，连接成街，借西猪市旁的珠宝市街之名，改东、西猪市为东、西珠市街，沿用到现在。

十、锣锅巷：古代军中使用的炊具之一铜锅，晚上敲击可作为报更、报警的响器。清代康熙、雍正时代，为统一西藏，曾在成都着手准备，扩充军队，使这条街的铜器业得到发展。直到清末，仍有做锣锅的作坊开设。

十一、打铜街：拐弯是锣锅巷。锣锅巷系马前大道，设有出售铜器的门市部，加工铜器的熔炉和敲捶作坊则设在打铜街。清代后期，打铜作坊迁走不少到祠堂街开店，出售铜制壶、瓯、墨盒、镇纸等，但打铜街名流传下来。

十二、作坊、集市街道：成都手工作坊，从汉代起，已十分发达。成都的“蜀刀”，曾远销印度、缅甸及东西亚。成都的金银丝编织品，工艺独特，历代均列为贡品，蜚声世界。19世纪时，欧美人视中国金银雕塑编织器件为奇珍异宝，甚至今仍享有盛誉。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均为清代手工作坊及出售产品的聚居地。其旁的白丝街，系出售白丝、黄丝（织锦和织布原料）的集中地。类似以生产作坊或集市取名的街道，还有金玉街，集中了买卖生金、璞玉的商店；玉沙街，是对玉石粗加工的作坊街道；玉石街，是对粗加工后的玉石进行精加工的作坊及人员居住地；纱帽



街．开设有好多家制作戏曲服装、纱帽的作坊店铺；皮房街，至今仍可见皮革制品商店；金鱼街，是出售金鱼、鱼饵的集市；烟袋巷，满街都是紫铜、白铜、竹、木制水烟袋、旱烟袋店铺；丝棉街、棉花街，皆系加工丝棉（蚕丝）、棉花的作坊、商店；灯笼街，清代举人以上人家皆悬标有官阶、学位的纱灯，商贾店家门口，白天靠招牌、晚上挂写有店名的灯笼以示识别，所以裱糊丝绸质地或纸灯笼，是一大行业 。辛亥革命后，灯笼逐渐被油灯、电灯代替．灯笼作坊改为生产纸伞、竹扇的作坊，但街名犹存。草市街，系郊外农民挑草（城内人买来垫床）进城出售的集市；钟鼓楼市，即鼓楼街，新中国成立后钟楼、鼓楼的建筑仍存，清代由都司衙门派兵丁驻守，用以报时和报警，楼下是沿街市场；糠市街，出售米糠的集市；石灰街，这条街上的石灰铺大多数出售由崇庆县运来的生石灰；牛市口、鸡市街、羊子市巷、羊皮坝街、豆腐街、簸箕街、浆洗街、鱼市坝街、杀牛巷、杀猪巷、坛罐窑街、肥猪市街、斧头巷，挠扒街（农具）、磨房街、盐市口、磨子村等街名，顾名思义，可以了解在清代或以前曾为集市或为有某种手工艺作坊之地。

十二、商业场：清代以前，成都布匹百货商店大多分散经营，没有集中经营之地。清末，在各省增设“劝业道”一职，主持发展本地工商业。周善培曾留学日本，有文才和经营才干，被任命为劝业道来四川后，选定城中建设“劝业场”。街面不长，不到一百米，沿街建楼，楼上楼下，都是商店，昼夜营业。开始晚间点煤油灯、煤气灯，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商业场”，添置锅炉，安装电灯。街内全是绸缎百货商店，经营进口衣料、镜子、梳子、手帕等小百货。由于清廷腐败，国内经济凋敝，有钱人又以拥有洋货为荣，因而这条街上人来人往，甚为闹热。巴金在《家》《春》《秋》中，对商业场的繁荣景象曾有过生动的描绘。1925 年春熙路建成前，这里是成都商业集中地。当时因街道短，摆不下工商百家，在其旁又扩建了昌福馆街（现东风商场），集中金银首饰行业、银楼银号，并修了戏院。这条街被取名“新集商场”。不过，因所卖商品中下层人士不敢问津，也没有商业场百货店那样吸引人，所以没有商业场那样热闹。为了满足脑满肠肥、四体不勤之人穷奢极欲，在出商业场之南辟有“锦华馆”，建有浴室、茶厅、赌场。锦华馆建成后，立即成为兵匪烟娼会聚之所，被哥老会控制。每天在这里洽谈枪支、鸦片的人如蝇逐臭，不少乡下少女被骗到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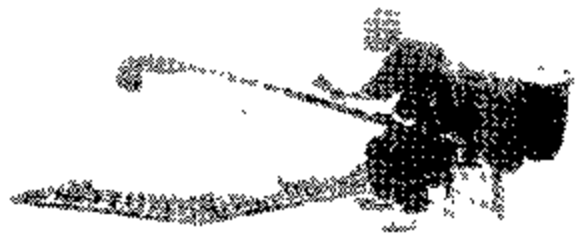
里的茶铺写下卖身文书，从科甲巷送出拉到妓院，坠入火坑。春熙路建成后，商业场就逐渐冷落，商业场、昌福馆、锦华馆和春熙饭店（这里是名为饭店不卖饭，专卖吗啡、鸦片以供达官贵人出入的场所），已由原来的地方势力逐渐转入蒋邦控制，继续干出诬人为盗、逼良为娼、骗赌贩烟、抓拿骗吃的罪恶活动，竞选参议员、贩卖壮丁，抓捕进步人士、操纵金融等黑暗勾当也在这里进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以将这些垃圾清除。

十四、名实不副的街：市场作坊街道，有的由于时代变迁，有的由于经营方式改变，集市转移，作坊搬迁，早已名实不副了。这类街道不少。染房街，在盐市口旁，傍靠流经城内的金河，明代前曾在此街开设土布染色作坊，汲取江水漂涤。后因金河堵塞，江水不畅，染房业大多迁到城外，城内仅留江南馆街有家大染房。染房街名犹存，但沿街小店，却是卖手工加工的木纺锤、象棋、骨牌、麻将、刀把等小木器的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谚谓："染房街，无染房，将帅对阵打麻将"，倒概括了这条街手工作坊的特点。烧房街，原系开设蒸酒的烧房作坊所在地。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为了弄钱，对烟酒实行专卖，酒坊停业，街名犹存。宾隆街，原来因街上有招商旅店，取名宾隆，意为祝愿被招来的从东大路进成都的客商生意兴隆之意。辛亥革命后，交通发达，旅客到达成都，都住到东大街各处旅店，宾隆街客店变成运输物资的骡马大车旅店，每天接待的骡马比客人还多，故有"成都人讲礼，连骡马都称为来宾"的说法。粪草湖街，在盐市口附近。在闹市中心，有这么一条街，太不文雅了，所以早就没有湖，也无粪草了。这里原来是成都西南方向往城外运输粮草大车的歇脚地，骡马需吃草料，故而得名。鹅市巷，在皇城外，原为鹅鸭市场。清代以后，禽类普及，到处集市均可买到，乡下人谁也不愿多跑路到这条街来卖了，但街名留传下来。

总之，市场、作坊命名街道，比较合乎自然。因此，城市屡经变换扩建，街名仍保留下来，从中，可以考察城市经济、文化的变迁过程。

桥梁水系类

凡以河、塘、池、沟、桥命名的街道，我们统归入桥梁水系类。





《华阳国志》称："蜀江众，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名。"成都以桥命名的街道有四五十条，再加上与水系有关联的街名，共约七八十条之多。兹择我知其中故事者简介于下。

一、万里桥：李冰修都江堰，把内江两大支流郫江、检江导于成都之下，二江之上，修建7座桥，一曰长星，二曰员星，三曰玑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上应北斗七星，统称七星桥。万里桥即长星桥，又叫笕泉桥（俗称南门大桥）。因诸葛亮遣费祎出使东吴，饯之于此曰："万里之行从此始"而得名。古时它是成都通嘉州（乐山），经叙府（宜宾），下重庆，入长江，通往江南的水路码头。从唐人"成都与维扬（州），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边多酒家，不知客向何处宿"的诗句中，不难想见桥上桥下的繁茂景象。"万里桥边女校书"，女诗人薛涛曾在此居住过。现存的桥，是清康熙五十年（1771年）重修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大加培修。开桥之日，由文、武两状元踩桥（即剪彩典礼）。文状元赵以炯（贵州人），当时适逢乡试（考举人），钦命赵为副主考官来成都；武状元童中和（天津人），时任督标中军官（即总督衙门副官长），一时传为佳话。

二、星桥街：新莽时，改汉制郡守为卒正，改蜀郡为导江，公孙述为导江卒正，据成都称帝。南门大桥（市桥）为七洞，上应七宿（日、月、金、木、水、火、土），又称七星桥，称号为星桥。汉光武帝（刘秀）为统一汉室大业，遣师征讨，自广都（今广汉）进逼成都城下。公孙述出战于星桥，城陷述亡。马援曾讥诮公孙述不识大局乃井底之蛙耳。望江楼公园崇丽阁长联"鸣井底蛙"句，即言此事。

三、九眼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于一龙任四川布政使时，修建于两江汇合处。其西为古合江亭、回澜塔等名胜，是古人送别之所，宋、元人留下不少诗作。亭、塔毁于明末战乱之中。清朝初年，仿照合江亭的结构，向东迁移一箭之远建亭。光绪年间，增建崇丽阁，后又配上薛涛井、枇杷门巷等有关薛涛的古迹，形成今天的望江楼公园。

四、万福桥：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高骈增筑罗城，引郫江水绕城北向东汇合，现名府河。桥址在今人民北路大桥附近，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77年），桥头有"万福来朝"匾额，故名万福桥。另有一说，言附近有一佛庙，号净众寺，建于宋朝，内有张益州张方平，治益州有惠政，

人民画像祀之（见苏洵《老泉集》）。后改为万佛寺，再改为万福寺，桥因寺得名。

五、猛追湾：府河从万福桥向东，经清远桥（后名迎恩桥、大安桥，相当于今大一号桥的位置）南下转弯处叫猛追湾，传说是张献忠起义武装，受大慈寺和尚兵追赶而得名。

六、上莲池、中莲池、下莲池、小漆坝：均内江断水后，因地势低洼留下的池塘，曾种过莲藕的，叫做莲池，今只留下街名。

七、锦江街：街不临锦江，为何以锦江命名，只因成都人对此美名有所偏爱？唐德宗贞元六年（785），西川节度使韦皋曾从西城内引水，凿解玉溪，因临溪而得名。

八、玉沙街：濒临解玉溪，有玉器作坊，取溪水夹带的泥沙解玉，故名玉沙街。白家塘、王家塘、子龙塘均是解玉溪干涸后留下的池塘。

九、玉带桥：解玉溪转弯处，其形如带，上面建桥，名玉带桥。

十、金河街：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白敏中任西川节度使时，浚内江，由城西南角入城，取五行西方庚辛金，金生水，名金水河，简称金河，街从河名。这里建有金河上的第一座桥，名金花桥。

十一、半边桥：金河上的桥，位于大城与少城之间，以桥心为界，各占半边，故名。

十二、青石桥：旧名龟化桥，因系青石建成而得名。保路运动中，同志军从此街出发，攻进督院。

十三、东、西御河沿街：明初，康太监奉旨入蜀为朱椿修建蜀王府（皇城）。在其周围，挖土筑城，疏导河沟，外通金河，内连摩诃池。河面甚宽，建造皇城时，可运木料砖瓦。王府既成，内廷生活所需，可由船运入，此即御河。明亡藩废，清代三百年，王府改为考举人的试场——贡院，水道淤塞，逼近御河的街道，称御河沿街。御河上建桥10座，各有美称。河废，桥渐拆掉。平安桥街，以城西的平安桥而得名。成都的天主教堂首建于此。现桥废街名仍留。

十四、沟头巷：康太监修皇城，高垫地基，隆然居于中心。每岁大雨，流水四溢，有明渠暗沟宣泄出城，使城内免受洪涝之害。年久失修，到了清朝晚年，涝灾日益频繁。光绪年间，湖北人刘心沅（翰林、书法家）任成都知府，考官课，以省城如何排水为题策问考生，命各抒己见。



其中一份考卷言，成都要免涝灾，必从沟头开始疏通整个排水系统。刘知府采用其说，由主管其事的提督，每年冬季派遣军工彻底疏通。验工时，士兵要从沟头爬行出城，才算竣事。后来军风不整，此役便废，城内又闹起水灾。

“狗头巷”为“沟头巷”之讹。沟头巷下面，是地下排水暗沟开头之处。

十五、九龙巷：城内地下排水渠道，从沟头巷出去，便分为九支，号称九龙。其上面的巷道，叫九龙巷。

十六、落虹桥街：在东较场附近，是排水系统明沟上面的一座桥，如彩虹落地，形容桥式之美观。华阳县常在此处决犯人，世俗便讹呼为落魂桥，街亦因之冷背了。

十七、桂王桥：位于落虹桥之西，再西为梓潼桥、双庆桥、总汇桥、状元桥、通顺桥，以至青龙街的青龙桥，桥都随排水沟渠的淤塞，早已无影无踪，唯留街名，供人了解过去市内沟渠的分布和变迁情况。

十八、南虹桥街：南虹是上海的地名。抗战时期，南虹艺术学校由上海迁来成都，仍名南虹艺专，桥与街皆以南虹命名。

十九、十二桥：因是烈士殉难地而著名。桥建于1912年。此桥建立之前，刘湘曾在此建木桥，有十二架格，富顺翰林宋云子以扬州城外有二十四桥，取“平分扬州明月”意，命名为十二桥。

二十、水津街：津即渡口，此街是市区通向两江汇合处要道，故名。旧日成都的烧柴，主要靠岷江漂运，于是这条街成了成都的柴市。夏季水涨，漂运便利，柴价较低。冬末春初，江水干涸，柴价暴涨，以“升升米、把把柴”为生的贫民深受其害。

地貌风物类

凡街巷以其特有地物、地形、地貌命名的，统称地貌风物类，分述于后。

一、槐树街：此街在少城内，清时名槐荫胡同，街内有槐树多株，可遮阴。辛亥革命后废胡同之称，改为街、巷，这条胡同改为槐树街。以槐树命名的还有双槐树街，因街北侧一大户人家门前有两株大槐树而得名。干槐树街以一家院内有一枯老的槐树而得名。

二、桂花街、东桂街：是蜀藩王朱椿的花园，遍种桂花，清代改为东

桂街。

三、桂花巷：亦因桂花树得名，清时名桂花胡同。

四、冻青树街：冻青即冬青，凌冬青翠。清乾隆时四川提督岳钟琪住址，以其府内有一株合抱的冬青树而得名。

五、竹林巷、竹林村、双林村：都因有竹林而得名。竹林巷的东侧，今和平街小学的校园，当系赵顺平侯（赵云）宅第后面的子龙塘旧址。赵宅的前门在和平街。清末为迎宾馆，后院有竹林。

六、竹叶巷：因巷内有“竹叶亭”而得名。

七、梨花街：明代，皇城东侧墙脚下种梨树，西侧种木芙蓉。形成街道后，分别以梨花、芙蓉命街名。原街内有一小桥，亦名芙蓉桥。清末，曾在梨花街内建潜溪书院，后改为华阳中学。

八、荔枝巷：荔枝是热带产物，盛产于福建、广东，四川省产自泸州、内江一带。杨贵妃喜啖荔枝，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是她所吃的荔枝，是通过驿道快马运到长安，供其享乐的。如果从闽、粤运至长安，荔枝早已腐烂。从四川沿子午谷驿道进至长安，快马五六天可达，尚能保持荔枝的鲜味。因此可以判断，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必出自蜀无疑。成都气温偏低，荔枝不易成活，然唐诗人张籍《成都曲》有“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句，可见唐代时，成都也是产荔枝的，气温要比现在高若干度。荔枝巷必因古时那一带有荔枝树而得名。

九、泡桐树街、柿子巷、枣子巷、皂角树街、拐枣树街：皆以街内特有的树命名。

十、龙须巷：旧时，督院街总督衙门对面，有一绝大照壁，左右各有小巷一条。人们把总督衙门拟为龙，二小巷为龙须，故名龙须巷。

十一、三倒拐街、叠弯巷、宽巷子、窄巷子：顾名思义，都以其自然态势而得名。叠弯巷曾讹传为得窝巷。

十二、东、西半节巷：也以自然态势得名。西半节巷靠近羊市街，东半节巷在东城根街南口，是两条很短的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死胡同。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政府在东胜街沙利文饭店设驻华美军联络处。为了取悦“盟友”，夜夜组织高级妓女为美国大兵伴舞。一日午夜，两个“汤姆”（人们对美国大兵的卑称）在沙利文狂饮乱舞之后，踉踉跄跄窜出东胜街，借助于微弱的天灯（街灯）光亮，发现两个妇女在东城根街行走，便如狼





似虎般地扑去。对于美军的暴行，成都人民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刹那间，一块飞石将天灯击熄。漆黑的街头，两个过街鼠吓得团团乱转，跑到西半节巷口，还以为上帝给了他们一条逃生之路，一头钻进巷内，被愤怒的人群堵得严严实实，巴巴实实地吃了一顿铁拳头。

十三、栅子街：有两条，一靠黄瓦街，一近斌升街，均为清代旗兵居住区。街口设木栅栏，晨开夜关，用以防盗。街以此设置命名。

十四、双栅子街：其街原为通向城外的排水大沟。为确保城内治安，防止宵小之人潜入，每隔不远，设有木栅。这里靠近藩库（布政使司的仓库），防范倍严，设两座镶铁栅栏，故有留名。

十五、黄瓦街、红墙巷：原均为少城兵丁胡同。昔民间盖房，习有青砖灰瓦。有两侯爷，家业破败，竟以建庙宇才用的红砖砌墙，黄瓦盖顶，特别引人注目，遂为街称。清寂堂诗有“柳从黄瓦街头发，花向红墙巷口看”句，描写闾里风光，历历若画。今之明媚，尤胜昔日。

名人遗址类

凡以历代名人姓氏、事迹或有关风物命名的街道，可归为名人遗址类。在成都市内，此类街道，约三四十条。其中，有的因历史变迁、街道改建而不复存在，有的随时代发展而另取新名。仅择其要者简介于下。

一、石室巷：其旁为文庙街（古之文翁坊）。古代图书，多写在竹简或绢帛之上，串编成册或卷。为了防火，书库多为石头房子。公元前 4 世纪，秦在灭六国之前，先灭了蜀国、巴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但西蜀文化，较之中原地区仍显落后。公元前 141 年前后，汉景帝刘启任命安徽庐江人文党翁（简称文翁）为蜀郡守。这时的中国，因“文景之治”，国富民殷。文翁鉴于蜀地文化不够普及，便选了一些青年，亲自为其开课讲经，并建筑石室藏书。这个地点称为石室书院。来学习的人增多后，文翁又选成绩好的到都城长安深造，学完归来在书院任教。由于文翁提倡办学，西蜀文风大盛，出了不少人才。到汉武帝刘彻时，就下令全国仿效文翁，普建官学。两千年来，文庙街一直是成都著名的文教发达地带，石室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历代文人学者都有大量诗歌讴歌石室。现在，文庙街口石室中学还建有石室书院纪念馆。这条小

巷因紧邻石室中学（原石室书院）故而得名。

二、君平街：这是为纪念汉代思想家严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公元前200年，严遵为传播老子教义，住在这条街上，以占卜蓍龟给人看相为名，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每天他看相，只要收够一百个铜钱能维持生活，就收起摊子，回家闭门读书。由于他不慕仕宦，节操清奇，当时声名远播，很受敬重。他写的《老子指归》一书，使李耳（老子）的道家学说更加系统条理化，得以发扬光大。他又是个长寿者，活了九十多岁。汉代成都大文学家扬雄称赞严君平说："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两千多年来，这条街名未改，说明人们对思想先驱者是怀念的。

三、支矶石街：因街上留有"支矶石"而得名。支矶石又与严君平有关。在汉初，严君平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还不是神。过了四百来年，公元3世纪的晋代，严君平在口头传说中已成为神，把本来与严君平无关的支矶石也蒙上了神话传说的色彩。如《蜀中广记·严遵传》说：汉张骞出使大夏（现阿富汗北部），历尽艰辛，走到河的尽头。回来时船上载了块大石头，送给严君平看。严君平观察很久后说：去年八月，客星侵犯牛郎星、织女星，难道会是这块石头吗？它是天上织女的支矶石啊！张骞惊奇地说：我顺着河源走到尽头，见到一个女子在织锦，一个男的在役牛。我问他们的地名叫啥，女的说这里不是人间，你怎么会来呢？你把这块石头带回去，问西蜀严君平，他会告诉你到了什么地方。所以我带了这块石头回来请教你。严君平说：去年我看到客星侵入牛郎、织女星座，心里很奇怪。原来那正是你到达天上星座的日子，你已经到达日月之旁了。这是一则很美的神话传说，天上人间融为一体。但这段传说，基本上抄自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在张华笔下，有人顺着大河乘船而上，到达天河，见到女子织布，丈夫牵牛饮水。他们告之来人回西蜀问严君平就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这人回来一问，他到达天河的日子，正是客星侵入牛郎、织女星座的日子。张华没有说这个人是张骞，后代附会成通西域的张骞。

后来，一些人认为张骞并未到达天宫，也未见到牛郎、织女，支矶石街上的这块石头是古代从天上落下的陨石。也有人说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陨石。历代史料、笔记上，对石头的形状、大小记载也不一致，有说长丈余，有说长五尺，石色微紫，原有唐人摹刻的"支矶石"篆文三字。现在



这块石头移到成都市青羊宫的文化公园，竖刻“支矶石”三字仍很清晰。经过考古学家研究，它不是天上织女垫织机的天石，也不是天上坠落的陨石，而是西蜀原始部族或奴隶时代，人们为纪念祖先或祭祀需要在特定场合树立的大石头。这类大石，通称为“大石遗迹”。支矶石就是在三四千年后仍能见到的“大石遗迹”。在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西蜀前，西蜀有着悠久的历史，李白曾说：“尔来四万八千岁”，“开国何茫然”。支矶石就是这漫长历史中留下的远古纪念物了。

四、东垣街：这条街系辛亥革命后拆毁少城时开的一条小巷。有人望文生义，以为垣即城墙，那这条街必在少城城墙根处。但它又在少城之西，应叫西垣街嘛，为啥叫东垣街呢？有东垣，为啥没有南垣、北垣呢？其实，这条街的得名，是因西城警察分局局长陈东垣在此居住而得名。陈是清末贡生，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任成都警察西城分局局长。当时吏治腐败，当官者只知搜刮民财，陈却比较清正廉明，拆城时不侵扰百姓，不剥削工人，受到大家拥戴，因以其名命名街道，还竖立“西城大邱”（东汉陈寔任大邱县令，有政声）大碑以兹纪念。可见只要给人民办了好事，是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的。

五、状元街、落酱园巷：这两条街都住过状元，因而得名。状元街，曾是明朝嘉靖年间新都人杨慎（杨升庵）考中状元时的住宅。杨升庵一生颠沛流离，刚直不阿，为人民所眷恋，因而街名至今犹存。清朝末年，资州人骆成骧考中光绪末科状元，主张新政，后居住之街称为骆状元巷，但音讹转为落酱园巷。

六、桓侯街：三国时，张飞在阆中被刺，谥号为“桓侯”。桓者，武也。灵柩运回成都，木雕首级下葬。这条街因传是张飞墓葬处（据考，不是张飞墓），故以命名。

七、岳府街：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岳钟琪任过四川提督，还署理过总督，平息准噶尔叛乱有功，封为“公”（封建时代除皇亲国戚外的最高封号）。不久，他被皇帝怪罪，削职为民，住在百花潭，靠种菜维生。以后，大、小金川叛乱，又被召还封为大将军。平息金川之乱后，又赏还公爵封号，迁住岳府街。其宅宽大，街以其宅命名。他的子孙后代在外做官，光绪末年，把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清末的川路风潮和推翻满清王朝时的不少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八、金马街：汉宣帝（公元前113年）听说益州（四川）有金马碧鸡神，很灵验，便派他的老师、四川资中人王褒到成都来祭奠。王褒来成都代表天子设祭，还做了篇祭文，因传说石马下凡足陷于地，就在陷马脚之处修了庙祭祀，地名“石马坊”，即今石马巷。在其西又建有“碧鸡坊”，祭祀碧鸡神。石马、碧鸡神到底有多大威力？传说石马系天上神马，下凡主吉祥；碧鸡也是天上金鸡，下凡一鸣，百邪俱避。王褒在祭文中就号召石马、碧鸡到成都来降落，不要落在偏僻之地，指的是云南昆明。因昆明、越秀等地，汉代皆属益州。至今昆明滇池旁还有碧鸡山、石马山，就是传说落下石马、碧鸡之处。

九、抚琴台街：这是一条小巷，旁边有一大塚，相传为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抚琴所在地。抗日战争中发掘，才知是前蜀皇帝王建墓。墓塚封堆在后，司马相如更古，传说的“抚琴”是不准确的。但街名仍存。

十、同仁路：清朝末年，少城内满蒙下层人民生活已然贫困。辛亥革命时，成都旗兵与军政府签约交枪，军政府在城西靠墙处以支矶石祠宇为基础，拓地盖房，设办“同仁工厂”，招收旗人及家属就业，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等，物美价廉，销路甚广。后因军阀混战，厂停地卖，今只存街名。

十一、天成街：清末乐山举人吴天成，任四川高等学堂监学，在南较场办运动会时，学生和巡警发生冲突。他认为学生有理，惹恼了总督赵尔丰。吴愤而辞职，办起天成中学。他故世后，以其名命街名。

十二、黉门街：黉（hóng）门是学宫的大门，故古代士子考中秀才，称为“身入黉门，天子门生”。但这条街的得名，却并非因皇家学宫而来。清道光年间，崇庆州武举杨遇春，官至陕甘总督，告老还乡后，在成都受领一院别墅。清末，杨家子孙将别墅捐办“存古学堂”，所招学生大多为秀才，所以此街道名为黉门街。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改为国学院，街名一度更名国学巷。



逗　街

成都街名联趣

◎ 曾炳昆

远远走来一铜人（同仁路），观此人面如“黄皮公所”黄酱黄酱的一张，一对“双眼井”，端端一根“笔（鼻）贴式”，颏下“福（胡）字街”，好像“龙须巷”。身穿一件“衣服街”（现鼓楼南街），上用“金丝（街）”盘成“九龙巷”，腰上围了一根“肚带巷”，挂了一把“刀子巷”，鞘子嵌“八宝街”。左手捏了根“烟袋巷”，背背“黄伞巷”，右手手执一柄“益善堂”，可惜一双“脚板街”长得黑苍苍的犹如“铁脚巷”。

此人信佛教，屋头供有一尊“韦陀堂”，天天早晚去烧“香巷子”，然后撕些“钱纸”（巷），烧成“纸灰”（指挥街），丢在“字库”（街）里。一跪二跪“三桂街”，嗑了三个“头福街”，随后又念经，不知是念的“喇嘛寺”学回来的“南打金”，还是“海会寺”学回来的“北打金”。桌上的供果到底拿给哪个吃？两个丫头一个叫上莲，一个叫下莲，不给“上莲吃（池）”，当然就给“下莲吃（池）”。

他天天清早要去“东马棚”，牵出“马镇街”来就跑“走马街”。他的住宅么，团转一带“四维街”，皆是“红墙巷”，房上盖的“黄瓦街”，对门一堵“红照壁”，为啥有照壁？因为两辈出功名，出过“大科甲”（巷）“小科甲”（巷）。他的公馆左边用“青石桥”雕座“狮子巷”，右边用“玉石街”雕了“白像庵”，房檐吊了一对“灯笼街”，当中是“铁门坎”，门口还有一对联，上联是：“万福桥”上“状元”（街）走“金马”（街）；下联是：“天祥寺”（街）中“将军”（街）骑“玉龙”（街）。额子是：忠孝人家。这就是“忠孝巷”和“任家巷”。公馆进门左边修的是“羊市”（街），“过街楼”过去当中三间“五世同堂”；右手半边还有一个“桂花”（街）园，花园里头栽有“青果街”、“荔枝巷”、“柿子巷”、“枣子巷”，此外还有各种树，“双槐树”、“冻青树”、“拐枣树”、“泡桐树”。可惜天干，

统统成了“干槐树”。里头弯弯拐拐似迷宫，“大树拐”、“汪家拐”、“毛家拐”，一共“三倒拐”。“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噫！那几年跑警报哟，才把它们修成一根“穿巷子”！又打垮一堵“缺缺墙”，修了一道“旮旯门”（现油篓街）。出了此门，地下面修了一道“板桥子”，成了“一洞桥”，皆因河坎修得不牢靠，“垮河坎”最后垮成“半边桥”。要走这桥上会发怵又发慌，因为众人不讲卫生哟，只要“笆笆巷”（现八宝街）一胀，脱了“藩库街”，引起“鼓楼街”，布——布——“布后街”，扃成“东珠市”啊“西珠市”，生拉活扯成了一条“珠市巷”。





遥忆当年春熙路

◎ 陈伯为

最近，我同老伴到春熙路买东西，但见街面正在加宽，新楼猝然崛起，商店栉比鳞次，行人络绎不绝。入夜，华灯初放，流光溢彩；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来往顾客，笑语喧哗」繁荣景象，美不胜收。

但是，当年春熙路的修筑，却隐藏了许多街民含辛茹苦的痛苦史，还隐藏着一场军阀混战的阴谋。

春熙路的前身，本是一条窄街小道，它与走马街相接，形成一条南北直线。横贯其中的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很多，街面稍宽。当周孝怀（又名周善培）作四川省劝业道台时，在城市中心地区开辟了一个商业场，作为市内商业中心。这样，从东大路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商业场，中间要经过一条羊肠小道，显得十分拥挤不便。修筑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沟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要求。成都古城赶时髦者，觉得用黄包车（人力车）为太太小姐老爷代步，比起坐四人大轿，其行倒也如“飞”，既快又“洋”，也要求修筑马路，增添光辉。

此时，正值杨森重兵驻防成都。他投靠北洋军阀，因缘际会，官运亨通，升到陆军第二军军长，被北洋政府视为实力人物，封他当了四川省军务督理，指望他统一全川，作为北洋政府在西南边陲的支柱。他也自恃手中有雄兵十万，幻想独霸全川，军民两管，做个“蜀王”。他见修马路既可笼络人心，为自己树碑立传；又能借修马路为名，大量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扩充军费，以实现其武力统一四川的梦想。如意算盘敲打之后，春熙路开始修筑了。

春熙路之名，乃督理亲自所取，寓意在他治理下的成都，犹如春风和煦，百姓熙熙而来，攘攘而往，一派升平兴旺的景象，全赖于本督理的

“德政”。他任命他的得力师长之一王缵绪兼任市场建设督办，拼命派捐派款，大捞其财。并下令从东大街与走马街交口处为起点，直到商业场，沿线商店民宅一律在限期之内自行拆除，迁往别处。如有逾期不拆者，即派兵强拆。声言：令出必行，不得有违。一场“大灾”，顷刻之间降临到成都人民头上。

这里单说街民们，听说修马路要拆房子，做生意的要停业，住家户要搬家，都惶恐不已，感到大难临头。自拆吧，自然可以少损坏些财物，但苦于无处搬家安身；拖延不迁吧，结果遭到派兵强拆之祸。逼得不少人家流离失所，风餐露宿，栖人檐下。若遇到风吹雨打，遍地泥泞，点火不燃，“床头屋漏无干处”，受尽了苦难的熬煎！马路修好，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以“赠”杨督理：

民房都拆尽，问督办何时才滚？
马路已告竣，请将军早日开车。

语意双关，充分表达了人们叫杨森“车”身快“滚”的怨恨情绪。

1925年，杨森妄图用武力统一全川，出兵攻占川东各县。在与军阀刘湘的交锋中，担任东路指挥的王兆奎被打败，王缵绪又突然倒戈，投降刘湘。杨军大乱，节节败退。杨森放弃成都，“车”身逃到叙府（宜宾）。最后走投无路，由师长王仲明护送，搭船逐滚滚长江“滚”到汉口、洛阳，投靠吴秀才（吴佩孚）过活去了。一场由杨森发动的所谓“统一”之战，以失败告终。有人作打油诗一首：

十万雄兵出简阳，
一王战败一王降，
一王送出夔关外，
回首巫山泪两行。



青莲巷

◎ 刘西源

成都有条街叫青莲巷[1]，是条很偏僻、很古老的小巷。街小名气大，好多外地来的文人学士，都爱到这条巷子来看一看、走一走。为啥呢？原来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这条街上住过。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小巷取名青莲巷。

李白从小就很聪明，琴棋书画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不过他有个毛病，学啥都不专心。年轻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江油，去游历峨眉山。上山后遇到大雨，只好住下，在等老天放晴的日子里，天天见到一位老大娘在石头上磨铁棒。一问，老大娘说要把铁棒磨成针。李白一听就笑了。老大娘撇撇嘴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仔细一想，磨杵成针，求学宜精，不专心、无恒心可算求学的大敌呵。从此，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读书很用心。没过多久，他便以性格豪放、诗酒无敌闻名成都了。

李白在成都，住在小巷的高升店，不远处是一家字画装裱铺。他的字画常送到这里装裱。有一天，几位朋友索要扇面字画，李白来到店铺买白扇。到了字画铺，只见店门紧闭，里面有人哭得正伤心。李白很为惊奇，便推门进去，只见案桌上摆着灵牌、供着香蜡，一位老妈妈正在啼哭。李白自峨眉山归来，对老人格外尊敬。他见老妈妈伤心，便劝慰说："老妈妈，要保重身子，来日方长呢。"老妈妈见说话的人是个少年书生，知书达理的，就边哭边说伤心的缘由：刚去世的丈夫，借债置备了一批白扇，谁知今年天无酷暑，销路不好，债期将到，当家人又过世，如何得了？

李白一听，也很着急。他眼睛落到案桌下竹筐内的竹扇，心里一亮。筐内有几十把已装裱好的白绫团扇和彩绸腰扇，裱工精细，绫轻扇美，正好作画。他忙对老妈妈说："不用愁。我在扇上题诗作画，卖个好价，就

① 青莲巷：现青莲街，在成都东大街附近。

好还债了。”

老妈妈听了，收住泪发愁地说：“题诗作画，好倒是好，可惜没有铅黄丹朱呀。”

李白笑嘻嘻地说：“案上有笔墨，就画水墨丹青吧。”说完，他急忙收拾案桌，洒水溶墨，取扇握笔，题诗作画。老妈妈收住泪，为李白打下手。只见这管平素写帐的笔到了年轻书生手上，变灵醒了，顺畅多了，三横两竖，扇上就现出花草山石；东涂西点，扇面又飞进了飞禽翎毛。他题的诗句，一笔到底，有韵有神，油亮亮的，硬是好看。

李白硬是个有学问的人，肚皮头装的诗歌又多，写写画画，几十把扇子没得一把是重复的。不一会儿，他就把一筐扇子画完了。他摸出一锭银子交给老妈妈，拿起三把扇子说：“老妈妈，你摆出去卖。一把扇子要价三斗米，少了不卖。我先买三把。三天之内，卖不出去，你到巷口高升店来，我赔你的白扇。”

老妈妈一听就吓住了。心想十把扇子也卖不到一斗米呀。怎么这个年轻人敢漫天要价呢？等她回过神来，年轻人已出店走远了。不信吧，手上拿着重甸甸的银子，是三把扇子的卖价。先摆出去，要是买主嫌贵，落点价也行。老婆婆把团扇摆到门口，一下就引来了过路的人。这个一把，那个一把，价钱都不讲，痛痛快快都出了三斗米的价。卖到最后几把，顾客互相抬价，一把扇竟然卖到五斗米。

第二天，收债人早早就来敲门，见到老妈妈忙下话说：“旧帐不提了。给几把扇子就行了。”接着，一队队、一拨拨的顾客都拥到裱装铺来，争相出高价要买扇子。从买主口中，老妈妈才知道题诗画扇的人是青莲居士。别看他年轻，却心高眼高手更高，王孙大贾锭金秤银，千恳万求他题字作画，他都不愿。这次是看在裱装铺有了困难，才画了扇子又赠银两。这些卖不起价的团扇，经李青莲题诗绘画，听说是少有的墨宝呢。老妈妈听大家这一说，才恍然大悟，忙忙跑到街口高升店，要找青年书生还银致谢。她今天找，明天寻，眼都快望穿了，也没见到李白。原来李白在裱白铺外，远远望见买扇的人多，知道老妈妈不会还不起债，便放心地外出访友，谈论诗文去了。

从此，老妈妈逢人就夸李白。不多久，李白住过的小巷就被大家喊成了青莲巷。在团扇上绘画题诗的传统工艺，也在好多家庭作坊沿袭下来，一直留传到现在。



双栅子

◎ 刘西源

成都有条铺面不多的街，名字取得怪，叫双栅子街。有人以为，它的东面是清代官府保管财粮的藩库，为求安全，才修了两座栅栏。其实，街名的由来，和岳钟琪有关呢。

岳钟琪是汉人，在康熙、雍正、乾隆年代当官带兵，到过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平定了好多起闹独立的乱子，立了大功，当了川陕总督。皇帝佬倌建造府第赏给他。这座大院就修在藩库西面，隔得不远，咂杆叶子烟就走拢了。岳府和藩库[①]都是青砖大瓦，门前立有双旗杆和天灯杆，雄势得很。不过，两座院子间还没修起街道。原来的街道在明代末年闹兵灾给毁了。藩库在砖墙外排水大沟的梓潼桥边，修了座栅栏作为屏障。

岳钟琪是清代开国后汉人中第一个带兵大官。他晓得满族人对他信不过，雍正年间还被撤职，差点连脑壳都要脱。所以府第修好了，他也不敢久住，大多时间都在督院办理公事。岳府里就住了他的老妈和一些从青海、西藏带回来的丫头。这些丫头，个个爱唱爱跳，活泼得很，对汉人礼法也不大懂，岳府里成天歌声脆铮铮的，闹热得很。

岳钟琪的老妈是个只晓得吃斋念经的佛婆婆。他家院子大，男人没几个。她就没想到丫头一天天长大了，该成家了。丫头们平素很少出门，只有到藩库领取粮米才能散散心。守卫藩库的都是八旗子弟，见到丫头生得齐齐整整，爱说爱笑，都愿帮搬柴米，卸牲驾车。一来二去，人缘熟了，就约定晚上在梓潼桥边栅栏旁碰头、燃起火堆跳锅庄[②]。就这样，每天晚上，梓潼桥边火光熊熊，歌舞欢笑，闹得乌喷喧的，闹声笑声传得好远

① 现岳府街和藩库街。

② 锅庄：藏族歌舞

好远。

这些事没过多久就传到岳老太婆耳边了。她把丫头们叫来，讲了半天要守妇道的道理。她说得嘴里白泡子翻，丫头们听得嘻嘻哈哈笑。老太婆又规定日落大门下锁。丫头们生来就是翻山越岭的好手，晚上照样翻墙出去耍。老太婆动了气，叫人在梓潼桥西侧修了个大栅栏，晚上落锁封桥。这一来，丫头们晚上就是能出院子，也过不了桥，到不了藩库了。

没过多久，岳钟琪从川陕边回家来了，住了几天，没听到丫头们扯起嗓子唱歌，没见到一张笑脸。他到藩库视察，出门不远就见到两座栅栏，更觉得奇怪。忙一打听，才知道是老妈让修的。

这天晚上，他趁请安机会，劝老太婆说："年轻人就是爱唱爱跳。她们晚上跑出去耍，正好说明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嘛。到了婚配年龄，别说两座栅栏，十座栅栏，刀山火海也挡不住啊。"他的话，说得老妈直点头。

第二天，岳府外的栅栏就拆了。岳钟琪还做主，让藩库兵丁和丫头们选配婚姻。在梓潼桥边点起火堆，他也下场和大家手拉手跳了大半夜锅庄呢。

以后，双栅子虽然没有了，在这里修建的街道，却叫了双栅子的街名。





科甲巷和真假石达开

◎ 李金彝

你到过成都科甲巷吗？这条紧靠有名的春熙路的窄街小巷，房舍破旧，很不起眼，无啥特殊之处。可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在这里却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太平天国翼王五千岁石达开，在这条街上被杀害了。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开国元勋，辅佐天王洪秀全，立下汗马功劳。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天京（南京）内部发生“杨、韦事件”之后，他带着数十万大军，西征四川，准备发展天国势力。没料到腐朽的清廷，用高价买通了他的全部向导，把石达开及其部队引向大渡河边，使其濒临绝境。这里，激流挡路，无舟可渡，四周清兵断绝粮道，据险把守。石达开多次组织木筏抢渡，无奈水流汹涌，都遭失败。为保存十万太平军实力，石达开牵着小儿子到清营议兵罢战，被俘押到成都，关在臬台（又称按察司，主管全省刑法）衙门的监狱，即科甲巷内。

四川总督骆秉璋本想“献俘阙下”，清廷却怕押解途中生变，命令“就地正法”。骆秉璋唯恐有人打劫法场，便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在科甲巷将石达开父子秘密杀害。

不过，在民间却流传另外的消息：被杀的是假石达开，真石达开已从大渡河边逃走，而且还高擎太平军战旗，同清兵打仗呢。

那么，怎么会有真假石达开呢？传说讲得来有鼻子有眼：石达开有个义女，人称四姑娘，长得聪明伶俐，掌管军机文书。到了结婚之年，她不挑英武盖世的将军，也不选辅佐天朝的文臣，却看中了一个职位很低的姓马的文书作郎君。马文书对天国忠贞不贰，文才武略却很平常。全军营上下议论纷纷，石达开对这门婚姻也很不满，四姑娘以哭相谏说：“将来总会理解女儿的用意。”她终于和马结了婚。

婚后，四姑娘对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当西征大军被陷大渡河边，

石达开决定到清营议兵的千钧一发之时，四姑娘在后帐问马文书说："父王待你如何？"马说："父王和小姐待我恩重如山。"四姑娘又问："天军被困河边，救部队之事大，还是保全你我性命事大？"马文书说："能救全军和父王免难，我万死不辞。"四姑娘就讲了楚汉相争时，汉将纪信替刘邦诈降遇害，争得时间，让刘邦带领汉军从荥阳突围的故事。马文书慨然表示要学纪信，愿替石达开赴清营议兵求和。就这样，相貌和石达开相似的马文书，被清军装进囚笼，押解到成都科甲巷。而真的石达开却金蝉脱壳，混在乱军中远走高飞了。据说后来还有人专门来到科甲巷，边看边念叨着说："总有一天真石达开和四姑娘会带着太平军进成都，来科甲巷祭奠为国捐躯的假石达开呢！"





十里新街话“安乐”

◎梦　弼

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市旧皇城以东，一条长龙般望不到头的十里长街——蜀都大道，出现在人们面前。它那笔直的街道，繁星似的华灯，盛开的花坛，如茵的草地，把古老的芙蓉城装扮得绰约多姿妩媚动人。尤其在夜幕降临之际，灯光灿烂，好似火树银花；凉风徐徐，送来阵阵清香。迷人的繁华夜景，吸引着不少两鬓如霜、安享晚年的老人。他们漫步在蜀都大道两侧，抚今追昔，谈古论今，话题差不多都集中在几十年来白云苍狗的沧桑变化，都会把谈话焦点聚在蜀都大道在城中的起点——曾操纵半个四川金融物价的司令台上。

这个司令台，就是成都人熟知的“安乐寺”。

“安乐寺”，位置在成都西顺城街。辛亥革命以来，它是成都最古老、最庞大、最复杂的投机市场，也是投机家们竞相角逐的“淘金圣地”。每天到这里做买卖、听行情的人真是成千上万。银行经理、字号老板、商号掌柜、外地客商自不消说是常客，还有各色各样的单帮客、跑滩匠、中小官员、公教人员、军警宪特、袍哥大爷，以及一掷千金、寻欢作乐的阔少公子、太太小姐，更免不了有野妓、窑姐、流氓、“飞机”混杂其间。这些人成天到晚，无日无夜，连绵不断地进进出出。

这么多人往这座不到一平方里的寺庙来干啥？答案三个字：做生意。什么生意？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卖，在这里都能成交。就连看不见的东西，只要开个价，就能掀起市场一层浪。这里的生意，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贵重的黄金、白银，不值钱的废纸烟盒，都可以在这里拍板成交，签订买卖合同。因此，这里从早到晚，整个市场一片银元的叮当声、铜圆的哗啦声、喊买叫卖声、吆喝叫号声、哭泣咒骂声、无耻笑闹声，声声震耳；一副副贪婪、丑恶、奸诈、凶狠、虚伪、吃人的

脸谱，在人丛中不断闪现。1949 年底，这些渣滓就被人民的大扫帚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现在，这里更拦腰劈成通衢大道。借着华灯璀璨光辉，翻开“安乐寺”的历史陈页，让青年一代认识过去的黑暗腐朽，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安乐寺”，是 14 世纪末，朱元璋封其四子朱椿来成都为蜀王时所建。这位蜀王，耽于淫乐，坐在皇城里闲得无聊，下令建了两座寺庙供其出巡宴息。这两座庙，一是鼓楼南街的“太平寺”，一是西顺城街的“安乐寺”。他一心想“世代有余庆，安乐享太平”。因此，富有禅意的安乐寺，除一间大殿供佛外，其余的宽宇高廊、金脊轩室，却陈设为万年台（有两座），日日让群优演唱，夜夜听女乐歌舞，挂的寺庙羊头，卖的安乐窝风流狗肉，毫无佛门圣地气息。到明朝末年，张献忠据成都建国，离开时，一把火使“安乐寺”化为焦土。

清初，康熙为笼络人心倡导佛教，修复安乐寺。起初倒也香火旺盛，不过它地处商贸市贾中心，不是晨钟暮鼓清静所在，僧道无缘，旋遭冷落。故后人将其计入古刹禅林之内。

辛亥革命后，这里办起华阳县初级小学堂，殿上香烟缭绕，殿后书声琅琅，一墙之隔，两重天地。后来各路军阀逞凶耍横，吞并公产，顺城街首富贾桂五等组成益寿慈善会将其接管，免却被军阀霸占的厄运，却开始了由佛寺变商场的变迁。慈善会，由商人组成。这偌大一块庙产，处在闹市中心，设个茶馆洽谈生意倒也便当，摆起兑换银钱摊子方便买卖双方，于是清静佛寺渐渐变成城中心唯一的银钱市场，进而由此掀起动荡全市、影响全川、波及西南的金融物价风潮，演出幕幕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金银丑剧。

下面且看它演出的几出闹剧吧！

造杂版，军阀发横财

1928 年，从安乐寺刮出了一股影响全川西的金融风潮。

辛亥革命后，成都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中央、外省、本省发行的钞票；有各大银行、钱庄发行的“执照”；银元又有英国的鹰洋、大清龙版、袁大头（袁世凯银元）、四川的川版、五角的云南版、成





都造币厂的厂版等，还有大一百、小一百、大二百、小二百、十文的各色铜圆。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位军长联合统治成都后，造币厂厂长是邓锡侯。为了赚大钱，他指使人铸造了大量五角的厂版银元上市。其他军长、旅长见造银元有大油水可捞，便纷纷私自铸造成色更低的五角银元（杂版）。他们开的银行、钱庄，也发出大量“执照”，骗取人民手中现钱。通货发行多了，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但军阀们只顾赚钱，哪管人民死活。

这时的“安乐寺”，经官方批准，堂而皇之挂起“银钱总市”的招牌。拥有一千多会员的油米钱业公会帅字大旗插在正殿，整个寺内进行着银钱的买卖、兑换，和申票、渝票公债票证的交易。这里的一涨一跌，都影响着全市乃至川西、川南的金融市场。自军阀们倾销杂版银元、滥发“执照”以来，整个安乐寺内，成天见到大大小小的兑换成交的和摊子上摆的样品，都是杂版和“执照”，而以往统治这里的大银元和信用昭著的聚兴诚银行、天成亨字号的“执照”却不见了。原来人们对杂版信不过，这些杂版掺铜太多，在柜台上拌几下，就成了哑版，谁拿到手都悬心吊胆怕吃亏，因此急于在此兑换脱手。而军阀们的银号“执照”更是空头支票，有的买过手，去银号兑不到钱，或兑钱时“执照”上明明写的厂版、兑出时却是杂版；有的刚把“执照”买过手，银号却已倒闭或根本就没有这家银号了。因此，安乐寺内进进出出的生意客，都在倾销杂版，抢购鹰洋、龙版。当时在这里打架、斗殴、上吊、吞烟自尽的，天天都有，整个银钱市场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成都有名的不怕事的斯文客刘师亮就写过一副辛辣讽刺的对联：“五角生洋滥、哑、假；一个死人邓、田、刘”，强烈控诉了造杂版发横财的军阀们。

滥造杂版和“执照”的人，眼看杂版行市天天垮，一元杂版只能换铜圆三千多一点（即只值三角多），“执照”更是没人要。于是，他们除了把商会、安乐寺总关火油米钱业公会头头弄出去训斥一顿外，还在安乐寺贴出告示规定：大洋一元兑换铜圆七千二百文，厂版一元兑八千文，杂版兑五千六百文，敢有不遵者，严惩不贷。接着，造币厂运来铜圆五万钏（一钏为一千文）交给钱业公会，专门兑换杂版，规定每人只兑一元。这个告示一贴出，安乐寺里就闹震了。有杂版的，一晚上赚个对本；捏铜圆的，一夜就蚀一半。顿时人心大乱，闹成一团。就在安乐寺里闹麻了的时候，

附近州县军阀们派丘八们把杂版一板车一板车运到安乐寺来兑换铜圆了。钱贩子、钱滚子见势不佳，忙把大银元、铜圆藏了，大殿上的弹压队也不知什么时候溜了，整个安乐寺只听到丘八们大声武气叫兑换声，乒乒乓乓打门声，钱庄伙计挨打叫唤声。丘八们眼见在安乐寺兑换不到银元、铜板，便纷纷上街，拿着杂版进店铺按官价买货，谁敢不卖，三枪托两拳脚便把店铺砸了，店员打倒。这一下，成都市面，商家纷纷关门，丘八满街乱窜，安乐寺内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整个成都都快要爆炸了。

由于舆论哗然，货价飞涨，天怨人怒，三位军长慑于民情，只好收回成命，宣布银元按质论价，抛了两个“操纵”金融的替死鬼枪毙，“以谢国人”。大大小小造币厂因再造银元油水不大宣布息炉，市面杂版一元垮到只兑一千八百文铜圆，这场风潮才告平息。在这场风潮中，破产的中小商家、贫穷人家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一下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千万豪门。

大投机蒋帮总发财

抗战以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安乐寺里又粉墨登场，演出了投机风潮的第二幕丑剧。

这时，由于“中央”入川，防区废止，银元变成“法币”，铜圆变成“镍币”、“铜分币”，兑换业务自行停止，盛极一时的“银钱总市”早已冷落，新纸烟帮挂印升帐，百货、颜料、新药等紧紧跟上，安乐寺仍然车水马龙，买卖兴隆。1943 年黄金开放，白银自由买卖，幕后的“钱业”死而复生，黄金、白银、纸烟三驾车并辔齐驱，驰骋在安乐寺的大殿上。那里有三个操纵金融物价的堂子（店堂）：买卖黄金的黄金堂子，买卖银元的银元堂子，买卖纸烟的纸烟堂子。操纵这些堂子的，都是有硬后台的大爷。西北帮因有阎锡山、汤恩伯作后台，掌握了大量游资，其代表人物王海山、张瑞丰、吴明甫等，只要在市场上一露面，就会被人围住，探听口风。他们只要一开口，经纪跑断气，要买涨一槽，要卖垮一坝。成都有名的老字号大成亨、天一福金号，碰到西北帮，只好退避三舍，不战而败。在这伙人操纵下，金子论条（重十两）才能进堂了。

纸烟市场历来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势力范围，纸烟堂子为英美势力经销





家，纸烟大王万树成、李桢祥坐首席。他们只要动动嘴皮，自有兄弟伙呐喊助威，行市就会几涨几跌。

银元堂子是安乐寺的老阵地，志诚号王良臣和正裕隆陈光裕，有成渝两地商界作后盾，其活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除此之外，还有一般人不敢问津的美钞市场，也由金融界的老板们操纵。从抗日战争到国民党统治的垮台，蒋帮利用币制改革，银洋改法币，法币改关金券，关金券改金圆券，后又改成银元券，来回几次折腾，每改一次，大财团发一次大财，中、小商人破产，挣扎在贫穷线上的工农大众遭难，逼得多少人上吊、跳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中下层官吏见上司发财，哪能不眼红，也利用手中职权趁机巧取豪夺，发国难财。例如1948年，蒋介石在军事战线上一败涂地，宣布法币改金圆券，恢复流通镍币。这些镍币早已废弃，在安乐寺一元银元可买几斤，一经流通，一斤镍币可值几十元银元。这个消息无异一枚炸弹，在安乐寺爆炸了。大家纷纷抢购镍币。成都市政府正在填写通用镍币的布告，监印官赶忙把大印挟起，坐上包车一溜烟赶到安乐寺抢购镍币。布告写好后，却找不到监印官盖印。等监印官抢购了镍币回来，人慌马乱，屁股上的大印又丢了。正在惶急万分时，多亏黄包车夫把印送了回来，这才在布告上盖了大印。消息传开，伪市长只得挂冠下台。

第二次金银风潮，时间长，危害大，影响深，但中央财团却发了国难财。仅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撤退时，就派空军飞机从新津机场运送黄金白银达几十架次。这都是搜刮的人民的血汗啊！

雄鸡一唱天下白，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来到了，结束了安乐寺操纵金融、危害国计民生的罪恶历史。

华兴街上的“鸦片战争”

◎ 官鸿文

前　言

我国川、康、滇、黔山区，因其土壤气候适宜鸦片生长，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已普遍种植鸦片。光绪末年，清廷曾下令禁烟，收到一定成效。但到 1917 年护法战争以后，四川由于军阀割据，鸦片的种、运、售、吸又复弥漫全省。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的、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

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很多，四川是鸦片的主要供应地。贩运烟土除商贩武装走私外，就是军队运烟。军队运烟，既逃免了税收，并且又有枪杆作后盾，十分保险。四川军队的军、师长们，在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所设立的办事处，其实就是运烟和储烟的机关。当时政府虽有严格的禁烟命令，设有督办、执法监、督察官等，然而这些法令和官员，只能去禁普通老百姓，而那些吸烟成癖的军阀、官僚、地主、土绅却不识禁烟为何事，依然是大种、大运、大售、大吸，私设烟馆，残酷毒害、盘剥老百姓。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表明严厉禁烟以申法纪，在四川的主要城、乡、县、市，普设督收处、戒烟委员会、缉私处、哨卡、巡警等等，然而只是虚张声势，禁民不禁官而已。我讲的这个龙门阵，发生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成都。献给读者，以管窥豹，可见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

一

1940 年 8 月的一天中午，一辆军车从川南公路急驰而来，一到成都南门，便被四川省缉私处南门检查站拦住了。

“站住！哪一部分的？”检查站长厉声喝道。

车上慢腾腾地走下一个上尉军官，瘦个子、尖下巴，也斜着眼睛，神





态傲慢地答道："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部的军车，执行任务。"说完，掏出烟盒，拿出一支小大英香烟，漫不经心地抽起来。

"车上装的啥子东西？"

"师部的给养，也要检查吗？你敢动手，惹起刘军长、刘师长来了，老子告你，你娃娃吃不消！"上尉这一席话，把检查站长惹冒火了。

"好哇，老子就是要检查二十四军的军车！你娃娃敢告到蒋委员长那里去才算真有本事。张副官，上车检查。"检查站长一声令下，检查站的武装纠察、宪兵都掏出盒子枪，进逼军车。车上的武装押运兵也一齐跳下车来，持枪把卡车围着。这时一个宪兵走上前，拉开汽车篷布一看，吓了一大跳。赶忙退回来向检查站长说道："报告站长，是一车鸦片。"

检查站长一听说是鸦片，立刻下命令："扣起来，带走！"

瘦个子上尉军官也不示弱，大声喝道："你娃要扣，不想活了！李班长，给师部打个电话，就说在南门上遇到了麻烦。"

检查站长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想坐牢，老子送你去。"

这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叫刘元琮，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亲侄儿，绰号"三养子"，在川、康两地算得上一个大歪人，颇有霸道名声。他仗恃刘文辉的势力，对国民党当局的禁烟法令置若罔闻，在川、康两地公开大规模贩运鸦片。所以，押运鸦片的武装人员，敢于明目张胆地在检查站前耍蛮。而缉私处系四川省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领导的缉拿走私商贩包括鸦片烟土在内的走私物品的机关。缉私处处长是曾任过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调查课长的何龙庆。缉私处有军事委员会作后盾，表面上不管你是党、政、军哪一派、哪一系统的，一经缉获，一律依法惩处，决不宽恕。他们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名义下，当然"理直气壮"。

过了一会儿，检查站长接到一三七师师部的电话："喂，找站长听话……你是站长吗？我是二十四军伍参谋长。听说一三七师师部军车被你们扣住了，回去报告你们何处长，他真要扣车，刘师长就要找他算账，二十四军是不好惹的！"

那检查站长，赶快摇通缉私处的电话："报告处座，南门检查站有紧急情况报告。二十四军一三七师一车鸦片要强行开走，伍参谋长来电话要你放行，请处座定夺。"

何龙庆乃军统局在成都的要员，一听此言，气急败坏地说："马上缉

拿，他敢开走，你就给我动手。”

此刻，一方要缉扣，一方要开走，双方争执不休，大有动干戈之势，各自迅速报给自己的后台老板。

二

当时，二十四军一三七师驻成都办事处和缉私处都设在成都华兴街附近。

双方领导机关接到通知后，都立即派出大批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在华兴街一带拿起仗事，摆开战场，如临大敌一般。吓得过路行人、小商小贩喊的喊，叫的叫，哭的哭，跑的跑，店铺老板、街坊住户也吓得浑身哆嗦，忙着上铺板、闩门上杠，躲避战祸。

眼看一场战事就要激烈展开之际，一辆贴有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设在华兴街的九十五军军部。

原来是消息传到成都行辕后，行辕主任贺国光也十分恼怒，心中暗自骂道：“这二十四军趁我在川立足未稳之机，尽在找麻烦，真是欺人太甚，可恼至极！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这些地方势力的。”贺国光急忙来到总务处处长宫大中的办公室，进门便说：“老弟，适才接到报告，二十四军一三七师一车鸦片在南门检查站被查获，你看如何处理？”

在当时的官场中，宫大中素以稳练持重、善于察言观色、能应付复杂局面著称，自从蒋介石势力入川以来，为融洽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与二十四军多有应酬往返。见贺国光问他如何处理，便自忖片刻：按目前的形势，这二十四军是得罪不得的。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为一车鸦片，惹得他在各方面给中央造乱子，我们在委座面前也不好交待。但是如今委座自兼四川省主席和禁烟善后督办，如果执法不严，搞得乱七八糟的，岂不有失委座威严？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搁平了事，方为上策。他又仔细揣摸贺国光的意图，才应声答道：“元公！[1] 方今川、康两地多是二十四军的队伍，省府里也不乏二十四军的人，何况刘自公[2]又兼西康省主席、西康省禁烟督办，何必给他难堪呢？二十四军伍培英参

---

[1] 贺国光号元龄，官场中称他为贺元公，当时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宪兵司令、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代行主席。

[2] 刘文辉号自乾，那时官场中都称他为刘自公。





谋长是刘自公的女婿，每次禁烟会上都声称鸦片是二十四军的经济命脉。言下之意，是中央最好不多过问，如果逼紧了，他们是要扳命的。三养子其人暂时还要迁就一下。这车鸦片嘛，等我亲自去一趟，相机处理，以不失缉私处的面子为原则，元公意下如何?”

贺国光一听也表赞同，当即派他前往查看处理。

三

官大中一到九十五军军部，与军部人员寒暄一番，随即分别给双方挂通电话说：“抗战期间，一切争端都必须和平解决。”命令双方，马上拆除工事，各自撤消警戒线，恢复交通秩序。

刘元琮接到电话，一听是行辕派总务处处长亲自来解决，也就软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行辕是直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便轻声细语地说：“既然你哥子出来说话，我还有啥话说，你哥子咋说就咋办嘛!”

何龙庆接到电话，以为给他撑腰的人来了，忙问：“官公，这车鸦片咋办?”官大中答道：“你负责找人运走，不准动一下，听候处置。”何龙庆当然不敢抗命。

这场鸦片战争旋即偃旗息鼓了。

次日午后，官大中在醉鸥饭店大摆宴席，宴请战争双方的主帅，少不了还请几位头面人物作陪。酒席桌上，大家猜拳行令，敬酒碰杯，彼此声称：“误会!”“误会!”

那一车鸦片呢?事后仍然是物归原主——刘元琮，一斤一两也没损失。何龙庆呢?得到了执法谨严的嘉奖，不久，便调任为稽查处处长，再也不去缉二十四军鸦片的私了。

此后，鸦片在四川，不但禁而未绝，而且越禁越盛了。

抗日时期的祠堂街

◎ 潘清雍　安德才

祠堂街，据说是因清代于此修建年羹尧的生祠而得名。它东连西御街，西接金河街，南傍纵横全城的金河，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一河相隔，水榭、亭台，遥相叠映。

这条街，从20世纪30年代起逐步成了成都的一条文化街，在30年代和40年代，是我党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在这里先后建立了7个支部，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广泛联系群众，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党的不少重要会议和聚会，都曾在这里举行。这里曾经是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殊死搏斗的地方。党的地下组织和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在这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公开的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派出大批特务在这里捣乱破坏，无数群众遭毒打，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里被绑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最后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条街，曾经是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大声社》、《群力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社》等十多个社团和报刊发行部所在地；这里有著名的“努力餐”饭馆和“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等二十多家书店。祠堂街不仅是一条文化街，而且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革命街。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祠堂街给成都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当年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老同志一到成都，免不了都要去祠堂街作一番历史的回顾。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建立始末

《新华日报》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办的，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在此以前即出版了党刊《群众》。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馆迁重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查封。

在罗世文同志的领导下，1938年4月，在祠堂街八十八号建立《新华日报》成都推销组；8月，扩大为推销处，除担负《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外，还开展了川西北各县的发行业务。1939年4月建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后，发行量增至一万二千多份。为使读者能早看到《新华日报》，曾每天由飞机从重庆送纸型到成都，在《华西日报》社翻印，成都的读者当天即可看到报纸。

祠堂街八十八号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营业部，每天除分发报纸、办理订报手续外，还经售由延安运来的马列著作、《解放日报》、《群众》以及“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社”发行的进步书刊。营业部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罗世文、邹凤平等同志经常到分馆工作，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上层民主人士和读者，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每天的报纸，除通过邮局和各种渠道发送外县外，大部分是由报童分送到订户手里。在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封锁很严的时候，报童一走出营业部即被特务盯梢，经常被阻拦、挨打。他们与营业部的同志一样，不计个人安危，在艰苦的斗争中工作。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拔掉。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封闭了分馆，罗世文、洪希宗等同志亦相继被捕。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汉年赶来成都做营救工作。国民党当局只承认分馆启封营业，坚不放人，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了。从此，《新华日报》即不再在成都翻印，直接由重庆运来。“皖南事变”发生后，成都分馆将《新华日报》迅速送到读者手中，并将中共中央揭露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和重整新四军，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政委、陈毅同志为代军长的电文张贴在

分馆营业部门口，各界人士、青年学生围看、抄写的人很多。国民党藉口扰乱社会治安，派警察将电文撕掉，并捣毁营业部和搜查分馆人员。

1942年，分馆联合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搞了一次书刊大减价。特务借口出售“反动书刊”，又查封了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和分馆，经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后才启封。每当斗争出现反复的时候，分馆遭到特务捣乱破坏的次数是很多的。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除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报纸发行业务外，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秘密传送文件、转移干部和党员做了很多工作。

分馆的同志从1938年4月建立推销组，至1947年3月5日离开祠堂街八十八号撤到重庆为止，共坚持8年之久。他们能在国民党特务统治极严的成都进行艰苦工作的原因何在呢？最主要的是有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和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及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分馆内建立了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先后在党支部负责的有洪希宗、杨继十、李春、罗石生等同志。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总馆被国民党查封，并限期总馆和分馆的工作人员一律撤回延安。成都分馆的同志坚持把最后运到成都的《新华日报》送到了读者手中，分馆的大门才关闭。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为了感谢各方面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张停止营业的启事紧紧贴在大门上。它告诉读者：《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查封了，分馆的同志们撤回延安了。但《新华日报》的声音却永远留在成都，留在川西北人民心中。

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和刊物

“力文社”和《力文》半月刊

1936年春，在张曙时同志的支持下，由甘树人、甘道生、郭祖劼、胡芷俊、徐庆坚等组织进步团体“力文社”，同年7月5日创办《力文》半月刊。其总代售处是祠堂街现代书局，分售处有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等。主编甘树人（甘孟材）、夏芷（徐庆坚），编辑郭祖劼、刘适，出版江牧岳、刘孟痴，发行于邦齐（于渊）。《力文》半月刊在编排上取法于上海救亡刊物，内容选自日本《朝日新闻》、上海英文版《中国呼声》等刊物。第四期转载了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





求》的声明，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以后其连续刊载抗日救亡文章，发行至第七期，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强迫停刊。《力文》半月刊在抗日救亡运动初期起了启蒙作用。

《大声》周刊和“大声社”

1936年9月下旬，在共产党员饶世俊（孟文）的支持下，侯方岳、张显仪、蒋桂锐、陈伯林、戴碧湘、叶兆琪等青年学生和职业青年组织秘密进步团体“海燕社”。10月初，共产党员、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韩天石、王广义（王路宾）约集四川大学、省立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16人，在四川大学秘密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和海燕社两个组织的建立，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为了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经韩天石、王广义、张希钦、胡绩伟、彭为果、周海文、涂万鹏等商定，由胡绩伟、周海文负责，于1936年11月6日创办出版了《活路旬刊》。该刊因大量刊登抗日救亡文章，主张团结抗日，反抗妥协投降，仅出版3期，于同年12月26日被迫停刊。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高潮。成都青年学生对时局的发展非常关切，深感有再次出版刊物的必要。民先队员周海文以车耀先女儿家庭教师的关系，得到车的支持，在努力餐饭馆的楼上腾出一间房子办公。民先队的同志与车耀先同志商量，决定以大声疾呼抗日之意，于1937年1月17日，在祠堂街一百二十二号创办《大声》周刊，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任发行，周海文、彭文龙任编辑。《大声》周刊出版后，因大量刊登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不容于国民党当局，曾几次被迫停刊，几易刊名，由《大声》更名《图存》、《大生》，后恢复原名《大声》。1937年底，罗世文同志接上车耀先的党组织关系，要他主要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大声》周刊交给党员胡景祥（冯列斯）主办。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大声》周刊的基础上，1938年初，发起成立了“大声抗敌宣传社”（简称“大声社”），发展社员近千人，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多个县。“大声社”建立党支部，书记胡景祥。以后，《大声》周刊及“大声社”都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大声社”工作的杨华栋、唐介舟、苏西林、胡占泉、刘辟等先后入党。

《大声》周刊虽曾几次停刊、几次更名，但始终坚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为实现我党全面抗日、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同国民党

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海文（牧人）、彭文龙（李奇）、胡绩伟（小丁）、张文澄（路人）、胡景祥（列斯）、彭为果（岳士）等用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大量转载了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的社论、评论和通讯。《大声》周刊单期发行量曾高达7000份左右，1938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停刊。

“星芒社”和通俗易懂的《星芒报》

“星芒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37年9月成立的一个比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地点在祠堂街四十四号“战时出版社”营业部的楼上，总负责人是江牧岳，办有“星芒通讯社”、《星芒报》、“星芒读书会”、“星芒图书馆”和“星芒宣传团”，参加活动的成都和外县进步群众达万人。1938年1月，“星芒社”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江牧岳，组织胡绩伟。以后党员人数增多了，又分为：群团支部，书记江牧岳；新闻支部，书记胡绩伟。

“星芒通讯社”先由方伯非负责，后为肖稚林，主要是向各报社，如《四川日报》、《华西晚报》、《新民报》等发布通讯稿。

《星芒周报》于1937年9月18日创办，胡绩伟任主编，冯诗云协助工作。1937年11月13日以“青救”成员熊复为主编，吴德让、董仲平为编辑，肖泽宽为发行，《星芒周报》与《救亡周刊》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报》。1938年4月，《救亡周刊》复刊，《星芒周报》改为三日刊于4月2日继续单独出版。《星芒报》以形式多样、短小精干、通俗易懂的独特风格宣传抗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发行量高达四五千份。除编辑部撰写的《千百万人的呼声》《从九一八到现在》《论政府抗战到全民抗战》《所谓民主是要人民自己做主》《解除成都学生的镣铐》等旗帜鲜明的文章外，知名的爱国人士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等曾为该报写文章。特别是它的短评《到陕北去》《主和就是汉奸》及小故事、诗歌、小说连载、评书、花鼓词、木刻、绘画等更吸引人。《星芒报》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辛辣的笔触针砭时弊，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1938年5月，《星芒报》刊登了天府中学教师张克林讲课批驳了“三日亡国论”受到学校当局打击的消息。该校校长肖寿眉唆使二百多学生于当晚（5月9日）7时去祠堂街捣毁“星芒社”，结果砸烂了楼下的“战时出版社”。第二天“星芒社”同“战时出版社”在祠堂街图书业公会礼堂，邀请成都文化界、新闻界说明暴行





经过，到会的有沈天泽、陈樾山、黄宪章和有关单位代表百余人。他们纷纷谴责反动分子肖寿眉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丑恶行为，各界报纸都对此次事件著文抨击。

“星芒宣传团”和“星芒图书馆”主要组织救亡歌曲演唱、读书会、报告会。

“星芒社”通过下属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党培养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

在祠堂街的进步社团还有“战时出版社”及《战潮》总经售部，“战时学生旬刊社”，“群力社”和《笔阵》《金箭》等。

“战时出版社”的社长是杨道生，这个出版社是他自筹经费租赁房子，购买书籍、报刊，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他组织图书业店员参加“星芒社”、为《星芒周报》写稿，去苏码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战时出版社”后来同吴与之开的益明书店（曾是党的联络点）合并，杨道生任经理。

“战时学生旬刊社”的服务部在祠堂街九十六号，社长康乃尔，有社员三百余人。党支部建立后，吴德让任党支部书记。它是在1937年10月19日由熊复、吴德让、董仲平、张黎群、肖泽宽等人创办的《救亡周刊》的基础上，吸收川大、中华女中、协进中学等校的进步学生组成的。1938年5月20日，《战时学生旬刊》出版，它是成都学联的机关刊物，总负责人先后有吴德让、魏永祥，编辑有张黎群、刘炎，副总编蒋汇泽，发行人白肖等，社址在祠堂街七十二号。旬刊的读者主要是中学生。1939年，川大迁峨眉，旬刊移交给朝阳学院党支部负责编辑继续出版。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战时学生旬刊》被迫停刊。

“群力社”是1938年2月，由共产党员饶孟文（世俊）、犹凤歧等组建的抗日团体，成员主要是川大、协进中学的学生，约七八十人，其中贵州籍学生二十余人。其总务主任为熊唯知，组织部长犹凤歧，宣传部长黄其敏，社址在祠堂街一百五十六号。“群力社”建立了党支部，犹凤歧、何仁仲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其宗旨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下分歌咏队、宣传队、群力宣传团。以黄爽英为主在《四川日报》办有《群力副刊》。除在市区内进行宣传活动外，“群力社”还到郫县去宣传演出。1938年4月，黄爽英、熊梦、楠林、周辉、吕雪熙等八九人到郫县宣传，被无理扣押，引起成都各界救亡团体的抗议和声

援，迫使省政府申斥郫县县长，立即释放宣传队全体人员并登报道歉。1939 年，因“群力社”骨干先后转移和一部分同志去延安，活动即告结束。

《笔阵》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 1939 年 4 月 1 日，总经售处及通讯处设在祠堂街九十六号。编委会主要成员有叶圣陶、沙汀、碧野等知名作家，周文任主编。《笔阵》是宣传抗日的文艺刊物。

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创办的《金箭》，1937 年 8 月 15 日出版，社址和发行所在祠堂街一百五十六号。陈思苓任主编，成员有张文澄、张宣、戴碧湘、王永清、方伯非等，王引之（隐之）任发行。《金箭》主要通过文艺宣传抗日，1938 年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还要提到的就是 1941 年至 1942 年设在祠堂街的“莽原出版社”，经理是姚雪岩，主编是黄碧野，编辑为周鼎文等。该社出版莽原丛书和顾牧丁编的《诗星》和《雨丝》。“莽原出版社”的营业部曾与“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互相交换进步书籍经售和秘密运往外县。后因人员暴露被迫转移，于 1942 年下半年关闭。

进步书刊的流通处——书店

祠堂街有十多家进步书店，特别在少城公园大门两侧和对面，几乎是店挨店，门对门，当时称为“文化街”或“书店街”。无论平时或星期天，祠堂街总是学生云集，他们不是买书，就是看书，有的站在书架或书摊前面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同志回忆自己走向进步就是从读进步书刊开始的。成都书店多，但出版书刊少，大量书刊靠从外地运来，特别是进步书刊，经过万水千山辗转运来成都，一到书店即抢购一空。

抗日战争时期，在祠堂街兴办起来的书店也是我党同国民党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的场所。党在图书业的店员中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店”和“儿童书店”都有共产党员。1938 年下半年建立了党支部，“战时出版社”的社长杨道生任书记。随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店”等也发展了党员。“生活书店”与“三联书店”在抗战初期公开经售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著作，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群众》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国民党警察曾



多次借故搜查“禁书”，把门市部捣毁以后查封，甚至连买书和看书的读者也受到监视。书店的经理和店员，随时都得警惕敌人的魔掌伸进书店。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查，经常要把可能被列为“禁书”的书刊与一般书刊“混装”打包转移，或者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尽管这样，仍有一部分书刊遭到厄运。

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祠堂街店员业余歌咏队”。参加的店员达百余人，早晨练唱救亡歌曲（“晨呼队”），晚上去街头宣传、讲演，曾多次与其他抗日宣传团体联合演出，有较大影响。1942 年，杨道生同志被捕，英勇不屈，牺牲于外东沙河堡，党的活动受到挫折。此后，祠堂街的书店只有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继续把进步书刊准确无误地送到读者手中。

党团结各界人士的聚会点——“努力餐”饭馆

“努力餐”饭馆是车耀先同志在 1929 年 5 月 30 日开办的。最初在红照壁街（一说在一桥南街），为了有利于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3 年迁至祠堂街一百三十七号。

车耀先早年当兵，曾在川军部队任团长等职。之后，他“解甲归田”，在成都从事教育工作。1933 年至 1936 年任教于省立成都师范，在教学中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办《大声》周刊。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等主要抗日救亡团体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广泛联系上层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

“努力餐”较之一般饭馆并没有什么区别和特殊的地方。但是，它在经营服务上却与其他饭馆和餐厅迥然不同。这个饭馆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卖“大众菜”，物美价廉，就连从事苦力劳动的黄包车工人也可花很少的钱，舒适地吃一餐饭；二是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提供了条件。“努力餐”的楼堂雅座曾以大设宴席来掩护革命活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和聚会都在这里举行。成都每年春季都要在青羊宫举办“花会”。每年花会期间，车耀先照例在南门城墙上打出醒目的广告，招徕顾客，广告词为：“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最后两句，隐约地说出了开设这个饭馆的目的。

1936 年底，由张秀熟和车耀先出面联系举办的文化界抗敌救亡座谈

会，开始在张志和公馆举行，后迁至“努力餐”。参加座谈会的有黄松龄、刘披云、邓初民、马哲民、熊子俊、黄宪章、洪沛然、张志和、钟汝为等，有时罗世文、张曙时也参加。形式上是每周举行的“聚餐会”，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做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筹备工作。1937 年 10 月 10 日，“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选出张秀熟、车耀先、张宪、杜棹生、李劼人、黄宪章、李嘉仲、洪沛然、王达非等为执委，沙汀等为监委，对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1939 年 2 月 23 日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车耀先当选为理事，赵世兰、刘披云等被选为候补理事。“努力餐”是该会的主要活动地点。

1939 年 9 月，在我党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倡议下，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保障各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权利、集中人才、改革行政机构的决议。新华社发表了《促进宪政运动的努力方向》等重要文章，给国统区人民开展民主运动以极大的支持。车耀先在成都主持了“宪政座谈会”，多次在“努力餐”邀请张澜、邓初民、马哲民等参加座谈。

特别要提到的是 1938 年 10 月 21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代表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路过成都，成都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努力餐”举行招待会。由刘披云主持，欢迎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林伯渠、吴玉章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并同在成都的党员干部见面。

“努力餐”每天接待着各种顾客，在公开的营业中掩护了不少秘密的革命活动。但国民党特务也在暗中探视着各种迹象和车耀先的行踪，伺机进行破坏。1940 年 3 月 14 日“抢米事件”后的一天晚上，车耀先同志在“努力餐”被敌特逮捕，后被杀害。现因成都市扩建蜀都大道，“努力餐”已从旧址迁至小南街口左侧，它将作为重要革命遗址（文物）长期保存下来。

祠堂街在成都不过是一条短小的街道，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能成为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阵地呢？这主要是有地下党的领导。党组织尽管在这里多次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有二十多个党员被逮捕，包括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但党及时增派党员和发展大批党员，在这里始终保持比较强的力量。党组织还不断输送



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和骨干去解放区以及四川各地。在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政策指引下，留下来的党员改变斗争形式和策略，转入地下。1944年“市中事件”前后，他们适时地参加到群众组织中去，把革命斗争推向高潮。



人文故迹



成都史话

◎ 李金彝

成都，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甲骨文中就有“蜀射”、“蜀御”的记录，而且在成都地区还发现过历史更为久远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遗址。从它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时算起，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远在春秋末期，古代蜀王开明五世就在今天的川西境内，兴建了城市。他所建造的城堡，史书上称为蜀王城。至于开明五世以前，并不像诗人李白所说的那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不仅不模糊，而且有清楚的脉络可寻。

据考，古代蜀国在昆仑山东的积石山与岷山地区，后来才迁到青城山附近的彭灌山区一带。至今，汶川、都江堰市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彭县有鱼凫山，温江也有鱼凫城。《蜀王本纪》说鱼凫在灌县（都江堰市）打过猎。孙松涛的《观古鱼凫城》诗，也有“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的句子。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是古蜀故地。此后一迁再迁，先到双流，后到广都（即原华阳县中兴场附近），直到开明五世，才算在成都定居。这样不断的迁徙，是由渔猎转向农业生产的必然过程。

开明王在成都平原所建的王城，是以今天文殊院街一带为中心。南门是供古蜀王宗祠的地方，著名的金马碧鸡祠就在这里。西门是墓葬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西北桥、罗家碾、百花潭、五担山附近，发现了不少蜀国墓葬群和蜀王妃墓、石镜、王女墓等。从城市建筑角度来讲，应该说它是成都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城市。以历史分期来说，开明王朝为奴隶社会；在考古学的分期上，相当于铜器时代；按地域划分，四川古称梁州，成都当然属于梁州。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降蜀王国为侯国，封蜀王儿子为蜀侯，



仍住蜀王城。秦人则在成都东南方，由张仪、张若“筑成都大城，周十二里”，称“张仪城”。传说建城时屡筑不就，后来“有大龟浮于江”，跟着龟爬行路线筑城，就成功了，所以张仪城又叫“龟城”。这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了。后来又在大城西边建了一座少城（不是清代建立的以人民公园周围为主的少城）。

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秦对中国的统一，加快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蜀郡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成都地区经济的发展，农工商贾甚为繁荣。原来的成都城终嫌太小，不敷应用，又在成都的西南角，原少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作为商业区。这个地区，包括今天的青羊宫等地。青羊宫古称青羊肆。“肆”是商店的意思，如茶房酒肆。因位置偏南，故称为南小城。这个城在后来桓温灭蜀时被拆毁了。与之相对的偏北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

这二座城，到汉代被连接起来，建成大城。除南小城部分地区而外，其余地方都包括在新城之中，是有史以来成都地区面积最宽的一个大城，历史上称为“汉城”。

成都在西汉初期，仍称蜀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分天下为十三郡，设州，置刺史。这时的刺史是监察官，后来才改为行政官的。成都属于益州，益州刺史的监察区，是巴、蜀、广汉、犍为等郡。汉时，蜀郡蚕桑发展，织锦工艺发达，已有制种、取茧、抽丝、织造等专业分工，官府就统一管理大量官奴从事织锦工艺。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集中管理，在汉城内外又分建了锦官城和车官城。锦官城的官署，设在成都南门外。设立锦官城，目的在于把织锦官奴和工匠集中起来，以便于监督织造，防止他们私带锦缎逃亡。因在其住地周围修了围墙犹如城堡，故名锦官城。杜甫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与锦官城遥遥相对的，还有设在西门的车官城，专为管理运送人、货以及征战用的车辆和车夫。因蜀锦除上贡外，还行销全国，称誉于世，所以锦官城闻名遐迩，流传至今；而车官城就少有人知了。

到王莽（公元9—23年）时，益州改称庸部，负责的官员改称牧；蜀郡改为导江郡，负责的官员称卒正。担任卒正的公孙述反抗王莽，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把益州改为司隶校尉部，还设置了京兆尹。这完全是摹仿西汉的做法。到东汉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公孙述政权结束，四川郡县制度才与汉代完全统一。

东汉末的三国（公元220—265年）时期，刘备统一巴蜀，建立蜀汉政权，即帝位于成都的武担山之南，定成都为都城。他没有住进现成都北门的原蜀王城，而选择了五担山作为称帝设坛之处，大概是因为这里系古蜀国可靠的遗址之一，并以此表明他与东汉的继承正统关系。刘备称帝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次建城，以今天青龙街一带为中心，面积虽没有汉城大，但“穿城九里三”的轮廓、位置已大体确定，并沿袭到新中国成立前。

西晋（公元265—316年）初期，天下分为十九个州。成都仍属益州，主管官员仍称刺史。益州州治，仍在成都。

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武帝封他的第十六个儿子司马颖为成都王，成都由州治升为王国国都。到西晋末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公元347年，他的政权覆灭。公元348年，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又称帝于成都，只经过一年，范贲被杀，政令复归于晋。东晋（公元317—420年）末年的谯纵，杀掉了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南梁的武陵王肖纪，也曾称帝于成都。但这些人割据的时间都不长，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

隋代（公元581—618年）文帝杨坚，封他的第四子杨秀为益州总管。杨秀在成都大兴土木，修建宫苑。为了取土，竟把皇城（今四川科技馆一带）周围，挖成一个大塘，即摩诃池（摩诃是梵文译音，是大的意思）。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蜀郡改称益州总管府。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分天下为十道。蜀置剑南道，设剑南经略使，后升级为节度使。为方便管理，成都人口稠密的东部被划为蜀县。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阳县，成都也改称南京。成都府的主管官员称为府尹，是等级比较高的职位，照例是由节度使兼任（与杜甫同时代的节度使严武，就兼过府尹）。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还扩建了隋代遗留下来的摩诃池。这时的成都，由于未经受战火的骚乱，京师各类工匠纷纷来此，南北水陆交通发达，因而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公元759年，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对这里的建筑和习俗，印象极为深刻。他在《成都府》一诗中写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曾”同层，“曾城”指楼房）像这样歌舞升平、楼宇华丽的景象，同当时扬、益二州的经济繁荣是分不开的。

到了晚唐，局势动荡。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节度使高骈在成都筑





罗城二十五里。王徽有一篇《创筑罗城记》说："所谓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也。"后面的铭文又说："外耸风云，内扃貔武。"这就清楚地揭示了修筑罗城的军事目的。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时期，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都先后在成都称帝。公元938年，后蜀孟昶曾在成都城上，大量种植芙蓉。每到深秋，城上好像铺满了几十里锦绣，红白相间，一日三变，分外妖娆，所以成都又叫芙蓉城。这个名称沿用至今，或简称"蓉城"。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五路，蜀为四川路，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主管官员没有唐代那么高的等级了。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起义军王小波的部将李顺，曾经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在王小波死后称"大蜀王"。义军失败后，成都府被降级成为益州。

元代（公元1271—1368年）设了十一个行中书省。行省是派出机关的称呼，表明实行中央集权。蜀为四川行中书省，省治在成都，共辖九路，成都路居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路划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元朝末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改国号为"夏"，把成都定为他的陪都。

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取消了行中书省的名称，改设13个布政司。四川为"四川布政使司"，主管官员称布政使，下辖8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二县。朱元璋为防止地方官员割据称雄，把儿子们分派全国各地。为新到蜀王修建的王府，即在今天的四川科技馆一带，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皇城"。这时的摩诃池，因年代久远，慢慢淤塞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就是这座王府。坐北朝南三座重檐高阁的大殿被高深城墙所围，前面是广场。广场之外，三桥并列，远处有红色照壁。府门前耸立石狮华表，庄严大方，甚为壮观。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部队进入成都，号称大西王，改年号为大顺，以蜀王府作为王宫，成都也改称西京。后来受明兵围剿，张献忠带队伍向阆中方向转移，撤离之前，拆毁了皇城和成都城墙。后来的成都城墙，是清代以后重建的。

清代（公元1644—1911年）以后，体制无大变动。四川称四川省，成都仍叫成都府，管三州十三县。康熙初年，经济稳定，人丁增加，又重建成都城。全城周长二十二里二分，所以成都人常说"穿城九里二"，即指从东到西的距离；从南到北相距仅七里七分。到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又开始修建以现人民公园为中心的少城，作为满族军民的居住区。少城范围较小，周长只有四里五分，因南面和西面有成都城墙，所以少城只修东面、北面的城墙，围成城中之城。少城内大街小巷，等级分得很严。八旗官街八条，住着满族文武官员。兵丁胡同二十二条，住着满族士兵。少城属于禁区，汉人不得擅入。

康熙时两次建城，最后奠定了成都城郭的规模。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 年），对成都城墙加固培修，长度未变。

公元 1911 年以后，四川因宣布独立，设置了军政府，但省以下行政体制未变。1913 年，取消了“府”和“直隶州”的称号，原成都府和府属各县改属川西道。第二年又废除道制，成都、华阳都直属四川省。成都县辖成都西城，华阳县辖东城。两县以北起狮于巷，经衙官公所街、冻青树街、暑袜街，到南至青石桥街为界，街东街西各属一县。谚语“暑袜街上跨一步　现（县）过现（县）”即源出于此。1928 年，正式把成都改为成都市，下辖的成都县政府搬到茶店子，华阳县政府迁往中和场。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县都撤消了。

现在的成都市，至 2002 年底，辖 9 区（锦江、青羊、成华、金牛、武侯、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6 县（双流、金堂、郫县、大邑、蒲江、新津）、4 市（崇州、彭州、都江堰、邛崃）。

成都，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止，还是一座只有“两根半烟囱”（机械厂、火电厂和半歇业的染布厂）的消费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楼崛起，工厂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欣欣向荣的工业城市。正如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所说“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了。成都的建设远景，政府已有规划。南宋诗人陆游曾写《成都书事》来赞美当时的成都风物说：“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待建设规划实现时，那才真叫人人游蜀都，个个“欲忘归”呢。



皇城和康公庙

◎ 廖上柯

成都的皇城，有人说它是当年刘备登基做皇帝的地方，其实不是，而是明王朝蜀藩的王宫。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作了大明开国皇帝。以后，分封他的儿子们为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北京；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驻成都，等等。当时朱椿年纪很小，又最为朱元璋所喜爱。受封以后，朱元璋仍旧留他在南京宫中，而叫一个姓康的太监先到成都，为朱椿营建宫室，并嘱咐修好点。

康太监奉了圣旨，驰赴成都，大兴土木，务为豪华堂皇，制拟京师，连筑城的基土也认为成都的不够坚实，要从汉中专驿运来。数年之间，修筑宫室花了明朝国库大量钱财。而康太监还自恃圣旨在手，继续软索硬要。户部无法，便上奏朱元璋，说康太监把国库都花空虚了。朱大怒，以为是康中饱私囊，便敕他自尽。帝命难违，康便服毒而死。及至朱椿长大，来成都就藩，发现康太监为他修建的宫殿如此富丽雄伟，必然要用那么多的钱，朱元璋说他贪污，敕他死，显然是冤杆。于是，便为康太监修了一座祠堂来悼念他，取名“康公庙”，遗址就在今天的康公庙街——康庄街。

成都皇城史话

◎ 李思桢　吴绍伯

皇城的修建起始年代已不可考，但大规模兴建皇城，是在1066年以前的五代时期。王建在成都称帝，历史上称“前蜀”，他下诏修建皇城。后来他的儿子王衍嗣位，又增筑宣华苑，宫殿亭阁，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皆可行舟。前蜀灭亡后，孟知祥又称帝，是为“后蜀”。其子孟昶袭位，宫殿更增华丽，后被宋朝消灭。王建至孟昶共58年，这时的中原大乱，“梁唐晋汉周，都来五十秋”，内乱不止，唯独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天下士皆来归之”。木板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四川教育大大发展。这为随后的宋代输送了有史可查的千余名官员。大府之国富甲天下一点也不虚假。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中枢就在这弹丸之地的皇城内。成都在当时，不仅是四川，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心的中心，又是王、孟父子先后居位的皇城。宋太祖灭后蜀后，从成都到开封搬运金银布丝车队百乘，历时几个月，天天搬，日日运，把这个从光棍出身的赵匡胤王朝的经济接济搞活，可见成都当时聚集了多少财富啊！

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为蜀王。在前、后蜀宫殿遗址，修筑“藩王城”，全用砖石砌建，非常坚固。从此，藩王的子子孙孙，就在这座被人叫着皇城的藩王城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约二百年之久。及至明末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建国称帝，国号大西，他就以这个藩王城作为他的皇城。仅两年时间，他退走川北，皇城也因为屡经战乱而残破不堪了。

清朝以后，皇城不断发生剧烈变化。最初它是“考场”；辛亥革命时，又是杀赵尔丰的“刑场”；后来两度变为“战场”，一度作为“杀场”，最后又变为“市场”。这“五场五变”的沧桑兴废，很有点历史价值。一幕



一幕的场景，像映放影片一样，展现在人们眼前。

就先从“考场”开幕吧！

皇城是清朝康熙四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请在明藩王城老基址上改为“贡院”的。基址相当宽阔，现在的四川省科技馆，正是原址的中心地区。现在的红照壁，就是皇城前门的红色大照壁墙。后子门是原皇城的后城门，左右两边是东、西华门，正对前面大门还有一条横贯东、西城的金河。金河上有三道大桥，桥两边有一对最大的石狮子。皇城外观是相当巍峨的。

皇城正门品排起三个大圆洞，俗称皇城洞子。中洞上边原有四个大字：“大开文运”。民国元年取消了，改悬“四川军政府”的招牌。外面一个大石牌坊，上刻“为国求贤”四个字。左右边坊刻有“会昌”“建福”字样。洞门两旁，也有一对大石狮子。进洞门右走，就是府试院，民国初年改为测量局。对直进去，又是三道大门。中间一道匾额题有“龙门”二字。正对一层高楼叫明远楼，不远处是至公堂。附近有矮屋一万八千六百多间，那就是贡院考生住的。又有一道石牌坊，上刻“帝求俊义”四字。字后刻有乾隆皇帝四首诗，诗意是勉励人读书做官。再进去还有“清白堂”“衡文堂”两座建筑。最后是“狐仙洞”。左边一座大煤山，右边是八角林，最后为后子门。皇城的概貌，实际上包括了南从红照壁，北至后子门，东起人民商场，西至东城根街的大片地区，大体是照北京模式修建的。

每逢大比之年，全川各县的“秀才”都到这里来绞尽脑汁，谋取功名。皇城名称虽存，实际已变成“考场”。

“抡才大典”是在阴历八月份举行，搞得既紧张，又隆重（俗谣：桂花黄，举子忙）。来自各州县的几千秀才老爷，手提竹篮，埋头缓步，陆续进入贡院大门。点名以后，被分配住进一排排鸽笼式的号棚内。每间号棚，长一公尺，宽约八九公寸，勉强蜷容一个身子。面前还有一个活横板，那就是写文章的扶手板。不管你坐、卧、睡、站，一律包干在这个小方格里。考生住定后，就有人扛着写有考试题的一面大木牌，缓缓游走；另一个人提一面锣，一边敲，一边反复地呼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根据曾经参加过考试的老辈子讲述，皇城做考场，搞了一两百年之久。在“道光”以前，封建迷信更利害，关贡院门一幕，是最荒诞可笑的。

在全部考生和有关人员进场以后，学台穿戴起翎顶袍褂，燃起香蜡，

先向天空膜拜，随即站在贡院大门前，做出拱手躬身、欢迎客人的样儿，口中念道："请各县城隍进场！"隔了一阵，又大声宣布："有冤有仇的阴魂进场！"谐剧似地做出真像有人进场的样儿。

鼓声一响，便有人慢声高呼："关贡院门啰！"贡院门一关，便和外界彻底隔绝了。一切对外联络，非要经过三场考试（九天）完结以后，才能开门。纵是有人疾病死亡，尸首也只能由阴沟里流出贡院。

每次考试，在考生中，都要发生很多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事故，不是自杀，就是疯魔。在考卷上有画女人头足的，有题淫秽诗词的，情况复杂，不胜枚举。很多鬼龙门阵，都是辗转传说，附会其词。有些人本来就有神经分裂症，环境刺激，旧病复发。有些是答不上题，借故装疯，来掩人耳目。总的说来，这都是由于丑恶的、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所形成。

自从清代晚期废科举、兴学校后，皇城一下冷落下来，荒凉到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洞门中间"天开文运"的横匾被取下来，换上"四川军政府"招牌，皇城一天天又热闹起来。至公堂上，还做过杀总督的"刑场"呢！

清朝统治旧中国二百多年，到了末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丧权辱国失尽人心。宣统三年，四川爆发了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当时四川总督赵尔丰（绰号赵屠户）用高压手段镇压人民，仍然缓和不了紧张局势。继成都之后，荣县等数十州县，纷纷成立同志会宣布独立。赵尔丰感到覆亡已在眼前。接着武昌独立的消息传来，北京情况不明，局面更难维持。赵尔丰为了保存实力，表示愿交出政权，赞成四川自治，宣布"四川自治方案"。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皇城内成立，公举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总督。

军政府成立之后11天，阴历十月十八日，蒲、朱率领文武大员来到东较场阅兵，突然发生兵变。大批乱兵涌出东较场，到处抢人放火，登时成都全城大乱。两个都督趁纷乱逃之夭夭。军政府改组后，另举尹昌衡、罗纶当正、副都督。这次兵变，一般舆论归咎于赵尔丰，认为他交出政权赞同四川自治，是搞的假过场。他还在用"总督部堂"名义，出告示安民；又秘密去信调其心腹驻雅安的傅华封赶快率领他在川边训练的巡防军到成都来；还在计划勾引"回军"从甘肃打进四川。这次兵变，肯定是他策划的。收鬼放鬼都是他，致使成都遭受这样的大祸。由于平时赵尔丰军阀兼





官僚的作风严重，早已引起广泛的民愤，各县民军讨赵文电如雪片飞来。尹昌衡认为杀赵的时机成熟，便于12月22日（冬月初三）命他的干将陶泽昆率队去捉拿赵尔丰！

陶泽昆机智勇敢，他带了两三百人的精壮队伍，不动声色地向督院街进发，沿途街口，留人防守。他带了几十人直驱总督衙门，出其不意地向门卫声称尹都督有紧急公事面呈大帅，一面说，一面以神速的步伐直奔赵的寝室。赵还在床上未起，陶泽昆叫几个大汉把赵拖下床来。赵只穿了一只靴子，便被四个大汉举起来向外跑去，陶泽昆紧跟后面大呼："哪个敢上来，我们就先打死赵屠户！"动作神速，飞奔出了衙门。

尹昌衡在皇城内放不下心，两次爬上明远楼去用望远镜远望督院街侦查，见巡防军无动静。正在焦虑之际，陶泽昆等已经扛起赵尔丰经过东大街、东御街、皇城坝、进入皇城，至公堂下面已经站满了开会群众。赵尔丰被扛上至公堂。他坐在红毡上，横眉怒目，继而谩骂。尹昌衡、罗纶讲话后，高声向群众询问："你们说赵尔丰该不该杀？"

"该杀！"下面雷鸣般的吼声。

最后，被押在至公堂的东廊檐下，由陶泽昆拿出一把雪亮的鬼头大刀，向赵走去。赵尔丰来不及考虑一刀之苦的时候，便被陶从后颈上砍下。尹昌衡叫兵弁将赵的首级用矛杆子支起，随着他乘马出外，耀武扬威地游街示众！

皇城做了刑场以后，还做过两次"战场"。四年后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他嫌这个落地桃子太小了，还想当皇帝。他一切准备就绪，突然云南督军蔡锷首先发难，通电声讨，全国响应。他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就忧吓而死。

蔡锷以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派到四川来当督军，率领左翼司令罗佩金、右翼司令戴戡进驻皇城。后来蔡因害喉症，离川到日本就医，8月13日，公布罗佩金代理督军职务，戴戡任省长兼军务会办。罗是云南人，戴是贵州人，他们统率的武装军队风纪十分恶劣，遭到群众的厌恨。四川大小军阀，都不甘心受制于外省人。二师师长刘存厚首先发难，提出驱逐罗佩金口号，双方发生战斗。罗驻皇城内，被刘存厚围攻，战况非常惨烈。一共经过9天的时间，皇城附近地区，蹂躏得不成样子。罗佩金率领残部，从后子门城墙缺口溃退逃离成都。皇城内滇军尸首，满坑满坝。在围攻罗

佩金时，戴戡起了私心，想利用川军力量，解决了罗之后，便是他一个人的天下。因此，在九天激战中，他都“拖眼皮”，不帮罗的忙。罗逃后，戴就是督军兼省长。4个月之后（1917年7月），刘存厚又发动驱逐戴戡的战争。这次战争破坏面更大，把戴戡军牢牢围困在皇城里，断绝水米。7月13日，黔军冲出皇城，掠夺附近老百姓粮食后又返回皇城死守。他为了要“亮城”，打出大量烧夷弹，把皇城四周的民房全部烧毁。半天功夫，四方八面成了火海，几十条街道如皮房街、大、小红上地庙等街道被烧成了平地。川军一共围攻皇城12天。戴戡支持不了，化装跟着敢死队冲出后了门缺口，跑到中兴场附近秦皇寺，便自杀了。1917年中，驱罗、戴两次战役，成都人叫“打皇城”，消灭滇、黔军共13000多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劫后的皇城内，残尸遍地，血水成洼。这就是皇城作的第一次战场。过去的皇宫富丽气派没有了，严肃阴森的科举考场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断垣残壁，一片瓦砾。

又过了一长段时间，四川政府觉得这块地荒起碍眼，便陆陆续续迁入了一些学校，分头整理，兴建房舍。陆续迁入皇城的学校有四川选科师范、四川省立艺术专门学校、成都中学、民新中学。最先在内的有成都高等师范（1926年改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还有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后来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那时皇城内学校荟萃，弦歌不绝。人们正在庆贺这个可喜转变，可惜好景不长，皇城又演了一次“杀场”大悲剧。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了城里的学校。2月16那天，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出武装兵一团，一早冲进皇城，把成都大学包围了。全校学生被赶到图书馆前草坝里集合，周围站满了岗哨，如临大敌。先由舍监点名，一个军官拿过名册，同他带来的黑名单对了一下，专点了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王道义、胡景元、韩忠霖六人，叫出列子，站成双行。又问：“哪些是社科的？站出来！”当时又站出二十多人。钱芳祥等站在行列前头，武装队押起三十多个人离校而去。

与此同时，在师范大学中，一阵疾风骤雨的跑步声、急促的高叫开门声，把全校学生从梦中惊醒，接着又把师生一齐关在合班教室里，整整关了4个钟头，后来驱赶到草坝点名。一共点出他们要抓的十多个人，押走。同时，又在师大附中逮捕了教务主任袁诗荛，一同押走。



那天除了在皇城三个学校抓人而外，还在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学校、脚板街的公立志诚法政学校、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逮捕了师生共一百几十个人。恐怖气氛弥漫全市。

在大逮捕的当天，午后三点多钟，就把袁诗荛、周尚明、李正恩、钱芳祥、张博诗、王向忠、王道文、胡景元、郭翼唐、龚堪慎、白贞瑞、陈选、石邦渠、韩忠霖十四人杀害于下莲池。行刑前并未经过审讯，更无所谓法律程序。成大、师大的师生义愤填膺，不顾军阀势力的威胁，流起眼泪去把成大的钱芳祥等六人和师大的张博诗、附中的袁诗荛等六具尸体运回，停放在皇城至公堂正中，让同学们瞻仰哭吊。社会舆论一致认为“不审而杀，何以服众?!”成大学生会发出宣言，抗议军阀蹂躏人权，摧残教育，表示誓死反对，并向全国呼吁，请求声援。

皇城真是多灾多难的区域，结束了“杀场”，又变为第二次“战场”。1932 年的“壬申巷战”，又以皇城为中心而展开了：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三个军合驻成都。为了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化，刘文辉和田颂尧便以兵戎相见，在市区占据街巷，挖筑战壕，进行大规模巷战。皇城居市中心区域，煤山是全城高地，为两方争夺的焦点。刘文辉占据皇城前面的城楼和明远楼一带地区。田颂尧军由于其军部在山西会馆，总指挥部在文殊院，田的公馆在东二巷，因此他拼命死守后子门一线。煤山是全城的最高点，两军反复几十次的争夺，双方都组织敢死队，码起大银元作奖励。刘文辉用的“棒客队伍”由石肇武、朱瀛州率领冲杀。田颂尧的师长王铭章的军帽都打落了，阵亡团长邹兴发等 2 人，营连长一二十人。战况惨烈，不亚于驱罗、戴之战。被围困在皇城内的各学校的师生员工，纷纷藏匿砖墙下或床脚避弹，几天几夜水米未沾，部分寝室被洗劫一空。战斗从 11 月 14 日开始，到 23 日结束，一共打了 9 天。据不完全统计，皇城内外连同部分街巷，总共死伤约 3000 人，其他损失就无法统计了。

劫后的皇城，败瓦颓垣，荒凉满目。皇城城墙年年被驻军陆续偷拆，百万匹明代大城砖，被盗卖一空。抗日战争中，各学校奉令疏散迁走，这样大一个烂地区，反动政府正忙于争权夺利、残害人民，哪有闲心来加以整理。时间稍久一点，部分地区就有小商贩来做生意买卖，渐渐变成“市场”。算命看相的，打金钱板的，卖唱的，卖耗子药的，还有外省外县流

落来的“难民”，用草席烂布搭棚子来作栖身之所。越搭越多，贫民窟和扯谎坝合二为一。更恶劣的是这中间逐渐产生贩卖烟毒的，搞枪弹买卖的，赌钱“烫毛子”的，买卖壮丁的，强迫良女作娼妓的，还有表面上以介绍佣人作掩护暗地搞勾引善良人家拐卖人口的“人市”。千奇百怪，异常复杂。与此同时，这个区域的环境卫生，也是相当的糟糕：垃圾遍地，狗鼠成群，灰尘蔽天，污水满坝，简直是旧社会的缩影，人类的耻辱。这时，聚居在这片地区内的贫苦户有好几万人，现在的体育场一带当年全是茅草棚或烂布巾巾隔成的无墙无窗无电无水的“杂拌房”，一到夏天，蚊蝇孳生，瘟疫流行。国民党不时还拉一些犯人来这里枪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块备受摧残、灾难重重的肮脏地区，受到新时代阳光雨露的沐浴。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指引下，从 1950 年起，千千万万军民热情自发地整治百年淤塞的御河，以学愚公的精神，搬走了一座大煤山，修起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体育场。所有皇城内外各个地区，包括阴暗角落，陆续不断地加以彻底清理。全市首脑机构市人民政府，便设在皇城内。原有那些席棚纸屋户，都被优先拆迁，小商小贩得到适当的安置。



支矶石

◎ 郑光福

成都有一块褐色巨石，高 2.12 米，宽 0.8 米，底大头尖，似梭子状。石头表面的剥蚀痕迹告诉人们，它的历史已相当久远了。它就是成都有名的支矶石。

一片支矶石，传来牛女津，
客槎何所处，卜肆已生尘。
较似昆池古，长从汉月新，
每逢秋夕里，吟眺倍相亲。

——《华阳国志·艺文志》

这是明代诗人曹学佺咏支矶石的诗，说远在汉代就有此石了，而且来自牛郎织女相会的天河。因此，诗人发出了“每逢秋夕里，吟眺倍相亲”的感叹。

诗中关于支矶石的来历，当然不是曹学佺个人的发现。史书中关于支矶石传说的记载是很多的。最早见于晋代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见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这则神话故事，仅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乘船到了天河，遇见了牛郎织女。他问牛郎这是什么地方，牛郎叫他到成都去问严君平。

严君平就是严遵，他是西汉时很著名的星相家。现在的君平街，是成

都的一条最古老的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这段记载，并没有说出支矶石的由来。经过后人的演绎发展，终于形成了关于支矶石的完整的神话故事。《蜀中广记》是这样记载的：

初，博望侯张骞使大夏，穷河源，归舟中载有一大石，以示君平。君平咄嗟良久曰："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女，意者其君乎？此织女支矶也。"博望侯曰："然。吾穷河源至一处，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吾问此何地？女子答曰：'此非人间也，何以到此？'因指一石曰：'吾以此石寄汝舟上，汝还以问蜀人严君平，必为汝道其详。'"君平曰："吾怪去年客星入牛、女，乃汝乘槎已到日月之旁矣！"遂相诧异。

自此以后，《蜀中名胜记》《蜀都杂抄》《益部谈资》《成都通览》等都有类似记载。

支矶石当然不可能是织女的织机上的垫石，更不可能是张骞从天河上用船运载来的。有人根据从天上而来的神话，便推测说它是太空中落下来的陨石。远在唐代时，诗圣杜甫就不相信支矶石是从天上而来的传说，他在《石笋行》中说："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判断其为古蜀国的卿相死后"立石为表"的纪念物——墓志。考古学家对支矶石的来历争论不已，除陨石说、墓志说之外，还有遍及世界各国均有的大石遗物的种种说法，尚无定论。

支矶石过去放置在西门的支矶石街。在支矶石处，还建立了支矶石公园。由于牛郎与织女的神话故事颇有浪漫色彩，对青年男女很有吸引力，那里一直作为谈情说爱、许婚幽会之处。



大圣慈寺话沧桑

◎ 王治平

大慈寺本名大圣慈寺，据《通志》的记载，它是唐代至德年间（公元757年）修建的。庙门前的匾额上的“大圣慈寺”是唐肃宗李亨御笔亲题。但据近代杨啸谷考证，认为寺内现存佛像的形像，并不像唐代造像风格，而近于六朝塑像。相传唐代名僧玄奘法师曾在这里受戒，但是据唐僧的传记所载，只说他在成都受戒，而没有说是在哪一个庙宇。是否在此受戒，只好存疑了。

唐代大慈寺占地极广，相传成都鼓楼洞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楼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以大慈寺庙门的两根红石柱而得名。它拥有96院和两万多间房屋。

自唐以来，大慈寺就是成都的名胜，四时八节，常聚万千游人，历代的地方官吏和名流学士都喜欢到这里宴饮游赏，留下很多咏物叙怀的诗篇。

到了宋代，寺门前便成为市场，每年二月十五日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宋成都太守田况作有《大慈寺前蚕市诗》：“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可见当时蚕市的盛况。

大慈寺内保存的历代文物极多，最著名的是壁画。据历代文献记载：大慈寺共有壁画一百多幅，都出自名家手笔。其中有唐代最著名的画家吴道子的画10幅。北宋时，画竹子的名家文与可，在寺内读过书，对唐朝名画家李夫人画的竹子很感兴趣。寺内和尚告诉他：李夫人根据月夜时竹子映在窗上的影子，悟得画竹方法。于是，文与可天天在寺内临摹李夫人画的竹子，终于创出了“攒三聚五”的画竹技法，为后世画竹开创了一条学习途径。苏东坡和文与可是表兄弟，他画竹就是跟文与可学的。寺内碑石书法墨迹也甚多。

大慈寺中还藏有唐明皇和唐僖宗的画像。据《蜀梼杌》的记载：五代后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六月到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并宴群臣于华严阁下。

唐武宗崇信道教，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下圣旨尽毁天下佛寺，在历史上称为“会昌灭法”。而大圣慈寺却因为庙额是他的祖先肃宗皇帝亲题的，他不敢触犯祖先“在天之灵”，因此大慈寺才得以幸存下来。《通志》上记载：“大慈寺……旧有肃宗书大圣慈寺四字，故会昌不在除毁之列。”

到了明朝末年，大慈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仍然保持着常住和尚两万多人的记录。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攻打成都，明朝官军抵挡不住，而大慈寺的僧众却拿起武器与张献忠义军搏杀，并把义军赶走了。据传现在东郊的猛追湾，就是当年和尚追赶张献忠的地方。随后，张献忠第二次攻进成都，怀着被和尚追杀过的仇恨，放火把大慈寺烧毁，寺内保存的文物壁画也随之付之一炬。清康熙年间，佛教徒们募款重修大慈寺，规模很小，已不能与从前相比了。残存文物也只有两尊铜铸的药叉神像、一尊铜铸的药师佛像，以及一尊铜铸的所谓“镇压海眼”的阿弥陀佛立像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币制变动，铜圆通行。四川军阀李家钰的部队驻扎在大慈寺内时，见两尊药叉神像分量不轻，便把它们毁掉铸了铜圆。那尊阿弥陀佛像分量更重，为什么李家钰没毁掉铸铜圆呢？

原来这尊阿弥陀佛铜像，全身金晃晃的，号为“丈六金身”，佛背上刻有小篆文“李冰铸”三个字。每个字约有五寸高、四寸多宽，三个字连在一起大约长一尺五寸左右。民间传说，李冰在四川治水，降服了孽龙，开都江堰灌溉川西田土，又铸阿弥陀佛铜像镇压海眼。海眼就在铜像下面，夜深人静，伏在铜像足下，还可以听见海潮之声。如果这尊铜像被毁，成都就要被洪水淹没。这个传说，自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无稽之谈。其实，连“李冰铸”三个字也是假托的。李冰是战国时代秦惠王（公元前337年—前310年）派来四川的太守，而小篆则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所创造（公元前221年）。李冰竟会把百年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小篆镌刻在佛像上，岂不是个大笑话？况且，佛教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才传入中国。这之前的李冰，又怎会异想天开地铸造阿弥陀佛铜



像呢？据考证，这尊佛像是南北朝时候的造像。在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公元 1502 年—1548 年）崇信佛教，普天下大造佛寺，大慈寺可能就建造于此时。我记得在这尊佛像前，还悬了一个“法侔宝志”的横匾，“宝志”是梁武帝的国师志公的法号，那么这尊佛像也就是梁武帝时铸造的。它“托福”于“李冰铸”和镇压海眼的传说，使封建军阀如李家钰等有所忌讳而未敢轻易毁掉。

不幸的是，这尊经历了 1300 多年沧桑的历史文物，在 1958 年的“献铜运动”中被毁了。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只有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加强对文物古迹的管理保存工作。



几番兴废话金河

◎ 夏顺均　李思桢

走进成都人民公园，跨桥一弯流水，夹岸花木扶疏，游船上下如织。河水流过几道曲折的小溪，汇入两个树色花光掩映的明湖，云影波光，为公园生色不少。你知道这条河流的名称吗？它就是有千年历史而今只剩这一小段的金河。

金河，在唐初自外西引水入城，斜贯城中，然后出城会于外东的府河，形似衣襟，共呼“襟河”或“禁河”。“金河”的美称，则是明初在它北面建立了藩王城（俗呼皇城）才普遍流传的。至今在它的上游，还有一条街叫金河街。但整个的金河，除公园这一段外，却不见什么踪影了。

说起“金河”的兴废，倒也不止一次两次。我们就根据史志所载，讲讲它的几番兴废的故事吧。

远在唐朝，成都府尹白敏中首先开凿金河，主要为汇纳城中沟渠积水，使其下泄，免遭水害。但自高骈筑罗城，分江水环城而东后，城内仅剩一脉小水，自城西北铁窗流入。不久唐朝灭亡，王衍继其父王建做了前蜀皇帝，便筑城西夹寨大堤，引水绕其皇宫为御河，连通摩诃池，供其行舟享乐。从铁窗流入的一股小水，自然不被重视而湮没无闻了。这可算是“金河”的一兴一废。

宋朝灭蜀后，又经过了大约70年，成都知府王观，始应群众请求，博访父老，找得原铁窗石渠故基，沿河西溯到上游十里的曹波堰，接上流溉余弃水，引导入城，循西门大街东流；又闸护城河南流的水，从南铁窗入城，与西铁窗水合流，汇纳诸夹街小渠，从东门出城，合于府河，这才奠定了以后“金河”河道的基础。又经历了一百年左右，席贡镇蜀，见河道年久失修，城中四处积水，泥泞满道，常遭水害，便发动群众，加以疏浚，淘出污泥，用作农圃肥料。从此水害减少，人民称颂。30年后，席贡



的儿子席益亦来镇蜀，不久就遇到一次特大的暴雨，城外堤防被冲决，水自西门夜泛入城，淹没民房无数。水退后疫疠大作，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颇大。这才彻底对其进行整治，并作节制闸门，绘成流域图，议定岁修维护办法，以后水灾就大大减少了。这几次工程，在吴师孟《导水记》，李新《后溪记》及席益《淘渠记》，均有记载，可资查考。此后南宋百多年中，又经王明叟、席大光、范成大续加疏浚，“金河”始终保持畅通。但在宋亡前的三十多年，成都屡经战乱，城垣房屋焚毁殆尽，“金河”也就自然废绝了。这就是“金河”的二兴二废。

明初平蜀，陆续修建大城、藩城后，才又修复这条河流，仍名“金河”。约两百年后，河身变窄，引流不畅。嘉靖末年，巡抚谭纶才发动群众，大加疏浚，引锦江水入城壕，再入河，河身两旁各加宽三尺，加深三分之一。刘侃写有《重开金水河记》，详记其经过，刻石立在河边。又过八十余年，明朝灭亡，成都迭经兵患，城池尽毁，“金河”也全部淤塞。它到此已是二兴二废了。

清初，“金河”逐渐恢复。至雍正九年（1731 年），大加疏浚，“金河”才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貌。这次工程是在当时四川巡抚宪德，及成都知府项诚的主持下，依靠群众，费时半年多才完成的。从外西磨底河引水，入少城（即康熙五十七年建筑的满城）铁窗，流贯全城，至东铁窗水关出城，合于府河，全长 1526 丈，全部加宽、加深。并在原西御街中段开凿新河，沿顺河街、小河街直通御河，全长 190 丈。并疏淘御河 1058 丈，使能行船。又先后在金河上建设了 22 座桥梁，由西而东为：（1）金花桥，在今金花街。（2）节旅桥，在将军衙门两面。（3）通顺桥，在小南街口。（4）斜板桥，在祠堂街（今人民公园侧门）。（5）龙凤桥，在祠堂街（今人民公园大门）。（6）半边桥，在半边桥街（半为满城水栅，故名）。（7）（8）（9）三桥，正对皇城三个城门洞（今人民南路新华书店东南面，中间一桥较宽平，两侧的桥较窄，拱背）。（10）锦江桥，今盐市口南。（11）卧龙桥，今卧龙桥街。（12）青石桥（即古龟化桥），在青石桥街。（13）太平桥，在半边街。（14）一洞桥，在半边街（今一洞桥街）。（15）余庆桥，在半边街（今余庆桥街）。（16）老卧龙桥，在南打金街口。（17）板板桥，木材平式，在龙王庙街。（18）景云桥，石材拱式，在龙王庙街东头。（19）拱背桥（一名金水桥），在东岳庙侧。（20）

铁桥桥，即东水门铁窗。（21）普贤桥，在东城外清安街。（22）大安桥，在东城外珠市街，旧称下里桥。各桥上多有屋覆，叫桥亭，后因拓宽街道，便利交通，始行拆去。诸桥尤以三桥及青石桥一带最为繁荣。御河上亦建有7座桥：（1）同善桥，在东御河南段；（2）履安桥，在东御河北段；（3）义成桥，在西御河南段；（4）平安桥，在西御河北段；（5）（6）龙眼桥，贡院左右各一；（7）后子门桥，在后子门街。今平安桥街即因当时西御河沿的平安桥而得名。更在西外建置闸门以防洪水，东外建置闸门以备水枯时蓄水。规定东闸门按时启闭，使货船分次出入，直达少城东水关（在今半边桥侧，过此是满城，禁船出入），及旧皇城北面的后子门桥。沿河商肆繁盛，货物随处起卸，居民购物十分方便。当时的“金河”，除便利交通运输外，还起到防火、泄水防病的作用。因当时城内草屋尚多，即使瓦房亦多由竹木构建，以前每家备桶储水防火，常感无济于事，“金河”常年有水，火灾就减少了。又当时居民多饮用河水、井水，“金河”疏通后，地下水的盐碱度减轻，有利健康。各处沟渠及洼地积水，都能排泄出去，减少秽浊熏蒸，更使人民少生疾病。并且，四季都有清澈的河水流贯城中，又能点缀风景，美化生活，所以人民都乐于遵照规定，按时疏淘，并保持清洁。终清之世，“金河”是起到了相当作用的。



望江楼和薛涛

◎ 李思桢

坐落在成都东郊濯锦江畔的望江楼，以拥有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文物古迹而驰名中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多次拨款维修园林，培修楼亭馆阁，整理了墙垣道路，兴建了水池假山，栽培了繁花异卉，正式命名为望江楼公园。现在园林面积已达一百八十余亩，较旧地扩大了20倍，遍栽省内和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以及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各类竹子，有一百三十余种，搜集之多、全、珍贵，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亦属罕见。望江楼已成为成都市的游览胜地。

在望江楼公园漫步，常听到人们问：哪里是薛涛故居？园内三座楼都可望江，哪一座是真正的望江楼？楼与薛涛有何关系，于何年建成？

其实，唐代女诗人薛涛生前既没有在望江楼公园一带住过，也没有在这里制笺题咏。她的活动，与望江楼并不相干。据王家祐《成都城史》的《碧鸡坊考》中说："薛涛早岁居万里桥边（在成都城南），中年移住节度使别墅浣花溪旁（在城西），晚年居碧鸡坊创吟诗楼（在城北），三处各不相连，盖迁居异地也。"那么，活动在城南、城西一生的薛涛，怎么又和城东的望江楼联上了呢？原来薛涛逝世后，她的坟茔的确是埋在此地附近里许，这才与望江楼发生了关联。据《四川通志》载："薛涛墓在华阳县东十里。"《华阳县志》与《华阳新志》均载"薛涛墓在城东数里"。《蜀中名胜记》引述："段文昌为撰墓志，题曰：西川校书薛洪度墓。"（薛涛字洪度，"涛"有作"陶"，"洪度"有作"弘度"或"度弘"）段曾任西川节度使，与薛涛有过往还，故薛死后为其题墓志。段题墓碑早已毁佚，然因志有记载，故在明代嘉靖时又补立，后仍毁佚。直至清代光绪九年癸未（公元1883年），浙西沈寿榕才再为其重新刊石，即十几年前尚能见到的墓碑。薛涛墓与碑，在十年浩劫中被夷平捣毁，墓址在望江楼公园右侧约里

许的四川大学内。

就因为唐时埋了这座真实的“薛涛坟”，才在这里引来了薛涛的身影。当时人们为纪念薛涛，还在坟的周围栽上桃花。故唐代诗人郑谷在《咏薛涛坟》诗中有“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之句。到明代，万历年间进士邓原岳的《咏薛涛坟诗》也说：“三尺荒坟傍狭邪，坟前流水绕桃花”。以后，不知何年何月，有人把绕墓桃花换成了几丛翠竹，因此引得清初诗人郑成基在《咏薛涛坟》诗中感慨地说：“昔日桃花剩无影，到今斑竹有啼痕。”

薛涛坟侧的几丛翠竹，因岁月长流，逐渐发展，再加之有意培植，遂成为现今望江楼公园翠绿缭绕，修竹成林，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竹园美景。这对纪念薛涛来说，倒是符合诗人生前志趣的雅事。因为薛涛《洪度集》的第一篇《酬人雨后玩竹》诗，写的便是竹：“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这首诗可以看成是薛涛对自己的写照，以竹比喻和象征自己崇高的品格。后人以竹代桃花绕其坟，是有道理的。

附近有坟，坟侧有竹，对构成现今望江楼公园的特色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恐怕要算“薛涛井”。

原来“薛涛井”这地方，据《四川通志》载，旧名为“玉女津”。左面是水码头，右面是清水池塘，地下水脉与锦江相连。因其塘底是由层沙构成，故塘水清冽，澄澈照人。明代蜀藩因而指定每年三月三日在此取水，仿效当年薛涛在浣花溪制造浣花笺的办法，制作 24 幅贡纸，以 16 幅贡纳朝廷（见《益都谈资》《南中纪闻》《蜀故》）。时移世易，月久年深，锦江有时水涨水消，殃及池塘及附近农田，故又在塘前建回澜塔，塘后建雷神庙，以镇水怪。明代末叶，朝政日非，贡纸事务早已作罢，池塘亦因历年变迁，逐渐缩小成为井状，只供当地人士取水使用。一般人士因称呼方便，约定俗成，遂呼此井为薛涛井。井侧江水泱泱，树影婆娑，田畴纵横，云雾缭绕。明末以来，就已成为名胜，供人游览（见曹学铨《蜀中名胜记》），但尚无薛涛在此浣笺之说。直至清代康熙六年丁未（公元 1667 年），成都知府龚应熊手书“薛涛井”三字并刻立石碑，作为正式地名标识，这就引起词人墨客对薛涛的幽思怀想。又过了百余年，至乾隆六十年乙卯（公元 1795 年），清朝的翰林院编修，由侍御署成都学使周厚辕来到



成都，于杜甫草堂、武侯祠题写之后，又至薛涛井旁，雅兴盎然，浮想联翩。他推断薛涛井水既可汲来制笺，那么薛涛似应居住此地，就手书唐代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巷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他又自己另外写了《薛涛井诗》（现剥蚀难认），将此两诗刻石附立薛涛井两旁，修建成牌坊形式。这就是现存可见的"薛涛井牌坊"了。

有了薛涛墓、井，固可引人入胜，但尚不能令人流连忘返。到清嘉庆十九年甲戌（公元1814年），四川布政使方积、成都知府李尧栋，于培修薛涛井外，在井碑对面，又建吟诗楼、浣笺亭。吟诗楼和浣笺亭是薛涛生前兴建在碧鸡坊和浣花溪的，在这里修建楼、亭，并用古时名字，俨然薛涛确曾在此汲水浣笺、吟诗咏怀了；又因都在濯锦江边，再建一座濯锦楼以作陪衬，兼作官民游宴之所。到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时任成都学使的何绍基与蜀中名士张怀溥、张怀泗弟兄，大发思古之幽情，为其撰写诗联题咏，悬挂楼亭各处。特别是何绍基用鸡毫书题吟诗楼的"花笺茗鳜香千栽；云影波光活一楼"的名联，字简词新，意味深长，一时争相传诵，这就更增游人过客对薛涛怀念的雅兴了。经过咸丰、同治以后，这些建筑渐次朽圮。直到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1886年），四川总督刘秉章约集蜀中士绅伍肇龄、罗应旒、马长卿等，以原修之问澜塔毁坏，创议并募款于井旁建造崇丽阁，取晋左思《蜀都赋》中"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之意，以壮观瞻。这次工程，规模既大，募款又多，雕梁画栋，飞檐重阁，建筑宏伟，设计精奇，既可望江睹景，又可登楼抒怀，故俗称为"望江楼"。阁成，又重新培修濯锦楼，并由名流雅士撰写诗联，刻悬诸处，以襄盛举。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公元1898年），又再次募款重新培修吟诗楼、浣笺亭，新建五云仙馆、泉香榭、流杯池，以增景色。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1903年），更特修清穆室（穆，音渊、同婉），并请江右冯协中画薛涛像，由华阳罗湘刻石竖于清穆室中；另又于室前建小牌坊，上题"枇杷门巷"，即把薛涛在万里桥边的住处名字搬来，配上"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的联文，仿佛薛涛不仅在此住过，而且诗书制笺的一生主要活动都在这里了。这样一来，望江楼公园以薛涛为中心的建筑规模算是大体就绪了。

自崇丽阁建成后，茶社饭庄兴旺发达，往来行人路客，城内各色人等，喜于此间郊游宴会，常作踏春赏青之行。在光绪年间，题吟之风极为盛行，如江津钟云舫、剑州李榕、华阳洪锡爵、长州顾复初等为崇丽阁及各处楼台亭榭撰写的长文名联，均在此前后刊刻悬挂。更兼此地原为东下的水码头，接风饯别，游览江楼，倍添情怀，因而日趋繁华，游人络绎不绝。每年端午，濯锦江上龙舟竞发，岸上观者如云，楼前万众欢腾，邻近州县亦来赴会，甚为壮观。一般人因崇丽阁、吟诗楼、濯锦楼均可登临望江，约定俗成，将此地区总呼为“望江楼”，亦有简呼为“江楼”者。

历代各阶层人民如此怀念薛涛，不是没有原因的。唐代女诗人薛涛，出身贫寒，才华出众，在成都度过了她的一生，和当时有名诗人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等，竞相唱和，写了大量诗篇，其中有不少歌颂祖国美好山河、关切劳动人民疾苦的佳作，对中唐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洪度集》以及创制的“浣花笺”（即薛涛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她在万里桥边、浣花溪畔、碧鸡坊舍等旧址遗踪早已杳不可寻。因此，为纪念诗人，由坟及井，建造有关诗人的楼台香榭，将望江楼臆定为其故居，开辟成劳动人民休息娱乐的场所和旅游胜地。诗人泉下有知，亦当含笑赞赏不已！





卓文君在哪里卖酒

◎ 黄书冠

“隔帘魂断凤求凰，风流辞章万口唱。”司马相如（公元前179 公元前118）和卓文君摒弃封建世俗观念，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千百年来，曾引来多少文人墨客的锦绣诗篇和戏剧作品，让多少憧憬幸福生活的男女青年为之着迷。现代人谈起两千多年前成都老乡司马相如，都记得他是汉代辞赋奠基人、著名文学家，开发由蜀人云贵的西南大道的先驱，会津津有味地谈论成都驷马桥、琴台等和司马相如有关的地名。当然，摆谈得眉飞色舞的自然是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被父亲所不容，不得不在临邛（邛崃）当垆[①]卖酒的故事。这段史实，在《史记》、《汉书》、《辞源》、《辞海》里都能查到。在邛崃，至今还有郭沫若题词“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的文君井古迹，汲取文君井水酿造的文君酒早已被评为四川名酒。不过，卓文君真的是在邛崃当垆卖酒吗？认真阅读史料，却觉得经不住推敲。

《史记》、《汉书》上说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后，“相如与驶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以生。何至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乃庸保作，涤器市中。”

这段话，为千百年来卓文君在邛崃卖酒提供了书面依据。

可是，这段话里破绽不少。

第一，成都人司马相如到长安去谋官，潦倒数年回来，应邛崃县令、旧时朋友王吉之请到邛崃作客，仅有写过《子虚赋》的名气，没有大的政治靠山。到卓王孙家赴宴，鼓琴《凤求凰》，使新寡的卓文君心动，夤夜投奔。从连夜逃回成都的事实来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追求婚姻自由、自

① 垆：古庐，酒店里放酒瓮的土墩了，借指酒店。

由结合，在封建社会舆论上是容纳不下的。他在邛崃又无私宅大院，不能把一个大活人隐藏下来，只有一走了之。因此，事过之后，他有可能再回临邛居住、开设酒店吗？

第二，卓王孙是邛崃的大盐铁商，家僮宾客号称八百人之多。他经常出入官场，王吉也常到他家喝酒，可见他经济殷富，势力不弱。他的女儿被人拐走，他岂肯善罢甘休？没料老账未算，司马相如居然敢在眼皮底下开了酒店，让卓王孙女儿当垆卖酒，当了活招牌，肇皮肇到脸上，而司马相如一非大官，二无权势，他竟不闻不问？即使他不出面，他的家僮难道不为主子帮忙，把司马相如随便两下就收拾了嘛。

第三，有人会说，司马相如敢回邛崃开店，是有一县之长王吉当后台，所以卓王孙不敢把他怎样。不，王吉的势力并不大。“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是当时当官的信条。王吉出于给朋友捧场（也为了抬高自己），请司马相如同到卓王孙家赴宴，也巴不得司马相如能高攀上卓王孙，不料穷朋友的婚姻自由来得太快，实出他的意料，弄得自己有失“官箴”，差点下不了台。因此，只要卓王孙不发雷霆，追究拐走女儿之事，他又何苦再找虱咬，让司马相如夫妇回邛崃开店当垆呢？前引史料也没有说司马相如再度到邛崃，又受到王吉的招待，就证明王吉在开店这件事上再也没有插手了。可见他不是后台。

第四，卓文君见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立”，穷得叮当响，才出主意回邛崃找有钱的弟兄借贷。到后来借到没有，史料未说。看来一文未借，才在邛崃卖了车马，买了酒舍，自己司馔，让丈夫当了服务员。这段话不是很费解吗？既然很穷，怎么还有车马可卖？要卖车马，成都大地方价格俏，何必跑一百多里到乡村小县去卖呢？有车有马的生活在汉初不能不算奢侈。在此之前的战国，孟尝君养士三千人，出入有车马可坐的，是最尊贵的士人。司马相如有车有马，怎么会没钱开座小酒店呢？卓文君是个有见识有决断的妇女，如果在兄弟处借不到钱，她是不会轻易叫丈夫与自己一同回邛崃去的。

所以，《史记》、《汉书》这一段话，矛盾不少。

如果在前面所引的话“相如与俱之临邛”之后加一个“返”字，则问题就得到合理的解释，上下文也读得通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卓文君见司马相如家太穷，便告诉丈夫，回邛崃找有钱的弟兄借点钱维持生活。司



马相如见自主婚姻风头已过，便与妻子同到邛崃，卓文君的弟兄赠送了车马。他们又回到成都，卖了车马，买下酒店，做起生意来了。

说卓文君在成都当垆卖酒，有何证据？唐朝诗人李商隐（813年—858年）在剑南东川节度使幕下当判官时，为审理案件到成都出差，上街喝酒，见到当垆的多为女流。他曾写诗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唐距汉代不算太远，成都也未经大的战乱，风俗习惯不会改变太大。诗中未用"应"字，而用"仍"字，说明仍保留汉代文君当垆遗风，女老板坐店堂。由此也可看出唐代人眼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开设酒铺的地点是在成都，而不在邛崃。至于在成都何处开店当垆，因时过境迁，时光烟云，就难以考证了。



蜀州和陆游

◎ 桑宽荣

陆游（公元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20岁就定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他30岁参加礼部考试，名列第一，因“喜论恢复”而遭投降派秦桧打击，被除掉了名字。但他毫不消沉，回乡后仍攻读兵书，刻苦习武，准备抗金卫国。

1162年，宋孝宗赵慎起用主战派张浚，准备北伐。孝宗召见了陆游。陆游趁此良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主张，并给予赵慎以有力支持。但是北伐失利，宋再度向金求和。孝宗意志动摇，朝中主和派重新抬头，张浚被罢官，陆游也被削职还乡。

1170年，陆游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任通判。他后来又到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中办理军务，积极向王炎提出恢复中原的作战策略。但是，由于朝中投降派的阻挠破坏，王炎被召回朝廷，幕府也被撤消。陆游的作战主张不仅得不到实现，自己也被调到成都府安抚司任参议官。

1173年夏，他被任命为蜀州（四川崇庆）通判（副州官）。不久，又被调到嘉州（四川乐山），年底才又回到蜀州。

陆游住在蜀州罨画池。50岁的陆游忧国忧民，报国无门，满怀郁愤，写下数十首感人肺腑的诗词。他在《初至蜀州寄成都诸友》诗中写道：“流落天涯鬓欲丝，年来用短始能奇。无才藉作长闲地，有凭留作剧饮资。万里不通亲洛林，一春最负牡丹时。犍笺报与诸公道，罨画池边第一诗。”

然而，生活毕竟不是一潭死水，美丽的蜀州给诗人弹起了动听的琴声。蜀州，唐朝时就因唐安公主封于此而取名唐安郡！宋时，仁宗的二女和徽宗的荣淑、帝姬女儿均封为崇庆公主。蜀州物阜粮丰，街道整齐。州衙旁的东阁红梅，飞红点点，幽香扑鼻；苑内三千官柳绽吐新枝，婀娜妩





媚；罨画池边百花争妍，蜂舞蝶喧；城东百亩东湖，烟波浩渺，鱼鸟相戏。陆游携着女儿，在东湖放怀亨“凭栏投饭看鱼队，挟弹惊鸦护雀雏。俗态似看花烂漫，病身能斗竹清癯”（《暮春》）。父女们闲时在罨花池边捉蝶，饮酒赋诗，排遣胸中烦闷。

陆游在蜀州时，还遍游了名山胜景。出西北门，他游了翠园寺、化成院、白塔山。其中，尤以在化成院独慰其心。化成院在怀远镇附近的大明寺里。这里，青山环抱，古柏森森，真是“绿坡忽入谷，惋蜒苍龙蟠”（《化成院》）。庙里的古塔、双楠凌空笔立，庙后的山峦起伏叠嶂。陆游朝庙时，与和尚同坐蒲团，亲切交谈，朝听钟鼓、暮闻磬鱼的生活，唤起陆游无限感慨，使他更加痛恨官场的倾轧、污浊。陆游在蜀州还多次登青城山，作了二十多首赞美的诗词，但壮志未酬的无限惆怅仍流露在字里行间。

由于南宋统治者腐朽，人民不仅备受异族欺凌之侮，还遭到贪官污吏、水旱灾害之苦。这年七月，蜀州久雨，三伏不热，岷江洪水暴涨，西门外的西河泛滥，冲毁房舍、田园。望着漂浮着房料、牲畜和禾苗的河水，陆游九转回肠，回想当年为民请命，建议朝廷关心黎民疾苦、惩办贪官污吏而遭冷遇，如今，官卑职小，又怎能解人民于倒悬！一杯苦酒下肚，他挥笔疾书，写下《古意》诗一首：

绁足饲饥鹰，鹰饱急未平。
伏枥岂不安，志骥终悲鸣。
士生固欲达，又惧徒富贵。
素愿有未伸，五鼎淡无味。
茅屋秋雨漏，福陂春水涂。
长歌倾浊酒，举世不知心。

这年八月廿七日，陆游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阅兵。当陆游穿上戎装，在镜前看到自己峨冠博带的样子时，两年前的戎马生活，仿佛又展现在他眼前：

南郑前线，他纵马系缰，往来倥偬；

仙人关前，他身裹铁衣，挺枪伫立，警惕着敌人侵袭；

渭水平原，雪夜茫茫，他脚迹匆匆，赤心切切；

大散关下，飞霜掠面，寒风刺骨，他三天未吃熟食，飞马追击敌人；

在北山，他也曾只身斗猛虎，刺虎喉于坡前……

然而，“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刘琨晚抱闻鸡恨，安得

英雄共着鞭！”（《蜀州大阅》）晚上，他阅兵回来，望着墙上张贴的已被金人占领的长安城地图，想到被金人蹂躏的三秦父老，义愤填膺，奋笔写下《观长安城图》诗：

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
横戈战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
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人间。
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

报国无门，爱民无力，终于在1174年十月，陆游又被调到荣州（四川荣县）去摄理州事。陆游在蜀州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对蜀州感情十分深厚。即使晚年回到浙江山阴老家，他也还写了许多记念蜀州的诗篇。蜀州人民怀念放翁诗人，诗人长溘之后，人们在罨画池旁为他和赵忭（宋代一御史，曾作蜀州官）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现在，“二贤祠”已改建为“陆游纪念馆”。

八百多年来，蜀州人民怀念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扶老携幼，不远千百里前来瞻仰、凭吊陆游。罨画池是陆游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的水榭楼台、林木花草，都镌刻下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诗篇。

（本文曾参考傅德岷同志提供的素材）



文殊院轶事

◎ 谢荣才

清道光年间的一天。

一位身材魁伟，戎装披挂的人，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在众多卫士的簇拥下，直朝成都北较场而去。

这人名叫罗斯举，祖籍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少时为绿林之豪，后被官府追捕，逃亡投入行伍。因作战英勇，屡建军功，官至四川提督，加太子少保，准专折奏事。

他到北较场时，场里已站满了清兵，他们正等待着接受检阅。

罗斯举登上检阅台，高高地坐在他的宝座上。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只见台侧，号旗一举，火铳三放，号炮响过，演练立刻开始了。

一队队上兵列队从检阅台下走过，个个向他行注目礼，他也高高举手向士兵致意。接着，士兵们演练了队形、刀箭。他对士兵们的演练是满意的，真有些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了。

快到中午时分，检阅事毕。他退下了宝座，始终不离他左右的侍卫们又簇拥他走出较场。突然，雷声响起，大雨如注。

“爵帅，到慈悲庵躲躲雨吧。”一侍卫对罗斯举道。

此时，大雨已将他的帅袍打湿，他马上点头哼了一声，示意带路，那侍卫飞身而去。

慈悲庵离较场不及里许，是一个只有十多个僧人的小庙。方丈听说爵帅要来躲雨，真有些受宠若惊之感，立即带着庵中大小僧人往门口迎接。

罗斯举见和尚们恭敬，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下马后面带笑容步入庵中。

待他坐定后，一和尚手端茶盘，给罗斯举送来一碗香茶，并道：“爵帅，请用茶。”

好熟悉的声音！

罗斯举禁不住抬头望去，只见这和尚身长六尺，宽额大脸，浓眉微竖，两只眼眸黑黑有光，高鼻梁下紧靠右嘴唇的地方有一颗豆大的黑痣。“莫非是他?”罗斯举心中一惊，又是一震，正要发问，这和尚已转身而去。他只好端起茶碗，轻轻呷了一口香茶，随口向方丈问了一些关于庵里的情况，然后起身道：

“多谢方丈厚待，罗某告辞了。”

方丈听此，连声道：“提督言此，折杀老衲了!”

罗斯举转身出了庵门，又对方丈说：“这里清净可喜，我得暇再来进香祈祥。”

“欢迎，欢迎，爵帅如此赏光，真乃佛门之幸呀!”说后，又双手合十，不断念着“阿弥陀佛”，送罗斯举而去。

过了几天，罗斯举果真又去了慈悲庵。

他对方丈说：“长老，我想和那位给我送茶的和尚谈谈，你看行吗?”

方丈心想：“爵帅怎么对他感兴趣，莫非他要打听庵里的什么事？不过，这小庙和我都无隐私，岂可示怯而拒绝。”于是，他对罗斯举道：“爵帅，我那徒弟名唤智圆，脾气有些粗莽，说话不知高低，还望爵帅宽宏大量一些。”说后，把手一指，“请!”把他引进了内室，又把那个送茶的和尚叫到他跟前，这才退了出去，找了个不打眼的地方躲了起来。

“敢问师傅祖籍何方？为何到此当了和尚?”等老方丈去后，罗斯举问。

和尚不知爵帅为何要问他身世，正在吃惊之际，忽听罗斯举说了一句当年他在绿林中的隐语，和尚听后睁大了眼睛，足足看了他半个时辰，这才叫了一声：“兄弟，原来是你!”扑上去，抱住罗斯举，放声恸哭。良久，两人渐渐平静下来。罗斯举道：“兄长，别后十余年，想不到你在此作了和尚!”

听了这话，和尚不免有些悲伤，说：“想当年，你我兄弟在绿林时，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好不威风。自那年被官兵追散后，你我兄弟再未见面，你发富了，长变了，加上你新改了名字，所以我真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兄弟，你可好呀?”

“好，好，”罗斯举连连点头。

故人相见，过去的往事很自然地又浮现在他们眼前……

那是罗斯举被追捕的日子。他和拜把兄弟逃到陕南，寄宿在山中一孤老妇人家里。一日，他去赌场闲耍，见赌手痒，便向老妇人借钱一百作赌





注，大胜而归。老妇人道："你赢的是什么人的钱？"罗斯举说："不识其人，只见他秃顶。"老妇人听后大惊，道："还不快走，你祸到临头了。"罗斯举不解，老妇人这才进一步道："此人姓胡，人称胡老虎，是一方之霸，在街上开了个赌场，谁要是连赢他两局，他非暗暗害你不可，被他弄得断臂少腿的不少哩！"

罗斯举听后眉毛一皱，计上心头，同拜把兄商量后，也不回老妇人的话，各自回房睡去了。

第二天，他找了一口沙锅，煮了一锅稀饭，趁滚烫时用绳拴锅提在手中，疾走到场上，见秃头正高高坐在赌座上大声武气地吆五喝六叫赌。把兄走过去假装要赌钱，罗斯举从秃头身后一个箭步冲过来，将沙锅猛地朝他头上一扣，秃头大叫一声，胸前又挨把兄一拳，立刻死去。待众人回过神来，罗斯举和这位拜把兄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有一次，罗斯举在川东任总兵时，往拜巴县县令，县令出衙相迎。待到公堂时，罗斯举问县令："你这大堂全用砖石铺成，你可知铺了多少行？每行多少匹？共有多少砖？"县令愕然，道："下官实未留心。"罗斯举听后道："我却晓得。"随即说出多少行，每行多少匹，共有多少砖。然后请人验数，其数不多也不少。县令赞道："总兵果然眼力过人。"罗斯举听后大笑道："我哪有什么眼力呀，只是当年我在这里跪过大堂，县令要我招供，我不招，动刑拷打我也不语。他等得不耐烦便进了书房歇气，役卒也各自星散，我跪铁链无事，这才数砖块消遣，至今犹记在心……"其实，罗斯举当时已经受刑晕厥了，这数砖之事，也是他拜把兄长告诉他的。

和尚也讲了他许多和罗斯举分手后的逸闻，两人讲得好笑时放声大笑，说得悲哀时又潸然泪下。

所有这些，被躲在身后的老方丈听得一清二楚。他从中已经知道他这徒弟与罗斯举关系并非一般，若要寺庙发达只有仰仗爵帅了。于是，他在罗斯举离去的第二天，便把寺内所有和尚召集起来，问道："汝等愿不愿此庙兴旺？"众答："焉有不愿之理！"老方丈点点头，说："为帅年事已高，无力主持禅房，这新的主持只有智圆了。我今把衣钵交付给他，你们可要好好听他管教呀！"说后把衣钵交给智圆，智圆也不推辞，只跪下道："师傅在上，徒弟一定听从师训，兴旺寺庙，普降吉祥。"

老方丈让院一事，罗斯举很快得到禀报，他大喜道："老方丈果然善解人意，我一定要助兄长一臂之力。"他马上召见文武官员，说要弘扬佛

法，重塑寺庙，让大家捐款；又写出布告，化缘募款。他自己首先捐银一万两。其他人等，见爵帅带头，也跟着凑热闹来，你出一千，他捐一万，不到月余，就集资数十万。没有钱的穷百姓，听说要兴修寺庙，凭着对佛的信仰，也要来捐工干活。一时间，工地上人来人往，挖土的挖土，抬料的抬料，好一幅热气腾腾的景象。

罗斯举更是一心挂念着工程的进展。他时时前来观看，有时还亲自干上一两个时辰。为难事只要向他禀报，他没有不尽心尽力的。院中大雄宝殿，需石柱48根，每根长过二丈，大皆两人合围。这么大的东西费了很大力气也运不进城，急得智圆不得不去找罗斯举。

“兄弟，你可想个法子呀？”智圆见左右无人时，悄悄求罗斯举。

罗斯举听了详情后说：“这有什么难的，把城墙拆掉不就运进来了！”

智圆听后惊得张大了嘴巴：“拆城毁墙，可是犯禁的大祸，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罗斯举却很认真：“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

智圆道：“拆城墙是要奏请皇上恩准的呀，你能办到吗？”

罗斯举笑道：“这不难，皇上给了我专奏权。”

智圆大喜，连声道：“这就好，这就好。”

罗斯举写了奏折，上报朝廷。清廷吸取扬州屠城教训，大修寺庙提倡宗教，所以得到报告便立即回复：准奏拆墙。

为修寺庙而拆城墙，这在当时真是件破天荒的大事。罗斯举亲到现场指挥，并负担了拆修城墙的全部费用。至今，文殊院内的大石柱上仍有“罗斯举捐助”字样。他为了传示后人，还专在庙里修了祖堂，供奉智圆遗像，名曰开山祖师。

寺庙终于竣工，费资数十万两白银。罗斯举亲自为寺庙取名文殊院，还将余资置肥田数百余亩，以供寺庙日久享用。

智圆有了文殊院，有了终身落脚的地方，他也是一个强人，精通文墨，善医理，且能苦心经营。所以，文殊院一直蒸蒸日上，香火极其旺盛，僧众曾达两千，成了成都四大丛林之一。



能海法师和近慈寺

◎ 徐伯荣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隋唐以来，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四大古刹，名震遐迩，海内扬名。然而，在成都南郊，还有一座雄伟宝刹，曾一度声威显赫，香火大旺，冠于上述四寺之首。它便是上世纪30年代末崛起的、由藏王敕封的黄教庙宇——近慈寺。

近慈寺位于成都南郊石羊场附近。寺外，阡陌纵横、流水淙淙；寺内，松柏参天，幽深静寂。仿西藏喇嘛寺特色建筑的藏经楼，巍然挺立，金碧辉煌。汉藏人民的友谊结晶——译经院，宽敞典雅，闹静古朴，异花名卉，应时而放。在这窗明几净的庭院，曾有许多青年人将藏文佛经译成汉字，培育了大批通晓藏语的人才啊。

上世纪40年代的近慈寺，挂斋入寺的僧人有八百多人，常年香烟缭绕，法号不绝。暮鼓晨钟，木鱼声高，吸引成千上万善男信女。每逢农历正月初八会供日，从成都出南门，便可见朝佛上寺的人们，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近慈寺声威远扬，成为佛教圣地。

近慈寺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立竿而起，是与寺庙创始人、奠基者能海法师的精心哺育分不开的。

能海法师是位半路出家的和尚，俗姓龚，名学光，字绥熙，四川绵竹人。他早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等同学。后在川军任职团长。之后，他辞职削发为僧，皈依三宝。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资助下，他带领能言善写的高僧十余人，仿效唐僧西天取经，从成都出发，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藏拉萨，皈依康萨仁波卿为徒。在西藏时期，他悉心学习藏语，钻研黄教佛经，历时三载，以后带着大量藏传佛教典籍回到成都。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在刘文辉的支持和鼓动下，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从浆洗街至石羊场，数万佛教徒和善男信女，燃灯捧香，

献花供果，手捧哈达，顶礼膜拜，欢迎能海和随带的圣经。这一盛会，使近慈寺和能海法师顿时名噪蓉城。

能海法师治庙颇有法度。八百僧众除管理庙务的僧人各司其职外，一半以上的僧众，专门研习佛经和藏文，并由达赖派出的活佛传经讲学。许多僧人从学文化入门，最后达到熟谙藏文藏经。诵经习文之余，所有僧众都要参加寺庙五十亩自耕田地的劳作，荷锄扶犁，日出而作。

能海法师治庙法规森严，午后申时（六点）关闭庙门。一日干稀两餐，苦渡时日。凌晨二时，僧人闻钟鼓而起，身披袈裟，在能海的带领下，上殿诵经，直至天明，从不懈怠，外来挂单僧人也不例外。如峨眉山的万年寺普超法师、成都爱道堂的隆莲法师，入寺进修，均依旧例，起早晚睡，参禅悟性，研究佛学。

为使佛法宏大，能海召集能工巧匠，绘制各种佛像两百余尊。藏经楼上宗喀巴大师像，堪称艺术珍品。仿制雕塑的全身黄教大威德，由西藏活佛亲手塑成，面善心慈，栩栩如生。

1949 年秋，四川解放前夕，遁迹空门的能海法师再度过问世事，亲往邓锡侯处劝说弃暗投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亦有能海法师一番苦心。成都解放后，能海又劝说熟悉藏语的僧人还俗，送他们随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入藏，充任翻译。他又委托隆果法师和哈桑上书达赖，晓以大义，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相应的努力。

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能海被选为副会长，后又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近慈寺规模现今依稀可辨，并由政府明令保护。



诸葛亮在成都的府第

◎ 陶元甘

诸葛亮在蜀14年，文治武功业绩显赫，至今仍为后人景慕推崇。不少人总爱打听，诸葛亮在成都住在哪里，在哪里办公，现在还有他的遗迹吗？

诸葛亮在成都处理公务的地点，先后有“左将军府”、“丞相府”两处。具体方位，史籍上没有记载，但可依据史料线索及成都城的位置大体确定。

刘备入川前，领左将军衔，后任荆州牧；夺取西川后，兼领益州牧。他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四川省科技馆位置），未建造新衙门，就在牧署处理军机大事。由于左将军头衔比州牧高，所以州牧署改称左将军府。公元214年，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即处理刘备的日常事务。

刘备于公元221年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刘备采纳诸葛亮意见，未修王宫，就以左将军府为皇城和王宫。“尚书”是皇帝的最高机要秘书，必然在宫内办公，所以诸葛亮担任丞相，但并未修建府第。

《蜀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封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侯是爵位，不是官名，“治事”只能用丞相名义发号施令。从这则史料可见，诸葛亮入蜀整整10年才“开府”，即有了自己的丞相府。这时，尚书令先是刘备临终时任命的李严（未在成都）；刘禅继位后，诸葛亮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之事，所以诸葛亮才未在宫内办公而“开府治事”了。那么，丞相府在哪里呢？史料虽未指明具体位置，根据封建礼制，相府应距皇宫不远，并在皇宫之南，所以大致可推定在御河外面不远处，即今人民东、西路或东、西御街处。诸葛亮本人崇尚俭约，丞相府修得不大，故他北伐曹魏时，“留府长史（相当秘书长）”只有蒋琬一人。由于北伐事务繁忙，诸葛亮很少住在

成都，故可能也未新修益州牧署。

诸葛亮在蜀共14年，前十年住在皇宫办公，后四年领兵北伐，回朝议事办公住丞相府。但他在蜀期间，戎马倥偬，大部分时间是“貔貅刁斗阵前过，虎帐中军练夜营”，在军营度过的。

让我们再探讨一下诸葛亮的住所。历代稗官野史、游记散文都记载成都有诸葛亮宅，有鼻有眼地载明地点有好几处。其实，“宅”是后人加的名称。两汉三国时，大官的住处叫“第”，侯爵的住处叫“家”，无官无爵者的住处才叫“宅”。诸葛亮入川后已担任了刘备的军师，领将军衔，他的住处应该叫“军师将军第”；后任丞相，住处应叫“丞相第”；封武乡侯后，应叫“武乡侯家”。这些住处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有人说在武侯祠东边。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指出，“亮居城南田畴”。“城南”可解释为城内之南，也可说是城外之南，但既有田畴，不会是城内，只能是城外。三国时出成都南门是锦江，锦江到武侯祠一带是锦官城，其西是车管城。这些地方织锦造车，是工业区，不宜居住。过了武侯祠倒是一望无际的田畴，但距城又太远。因此，前人推断诸葛亮的住处，可能在武侯祠以东，即过南门大桥直走，不远是田野。由此到广都县（现双流）一带，尽是茂林修竹的田园风光，这里建屋符合诸葛亮躬耕的志向。因此，诸葛亮建屋，很可能在这一带（即现浆洗街附近）。

又据宋人记载，诸葛亮在住处修了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1]。到唐代武宗时，崇奉道教，竟传说孔明女儿在读书台“白日飞升”。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西川节度使姓章仇名兼琼的人在读书台故址修了个道教寺庙——乘烟观。宋代对乘烟观几经培修，又修了“葛女庙”。明末，观、庙尽毁于战火，但从明、清时的诗句中，也可推断出位置大致在下南门大桥往前不远处。

有人说在双流县。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广都县（现双流）南一十九里有武侯宅”。确切地点已不可考，也许是座别墅。

又有人说在北较场。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宋成都府衙（在今正府街）西北二里有诸葛亮故宅”，并说诸葛亮的读书台和唐时修的乘烟观都在故宅附近。清代人附和这个说法，并明确指出故宅就在城西北

---

[1] 见《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



角的北较场。这个说法根据不足：第一，诸葛亮不可能违反礼制，在皇城北面建住处；第二，从古蜀到唐朝，北较场一带是墓葬区（唐僖宗时高骈扩大城区，北较场才划进城内变成街道），诸葛亮怎么在墓葬区居住呢？

还有人说在正府街。清代一直流传的说法是，刘备、诸葛亮在成都的办公地点在现正府街的成都府衙（辛亥革命后已拆除，衙址辟为人民中路），其住宅也在其内，分别筑有观星台以观天象。清代一些怀古诗词，也大写特写正府街的观星台。其实这完全是附会。因古蜀、两汉、三国、晋、唐、五代时的帝王宫殿和驻蜀最高长官官衙均在皇城（现四川省科技馆一带）。唐末宋初，皇城被焚，宋代的成都府衙才在现正府街修建，明、清两朝府衙也设在这里，于是就被后人误认。

考证史料时，除了剔除封建迷信、荒诞无稽的传说外，还要注意分辨历史真伪，避免以讹传讹。



诸葛亮和武侯祠

◎ 李金彝

诸葛亮（公元181年—234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是他在《出师表》中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一直到现在都还起着激励人们的作用。所以我们只要一提到他，便会联想到“诸葛大名垂宇宙”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等杜诗的名句，也会很自然地联系到锦官城外的丞相祠堂。可是当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却是大门上边的一块金字大匾，写着四个大字：“汉昭烈庙”；武侯祠三个字，却在进门左边的墙壁上嵌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成都的武侯祠曾经发生过多少次的变化。最初的武侯祠，并不在今天这个地方。

最初的武侯祠在成都少城里面，是西晋李雄创大成国（公元302年—307年）时所建。这座祠，在桓温灭蜀的时候，都没有被毁，《方舆胜览》说：“桓温灭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这“独存”两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不是出于对诸葛亮的特别崇敬，怎么可能做到“独存”呢？可惜这个孔明庙，后来也因年久失修，没有保存下来；但自此以后，成都地区却先后在成都西北古乘烟观偏西的地方、草堂左侧、城东江南馆街诸葛井附近、城北簸箕中街，以及郊区九里堤等地，都修建过武侯祠、武侯庙、诸葛庙或者叫丞相祠，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在惠陵（刘备的坟）南边的武侯祠保存得比较完好。这座武侯祠，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被封为蜀王，来到成都以后，才把武侯祠和昭烈庙合并在一起，并把诸葛亮的塑像也搬到昭烈庙来，放在旁边，用以体现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就是人们之所以常常把昭烈庙叫为武侯祠的原因。那么，惠陵南边的这个武侯祠又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这就很难查考





了。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汉昭烈庙是南齐（公元 479 年--502 年）时候修建的。并说“其南原古武侯祠”，可见武侯祠比昭烈庙的建筑年代还要早一点。它们距离虽近，但并不在一处。杜甫当年说的“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但这座庙宇到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毁了，今天的昭烈庙、武侯祠（包括最后一座诸葛亮殿），都是清代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建的。这次修建，除了把诸葛亮的塑像迁到后殿之外，还加了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的塑像。这一次的像塑得比较多，北地王刘谌（刘备的孙子）和两廊的文臣武将像，都是在这个时候塑的。但这些塑像过了百多年以后，又有些损坏了，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重新修复过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最后一次培修，是公元 1921 年，隔现在也整整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多次培修，才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并由国务院于 1961 年 3 月 4 日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这里的一切，都焕然一新。几座大型的石碑都保护得特别好。碑文的记述，也很有价值。特别是那块唐碑，对诸葛亮的文治武功，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诸葛亮是一个事君很忠诚，又有开国的才能和远见，个人品德也很好，并且善于用人的人物。称赞他的政绩，是“刑政达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对他“结吴抗魏”的军事策略以及“出斜谷、据武功”的具体措施，都表现了作者由衷的敬佩的感情。明碑的时代虽然要近一点，但它对武侯祠的沿革，也给我们作了些有价值的介绍。人们常常爱问：怎么这里没有阿斗太子（刘禅）的像？明碑上的文字，是提到这一点的。说原来有他的像，宋真宗的时候，四川的地方官将堂，认为他是蜀汉政权的败家人物，所以就把他取掉了！

掩映在这些石碑之间是一些苍翠的古柏，它们虽然不是杜甫诗中的原物，但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却很有作用，能够给人一种“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感觉。武侯祠到处种柏，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穿过这里，便是这条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刘备殿。这里殿宇高朗，气象开阔。刘备的塑像，高达 3 米，显得特别突出。左右关、张，两廊文武官员，也显得很有气派。清代的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完颜崇实，

在大殿上刻了一副极尽推崇之能事的对联：

使君本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锺楼桑车盖；

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

“王气锺楼桑车盖”，那是胡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不会相信；但“巴蜀系汉朝终始”却是事实。因为西汉的创立，依靠了这个地方；蜀汉的灭亡，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化用明代诗人陈恭尹“诸葛威灵成八阵，汉朝终始在三巴”的诗句。殿角的刘备孙子北地王刘谌的塑像，群众对他以身殉国、宁死不降的精神倒是有好感的。北门的娘娘庙街，还供有北地王妃的塑像，这就是群众对他们崇敬的表示。

刘备殿后、诸葛亮殿前，有一个相当宽大的过厅。这里对联很多，董必武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的对联和郭沫若的“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的对联，都挂在这里。

走近诸葛亮殿，殿门挂满了匾联。这些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评赞诸葛亮的词语，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重要业绩。

有总结他在军事、政治方面经验的，如清人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也有历数他的重要功业、表现缅怀前贤情意的，如那副篆书的长联：

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驰，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存两表；

世有陈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安危天下系，先生以往，缅怀风义拂残碑。

这副对联，叙述了诸葛亮的一生。上联谈他早期隐居隆中，是一个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了答谢刘备对他的特殊知遇之恩，他才愿效驱驰。以三分始，指隆中决策的预见；以六出终，指六出祁山伐魏的事情。效死不渝，是效忠蜀汉政权，至死不变的意思。两表，指前、后出师表。所谓遗恨，是指没有完成他理想中的统一中国的事业。

下联说，世上有像陈强、古冶子这样同生死的人，就应当讥笑那些本是同根、而又相煎太急的丑角。当时的情况又正是如此。谁能够像诸葛亮那样，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因此他认为诸葛亮是一身系天下安危的人，



如今人死了，如果要凭吊忠烈，只好“缅怀风义拂残碑”了！

也有从影响来谈的，如已故书法家沈尹默写的“诸葛大名垂宇宙”那副对联；还有从群众敬仰的角度来谈的，如“千秋同祀武乡侯”那副对联，等等。提到诸葛亮祖孙三代的，有刘咸荣撰书的那一联：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三世忠贞”，他们确是当之无愧。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是在保卫蜀汉政权的战争中牺牲的，诸葛亮本人也是病故在北伐前线。尽管陈寿写《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但他对诸葛亮的一生，还是作了高度的赞扬。陈庶子就是陈寿，因为他担任过太子中庶子的职务，所以称他为陈庶子。“墨痕同溅岳将军”，是说岳飞在南阳诸葛庐草写《出师表》的时候，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看了这副对联，再走到殿里去瞻仰他们祖孙三人的塑像，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像诸葛亮这样一个可以左右当时政权的人物，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争权的念头，总是那样勤勤恳恳地辅助刘禅；尽管他作了丞相，却从来不置私产，连刘禅的赏赐，他都上表辞谢。难道像这样不争权、不争钱，而以毕生精力勤于王事，来实践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的人物，不值得我们崇敬么？

从诸葛亮殿出来，向右一转，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水榭船舫，相映成趣，几株老桂掩映在一池清水之间。你若坐在池旁，看看墙上的“有关诸葛亮的纪念祠宇和部份遗迹、文物图片”，也会使你得到一些启发。

这里的图片，有赤壁的“拜风台”。拜风，是《三国演义》的虚构之笔，拜风台就更是无中生有了。但大家对这个建筑一直保护得很好，就说明人们对诸葛亮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假东西，但作者却在那上面倾注了诚挚的感情，这里琴亭上面的石琴便是如此。诸葛亮会不会弹琴是另一问题，即使会弹琴，也不会去弹石琴，这本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但清代嘉庆年间武侯祠的道士黄合初，却在石琴上边刻了一段衷心仰慕的赞语：

坚贞其质，雅正其音。宁静者学，淡泊者心。宗臣已往，遗像长钦。惠陵之侧，锦水之浔。祠堂肃肃，柏树森森。良工仿制，古调堪寻。草庐抱负，梁父胸襟。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短短几句，充分体现了他对诸葛亮的向往之忱，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武侯祠的道士。所以，当国际友人来到这里，听了介绍以后，也要站在琴亭下边，凭吊这位卓越的历史人物。



成都的诸葛亮祠庙

◎ 陶元甘

三国之后，由于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敬，不少地方都建有诸葛亮祠庙，如南阳诸葛庐、荆州诸葛坛、赤壁借风台等。而成都的诸葛亮祠庙，先后共建有8所之多。在叙述成都诸葛亮庙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全国最早建立的沔县定军山下的诸葛庙。

定军山，在汉中西北九十里沔县城南。当年，曹操打败汉中王张鲁，派大将夏侯渊驻守定军山。刘备听取诸葛亮的策划，趁曹军立足未稳，率诸将进兵汉中。黄忠夺取定军山，斩夏侯渊于马下。从此，诸葛亮就在这一带苦心经营，把它作为六出祁山的大本营。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兵伐魏，在五丈原与司马懿隔渭水对峙，病死军中。对于自己的后事，诸葛亮明确讲过："葬汉中定军山，因山而坟，坟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他为什么要把遗体葬在定军山呢？历史记载说是为了激励将士，继承遗志、完成统一大业。因诸葛亮不是帝、王，限于封建礼制，不立祠建庙，而蜀中百姓都在郊野设祭，以寄哀思。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后主刘禅采纳步兵校尉习隆等人建议，在诸葛亮的墓地沔县定军山立庙。前面是殿，后面是墓。同年秋，钟会带兵南下攻打蜀汉，经过沔县，还亲自到庙前设祭，下令保护墓庙。历代对这座庙都予以培修，至今仍在原址。

成都的第一座诸葛亮庙，是在诸葛亮去世将近一百年成汉时建立的。西晋末年，陕西氐族人李特、李雄兄弟率军攻入成都，占据全川。李特死后，李雄于公元306年至333年，先称成都王，后称帝，国号叫"成"。为了团结巴蜀人民，李雄后来将国号改为"汉"，史称"成汉"，表示继承汉室之意。早在入城时，李雄就下令在少城建诸葛庙。这是成都正式为诸葛亮修建的第一个庙宇。具体位置可以判定在少城北部，因南部是商业区，

不便立庙。按照当时少城方位，其北部应在现长发街以南，将军衙门、金河街以北一带。

公元346年，东晋大将军桓温灭成汉，拆毁少城，唯独留下诸葛亮庙，以资纪念武侯。

这座庙于何时消亡或迁移，已无史可考。但很可能是隋代（公元581年—618年）迁移的。隋文帝杨坚封儿子杨秀为蜀王。杨秀好大喜功，在成都大兴土木，在大城之西扩建城垣，称为子城，实比拆掉的少城还大。唐杜甫诗句“东望少城花满烟”，可证明子城的广阔繁华景象。扩建城池时，很可能拆掉了孔明庙，而迁到了郊外的锦水之南，即刘备陵墓和先主庙附近。新建的诸葛亮庙，定然宽屋大宇，祠庙森严，并广种了翠柏。因此，到公元760年杜甫见到的诸葛祠堂已是“柏森森”了。而柏树能长到参天抱围，非有上百年不可，所以杜甫见到的丞相祠堂，极可能是隋代所建。杨秀建子城，既要拆庙，是决不敢冒蜀境人民之不韪而不另建新庙的。

杜甫诗《古柏行》所咏的丞相祠堂在什么地方呢？

杜甫从公元759年到768年在四川住了10年之久，在成都曾游览过成都南郊的丞相祠堂。766年在夔州（现奉节）写了《古柏行》，借咏武侯祠古柏而兴怀才不遇之悲，是有名的古诗。诗中说：“孔明庙前有古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忆昨路绕锦城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诗中记叙的先主庙，是刘禅修建的，以后蜀汉虽亡，庙陵仍存。南朝萧齐国皇帝萧道成培修后，隋代将诸葛亮庙迁来合成一处，就有了“先主武侯同閟宫”在一个庙的情景了。

明世宗时，为尊崇诸葛亮，在现草堂寺东侧另建武侯祠。这座庙的规模、范围，因明亡被焚而不可考了，南郊昭烈庙也于此时焚毁。至此，成都一座诸葛亮庙都没有了。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川总督蔡毓荣在唐、宋昭烈庙旧址复建了昭烈庙，道光时由刘沅培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武侯祠。

以上诸葛亮庙，均由官府出资兴建。但在成都，由民众集资筹备修建的诸葛亮祠庙还有几处。

锦江街口有口古井，井口小，井底大，形制神奇，井水清澈。虽逢旱年，井水不枯。宋朝著述中已提到此井为诸葛亮所凿。明神宗时，乡人协



力在井旁建了诸葛祠，四时八节祭奠。现在庙废井存，这条街叫诸葛井街。

成都外北簸箕街西侧有古金绳寺，其北有丞相祠。《成都县志》记为汉末所建，清朝历有培修。“汉末”建祠是传说，但明末以前已有此祠了。到清代中叶，祠的香火甚旺，近代衰落。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郊外，唐名糜枣堰。战国末年，李冰凿成都城外两江，一条现名锦江（南门大河），一条名郫江。郫江经糜枣堰向南流经通惠门、同仁路、南较场、西胜街、文庙西街，向东流经上池街、纯化街、中莲池、下莲池，到安顺桥合江亭注入南河（锦江），流经半个成都，为城内提供水流和交通。唐末高骈扩大城垣，筑糜枣堰，截断郫江，使上游水改道流入新开的北门大河。因北郊地势低凹，在新开河道南岸筑起九里长堤。从此，郫江不再入城。北宋初年，九里堤决口，江水涌入郫江故道，城内金河水涨，民困其苦。赵匡胤派刘熙古修复堤堰。蜀人为纪念此事，在堤岸修了刘公祠堂。南宋范成大培修过刘公庙。中经元朝攻陷成都，历经战乱，到明朝时，竟无人知晓九里堤的来历，误为九里堤系诸葛亮为保护成都人民而筑。因此，堤上刘公庙也就变成诸葛庙而受到香火供祀了。

清代一些文人学士，认定北较场一带是诸葛亮住处，于是集资修建了诸葛祠、乘烟观、观星台。但以后经过考证，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在北较场定居，因此，祠、观、台都随岁月流逝而湮没了。

丞相祠堂话古柏

◎ 吴天畏

成都武侯祠的古柏，唐时已远近闻名。一千多年来，诗人咏赞，史籍记事，流传广远。而今提到武侯祠，便令人想起那高枝千岁、老态生辉的森森古柏。广大中外旅游者不远千万里，慕名而来，寻踪访迹，摄影留念，以此为一大事。丞相祠堂的古柏因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据说，成都武侯祠有两棵古柏是诸葛亮当时亲手所植，这也许是游人如织的一个原因吧。那么，这种传说是否当真呢？除此之外，是否还真有其他原因呢？要弄清这两个问题，最好是从古代诗歌谈起。

武侯祠古柏在古诗中出现，始见于大诗人杜甫的《蜀相》诗。其时诗人寓居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曾多次拜谒贤相祠堂。诗人用“锦官城外柏森森”，“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来形容丞相祠堂，并非艺术夸张，而是在写实。这可以从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武侯祠古柏》诗得到印证。杜甫死后约八十年，李商隐到武侯祠游览，对苍劲挺拔、千姿百态的古柏也赞叹不已，因而唱出了“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荫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的千古绝句。与李商隐同时的成都诗人雍陶，也专就武侯祠古柏作诗咏赞：“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自杜甫、李商隐、雍陶之后，咏古柏的诗虽然越来越多，但大都没有超出杜、李、雍诗中的意境。近见柯如青铜，盘根如石，似龙腾蛇绕；远眺古柏森森，黛色参天，疑为精灵所在。真是好一派引人入胜的古柏景色！难怪唐穆宗的宰相段文昌，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游览武侯祠时，激动得不能自已，叹为观止，乘兴撰书《古柏铭》一篇，刻石立碑，以示纪念。《古柏铭》文辞华丽，感情真挚，既富于气魄而又写实入微，是继杜甫之后，咏赞古柏的又一佳作。今碑虽不存，文字尚在，铭曰：



是草木有异，於[1]草木则灵，武侯祠前，柏寿千龄，盘根拥门，势如龙形。含碧太空，漫雾虚庭。合抱在於，旁枝骈荫，叶之青青；百寻及於，半身蓄气，雷之冥冥。攒柯垂阴，分翠间明。忽如虬螭，向空争行。上承翔云，孤鸾时鸣。下荫芳台，凡草万生。古绝天气，苍苍冷冷。曾到灵山[2]，老柏纵横，亦有大者，莫之与京[3]。於维武侯，佐汉有程，神其不昏，表此为桢[4]。斯庙斯柏，实播芳馨。

三百多年后，南宋大诗人陆游家中，还珍藏着一幅唐代的古柏图，陆游爱之如宝，在画上欣然题有如下跋语："此图古家旧藏。予居成都七年，屡至汉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庙中，忠武侯室南。所谓先主武侯同閟宫者，与此略无小异，则画工亦当时名手也。"落款是"淳熙六年，龙集己亥，六月一日，陆某识"。根据陆游的鉴定和推测，跋语认为有两点可以基本肯定：一、古柏图系出自当时有名的画工之手，而且画中古柏确有所本，也就是说，在忠武侯室之南，确有一至二棵根深叶茂、长得特别出奇的古柏；二、古柏图中祠堂、庙宇的布局与杜甫《古柏行》诗中"先主武侯同閟宫"的描述吻合，也基本上是准确的。

在诗人的作品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古柏，是不是诸葛亮手植的呢？再来翻阅史籍，看能否得到证实。据《本草》载："益州诸葛亮庙中大柏，相传是蜀相所植，故人多采其叶以作药，味甚甘香，异常柏也。"《成都古今记》载："先主庙西院即武侯祠，前有双文柏，古蟠可爱。"前者肯定诸葛庙中有大柏，只是对蜀南所植表示怀疑，加上"相传"二字，是客观的。后者肯定地说武侯祠在先主庙西侧，与其他史籍记载相同，是可信的。至于古蟠可爱的双文柏，是否为武侯所植？根据《三国志》记载，作一番考查，会看到诸葛亮戎马一生，志在统一。刘备病死后，他于建兴元年（223年）开府治事，时年刘禅17岁，不胜国事，国家大小事务均取决于诸葛亮。随后，他亲自率兵南征北伐，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中，6次同魏作战，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前线五丈原。临终遗命葬在定军山下。直到29年后（景耀六年），刘禅才准于在其墓旁为他立庙。生前他并未在成

---

① 於：语助词，无义。

② 灵山：在北京市郊，西山的主峰，历时古柏苍郁。

③ 京：大。指无有能够与之相比较的大树。

④ 桢：原指筑墙所用之木杆，引申为支柱、根基、骨干。

都选下墓地，也不可能生前就在成都为自己立庙；他毕生公忠体国，死而后已，也无自己亲手植柏的闲情逸致。成都为他立庙，是在西晋时期，李雄在成都称王，“始为庙于少城”（见《方舆胜览》），那是诸葛亮死后70年的事情了。位于南郊的武侯祠，兴建则更晚，那庙旁的柏树，当在建庙后栽种，较为可信。如果说诸葛亮果真栽植了两棵柏树，但不是在武侯祠，而是在昭烈庙；不是为自己，而只是纪念刘备。我们姑且不去考证古人是否有为死者植树纪念的习俗，就情理上讲，倒也还通得过的，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至唐代，古柏已森然成林，颇为壮观，出现在诗人笔下，记载于史籍之中，都是极其自然的事。当然，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夸张，史籍记载中虚实并存，都是难免的。从《儒林公议》的一段记载可见这种情况：“成都先主庙侧有武侯祠，前有柏树，乔柯巨围，蟠固陵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铭、勒石。唐末渐枯瘁，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丛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之。至皇祐初，千二百余年也，新枝耸云，枯干并存，夭矫若蚪龙之形。”这段记载，虽然真真假假，真假却不难辨别。前边关于武侯祠所在方位、以及对祠前古柏的描述，和杜甫有诗歌咏、段文昌立石刻铭均属实。唐末战乱不息，古柏因天灾人祸而渐至干枯，或者被盗伐而毁也有可能，引咎于王建、孟知祥伪国所至，是把植物人格化了，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政治见解。到宋乾德五年（967年），如果从天复七年（907年）王建称帝算起，历时60年，居然枯柯再生，茁壮成长，真可谓天下奇观了。如果枯瘁后的古柏果能复生，三百多年后，也就是到皇祐初年，它已枝繁叶茂，高耸入云，仰望莫及，这自然是毫不夸张的。至于枯干并存，屈曲而富于气势，犹如传说中的蚪龙之形，很明显，这是在替宋仁宗赵祯歌功颂德了。

但是，这类历史记载，于褒贬之中，隐喻着民心民意，象征着一种精神，寓意极其深刻，读了发人深省，不能视作一般的神话故事。

再试举一例，《游梁杂钞》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嘉靖中，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於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朱书第一号字。俄聚千百人砍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朱书，深入肤理，字画灿然。”这段故事，看起来也十分离奇，细品读，字里行间，却使人看到



了民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明代封建统治者，为自己修宫殿、造陵园，劳役繁重，政苛民怨，尤其是骄奢淫逸的世宗朱厚熜，为兴建豪华的乾清宫，竟然派官员到成都选伐大树，而且不惜毁掉闻名遐迩的武侯祠古柏，难怪天怒人怨，群鸦不容，用尖利的嘴巴惩罚盗伐者了。蜀中地方官员为怕激起民变，不得不尽力劝阻，冯清也慑于民心不可违，一场浩劫方才罢止。然而，朱书第一号字样却深入肤理，字画灿然，成为邪恶必败、民不可侮的历史标志。这种惊人的想像力，绝不是要神化诸葛亮。古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把杰出的政治家爱国爱民的形象融为一体，正是民族之魂的升华。千百年来，历代爱国诗人咏柏抒怀，唱赞不绝；中外游人为赏柏而来，络绎不绝，不足情在必然、理在其中吗！

明末，武侯祠毁于兵火，古柏大都枯死。清康熙十一年重建武侯祠，主持人四川臬使宋可发，在诸葛亮殿前补植了一批柏树。之后，主持道人徐本衷、张清夜、张合桂等又先后多次补植柏树，补植地点、棵数均作了详细的记载。由于管理精细，大多数先后成材，蔚然成林，丞相祠堂又绿荫如盖，令人神往。近年来，武侯祠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较重，古柏的生长受到影响。为保持古柏的正常生态，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统一规划。现在，唐、宋诗人笔下的古柏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的古柏也只有可数的几棵了。

诸葛亮植柏自然是没有的，但那美好的传说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广大游人乘兴而来，尚可见到“古柏森森，遗庙沉沉……”（唐碑），“昭烈庙西偏稍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老柏参天，气像甚古，诗人常赋之……”（明碑）等有关古柏的记载，以及清人周厚辕、龙岩所书的“蜀相”、“古柏行”等咏柏的碑碣。逐一吟读，也能尽兴而归，不虚此行。

武侯祠后殿的铜鼓

◎汪　潜

走进翠柏森森、浓荫蔽日的成都南郊武侯祠后殿，在贴金彩塑的诸葛亮像前，陈列着大小3面形制古朴的铜鼓。大的一面高40厘米，面径60厘米，形圆束腰，鼓面、晕圈和腹部均有精致的图案花纹，鼓面四周铸有蹲蛙6头。不少文章介绍是唐代以前的文物，有的说铸造于5世纪。最近一篇文章更指出它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的，白天用以煮饭，晚上用以报警，故又称诸葛鼓”（见1981年1期《旅游》杂志）。

诸葛鼓的名称，至今在西南边陲兄弟民族中仍在沿用；四川西昌、越秀地区城郊举行集会，也有敲击铜鼓的习俗。因之，上述传说仿佛具有不可辩驳的可靠性。那么，这三面铜鼓是不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制作的，是不是当年的军中之物？

首先，应肯定的是，创制铜鼓的发明者，并非是生活于2世纪的诸葛亮。铜的发明和铸造器物的历史比铁器为早，公元前17世纪，中原地区的夏商奴隶社会就有大型铜器铸件出现。南部地区经济发展虽比中原地区缓慢，但在公元前3世纪，秦灭西蜀之前，青铜制品在巴蜀就极为流行。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后，铜铁冶炼在西蜀已有很高水平，“蜀刀”曾远销缅甸、印度。据史书记载，早于诸葛亮的东汉名将马援南征，于交趾（现越南）得到骆越铜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四川南部均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铜鼓，足可证明铜鼓不是诸葛亮创制的，是后人为了怀念诸葛亮而为之定名的。

其次，诸葛亮南征时是否制作铜鼓，《三国志·蜀志》上并无记载，汉以后较长时期正史上也无可考。杜甫、苏轼留下好多篇武侯祠诗，也未提到诸葛亮制作铜鼓。直到14世纪明代何宇度写的《益部谈资》上，才首次提到成都武侯祠陈列有3面铜鼓。书中写明这三面铜鼓形圆色绿，上宽





中束、下则敞口，像倒扣的斗。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鼓面有四头水兽及帆船等花纹。旁有四耳，重仅二十余斤，敲击时有鼓声，放在水面敲打，声更洪亮。传为南征孟获时所制，故名诸葛鼓。何宇度记载的三面铜鼓同现在陈列的三面铜鼓显然不同。尽管形状有点相似，但高矮大小不一，花纹饰物更不相同。既然唐宋时期武侯祠没有铜鼓记载，那么，何宇度所见的铜鼓，很可能是明代移进庙内的。

据史料记载，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讨伐“都掌”少数民族，曾获得过铜鼓。“都掌”部落居住在叙州戎县（即现在宜宾地区的高县、珙县、筠连、长宁、江安、纳溪等县）。曾省吾讨伐时克寨六十余座，得诸葛鼓93面，选了声音洪亮的60面进贡京师，其余的留在成都库中。由于缴获时的名称叫诸葛鼓，很可能就选了3面放进了武侯祠，作为配祀。不过，到明末战乱，武侯祠成为废墟，殿上三面铜鼓也不知去向。

现在人们看到的三面铜鼓，是清代咸丰年间成都人张瑞龄父子所献。安放铜鼓的木架上刻有文字：“咸丰辛酉年清和月中浣吉日，蓉城弟子张瑞龄率子应星置。”正由于比何宇度晚二百多年才陈列的，原物又找不到，因此现在的铜鼓在形制、重量、图案上都与之前的铜鼓不相同了。

西南地区兄弟民族铸铜鼓是干什么用的？古时征战讲究兵贵神速，西南多山，进退是以牛角号音、皮鼓击动声为号，不可能把笨重的铜鼓搬到战场上使用。据《后汉书》《桂海虞衡志》《赤雅》等书记载，都说西南各省兄弟民族习俗铸铜为鼓，愈大愈贵重，是权力的象征。正如汉族地区奴隶社会夏、商、周都铸铜鼎以为国运权力所在一样，“都掌”部落以铜鼓为宝器，鼓有剥蚀、有声响者为上上鼓，值牛千头，有上鼓二三面即可雄视一方称王。

每有事，则击鼓高山，集合远近寨子土兵，杀牛饱餐以后，出发征战；战斗取得胜利，愈以为铜鼓显灵。正因为“都掌”部落以铜鼓为权力标志，所以曾省吾讨伐时，也把缴获铜鼓多少作为胜利的标志；进贡京师和带回省城，则含有不再给“都掌”以造反机会的用意。

“都掌”部落是几经迁徙，才在宜宾地区定居的。其先人所在地区，是诸葛亮南征渡泸水、平孟获的西昌越西地区。诸葛亮南征，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友好、开发边陲的政策，促进了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些地区的人民长期怀念诸葛亮，住的瓦板房称为诸葛屋，扎白头帕以悼念诸葛亮叫诸葛巾，所以把铜鼓称为诸葛鼓也就不奇怪了。

诸葛亮殿上的3面铜鼓，尽管不是诸葛亮生前之物，现存3面铜鼓也与明代文献记载不同，但是，作为诸葛亮治蜀功绩、民族友好的见证，将其陈列，对今天的观众有教育的现实意义，仍然属于珍贵的历史文物。





漫话八阵图

◎成　观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诗圣杜甫在公元766年，从成都到了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写下这首堪称千古绝唱吟怀诸葛亮的《八阵图》绝句。前两句对仗，赞誉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他创制的八阵图，更是声名远扬，永垂青史。第三句精炼地点明八阵图遗迹富有传奇的特征；末则惋惜刘备不顾大局率兵伐吴，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战略，统一大业无法实现，成为千古遗恨。

杜甫诗中提到的八阵图，又叫水八阵，是与在成都青白江区弥牟镇早八阵相对而言的遗址，位置在奉节西南白帝城（古鱼腹浦，刘备更名永安宫）前平沙上。传说诸葛亮从荆州入蜀时，命士兵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有序，星座棋布，排列成六十四堆，按天、地、雨、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组成，供军事操练和作战使用。长江水流汹涌，八阵图在夏天即使被淹没，而到冬天水落石露，两岸万物失态，唯独八阵图岿然如故，岿然不动，“江流石不转”。所以刘备兵败白帝城，东吴大将陆逊追到八阵图，被变幻莫测、隐有千军万马的石头阵吓退。

其实，八阵图不是诸葛亮率军操练、作战的阵势，奉节八阵图也不是诸葛亮派士兵堆砌的。历史学家、军事史家已早有定论。[①] 但人民群众太尊崇热爱诸葛亮，所以把这本不属于诸葛亮的遗迹归之于他，并且加以神化。如说八阵图石堆被人搬动散乱后，水涨石聚，水退阵现，是仙人搬动复原；又说当强敌入侵，八阵图显灵能呼风唤雨，招云布雾，鬼神出动可变千军万马，等等。这些传说放在恰当的历史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也表

① 考古证明，奉节江心石堆，是古代盐工熬盐堆砌而成。

明对诸葛亮的怀念。

其实，八阵图这种阵势产生的年代很早。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有名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中就有专门谈论阵势的篇章。当时诸侯国之间杀伐征战，无不讲究兵法阵势。1990 年新华社公布了我国考古在军事史上的重大发现：在河南密县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风后八阵兵法图》。此图发现于密县刘寨云岩宫（即轩辕黄帝宫）。据历史记载，轩辕黄帝与蚩尤作战，九战皆败，退守到河南密县，修建宫寨，操练士卒。黄帝同大将风后演练创制了八阵兵法，运用于实战的河北涿鹿决战，杀了蚩尤，统一了华夏。出土的八阵兵法图，共 9 幅，1 幅为八阵正图，其余 8 幅，每幅是一个阵势，分为天复阵、地载阵、风扬阵、天垂阵、龙蟠阵、虎踞阵、鸟翔阵、兽行阵。这一考古重大发现，把八阵图兵法的历史从公元 2 世纪诸葛亮时代，往前推了两千五百多年。从密县八阵图兵法名称可以判断，其阵势仍指部队作战布置的局势。后代军事家依据作战地形、敌我态势、气候等条件，创造的一字长蛇阵、三才阵、五行阵、八卦阵、七星阵等，都是指部队部署位置以及在作战时的相应变化。诸葛亮一生作战频繁，善于用兵，鞠躬尽瘁，力挽狂澜，人们追念他的功绩，把八阵图创造权归之于他，亦无可厚非①。

三国以后，因为诸葛亮造八阵图的传说，以及他当年确曾两度在夔州习兵，留有演兵台、“八阵图铭”石刻等遗址，后世为他建有祠庙，文人学士多在凭吊感怀之余，留下不少名篇佳作。文献典籍上也把水八阵图建造者的桂冠戴在诸葛亮头上。我国地理经典之一的《水经》，在叙述长江到奉节时就说，“江水又东经诸葛亮图垒南”，并加注说：“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复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一些古文记载上，还对立于不败之地的八阵图有更玄的说法。甚至有的臆想连后人也见之摇头，这里就不列举了。倒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诗写得好：“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绝。纵横满江上，岁岁沙水啮。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已心悟，后世徒妄说。”苏东坡评价诸葛亮的态度是正确的。针对历朝历代都有人不远万里来到八阵图旁，昼夜面

---

① 经考证，《风后八阵兵法图》为后人伪作。



对滔滔长江，冥思苦想，企图参悟秘诀玄机，一举得到诸葛亮治世立国惊人的龙韬虎略，好一鸣惊人。苏轼语重心长地指出：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再也不要被妄说迷住了。

旱八阵，在成都北外三十多里的青白江区弥牟镇。《三国志·蜀志》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益州记》说："有武侯八阵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纬略》载明了八阵范围："八阵图在新都者，峙土为魁，植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并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古代计算单位与现在不同，按现行计算，弥牟镇郊旱八阵，占地约1.6万平方米，垒泥土堆64座，还杂以巨石。土堆排列摆放设置，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看，似有不同阵势。每座土堆形状大小也不一致，大的周长20米、高约7米，低下的仅有几米周长。旱八阵逐年湮灭，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曾予以铲平。现在仅剩下五蹬半，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旱八阵原来所处地势平旷，没有土堆、石堆，不失为指挥部队操练的好去处。这里又是由川入陕的咽喉要冲，历史上曾有兵营驻守。所以，说旱八阵是诸葛亮依据古代兵法，加上自身作战经验，为训练部队而修筑，并不是臆测。古代作战，主帅以令旗、金鼓指挥部队，平川地带设立高台，便于指挥。事先以土堆作为进攻出发或防御阵地、炮矢阵地，借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土堆石台也是训练进退的指挥部营地。事实上，三国以后，弥牟镇八阵图，尽管地处荒郊，但一直被部队作为训练士兵、操练战法的营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曾从汉州率部队狩猎到弥牟镇，在八阵图一带操练士卒，并写诗记事："野火炎高冈，江雪暗空戍。角弓寒始劲，霜鹘饥更怒。邂逅成小猎，尺垂聊指呼。北连武侯祠，南并稚子墓。合围蹙穷鹿，设伏截狡兔。壮哉带箭雉，耿介死不顾。"到清代，成都驻扎的旗兵绿营兵，每年都要到八阵图一带巡弋校阅呢。

不过，弥牟镇的旱八阵，真是诸葛亮在公元195年蜀汉政权建立后所筑的吗？考古学家指出，这些土堆、石堆，是古蜀国原始社会大石文化遗迹中的"列石"。大石文化是古蜀氐羌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时代与中原的青铜文化时代相若。当时的蜀人，以大石为崇拜图腾，常在山顶或平川地带堆土供奉大石、石鼓、石笋等，让自己的心愿或祈祷声上达天帝。成都的支矶石、五块石、武担山石镜都是大石文化的遗物。弥牟镇的

土堆、石堆，正是古蜀人的祭祀场所之一。按这种说法，弥牟旱八阵出现的时代又比诸葛亮早一两千年。

考古学家考证是一回事，早八阵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仍然按照人们对诸葛亮的怀念和对八阵图的仰慕而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一个传闻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当从成都撤退时，途经弥牟镇。追兵袭来，一个葛布长臂老者，用扇子指示张献忠撤退的方向。追兵蜂拥而来，只见大雾迷茫，乌云翻卷，进入深山峡谷。追了一夜，人困马乏，天明一看，原来进入早八阵迷了路，转了一晚也未找到出路。这个传闻如果说仅反映人们的愿望，另一个真实故事则反映了在正义战争面前人们的不同心态。1949 年 12 月初，我人民解放军三面合围，夹击困守西南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在成都的残部。从秦岭撤退的蒋家残兵败将，心惊肉跳，顺川陕公路向成都逃窜。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民解放军两条腿会快过他们汽车轮子、更没想到沿路百姓农民，居然敢拿起锄头扁担逼着他们缴枪。一股打散临时凑合超过一连人的散兵，被弥牟农民追得逃进八阵图，依靠地形潜伏下来。白天，远处传来群众迎接解放军的欢呼声，他们不敢出去；晚上想乘夜幕溜走，哪知到处阴风惨惨，伸手不见五指。到田地里想偷点萝卜充饥，谁知走拢山坎，白天好像是萝卜田，夜晚却都变成冬水田。这伙乱兵困在八阵图整整三天，饿得眼睛落了抠，双脚发了软，浑身冒虚汗，不得不向我军某部随营学校文工团交枪。他们心有余悸地说："孔明显灵了。跟着蒋介石打烂仗，让我们钻进八阵图，东撞西碰，就是找不到出路。"

我们无须考究弥牟镇早八阵创筑于何时，也不详查诸葛亮是否在此训练了能与曹魏对抗取胜的军队，早八阵作为历史遗迹，证明巴蜀是文明古国。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镶嵌在巴蜀大地的奉节水八阵和青白江弥牟早八阵，就是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



是陵园又非陵园

漫话惠陵

◎ 吴天畏

无论在梅花怒放的隆冬，还是在桂蕊飘香的金秋，无论春光明媚、百花争艳，还是夏日炎炎、蝉鸣鸟喧，乘兴游览武侯祠的人们，很难立即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以及有趣的历史故事中解脱出来。常常可以看到游人徘徊在惠陵前，触景凝思，猜测问讯：这一千多年前的巍然古冢果真是刘备的墓吗？它被盗过没有？

据《三国志》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为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不顾大局，不听从谏，执意东征伐吴。7月，举倾国之兵沿长江而下，孙权畏惧，派人请和，刘备盛怒不许。第二年夏天，东吴青年将领陆逊用火攻之计，在湖北猇亭一带大败蜀军，刘备退守白帝城，于公元223年四月病死于永安宫。五月，遗体运回成都。八月葬于成都南郊，史称惠陵。甘夫人在刘备称帝第二年，追谥为皇恩夫人，从南郡迁葬成都。她的神柩运抵成都时，刘备已死，棺木正在运回途中，根据诸葛亮的建议，遂合葬于惠陵，并将此事布告天下。刘备入蜀所娶吴夫人，于延熙八年（242年）病故，也合葬惠陵。这座距今1700多年的三人古冢高12米、周长180米，四周古木参天，修竹葱茏，红墙环绕，气象森古。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武侯庙古柏》中“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荫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宋爱国诗人陆游《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中“陵边四五家，苑竹居接栋”，都生动地描绘出惠陵当年古柏苍郁、千竿绕径的景况。

《三国志》作者陈寿，西晋史学家，四川南充人，生于公元233年。他曾任蜀汉散骑黄门侍郎，在刘禅身边做侍从，传达诏命。而他的父亲，原为马谡的参军，因失守街亭，马谡问斩，他的父亲也受“髡刑”（古代一种剃头发的刑罚）处理。公元280年，晋灭吴后，他著成《三国志》，因此，书中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其他史书记载也大体相同。《华阳国志》载："章武三年五月，梓棺（皇帝棺材）至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太平寰宇记》载："惠陵即先主刘备陵也"，"先主祠在成都府八里，惠陵东七十步"。《四川通志》载："汉昭烈帝惠陵，在华阳县南八里，旁即汉庙"。惠陵不但是刘备真墓，而且是二人合葬墓，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认为惠陵是埋藏刘备弓剑的地方，刘备和甘夫人的真墓在白帝城。到武侯祠游览，在二门前碑林中，可以看到一通明碑，碑文一开始就说："成都府城南三里许，邱阜巍然，是曰惠陵，昭烈弓剑实藏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碑名《新修诸葛忠武侯祠堂碑记》，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四川巡抚张时彻撰文，成都府同知高登立石。此碑所出，完全依据宋碑。宋碑名《重修先主庙记》，立于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任渊撰文，今不存。张时彻的那段文字，只是照录任渊碑文，而任渊撰文，乃受命于王公（十朋）。王十朋官中书舍人，宋高宗钦命以龙图阁待制置四川使，出镇成都。他游览惠陵时对"祠畔荒陵"的衰败景象十分感慨，下令对惠陵和祠庙进行了一次维修，并筑围墙保护。碑文接着说，王十朋"命渊记之，渊惧陋不克称，固辞，公不许，乃冒昧书其事"。至于弓剑墓之说根据什么，任渊没有讲。除此两通碑外，就再无其他依据了。

此说最初来源于宋代官方，至明代又为官方再入碑记以广流播。究其真实原因，大抵不过为了防止盗墓而已。历代封建帝王最怕死后陵墓被人盗掘，因此建陵既极秘密，陵成还要杀人灭口。也有的设置假象，故弄玄虚，以乱视听。相传曹操在漳河边上、铜雀台旁，就设七十二座疑冢。惠陵为刘备真墓，史书多有记载。星移斗换，沧桑易变，战乱不息，国家分裂的南宋已非蜀汉诸葛丞相平民之治可比，难免为非作歹之徒图谋盗掘。刘备、诸葛亮被视作统治阶级明君贤臣的典范，历代帝王推崇备至，护墓自然是共同愿望。驻兵守护远不及以假乱真的谬说流传高超、持久，加上帝王有衣冠墓、弓剑墓本在此埋之中，而刘备死在白帝城，古代交通不便，难以运回成都等等之说，也貌似雄辩有理，惠陵乃弓剑墓就不胫而走、流传迄今。

人民对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最公允的，历代人民为保护这一古迹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迄今尚可看到许多神话故事记载，对保护陵庙比



封建统治阶级欺世骗人之说高明多了。譬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一伙歹徒妄想盗墓发财，不惜起早贪黑，熬更守夜，用尽心血，耗尽气力，好不容易挖成一条地道直达墓内。当他们蜂拥而入，向金碧辉煌处跑去，企图争夺财宝时，猛然间许多高大健壮的卫士，手执刀枪，不知从何而出，四面林立。正中一桌，刘备与诸葛亮对坐下棋饮酒，关羽、张飞侍立左右。歹徒们吓昏了头，忙跪下求饶。刘备问他们会不会喝酒，命侍者各赐酒一杯，又各赠玉带一条，然后放他们出去。这伙人刚出地道，道口就消失了，因为每个人喝酒一杯，所以都变为哑巴，腰间的玉带也都变为巨蛇。故事最后说，从此再无人敢盗墓了。参观游览的中外游客，听完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乐得捧腹大笑不已，一致称赞古墓保护得好。

昔日“凄凉汉陵庙，裹草卧翁仲”，而今“又是一重天”。然而意犹未尽的游人，回想起刘备东征伐吴兵败之死引起的争论，回想起诸葛亮“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进，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的叹息等等，多少是非曲直、功过奸贤，有待研究评述。武侯祠是个多么理想的寓教育于知识、哲理、趣味之中的游览胜地啊！借用吴玉章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游武侯祠的浪淘沙一首作为结束语：

丝竹绿如烟，兰桂檐前，
古碑三绝柏参天，
昭烈墓荒春又过，
记取遗联。

又是一重天，金碧频妍，
是陵园又非陵园，
应把事迹昭示出，
以申奸贤。

成都的黄忠墓

◎郑光福　治　平

成都西郊营门口的“鸡矢树”，在二十来年前，有一座青幽幽、黑苍苍的大坟包。坟前有座宽檐大柱的祠庙，从老远望去，鹊绕松柏，殿映朝阳，庄严古朴，典雅异常。走近祠庙大殿，可以见到正楷金字对联。联文是：

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唯公绩最；
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

看了联文一想，谁辅佐汉中王刘备建立蜀汉新“墓”的功绩最大，能够享受与刘备祠堂不分高低坐受香火的礼遇呢？只能是诸葛亮。何况史书又有诸葛亮庙在惠陵之西的记载，那么，这座大庙和陵墓是否与诸葛亮有什么渊源呢？

进庙拾级登阶，一看庙内塑像，怎么羽扇纶巾的黑胡子塑成了黄金铠甲的白胡皓首老汉？再一品评联文，对照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怎么唐代成都城南的诸葛亮庙会搬到城西来了？

好在附近有农家，一问，才知道这是黄忠墓和黄忠祠。

读过《三国志》、《三国演义》的人记得，黄忠字汉升，河南南阳人。先为刘表部将，后归刘备。取益州（四川），屡立战功，封为平虏将军；蜀汉伐曹魏时，取汉中，斩曹操大将夏侯渊于陕西定军山下。刘备在公元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223年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三国志》上并未有过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赞词，怎么联文上会有这么高的评价？他的墓在陕西，怎么祠、陵会在这里？

原来蜀汉以后较长一段时间，成都只有刘备墓和祠，关羽、张飞的衣冠祠和墓，五虎上将中，赵云、马超依葬地而建有墓和祠，唯独没有黄忠的墓和祠。17世纪清初重建诸葛亮庙时，立有黄忠塑像，作为刘备文臣武将附祀。直到18世纪，成都都无黄忠墓和祠。





清道光五年（公元 1825 年），被授为湖北天门县令而未到任的刘源（字止堂），在成都西郊买了许多亩上好田产。佃户在耕地时，耕出一块“黄刚侯讳汉升之墓”的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物。刘源判断，尽管史载黄忠葬在定军山下，但依封建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也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能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现在既有墓碑，理应修复。于是由他出面，发帖子，印化缘薄，请堂会，摆酒宴，并趁拜会府道大员议政之便，找官府乡绅捐银募款。官场上的人知道刘源对建筑一行颇为精通，办的又是崇敬先贤、发扬国故的好事，故乐得捐助并公推刘源和他的儿子刘桂文主持，在鸡矢树修建了黄忠墓和祠。后来，刘桂文撰了联文，刻石为记。

为什么刘桂文要对黄忠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因黄忠投降刘备之后，在取西川的征途中，建有赫赫战功。相较之下，关羽那时镇守荆州，并无取西川寸土之功，故给以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语。反正这类联文褒词多说，不需求实，这也是当时习俗，今天也不需苛求了。

刘源、刘桂文建了黄忠祠和墓，显露了建筑调度才华，以后他又主持培修过城南武侯祠，奠定了今天武侯祠的规模和格局。

黄忠墓、祠建成后，到清同治八年（1869 年），省、县地方官员又筹资购地作为公田，每岁收入作为春秋祭奠用费。

十年浩劫中，黄忠墓被当作四旧毁掉了，祠已改作公房，所在地命名为黄忠大队。从名存物亡来看，人们还是记得这位人老不服老、仍然跃马挥刀，驰骋疆场，定国安邦的老将的。

春流绕锦城

◎ 熊达成

成都，西南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公元前6世纪蜀国开明五世迁都治城以来，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十代帝王和农民起义领袖在此定都。尽管曾受到兵火战乱，城毁人散，但长期以来，它始终保持经济繁荣、物阜民殷的局面。究其原因，除政治因素、地理位置、气候物产等因素外，成都水利事业的发达也是重要的原因。古来诗词吟咏成都，多涉及成都的水利，如："芳树笼栈桥，春流绕锦城"（李白）；"清流一曲包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画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柳梢头。"（高骈）在诗人词客笔下，江水不光为锦城增添胜景，也是成都繁荣昌盛的重要纽带。

城市水利，包括除水害和兴水利两方面的内容。除水害指防洪、排涝、防止水质污染；兴水利指引水灌溉、行舟、漂木、水力利用及城市供水等。现在，让我们沿着历史足迹，顺江而下或溯江而上，看看成都先民是如何在城市水利工程中，描绘战天斗地的动人画卷吧。

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禹贡》上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意思是把岷江洪水分引到沱江去，以便削减成都地区的洪灾。《尚书》记载的是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即殷商至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远古社会的经典史籍。这段记载说明，很早以前，川西坝子的人就懂得利用岷山地势，引渠导江，使低洼的川西坝子不受洪水肆虐。到了公元前10世纪的杜宇王朝，杜宇帝娶的妻子梁利，就是傍水而居以渔猎生活为生的人。杜宇教民务农，改渔猎生产为农牧生产，生产方式巨大飞跃，防洪排涝显得更为迫切。杜宇在郫县建都，命丞相开明挖玉垒山（现都江堰市灌口山），"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水经注》）挖山分洪水入沱江，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这项工程比李冰修都江堰要早二四百



年。当时，生产工具极为简陋，杜宇却命开明督引奴隶完成了这巨古奇功。这个分水口，后来因都江堰分水工程完成而废弃了，但导岷入沱的渠道（现柏条河）两千年来一直在为人民送水，灌溉着川中大片地区。公元前7世纪，开明取代杜宇统治蜀地。这个氏族是善于治水才在蜀地安家落户并取得统治权的。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在这之前，“江水初荡（音玉），蜀人几为鱼”（唐·岑参）。经过杜宇、开明两个王朝几百年的治理，成都水灾已大大减轻，方能建都。不过开明氏族统治西蜀还是青铜器时代，铁器并不普及，开山导江也只能拣易去难，小修小补。真正根除成都水患，大概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

为了把成都地区建成秦国统一六国的粮食基地和兵员补充场所，继张仪之后的第二任蜀郡守李冰，动员万千群众，艰苦奋战，建成了天下闻名的都江堰。《史记》上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享其利。”离堆凿通之后，岷江夏季洪水受宝瓶口限制，能进入成都地区的不过1/10左右，对成都地区的防洪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以致唐朝大诗人杜甫在赞叹李冰功绩时吟道：“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李冰从灌县引到成都的二江，即柏条河、走马河，河内行舟，江水灌田，以水稻为主的农业得到极大发展，“天府之国”大粮仓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如今漫步在市郊府河、南河之滨，眺望波光粼粼的江水，怎能不对蜀国先民和李冰满怀感激之情呢！

尽管当时对成都防洪作了巨大努力，但市内却不能高枕无忧。成都洪水来源有三：第一是岷江水，因已分流不易成灾；第二是地震洪水；第三是暴雨积水。这后两种洪水，一旦发生，危害极大。地震，历史上成都五级以上的震中还未有记载。但岷江上游，却是地震频繁地区。远的不说，仅1933年茂汶县叠溪地震，就使岷山山体倒坍，堵塞江水成湖；一个月后，江水冲垮250米高的天然堤坝，直冲都江堰市，绕过宝瓶口，大量进入内江，使都江堰市、郫县、成都沿线百里成海，万余人丧生。凡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00毫米以上的暴雨，成都就会因宣泄不畅而成灾。如1947年和1981年洪灾，就是这一类型的灾害。暴雨洪灾的几率较大，每30～40年就会出现一次。成都洪灾的成因比较复杂。不过，历代劳动人民也积累了一套整治洪水的办法：分洪减灾和淘河泄流。分洪是最古老的治

水方法，相传是夏禹治水总结出来的。成都上游的柏条河，在郫县石堤堰分流去金堂，小部分流到成都改称府河，就温驯得多了。走马河在适当位置分流到江安河，就能削减南河的洪水。这些分流措施，对保证成都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岷江每年向下游输送泥沙 400～600 万立方米，如不及时淘修，则河槽将逐年淤塞削弱泄洪能力。故成都地区各河流历代均实行岁修制度，以增大河道泄水能力，减轻洪灾。成都是冲积平原，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泥沙为堤，极易淤塞。除淘修河槽外，为防决堤，常从远山运来石料砌堤护岸。成都西北角的九里堤，创建于唐代（传说为诸葛亮所建，不确），至今仍在发挥防洪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防洪不限于淘河和筑堤，还可以在岷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以削减下游洪峰；也可以在成都上游分流，将水再分一部分到沱江和外江去。

防洪是手段，充分利用水源，才能保证成都平原农业增产，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都江堰兴建两千年来，成都平原自流灌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 300 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渠首和渠系进行一系列改建工程，都江堰灌区已扩大到 850 万亩。各条河流并多利用落差水动力，安装了水轮泵、深潜泵发电提水，满足农工副业生产的需要。

在元代，马可波罗曾到过成都，见到成都市内河渠纵横，桥栏整洁。他看到的是唐代宣宗时（847 年- 859 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白敏中督众开挖贯通西东的金河和为排泄暴雨积水的条条大沟。成都城内水系的建立，当时对市区有五大效用：一、可通舟楫，运柴米入市中心；二、排泄污水；三、宣泄暴雨积水；四、可供消防用水及菜园灌溉；五、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古金河河面较宽，泄流能力可达 30 秒立米，今已改作人防工程，失去原来功用。

晋代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上有从岷江沿江漂木的记载，说明古代人民很懂得综合利用水力资源。隋朝蜀王杨秀修建蜀王府时，从温江新源水开了运送木材、砖瓦的渠道，直通成都市中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岷江上游每年漂送木材 50 万立方米到成都，供建设之用。

成都的南河、府河，流经成都城下，蜿蜒而下长江，航运极为便利。



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十斗为一斛），浮江伐楚”，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后代政治家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要取天下，必先取西蜀，方有粮食和兵员的补给。

《马可·波罗行记》中也记载过成都水运事业兴旺发达的盛况：“有一大川，经此大城（指成都）。川中多鱼，川流甚深，广半哩（折合八百多米），长延至海洋……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像其盛者。此川之广，不类河流，竟似一海。”在马可波罗笔下，成都俨然是一水乡，难怪西欧不少人都曾把成都比作世界有名的水乡之城意大利的威尼斯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都从南门万里桥（现南门大桥）和九眼桥起航的十吨木船，可直通乐山，上行运食盐、木柴和条石；下行载百货及商旅行人。

解决城市供水，是市政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很长时期，成都人民饮用河水、井水。抗日战争后，青羊宫处建起一座自来水厂，日供水量不足万吨。那时，每天天不见亮，城内各条大街上都有人拉马拖的大车，装载大木桶，奔波于四门的河岸，往城内商贾市民家送水。南门大河，则沿河架起高大的筒车，利用水流冲激旋转带动叶轮，车水上岸，接通木槽，越过城墙，流到市内。那咿呀咿呀的筒车声，曾给成都人民供水带来美好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市水利事业得到巨大发展，先后建成水利工程2万多处。其中，中型水库2座，小型水库201座，提灌站1000多座，小电站四五十处，总装机容量近6000万千瓦。铺设了污水管道一百多公里，极大地改变了旧城市的模样。特别是彻底整治了府河、南河，沿江建成宽敞秀丽的绿化带和新区，使成都成为名副其实的“锦城”。这些巨大变化，足可告慰世世代代战洪水、兴水利的古蜀先民啊！

九眼桥杂谈

◎ 丁晨滨

九眼桥，古名宏济桥，又名锁江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当时布政使余一龙所建。它系石栏杆、石桥面的大拱桥，长40丈，宽4丈，高3丈，下有9洞。在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由总督李世杰补修时，改名为九眼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加以重修。1988年于九眼桥西侧新建交叉钢架水泥预制桥，从桥基点起算，长约120米、宽25米，桥北下端辟有汽车通道横贯东西，形成半立式交叉桥。古九眼桥于1992年冬拆去。

余一龙修建九眼桥时，又于桥南侧原宋代东山白塔寺废墟处兴建回澜塔。张献忠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成都，不久毁了此塔。后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张献忠在皇宫里，一天登高远望，忽然望见了回澜塔和九眼桥，不觉说道："桥似弯弓塔似箭，弯弓直射承天殿！"张献忠认为不祥，遂派人去把塔拆了。拆塔后在塔基上现出了一座碑，上面刻着"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中"20个大字。"吹箫不用竹"，隐注肃亲王的"肃"字，预兆张献忠后来在西充凤凰山被肃亲王豪格所射死。

另一传说是：张献忠退出成都时，将库中的银子铸成银饼，埋于九眼桥下江中。后来在民间遂流传着"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即张献忠埋银的传说。殊不知在两百多年后，抗战时期，1940年至1942年，竟有人组成锦江淘银公司，要在九眼桥下掏起沉银来。第一年毫无所获，隔了一年又干起来，最后果然挖出了1只石牛、1个石鼓，而银子呢？却杳如黄鹤。有人说：银子可能被水冲移到下游去了。是真是假，就作为一个传说去听罢了！

20世纪70年代，在现今武侯区永丰乡的农田中，曾先后发现张献忠



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钱币 50 多公斤，这又是一次巧合吧！

九眼桥下的一段江面上，曾一度成为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竞赛龙舟的地方。端午这天，从新南门到望江楼的江面上忽然热闹起来，平时停泊在九眼桥下码头的筏篷小船，在舱门上挂起彩绸彩球，船舱前后扯起彩旗，舱中摆设用白布罩着的方桌，茶、烟、糖果、糕点、酒菜、粽子、雄黄酒，一应俱全。届时，有闲阶层、有钱阶层或携带家眷或挟妓弹唱，乘坐游江花舫往来于锦江之上，有如织锦穿梭，真是欢笑之声不断，丝竹之声盈耳。

九眼桥江面上有时还由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小型龙舟竞赛。当龙船或花船竞赛结束后，仍余兴未尽，纷纷把已预备好的鸭子放入河中。参加龙舟竞赛者便纷纷跳入水中争捉鸭子，谁捉到鸭子便归谁所有，并以多捉为荣耀。这时河中、岸上鼓乐鞭炮齐鸣，笑语欢声一片。

九眼桥的水码头，设在九眼桥南岸的白塔寺前河边。清朝末年从成都由重庆出巫峡，都在此乘船起程，货运也由此起载。民国时期一般船只驶到乐山后，人们即改乘轮船到重庆，再改乘大轮船出川。

成都市民大都以木柴作烧茶煮饭的燃料。木柴的来源是眉山、新津、邛崃、乐山等地。这些青冈木、松木柴都用木船运来，来船大都停泊在九眼桥码头，然后转运到水井街、水津街、黄伞巷等顺河边的街道等待出售。

九眼桥边以前是东去西来的水陆码头，那进交通不便，一批批搞运输的主力军，就是船夫、轿夫，推车的、抬滑竿的、拉黄包车的乃是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他们都挣的是血汗钱，没有大钱花。所以当时九眼桥边应运而生的是“鸡毛栈”、小酒馆、小茶铺、小鸦片馆，供这些人住宿、生活和消遣。那时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人收入不多，他们出卖的是气力，有些人误认为鸦片烟可以提神长力，故一些人染上鸦片烟瘾。所以，那时如果谈妥一笔生意，雇主就得先付出一定的钱，让他们先去烧饱烟过足瘾，然后取出他们抵押的劳动工具才能上路。这些人等到血汗被榨干之后，就只有沟死沟埋、路死路埋！

锦城风物



湖广填四川后的成都风情

◎一 苇

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
咂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

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
村姬不惜蛮鞋远，凉伞遮人爽道行。

《蜀都碎事·卷三》

这两首竹枝词，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作者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它生动真切地反映了18世纪初期，清王朝实行移民垦荒——俗称“湖广填四川”后成都地区的风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回音，具有形象化的可贵的文献价值。

竹枝词的作者陈祥裔，康熙后期任成都通判。其写作年代，上距明末的战乱约50年，下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之子吴世璠约20年。诗歌以富有情趣的两个生活片断，表明了四川在这不太长的时间内，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复苏了，城乡出现了安居乐业喜气洋洋的新面貌。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频繁的战乱，灾荒连年，瘟疫遍地，以至“城郭鞠（意为极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白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见康熙《成都府志》）随后，吴三桂叛变清廷，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皮穿髓竭”。虎狼野兽趁机行凶，老百姓“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同拦）食者。”（见《明清史料·第六册》）川境甚少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难挣扎。顺治末年，开始从外省向四川移民。康熙四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



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清圣祖实录》）清廷为了奖励移民垦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耕熟，不许原主复问。”并规定垦荒辟田者，放宽“起科”（纳税）的年限（分别规定为5年后、6年后、直至10年后“起科”）。正确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移民垦荒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驱虎豹、斩荆莽、修复水利、新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例如当时成都平原上金马河淤塞，河水为患，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集众导川，荷锸成云，温（江）新（津）上下百里间悉成沃土矣。”（《新津县志》）荒原变成了绿洲，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地方也逐步富裕起来，从而才有财力物力于康熙年间重筑起周长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的成都城。城墙上“芙蓉栽插几千株，锦江不少吴泊船”（李调元诗句），好一片繁荣景象。

前一首竹枝词，写成都郊原嫁女会宴的情景。咂酒，是一种家酿土酒，用玉黍或稻米高粱蒸熟后和以麴蘗贮于坛中酿成。坛口用泥土封固，酒熟饮用时，将细管穿进封口，通至坛底，以席间长幼为序，口含竹管吮吸。承平岁月，家家有余粮，家家酿酒；每逢婚娶喜期，纷纷大办酒筵，邀请左邻右舍来吃喜酒，竞斗奢华。那些赴宴的乡妇村姑，吃得酒醉微醺，于傍晚时节，骑在牛背上，在夕阳残照的余晖下逶迤而行。如果当时农村，没有比较富裕的家庭经济，没有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生活场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后面一首，写农村妇女进城看戏，川主庙（九眼桥附近，今有川主庙街）前戏班的闹台锣鼓，震动还滋生着荒荆野蔓的成都，撩人心扉。许多农家妇女，不顾路途遥远，不惜踏破“蛮鞋”，赶进城来看戏。她们走在宽敞的街道上，张一柄小凉伞，挡住那些轻薄儿郎投来的挑逗眼光。诗中的“蛮鞋”，是古代两湖一带的一种舞鞋。舒元舆《赠李翺》诗有“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句。那一群群远道进城看戏逛街的村姑，岂不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吗？

两首竹枝词前还有作者的一段小引，也颇有情趣：“今蜀中各族妇女出入皆骑马，戴围帽或面纱。乡中妇女，皆骑牛；步行入城者，皆各持伞，如遇人则以伞遮之。”从骑乘的牲畜上，还能区别妇女的身份，是居城或是居乡。骑马的是城中富室名门的大家闺秀，将姿首轻掩在面纱中、

围帽下，不肯露出芳容；骑牛的是乡间的小家水平。农村妇女进城，或骑牛或步行持伞，皆把南国习俗带进蜀中。这两首饶有情趣的竹枝词所绘出的成都风情画，可以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看见三百年前的四川盆地，在移民垦荒，与民休息、薄徭轻税政策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由荒残到复苏时的一片生机，由乱到治的安定康乐的局面。





锦春楼三绝

贾瞎子、周麻子、司胖子

◎ 李思桢　马廷森

1942年秋，一天傍晚，我在老朋友马胡子的陪同下，去锦春茶楼欣赏早已闻名而未曾目睹的“三子三绝”。为了提前到达书场，我们在少城小餐吃了一顿豆花便饭，饭后走出餐馆大门，但见西御街、东城根街、祠堂街一带，叮叮当当的私包车和黄包车如潮水样沸沸扬扬，涌向东城根街口的竹琴书场——锦春茶楼。穿着长袍、短衫、西装革履的军政士绅和文人名士们，纷纷走出车来，步入书场。包着白铜、黄铜车辕，撑着黑白绸子车篷的各种私车摆满街边。这时，马胡子用肩头碰了我一下：“刚下车的那个胖子，是《国民公报》主笔谭剑之，他是夜夜必到书场的忠实听众。”

我问：“听说胡愈之、谢添也来听过竹琴？”

马胡子点着头说：“有那回事。胡愈之来的那个晚上，是巴金陪着来的。”

老朋友的回答使我惊讶不已：贾瞎子的竹琴竟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边说边走向锦春茶楼。一辆黑色小轿车“嘎”的一声停在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身穿蓝布长衫的人，走在前面的是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马胡子偏过头对我咬了个耳朵：“嘿，冯玉祥！他今晚也来了。”

“啊？”这位名扬华夏、威镇西北、蒋介石喊“大哥”的抗战派司令，也来听竹琴？我不知不觉停下步来。直到马胡子拉一把，才回过神来。

进了茶楼，由于初来乍到，免不了四处观看。这是座古色古香的老式楼庭。楼下一排泡桐郁郁葱葱，楼上灯火辉映着玻璃门窗。登上楼口，便见一个进深二十多米、宽十多米的书场。场口左右摆着迎春、兰草和万年青，盆景适中不杂；天井、耳楼与书场首尾衔接，龙爪、帅旗和“碧峦玲珑”、“银河长泻”、“紫龙卧雪”等菊花，散布在庭院角落，将楼庭三个部分联为一体，瑰丽、清新、幽雅，给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进门右侧是柜台，招牌上写着芽茶、雨前、雀舌、龙团、香片、茅尖、龙井、高尖、西

路茅亭、春茶、沱茶、花茶、杭菊十三种名贵茶名，柜上摆着仙鹤闹松朱砂碗、白瓷吊钟碗、喜鹊闹梅碗等十三种精制茶具，真是琳琅满目。场内四周挂着文人名士送的一副副对联、中堂。正中的演唱台上，放着一张茶桌。中等身材的贾瞎子贾树三，戴着一副墨镜默然坐在桌后椅子上，“渔筒”“简板”横列案桌。红缎桌围上绣着四个金字：“竹琴绝技”。台口两侧悬着两副红缎金字对联。一副联文是：

唱罢离合悲欢，回首依然贾瞎子；
拍开风花雪月，伤心谁问李龟年。

另一副联文是：

盛世之元音已杳，今又逢师旷重来，绝技出瞽盲，最好是杨素还妻，李陵饯友，浔阳送客，子胥渡芦，串生旦丑净而各有神情，慷慨激昂惊四座；

历年之国步多艰，只赢得长沙痛哭，幽怀寄弹唱，恍如闻渐离击筑，雍门抚琴，越石吹笳，祢衡挝鼓，从忠孝节义以扶维教化，发扬蹈厉足千秋！

这两副对联，把名优瞽叟、志士绝唱集中一起，以史喻实，引古证今，意味深长。特别是后一联，上阕把贾瞎子的有名唱段串在一块，下阕引用历史典故比喻竹琴演唱的社会效果，令人读后难忘。

台的上方，一副两尺宽、一丈九长、吊着黄穗的红缎横彩，绣着“以厚风俗”四个黄灿灿的金字。整个舞台，庄严大方，朴素雅致。

这时，能容纳三百多人的书场坐得满咚咚的，过道上还加了不少小凳子，而门口还在不断地进人。幸好马胡子是场场必到的听众，堂倌给他留有固定座位。我和马胡子落座后，才发现前排是两张联二桌子。一张桌旁坐的是冯玉祥、肖静轩、陈国林等军政要人，另一张桌旁坐着谭剑之、胡恭先、周建芳、李功甫、贾培芝、李莲生等知音。

一会儿，麻子堂倌右手提着亮晶晶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二十个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宛如盛开的海棠，向台子跟前走来。未拢茶桌，他左手一扬，“哗”的一声，十几个茶船脱手撒出，“咯咯咯……”，几旋几转，一位坐客面前旋转一个，不多也不少，茶船未停稳，“咔咔咔……”，一个茶船上已放好一个茶碗。顾客要的茶，品种不同，放在面前的茶碗颜色花鸟也不相同，决不会你要“龙井”给你上的是“雨前”。你眼睛还未眨两下，十几个茶碗已经摆好，动作之神速、干净、利落，无不引起座客啧啧叫绝。大家又聚精会神看他掺水。只见这位麻子哥，站在一米之外，提起茶壶，手臂挽住壶梁，手杆打得笔直，“刷、刷、刷……”，十几碗茶碗掺



得垒起尖尖，桌子上、茶船里滴水不洒。接着他抢前一步，用幺拇指把茶盖子一挑，刚才还站在每个茶碗旁边的盖子，“嗑嗑嗑……”，一个个归位，跳起来把茶碗盖得严严实实，依然一滴茶水也未溅出。这哪里是在掺茶，简直是变魔术。冯玉祥禁不住叫道：“绝啊，真绝！你就是报上说的锦春楼‘三子三绝’的周麻子吧？我是慕名而来，专看三绝的，不错，你算一绝。”

周麻子谦恭地笑着说：“我这算什么绝啊，等会儿贾老师的竹琴，才算真正的绝哩！”

经周麻子一提，不少人抬起头望着台上默坐的贾瞎子。他衣冠齐整，额上有几道明显的皱纹，身上仿佛蕴藏着强大的魅力。忽然，贾树三挺腰端坐，俨如庙内大钟，纹丝不动。他沉思片刻，拿起“渔筒”、“简板”，放在怀里，轻拂两拂，就乓乓地敲起来。说来也怪，一根竹筒，两块竹片片，经他几打几拍，便有了五音十二弦，悠扬婉转，音清韵正。偌大一个书场，刹那万籁俱寂，三百多人屏息凝神，不敢骚动。前奏方罢，瞎子歌喉遽发，字字清脆滚圆，声声明亮昂扬，像琵琶声飞，如山泉叮咚，似急雨嘈嘈，若私语切切，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好一曲《浔阳琵琶》，听得人大气不出，暗自称绝。起初，我还随贾瞎子的唱腔点头磕脑，领略词意，继而眉闭眼合，如醉如梦。

一曲歌完，全场欢腾。待大家喝口润喉茶后，二段《李陵饯友》又起。瞎子这时转腔换调，调子越唱越高、回环婉转，七折八叠，百变不穷，级级登高。尔时，歌声、琴声分辨不清，耳中但闻狂风怒吼，雪雾飞腾，胡笳报警，悲马嘶鸣。接着，又是一阵呜呜咽咽，苍苍凉凉，悲悲切切之音。我心里一酸，眼圈湿润了，完全被李陵的悲惨遭遇所吸引。猛然，瞎子愤然一顿，琴声歌声顿寂。书场里鸦雀无声，似乎都沉浸在他的结尾警句里：边关报警，大敌当前，我辈意当若何？

按常规，这时应该休息几分钟。突然，楼梯一响，一个胖子提着装有瓜子、花生米的竹篮走进书场。他走向每张书桌，只要坐客用手指在茶桌上一敲，胖子便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米摆到你面前。不一会儿，几百包食品便摆在各个茶桌上。我打开一包瓜子，还有微热，哟，颗颗都是胀鼓鼓、白生生的南瓜子。咦，嗑起来，都是鸦雀嘴，又酥又香。花生米更是耐看，香味扑鼻，每颗包着嫩嫩的桃红里衣，像少女脸上的红晕。米米胖嘟胖嘟的，个个一样大小，裔子一点没破，可见炒烤的功夫。吃起来不咸

不淡，香脆可口。马胡子看我连连进食，忙介绍说："这又是锦春茶楼的一绝　司胖子的花生米，蓉城的名小吃。"他说司胖子的瓜子、花生，进料后建立了严格的筛选制度，籽粒要选成一样大小，烘炒时司胖子亲自掌灶下铲，连烧火的柴也有考究，火候掌握更见技巧。顷刻，品花生米的，嗑瓜子的，议论琴技的，谈论曲目内容的，各种声音，如同蚕房蚕儿啄桑，喳喳直响。

台下尽管有各种声调，台上贾瞎子依然端坐，嘴唇微动，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着。马胡子悄声说："瞎子这阵在默戏，推敲板眼，运调和腔，咬字正音。在年轻跑滩时，他就是这样的。二十六年来，虽然几百个段子在他肚子里生了根，记得滚瓜烂熟，但还要在唱之前默戏。"

我感慨地对马胡子说："他对竹琴真是认真啊！"

"是啊，瞎子的每句唱腔，每个字，都是熬了心血，才那么动听的。"马胡子接着讲了一件瞎子磨戏的小事。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瞎子把《三难新郎》一戏中的唱词"闭门推出窗前月"一句，反来复去推敲了半个多月，运用不同语气、声调、节奏，变化成十几种不同的念法。演后，使听众回到家里，只觉得秦少游仍在月下吟诗，仿佛那作不出对子的窘态在眼前萦绕。能让听众有这样的感受，瞎子默戏的功夫总没有白费。当时号称川剧戏圣的康芷林对这句唱词只会几种念法，为此专程拜访贾瞎子，吸取了他唱腔上的优点。

正说着，一阵渔鼓声打断了谈话。贾瞎子的《三英战吕布》激烈厮杀又紧紧吸引了听众。贾瞎子运用抑扬顿挫的唱腔，朗朗上口的讲口，向听众展示虎牢关前的鏖战图景：张飞鞭打，关羽刀剁，刘备剑刺，吕布方天画戟上下飞舞，左遮右挡，直杀得烟尘滚滚，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号角呜咽，刀剑铿锵，杀声震天。台上虽只一人弹唱讴歌，却有千军万马之势，听众无不屏息凝神，细心倾听，没得一声咳嗽，没有一人分神。当贾瞎子收板之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这时，冯玉祥走上台去握住贾瞎子的手说："贾老板唱得太好了，炉火纯青，唱出了感情。"说完转身向听众说："今晚听唱后，我认为北方的刘宝全（唱京韵大鼓的鼓王）和四川的贾树三，可称为独唱双绝。"这话，引来大众又是一阵雷鸣般掌声。

好几十年过去了，好多往事都已忘却，唯锦春楼上"三子三绝"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高把戏

◎ 张达夫

说起老成都，便使我回忆起少年时亲眼看到过的大幻术家“高把戏”来。

“高把戏”当然姓高，但他的大名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前清光绪十年到民国9年间（1884—1920），成都东华门正街兴隆巷口的一家小茶铺的门前，经常挂着一块高把戏邀订演出的粉牌，哪家为老年人祝寿，或遇婚娶喜事，便与茶馆办理邀订手续，约高把戏到雇主家中，于宴客筵席前后，在客堂大厅前，同被雇请的扬琴班子交叉演出，以娱宾客。这种演出，名叫“堂彩”。在这种无舞台的情况下，前后左右都有观众，稍一不慎，便要露出破绽。高把戏雍容大度，进退自如，在方寸之地，利用几件小道具，就能演出一个个精妙绝伦、叹为观止的魔术节目，赢来满堂一阵又一阵的喝彩。

高把戏的演出自始至终贯穿着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富有浓厚的喜剧色彩，既表现出他的勇敢机智，又给人以轻松愉快。整个演出生动活泼，笑声不绝。

有一次我去看他演出，只见地上铺着大红毯，他身穿宽大的深灰布夹衫，外套大袖青布马褂，右手轻松地摇着旧纸折扇，面黄头光，一出场就给人以幽默滑稽之感。他首先向西方顶礼膜拜，恭请西天王母派七仙姑给主人送寿桃来。当时已是农历七月，桃子早已下市，而助手掀开半铺着的地毯，却端出一大盘鲜桃来。高接过盘后，捡了几个交与主人品尝，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向宾客散去。当一个小孩伸出双手来接寿桃时，接到手里的桃子突然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青蛙，吓得那个小孩慌忙将蛙甩到地上。大青蛙向庭坝跳逃，高把戏放下盘子去捉；青蛙又转身跳到男宾椅子下面，高赶忙伸手向坐椅下面捕捉，不料捉到的青蛙却变成一长串点燃的鞭炮，噼哩啪啦地就响了起来。在烟雾弥漫和爆竹声中，结束了“献寿桃”

的表演。

高把戏还用动物皮制成可以随意操纵控制的小动物，如小白兔、小猫、黄鼠狼、金鱼、乌龟等，可跑可跳，可走可停，宛然若生，而且都能根据情节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他表演的“杯遁”另有情趣。只见他将盛放杯子的木盘托在左手上，用一张两尺见方的红布盖上，一边说着笑话，一边用扇子猛击盖着的玻璃杯。“啪”的一声刚停，他忙将红布揭开，茶杯已不见踪影，连碎片也找不到。在观众的惊讶声中，他一口咬定是助手把杯子藏了，又说是助手将碎片吞了。助手当然矢口否认，他便在助手身上搜摸，果然从助手的内衣里将杯子掏了出来。经观众验证，确认是他托在木盘内的原物。可是助手自始至终都没接触过木盘和茶杯哩！观众惊奇不已，助手也十分骇异。

高把戏擅长表演“口里穿针”。他将 20 根大针钉在木板上，拿一根白线丢在口内，线头由助手牵来系在扇柄上。助手将大针五根一组递给高把戏，高将针丢在口内，用舌卷住针咀嚼，仿佛要吞针下肚。这时，助手将扇子一拉，二十根大针已依次穿在线上，从高的口中徐徐拉出。

高把戏的又一绝技是“金鱼缸遁”。盛满清水的玻璃鱼缸从红地毯下面变出来后，缸里有两条金鱼在水草间缓缓游动。高把戏捧起鱼缸左右摆动，越摆越快，眼看鱼缸快要倾覆，但水却一滴也不曾洒出。随后，他将鱼缸放在案上，用红布盖上，再将包着红布的鱼缸端起朝外一甩，缸落阶沿，破碎声起。高把戏跑过去将红布拾起后，地上无缸无鱼也无水。观众惊叹呼绝，掌声雷动。

高把戏最著名的拿手戏是“吹灯点灯”。助手端出 3 盏高脚大灯座，灯座上 3 支红烛早已点燃。高在距蜡烛一丈远处站定，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对准蜡烛，徐徐吐气，由慢到快，居然将三支红烛依次吹熄。在他吹第二支时，脸上已开始流汗；当吹熄第三支时，便大汗淋漓了。

他正欲挥扇取凉，助手却要他再把灯吹燃。高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接着运气做深呼吸，又依次将这三支蜡烛一一吹燃！在吹的过程中，只见他大汗淌流，加上故意做出来的那副精疲力竭的神态，博得了观众的大声喝彩。

高把戏对技艺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演出认真，一丝不苟，对杂技魔术事业作出了贡献。



把妖精钉起示众

记雷耀山的面塑

◎ 晓武搜集整理

1946年夏季的一天，刚过晌午，天上卷着乌云，偏东雨降下前沉闷湿热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猛然，像滚雷般的呐喊声、诅咒声、惊诧声、呼叫声，从春熙路滚到科甲巷。情绪激昂的人流拥挤着冲进这条小街。人丛中，挑起长板凳沿街兜卖面塑人儿的雷耀山，被挤得跌跌绊绊的，气鼓气胀地连连摇头说："这成什么世道，这成什么世道！"

雷耀山是个街沿当店堂，板凳为作坊，两手挣饮食，双脚走八方的流动手艺人。他捏的飞禽走兽，活灵活现，见者叫好；他塑的神鬼仙人，惟妙惟肖，观之称绝。他虽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有满腔侠肝义胆的爱国心肠。老成都人记得，日寇侵占东三省，他在花会摆摊摊，就塑了《义勇军痛歼侵略军》，长了大众志气；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他又捏出《密苏里敌酋跪投降》大型彩塑，博得大家掌声。他在芙蓉城里卖艺，一不吆喝叫卖，二不耍嘴吹牛，板凳一搁，自有顾客起堆堆、打拥堂。他做生意，更是一绝：若遇绷阔气、装门面的阔少千金走来，他开口起价就贵，言不二价，说这叫一分钱一分货；若是穷人岁娃围拢，欣赏他的绝技，酷爱他的艺术，他却只收本钱甚或赠送，说这叫舍得宝来宝调宝。在九里三分省城，人人晓得"面人雷"，他的大号却少有人提起了。

科甲巷两厢，都是刺绣被面铺子。正在洽谈买卖的顾客和店员，被咒骂声、跑动声惊动了，纷纷出来拦住路人询问。原来在闹市中心的春熙路，又发生了"盟军"欺侮中国人的事情：有两个美国大兵，仰叉八叉地挤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张脚舞爪又扳又跳发酒疯，弄得车子前仰后翻。已经拉着他们在大街上转了几个钟头的拉车老汉，怕车子翻兜，到了春熙路就放下车把。谁知这一放，放出了祸事。两个家伙嫌没有侍候到家，又打耳光又赏皮鞋，把拉车老汉丢翻在地痛得打滚。周围的人吼起来，围住讲理，警察扑爬跟斗

起来，把肇事凶手当上宾救走，骂拉车老汉惹是生非，让赔友邦人士安慰费。打抱不平的人又吼起来，警察们红不说白不说就要抓人逮人，拿起警棍朝人们上三下四乱劈乱打，一些人就退避进了科甲巷。

随着人流，面人雷脸气歪了，手气麻了，脚气颠了，反复说着："这成什么世道！"他边走边想：真是怪事！当局天天喊今年是抗战后第一个复兴年，是中美英苏四强称雄的胜利年。啥子复兴哟，物价天天涨，票子不值钱，捐税月月加，铺子把门关。啥子胜利哟，当官的发财，老百姓跳岩，洋大人耍歪，到处都遭灾。这不，天天捡起板凳上街都要碰到倒霉事！

他闷起脑壳边走边骂世道，不防门内飞出一支玻璃小瓶瓶，差点钉到他草鞋脚上。他低头一看，原来街旁是家诊所，刚给病人打针，顺手把空瓶瓶甩了出来。门口撮箕里，丢了一堆像酒瓶形状的针药小瓶瓶。他心里一动，便拣了几个来揣起又走。

走到棉花街口，他停住了脚。这里人来人往，口岸不错，便放下板凳骑着，揩了把汗，点燃叶子烟说："哪一天，中国人才再不当'踩倒爬'[①]啊！"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耳畔响起："雷大爷，给我换一个面娃娃吧！"

面人雷平眼一看，认得是在育婴堂街住的一个报童。他递过一卷报纸，奶声奶气地说："我妹娃子在东较场见到你捏面娃娃。哭死哭活想要一个，闹了几天了。我没得闲钱，你发发慈悲，换一个吧。"

"今天的报？别换了，屋里还等你拿钱回去买升升米、把把柴呢。"

"卖不脱。现在啥子行市都见涨，就是报纸往下跌，唉！好多《中央日报》订户都退了，说报纸没得看头。"

雷耀山从报童渴望、乞求的眼光里，似乎看见一个女娃娃咬着手指、流着眼泪不转眼地盯住自己的木匣子，盯得他心尖尖都痛了。他淡淡一笑说："报纸认不到我，我也认不到它。你等着，我送你一个。"说完，他筋骨突出的双手，飞快地搓动着面团，灵巧地拈捏着红、黄、绿、赭、蓝色面料，没啜完一竿叶子烟的工夫，一个粉嘟嘟、胖虎虎、身穿花布围裙的小姑娘站在了签子上。那鼓着的大眼睛、翘起的小嘴巴，好像正跟报童哥哥说悄悄话。

报童黄皮寡瘦的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红晕。他接过面娃娃，鞠了个

---

① 踩倒爬：旧社会对人力车夫的蔑称，这里系泛指。





躬，把报纸塞到面人雷腿弯上说："雷大爷，二天我再报答你。"话音未落，人已飙出去一丈多远了。

雷耀山连喊几声没喊住，只好把报纸往匣子里塞。塞了一半，他的眼睛蓦地落在报纸照片上，手就停下了。照片上，是个穿着旗袍，烫着刨花脑壳，挎着玻璃皮包，拄着遮阳伞还戴着墨镜的女人，正钻出飞机窗门，向外国人打招呼。他认不得字，但在茶铺听人讲过：某大人物的二小姐，天天用牛奶洗澡；喂猫狗一顿食的钱，就够七百号人吃一个月；抗战中撤退时，一架大型运输机为她搬箱笼被盖和大狼狗就飞了好几趟；她结婚时要周游世界，花钱像流水。哦，她嫌中国话太土气，开口闭口都讲洋话，丫头老妈都取洋名。越看越恶心的面人雷恼恨地说："呸，有这些混世虫，中国咋个会昌盛啊！"

他骑稳板凳，见日色偏西，想起家里还等米下锅，便专心致志捏起面娃娃来。不一会，木匣子上就站起了一个个形态逼真、面容各异、自有秉性、气度不凡的人物：有在"岳"字旗前指挥千军万马大破金兵的岳飞；有威烈肃穆、儒雅俊秀、挥毫书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有满脸憔悴、忧国忧民、立岸长吟《离骚》的屈原；有挺立船头、率军渡海、收复台湾的郑成功……这一件件的作品，无不融进了面人雷的爱和恨，无不倾注着面人雷的恩与仇。他是那么的专注，全然没有听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在赞叹，喝彩。

忽然，身边的人群搅动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惊诧地呼喊："幺妹，快跑！"两个卖纸烟瓜子的小孩飞叉叉地提起篮子从身旁跑远了。顺着人群让开的缺口，他见到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兵，握着酒瓶子，铁钉子皮鞋踏着鹅卵石路面，咔、咔、咔一步步向木匣子逼近。他正在站起来护住木匣子，几个青年男学生，肩并肩站在板凳前，把美国兵挡在几步之外了。

那个美国兵，船形帽别在肩膀上扣带里，长梭梭的脑袋上，歪扣着一顶有油大片痕迹、不知从哪里抢来的红结子瓜皮帽。他大睁醉眼，盯住面娃娃，绿眼睛像猫眼放出绿霞霞的光芒，高鼻子一耸，大声叫道："Oh，hownice！It's really a wonderful work of art！"顿了一下又吼道："Is this only in display or could Ibuy it with money?"

一个学生翻译说："他说：'啊，好极了！这真是漂亮的艺术品。这只是摆展览呢？还是我可以用钱买呢？'"

面人雷咬了咬牙说："卖给他，看打脏了我的手。灌了那么多黄狗尿，我偏不怕他发酒疯！"

学生笑了笑，哗啦啦说了一串外国话。面人雷只听见什么"米开郎其罗、罗丹"一类听不懂的话。美国兵听了，左瞄瞄，右瞟瞟，又叽里哇喇说了几句话。

学生翻译说："他问你多少钱可以买一个！"

一个穿西装的人挤过来，朝美国兵又点头又哈腰，板起脸向面人雷说："刚才你舍得送报童，还不快送一个给国际朋友？"说着，他转脸问美国兵："你要这一个吗！"伸手就想从木匣子上取白素贞泥塑。

美国兵听不懂西装客在说啥，以为他要拿走自己正在看的面娃娃，龇牙咧嘴地一声怪叫，红眉毛绿眼睛地一巴掌，把西装客打了个窜帘。

在人们哄笑声中，西装客脸不红气不喘地朝美国兵哈哈腰赔笑："OK，OK！"又瞪眉鼓眼地说："老头，快送一个吧！"

面人雷哼了一声说："我的姐儿妹子跟他没有沾亲带故，我又不指望洋人升官发财，凭啥要送？要买，就拿钱来。"

西装客脸垮下来，但又不敢在洋人面前逞横，忍了一下又说："盟友瞧得起你，不能多要价。要讲友谊。"

面人雷冷冷地说："啥子叫友谊，值多少钱一斤？一分手艺一分价，你先生不会要我丧德，挨了耳光还赔笑，连本钱都不要吧？"

西装客给问哑了，嗫嚅着直摇扇子："这个……当然……"

美国兵拍了下学生肩头，又说了几句。学生向面人雷说："他说，他有钱，要买一个。"

面人雷笑扯扯地说："这是无价宝。他真的要买么"，顿了一下才说："一个一千块。"

周围的人叫起好来："三斗米一个，是该值。""他的钱还不是中国人进的贡，让他吐出来。"

西装客脸都吓变了色："你咋个漫天要价呢？刚才还一百块钱一个嘛。"

学生插嘴说："他用飞机带回国，就值上万元。"他把话翻过去，美国兵掏出皮夹子，摸出一把钱来，学生帮他数了数，又翻出他的话来："他说只有八百块，能不能减价？"

"可以。捏一个像他那样的美国大兵。"



美国兵听了，高兴得两手抱拳学着作揖，手脚七拱八翘地动，没个放处。

面人雷拿起面团，扯了一砣，三搓两搓，高鼻子的长方脸就粘在了签子上。牙棍一捋，棕色面片变成了脑袋上的分分头。手指几拈，米色夹克衫和军裤四楞四现地粑在脑壳下面。再把赭色面团挑了三砣，一揉一压，牛皮带和两支黄桶皮鞋飞在了合适的位置。把几丝黑毛线栽到手臂上，绿眼睛嵌在深眼眶里，大板牙插到鼻子下，一个标准的鼓鼻鼓眼板着脸，半尺来高的美国兵，立正站在面前。

美国兵惊得倒吸了口气，呵呵笑着，张开毛虎虎的手就要抓。面人雷却伸手拦住，把刚才拣的药瓶拿出来，倒了点茶水在里面，塞了一瓶在面人屁股口袋里。灵动的手指一翻一压，把面人右手翻起来，捏住药瓶，瓶口倒栽到嘴里，再用牙棍尖尖一挑一抹，刚才还五官周正的美国兵面人脸上，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两个腮巴因嘴含酒瓶也高高鼓起。这几下传神动作，把个仰面酗酒、醉眼惺忪的美国大兵形象钉在了竹签上。

看的人鼓起巴巴掌来，大声叫好。那个西装客见美国兵高兴，也不好再多嘴，蔫梭梭地溜了。美国兵接过面人，发出了比在他们西部挖到金矿还开心的笑声，递过钱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顶好，顶好！"接着，翘起高出一截的脑袋，招呼在蜀一电影院门口搂住女人吃水蜜桃的伙伴："约翰！"

约翰应声跑过街，看见面娃娃，嘻开猩红的嘴巴叫好，向面人雷说着洋腔中国话，递过八百元来。面人雷不用学生翻，听懂了他要一个摩登女郎的面塑，点了点头，两手飞快地滚动着面团，手指头东捏一点黄色面团，西收一团红色面砣，做了起来。

约翰鼓圆被酒烧红的眼睛，还没品评完木匣子上的面娃娃，一根竹签已塞在他手上。他低头一瞧，签签上站着个时髦摩登女郎：烫黑发、大墨镜、挂项链、挎皮包、穿旗袍、拿阳伞、红嘴皮上栽了根纸烟，几缕棉花丝粘在烟卷头上，活像袅袅升腾的烟雾。令他胀圆了眼珠的是，肌肉丰满的手和穿着镂空皮条高跟鞋的脚，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手指甲、脚趾甲上，竟然个个像涂了蔻丹，油浸浸地红得发亮。他咧开嘴皮，露出马牙似的黄板牙怪笑着："很好，摩登女上，漂亮。"说完，搂住伙伴，像鸭子过街一偏一摇地离开了。

面人雷盯住美国兵的背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几个学生高兴得耳根子都发红了，帮面人雷把带有照片的报纸折好，替面人雷扇汗取凉，连声感谢说："老大爷，你真有志气，敢把妖精钉起示众！"

几个从春熙路就跟面人雷在一起，挨过警棍的过路人，递过一杯路边卖的玻璃茶给面人雷说："我们的心一直悬吊吊的，生怕你吃亏。多谢你帮大家出了口气！"

面人雷一面收生意，一面说："多亏你们扎起了篱笆，光我一个人，干不成大事。"

偏东雨暂时没有下下来，鲜艳的晚霞透过云层，照射着面人雷拖着板凳、挺得笔直逐渐远去的身影。他要急急赶回福德街家中放下生意担子，到育婴堂街去找报童，付还报纸钱呢。

从此，面人雷雷耀山的板凳担子上，就有了捏着小酒瓶酗酒的美国兵搂着妖里妖气打洋伞的摩登女郎塑像，谁见了，都说塑绝了。



西蜀怪人　糖画圣手

◎ 任吉祥　任光灵

川西坝成都出了一桩新事，蔡树全不当红风汽车配件厂厂长，却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地摆起糖画摊来。他身怀糖画“三绝”：一能闭目“作画”；二可塑半浮雕和立体像；三是糖画“微雕”，举凡蜜蜂、蚂蚁都能大小如真，翅膀、眼脚齐全。他自称，只要给他一勺化糖和一块大理石板，就可以画它三天三夜不重样。他的糖画套上塑料袋可存放3～5个月。

儿时的梦

糖画是四川独有的，深受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欢迎的民间工艺食品之一。过去人们称它为“倒糖饼儿”、“糖巴巴儿”、“糖灯影儿”等。1986年成都成立了第一个糖画艺术协会，才将其定为今名——糖画。

糖画这一民间艺术，虽属小技，然而却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据考，它起源于明代的“糖丞相”。《坚瓠补集》载：明俗每新年祀神，“熔就糖”印铸成各种动物（虎狮等）及人物作为祀品，所铸人物“袍笏轩昂”，俨然文臣武将，故当时戏称“糖丞相”。后来，它又吸收了中国皮影、民间剪纸等姊妹艺术的造型手法与雕刻技艺，逐渐演变发展为今日的糖画。蔡树全1981年辞去厂长，上街摆起糖画摊来。糖画摊这个古老的行业一度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但它却给无数的人留下了甜蜜的回忆。小孩兴围着它欢喜雀跃，中年人曾看着它悠然微笑，老人驻足摊前似乎生命又在重新开始。对早过了不惑之年的蔡树全，糖画则更是一个美丽的梦。他的童年，正是扛着插满龙、凤、猴、兔、花、鸟、鱼、虫的草把儿，跟着父亲的糖画担，从邛崃的山间乡路辗转到成都的。祖父蔡其昌、父亲蔡建成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糖画艺人，久享盛名。在家庭的熏陶下，

蔡树全从小就十分喜爱糖画艺术。由于糖画历来是独立操作，个体经营，分散在僻静的街头巷尾，虽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却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人们也未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她，去理解她，不少人还歧视她。因此，他父亲虽技艺出众，却从不教他，绝不愿儿子再操此“贱业”。蔡树全在儿时，就偷学父亲倒糖画的技艺，邻近的孩子们只要买上20个红苕糖给他作原料，要啥他就倒啥。一次他正偷偷地学着倒“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不料被父亲发现，一勺下去，成品被砸得粉碎，他伤心得大哭一场。父亲心软了，舀起一勺糖汁默默地给他重新绘出一幅。也许是遗传吧，蔡树全在艺术上很有灵气。上小学时他的美术劳作课经常是100分，泥塑的小汽车、动物在班上总是名列头名。他的泥塑《莫斯科的灯塔》在15所学校的展览中获得第一，深得美术老师的喜爱。回忆起小学的经历，他感慨地说：“要不是母亲过早去世，家中弟妹小，生活困难，放弃升学，进厂做工帮助父亲养家，我早上美院了。”尽管父亲嫌他学糖画，多次拿扁担打他，把他赶出家门，可是，等父亲的气一消，他又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在糖画摊前转悠，目不转睛地揣摩着其中的奥妙。蔡树全在工厂待了二三十年，可最赏心的乐事，还是余暇时熬糖做画，做了厂长也忘不了儿时的梦幻。政策一活他就不顾一切的写了辞职报告，等批期间他急不可待地去帮助别人倒糖画，以求得一点精神上的满足，他被糖画迷恋得如痴如醉。批文一下他不问辞职费的事，就高高兴兴去办行业执照。从此后，他就专心致志地挑起那古老的糖画担，在大理石板上力耕勤耘，追求流金溢彩的艺术青春。

画熊猫

在行艺过程中，随着技艺的提高，特别是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审美情趣的变化，蔡树全对传统的造型越来越感到不满足，决心向新的题材开拓，改革传统的工艺。他购买了大量的素描、速写、国画等画册，潜心研究，把传统国画的用笔技法巧妙地运用于糖画艺术。齐白石的虾、韩美琳的狐、徐悲鸿的马等等都被他移植到糖画作品中，并从平面向立体、从中小型向微型大型发展。一天蔡树全接到省外办的通知，邀他为外宾表演。他来到成都的锦江宾馆，在花园中一块如画的地方摆起了糖画





摊。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客人看蔡树全矮矮的个子，外貌不扬，似乎没把他看在眼里，有意想考他一下，顺手拿精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站立的熊猫（漫画风格），递给蔡树全问他会不会画？蔡树全没倒过这样的画，他看了看画想了想说：试一试吧。顷刻间，一个活灵活现的熊猫出现在客人们的面前，澳大利亚客人们惊奇地伸出大拇指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他们急忙拿出摄像机录了下来。蔡树全用稀糊糖汁倒出和竹编一样的一只立体花篮，赠送给贵宾。客人们观赏着，看到花蕊中有几只小蜜蜂在采蜜，叶子上有很小的不注意无法看到的，用熬糊（要焦未焦）的糖倒的正在向上爬的一群蚂蚁，欣喜若狂地连声叫道："美极了，妙极了。"随后蔡树全应客人的要求，倒了几十种各式各样的人、花、鸟、鱼、虫，倒的乌龟头尾脚动来动去，像顷刻就会游弋河中；倒的鸟像顷刻就会凌空飞翔，倒的花像倏地就要清香扑面而来。澳大利亚代表团怀着浓厚的兴趣录了专辑，回国后广为放映。

北京献艺夺魁

由商业部、国家旅游局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1988年5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川菜大师组成的代表团即将进京参加大赛，大家谋划应做一条出众的龙作为"龙年大赛"的旗帜。可怎么做，大师们都有点犯难，不知是谁想起了奇人奇艺的蔡树全。

带队赴京参赛的杨厅长找到蔡树全，蔡树全一口应承下来。常言道："画鬼易、画人难"，越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就越易画，凭空塑造，随心所欲；越是人们熟悉的东西，就越难办。龙本来也是没有人看到过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对它太熟悉了，因此画龙也难。离大赛的日子不远了，蔡树全在街上买回一大堆龙纹花盘、龙形台灯、龙画、龙雕……还买来绒毛狮子，仔细观察琢磨。因为传说中"龙头"如狮。他嘱咐家里人道："你们不要让人来找我，你们也不要来管我，我要想我的龙。"一到北京他哪里也不去，专到故宫转悠看龙，比较哪条的头好、形妙，取舍融合、揣摩酝酿。

第一次全国烹饪大赛只有7个代表队参赛，可这次有34个代表队，200多名"神手"云集北京国际饭店，而且大多提前10天就将各自的展台布置得花团似锦。看了的人回来悄悄劝蔡树全不要再做那条龙了。蔡树全

不安地赶到展览大厅，只见各式各样的龙足足有 30 多条，咖啡的、奶油的、杂用各种材料装点的、面团做的，真是云起龙骧，各呈异彩。西藏代表队做的传统酥油花，足足用了一吨半酥油，黄澄澄如一座花山。著名冰城哈尔滨的一座冰雕也用飞机运来了，冰山仙鹤，玉洁冰清，整个展览大厅真是辉煌壮观。

蔡树全走了一遭，心里反倒踏实起来。回到下榻的宾馆里，他生起两个炉子，铺开大理石板，开始炼糖制龙。明天就是预展，如不将展品摆出就算弃权。杨厅长实在放心不下，在一旁守着，直到凌晨 1 点才被劝去休息。6 点钟他翻身起床推门一看，不觉大吃一惊：一条滚圆的糖龙和 4 个直径约一尺的立体糖花篮赫然耀目，满室生辉。他急忙叫人用车将其运至国际饭店。

这条用 70 多斤糖制成的龙，长 1.7 米，被安置在大厅正中的最高处，4 个花篮分放两边。兄弟代表团的几十条龙都用玻璃罩保护着，唯独它晶莹剔透，金灿灿纯然一色凌空而出，狮首鳄嘴、虾眼、鹿角、蛇身、龟脚、蜃腹、鹰爪、虎掌、金鱼尾，云谲波诡；4000 多个鳞片熠熠闪亮，流光溢彩；龙头昂昂啸然生风，身屈曲曲霍然欲动，英姿勃发，蔚然霞飞。展出 10 天，它毫发无损，观者无不称奇。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名身怀绝技的大师们，都要到大厅表演实在安排不下，大会决定选少数代表参加表演。选拔时，蔡树全倒了立体龙、金鱼，秘书长和执行组长问：还会倒什么？蔡树全又用那只瓢倒了一只蚂蚁，10 厘米长，脚像头发丝一样细，肚子是空心的只有半粒米那么大。秘书长和组长脸上露出了笑容，蔡树全入选了。

蔡树全站立在糖龙之下、花篮之侧，在光亮的大理石板上挥瓢做画，那如注流糖，忽快忽慢飞丝走线，忽高忽低粗细有致，一放一纵婉转流畅，一顿一抖悄然成趣，鸡、鹤、鸟、鹿、马、狮、花、桃、鱼、虫、蝶、米老鼠、唐老鸭、猪八戒、霍元甲等形象次第而出。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看得呆的呆、笑的笑。参加大会的陈慕华、杨成武、康克清、余秋里等中央首长及中外与会者观看了绝妙的四川糖画表演。大会为之轰动，原定只在开幕式上表演一场，可其后是每天两场，天天忙到深夜，人们仍然感到意犹未尽。蔡树全一举夺得特技表演奖，小小“糖巴巴儿”登上了大雅之堂。



糖饼关刀要出国

1987年1月，蔡树全应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之邀，前往日本广岛“大中国展”献艺。行前，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忠特地赶来送行说：“你要好好为国争光”。他连连点头称是。

在日本，他表演于广岛、东京、横滨等八个城市。37个国家的报刊登了他的消息。每到一地，都特地搭一个漂漂亮亮的献艺台由观众点“画”，他在上面表演。只见他面对洁白如玉的大理石板，执勺在手，静气凝神，运腕走勺，流糖如丝。一双灵巧的手腕采用抖、提、顿、放技法，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顷刻间各种画面便跃然石上。闪翅的彩蝶，开屏的孔雀，呈祥的龙凤，摆尾的金鱼，蹦蹦跳跳的虾都栩栩如生，观众点到即成。它们既可观赏，又可食用；即饱眼福，又饱口福，溶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尤为日本观众倾倒的是，他祖传绝技半浮雕人物糖画。人们见他先画后雕，在饴糖将冷未冷之时飞快完成，转瞬间，黑旋风李逵手抡板斧“跳”将出来，看得见胸毛颤动；刘备纵马扬鞭，连马的护脚毛也逼真如现……日本藤泽市的一位六旬老翁，专程乘高速列车赶到横滨，出一万日元请他倒一条立体红金鱼。蔡树全说“我不卖钱”，倒了一条摇头摆尾的大红金鱼送给那位老翁，老人笑得合不拢嘴。电视台记者高举蔡树全的手在电视机前跟全日本的观众见面，称他是“大中国展”的佼佼者，全日本最受欢迎的人。

听说蔡树全能闭目作画，一天来采访的记者出于好奇想看个究竟。蔡说：“闭目作画只是为了提高技艺，提高徒弟们的水平，只在教学时做给徒弟看。闭目作画主要是熟练，一气呵成，中间糖丝不能断。”为满足记者要求，蔡树全闭目倒了桃、飞燕、奔马、小鹿等糖画。那美妙的意境，别致的造型，独特新颖的构图，使记者为之折服。

被称为“西蜀怪人”的蔡树全，在继承历代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使四川糖画这一民间艺术的“小技”，推向了全国，飘向了海外。他创作的“双龙盘花”糖画，被送往美国参加了世界儿童画展。他带9个徒弟制作的15米长、3.5米高、用糖3000多斤、1万多个零件的巨型糖龙，获得成都第二十届灯会一等奖。

然而，被人们称赞为“观之若画，食之有味”，溶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的糖画，却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不易保存。无怪人们风趣地说：“糖画，糖画，转回家就化！”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了。目前经过改革白糖的炼制工艺及配方，糖画在密封的情况下，已能保留3～5个月。蔡树全正精心研究，采用多种食用的底料及辅助材料，力争尽快将糖画发展为一种或悬挂壁间，或放置案头的观赏品，作馈赠礼品；也可撤去包装食用，打入食品市场，使四川民间糖画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理发史话

◎ 廖上柯

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人都要理发。今天，成都有许多高明的理发师，会根据人们的不同年龄、职业、相貌、头形，精心修剪出不同的落落大方的发型，使你容光焕发，倍增风采。理发被人们称为美容师，是当之无愧的，理应受到尊敬。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大地有理发这门职业，却是近四百来年的事，而且它一直被视之为卑贱的职业，处于受鄙视、受凌辱的地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才得以昂首挺胸为美化人们的仪表，贡献自己的才智。

明代以前，我国汉族人民都是留满发，不剪也不剃。头发长了，容易污秽、散乱，只是洗洗梳梳，在头顶上挽结个髻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得空闲去梳洗头发，急风暴雨替他洗梳，留下了“沐其雨，栉疾风”（庄子）的美谈。周公姬旦因政务繁忙，在他洗头的时候，还不断有人来会。他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握起头发去接见来人，传下了“一沐三握发”的佳话。但是，这也说明留满发很不方便，梳洗起来是很费时间的。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族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孝经）的思想束缚，小孩生下地来，任头发自然生长。到了应该上学读书的童年，把头发因势理顺，挽结成髻，叫做“束发受书”。除非出家当和尚、削发为僧，头发是不能剪也不能剃的。古代的统治者，还制定了“髡刑”，把剃去发容易辨别作为惩治罪犯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剔发受辱”。曹操兵临南阳，因坐马惊奔踏了禾苗，触犯了他自己规定的“践苗者斩”的禁令，便“割发权代首”，以儆效尤。

总之，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汉族的头发一直被当作生命、荣誉的

一部分，珍惜异常。

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愿望的反面。爱护头发的传统，到了17世纪，突然受到致命的一击。1644年，清朝封建政权取代明朝后，满族统治者要汉族人民遵照他们的风俗，一律剃发留辫。什么叫剃发留辫？满族的祖先女真和东胡、鞑诸族，自古以来，是把脑袋周围的头发剃掉，前面剃得露出脑心，后面稍加剃修，然后把大脑覆盖处的发辫编成辫子，视头发的长短分为独绺、三绺、五绺、七绺四种。每绺头发中还要加黑色或彩色丝线、丝辫，以增光彩。有的发梢还加系珠玉发坠，以示富贵和身份。

清兵入关，明朝统治者虽然垮台了，但遗民们却认为剃发有伤民族感情，纷纷反对。清兵在一些城市，命兵丁环卫待诏（剃头匠），遇到未剃头的人，要么当场剃头，要么斩首示众。这更激起一些地区人民的武装反对。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朝统治者对敢于反抗剃头的汉人实施血腥大屠杀的事实。

清廷为了推行剃头政令，组织了专业剃发人员，发给剃头担子，到城乡各地为人剃发。剃头担子是用肩挑的担子，一头高，一头低。矮的一头是一个柜凳，凳子下面放抽屉，内盛理发工具。高的一头像洗脸架，下置火炉，上为鼎锅烧热水，上再放洗脸盆。洗脸架上一竿高耸，雕饰成单斗桅杆状，上挂“留发者断头”的诏书，以示令出必行，抗剃者斩的威风。后来，剃头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诏书不再悬挂，代之以挡刀布。这种专业剃头人员，清廷命名为“待诏”。“待诏”，本是古代的官职名称，明、清时为从九品的小官。这里用此官衔称呼，是沿用汉代的出征将士胜利归来待诏于金马门，等候皇帝诏见，鼓励他们立功受奖。然而，待诏在统治者的眼中，不过是镇压人民的工具，一旦政权得到巩固，待诏也就打入下九流，而且是卑贱职业。清代的考试规定，待诏是不能应试的，这是以法律手段杜绝理发业的仕途。

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外国人把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叫做长尾巴的人。辫子成了落后的标志，留辫子被作为嘲笑鄙弃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驻外使节和留学生。他们有的干脆把辫子剪下扔掉。有的剪下藏起来，制成假发，回到国内依旧带上，以表示对清皇帝的忠贞，就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那类人物。

后来，革命风起，革命党人纷纷剪掉发辫，以示坚决。在这种潮流的





影响下，连清政府官吏，如成都巡警道周善培，也剪去了辫子，所以人称周善培为周秃子。辛亥革命后，不但汉族人民认为发辫是损伤民族尊严的标志，应该立刻剪掉，就连满族人民，也认为这种习俗是落后的象征，在生活上实在麻烦不便，随之也相继剪除。

发辫剪除之后，男人们的发式出现了三种类型：通都大埠，有新式理发店的地方，人们仿效欧美和日本人，剪成拿波头、分分头、平头、元头（或称学生头）等等，当时统称东洋头，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干脆剃光刮净，成了光头、和尚头。这种头式简便利落，当时剃光头的特别多。第三种是从后脑齐展展地剪掉辫子，四转一仍其旧，名曰“鸦鹊窠”，或叫“一爪瓦”，以乡间最为普遍。城市内清代的遗老，也多留这种“鸦鹊窠”。记得上世纪20年代末期，我在学校聆听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某宿儒的讲演，他讲热了，揭下平顶瓜皮帽，便露出了“鸦鹊窠”。

以上三种发式，第二、三两种，无需什么新的操作技术，原来的剃头担子都能胜任愉快。于是，从清初执行剃发命令发展起来的剃头担子，这时得机反戈一击，刀剪下处，辫子纷落，把清统治者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丑陋落后的标志，剃除得干干净净。

第一种发式，则必须以新工具和新技术来完成。于是，新式理发店便应运而生。我国的新式理发店开设得最早的是在奉天（今辽宁）。清代末年，奉天为日本势力范围，日侨极多，有日本侨民经营的新式理发店。剪辫运动开始以后，当地华人就近习取日本人的理发技术，开设新式理发店，仿照剪理东洋头式。店堂门口也仿效日本人悬挂了理发店的特有标志——转花筒。这种转花筒始于法国，谈起它，还有一段国际理发业引为自豪的史话。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不少法国理发工人参加了革命活动，有一家理发店是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据点。一次，一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被反动军警追捕甚急，他匆忙逃到这家理发店里，在工人们的掩护之下，得以脱险。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准他们以红、白、蓝三色国旗作标志，装饰门面。经过多次设计改进，成为后来的转花筒灯。因为它新颖、美观、醒目，世界各国理发业争相仿效，遂成为国际性理发店的标志。

在我们成都，由于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理发业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整个清代，只有剃头担子。清末民初，茶馆兴起以后，才有剃头匠人

在茶馆里分一席之地，挂镜置椅营业。再后，又有人开专业剃头店铺，叫做“待诏厂子”，逐步由流动变为固定，并逐步引进了新工具、新技术，有了剪头新业务。这段时期的理发项目，除剪剃头、修面之外，还有取耳（掏耳）、洗眼、搬打（也叫推拿，舒筋捶背），统称“五匹齐”。剪、剃头发是正活，有定价，其它项目收小费，酌量给予。

成都第一家新式理发店，是民国初年，日本人掘口在暑袜街开设的东洋理发店。继后，从南洋归国的薛特恩，开设的薛记理发店，初在陕西街，后迁半边桥。再后才有本地人经营的高记理发店（华兴街）、美都理发店（顺城街）、明星理发店（春熙南段）。1929 年，上海人高福全在暑袜北二街开了第一家沪式理发店。这些理发店专剪样式，并开始使用火夹烫发，座位也比较舒适。但有些老年人是从来不去问津的，他们仍习惯到剃头担子上去，手上端一木盘，接装头上剃下来的头发，剃完后，再倾散到房屋上。他们认为西式理发店把头发剪得粉碎，落在地上，任人践踏，大悖“不敢毁伤”的古训。

1934 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接着，成渝公路修通了，国民党中央的达官贵人，大批涌来成都。当时有一个原赖心辉部的编余师长马昆山，看见成都理发业的设备水平，远远满足不了这些曾在上海、南京享受惯了洋化生活的人的需要，便在商业场内开设了一家“二泉”咖啡楼。楼下照上海的排场，经营一间新式理发厅，雇请的理发技师全是清一色的下江人，生意极为兴隆。可是，工人们受不了马昆山的剥削和压迫，不到两年，部分工人就退了出来。他们集资在春熙北段，开起了大光明理发厅。他们竭尽全力，运用从上海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去征服顾客。首先以齐全的新式设备，把店堂布置得富丽堂皇，清洁卫生，舒适美观。顾客一进门，他们就施展出纯熟细致的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从取样、剪修、洗涤到吹梳，每一过程都做得一丝不苟。理完后，打照背镜，征求你的意见，达到满意为止。接着给你送来一张热腾腾、香喷喷、厚绒绒的高级毛巾，使得经过坐躺折腾已感倦意的顾客，感到心脾清爽，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当大光明以崭新姿态出现在春熙路上时，过往行人都说是上海来的大资本家开设的。谁会相信它竟是一些工人捏起两个碰子、几把刀剪干起来的呢？

抗战以后，下江人大量涌入。云裳、南京等沪式理发店不断兴起，也



以敞亮的店堂，优良的技术，热情的接待，招徕顾客，对本市原有理发店铺起了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而且还吸引了成都的达官贵人改变理发习惯。在这以前，他们有的以士兵的饷额，雇请家庭理发师；有的雇“拎包”（提包理发师）定期上门服务。自从沪式理发店兴起以后，他们不再以私包车来接“出包”（由理发店派人上门服务叫“出包”），而是亲自上门光顾。

这些头面人物到大光明理发，各有各的派头。邓锡侯总是早起溜马路以后，就来大光明，不多言多语，剪个光头就走。张群、王缵绪则边理边摆龙门阵。刘文辉照例要你用磨得锋快的土剃头刀给他剃光光头，不让你用刮起来“哗，哗”作响的东洋刀。王陵基来理发那就麻烦了！他照例身带8个卫兵，在春熙路北口，一边站一个；重庆银行和锦华馆口，各站一个；店门口，左右各站一个。为他理发的理发师左右各站一个，戒备森严，不但弄得理发师精神紧张，全店上下也为之悚然。顾主看见店堂内外都安上岗哨，如临大敌，以为出了什么事情，都赶忙避而远之。理他一次发，起码得吓跑一二十个顾客。不过据《亚洲内幕》说，张作霖理发时，由两个护兵举枪对着理发员。与之相比，王陵基还算“客气”些哩！



龙狮斗

◎ 刘西源

前清晚叶的成都银丝街，石板大路两厢，全是一楼一底的铺面。家家门口都有夜不收的木漆招牌或布质店幡，“恒昌楼”“茂升楼”“益宝楼”“达远楼”等等店铺肩并肩站着。嘿，座座店名都带楼字。这不稀奇，就像帽铺以“斋”字作底、鞋店用“隆”字吆台、布店以“祥”字煞尾一样，一听“楼”字就明白是金银器首饰铺。银丝街满街都是银器铺，街也因此得名。别看街面不大，生意兴隆火爆得很。从这条街捧走的银器首饰、精致摆件，有的越山渡水，成为达官贵人镇宅传嗣的稀世奇珍；有的漂洋过海，当作爵士廷臣千金难觅的东方宝物。有人会说，银器饰物，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中世纪的秘鲁、波兰、意大利，都有精巧绝伦、独特稀罕的珍品，怎么单单举出中国成都的银丝街？俗话说，冲壳子[①]的看嘴功，懂门道的看手功。欧美所制银件饰品，大多先将金银熔炼，倒入模具，整体成型，镶嵌珍珠宝石。它们美就美在粗犷造型上，贵就贵在珠宝钻石上。而银丝街的银器，除有整体造型的先期浇铸工艺，更有后期把银丝拉得比头发还细的“垒丝”、银饰敲击镶嵌的“片子”两类独特工艺。它们精就精在技术上，宝就宝在工艺上。这就成了世界上工艺之林的一枝独秀，璀璨夺目，令人惊羡。至今成都银丝制品都被称为“中国的国技”“东方的瑰宝”。不然，银丝街的产品，怎会在法国巴黎博览会上，在各大洲万千精工巧匠倾注心血塑造的洋洋大观展品中，冠盖群芳，独占鳌头，夺得头彩，捧回金奖，为国增光，震惊全球？

那么，银丝街的银器，究竟有啥奥妙，有何奇特？请听一段“龙狮斗”的龙门阵，便知端详。

---

① 冲壳子：川语，指聊天。



一

前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五月半，天刚过午，老天马起脸，阴云压过顶，鸟不飞，蝉不鸣。成都银丝街“德发楼”店主刘书元沏了壶酽茶，磨好砚墨，铺好一张大红金纸，对握毫在手的邻居、考过监生的林四爷说：“请写一张告奠安南阵亡将士英灵的牌位。”林祥恭一听，滚滚热浪从胸口翻到喉咙。两年前，法兰西派兵船火轮侵入安南，把战火烧到南疆。今年春上，多亏老将冯子材镇南关血战，打得番寇望风而逃。捷报传来，街面上火炮纸都扫了几撮箕。没料想软骨头大臣办外交，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打了胜仗的堂堂天国，却签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股旋风刮到成都，天涯石、方正街教堂夹了几个月尾巴的洋和尚，竟敢耀武扬威扯把子讲道收徒，四月八佛祖生日那天居然摆摊摊施舍稀饭，这叫阵亡将士在九泉下心何安？有血性的男子汉哪个肯咽这口窝心气？没想到刘书元借过晚端阳节[①]祭忠，实在令人钦佩。他忙展纸说：“凭你这分侠肝义胆，得写魏碑，方显恭敬。”

话音未落，门口响起一声怪叫：“啊哈，刘二师，道喜道喜了。”

刘书元抬眼一看，认得是瘦得像干姜豆、一贯吃铜厕铁、估赊八方的杨在敏。这个地痞，连亲娘老子缝缝补补挣的补衣钱都敢偷去吃喝嫖赌，听说前几天投了洋教，今天上门，不是占兆。他正要答话，又见一乘青纱小轿停在门口，轿帘一掀，一个蓝眼珠、黄头发、高鼻子的长脚汉，裹着黑不笼登的孝服，一脚就跨过了门槛，像根顶魂幡，戳在屋门口。

“嘿嘿，刘掌柜，快拜啊，礼拜堂首席牧师麦得法师到！”杨在敏拖长嗓音通名报姓。

刘书元稳稳坐着，没有起身。他早就听说洋教堂有个洋和尚，平时除了会官府、上衙门，大门不出，市面难寻，今天怎么会闯到银丝街来了？

洋和尚站在货架前，半张着嘴，转动眼珠，望着货柜里的银质神佛塑像、翎毛走兽、镯环簪钿、福禄寿屏，连连搓手，不住哼声：“妙，妙极了。啊，德发楼，妙极了。”

刘书元和林祥恭对望了一眼，心里说：“这家伙不光会念洋经，还会

---

①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阳节。在此前后设酒祭魂，称早、晚端阳节。

说中国话呢。”

洋和尚猛一转身，凹眼睛直勾勾盯住刘书元，撇着京腔问：“你，德发楼主人，工匠刘？”

杨在敏踮起脚，伸长颈项忙着介绍：“对。历年进京的贡品，都选中有他的货。”

“啊，认识你真是幸运。我，叫艾德华·默得斯通（Edward. Murdstone）。我尊重贵国民俗，就叫我艾德华吧。”洋和尚抑扬顿挫地说，像在背书。

刘书元心想，他们岂止想得到中华，天宫地府都恨不得捞到手。

“我们的欧罗巴洲，有位和阿尔卑斯山齐名的雕塑大师罗丹。他说过：‘艺术是一种宗教。’伟大的艺术家，是把理想、情操、生命都献给了艺术殿堂的殉道者。能认识你，艺术家工匠刘，太荣幸了。”艾德华说完，双手打拱学着作揖，活像下江猴儿班要钱的猴子，七拱八翘，张脚舞爪。

刘书元并不还礼，拈着短须问：“来到小店，有何贵干？”

“你，能做吗？”艾德华从披肩腋下拿出一本书来打开，插页上是一幅雄踞地球、咆哮怒吼的猛狮。看它那鬣毛怒张、突睛利爪的狰狞怪状，仿佛不仅是百兽之王，也是主宰全球的万物之王。

刘书元从来未见过活的狮子，听在广州万牲园见过的朋友说过，这种畜生像猫、像豹又像虎，在新都宝光寺、成都昭觉寺禅堂上，倒见过从印度带回的彩绘供屏。那屏上的狮子，和文殊菩萨骑的青狮一样，都是蹙毛祥目、皈依佛门的蹲伏坐骑，怎么艾德华偏要纵狮归山，逞其野性？

艾德华见刘书元沉吟不语，忙说：“我明白，思考和时间，是艺术创造的前提。雕塑先驱米开朗其罗，给西斯廷大教堂绘壁画，三百四十三个像，用了四年又三个月。你，我计算过，二十个礼拜足够了，嗯？”

“对，法师看得远，半年尽够了。”唯恐显不出自己在场的杨在敏忙着插嘴。

“不！”艾德华龇牙瞪眼：“你得找教师教会你计算历法。不是半年，是五个月。”

一直冷眼旁观的林四爷，悄悄对刘书元耳边过话说：“风吹过他身边都要臭，不给他做。”刘书元仿佛没听见，端详着书上插图，认真地问：“照图加工，狮子踩球，就这一件？”“对。狮子要张口怒吼，脚爪锋利。”



艾德华说："呃，在地球上再盘一条龙。"

刘书元眯起眼，琢磨对方的话，林四爷却插话说："他，多年不制作银龙了。"

艾德华脑袋像巴郎鼓似的摇着："不，工匠刘很会雕龙刻凤的。五龙戏珠不是你做的？"

一听"五龙戏珠"，刘书元觉得钢刀戳到心尖尖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五龙戏珠"这件摆饰，是他二十七年前，学徒满师，独立操刀，和几位金银器前辈，花一年多时间才制成的国宝。这座雕塑，在不到一尺高的空间，一尺见方底座上，整体浇铸，立体镂刻五条银龙。那五条龙，恪守"三停九像、三现三不现"古规。"三停"乃龙头、龙身、龙尾三段几乎等长，方显矫健异常，呼之欲出。"九像"是指龙头像鳄鱼嘴像驴，眼像螃蟹角像鹿，鸡脚蛇身龙虾须，穿山鳞甲尾似鱼。唯有"九像"，方显刚健有力，神采奕奕。"三现三不现"，指塑龙时必以五彩云霞罩体，现头现身又现脚，便又不完全现身、脚、爪，方显腾云驾雾，神采飘逸。为铸好五条龙，刘书元有多少个夜晚睡不落枕，食不甘味，硬是用心血和汗水浇铸出来，才使得五条龙龙体神态各异，各有秉性，翻云击浪，滚绞缠绕，共夺斗大一颗琥珀珊瑚宝珠。这件珍品，从前后左右、高低俯仰任何一面看去，都有五条活灵活现、矫健异常的神龙在游动。其雕工的精细，镂空之玲珑，确是集前人之绝技，凝工匠之智慧。制作之际，就引来同行先辈品评鉴赏；雕就之日，立马轰动省城。它当即被四川总督选为贡品，送进京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陈设。没料到咸丰十年（1860 年）十月，英吉利、法兰西联军抢劫、焚烧了圆明园，这件举世罕见、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竟不知下落。现在，艾德华提起这件珍宝，叫刘书元怎能不痛心啊。刘书元闭眼定了定神问："啊，球上盘龙，球上有狮，狮要如图，那，龙头摆哪？"

"在，龙的头部……"艾德华愣了一下："在地球上。"

林四爷一惊，站了起来，心想：你讲了狮子要高踞地球之顶，哪里还有龙头的位置？还没容他多想，刘书元却指着桌上文房四宝说："四爷，拜托你了，按他讲的，写个契约。"

林祥恭迟疑地不肯抓笔。刘书元递了个眼色说："四爷，人家看上银丝街的银器，还不该露一手么？"林祥恭只好把"球上盘龙，顶端有狮，

狮口怒张，睛突爪利，龙头在地球上”一一写明。只听刘书元又说：“工期嘛，今天五月半，盂兰节[①]取货。”

艾德华见林祥恭把取货日期写上，不解地问：“盂，盂兰节？”

“就是送鬼升天的七月半。”杨在敏忙着解释。

“啊，八个礼拜。”艾德华瞪大眼长舒一口气。

刘书元将一式二份的契约递给艾德华一份，一字一句地说：“官凭文书私凭信，出门无悔。”

艾德华仔细地读了契约，指着柜上坐堂招牌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几个大字，连声说“无悔，无悔”。说完，尖声尖气地笑起来，活像补锅匠在刮锅那么刺耳。

杨在敏早从门外轿内提过匣子，取出几锭五十两白银递过来，陪着艾德华干笑。呵呵的笑声，活像破夜壶从楼梯上往下滚！

艾德华见刘书元用戥秤称过银后，把书留下出门，上轿时念念有词：“六十天，盂兰节，命运之神啊！”

林四爷待杨在敏跟着轿子走后，一把拉住刘书元的手说：“你发梦癫了，我们起过誓，不买洋货，不搭理洋人……”

“他要做摆件，必有大文章。”刘书元翻开书认真地瞧着插图。图上，狰狞凶恶的雄狮，扬起前爪，似乎要把眼前的猎物劈倒、撕裂、吞噬。他思索着慢慢说：“龙，祖先靠它发祥，民族靠它昌盛，是帝德大威所在，镇魔辟邪必需。洋人一看到大龙旗[②]就浑身不自在。自古讲究龙凤呈祥，龙虎并威，怎么洋和尚偏要龙狮同球？”

林祥恭素来敬重刘书元有主见，管不平，挟技爱国，敌忾同仇，可今天所为，实在费解，便气鼓鼓地点了一句：“鱼爱鱼，虾爱虾，杨在敏跟洋和尚狗扯连环，不会有好名堂。龙，是国脉所系，祥瑞功德万灵之神。你的炼银巧技，是鬼斧神工，炎黄子孙的智慧结晶，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答应给他做啊！”

刘书元蹙眉凝神，眼光凝在书上轻轻点头。

---

① 盂兰节：农历七月十五日，迷信为城隍生日，照例要抬城隍神像游行、祈福。

② 大龙旗：清朝的国旗。



二

洋和尚刚刚离开德发楼，刘二师要做龙狮同球的消息就闹响了银丝街。一拨又一拨的先辈、同行拥进了德发楼，有劝告的，有提醒的，有送狮像的，有介绍洋人脾气的。刘书元笑眯眯地依礼貌接待。连着三天，既不操刀刻模，也不生炉化银，门面生意照常，他却天天一早就捏着叶子烟竿出门去了。

刘书元的不紧不慢，可急坏了隔壁的林祥恭。他素来见到洋人就有三分气；那天见艾德华进德发楼摆阔显富，心中的火升到五分；及至刘书元满口答应制做银器，肚里的火苗窜到七分，气得发抖的手，差点捏不稳笔把契约写坏。没料想刘书元答应了生意，却又上街酗开了酒。他吃了一惊，心想钱能变性这句话不假，火气又增了一分。昨晚在茶铺听人说刘二师和杨在敏在二桥南街下牛肉馆品酒，心中的无名火蓦地增到九分。第四天一早，他早早下床，想把刘书元堵在屋内，要问个青红皂白。

林祥恭刚刚拉开院落大门，就见满脸含笑的刘书元站在门口，他没好气地问："怎么，吃了笑婆子的尿，笑嘻嘻又往外跑呀？"

刘书元见林祥恭满脸挟雷带电，便故意悠闲地说："做笔大生意，不该高兴，脚底板能在屋里站住么？"

"时间金贵，七月半要取货，还往外跑？"

"跑跑腿，散散心，想想事嘛。"

"散心散心，你跟杨在敏那号东西吆三呼六碰杯，哪个正人君子见了不痛心、伤心？"

刘书元见林祥恭脸红了，筋胀了，气粗了，声高了，再不解开谜团，这位书呆子会气出病的，便弯腰赔礼说："多谢四爷关心。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四爷指点。常言说，做桌椅要有卯窍，做生意要懂行市，这近水呢？"

"知鱼性。"

"近山呢？"

"识鸟音。"

"洋人要'龙狮同球'的摆件，是龙狮相斗还是龙狮贺春？"

"这——"林祥恭被问得倒抽了口冷气，愣住了。

“他要这件银器，是真心品鉴还是转手赚钱?”

“这　　”

“他说狮在球顶，又要龙在球上，是龙在上还是狮子在上?”

林祥恭被刘书元步步逼问、声声催紧问哑了。闷了一阵才问：“那你这几天是——”

“到洋教堂那个乌龟窝摸龟性去了。”

恍然大悟的林祥恭，几分怒气化为满怀敬意，忙说：“啊，灌杨在敏的猫尿，是让他酒后吐真言呀。”

“让他吐真言，也让他灌艾德华的酒，把虚实探个明白。”

“好兄弟，盘出啥根底来了?”

刘书元忍住笑说：“就让我站在门外说么?”

林祥恭这才意识到失礼，忙忙拱手相请，把刘书元引进书房落座敬茶。

刘书元喝了口茶，神气骤变，满脸哀伤地从头到尾说开了子午卯酉：二十五年前那场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用大炮轰开了圆明园大门。艾德华的叔叔汤姆逊，当时是英联邦骑兵团的中尉，冲进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位皇帝上殿临朝的正大光明殿，用火枪射死守卫的太监，抢到了设在殿角的“五龙戏珠”银器。不过，没等他从欢乐中清醒过来，深知“五龙戏珠”价值的上尉队长，从背后给了汤姆逊一枪。他被抬上船运回英伦三岛时，艾德华到码头迎接，从快要咽气的汤姆逊嘴里，知道了“五龙戏珠”不是先朝遗泽，是健在人世的成都德发楼工匠所制。为了能像开黑枪、夺珍宝、封爵士的上尉那样发横财，博得爵位晋身之阶，艾德华脱去华贵戎装，穿上教士道袍到上海学了几年中文汉语，又来到成都收买了杨在敏，找到了生意兴隆高悬店招的德发楼。

“那，他想拿‘龙狮同球’去谋个一官半职?”拈须点头的林祥恭吟哦着说。

“他派人神不知鬼不觉从德发楼随便买一件银器，回国一进贡，都会官星高照。他这番乌龟出洞，要做‘龙狮同球’，文章深沉得很。”

“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林祥恭瞪大眼，屏住呼吸，急切地听下去。

刘书元不紧不慢地说：“艾德华肚子里装的啥料，杨在敏哪能一下子就掏出来。我想，抓麻雀得撒一把谷，逮耗子得费一把面。前天昨天，都拿钱沽酒，先灌杨在敏，再让他包肉提壶去灌艾德华。灌了两夜，几瓶邛





嵊‘美人酒’没有白费，功到自然成，终于套出了艾德华脑壳里想的如意算盘。”

听得兴奋激动的林祥恭，忙提壶斟茶，让刘书元润润嗓子接着往下说。

“那艾德华见到几十年来，炮舰、火枪都没有把中国轰垮，就想出了个烂主意，让德发楼做一件‘龙狮同球’，代表英吉利的雄狮把象征中国的大龙踩在脚底下，俯首帖耳慑服于狮威，好让中国永远臣服大英帝国。他拿上这件可与‘五龙戏珠’比美的‘龙狮同球’回国，就能敲锣放炮向人炫耀，是他艾德华，没费一枪一弹，没花一分一厘，从中国战争赔偿费中拨几两银子，就让中国最高明的工匠制作了心甘情愿臣服帝国的珍品，由此证明他是占领国的开路先锋，建立了不亚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的功勋。”

气得“哇、哇”直叫的林祥恭恨声说：“好个吃骨头不打嗝的洋和尚！”

“凭着这件银器，他不单想封侯晋爵，还想和什么凯塞琳公主到埃及度啥子蜜月呢。杨在敏说，艾德华见酒不要命，还放了好多洋屁，可惜喝醉了，有些话没听懂。”

早把九分火气压下的林祥恭，憋得满脸通红，火气冒到十分，额头青筋直跳，霍地站起身说：“哼，鹰钩鼻子蛇蝎心，银器么，不做。”

刘书元笑呵呵地说：“七月半送鬼，打发这批混世虫，我有主意。”

七月半盂兰节的晌午，刘书元借林祥恭的四合院摆了桌席，请了成都府刑名师爷、成都县的捕头、银器同业公会会首，在天津卫看过租界判案的东大街匹头行管帐先生入席。席上，他敬酒说：“承蒙赏给金脸银面，光临小号品酒。一来为阵亡将士超魂祭祷，保佑天朝昌盛，不再割地赔款；二来为城隍祝寿，保佑省城平安，不受洋人欺侮；三来请诸位搭帮协力，驱逐洋鬼出门，不令街坊遭受劫难。”

这些人刚才已从林四爷嘴里，摸准了洋和尚制作银器的命脉，明白刘书元要跟洋和尚斗法，于国无伤，于民有利，于己无妨，合理合法，有情有义，乐得嘴甜情满，所以都连连举杯说：“二师放心，今天这个场合，大家凑起。”

饭后，大家坐在“德发楼”喝茶，杨在敏领着艾德华的青衣小轿到了。艾德华进了门，不瞧旁人就嚷开了：“了不起呀，处处是节日气氛，

街街有敬神人群。一路上，兴禅寺、狐仙祠[1]、真武庙[2]、五岳宫、文殊院、白云寺、楞伽庵，都立着纸扎的人像、房屋。多好的艺术品，可惜到晚上要烧掉。每座寺庙都有七七……”他翻着白眼，舌头抖不圆了。

跟屁虫杨在敏忙忙提醒：“四十九盏天灯。”

“嗯，天灯。你们中国人信仰宗教，很虔诚。”他的话随着眼珠定在柜台戥秤上，一下断了。

戥秤两端，平平稳稳。一头盘内，装着量重的戥子；一头盘内，隆起器件盖着红绸。

艾德华眼珠闪着光说：“六十天，你很准时，工匠刘。”

“别动！”刘书元一声低喝，把艾德华伸向红绸的手定在空中，又问道：“契约呢？”

杨在敏见艾德华迷瞪瞪地，忙凑近踮起脚小声说：“凭约取货。”

艾德华忙从怀里拿出皮夹子，取出契约。

会首从桌子上拿起刘书元的契约，把艾德华的也接过来对照一下，验明无误，又让他们互相验证，便放大嗓门，向越来越多挤在店门的人朗朗读道：“立契约人方正街福音堂艾德华，付卖方德发楼店主刘书元工本银一百二十两，除贴水[3]、工银杂支，交割实重踏球银丝一具。买方言明，球上盘龙，顶端有狮，狮口怒张，睛突爪利，龙头在地球上。工期六十天。到期取货，毁约加倍。空口无凭，立约为证。大清光绪十一年五月谷旦吉日。下面是买卖方、中人和代约人的名讳。牧师先生，文约无错吧？”

艾德华看看杨在敏，杨在敏哪上过这样的台盘，大张着嘴，说不了个子午卯酉。艾德华只好点头说：“绝对正确。”

刘书元指着戥秤说：“请验斤两。”

艾德华躬起背背看戥子重量，计算一下点头说：“除去损耗，符合重量。”说完，在契约上写了“收讫”字样，伸手又要去揭红绸。刘书元伸手护住红绸说：“本店店规，按约交货，下柜不认。”

艾德华揩揩汗说：“我尊重贵国风俗。”

---

① 在通顺桥街。

② 在北大街。

③ 贴水：指加工时银子的损耗。



刘书元伸手揭去红绸，声若洪钟地说："那好，请看德发楼的龙狮斗！"

见刘书元的手触到红绸，艾德华本能地感到幸福暖流流进心田，下意识地闭上眼。他强压怦怦跳的心，等待着稀世奇珍的光芒跳进眼帘。他刚闭眼，门外响起了"恭喜发财"鞭炮声，噼哩叭啦，好不震耳。吓得他忙鼓起了眼睛，朝戥盘里看去。主啊，这叫什么奇珍异宝啊，一点也不合乎自己心意。精致无比的地球上，有龙有狮，比例适当，雕刻精细。工艺精湛，神形兼备。不过，眼前不是把大龙踩到脚下、撕成碎片的雄狮，而是奋鬣发威、挺身怒目的银龙，死死缠住痛苦挣扎、惊恐绝望的狮子。尽管狮子也张着口、扬着爪，但是，谁都能看出，张口是临死前的哀鸣，扬爪是断命前的挣扎，而那矫健勇猛的银龙，龙尾紧贴地面，龙身缠绕狮身，居高临下的龙头，正要向伸颈哀号的狮颈以最后的一击。艾德华只觉得大龙像缠住自己，浑身骨头都在发痛，像要被咬住一样。他战抖着双手把银球端起来观察，仿佛银龙的利爪尖牙在不断涨大，朝自己颈子扑来。他气急败坏地把手往桌子上一捶说："太不友好了，工匠刘，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刑名师爷冷冷地问："官凭文书私凭信，德发楼违反了契约哪条哪款？"

艾德华抓起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契约，眼睛在纸上扫过来又扫过去，"呃"了半天没呃出话来。

杨在敏却为主子仗胆说："成色不足。"

捕头把铁链从怀里掏出一抖："你敢具结画押，就上银庄轧银①。"

杨在敏知道德发楼凭成色足才挣下公道楼的硬招牌。真要落个诬告罪名，却没人送牢饭。

他转脸就下话："嘿嘿，我没说成色不对嘛。"

艾德华像被银龙缠得喘不过气来，憋红了脸说："我说过狮子在球顶，你，把龙雕在狮子头上面，不合协议。"

他这一吼，好几双眼睛都望着契约。刑名师爷和捕头愣住了，匹头行帐房把眼盯住林祥恭。林祥恭眼睛也定了神，心想：真是鬼使神差，我怎么写狮在球顶上呢？看不出洋人倒会钻空子呢。

艾德华见大家开不起口，鼻孔里哼了一声，在寂静的店堂发出很大的响声。他哼声未落，刘书元却发出一串声震屋宇的哈哈大笑，笑声落，话

① 轧银，即化验金银成色。每轧一次，都有损耗。

出唇："你看清楚契约，'龙在地球上'，就是在地球之上。牧师先生，你得找教师教会你学懂中国文字。"艾德华一口冷气憋回肚里，顶得胃里鸡蛋冷饮翻泡打滚，喃喃自语："在地球上，在地球之上。"猛地，他又蹦出一句话："我不要。"

四头行帐房冷冷地说："签字生效的契约上写明毁约加倍，你愿付两倍工银吗？"

杨在敏看到主子丢丑，他硬起颈子说："没按规格做，就敢到衙门告你。"

刑名师爷一拍桌子站起："呈递上来。"

杨在敏眨着眼问："啥子？"

"状子。话得喊醒，衙门高悬'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皇牌，是牧师还是你，要以身试法？"林祥恭不软不硬地说。

"牧师有治外法权保护。"杨在敏顿着脚说。

四头行管事笑了："成都没有租界，洋人犯律，与民同罪。"

艾德华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国人面前，自己竟会矮了三分。从他记事起听到的就是中国人贫穷、愚昧、落后，对外国崇拜、畏惧、羡叹。来到中国后，也确实见到杨在敏这样不认祖宗，舔自己皮鞋的侏儒。可今天，他们怎么会敢与自己平起平坐大声说话呢？难道契约真的对中国人有利，难道自己订制银狮的隐秘已被工匠刘窥测到了？他望望杨在敏，希望他能想出制服这伙人的高明办法来。

杨在敏见艾德华光张口不发音，自己提起的劲也虚了，呢呢痴痴地说不出话来。

刘书元却看准对方心理变化，发起了攻势，低头怒喝："杨在敏，我问你，牧师要德发楼银器，是想回国挣个爵士，是不是你亲口讲的？"

"呃，我……"

"牧师要狮踩银龙，是要证明中国臣服西方帝国，是不是你亲口讲的？"

"呃，我……"

"牧师的叔叔当年火烧圆明园，抢夺'五龙戏珠'闹内乱送了命，是不是你亲口讲的？"

杨在敏脸色惨白，嘴角垮下说："呃……"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哪个不想出皇宫被烧、宝物被抢的恶气？牧师正大光明做生意，我们礼尚往来；谁要借做生意侮辱中国，是烧



香找错了庙门。”刘书元义正词严地说。

艾德华听完工匠刘惊雷闪电的话，一股怨气冲到他青幽幽的脸上，脸色比死人还白。他一把抓住杨在敏胸前衣襟，咬牙切齿地说：“是你，泄露了机密？”

杨在敏被提得双脚离地，打着哆嗦说：“不该好酒贪杯……”话未说完，被艾德华一记结结实实的钩拳，挺在下巴上，他身不由己飞起来往后便倒，脑壳碰到柜台上的“龙狮斗”上，银光闪闪的雕塑品被砸倒跌落在地面青石板上。

“龙狮斗”的银球，是空心浇注镶嵌焊接成型的，龙和狮是由细如发丝的银线纽结盘虬的，虽说不合艾德华的心意；但确是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千金难买、世上稀有珍品。艾德华见银品落地，忙抢前一步拾起。他细一瞧，哪里还算东方艺术珍品：狮子跌得瘪头乱耳，银质地球也砸扁了。本来是无与伦比的宝物，眨眼变成只能回炉的废银。他怔怔地望着手上的银器，哭嚎着：“啊，我的雄狮。”

刘书元笑眯眯地说：“牧师先生，中国人的心，向着神龙。谁也别想打龙的主意。”

艾德华还想再说句硬话，只见刘书元身后、大门外的人群，都用愤怒、讥笑的眼光盯住自己，便悻悻地抱住银器，朝刚爬起来坐在地上的杨在敏狠命踢了一脚，跳出门钻进小轿让人抬起跑，眨眼便不见影了。

在人们的嘘笑声中，杨在敏爬起来，顾不得揩嘴角流出来的血沫子，跌跌绊绊撵出门喊着：“法师先生，我是信教的，是你们的仆人哪！”他力竭声嘶地喊着，扑爬跟斗地跟着轿子跑。沿街有小孩点燃鞭炮扔到轿子周围，向杨在敏吐口水，整齐地喊道：“送鬼了，送鬼了！”

以后，艾德华是否向使馆报告，是否打通了成都官府关节，现有资料查不出来。大概慑于中国在南方战胜法兰西的赫赫战绩，才没有敢打喷嚏。只听教堂厨师说，艾德华眼睛气得比牛卵子还大还红，三拳两脚把杨在敏开销到沿街讨口，他没过多久也螃蟹夹豌豆——连滚带爬溜了。

德发楼精制“龙狮斗”智斗洋人的故事，比吹风还传得快，一下子就传遍了成都城。北门城隍庙河滩书场，城中棉花街茶铺书棚，都编了《龙狮斗》评书来说，听众哪个不眉开眼笑，哪个不觉得长了志气！晚上在街边搭起方桌说圣谕的还将此事写成诗作为开篇：

千古练银绝技功，灵光宝气贯鸿蒙；
手飞亮箔凝金辇，指拈明丝化玉虹。
翎禽虫兽降凡土，仙人神鬼落苍穹；
笑看锦城龙狮斗，德发高楼盖世雄。

讲到高兴处，自己端着板凳来听的听众谁不叫好！结尾处总有人放上几枚响鞭炮驱邪助兴。

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刘书元病逝时，好多不认识他的人，都赶到银丝街德发楼送祭礼、上灶香，恭敬施礼，比赶场的人都多，都夸刘二师为中国人争气。听说至今，北京故宫展品中，还收藏有德发楼的银制品呢。





百花潭畔赏“百花”

◎ 高华敏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裹红蕖冉冉香……”这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描绘当年成都草堂到百花潭一带秀丽的田园景色的名句。古百花潭址位于何处，尚待考。但成都西南角的现百花潭一带，千百年来便是蜀都人民喜爱郊游的胜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离开成都多年，还思念“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古百花潭址究竟位于何处，历来传说不一，有人说在浣花溪畔，也有人说在今龙爪堰，还有人认为就在今日的百花潭公园处。众说纷纭，引经据典，盖有依据。《蜀梼杌》载：“乾德五年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仕女珠翠夹岸……”从这段文字的地理、河道来推理，则古百花潭旧址亦很可能就在今日的百花潭公园处。

清末黄云鹄题“古百花潭”石刻，曾嵌于今青羊正街桥头，与今日百花潭相隔南河的宝云庵西壁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石碑早已无处寻觅了。1981年，百花潭公园重建开放后，著名书法家张爱萍将军来此游览，追述往事之余，欣然命笔，重题“古百花潭”四字，园林部门已聘请名工巧匠，精心雕刻成碑，立之于园庭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百花潭因何得名呢？《蜀中名胜记》《成都县记》皆有记述，浣花溪在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溪上民家之女任氏，家境贫微，勤劳善良，一日在潭边为痴僧洗涤袈裟，朵朵莲花辄应手而出，整个水面素花满潭，故名百花潭。西川节度使崔旰慕其美貌纳为妾。公元768年7月，崔旰奉召进京，泸州刺史杨子琳趁机突然进攻成都。崔旰远离剑门关外无法回援，任氏当机立断，用家财募得勇士，自帅抗敌，击败杨子琳有功。崔旰妻死，遂为继室，封冀国夫人。

人民免遭涂炭，甚为感激，曾镌浣花夫人石像。亦有诗赞美她善良、机智、果敢，诗云："浣花溪边濯锦裳，百花满潭溪水香。宝奁散尽买霜戟，草林匹马不可当。"

百花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于私人别墅所在。1953 年，它辟为动物园。随着城市的发展，动物园亦搬迁。1980 年，党和政府便决定在这里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重建独具风格的百花潭公园，为广大群众提供郊游的场所。经园艺工艺师的潜心布局，神工鬼斧的辛勤劳动，今日，这地方景色别致，山石盆趣，兰桂飘香，百鸟枝头，古树奇特……给纷至沓来的国内外游人留下了多少美妙的情趣。

出芙蓉城西，向诗圣杜甫草堂故里行，过青羊正街，跨南河，粉墙朱柱，画檐宫灯，门槛外右处便是百花潭公园。步进庭园，过金鱼鸟廊，沿翠竹树阴的蜿蜒小道，空气清新，鸟语伴行。不远处一山石拔地而起，巍然屹立，珠帘瀑布，从上而下，颇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境。这山石高约 10 米，宛若屏障，挡住视线、"锁住"了满园的风光。转过山石，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湖水清澈鉴人影，碧波摇动彩画图。曲径通幽处，道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便是公园的山水游览区，面积不大，地势狭长，以湖为主，亭、榭、桥、廊、石舫、叠石、小岛，围湖布局，绕水而建。举目望去，但见石舫上，假山旁、小桥横跨处，处处都是观鱼景，景景都有观鱼人，立其间不禁使人有游西湖"花港观鱼"的联想。湖心小岛上，植物长势良好，树阴下设仿树桩桌、凳，有游人小憩，谈笑风生，好不惬意。岛边有红领巾一群以饵投入湖中，尾尾红鲤，悠然游来，争相觅食，越聚越多，时有鱼头相撞，受惊不小，误以大祸来临，头尾一摆，转身游去，搅动水波，泛起漪涟；片刻，鱼群见安然无事，又纷纷游来。如此反复，引起了观鱼者一阵又一阵爽朗的笑声。

湖边有高树入云的"宜雨宜晴"的石舫，上、下两层，四周临水，前搭跳板，后设丁步二三墩。登石舫上层，凭栏放眼，满园花木，郁郁葱葱；俯身向下，一湖碧波，波光粼粼。两侧一组假山，把湖面分成大、小两湖，天地虽小，然给人既不门户洞开，更无一览无余之感。东侧绿树掩映下，"盆趣园"、"百花园"、"桂花园"和远处的"国香园"，错落有致，树影摇曳，时隐时现，可见造园寄情山水，拓湖设影、借湖点潭，以呈现大自然"湖光山色分外好，诗情画意逼人来"的一番匠心。





“盆多清趣”。这是游人对百花潭公园“盆趣园”的赞语。“盆趣园”坐落在人工湖畔，毗邻“西苑”。黑瓦、云墙、漏花窗，月洞门内展厅、展廊、展台、博古架，红亭、小池布局讲究，浑然一体，十分典雅。门亭的楹联挂着诗人、副总理陈毅元帅1959年冬，在芙蓉城观赏盆景时留下的墨迹：“高等艺术，美化自然”。步进园内，紫荆屏迎面，右侧展廊通“西苑”。举步盆景展园，经瓶门，可赏山水盆景。出六角门是旱盆景展园，再往前行，池边红亭，地面上树桩盆景，蟠扎造型，手法巧妙，大弯垂枝，滚龙抱柱、小悬岩、大悬岩、方拐、对拐，还有三弯九倒拐，即正面看有三弯，侧观有九拐，景随步移，千姿万态。穿梅花门便来到“西苑”。“西苑”展厅对对绿架，荷花形池畔叠石理水，流水潺潺，又是一番景色，令人迷恋。

天府之国古迹名胜，山川河谷以“幽、秀、险、雄”著称于世，咫尺盆景呈现丛山数百里，则采用“缩龙成寸，小中见大”，运用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艺术手法，把蜀中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雄、三峡天下险等奇丽风光，展现于游人前。“出巫峡”山水盆景，宽2.5米，长3.5米，其大堪称盆景之最了。盆中山峰突兀，怪石嶙峋，峭壁悬岩间，古柏苍劲，江波浩渺，沿峡而出。立其间观赏，不禁使人想起夏禹见神女的故事来了。传说，大禹治水之年，过巫峡畔在此遇神仙，传授驱使鬼神的符书于他，助以治水一臂之力。

出“西苑”，一株唐代银杏立于桂花林前。它在明代遭火焚，清朝又被雷击，大难不死，雅号“白果大仙”。这株树冠3.2米，高5.3米，重8.5吨的树桩，1980年冬从都江堰山中胜音寺古刹迁来成都落户，堪称园中一宝。在园艺工人的精心养护下，枝叶繁茂，显示了它强盛的生命力。

“国香园”内，兰棚里，“芝兰亭”四周，仿竹船亭水榭的绿树浓阴下，沟渠交错旁，可称为兰蕙的海洋。这里常年展出的春兰、夏蕙、秋素、冬雪约有两百种，达七千多盆。按兰蕙生长的习性特点修建的兰棚，既蔽日晒，又通风凉爽，着实匠心独运。棚内置放整齐，展出的有牙黄素、玉归素、线兰素、朱砂素、雪芳等较为名贵的品种，四季常青，放花时节，香风满园醉游人。

“兰叶摇皱一池水，春风送过满目秀。”我国人民喜爱植兰、赏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代文人墨客，咏兰的华文诗句甚多。曾记否：“二月春风卷地香，天涯芳草任徜徉。寻得幽兰报知己，一枝柳赠梦潇湘”。

《金漳兰谱》和《兰谱》专著，成书于13世纪。古往今来，我国画家笔下松、竹、梅被喻为“岁寒三友”；兰、菊、竹、梅则号“四君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邀日本友人松村谦山先生来我国观光。这位时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成都还“挤”出时间到人民公园桂花林下赏兰，津津乐道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兰草协会，从事宣传革命的趣事。20世纪5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赠给家乡人民珍贵的“墨兰”，至今生长尤佳。1961年，董必武同志在广州兰圃根据古人对兰的称道和兰原产我国，题下了“国香”二字。

兰蕙质朴，素雅而有四清，即气清、色清、神清、韵清。花可作药，也可制茶。用素兰配制的“香片”花茶，味纯绝雅，清香，生津解暑，是不可多得的饮料。

趁着游兴，我还仔细地鉴赏了植于“百花园”内的姿态苍劲的罗汉松。相传这两株罗汉松生长于宋代，前不久，从名山县迁到这里，饱经风霜的树干上已添青枝绿叶。园内时令花木也竞相开放，一簇簇，一团团，争艳吐芬，蓊茂可爱。正厅里展出组合成景的木化石，距今已有二亿年的历史，这是成都地质学院特地献给百花潭公园的。当代著名国画家冯建吾、苏葆祯、赵蕴玉、阎松父等的巨幅佳作，也在这里展出，辉映成趣，可谓今古奇观。著名诗人、书法家魏传统来此游览时，留下了“天府春色”的赞语。

展望未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针的指导下，百花潭公园将进一步完善其园林设施。依据著名作家巴金《家》、《春》、《秋》描述的园林而建的《惠园》和大盆景园、百花园等已呈现在游人面前。要不了多久，定会出现过去人们对百花公园的殷切希望：

百花潭畔集百花，
百态千姿竞百家；
百鸟枝头歌百曲，
百代游人赞百花。



文绝书妙　美不胜收

观赏成都武侯祠书艺

◎ 田旭中

位于成都的武侯祠，历来是成都的一大游览胜地。从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脍炙人口的《蜀相》诗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760年前，武侯祠就已古柏森森，具有相当规模了。唐、宋以来，不少高人雅士都曾到此凭吊古迹，游览休憩。他们或赋诗作画，或撰文题词，留下了十分丰富而珍贵的墨迹。今日的武侯祠，古柏苍松，竹树葱茏，殿宇宏伟，园林清幽，粉墙青瓦环绕其外，楼台亭阁掩映其间，成为驰名中外的名胜之一。

古老的祠庙，幽雅的环境固然使人流连，而那琳琅满目的碑刻匾联则更加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它们不但启人以思考、教人以知识，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就让我们循着参观路线来欣赏这里的书艺吧。

一进大门，绿荫如盖，碧草映阶。纵目望去，殿宇深邃。大门至二门之间，两旁矗立着唐、明、清石碑6通。其中最大的一通是唐碑，高3.67米，宽0.95米，厚0.25米，刻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全称为“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这就是誉满遐迩的“三绝碑”，由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工匠鲁建镌刻。因其文章、书法、刻技超群绝伦，故世称“三绝”。柳公绰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之兄长，官至吏部尚书，工书。其书法刚劲而见端和，浑厚而不失疏达，与其弟豪健劲紧的书风较之，则另有一番韵致，实为唐代楷书又一流派。“三绝碑”距今一千一百多年，字迹清晰，实在难得。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即以书法而论，亦够得上唐代楷书的上乘。

二门入口处，悬挂有近人刘咸荣撰书的对联（除此处外，诸葛亮殿、琴亭旁也有其书迹）。刘书兼有“二王”遗韵和山谷笔趣，以圆转流美、豪宕舒展见称，在蜀中享有盛名。

步入二门，翠柏参天，殿宇雄伟，这就是刘备殿。正殿两侧为东、西

偏殿，殿下左为武将廊，右为文臣廊，分别与二门相连，形成一座严整典雅的四合院。二门长廊壁间嵌有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石刻，前表由20块石碑组成，长约14米；后表由17块石碑组成，长约11米。二表分嵌二门长廊左右，形似二幅长卷，十分壮观。此二表刻工精良，墨底白字，宛如手书。游人至此，叹为观止。前后二表一千三百余字，一气沛注，淋漓酣畅，远观如电掣雷奔，龙飞蛇腾；细视则铁划银钩，顿挫分明。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粗或细、或疾或迟、或驻或引，随态运奇，无不适意。真可谓“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岳飞固然兼资文武、能诗能书，但是否手书前后二表，尚待详考。然而，此书笔力雄逸、结体遒丽、气韵生动，书法艺术价值颇高，则是不容置疑的。长久以来，岳书出师表深为世人所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景仰岳飞，另一方面与此帖自有价值不无关系。

步入大殿，左壁为10扇楠木板组连而成的岳书《前出师表》，形成高2米余、宽5米余的大幅木刻书迹。也许是排列组织适当的缘故（变横向为纵向），或许是木刻更易于雕刻，更觉岳书前表气势磅礴，绝妙之极。右壁悬有楷书《隆中对》木刻，为现代已故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1964年所书。沈书得力于“二王”，精于用笔。此书笔画丰润秀劲、结体俊逸、布局开朗、酝酿无迹，深得“二王”三昧，不失为尹默先生晚年精品。紧靠旁边，为6扇并连的木刻恭楷。这是清人姚晅书写的《诸葛亮传》。姚书端肃静穆，用笔方劲、结字紧敛，实在够得上欧阳询的嫡宗，不过已失欧书险劲特色而趋平整，使人不免有刻板之感。

东西偏殿分祀关羽、张飞，其上悬匾一为“义薄云天”，一为“诚贯金石”，均出自一人之手，但书者不详。其书大段法北碑，用笔圆劲醇厚、结体奇峭逸宕、篆分意味较重，因点画飞动，故有云鹤海鸥之态，实为善学北碑者。刘备殿后过道处，还悬有近人冯灌父的楷书“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笔力雄厚、体势苍遒，不愧为蜀中高手。

穿过刘备殿，眼前又是一重天。殿宇巍峨，古木苍烟，钟鼓二楼峙立正殿两侧，重阁飞檐，蔚为壮观。过厅门首，悬有两副楹联。一副为董必武同志1965年撰写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楷法兼有颜柳，凝重而精深、劲健而俊逸，体现了董老的高风亮节，博学多才。另一幅行书联为郭沫若同志1964年撰写的“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甚觉风流磅礴、意态高爽、逸气横溢，显示出郭老学者兼诗人的气质。入过



庭，仰首可见现代著名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徐悲鸿书写的“万古云霄一羽毛”横匾，凝练沉稳，亦极有特色。出过庭，回首可见冯玉祥将军撰写的隶书联“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芳于遗迹万古清高”。冯将军亦是身兼文武，书法以隶书著称。此联用笔沉稳、体势瘦劲，足见他于古人隶法历练较深。此处还有沈尹默的一幅杜诗联，也是风采动人，遒媚可爱。

徐步入殿，但见上首高悬“名垂宇宙”金字横匾，十分引人注目。此为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所书，强雄俊逸兼而有之，饶有气势。登上诸葛亮殿，悬挂在大门两侧的是一副为世人乐道的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撰书者为清人赵藩，云南剑川白族人，一度任四川盐茶使者。他1902年来祠游览，追思诸葛亮政绩，以“攻心”和“审势”命题，高度评赞了诸葛亮的非凡睿智。这副对联立意隽永，发人深省，故为人称道。赵藩师法颜真卿，此联笔力厚重，壮健宽博，颜味十足；虽系颜氏楷法，却楷中兼行，以静为动、化巧为拙，溶有己意，不愧善学颜者。殿内壁间，还嵌有十余通碑，以清人周厚辕书《蜀相》诗碑为最大，高2米余，宽近1米。周书也是学颜，圆浑宽绰，一望而知。出诸葛亮殿右行至鼓楼前，立有2通碑。其一为清人马维琪书“隆中对”，由3座石碑连成，高1.8米，宽1.1米。字如碗大。马书也取法颜，但能自成新意，一变颜体正方为长方，用笔苍劲深厚，体势雄强茂密，特有个性。赵、周、马俱学颜，三人且同具颜法，然又各得其妙，堪称善学者。诚如孙过庭言：“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这对我们今天学习书法仍有启示。还有一通“重修武侯祠记”的隶书石碑，高2.5米，宽1.1米，为清人李昶所书，笔圆而形密，工整而秀丽，隶法完备，足资楷模。

大殿内外还悬有多幅匾联，或篆或楷，或行或草，均自成面目，风格各一。

绕大殿走廊至殿后，壁间嵌有3通石刻。最长的一通为清人刘心源的篆书《出师表》，共计10块，一组5块分嵌殿阶两侧。此书笔划竖而直、细而匀，结体圆转合度、疏密有致，素有“铁线篆”之称，确是达到“婉而通”的境界。另外两通为行草诗碑。清人龙严所书杜甫《古柏行》，用笔瘦硬，结体疏落，率直天真，朴实无华，寓巧于拙，以熟为生，流畅老辣，格调甚高。明人张应登所书诗碑则全为大草，笔走龙蛇，奔放不拘，

一气天成，大有唐人草书遗韵。

下诸葛亮殿，左行经桂荷楼、琴亭，沿绿水涟漪的荷花池，穿“中有汉家云”的月洞门，眼前景色为之一变：红墙夹道，曲径通幽，竹荫蔽日，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夹道尽头便是刘备墓。墓前享殿悬挂有一幅别有韵味的隶书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此为已故四川文史馆馆长刘孟伉补书。他兼擅各种书体，尤精隶书。刘隶工力深厚，其运笔一变隶法凝重迟滞的成规而趋于疾速，故所书气流脉畅。此联行笔速捷而不感飘浮，造型多变而不显狂怪。

祠内近年来还陆续恢复和新增了不少匾联碑刻，书写者或为当代名流学者，或为书画界之耆宿，所书匾联也都各具特色。





千古众香城

◎ 郑建邦

成都，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曾有不少美丽的别名。秦灭开明氏后，张仪筑城，依龟行路线建城，别名龟城；汉代因织锦业发达，叫锦城；后蜀孟昶时大种木芙蓉，又称芙蓉城。然而，你可曾知道？它在藏族同胞的心目中，还具有一个非常富有宗教色彩的美好别称——众香城。

众香城的典故出自佛教巨著《大般若经》。那是一个春风浩荡的早晨，又是一个阳光旖旎的傍晚，还是一个虫声唧唧的秋夜，再是一个白雪皑皑的寒冬，它一直常啼都恭候在昙无竭的身旁，请求他说法。年复一年，一共候了7年，昙无竭没有开口。突然，常啼想到："妙法殊胜恩德难补，虽鲜花，不如体供。"于是，从头上拔下一枚闪光的金针，拿到手里，向着肤光灼灼的肌体刺去，碧血燃亮了常啼的眼，脸也被映得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啊，碧血！"昙无竭喊了起来。就这碧血，不知染红了多少比岩浆还要炽热的希望；就这碧血，不知凝聚了多少比彩虹更加瑰丽的理想。终于，昙无竭张开洁白的牙齿，牙缝中流出涓涓的智慧。这时，大地上洒的是碧血，化为珍贵的旃檀妙香，香遍全城。美丽的神话故事虽然完了，汉藏的同胞情千百年来一直流传下来。藏族同胞确信众香城就是成都，洒血的地点就在昭觉寺。从古至今，不少藏族同胞朝了昭觉寺还将红色的泥土带回去，作为永悟的纪念。

成都，藏族同胞为什么这样爱戴你，把你奉为舍身求法的圣地来朝见？历史上的成都，由于地理原因，不似大江南北战争频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流入众多的杰出人才，高僧巨贾形成大西南经济文化的重镇。1944年在成都附近发现了梵文陀罗尼经卷，印有咒语的经卷右边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买经咒"的汉文题记。经文是用唐代著名的成都产茧纸印刷的，这证明成都在唐代就是一个雕版印制业务的重地。"十年浩

劫”中，当作“四旧”焚毁的能海法师从西藏带回的茧纸印刷藏文经典，还是古代藏胞从成都购去的。由于成都是木板雕刻印刷重地，到了北宋开宝四年，中国第一部《大藏经》的印刷就选择在成都，花了3年时间刻板13万块。这部《开宝大藏经》印本，从成都很快传到日本、朝鲜、西夏。《高丽藏》《契丹藏》都是以它作为范本。

古代藏族信徒读着成都印刷的经典，捧着鲜红的泥土，怎能忘记常啼洒血求法的故事、怎能忘记成都劳动人民印刷的藏胞的经文！



竹枝词与成都传统群众文化活动

◎肖　吴

“竹枝”是古代流传于四川东部的一种将音乐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义》中谈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中唐以后，这种民歌流向城镇，成为一种诗体，明清乃至民国初年，文人们开始大量写作竹枝词。

竹枝词，七言四句，“所以记风土，讽时尚也”（《清代北京竹枝词》）。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竹枝咏风土，诮细诙谐皆可人”。反映民风民俗是竹枝词的最大特点。千年古城成都，以她恬静优雅的生活，淳厚朴实的民风，引得多少骚客诗人流连忘返，沉醉于成都那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有感而发，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竹枝佳句，其中反映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的作品占有突出的位置。在他们有意无意地描述中，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研究成都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春　节

春节，是每年群众文化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期，反映这段时期的文化活动的竹枝词也较多。

闹年锣鼓迎来了除夕。《成都年景竹枝词》云：

景运初开事未繁，闹年锣鼓满街喧；少年最爱翻花点，每学班子打《十番》。

一到除夕，首先要贴春联、换门神。《成都年景竹枝词》有词二首，各咏其事：

桃符半旧半新鲜，阴历今朝是过年。邻女不知春来到，寒梅来探倚窗前。

把户尊神气象豪，虽然是纸也勤劳。临年东主酬恩德，尽与将军换新袍。

年末的守岁，接连不断的爆竹声是春节的一大景色。《蜀中新年竹枝词》云：

楣拙烧残岁已终，各家灯竹闹匆匆；焚香竞说开门早，此日迎神应向东。

过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

随着鞭炮声声，便宣布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了。

正月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人们都希望能碰上如意的事情。成都人都喜欢出南门，上庙宇“游喜神方”。《蜀中新年竹枝词》云：

烧香幸福占头香，又叫旁人话吉祥：米价平常蚕市好，今年喜事在家乡。

这风俗一直流传下来至今，旧历春节游武侯祠仍然是一项热门的春节活动。

贴贺年片、拜年是又一点染春节气氛的项目。《蜀中新年竹枝词》云：

队队衣裳簇簇新，相逢道喜贺新春。无愁百岁惟今日，醉里何须谢主人。

春节期间，成都街头到处可见春官说春。《成都年景竹枝词》云：

乞儿得意做官时，袍带乌纱手内持。说过千门恒炫耀，春官常挂嘴唇皮。

正月初七叫人日，成都人还要相约去游工部草堂。《锦城竹枝词百咏》云：

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

人日游草堂是成都人民为了纪念杜甫这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这一风俗也一直相沿至今。

正月初九又叫上元，相传是玉皇大帝的诞辰，全城都要挂百果灯和耍狮子、舞龙灯为玉皇祝寿。《锦城竹枝词》云：

水仙花送倍芬芳，百盏珠联供玉皇；狮子龙灯从此出，沿街花灯惹衣香。

今日，玉皇大帝这尊偶像早已不复存在了，而耍狮子、舞龙灯却作为一种民族的传统舞蹈项目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它的特点是“闹”，玩花灯、烧龙灯、耍狮子、猜灯谜都少不了要闹，民间叫做闹元宵，自有它的道理。先看闹花灯，《锦城竹枝词》云：

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锦城新年竹枝词》云：

鳌山万架喷烟云，油壁锦鞯夹路纷。看到万花丛影里，遗钗争拾暖香熏。

这两首竹枝词，把万人空巷、十里彩灯的盛况生动地记录下来了。

再看舞狮子、耍龙灯，《成都年景竹枝词》云：



花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采莲船。

《成都竹枝词》云：

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堪称。

我们今人已从这些前人的字里行间看到那种节日的狂欢了。

猜灯谜，也是元宵节里一项有趣的活动。《春节游竹枝词》云：

春灯谜子递相猜，惹得过迂学子来。漏下二更人影散，可怜灯下尚徘徊。

今日猜灯谜，已成为老少皆宜的一项文娱活动，春节各地都举办猜谜晚会。那些在“灯下徘徊”的，当然不会仅仅是“迂酸学子”了。

花　会

每当二月春好，成都青羊宫花会如火如荼，十分热闹。《锦城花会灯竹枝词》叙景述情，惟妙惟肖，特有风趣，把花会的全景推及眼前。

春风吹到锦江滨，绚烂春光上巳辰。怪道沿街声不断，买花人唤卖花人。

轻寒轻暖艳阳晨，一路繁华景物新。妾欲笑花花笑妾，大家颜色为争春。

青羊宫里似星罗，乘兴家家戴酒过。小妹戏呼阿姊语，今年人比往年多。

《锦城竹枝词》中还对花会的整个热闹场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

城南十里尽栽花，翠翠红红处处遮。最爱路旁连理树，愿教移植在农家。

小园闲步望晴岚，指点枝头睡正酣。莫谓海棠饶妩媚，有人树下更娇憨。

把花会中繁花似锦，赏花人高兴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花会中乘兴而来的钓鱼者是这样描述的：

戏举兰桡皓腕舒，江头新涨涨红裙。丝绳争系杨枝上，笑掷波中钓鲤鱼。

那花会中打秋千者的媚态美颜更是跃然纸上：

血色罗衣映日鲜，瑶阶步步艳生莲。秋千戏罢桃花下，红雨缤纷润一肩。

真乃别有一番情趣。

踏　青

每年清明前后，溪草青青，一时成都人流如潮，蜂涌出城郊游，老少相携，设帐宴饮，并同时开展打秋千、放风筝、踏毽子等文娱活动。踏青特别受到当时妇女们的喜爱，《药王庙竹枝词》云：

浓妆淡抹费安排，姐妹相邀步履偕，珍重街头须缓缓，恐他泥污踏青鞋。

《春游竹枝词》云：

暮春天气踏青游，笑向阿郎话不休；蝴蝶也知侬意乐，双双飞上玉人头。

妇女们踏青郊游时也感受到穿风头鞋的不便，而愿意放脚。《锦城竹枝词百咏》云：

踏青休绣凤头鞋，天脚于今更大佳。白首糟糠偕到老，何须十二列金钗？

踏青这种活动深受成都人民的喜爱，有一诗人专门做一首竹枝词描写当时的盛况：

新年送罢觉无聊，转瞬良辰隔一宵。踏青芙蓉城外去，人山人海路迢迢。

倾城出动，大有万人空巷之势。

放风筝

在成都少年儿童中，放风筝活动历来十分盛行。《锦城竹枝词》云：

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马尾辫牵牛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

作者在这段诗后注中谈到："春天，东较场众少年赛风筝，亦一好光景也。风筝如美人、鱼、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可见，当时风筝的品种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成都竹枝词》中也记载了春天时节儿童放风筝的情景：

微和澹荡锦官城，柳色青青天气晴，三较场中宽敞好，儿童逐队斗风筝。

《续青羊宫花会竹枝词》中记载了青羊宫花会时放风筝的活动：

一叶风筝忽上升，轻浮竟遇好风乘，任他高入青云路，牵引无非仗宝绳。

当时放风筝的活动在妇女中也很盛行。《锦城花朝竹枝词》这样写道：

向晓晴曦挂头巅，和风吹透杏花天。莫嗔使女偏多事，偷把红丝系纸鸢。

端午龙舟会

清末民初，成都每逢端午节，不唯民间自发组织龙舟竞赛，政府当局也很鼓励这一活动。它一般都在锦江举行。《锦城竹枝词》云：

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



《江楼竹枝词》云：

绿波如镜欲浮天，端午人游锦水边。画桨红桡齐拍水，万头争看划龙船。

真可谓观者如云，比赛获奖称作“夺龙标”。有《成都月市竹枝词》咏道：

端午会过夺龙标，心字香儿约半烧，一步朝天须一拜，恨郎腰瘦太苗条。

重阳登高

重阳登高，是广为流行的一种节令活动。在《成都月市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关于当年成都重阳登高的竹枝词：

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闹寻药市穿芳径，多卖茱萸插满头。



观成都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出驾

◎ 白景纯

旧社会的成都市，纯粹是一个消费的城市。由于地处盆地，气候四季分明，周围县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些官僚军阀、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就把这个地方作为安乐窝，以致“两极分化”突出。广大劳苦群众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靠挣一天吃一天，买“升升米、把把柴”过生活。在苦闷中，一些人精神上十分空虚，只得把思想精神寄托在鬼神身上，认为今生贫穷，是前生没有做好事，今生相信鬼神，求神拜佛才能求得解脱，达到来生的富贵荣华。由于这种愚昧无知，所以迷信活动极为普遍。特别是对城隍菩萨的信仰，可说是五体投地，认为城隍菩萨是主宰人们今生和来世的善恶祸福。除平时到城隍庙去焚香求愿外，到了城隍菩萨出驾这天，很多人不惜出钱出力，办理出驾事宜，搞得十分热闹，全城轰动。

成都当时地方官的衙门，是成都府辖华阳、成都两县，相应的城隍庙也有府城隍庙和华阳、成都县城隍庙。每到出驾这一天，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都要“请”出来巡行。坐落在外北万福桥侧的成都县城隍菩萨的出驾行列要提前摆队到盐市口，坐落在昭忠祠街侧的华阳县城隍菩萨的行列也要摆队来到盐市口，等候坐落在东城门口（即今东大街附近）的成都府城隍菩萨一起出巡，名曰“两县迎府驾”，然后绕城一周，各归本庙，以达到扫除瘟疫、百姓平安的目的。这一天，全城万人空巷，都要到城隍菩萨出驾所经过的街道来敬香和看热闹。

城隍菩萨的出驾日期，在清朝时，要三年才出驾一次。后因历年战祸，百姓死亡太多，兵燹之后，又是瘟疫，人们认为这是作恶所造成的。城隍菩萨忙于收容和处理大量死魂，便把三年出驾一次改为一年出驾一次。到了1931年前后，竟是一年出驾三次了，那就是每年三月“清明节”一次；七月半“中元节祭孤”一次；十月初一“牛王节”送寒衣一次。





城隍菩萨出驾的筹办，由富商大贾、各行会、袍哥等组成一个“城隍会”，名曰“会首”，专司全部事宜。他们乐意参加，不但出钱，还要出力，再加以善男信女的赞助，经费是满充足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消灾免难，或求寿，或求子，或忏悔，城隍菩萨是有求必应的。

出驾的前一天，参加出驾的各部门，都要把道具摆出来，任人参观，名曰“摆摊子”。如喜神组（即扮成凶神恶煞的五猖、鸡脚神等，人们忌讳凶恶的字眼，改称“喜神”）把面具、刀叉、衣服等陈列在戏台两边的看楼上，各种旗锣伞帐、香盘、提炉等都要摆成高堆，各乐队就在庙内随时吹打演奏，加以香烟缭绕，呈现一派神鬼局面，令人不寒而颤。到了夜晚，扮喜神队的人员把妆化好到城隍殿上肃立，名曰“为城隍菩萨站班”。这时，还有的人跪在菩萨神案前，两手各执一只点燃的蜡烛，要跪到蜡烛燃完才起身，表示虔诚忏悔和祈祷，名曰“跪蜡”。这种活动，要闹到半夜才停止，然后去准备第二天出驾的事情。

出驾的行列情况，大约是这样的。

一、清道

在一个木架子上置一铁锅，锅内燃起柏树枝，由两人抬着，走在最前面（两架或三架），使沿街烟雾缭绕，以消除秽气，名曰“熏秽”。

二、开道

由两人并排，每人肩上挑一竹竿，竹竿尖端悬一面红旗，挂一铜锣（名曰“道锣”），边走边敲。一些扮成皂隶的人，手提和肩挑着各种刑具边走边吼“喔……”，名曰“开锣吼道”。

三、净道

由两人扮成皂隶模样，手执长鞭，名曰“净鞭”。边走边把鞭子敲在地上，发出“噼、噼、噼”的声音，指挥人们“行者止步、言者息声”。头上包有白帕子的，要马上取下来，以示神灵的威严和对神灵的尊敬。

四、仪仗队

无数面彩旗和十多顶红色幡伞迎风招展地徐徐拥进，接着是“威仪

牌”，上面写着“肃静”、“回避”及神号等字样。有工艺特色的幡伞也跟着走来，即根据各行各业所产的成品扎成的伞，如五谷伞、蔬菜伞、花色丝线伞、绫罗绸缎伞、瓷器伞、水果伞等，真是玲珑满目、美不胜收。另有一人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行走其间。

五、喜神队

每个庙，都有几起喜神队，穿插在出驾行列中行进。每个喜神队都由一个小孩腰上插一杆有“巡风”二字的小旗，手敲铜锣前导；紧跟着是一个赤发蓝脸、身穿铠甲、头生两支角、手执铜锤的开路神，接着就是手执钢叉的五个花脸（名“五猖”，分阴五猖和阳五猖）；手执铁链、雨伞，口内拖着长舌、腹部带起凸起的腹具的鸡脚神（脚上绑的纸做的鸡爪）；头带白高帽，一手撑油纸雨伞、一手拿着有“正在拿你”四字的木牌，也是口吐长舌的无常（人称“吴二爷”）；用猪肺作面具、用猪肝作长舌、周身涂上蓝色的靛脚子、手执雨伞、耸起肩头斜起行走的油腊神；后面是判官、小鬼押着披枷带锁，身披色衣的犯人，其中有带耳箭的、有钢刀穿腹的等等。

六、挂灯队

参加的人数不等，每个人都是赤膊，两膀用木衬子支着，使两膀与肩固定不动和平衡，用铁皮做成的清油灯燃烧着，破皮挂在头额一盏、两膀各一盏、背部两盏、胸部两盏的皮肤上，共七盏灯，清油烧热灼着皮肤，忍受疼痛前进，以示虔诚忏悔。据说这挂灯是屠宰业的人为忏悔杀生害命而举行的，但更多的是孝子为父母祈求平安而举行的。

七、孝友会

这是参加的乐队之一，也是旧成都的一个特种行业，它的成员都是靠此为生的。敲打乐器有“脚盆鼓”（形似脚盆）、铜锣、小锣、铁钹、铜铰、唢呐等，其节奏与其他乐队不同，有特殊的乡土味。他们平时受丧家雇请，为丧家开吊时担任“迎门吹”、叫礼（即“司仪”）、出殡送丧，晚间还为丧家做“三献礼”仪式。



八、罗全善扮的判官

府城隍出驾的行列中，有一两眼圆睁、身背大算盘的判官模样的人，这就是罗全善。其人平时自称是城隍的差人，白天在阳间，晚上到阴间服役，能知每个人的生死祸福，经常走阴，为阳世人与阴曹鬼魂传递信息。人们说他手上的汗毛，长成一条龙形。他就靠以鬼神迷信骗人为生，有时他于傍晚在街边说善书，人们看见他，都起畏惧之心。

九、提炉、香盘队

这是各行各业组成的香棚，每个棚都用白布缝成长七八米至十几米不等，四角及棚边用竹竿支着，每竿由一人撑起，大家一齐行走。棚下是许多提香炉和捧香盘的，提炉是用木棍作械竿，竿头雕成龙头，油漆贴金，从龙头上系一丝线，下挂小香炉，炉内燃着檀香或檀香木，沿途香气四溢，令人心沁。棒香盘的则是每人端一四方小木盘，盘的前端，配以彩镶桌围的样子，盘内分别摆着檀香、鲜花、小青油灯、清水、水果等礼神的供品。每个棚内还配有细乐（笙、箫、琴、筝）和大乐（川戏锣鼓或闹年鼓），真是鼓锣喧天、笙箫清脆、香烟缭绕，呈现一派肃穆而热烈的气氛。这种香棚和乐棚，约有十多组走在靠城隍菩萨的神轿前面。

府城隍出驾的行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组乐队，是由居住在和尚街一带长机业中的重庆人所组成，他们的乐器小巧玲珑，敲打节奏十分幽雅，称为“渝锣”。可惜现在它已绝迹了。

十、白衣会

这是约百人组成的抬城隍菩萨八人大轿的轿班。其成员大多是各行业的老板和码头上的袍哥，据说还有川剧艺人参加，他们的服装一律是白大绸制成的上下装，因此称为“白衣会”。他们轮番争着抬城隍菩萨的八人轿，还用两人扶轿。他们认为抬过城隍菩萨的人，可以长命百岁，消灾免难，邪鬼不敢近身。

十一、后拥

当神轿经过各街道时，两旁的住户和店铺，都要焚香膜拜。神轿后

面，是一些手执金瓜、钺斧和小旗的人，还有一批善男信女燃香随行，称为“后拥”。

一府两县的神轿在返回时行至盐市口，两县城隍菩萨要参拜府城隍菩萨，即抬府城隍神轿的人抬着不动，揭开轿帘，抬县城隍的轿伕，用手提着轿竿，使轿子低于府城隍的轿子，表示对上级的参拜，然后分道回驾。在回驾时，鸡脚神的链子上往往锁着花眉花眼的鬼怪，这些鬼怪，就是城隍菩萨出巡时，缉拿的瘟疫霍乱的作祟者。扮演这些鬼怪的人，都是自己许愿来表演的，有的为已死的父母解罪，有的是为减少瘟疫霍乱的流行。如果城隍菩萨出驾后，瘟疫霍乱仍然流行不止，死讯甚多，一致都说是人心险诈、在劫难逃，出驾后要唱几十本戏，以目莲救母戏为主，其它因果报应的戏为辅。

至此，城隍菩萨出驾劳民伤财的活动，方算结束。



少城春秋

◎ 戴盛昌

外地人游成都，至东城根街，常奇怪地问："据说皇城是旧成都府的中心，为什么城西边的街道却叫东城根街？""老成都"向他解释："东城根一带是旧成都府少城的东垣，东城之根嘛！"提问者更加不解："啥叫少城？"对这个问题，尽管是"老成都"，也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那就让我们一起，到古蜀典籍，历代方志，骚客诗篇，墨士文稿中，涉猎一次少城的沧海桑田吧！

早在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时，成都便有太城（亦称大城）和少城（亦称小城）了。《辞源·太城》条说："太城，城名，即今四川成都市旧府城之南城。相传为秦张仪、司马错所筑，一名龟城。其西城称少城，又曰小城。"

相传秦并巴、蜀后的第六年，即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丞相张仪，蜀守张若在建成都城时，遵照秦制，依样咸阳，于太城的西边，建造了少城，并在少城中"修建闾阎，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见《华阳国志·蜀志》），使少城比太城更为壮观。这就是成都少城史的开篇。

由于成都地近西南边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很重要的位置。从秦、汉、蜀汉以至后来的晋王朝统治者，对成都的建设都十分重视，对少城的装点更倍加关切。他们为少城开九门，城中"广填华屋，置楼、观、榭、阙，并饰以金碧珠翠"（见《西阳杂俎》），使整个少城好似天宫神宇一般。故前人有诗赞少城说："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扬州是我国江南名城，它以豪华秀丽而见于史上，说扬州不如成都，虽然夸张过头，但少城的壮美也可想而知。

我国古代，城墙是作为防御体系而兴建的。在城上建屋宇、造楼阁，除供守城将士居住外，还为了显示城郭的雄伟和壮观。少城也不例外。少

城上的楼阁也是从张仪开始建造的。它的建造，还为了标示城市的方位。《成都古今集记》说："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城楼以定南北。"张仪筑的少城，有门就有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仪楼。《益州记》说："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宣阳门，次西曰宣明门，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

张仪楼相传是张仪建成都城的遗迹。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宣明门和张仪楼的遗址，当在今天的柿子巷内。它的正南面的金河一段，就是昔日郫江故道。这座历史名楼临街瞰江，高跨城门，高轩朱扉，重阁复道，是自秦至唐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中，闻名蜀中的重要古建筑。因为它高百尺有余，汉代称它百尺楼，晋代叫它白菟楼。晋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重楼结曲阿，飞宇起层楼。累栋出云表，峣峰临太虚。高轩启朱扉，回望畅八隅，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对张仪楼的外观和气势，作了形象的描绘。

不知是战乱焚毁，还是楼古朽败，张仪楼在唐代中后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座古楼台——筹边楼。

筹边楼是少城的又一座颇有名望的古楼台，由李德裕主持兴建。李德裕又叫李文饶，他是唐代中后期的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丞相。唐文宗（李昂）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入川帅蜀，负责处理西南边防要务，筹边楼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建成的。《旧唐书·李德裕传》说："李德裕建筹边楼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画帝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可见李德裕建筹边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登高远望，而是为了筹划边防事务。著名女诗人薛涛在赠李德裕的《上筹边楼》诗中写道："平林云鸟入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上见边头。"

筹边楼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直到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还慕其名，重建筹边楼于"子城西南隅"（见《蜀中名胜记·成都府》）。楼成后，范成大作《水调歌头》颂其事，有"万里筹边外，形胜压坤维"之句。筹边楼在少城屹立了八百多年，直到明代，还保存着。

成都少城，有许多历史名人在其中居住过，如汉代的扬雄和严遵。扬雄，字子云，是汉代著名文学家，移居长安之前，居住在少城内。《寰宇记》说："子云宅在少城西南，一名草玄堂。"也就是与"南阳诸葛庐"齐名的





“西蜀子云亭”。现在的成都市第十三中学校就是当年草玄堂的故地。严遵，字君平，是汉代著名的学者和星相家，成都人--提到他就会联想到支卯石的故事。现在的君平街，是他当年住家之处，支卯石街曾是他卖卜的地方。又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丞相府就在少城内。诸葛亮还曾在少城筑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见《太平寰宇记》）。武侯去世后，他的相府一直保存着。过了一百三十年，即东晋永安元年（公元 304 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国后，在其宅基上建立了成都的第一座武侯祠。此外，汉代的大教育家、蜀郡太守文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等名人，也在少城居住过。

少城和成都大城一样，也是屡经战乱，屡遭毁败。第一次大毁败是在东晋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大司马桓温入蜀，征成国灭李氏政权时。这次破坏十分严重。据《方舆胜览》记载：“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桓温为什么要这样下狠心呢？《酉阳杂俎》说他是“怒其太侈，焚之”。此次破坏，影响久远，直到二百三十多年后的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封其子杨秀为蜀王，才把少城重建起来。

杨秀重建的少城，经以后各代的建设装点，又繁盛起来。唐代就有“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的比喻。到了五代，前蜀国和后蜀国的宫殿都在少城之中，他们对少城的装饰更加不遗余力。再经两宋时期的建设，少城就更繁华了。“……城中雄繁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晚登子城》）从陆游的诗句中，对少城的繁华景象，可以领略个大概。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成都又一次遭受最严重的破坏，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连城郭都被摧毁，少城当然也不例外。清王朝统一全国之初的成都，完全是一片破败景象。顺治十七年（公元 1660 年），巡抚司道田保宁率兵入成都时，接管的是一个满城颓垣断壁的烂摊子，他只好“草建城楼以居”（见《成都县志》）。康熙五十三年（公元 1714 年）开始动工重建成都大城。过了四年，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又附大城西南另建小城，作为“八旗”营地，专供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满城”，也就是少城。《成都县志》说：成都“有少城大城，少城一名子城，今满城也”。

但是，满城的建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酝酿到建成，前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清王朝建立初期，实行民族统治政策，再加上在服装

和削发等方面推行强制措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此，清军一入城，就把官吏、军队及其家属集中在少城遗址一带居住，这就是满营。最初，进驻成都的满蒙“八旗”军队，是从荆州抽调来的，所以称为“荆州营”。当时没准备久住。三年后，清廷从赴调的3000名兵丁内，留1600名永驻成都，其余归回荆州。康熙末年到雍正期间，成都旗军仅由副都统统率。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阿桂镇压了大、小金川少数民族起义后，奏请清廷，在成都特设将军一员，统率旗军，“控驭”西陲。旗军人数，自乾隆之后陆续增添，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达2673名。

驻防少城的“八旗”，无论是官是兵，俱可携带家属。为了减少满、汉的接触，避免民族冲突的发生，清政府又从外省调入部队，驻在满营周围。从福建调来的部队，设大、小福建营（在今西玉龙街）；由宁夏调来的骑兵，设宁夏营（即今天的宁夏街）。还从西北移来大批回民，迁入满营西侧居住。这样，就在满城西侧，设置了一道“防御”或缓冲地带。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由年羹尧主持建筑的满城，周长四里五分，高一丈三尺八寸。城门有五：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4座城楼，共12间（见《成都县志》）。今天的东城根街，就是当时满城的东垣，也就是大城的“西墉”。满城的大东门，称受福门，在祠堂街口；小东门称迎祥门，在东门街口；北门称延康门，在东顺街口；南门称安阜门，在西较场中；西门也是大城的西门，称清源门，在西大街口。

同历代的少城比较，满城的建制有许多不同。整个少城共建大街8条，沿大街又建32条胡同。大街称“官街”，小巷叫“兵丁胡同”。胡同沿官街排列，就好像是条条蜈蚣，街是身躯，胡同是脚脚。

由于满城是专供旗人居住的，“八旗”的许多重要官署，都设在里面。这些官署中有：将军衙门（在今将军衙门街）、左司（在今东胜街）、右司、恩赏库（均在今西胜街）、都统衙门（在今长发街），以及火药局、永济仓等等。今天的多子巷，原称刀子巷，是八旗的刀剑铸造地。满城中还设有官学1所，由“八旗”官办，选“八旗”优秀子弟入学；义学24所，由各兵队筹资金自办。后来又增设少城书院，定期讲学，可以推荐成绩好的学生做官。

满城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对于汉民是不可逾越的禁区，城内的防卫也很森严。除了五座城门设有卡房外，又在各街要隘和各条胡同增设步军营





大卡和夜巡卡共36处，各条街巷还设立栅子。今天的栅子街，就是它的遗名。这么多的官署、营房、大卡小卡，把整个满城填得满满的。

满城居住着满洲人和蒙古人。据《成都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满城初建不久，城中居住的满、蒙人仅2000余户，5000多人。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就增加到4500多户，13700多人。根据清王朝规定，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享受特权，“尔旧尔宅，月赐银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坐吃俸禄，全靠各族人民的血汗供养。满城中的恩赏库和永济仓，经常装得满满的。单就永济仓（遗址在今小南街）而言，每年都要装满从成都、华阳、新都、双流、温江、郫县、灌县、新津、新繁、金堂、什邡、彭县、崇宁以及崇庆州、汉州（广汉）、简州（简阳）十六个州县运来的2288石大米，计92万多斤。按清政府要求，这些旗人和他们的子弟，应日习武功，勤练骑射，骁勇者方能披甲做官。但是，随着全国的统一，形势安定下来之后，这些旗人就不再那样积极地去习文练武了。坐吃俸禄，天长日久，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懒惰下来，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清朝中、后期，满城中那些享有特权的居民们，成天拖着两片鞋，手里不是提着鸟笼就是团弄着铁弹子，整天出没于茶馆、酒肆、妓院、赌场，从小到老在养尊处优、百无聊赖中混日子。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不得不承认蜀“八旗”子弟“吸食鸦片，开聚赌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而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一十二“兵”）曾国藩道出了当时八旗兵的腐败没落情况。他们祖先的那种精于骑射，能征善战，生气勃勃的精神，早已丧失殆尽。可以这样说，满城旗人的堕落，就是清王朝腐朽没落的一个缩影。

还值得叙及的是少城公园的开辟和对外开放。满城的东南角，原是一处风光明媚的地区。那里林木翠竹成荫，假山溪水遍布。金河水从西北流来，从此分成两股，一脉南流，一脉东去，河两岸假山上下，建造有众多的楼台亭阁。池水清波荡漾，圃园百花争芬。真是景色四时新，幽意畅于怀的去处，名声早传于外。辛亥革命前夜，当时的成都将军玉昆把满城东南角划出来，增建一些楼台水榭，圈养一些虎豹鹿狐，设几处茶坊酒肆，置备了棋弈射场弹子球，使之成为一个游乐的处所，主要供旗人游乐，也向汉人开放。这就有了少城公园。成都有公园是从此开始的。少城公园的开辟和开放，打破了满城这个神秘的禁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开始

进出满城，人民之间的往还交谊也日益增进。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王朝宣告倒台。这时，从杭州、荆州、西安等地仇杀旗军的消息传到成都，满城上下，异常惊慌，以为火亡之祸迫在眉睫。实业街的三英小学，就成了满族群众聚议的地方，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讨论怎样应付这一剧变。有些人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死斗。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来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老幼妇孺先行自杀，精壮青年便扑向汉城，拼个你死我活，形势非常紧张。尹昌衡就任督军杀了赵尔丰之后，形势越发紧张起来。后来经过满、汉士绅和四川军政府一起谈判，反复研究磋商，达成了和平解决满城问题的协议。条件是：旗兵交出枪支武器，军政府一次发给旗兵每名3个月的饷银，并拨20万元修建同仁工厂，收容穷苦旗民学艺，解决他们的生活。这样，一场民族仇杀的风波，顺利地平息了。辛亥革命以后，首先拆除了满城的东墙，正式开放满城。随着光阴的流逝，满城作为禁区在人们头脑中也失去踪影。



成都风情小拾

◎ 龙在天

“春官”和“财神”

旧时的成都，过大年是个重要的节日。那时不用公历，只用农历，城乡官民，都以农历纪事过节。春节，乃一岁之首，故特别隆重。这里不详述春节前后名目繁多的典礼祭祷活动，只谈在成都过春节前能见到的独特的现象：送“春官”和迎“财神”。

春官，是官职名称。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掌管朝廷礼节的官员叫春官。到唐宋至明清，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叫春官。但在晚清至辛亥革命后，这一官衔名称却转化成《春牛图》的俗称。《春牛图》就是来年的简要年历，系用木版雕刻印刷的黄表纸制成，大小类如现在的十六开纸页。图的最上方是“春牛图”三字及喜庆对联，上部印有农夫吆牛犁田图像，下部标明一年十二月的大小月份和农事二十四个节气的日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些节气旁又标上了公历日期和星期序数。那时因印刷条件落后，日历和年历式挂历不普及，一般人家有了一张《春牛图》，就能知道一年的大致月份、日期，推算起来也较方便。这种木刻印刷品，大多是成都几家木版印刷厂制作的。只需雕刻60块木牌，一年印一块，六十年一轮，上面反正印些喜庆字句和对联作为陪衬，就可世世代代用下去。本来这种简要年历，放在书店出售无不可，但人们为了讨个吉庆，不出外购买，自有“春官”送上门来。

在旧社会，乞丐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有行会组织，有乞丐袍哥社团。各社团划分有叫化乞讨的市区范围。每到春节前，乞丐们早和木版印刷业达成协议，印出的《春牛图》由他们包下，各自划分街道范围，在

腊月间，沿家挨门挨户，在早午晚饭时，边说、边唱站在门口，等主人出来，赠送一张“春官”，主人顺手给点钱作为报酬。当然，赏钱是大大高于一张黄表纸的价值的。送者得赏，收者得喜，皆大欢喜。

迎“财神”，是在正月初一这天，由乞丐和无业游民扮的“财神”到各家各户门口亮相。但这时对乞丐不能叫讨口子或叫化子，送纸“春官”来时不叫“春官”，这一天应叫“财神”。他们的打扮，也不同于以往穿襟襟、挂绺绺、手拿打狗棒、破饭碗，而是花钱租用一件戏衣或借用一件色彩鲜艳衣服来笼起，头戴一顶彩纸糊的官帽，口挂一串玉米胡须，脸上抹点油彩，右手执一根甘蔗做的金鞭，左手捧一托盘，盘盛金银纸（香烟盒中的金、银箔纸）糊的元宝，象征金山银山，脚背上用黑纸糊个靴桶子，底下是草鞋或光脚。谁见到这副滑稽打扮，都会忍俊不禁。他们来到谁的门前，扬鞭托盘，大瞪双眼，直望主人并不开口。任凭火炮在身边爆炸，火星溅到脸上，也不开腔。按惯例，“财神”开口，就要蚀财。所以，他往谁家门口一站，谁家主人认为“财神”临门，是个吉庆，因此都要给点喜钱。“财神”拿到钱，也不同往常要千谢万谢，而是高昂着头，高举“金鞭”，再往第二家走去。过去当乞丐，总是被人骂、遭狗咬，讨残羹，得剩饭，唯有正月初一扮“财神”，是扬眉吐气、昂首做人，过真正的盛大节日。

烧龙灯

舞龙灯，是我国各地流行的民间习俗。在成都，旧时玩龙灯，大多在正月初一“出龙”，正月十五“烧花”收龙，要玩半个多月。遇到年辰不好，一般在正月初九才“出龙”。龙，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神灵，帝德天威的象征，功瑞吉祥的标志，国脉天宝之所在，勇武刚健的徽记。尽管皇帝老倌把龙的图腾、徽记、称号统统霸占了去，但民间玩龙灯的习俗却世世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正月玩龙灯，旱灾玩水龙，水灾祈龙退，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仪式。舞龙灯需要技巧、力量和队形变换、调动，因之就有组织。这种组织，大多为袍哥帮会（称为码头）或行会组织。由于行业不同，扎制的龙也各有特色。匹头行的多为丝绸龙，竹篾行多为竹龙，灯笼行为纸糊巨烛龙，蓆草撂扇行为草编龙，还有花匠们的花龙，蔬菜业的菜



龙。舞龙的人则多为年轻力壮的各行各业的店员、徒弟。每到腊月便要组织起来制作彩龙，演练队形，选择游行路线和停下舞龙的“场口”。玩龙灯时，一般选择傍晚出动，以锣鼓为前导，灯笼开路，龙灯随后。行前，灯会派一人打前站，持灯笼和印有“某某老龙会恭贺春喜”的大红片子，顺着已选择好的路线，到沿途富有人家谒见。这户人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纸封封（裹的是银元、钞票）或一幅不少于六尺的红布、红绸作为“彩头”回赠，并准备好必要的烟茶糖等，抬出桌子放在空阔地点（一般是天井）。这时，龙灯队伍来到空阔地，随着鞭炮齐鸣、锣鼓铿锵，舞龙灯的人赤膊光腿，只穿短裤，跑动转圈舞将开来。围观的人不住燃放鞭炮，呐喊助威，有的还点燃“花”（筒形喷火花的焰火）射向龙灯和舞龙灯的人。舞龙灯的人虽赤身，但焰火喷在身上瞬间即熄，故不致造成伤害。而围观的人却更加兴奋，鼓掌吆喝。龙灯队第一队舞完后，散坐饮茶吸烟领赏，第二队又舞动开来。就这样，一队舞罢，再来一队。从擦黑直闹到深夜，人们簇拥着龙灯向远处走去。

舞龙灯，是喜庆的标志，强身健体的竞技活动，因而延续很多岁月，至今不衰。

过去，在群众口语中，舞龙灯有时又叫烧龙灯。这是指正月十五深夜，全城各路龙灯，都要游行到北门府河边的城隍庙外空地上，尽情舞弄。待到夜深人静，龙身内蜡烛燃完，各路人马把纸扎龙灯堆放点燃，祭龙上天，以祈吉祥。这些纸龙，耍了几天，已经损坏，堆放需要大的仓库，不如一把火烧掉，所以叫烧龙灯。至于彩绸扎制的龙灯、菜蔬绑扎的龙灯，有的可以拆卸，有的在舞弄中已经损坏，当然不在烧掉之列。总之，过了正月十五龙升天后，便是“娃娃拣狗屎，大人做生意，各干各的事”，过完了大年。

大街凉棚

好几十年前，每到春末夏初，成都商店集中的大街，便会出现户户搬席、家家搭架的盛况。只见大街上，这一家在石板路旁挖坑栽上竹竿或木桩，那一家在搭好的架上牵绳挂索，顺着搭好的棚架，有人在递竹编大幅晒垫，有的在架上铺开竹垫拉紧绳索。这是在搭凉棚。凉棚，顾名思义，

是歇凉用的。是店铺晚上乘凉用的吗？不，是专门为过路人用的。那时的成都，街面不宽，泥土地面，街心为宽不过两尺的石板路，路旁没有植树。若遇大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流油，无处躲避；若遇雨天，商贾通衢大道，稀泥成粥，泥泞不堪。从街两面的骑楼延伸的竹竿、杉木条子上，牵挂竹垫，天阴时，站在门口一拉绳索，晒垫卷成筒状滚在街边，露出顶空光线；大太阳天，一拉绳索，晒垫放平，当街遮个清丝严缝，挡住阳光，满街凉幽幽的；若遇天下小雨，晒垫还可暂时挡雨，在店铺买货的客人不致身淋脚湿，共为称便。不要以为这是店主们发善心，其实这是拉买主的一种高明手段。这种凉棚直到九月初，方始拆除。当时成都商业集中的街道，如西头行聚居的东大街，洗染房较多的江南馆街，百货、金银首饰铺居多的商业场、昌福馆街等街面，每到四月，便会见到商店坐堂掌柜手捧水烟袋，手拿纸媒子，指指戳戳，指点小徒弟扛竿抬垫，忙忙碌碌。街上不时传出长声吆吆的喊声："稳着，立竿喽……""顺手，打烂脑壳哟……"

抬盒队列

一百年前，成都大户人家嫁女过礼，所用陪奁，是各色各样的穿戴、铺垫、金银首饰、箱笼被盖等。每一样物品，都用抬盒装盛。抬盒，是木质红漆涂饰的盒形抬件，梁上有孔，抬杠穿过，两人抬走。其实，每一抬盒所抬东西并不重。不过，过礼时，抬盒越多，越显示富有，所以雇用抬工就很多。往往一家办喜事，长麻吊线的抬盒能牵几条街、十几条街，伴上吹吹打打的响器和放火铳、火炮的响声，硬是要震动沿途各家各户，大人细娃都要跑出来看闹热。辛亥革命后，有些发了"反正"财（即反清革命）的大官显宦的闺女出阁，动辄要用几十抬、百多抬抬盒。花轿铺一时雇不到那么多闲散人员来当抬工，于是就备办了花红酒席请巡警道道台周孝怀帮忙。而周大人是甚好饮食的。于是，他点头应允，让关押的犯人来当抬工，一来可以让监狱看守之类下属官员发笔外财，二来可解花轿铺人手奇缺的燃眉之急。这样，在火炮乒乒乓乓爆响之后，沿着繁华街道，便可见到这队奇特的抬盒行列：抬盒抬着红红绿绿、点金铺翠的各色喜庆物品，抬抬盒的却个个鹑衣百结、开花开朵，脑壳上人人留着冬瓜圈（怕犯



人逃跑，进狱即把脑顶剃光，只留一圈头发，取古时髡钳之意），戴着脚镣手铐，一路行进，稀里花喇，踢踢踏踏，响声连天。囚犯们抬得汗流浃背，步履踉跄。哪知道抬工费用却揣满了衙门老爷的腰包啊！这种奇怪的抬盒行列，在成都街上晃荡了十好几年才绝迹了。



古蜀名产集萃

◎ 冯一下

说到成都名产，大家都知道蜀锦和蜀绣。巧夺天工的蜀锦称妙两千多年，使成都得到锦城的美称。精巧细腻、构图优美的蜀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当然值得称道。但是，蜀地富饶，“蜀匠最巧”，勤劳智慧的四川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珍品异特岂止蜀锦、蜀绣而已，蜀刀、蜀布、蜀酒、蜀杯、蜀纸、蜀笺、蜀刻、蜀扇等都是名传四海，蜚声天下的名产。知道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祖先的创造才能，加深对故乡、对祖国的热爱，而且对发展地方名特产品的生产，丰富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有借鉴作用。下面我们就简略地介绍成都古代的几种名产。

蜀　刀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守。为了提高官吏的水平，他派年轻有为的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城学习律令。为表示对老师的敬谢之情，他节省开支，买了一些蜀地名产遣人送到长安，赠送给博士。购置的礼品中有蜀刀。这种刀叫金马书刀，刀柄上有环，环内用金丝镶成奔马图案。当时在竹简、木简上写字，修整简牍、改正字迹都要用小刀。“巧冶炼刚”的蜀刀正是读书人最喜欢的文具。史书上关于蜀刀的记载并不少。《汉书·酷吏传》写楼船将军杨仆时，提到作为武器的蜀刀；《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提到作为贡品的蜀郡出产的“九带佩刀”。可见，质量高、种类多的蜀刀确实是古代成都地区的名产。

成都制刀业的兴盛，有多种原因。汉代在临邛（今邛崃）、武阳（今彭山）和南安（今乐山、夹江一带）设有铁官，这些产铁地离成都不远，为制刀提供了充足原料。四川自古出钢（古字写作“刚”），成书于战国的





《禹贡》就把“镂”列为四川地区的贡物。“镂”就是钢铁，因为它可以镂刻包括铁在内的各种东西，所以称为镂。刀中加钢，这就使蜀刀的锋利不同凡响。而且，“蜀江爽冽”，水质优良，最适宜于淬火。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就为成都制刀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刀还得人来制。一代代成都制刀工匠练就了高超的技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制出一把把蜀刀。可惜，流逝的岁月早已将他们的姓名湮灭，只有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师蒲元的事迹还流传在群众口中，见之于史册。蒲元性多巧思，溶金造器，特异常法，有“神刀匠”之称。蜀汉政权任命他为西曹掾，负责打制战刀。有一次他到北伐前线，在斜谷（今陕西周至西南）为诸葛亮造成刀3000把。他发现当地水不宜淬火，便派士兵回成都取蜀江水。士兵在运水途中不慎将水打倒一部分，便就地取涪江水补充。这哪里瞒得过蒲元。淬火时他发现声响不对，立即追问士兵为什么要取他江之水混在蜀江水中。士兵大为惊奇，只得如实报告。蒲元严加斥责，令其重新取水。刀制成以后初试锋芒，举刀向装满铁珠的竹筒砍去，刀落之处，筒断珠裂，锋利无比。这批刀并非在成都制造，但它是由蜀地工匠用传统的蜀地技术制作，用蜀江水淬火，而且所用材料也是蜀地运去，因此是地地道道的蜀刀。

蜀　布

文翁赠给博士的礼物中，还有蜀布，这也是成都地区古代的名产。《盐铁论》说：“吏之所计，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亦民间之所为耳。”蜀布的产量相当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当时蜀布不仅名闻国内，而且远销国外。汉武帝时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经艰险跋涉来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张骞惊奇地看到了蜀布。一打听，才知道是当地人众在身毒（今印度）从做买卖的蜀地商人那里购买来的。张骞推测，从四川到印度一定有一条商路。回国以后他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皇上派人南出蜀地探寻通往印度的道路。

蜀布是怎样的一种织物呢？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木棉布，即汉书上说的“土卢布”“僮华布”“桐华布”；有人说是麻布；近年有人又提出一种新见解，说蜀布是用“四川特产棉花织成”（见李璠等编《生物史》第五分

册)。以上三种说法中，我认为说蜀布是一种麻布较为恰当。我们知道，棉花原产印度，如果蜀布是棉布，印度人和大夏人不一定感兴趣。木棉纤维粗短，一般多用作絮褥，很难加工成高级织物。蜀布细密，又称作缋。《说文解字》上说："缋，蜀细布也。"司马相如《凡将篇》说蜀布"黄润纤美"，扬雄在《蜀都赋》中也说"其布则细都弱折"。这样的黄润细布不是木棉纤维所能织成，而麻则能织出这样的布。《华阳国志·蜀志》说，江原县"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江原县在今双流、温江、崇庆和新津之间，距成都很近。这句话把成都蜀布的原料和特点都说得十分清楚。

蜀　酒

到过成都的历代诗人，差不多都要以酒入诗。杜甫写道："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怀。"（《客至》）李商隐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署中离斋》）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陆游："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楼上醉书》）在历史上，成都的酒曾使多少文人骚客陶醉呵！

成都地区酿酒历史悠久。传说先定居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境内）、后迁都于成都的蜀王开明氏就酿造过醴酒。醴是一种浓度很低的甜酒。汉代扬雄在《蜀都赋》中列举自己故乡的名产中有"酴清"。酴清就是酴醾酒，也叫酴清。这种酒很长一段时期都很有名气，以至引起北魏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贾思勰的注意，这位杰出的农学家在《齐民要术》中专门介绍了蜀人作酴清的方法。自然，这样的美酒不是劳动人民所能享用的。汉代蜀人王褒在《僮约》中说，奴婢"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近年成都市郊土桥汉墓中出土一批东汉画像石，上有酿酒图。图上有5个大酒坛，有人正拿瓢勺舀酒，有人赶着拉粮食的牛车向酒坊走去。从图上我们看到了当时酿酒作坊的规模。晋代成都出产一种叫"清长"的美酒，豪贵之家"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没有"清长"是不行的（见左思《蜀都赋》）。

唐谚说："一扬二益"。唐时成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城市，酿酒业更为兴盛。这时成都的酿酒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汉代成都的酒浓度不高，可以"倾盂覆斗"而饮。有名的酴清也是"合渚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





杀（醉）人，人多唼，温温小暖而面热也”。唐代已能酿出浓度较高的酒了。过去一般认为我国酿造蒸馏白酒（烧酒）的技术是元代从阿拉伯传来的，当时称白酒为“阿拉吉酒”。可是近几年我国出土了金代的铜制蒸馏锅。唐代诗人陶雍诗中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之句，杜甫又有“蜀酒浓无敌”的描写，因此唐代成都是否已能酿造蒸馏酒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唐代以来，成都的名酒见于记载的有“锦江春”“竹叶青”等。不过这是些什么样的酒，早已无人知晓。历史悠久，并至今仍能品尝其韵味的是全兴大曲。相传，清朝乾隆年间（1736 年--1795 年），有身怀汾酒酿造技术的山西人来到成都，见成都粮源丰富，锦水清纯，适宜酿酒，便开设作坊试酿，经不断改进和提高，终于酿出曲香、醇和、味净的美酒，这就是全兴大曲的来源。

蜀　杯

好酒还需好杯盛。杯子可以用各种材料制作，古人常用铜杯。精工制作的铜杯，上有其他金属镶嵌的图案，其价值是很高的。但在汉代，铜杯比起成都出产的“文杯”就差远了。《盐铁论》说，1 文杯可换 10 个铜杯，非中等以上人家是用不起的。文杯是什么呢？就是以木为胎，造型典雅，光亮照人，色彩瑰丽，图案优美，并镶有金银饰件的漆杯，因主产于蜀地的成都和广汉，故称为蜀杯。

有涂料之王雅称的生漆是四川特产。成都漆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羊子山城国墓中就有漆器出土。汉初，成都漆器是由“市府”经营，是地方性的官办手工业。市府在南乡、中乡、北市等处开设作坊，所产漆器除进贡和满足官府所需外，也大批外销。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有大量漆器出土，不少器物上印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等字样，无疑是成都市府作坊的产品。其中凤凰山 167 号汉墓出土漆器 90 余件，包括漆壶、漆盒、漆盘、漆盂、漆杯、漆奁等各种类型，漆杯最多，共 50 余枚，有大漆耳杯、黑色耳杯、酱色耳杯、花耳小耳杯、花沿花耳杯、素耳杯等各个不同的品种。这说明，杯是成都漆器的代表性器物。

蜀杯制作精巧，工艺复杂，一般要经过造型、打磨、雕字、髹漆、铜

饰、绘图、清整等几道工序，而上漆又需重复多次，所以有“一杯卷用百人之力”的说法。这样，蜀杯和其他漆器的价值就高了。难怪司马迁说：家有漆器千枚，可比千乘之家。

大约汉文帝以后，鉴于成都漆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在蜀郡设工官，直接控制漆器制作，每年耗金五百万以上。工官出产的漆器首先要满足皇帝需要，这种器皿上有“乘舆”字样。除此之外，成都漆器也远销全国各地以至国外。近几十年来，东至朝鲜平壤附近，北至蒙古诺颜乌拉，南到贵州平坝、各地都有蜀杯等成都古代漆器出土。

蜀　纸

成都市郊双流县，原叫广都，文化发达、历史悠久，隋朝时，是成都地区造纸业中心。田野上广植楮树（构树）。到时人们砍枝剥皮，用以造纸。双流纸产量很大，专供簿、契、图、牒之用，也有用于印刷各种书籍的。双流纸分四种：假山南、假荣、清水、竹丝。清水造于冉村，竹丝造于龙溪乡。

唐代全国纸的集中产地有 15 个，益州（成都）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益州纸以麻为原料，继承并发展了蔡伦创造的造纸方法，造出来的纸叫益州麻纸。当时各地普遍以树皮造纸，益州麻纸以料精、工艺高成为纸中上品。唐代官府文书皆用益州麻纸书写，消耗量很大。唐玄宗开元年间，在长安和洛阳设集贤院，编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共十二万零五千九百六十卷，全用益州麻纸。太府每月发给蜀郡麻纸五千番。《蜀笺谱》说蜀纸“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那就是说，书院每月所用蜀纸需十位力士搬运。从尺幅看，益州麻纸有大、小之分；从颜色看，有黄、白之别。黄色麻纸是用黄檗汁处理过的，可以防虫蛀。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下诏说：“比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后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县，皆并用黄纸。”

大凡造纸业发达的地区，总是位于清溪之畔。因为造纸用水多，对水质的要求高。唐代成都造纸作坊主要分布在西郊浣花溪一带。浣花溪水悬浮少，有色金属盐含量低，宜于造纸。《东坡志林》说：“成都浣花溪，水清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坚白可爱。”浣花溪、百花潭一带造纸业，宋代更盛于唐代。造纸用的原料必须杵烂、洗净，若用人力那是很费工的、





宋代在百花潭边已用水碓，以水力代替人力。前几年在淘修百花潭河道时，发现石质碓窝残件。碓窝直径1～2米，估计每个重达数吨。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古书上所说“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的记载。

蜀　笺

纸造出来以后，根据不同用途可以再加工。笺（牋）就是成都古代一种著名的加工纸。《辞海》说：“笺，精美的纸张，供题诗、写信用。”唐代、成都笺纸列入“纸之妙者”。据李肇《国史补》记载，有“麻面、屑骨、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陆龟蒙有诗称赞鱼子笺：“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今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印萍文。”不过，唐代成都笺纸中最有名的还要算薛涛笺。

女诗人薛涛旅居成都浣花溪畔，好写小诗，见一般纸张尺幅太大，“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苏易简：《文房四谱》）薛涛笺是彩笺，颜色有10种之多。《续博物志》说：“薛涛造十色笺。”《考槃余事》说：“薛洪度以造纸为业，制小笺十色。”可见，薛涛笺并非深红一色。大概因为薛涛是女性，爱用红色，加之传说红色为芙蓉花汁染成，这样红色小笺就尤为人们推崇，成了薛涛笺以至整个蜀笺的代表，历代仿制不绝。元末，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占重庆，据有四川。首领明玉珍听说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人，便在成都浣花溪畔设笺局，请陆子良总管其事，负责造笺。明代蜀王府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也要造笺24幅，从中选16幅送入宫中，贡献给皇帝。不过，明代造纸地点已迁到东门锦江岸边，用的是卡女津（俗称薛涛井）水。

不少人把薛涛笺和蜀笺视为一物，其实蜀笺种类甚多。宋代见于记载的有百韵笺、青白笺、大学士笺、小学士笺、假苏笺、玉水笺、冷金笺、流沙笺、彤霞笺、布头笺等。百韵笺大小可写诗百韵，青白笺因正面白色、背面青色而得名，假苏笺仿苏州杂色粉纸，布头笺则是专用“布头机余”为原料而制成。苏东坡说布头笺“薄而清莹”，“名冠天下”。宋代蜀笺不仅色彩丰富，种类繁多，而且有一套研制图案的工艺。笺纸研上布绫绮锦、人物花木、虫鸟鼎彝花纹，约隐约现，别有一番情趣，是一种美妙的工艺品。

蜀　刻

唐文宗时，冯宿到四川做官。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司天台（国家天文台）尚未颁发新历，成都等地便有人雕版印刷历书出售，生意甚为兴隆。冯宿认为发布新历是国家的权力，民间滥印“有乖敬授之道”，立即上书皇帝请求下令禁止。太和二年、大和九年（835年），唐文宗果然下令禁止“私置历日板”。然而这哪里禁止得了，成都等地照旧年年印发。清末在甘肃敦煌发现唐朝中和二年（882年）“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残件，说明成都历书除四川外，还远销西北。

成都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印刷中心，唐代后期成都印刷业已相当发达。1944年在望江楼附近一座唐墓中的人骨架手臂上的银镯内，发现成都府龙池坊卞家印刷的《辽罗尼经咒》，现存四川博物馆，这是我国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印刷品。除印历书和佛经外，还印其他书籍。当时成都印制的书被称为“西川印子”。865年（咸通六年），日本僧人宗睿回国时就曾带走西川印子《唐韵》《玉篇》各一部。那时成都已有售书小摊，出售阴阳、杂记、占卜、相宅以及字书等印刷品。

五代时期的毋昭裔对四川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相传，毋昭裔从小好学，因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只得经常向人借书。有一次他向人借《文选》，书主面有难色。毋昭裔受到深深的刺激，他发愤说：“将来我如果有了能力，一定镌版大量印书，让天下的学者都有书可读。”后来他当了孟蜀（925年建立）宰相，为实现誓言，一面建议蜀主刊刻印行九经，一面私人出资刻书。他让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所不工的门人勾中正等在成都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雇工匠刻版印书。北宋灭后蜀，毋昭裔的后人还把这些雕版运到开封印书，行销各处，很受欢迎。

宋初，统治者看到成都刻印技术高超，纸源又十分丰富，便于开宝五年（972年）派王从信赴蜀刻印佛经总集《大藏经》。全书计1521种，5000卷，13万页，刻版13万块，历时14年。成都刻印的《大藏经》是我国古代印刷珍品，传入朝鲜、越南等国，成为各国仿刻的范本，被国外科技史家称为“历史记载上最不朽的典籍之一”。宋代成都私家印书也很盛行，费氏、崔氏、裴宅都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印书家。费氏是广都（今成都



双流县境内）大姓，他家开设的进修堂被列为当时的全国七大刻书名家之一，所刻《资治通鉴》有“龙爪本”之称。著名诗人陆游认为南宋时代，天下之书蜀本质量仅次于杭本。蜀本刻得快、印得快、销售快，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蜀　扇

明朝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蜀锦、蜀扇、蜀衫，古今以为奇产。”这里所说的蜀扇是指折扇，又叫聚骨扇、撒扇。

折扇原产于朝鲜、日本，宋代传入中国。折扇“张之如满月”，收之则长不过尺、宽不过寸许，携带方便，明朝时我国已普遍使用。制作折扇，十分讲究扇骨和字画。扇骨可用多种材料制作，明人推崇竹骨，好的竹扇被看作“怀袖雅物”，而名贵的紫檀、象牙、乌木制作的反被视为“俗制”。成都文化发达，出竹产纸，书家画家人才济济，因而与南京同列为当时的两大折扇产地。

蜀扇起初仅民间使用，并不十分出名。明代中期，有一官吏将蜀扇偶然贡至宫中，皇帝甚为称赞，下令列入贡品，每年由四川布政使司贡献。初定每年11540柄，后陆续又有增加。此外，蜀王府所贡数千柄不计在内。年年端午，皇帝要赐给臣下折扇，而能得到高级蜀扇的只有大臣一级的显贵。

蜀扇规格不一，品种很多，其中“小式细巧”者，是专供宫中贵妃用。蜀扇画面富于变化，有的淡雅，读书人拿在手中风度翩翩；有的艳丽，最受妇女欢迎。1665年（嘉靖三十四年），明朝皇帝传旨，要求制作蜀扇，花色竟达33个之多，如龙凤舟船扇、寿比南山扇、百子扇、孔雀牡丹扇、苍松皓月扇、菊花仙子扇、金菊芙蓉扇、锦花帐猫儿扇、人物故事扇、四季花扇、梅花草虫扇、百鸟朝凤扇、盘桃捧寿扇、七夕银河扇、菊花兔儿扇等，真是花草动物扇中收，人物山水人画来。

旧城拾零

◎晓　枫

桥　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都有桥市。它是人市的一种，所不同的，人市是卖人，它是卖力，俗称“卖砣砣肉”。

桥市，成都四门都有，各乡场上也有。农忙紧张季节，如春天栽秧、仲秋打谷，下五县（安岳、乐至、简阳、资阳、仁寿）的贫苦农民，便云集成都四乡，早晨就站在桥头，等主家雇请。来雇人的多半看“货”论价。这些卖力的苦汉，一不带行李被卷，二不携碗筷缸盆，大都赤脚光头、穿着单薄的织布衣服，背上吊顶草帽，屁股上插把镰刀，夜晚投宿在最下等的旅馆——“鸡毛店”。这种旅馆，通常没有蚊帐，没有被盖，是木板搭的连间铺，上面有一两张生霉发臭草席。如果遇上雨天，没有主家雇请，他们便取出自带的干粮（多半是麦麸饼和包谷粑）解饥。要是吃完了，就紧裤带抱肚子，纵然饥火中烧，绝不会下馆子买吃的。每来一次，大约能赚回斗多米，然后返归务农，翌年再来。这种桥市，随着1952年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便自行消失了。

一九四七年元旦那一天

1947年元旦，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平常的一天。在旧社会生活的成都人，天天都是如此度日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件？翻看那一天成都出版的大小报纸的标题，便可一目了然。

先看第一版。



《新新新闻》："迎新送旧不景象，昨日米价又一番"。
《新中国日报》："物价上涨苦穷汉，多少冻骨在呼天"。
《工商导报》："百员萧条寒风里，十家工厂又关门"。
《华西日报》："慈母出卖亲生儿，只缘家贫腹中饥"。
再看社会新闻栏。
"陈某某送女去妓院，换回白米三斗解腹饥"。
"联升巷又出抢案，五匪徒破门杀人"。
"女学生归家不幸，行途中被人强奸"。
"带金表演成灾祸，张太太右腕被砍"。
"市府解员，阔佬升官"。
"一教师失业投身锦江，三少女为爱葬身鱼腹"。
"南大桥警察被杀，保安队缉私通匪"。
"禁烟大员原是烟鬼，平价局长囤积居奇"。

以上诸报，白纸黑字，窥一斑可见全豹，旧成都是个什么模样，不是清楚了吗？



游百病

◎ 方礼平

每年新春伊始，久居城市的人都喜欢外出春游。离开喧闹繁杂的城市，去郊游远足，的确是一件悦目赏心的乐事。然而，成都人的春游，却与众不同，有三个独特的地方：一是日子独特，它不在春季任何一天，而在闹了元宵的第二天——正月十六；二是郊游地点特别，人人都到四十八里长的成都城墙上去走动走动；三是名称独特，不叫游春，而叫“游百病”。这是个流习已久的古老风俗。关于它的来源，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传说许多年前，成都城曾被一支外来军队团团围住，针插不进，水泄不通。成都历来少战火，大小官员过惯了歌舞升平的日子，哪见过这种阵势？他们爬上城楼，只见城外旌旗漫漫，尘沙滚滚，营寨相连，刀枪耀眼。成都城墙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守军不足，武器不精，眼看敌人磨拳擦掌，准备云梯栈桥，如果吆喝发起冲锋，如何抵挡得住？他们个个苦脸愁眉。忽听城墙脚人声大震，势如大江决堤，天边滚雷。他们急忙回头定睛看去，原来城内工商各色人等，自动助战，上城来协助守城来了。吆喝声是编好队以后上城的壮胆口号，此起彼伏，甚为雄势。

百姓们上得城墙，只见墙低凋破，不由得都捏着一把汗。紧急中出奇智，不知是谁一声“快挖土加固城墙”，立即得到大家响应。很快，全城倾巢出动，一面准备御敌，一面加固城墙。筑墙的土，就在城墙下就近开挖，一担担，一挑挑，运到城墙上加宽加厚。成都城市，本来是一马平川，施工取土之后，就留下一个个低洼之处，后来遇到下雨，积水成洼变塘。所以，沿北门城墙内不远留下了白家塘，南门城墙内留下了粪草湖，以及莲花池、王家塘等地名。

这时，城外敌军枕戈待旦，指望早日破城。城内百姓万头攒动，往来



如梭，想的是早修好城墙，免遭屠杀。兵贵神速，不几日，城墙一寸寸、一尺尺见天往上涨。不料，因风寒露感，连日劳累，饮食无常，百姓中突然闹起春瘟时疫，不少人撂下扁担铁锄，卧床不起，筑城人数锐减。守城官兵和助军领头人不得不把在城墙上夯土的人抽下来担运泥土。这样做，运土人数虽可保持，但城墙上浮土未夯，松软不实。不少人烧着红烛大香祷告：千万这几天不要出事啊！

正月十六日晨，城外几声号炮响过，敌军发起攻城信号。霎时间，杀声大起，金鼓齐鸣，万箭齐发，云梯直上。守城军丁百姓齐奔城墙，不料脚下松软，无法动步。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一个百姓大喊一声："快夯土啊！"一声引来万声和，城墙下，市街内，叠声吆喝："快上城夯土啊！"顿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谱谱地奔向城墙，许多患春瘟的人也硬撑着跟了上去。夯土工具不够，人们就手挽手，肩并肩，踏着节拍，有节奏地踩土。这时，只见人影摇曳，跃动不止，千万个身体的重量，将新土踩得又牢又实。守城人们脚踩实土，身旁又有亲人助战；患春瘟的人见到敌兵冲城，想起保城重责，个个同仇敌忾，勇气倍增。大家砍的砍，戳的戳，不一会，冲上城墙的敌兵被杀退了，云梯也掀倒砸断了。经历了战火的成都古老城墙高高屹立在坦荡的平原上。那些患春瘟的人，在分享胜利的同时，不约而同发现身上的病不治自愈了。人们认为正月十六日是个吉祥的日子，攀登城墙能够去病却灾，值得永远纪念。于是，"游百病"这个民俗，从唐代以后，就逐渐流传下来。

每年"游百病"这一天，天刚麻麻亮，城门一开，城外的小贩便潮水般涌向东南西北城门。过去城墙上，只准巡防兵丁驻扎和瞭望，到这一天，也破例大开女墙，让出梯道，只见挑担的、担筐的、提桶的、背篓的，急急忙忙奔上城墙，各自找一个已被城内人先登城挑剩下的地盘，搭起临时帐篷。当"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的时候，城内居民就扶老携幼，结伴相约，倾城出动，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墙，拾级而上。小贩的叫卖声、耍猴戏的锣鼓声、游人的嬉笑声、小孩的喧闹声，交织成声音的海洋，随风飘散到很远的地方。

成都的冬季，多是阴雾茫茫，铅云低垂，难得见阳光，缺乏生机。新春一到，和煦的阳光一扫阴霾，枝头转绿，略带暖意的春风从身上轻轻吹过，令人心旷神怡。在高高的城墙上极目远眺，饱览春日山河之胜。往东

看，锦水碧澄如练，帆影点点；往西看“西岭千秋雪”，数百里外莽莽岷山若隐若现；转望城内，街屋纵横，犹如微风掠过幽深湖面泛起的涟漪。这种春和景明、气象万千的日子，让人登高大饱眼福，精神一爽，身上病痛也顿时不治而愈了。

游百病的民俗，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墙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游百病”也为春游所代替，但人们仍在口语中保留下“游百病”这个名词，让人寄以无限的遐思。





异代升堂宋两贤

杜甫草堂为何配塑黄庭坚和陆游

◎ 周维扬

初次游杜甫草堂的人们，来到最后面的那座大殿——工部祠，常常会惊诧地问道："工部祠是供奉杜甫的殿堂，为什么在杜甫塑像的两侧还有两座塑像呢？"

其实，这个问题，殿廊上的一副楹联，已作了解答，联文是：

荒江结屋公千古，
异代升堂宋两贤。

上联说杜甫在浣花溪畔荒江结屋营建草堂，诗人流芳千古，草堂也成了流传千古的胜地。下联说与杜甫不同时代的宋代诗人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中年入蜀后，又别号放翁，因主张抗金，遭到秦桧的打击），学习杜诗，有卓越的成就，被后人分别塑像，一同配享于工部祠内。如果定要打破沙罐璺（纹）到底，故事还得从清代谈起。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于公元759年入蜀，着手建草堂，次年堂成，765年离开成都。几十年后草堂便荒芜了。到了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旧址，为纪念前贤，"思其人而成其处"，结茅屋于草堂旧址。后经五代、宋、元、明、清的风云变幻，杜甫草堂历尽沧桑，几度荒芜破损倾圮，又多次培修重建扩建。在明末的战乱中，杜甫草堂毁于兵火，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康熙十年（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访得草堂遗址，倡议重建，次年仲春完成，使经历了几百余年漫长岁月的草堂，终于保存了下来。在其以后的一百四十年间，虽然经过若干次培修，但到嘉庆时，又出现了荒草颓垣的可悲景象。

嘉庆十六年（1821年）七月，四川总督常明和布政使方积等发起重建草堂，由按察使、成都知府曹兴六为董事，大兴土木，费金五千五百余

两，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培修，历时半年，于次年（1812）正月落成。

草堂竣工不久，时值仲春季节，布政使方积携夔州通判谭光祐、孝廉严学淦、户部员外郎杨芳灿等大小官员、幕僚，前往草堂，准备选吉日良辰，以祭杜公。一行人在草堂外下了官轿。他们进大门，过石桥，步亭台，度幽径，面对修葺一新的亭、廊、轩、榭，饱览竹翠柳青，百花争艳，蜂飞蝶舞，燕语莺啼的美景春色，个个心旷神怡。他们齐趋工部祠前。当瞻仰了端庄肃穆的杜甫塑像之后，杨芳灿转身对方积说："方大人，以老朽的愚见，这工部祠内，应加塑渭南伯陆公放翁，以配享杜公。"

杨芳灿那时年已花甲，自幼满读经书，精通诗词，曾任衢杭、关中、锦江等地书院主讲，参加过《四川通志》的编修，有《兵率斋》《芙蓉山馆诗词》等文稿传世，久负盛名，素为方积、谭光祐所钦佩。方积仔细思考片刻，觉得有道理，但还不解其详，正要向杨芳灿请教，有一个自恃博学的幕僚却忍不住问道："松公此举，理由何在？"

芳灿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因杜公与放翁的心迹相同。二公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忧愤的诗心、报国的大志，且放翁十分值得推崇怀念，他那'亦知此老愤未平，万窍争号泄悲怒'的诗句，真可谓杜公的异代知音啊！"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官员问："配享之举，岂非标新立异？"

芳灿微微一笑说道："以后代诗人配享前贤者，海内不乏先例。浙江钓鱼台的严公祠内，就塑有晚唐诗人方雄飞、南宋诗人谢翱的塑像，配享东汉的严子陵；至于吴郡的三高祠，同塑不同朝代的范蠡、张翰、陆龟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芳灿说得很有道理，使众人不由得点头称是。却也有人挖空心思地给杨芳灿出难题，想使他不能自圆其说。又一个幕僚拱手问道："请教杨公，李太白也在蜀地游历过，高适、岑参也在蜀地做过官，都是杜公的好友，可谓心迹相同，以他们配享杜公不是也可以吗？"

芳灿听后，胸有成竹地说："太白、高适诸公皆是杜公友好，如用他们来配祀，使诸公屈居其下，杜公在天之灵亦有不安；如比肩并祀，客主不分，这里也就不是工部祠了。"

芳灿刚说完，又有人发问："唐代以后，吟诗、评诗的人，莫不以杜公为其宗。眉山的苏东坡，新都的杨升庵不也可以配祀吗？"





才思敏捷的杨芳灿，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苏、杨二公，本来就是蜀人。蜀中已有二公的祠堂、墓室受人供奉祭祀，可说是魂归故里有所依，不必另立塑像。而杜公和放翁都不是蜀人，都流落蜀地多年。放翁来蜀依靠好友范致能，如同杜公到蜀依靠好友严季鹰（武）；放翁在蜀应王炎之邀作幕府，如同杜公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迹同'。放翁离蜀后，和杜公一样，一直不能忘蜀，将其全部诗作题为《剑南诗稿》，也就是前面说的'心同'。至于二公忧民忧国，每饭不忘，至死不衰，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的大节亦无不同。故以放翁配享于工部祠是放翁之幸，也可慰少陵在天之灵！"

布政使方积，曾著有《敬恕集》，也属文人墨客之流。他见芳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连声叫好。众官员幕僚们，也不得不交口称赞："杨公高见，杨公高见！"

于是，方积令芳灿为放翁配祀事撰文，严学淦作赞，谭光祐用八分书文，书成后，镌刻石上，放置工部祠右壁。这就是发生在约一百八十年前的故事。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认为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的北宋诗坛健将、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公开标榜诗作应学杜甫，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诗论，追求奇丽硬涩的风格；又曾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遭贬谪到蜀，任涪州别驾，一生宦途生涯也是很不得意的，符合"心迹相同"的原则，又援引前例，塑像配享杜甫。原在工部祠旁的陆游神龛，移至祠内杜甫祀像的正西，添置的黄庭坚神龛置于杜像正东。这就是今天的格局。

后来，清人钱保唐为工部祠撰书了"荒江结屋公于古，异代升堂宋两贤"这副楹联，启迪游人瞻仰凭吊唐、宋两代的大诗人。

杜甫为何不吟青羊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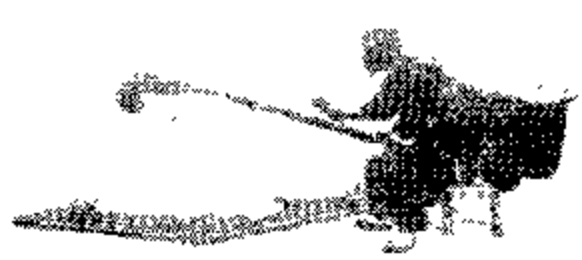
◎ 陶元甘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年—1210年），在1170年后到四川参加抗金救国的军事工作，闲暇时，曾写过不少歌颂四川山水秀丽、风景旖旎的诗篇。“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这是陆游对成都西郊冬季景色的如实描绘，是对锦江河畔郁茂梅花的极口推崇。诗中特别提到青羊宫，可见它在宋时，已是有名的郊游胜地。人们很自然地会问，在四川住得并不久的陆游都留下描绘青羊宫的瑰丽诗作，而号称一代诗圣的杜甫（712年—770年），在成都住了5个年头，到云阳、夔州（奉节县）又住了3年，在四川留下了近一千首诗，成都有名的名胜古迹，如武侯祠、刘备墓、九里堤、武担山、开明遗石、浣花溪等，都留有他的传之千古的诗句，为什么唯独对青羊宫不留下一两首咏叹绝唱呢？

是杜甫没有到过青羊宫吗？草堂距青羊宫近在咫尺，别说他在节度使严武麾下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出入城郭有马可骑，必须经过青羊宫，就是倒霉时拄着拐杖也走不了一竿叶子烟的功夫，应该走到过嘛。所以，杜甫是到过青羊宫那一带的．而且有杜诗为证：“江路野梅香”。可见，成都西郊沿江茂盛的梅花，早在唐代就有了。连梅花都赞了，就是不赞梅花丛中的青羊宫，真是奇怪。

是杜甫也与当时崇释（佛教）贬道（教）思潮一致，故意不提道教观宇的青羊宫吗？从杜诗总体来看，“诗中圣哲”杜甫谴责、揭露了朝政黑暗，哀伤、同情“失业徒”“远戍卒”等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是诗人杜甫的主流。尽管他也有不忘“君”的历史局限，却看不出对宗教有什么更大的寄托。因此，他不咏青羊宫，不能用崇佛反道的框框来解释。

那么，杜甫为何不咏青羊宫？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杜甫在成都时，还





没有这座“道家仙境”“李老君太上感应”的青羊宫。青羊宫的命名是杜甫之后的百多年，杜甫当然不会咏青羊宫了。

青羊宫的命名，据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名耳，字伯阳谥聃。周守藏室吏也。”他是春秋时代的哲学家，著有《道德经》。司马迁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在他的笔下，李耳是人，不是神。研究老子学术《道德经》，称为老庄学派，不称为道教。

道教在中国的兴起，始于东汉（25 年– 220 年）末期。江苏沛县人张陵，当过江州令，后弃官入江西龙虎山学炼丹符咒之术，他的儿子、孙子都继承符律禁咒之法，当时名叫鬼道教，是巫师一类的行业。到北魏（420 年—534 年）寇谦之奉李耳为教祖，张道陵（即张陵）为大宗，打出道教旗号。自此以后，道教作为宗教逐渐流行开来，李耳也被尊为神，说他“生来白发，故号老子”，“生于李树下，指李为姓”，号太上老君，管天下之神。道教到唐代更是盛行。武则天就下令全国大修道观；唐武宗（841 年）也曾下令全国拆除佛教寺院，改建道观，史称“会昌灭法”。

李老君被捧上了天，又怎样和成都挂上的呢？晋代干宝著的《搜神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昭王时，李聃西行出函谷关，守官令尹名喜，跟他学了《道德经》。老聃临别时说：千日后寻我于成都青羊肆。令尹喜辞官到成都西郊，见到一个童子牵了青羊，他跟着找到一处宅院，童子向他传授符录升天而去。这个地方后来建了道观，叫青羊观，就传为李老君升天的地方。

到唐代，青羊观不知啥时已改为玄中观。杜甫在成都时，玄中观破败不堪，庙外土地典给农民种葱栽蒜。这番景象自然不是游览胜地，所以杜甫多次路过，也未留下诗篇。

公元 882 年，黄巢起义军威逼长安，唐僖宗匆匆逃到成都来避难。面临起义军的强大攻势，除了依靠军事镇压、政治收抚外，统治阶级还不断制造天命攸归之类的迷信，麻痹人民，也为自己鼓气。僖宗到达成都后，西川节度使陈敬暄煞有介事地报告说：玄中观红光罩地，挖出青砖一面，上刻“太上平中和灾”六个篆字。“太上”即李老君，“中和”是僖宗的年号，“平灾”自然是指能消灭黄巢。僖宗听后立即下令将玄中观改为青羊宫，大兴土木修建道观，庙产赎回不再种葱蒜，以免熏蒸了“清虚之地”，砖上字迹摹写送全国各道（行政区）及军队。陈敬暄和玄中观住持道士李

无为都受了奖。其实，所谓红光、砖刻都是人为的，说不定是唐德宗指使人干的，以此欺骗军民人等。于是，在杜甫逝世后 112 年，青羊宫的匾额挂了出来，自然杜甫不会写出歌咏青羊宫的诗篇了。



旧蓉城市民日常生活漫忆

◎ 崔显昌

衣、食、住、行，乃人类物质生活之基本，号称“人生四柱”。“民以食为天”，食又为“四柱”之首，故又称其为“基本的基本”。谚云：“衣食足，礼义兴，衣食不足光扯筋”。因其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关系至为密切，故历史和社会学者又常用它来作为研究考察人类社会进步、国家民族发达、百姓生活富裕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志。

本人选取旧时成都的一些材料作一番描述，勾勒出几幅社会风情画，如能令过来人温故知新，让年轻人获得些许乡土历史的知识，则亦幸焉甚矣！

或曰：旧时成都人是吃饭穿衣，今天的成都人也是吃饭穿衣，有啥写头？我说：不然！同是成都人的吃饭穿衣，今昔相较已大有不同。别的暂且不说，先请看“开门七件事”中的柴、米两事便知。

先说柴，这是旧蓉城市民的主要燃料。后来的蜂窝煤是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推广普及的，据说也是学的日本。记得刚在青羊宫物资交流会“煤炭馆”展出介绍蜂窝煤时，人们还视为奇物。初仅用于市区居民，后经1958年“大炼钢铁”和刮“共产风”，农村林木的元气大伤，蜂窝煤才进入农家。至于天然气作为生活燃料，乃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事，旧时更是闻所未闻。

因旧时蓉城买卖木柴，便形成了旧蓉城一大帮口——木柴帮。

“蜀山青青蜀水碧”，旧时四川林木是相当丰富的，作为柴炭的薪炭林更是漫山遍野，真所谓“无山不绿，有水皆青”。仅以成都郊区而言，薪材之富即屡见于历代诗章。如杜诗云“棕林碍日吟风叶”，足见其林木的茂密。宋时亦复如是，王安石诗有“濯锦江边本有棕”句；苏东坡仅吟棕木的诗就有好些：“三年棕木行可樵”，“棕阴三年成”，“棕木三年已足烧”

等等，皆写成都风貌。其时不乏木柴之状况足可见之。清时成都诗人杨燮有首《竹枝词》，专写当时市民烧柴的情况："十万人家午爨忙，棺柴石炭总烟光；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从中还略可窥见旧时此中风情。回忆起来，旧时成都确实是木柴王国，木柴的种类不少，除前述之棺木外，尚有松柴、柏木、青冈及杂柴几大宗。

这些木柴来源分水、旱两路。

水路沿府河，或自乐山一带而上，或自灌县（今都江堰市）而下（其中以眉山张坎一带的"张坎松柴"和邛崃西山的"南河柴"最为有名），至成都东、西门码头起岸。此路多为柴炭行大宗进货，一般市民很少直接赴码头市柴，或有，也是近码头之贫民，借地利、人和随时贱买一点俗称"水打棒"的舱底水泡柴。对于沿河贫民，反正气力有的是，河岸也不花钱租用，闲时买来急时烧，平常买来劈开，架在岸前屋后，几晾几晒，用时搭些干柴现炕现烧，俗话说"湿柴怕猛火"，也还顶用。

水路柴的特点是生柴较多，干湿不一，块头较长大（一般三尺许，俗称"娃娃柴"），捆子较重等。但柴炭行进货后往往还要改短改小，经过晾晒再卖给市民，故也不妨事。

旱路柴多为成都四郊所产，由农民用鸡公车之类交通工具运至成都，直接卖给市民。早年成都市内中小街道很多是石板铺成的路面，大街虽不尽是以全石为面，至少街中心也有一道石板，略高于两侧的通道，专供鸡公车之类过往的所谓"鲫鱼背"。彼时鸡公车推的柴可以直接入城沿街叫卖。成交后柴贩还可代主人码堆、部分劈小，只不过主人要多给点工钱或帮补一顿饭为酬而已。此种交易两得其便，且还有点古朴的人情味儿。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内修起了不少"新式马路"，木轮鸡公车之类便禁止入城了，于是鸡公车只能推拢各城门洞周围为止，自然而然柴市也就在城门洞一带形成了。一般市民只得移樽就教，届时往购，成交后也就还须请脚子挑送或雇黄包车拉回家，劈柴、码堆之事自然也只能善自为之了。

因为旱柴全部直接销售给市民，故其捆子的大小、柴的块头及长度均以市民的需要为转移。一般二十来斤一捆，长度一尺多；块头呢，粗者四开，次者对剖，细者不劈。买得柴后，视柴的品种，用户往往分别处理对待：松、柏柴干湿皆易劈、好烧，以捆码之即可随取随用；棺木柴一般不太粗，稍劈一下即可码堆备用；惟青冈木质坚硬，须趁湿时劈小堆放，否





则干后难劈得很，正如四川俗话所说："除了青冈没好柴，除了郎舅没好亲"。由于青冈柴经烧、熬火，人们仍然喜用。旧时成都市民用柴一般劈作板凳足粗细，干者及半干者可码在室内备用，过湿者须露天晾晒令其干后始搬进室内码放。凡须晾晒之柴，皆码作"井"字高架如塔然，取其通风易干也。架柴事多属孩子们，彼等也乐此不疲，因为这事并不费力且有趣，如玩积木一般。但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守着大人劈松柴。何以？因松中"老母虫"最多。"老母虫"者，金龟子之类甲壳虫之幼虫也，因其喜食松木心，钻在里面长期不见天日，养得来油光水滑、肥白如蚕。一经劈出，蠕蠕而动，拈进小碟，蠢态可掬。劈柴半日，多可数十头，少者也可得十许头。观玩之余，尚可以油炸之，香酥可口，实在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味呢！

劈柴中不免有些难以对付的老疙兜。但也不必担心，暂且堆在一边，到时还可请能人代劈。能人者谁？旧时成都街头专此营生之--特殊人物也。其人肩扛一柄"开山儿"（柴斧俗名），一路吆喝着："包划（劈）疙兜柴！"巡行在街头巷尾，人们有对付不了的老疙兜便雇其代劈。此公除有力气，还有特技，犹如善解牛之"庖丁"，任何盘根错节的怪疙兜到了他面前，只需翻看一番，认准筋脉，乒乒乓乓一顿"开门儿"（偶尔也打入几块随身所带的铁楔子），便噼啪啪啦地崩成--堆可进灶孔的小柴块了。他的表演常常引来一大堆观众，每当老疙兜应斧而开时，人们禁不住为之喝彩。

旧时成都市民烧柴颇有些技艺，所谓"烧根板凳办桌席"。说法虽有点夸张，但也很能说明其用柴之节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节约的原因之一在于柴灶合理、巧妙。彼时市民普遍用的是一种现在已不存在的"行灶"。行灶者，可随意移动之灶也。其外以木为体，其内以泥为膛，形制及大小有点像一张带柜的方桌。其面作"回"形，圆处安锅，四方余裕处即为木面锅台。台面下接"柜"，"柜"内即泥糊灶膛，"柜"的一面开方孔，即灶门。膛内呈"∽"形，一横处系一尺许铁条，为架柴处。

省柴的原因之二是用柴有方。本来一灶柴只需三四根就能大火熊熊，而人们尚根据用火的猛缓、久暂的不同来个大小兼搭、干湿配合、辅以竹草，甚或把一根尺多长的柴宰作两段烧。凡不必大火，如煮腊肉、熬汤之类时，更把不甚冲火之老疙兜也用上了。这样，既收了文火细煨之效，柴

又经燃，且处理了积压的疙兜柴，取得一举多得之功。

此外尚有不少挖潜、利余和辅助措施，则可算旧成都市民省柴的原因之三了。比如，彼时每孔灶前总少不了两样东西：闭桴炭的家什和吊壶。前者可随时闭贮灶膛内多余的红桴炭，既畅了火，又得到了异日用来烧炉子或瓮烘笼的木炭；后者为挂在灶门前的圆肚瓦壶，壶内常装满水，依赖灶孔燻出的余热，一家人早晚的洗脸洗脚等所需的热水也解决了。细心人还不时刮锅底，戏曰“给灶王爷开光”，实际上刮去锅底烟垢后锅的传热更好，自然也更省柴。

旧时成都市民，中等以上人家以及某些工厂、作坊、学校等单位多买趸柴，即一年之中买一两次备足全年之用（为方便用户，柴行还可为之代贮，随要随取，店家可加强资金周转，用户不愁堆放，两得其便）。等而次者买捆捆柴，这便是木柴店的好主顾。至于连捆捆柴也买不起的，如推车、抬轿者流，则属于“升升米、把把柴”的贫民阶层了。他们是木柴店的长买主。每天买一把柴，只有板凳脚粗细的三五根，自然无论如何省也不够一日三餐之用。咋办呢？穷则思变嘛，早晚再背上一只背篼，带只竹扒扒，到路旁、城边竹木林间捞些枯枝败叶，回家来同“把把柴”兼搭着烧。对于他们，找米下锅比找柴更不容易呵！

再说米。这历来是成都人的主粮。旧时米的买卖不像今天用秤称，而是以石、斗、升、合之类的容量计算。单位皆十进位制，惟斗有“大斗”（又叫“双市斗”）和“小斗”（又叫“单市斗”）之分。“大斗”10升，约合现在32斤；“小斗”为“大斗”之半。和斗相应，升也分“大升”和“小升”。彼时市民买米处，一为米市，一为市区内分布各处之米店。

旧成都四门皆有常年交易的米市。每当新米上市之际这里显得特别兴旺，川西坝各州府县的米商、乡户（卖余粮的农户）如潮而至，这是卖方。买方呢？除了成都米商、囤户趁机贱进，以充仓廪之外，中等以上人家也赶这一年的黄金时节购储一年半载之所需。而常年靠米店买一斗两斗的一般人家，至此也相机多买一点新米以备不时，再加上其他形形色色在米市讨生活的人物的活动，这里便掀起一年之中交易的高潮，处处烟尘斗乱、噪声阗耳。

人乎其中，你会发现米市上花样还不少。

首先，市有“大市”和“小市”之分。“大市”营大宗交易，“小市”



进行小宗买卖，各有一批卖主和买主，泾渭分明。人们有个说法，叫做“‘大市’并不大，而‘小市’不小”，意即以米市上所见的规模而言，“大市”并不大，而“小市”并不小。这是啥道理呢？道理有三。

其一，“大市”正因其成交额大，买卖双方都不可能、也不必当场货款两清。卖方只需带少量“样米”上市，供买方看货议价，成交后买方也只需先付部分“定钱”即可，所余大数多在卖方仓库按质按量提货完毕后，双方才把货款之类交割清楚。“大市”交易在米市上的场面（看货、议价、交定）行话叫“包包梢”生意。“包包梢”乃土语，意为双方本钱（梢）外人看不见，好像揣在“包包”（口袋）里头似的。因此，“大市”不见其大。而“小市”恰恰相反，全系小宗买卖，行话叫做“板板梢”生意，意为卖方的“梢”全摆在“板板”上，即亮了出来，故地界扯得比“大市”的生意还大，故曰“‘小市’不小”。

其二，“大市”买卖双方全是精于此道者，货的高下一看便知，没有多少繁言，主要精力用于讲价钱。“大市”的讲价钱很有点技巧。既要争多论少，又要防着第三者听见来“撬盘子”（介入干扰），交谈一般都是小声用暗语，比如数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要说成“幺、按、苏、绍、外（上声）、料、俏、笨、绞”之类。对此若仍嫌不够机密，双方往往还抹下袖口，套着手在袖筒子内“捏指拇”，无声地进行。局外人除了听见一些无关紧要的语气和看见一些激动地拉拉扯扯的动作之外，两人葫芦里卖的啥药一概不得而知，显得极其机密。“小市”买卖则不然，买卖双方说长道短，争高论低，有时大声武气，红脖胀脸，简直像吵筋。“大市”、“小市”两相比较，“大市”的大笔生意悄悄咪咪就做成了，所谓“螺蛳有肉在心头”，而“小市”生意则“叫唤的麻雀没得二两肉”。这自然又形成了“‘大市’不大，‘小市’不小”的又一原因。

其三，“大市”上的生意做一宗一大笔，不消几宗就可收盘，故其气势也不见大；而“小市”呢，尽是长麻吊线的尖嘴嘴生意，交易频繁，熙来攘往于始终，故其气势比“大市”还大。

其次，米市上还有两种特殊的交易。

一种是本身就等着米下锅，还来这里卖“米”的。这是啥意思呢？原来旧时有段时间，据说为了“体恤”公务人员的艰辛，政府每月发给他们一部分大米，可是这米还不是实物，而是到指定地点去出粮的调拨凭单

（俗称“米条纸”）。出粮地点一般都在成都以外地区的仓库，其中好些甚至远在两三百里的县区。在当时的交通、治安情况下，一般穷公务人员根本没有能力去出粮。咋办呢？一部分便向开凭单的人员“塞包袱”，把出粮仓库换成近处去出粮。但这需要相当关系，一般人“走不拢”。于是，大部分人只好把凭单拿到米市上出卖，视出粮地的远近给买主敷贴折扣，七折、六折乃至对折以下不等。等卖得现钱后，这些穷公务人员才急急忙忙转向“小市”买成现米回家备炊。

再一种是米市上“打过河”的角色。“打过河”者，经纪、掮客之俗称也。“打过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给“大市”买卖双方牵线、撮合，成交后索一定报酬；一种是凭信用、担保当场赊进一批现米，在“小市”上零卖，卖完后再付款，他从中得赚头。

除了上述形形色色的买主和卖主，米市尚有以特殊方式讨生活的人物。

一曰“斗匠”，亦称“斗工”、“斗手”（粮食机关通称），民间则称“刮刮匠”（含有刮削之贬义），如民谚“张乡约、李打斗”之类。这是些代卖方撮米、过斗挣钱的人。表面上他们仅仅是卖劳力，实际上是兼卖“技巧”给卖方。按说起来他们使用的量具都是经过检验打过火印的“标准斗”，而且照规定要“平口硬刮”，本不该有问题。但问题不在斗而在手。“差斗匠”都会“耍斗”，即在过斗中耍手脚。其奥妙全在倒米入斗和使“刮刮”（一丁字形木刮，米装满斗后用其刮平）上：米撮箕口沿着斗心往四周迅速扯个旋子、堆个尖尖再轻轻刮平。看似一个满斗，实际上斗的四角空而松，比十足满斗少说也要差两三合。以卖十石米计，这样至少多“耍”出两三斗来。唯此之故，卖米人当然愿请“斗匠”代庖，既落得公平的印象，又省却劳累，花的工钱与多出的米相比，自然划算。旧时新津花桥以出斗手名冠川西，人们把他们的过斗技巧说得神乎其神，说是花桥斗手倒在斗里的米粒都是直竖着的，互相支撑着，可以比实际容量多挤出5%来。为此之故，粮官和大商人都要用高价去雇请花桥斗手为他们出米。也惟其如此，行家买米总爱照顾乡户。因为乡户所卖不多，而且出在自己田里，犯不着去雇斗匠；再说呢，乡户区区，斗匠也不屑为“五斗米折腰”。

二曰“脚子”，也就是代买主搬米回家的挣脚力钱的人。操此业者除





一般穷苦人外，尚包括少数有劳动力的乞丐，他们把这作为行乞的补充。这些人在代为运米途中偶尔要搞些小动作：一曰“仙人过渡”，即在其外衣内暗吊一个小布袋，藏一根钢笔头粗细的硬管子，等把米袋扛上肩后，在适当位置把管子通入米袋，米粒便慢慢“渡”入他的小布袋；一曰“借袋扒皮”，即脚子备包装口袋，免费借给用户代为运米，表面看，口袋是上好的麻布，而实际上，袋内层角上缝有倒包，装米时倒包也装满了，倒米时虽然他还要抖几抖以示干净，但倒包内的米却无论如何倒不完。这些无奈小搞虽然可笑、可鄙，亦复可怜，而且内行也不会上当，徒为旧时米市增加几许小小的悲喜剧而已。

三曰扫落地米的。这往往是些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这是一支为数不小的活跃在米市上的“游击队”。腰扎一根围裙，入手一把小扫帚、一块铁片，眼珠跟着口袋、过斗的撮箕口滴溜溜转，一见有米粒洒出，哪怕是一小撮，立即一拥而上，以膝行地，迅速连灰带泥扫作一堆，用铁片撮起，倒进捞起的围裙兜里。脏也，累也，人们大声斥也，同伙的争抢也，为了可怜的几粒米，此时他们也顾不得那许多了。笔者幼贫，亦曾介入过捡米行列，忆其一日所得不过一两斤米！呜呼！“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诗岂独指当日锄禾之农夫也欤乎？

除了四门的米市，分散在市内大大小小的米店则是成都进行米的交易的又一场所。

市区米店交易有两大内容，一为大宗生意，这是大头；一为供应“升升米，把把柴”的城市贫民，这是其次，仅作应付场面而已。

大宗生意之一是借招牌在大市上搞投机，比如买空卖空、赌输赢、赌盘子，成则巨富，败则破产，风险极大。一是常用的较稳妥的经营方式，即向大宗用户卖空仓、卖期米或代囤米。这实际上是面向大用户以讨便宜的经营方式。其具体办法又分几种：一种是有些富户趁新谷大量上市，米价相因（便宜）时，便买进一年所需，但或因家里堆放不下，或怕放久了，陈米不好吃，或难得对付鼠盗虫伤，便交由米店代存，分期取用；再一种则干脆向米店趸买零出，即买方以成交时米价为准，略打折扣以示优惠，一次付清款项，便由米店出具一个存米折子，用户凭折随时取米皆可，直到出完为止。这种方法，用户方便，而米店也可用存米和趸款去周转得利。在1927、1928年成都市面闹“厂杂银元”期间，各大商号纷纷印

发类似银行本票或存单的各种有价证券流通市面，以油、米行业所发数额为最多。

供应一般“升升米”市民的米来自米市，故比米市为高，米价已悬牌标出，不再是浮动的议价。但米价并不固定，而是随着年景的丰歉以及季节的不同由米帮少数人操纵着。

米店的这类小宗主顾多是“升升米、把把柴”的市民。其上等者买一“小斗”，因为买得更多一些的多直接上米市去了；其中等者，多以升计；其下等者，连升升米也买不起的，米店更以一碗、一筒之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劳动者对买筒筒米倒习以为常，而且劳动所得，力仅如此，也不以为耻。惟其间有些破落之家，本不善营生，靠典卖为生者，明明已落到“升升米、把把柴”的境地，却还要绷面子掩其窘，为买米煞费苦心，弄出些自欺欺人的笑话来。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这类人家，诗曰：“肆外衣裳亦美哉，携他一个大壶来。分明贮米归家去，却道街前打酒回。”

其实，旧社会岂但“升升米，把把柴”的人家不在少数，而缺粮断炊的悲剧也屡见不鲜。这并不奇怪，乃是剥削社会的痼疾之一。天灾人患之年自不必说了，就是常年的农历二三月，由于“青黄不接”，总不免要演出“吃大户”、闹米荒的风潮来。值其时，米价昂贵不说，奸商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常常令米市无米，米店关门，制造紧张气氛。走投无路之人不免铤而走险，轻则划（割）口袋，重则打粮店，破仓抢米。笔者虽其时尚幼，但从一些片断印象已有所感受。一是某日，突然听见街上一伙人呼啸而过，其前为一群衣衫褴褛以各种家什装着米的人在仓皇奔逃，后面是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追赶。跑得快的逃散了，可怜两个老弱者落在后面，被拖翻在地，连人带米被拉进了三桥南街“韦驮堂”（仍保持着原址庙宇名的一个警察分驻所）。其中一个老人仅穿一条短裤，原来长裤已临时脱下，拴上裤脚作装米口袋搭在肩上了。事后听说这是一伙抢劫南大街米店的饥民队伍。目睹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儿。第二天上学，我把这事告诉了我所敬爱的级任赵老师。他听了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拿着粉笔在办公桌上写了个“饭”字对我说：“你看，‘饭’字——”随即擦去半边，“去掉‘食’就是‘反’。‘无食则反’，民以食为天呵！懂吗？”我联想起近半月吃连麸面疙瘩的日





了，似乎悟出了老师的深意，不禁也点了点头。

旧时统治者也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也生出种种花招来缓和矛盾。当然，这是以不触及其统治和它的上层集团利益为前提的。

一曰“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限令米店开门营业。当然这是让中、小米店有限地装装门面，个把钟头就翻牌告“毕”。

一曰卖“冲销米”，意为政府出面卖官价米来“冲销”私商的高价米。其实这是些数量极有限的陈仓烂米。与此相应的还勒令私商卖“平价米”。“平价米”有个特征，即米内混有特意染作红色、绿色、蓝色的米粒，以防米商作假、扣量。一些后台不硬而又未给当局者“塞包袱”（行贿）的中小米店往往是替罪羊，一伙公事人带着颜色米进店来，打着官腔往米堆里一混，这堆米便罚作“平价米”勒令出售了。中小米店老板对此喷嚏也打不出来，只好认倒霉。

一曰“赈荒济贫”，即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拔九牛之一毛而大肆鼓吹以缓解矛盾。赈济的方式常有两种，一为由“善堂”之类的机构发“米飞子”（领赈济米的单据），对象为常住城市的贫民。笔者家里曾领到过大科甲巷“正心堂”的“米飞子”，似乎领到过两升糙米。一为“施稀饭”，多为赈济外来灾民。灾民们排着长长的列子先领得“稀饭牌子”，到时候鱼贯而前，从“施稀饭”人那里得到一两瓢清汤汤稀饭以充饥而已。

正如俗话所说：“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包谷，不晓得粗细。”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实在很难想象旧社会一般人家对米是种什么感情。大概也正因为旧时人们对米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一来他们对米很珍惜，二是对米的学问也比今天的一般人更有讲究。

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撒了饭轻则受到大人的恫吓：“谨防遭雷打！”或者“快捡来吃了，不然要成麻子！”重则挨几下筷子脑壳：“下巴儿是漏的吗啷个？败家子！”甚至说：“从前某某人在茅房头地上捡了颗饭吃，后来就当皇帝”，等等。于今思之，其法虽不尽善，但其用心不能说不可取，不过是要人珍惜粮食而已。

关于米的学问，包括对米的种种认识和使用实践，旧时的成都人对此有着丰富的知识，除了下乡当过知青者，今天居于城市的年轻人对此知之甚少。老人们却能如数家珍地说出：马家寺的“青杆谷儿子”如何又香又

长饭（出饭率高）、“郫县大叶子”如何饱满浑实“牙口好”（干硬经煮），“绵阳白毛香”煮稀饭怎样清香可口等等。任何米，抓在手上搓一搓，嗅一嗅，拈几颗抛进口中嚼一嚼，他们就能辨出米的产地、新陈，是旱碾还是水碾之类来。

谚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言之，有米也还须妇巧，其炊方可达佳美。旧时成都人家颇不乏“巧妇”的，米到了她们手里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炊”来，笼而统之曰“干饭、稀饭、馑馑”。具体而言，仅“干饭”一项就可做出情趣风味不同的几种来。

一曰“焖饭”，又称“焖锅饭”或“连水干”。这是人口不多之家常作之饭食。淘米下锅，掺水适度（一般淹过手背），然后猛火煮开后渐减小火力，待听到锅内有噼叭之锅巴响声便熄明火，赖灶膛内余炭之热收水即成。“焖饭”的优点有二，一因米汤未溢，饭香软可口；二可得一饼酥黄香脆的锅巴。在一般人家，锅巴不过是焖饭的副产品，除偶作单独食用，或铲一牙、捏一坨打发闻声而至的小孩之外，多煮成锅巴稀饭吃，如果有剩，还可用来打发沿门乞讨的叫花子；若在饭馆及某些庙宇，锅巴因有专门用处，则属特意经营之物。在饭馆，锅巴是号称“满堂响”的“锅巴肉片”的主料；在庙宇，锅巴又是吃素的香客的爱物，如昭觉寺的油锅巴就很有名。香客除以当场先尝为幸，尚要带回家供亲友品味。当然，像饭馆或庙宇要煮大量的焖饭，其为炊的技术要求就比小户人家更高了。

二曰“滤米饭”。如果人口较多之家，焖饭不好煮，或者要取汤作它用（比如煮苕菜、桐蒿菜以米汤最好，或者浆衣被也要米汤），人们便煮“滤米饭”。“滤米饭”者，先掺较多量之水把米煮至半熟，滤出米汤后再焖之令熟。如果随锅滤米汤，作法与焖饭无大异；如果滤米起锅，还可利用锅空火猛之间歇炒菜。此法的好处是，菜起锅后连锅也不必洗即可焖饭，既省时节柴，且锅底余油不但未浪费，而饭也不生锅。

三曰“甑子饭”。此法略类“滤米饭”，只是后一阶段不是用锅焖而是用竹或木制的甑子蒸饭令熟而已。甑子饭还有一个好处，即可在甑脚煮炝炝菜，与饭同熟，冷天吃来尤感热烙。

总的说来，三种饭食各有千秋。如果仅以饭的质量来说，“滤米饭”和“甑子饭”虽比“焖饭”显得干些、散些，似乎略逊一筹，但还可以“米汤泡饭——官（灌）还原职（汁）”，既是补憾，吃起来也不能不说又



是一种风味呢。

此外，米除了做饭，在成都人手里还可以巧翻花样，加工成凉粉、凉糕、凉虾、白糕、黄糕等食品，这里就不再细述了。



梨园夜话



川剧圣人

康芷林

◎ 刘宗林口述　傅伯林整理

我的师傅康芷林，离开人间已经好几十年了。每想起师傅，总是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师傅生前，有康“圣人”之称。这个称号，虽非御赐钦封，但从“康二蛮”到“康圣人”，却包含了广大川剧艺人和观众对师傅的尊崇。师傅之所以被誉为“戏圣”，不仅因为他在川剧表演艺术上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师傅一生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尊老爱幼，疾恶如仇。正是这些高贵品质，他才博得了“戏圣”这一崇高的荣誉。由于我跟师傅时间不长，当时年龄又小，这里所追忆的，只是师傅生前生活的一些片段。好在曾受师傅教诲的还不乏其人，文中有不足和不确切之处，尚望不吝补充、指正。

功夫不负有心人

康芷林，1870 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生于四川省邛崃县。幼年曾习中医，后改行习川戏。先拜唱旦角的彭子元为师，后从何新田学小生。在初负盛名之时，亦曾拜大邑县被誉为“戏状元”的川剧名丑岳春学艺。因得名师指点，他擅长文武小生，尤以表演细腻、唱腔优美的文生见长，风流一时。

师傅的川剧表演艺术，不但继承了老一辈艺人的传统，并且善于吸收其他剧种和同行们之所长，加以丰富发展。因此，他的表演艺术独具一格，为当时许多艺人所不及。这里，我想起一件我亲自见到师傅演出的情景。

一天夜场，师傅演出《离燕哀》一剧。这个剧目，为当时成都的“五



老七贤”之一尹吕龄等人所作，师傅在排练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场内的不少观众，与其说是看戏，不如说是专来听戏中的一段唱腔的。这段唱腔是：“风一程，雨一程，处处都是愁人景，满目黄沙草不春。南来之雁孤飞影，好男儿不得烈马天山千里骋。嘉关凄楚，却知成个塞外流人。”

那晚，我想学师傅的临场表演，便跑到台上过道边上看。在演出中，还听得见台下轻微的谈话声、嗑瓜子声、吸水烟的咕噜声。当“风一程……”一腔起唱时，台下鸦雀无声，不少观众挺直了腰杆，伸长了颈子，两眼死死盯着台上，唯恐听漏一个字。有些抱着白铜烟袋的，装好了烟丝，吹燃了纸媒，正要伸嘴过瘾，这时也忘记了吸烟，闭着双眼，摇头晃脑地过起“戏瘾”来。等到一腔过后，火已烧到指头，虽感疼痛，也心满意足。挨到坐的观众相互对视一笑，不住地点头。这一笑、一点头，无声胜有声，比起那些狂喊乱叫的喝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师傅这一段唱腔，主要的功夫是用在“塞外流人”四个字上，唱得来苍凉悲壮，感情恰到好处，唱出了一个离乡背井、流落千里荒漠之外的人的凄凉心情。

在武功戏里，师傅最初擅长于翎子功、把子功，在川剧同行中名噪一时。一次，他和当时有名的武生李泰昌、胡丹文三人同台演出《蟠龙剑》中《芦花救险》一场。李、胡二人对师傅素不服气，自恃艺高，总想寻师傅之短，以逞自己之能。演出时，李、胡二人超出剧情内容，在台上卖弄腿功，大踢“尖子”。台上三个武生，只有师傅踢不起“尖子”，相形见绌，引起观众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戏完退后台，何（新田）师爷用手指着师傅的额头，责备似的说道：“娃娃，你呀，你！”简短的一句话，语短情长，师傅从此重视了腿功的锻炼。

师傅从这次演出中正视自己的不足，暗自发愤练功，当时已成年，练功不如年轻时得心应手。为了弥补这点，他每天天不见亮，便到浴池内泡上一会功夫，使浑身筋骨松软，然后在池边搁腿压腰。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师傅却练就了腿上的硬功夫。

一次，师傅挂牌上演《水漫金山寺》，扮演戏中的韦陀。熟悉师傅的观众都议论纷纷，李、胡二人更不解其意。演韦陀是需要有过硬的腿功，大家都要看这回康芷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随着一阵紧密的锣鼓，身扮韦陀的康芷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好一幅威武的扮相！但细心的观众，一眼就看出了破绽：原来韦陀有三只眼睛，今天韦陀额头上却少了一

只“慧眼”。一刹那台下喧哗起来。这时，只见师傅在法海面前叫了声：“领法谕”。然后走至台前，面向观众，挺身亮相，高叫一声：“睁开慧眼一观！”起脚飞腿，一个“尖子”踢过，不偏不倚，在额头正中出现一只金灿灿的“慧眼”。一刹那掌声雷动，群情激动，莫不叫绝。

这是师傅一年多来勤学苦练，暗中发奋的结果。这一手绝技，不但要求腿功、腰功过硬，并且还要求动作熟练、准确，飞起一脚就把预先贴在靴尖子上的“慧眼”，正正当当地踢上额头，收到了惊人的效果。从此，“开慧眼”就成了川剧的绝技之一而保存至今。

后来，成都流传一句俗话，叫做：“曹黑娃的天旋子、地旋子，当不得康芷林踢尖子。”

其实，曹黑娃也是了不起的演员，“三变化身”就是从曹开始逐渐改进形成的。

“变化身”这个动作原来只有《归正楼》才有，是由剧中的武生背（遮）容，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纸脸壳，然后一亮相，扯去壳子开唱，这是“化身”的初胚。后来曹黑娃（曹俊臣）改用草纸蒙在脸上、涂上色彩，演出时，撒上一把“粉火”（松香），用手一抹脸，抹去“纸脸谱”，现出原形，然后开板起唱。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师傅对曹黑娃这些技巧进行认真研究，把纸剪成脸谱，画上色彩，在脸上贴了三层，用绳结好头绪。演出时，利用舞台动作，用扇子一遮，不用“粉火”，一个动作一张脸，生动别致。“三变化身”从此成了川剧又一个绝技。

后来师傅又加以发展，由三变化至五变化、九变化，甚至几十变化。如三庆会有一出戏叫《蒙面侠》，就用了十多次变化。师傅台上或遮、或扯、或一抖披衫、或配合其它动作，使台上人物千变万化，男、女、老、少、美、丑、善、恶应有尽有。后来，在《飞云剑》、《金山寺》等剧中的变脸，都由此发展而来。不管其七变八变，大家都习惯地仍叫“三变化身”。

由于师傅勤学苦练，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敢于创新，功夫过硬，很快便在川剧界中享有盛名。



宁愿让人说我瘟　不愿让人说我丑

前清时，成都尚无专门的戏园，艺人都在各会馆或有钱有势的人家中演出，谓之“唱堂戏”。1918年悦来茶园建立后，乃由杨素兰、康芷林、唐广体等人发起，联合“太洪”“长乐”“苏玉”“升平堂”“采和”“翠红”等戏班组成三庆会。成立之始，公推川剧名旦杨素兰为会长，康芷林为副会长。杨死后，即由师傅担任会长。

三庆会是旧社会川剧艺人的一种封建行会组织，也是川剧艺人团结自救的一种组织形式。凡加入三庆会的师生，实行有戏大家唱，有饭大家吃的宗旨，因此，深受艺人们的欢迎。凡外地来蓉的戏班，也欢迎在三庆会搭班，免得大家唱对台戏。关于三庆会的历史，因不涉及本篇内容，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时，与师傅齐名唱小生的肖楷成（成都并称“康、肖”），年轻好胜，自恃艺高，不愿与师傅同班。放出话说：“一个老鸹守个滩，一笼不藏二虎。”后经众人劝说，肖才加入了三庆会。师傅为了争取肖共同办好三庆会，不以个人意气用事，主动在演出时给他当配角，如《双洞房》一戏，肖演韩文玉独树一帜，师傅配演戏中的罗文孝；《渔夫辞剑》一戏，师傅让肖演伍子胥，自己配演渔丈人；小丑戏《醉隶》，肖演皂隶，师傅配小生；《破峡寨》大营会一场，师傅让肖演白靠生，自己演黄靠生。师傅和肖同台演出，甘当配角，使肖深受感动。师傅病逝，肖楷成接任三庆会会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二十年，尽心竭力，不能不说是受了师傅的影响，这是后话。

成都的观众，在看了师傅和肖同台演出后，不但没有认为师傅是“瘟症”，反而说“今天康芷林和肖楷成这个戏简直演绝了”，总是把师傅的名字提在肖楷成的前面。

一次，肖演《吊翠》。戏毕，师傅很认真地对肖说：“楷成，生、旦同场的戏很多，在演调情方面，只能点缀一下，不能表演过火，如做尽道绝，那是要损阴德的哟。”师傅的这一番话，肖楷成心领神会。原来，那时台下看戏的人中，不乏遗老、遗少、阔小姐、姨太太之辈，这些人平时吃饱喝足，精神空虚，经常主动和一些唱生角的打情骂俏，干出一些见不

得人的勾当来。事后有的演员弄得来身败名裂，甚至糊里糊涂就丢了性命。

师傅还说："虽然观众在发笑，不一定完全是笑你演得好，其实有的是笑你做得丑。"从此，肖在台上演出这些调情戏时（在旧社会，演调情戏是不可少的），做了很大的改进，掌握得很有分寸。后来，调情戏不淫，淫词多的戏不演，成了三庆会的优良传统。追本溯源，不能不推师傅之功。

师傅和唱旦角的刘世照，长期同台演出《红袍记》，配合默契，十分成功。在一次演出中，演到《夺棍打瓜》一折，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刘高："三娘撒手，我要去制服妖精。"

李三娘："若是妖精将你伤着，你妻靠何人？"

刘高："如不制服妖精，夫妻如何度日？"

李三娘："老子，老子，我不要你去，我不要你去。"

戏完之后，师傅对刘说道："义生（刘世照别名）啦，好好一本红袍记，被你两声'老子，老子'演坏了。李三娘是员外之女，看上了当时还是长工的刘智远，可见她是一个有才学、有见识的女人，你都把她演成个庸俗的泼妇了。"刘在以后的演出中，再也不"老子、老子"地叫了。

师傅一生演过几百个戏，从不演出那些诲淫诲盗的戏。一个叫"红甘蔗"（尹华轩）的艺人，常和师傅开玩笑。一次，他说："有人说康芷林是文武小生，你啥子文武小生哟？你文不能'打令牌'，武不能'打红台'，你是狗屎做钢鞭——闻（文）也闻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师傅坐在竹椅上，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微笑着说："我康芷林不是那样的人，我就不得唱那样的戏。"

这是事实。师傅在生活上是正派人，有损艺人的声誉、毒害艺人的戏，师傅是绝对不演的。师傅常说："宁肯让人说我瘟，不愿让人说我丑。"这种对待演戏的严肃态度，是多么令人尊敬啊！

1943年，我从重庆、川北一带演出回到成都，在"悦来"演出《抢伞》一戏。当剧中的蒋世龙唱完"放下雨械，又来等你"一句时，我把雨伞往腋下一夹，向着王瑞兰点了两点头。戏演完后，周企何喊到我说："喂！刘师兄，你离开三庆会十多年，简直变了喃。你变丑了！你那个蒋世龙，哪像个秀才，秀才要说秀才话嘛。"可见师傅对肖楷成等人所说的一番话，对三庆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疾恶如仇

师傅一生正直，疾恶如仇，从不干坏事，不演坏戏。对于同辈中败坏风俗、伤害伦理的事，他也深恶痛绝。

三庆会的一个艺人，曾利用小恩小惠侮辱了一个科生。师傅知道后，经过查对核实，立即把他叫来，义正词严地说道："我问你，'人之儿女，己之儿女'，你知道不知道？三庆会的科生，都是我们唱戏人的子弟，你的兄弟也还是里面的科生。要是别人也这样糟蹋他们，你那心头痛也不痛？"说到激动之处，师傅伸手就是一记耳光。这是师傅生平第一次打人，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这个艺人恼羞成怒，要和师傅动武，这一下激起了公愤。唱花脸的杨青云（外号"扪扪"）叫道："他们屋头供的是天地君亲牛，不是天地君亲师。"唱老生的周明超（外号"满板"）说："班有班规，家有家法，叫化子还有个草坝场嘛，坐公堂！"

"坐公堂"是当时行会中的一种聚会形式，近似现在的全员大会。在大多数师生的赞同下，立即在正中供起太子菩萨的牌位，两排太师椅八字排开，正、副会长及有名望的师傅分坐两旁，其余的或坐、或站，围成一个半圆形。这个艺人在众人谴责之下，自知理亏，只好低头认错，叩头盟誓："从今永不再犯，如若食言，一辈子塞（哑）嗓子。"（唱戏的人若失掉嗓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衣食饭碗）一场风波才算罢休。

在这次会上，师傅当众公布了一条规矩：任何师傅不准背地拿东西给科生，科生也不准收别人的东西。这条规定，虽不是那么合乎情理，但师傅对于后代的关心爱护，确实用心良苦。

道吾恶者是吾师

一次，在"悦来"演出《小放牛》，杨云风演村女，我和周企何（外号"小精灵"）二人争演牧童哥，几乎动起武来。本来我和周企何从小相处，感情甚密，这一次却为演戏争吵，互不服气。师傅知道后，将我拉至一旁，让周扮演。回到家中，师傅问我为啥要争。我说："《小放牛》是尹

闲才（外号“尹讨11”）师傅教我的，今天他硬要演。别人也说我没有他演得好。”

师傅听了我的“理由”，关切地说：“道吾恶者是吾师嘛。你不但《小放牛》莫得圆娃子（这是师傅们对周企何的称呼）唱得好，很多戏你也唱不赢他。这个娃娃从小失去父母，流落在‘太洪’班，被何狗宝收养。何师傅死后，才进三庆会，参师升春（唐荫甫）。他好学，尊重长辈，比你好得多。”师傅见我还有不服气的样子，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不要说你，就是师傅已经名声在外了，还有人说我唱得不好。”接着，师傅对我讲起了他自己的一段往事，事情发生在师傅在川剧舞台上已很有名的时候。

师傅的《评雪辨踪》，别具一格，确有独到之处，师傅也自鸣得意。一天，师傅戏毕归家。行至一条小街，迎面过来一个老人。师傅不识此人，但由于平素尊老爱幼养成习惯，便主动至道旁让路，目送老人过去后，方才起步。那老人走过数步，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康芷林！”

师傅听见喊声，立即回过身来，走至老人面前，恭敬地抱拳一揖：“长者有何见教？”那老人望了师傅一眼，然后认真地对师傅说：“康芷林，你那个‘吕蒙正’，咋个那么一副窘相？”老人边比划说：“你看你那副样儿——两手抱到肩膀，颈项一缩起，一副讨口子相。”师傅演了这么多年吕蒙正，居然有人如此评论，使他大为震惊。

老人正色地接着说：“这哪像一个有学识、有抱负的秀才，倒像个十足的叫化子。要是这样一个人，日后又怎能金榜题名？刘翠屏还爱他的哪一门？寒窑还有啥子守头？”一席话问得师傅哑口无言。

事后，师傅对吕蒙正这个角色，作了认真反复的推敲，并且在大雪天一个人跑到野外去体验生活，后来在演出时有了很大改进。第二次遇见老人的时候，他拍着师傅的肩头说：“这就有点像‘吕蒙正’了。”经过几次谈话，才知道老人原来是前清的一位“廪生”（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此人学识渊博，对诗、词、歌、赋十分在科，并精通声律。师傅自从和老人结识以后，经常登门求教，多得老先生的指点。师傅演出剧本中的不少唱词、念白，经过老人修改，更富有诗意。师傅认字不多，在老先生的教诲下，不多久功夫，竟把一部《聊斋志异》读得滚瓜烂熟。





道在人为修在己

我是1925年秋拜师学习川剧的。

师傅生前只收了五个弟子，大师兄李志云，二师兄陈洪君，三师兄崇善，四师兄贺云章（双喜），我是最后一个徒弟。后来给师傅参师学艺的人多了，如原乐山市川剧团的傅幼林（兴隆）。名旦周慕莲，时常和师傅同台演出，也曾向师傅参师学艺。

我跟随师傅几年，住在科甲巷师傅家中，每日早出晚归。除料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外，师傅便教我练基本功。演出的时候，师傅叫升芳（晋明全）给我练六合剑上下翻，升文（黄开文）教我练枪、阴阳手。熟悉一个把式，他们就把我带到师傅面前，练给师傅看，直到师傅点头验收。有时师傅没有戏，也在后台亲自教我“扯势口”、练“蹬打”。师傅经常对我说：“师傅是块指路碑，道在人为修在己。要尊敬长辈，他们都会指点你。平时要多看，看别人咋个样子演、咋个样子唱。”

有一天，我对师傅说：“师傅，教我演《八阵图》吧。”我知道这出戏是师傅生平最拿手的杰作。

师傅笑了笑说：“师傅教你的，你要好好练，到了那一天，这些戏不教你都会唱，功到自然成嘛。再说，你这么大点点，唱起来也不像嘛。”我口虽不说，心想，世上哪有不练就会的戏？

事情真凑巧。在一次演出前，一个观众（当然是有势的人），指名要看师傅的《八阵图》，管事的回绝，说师傅有病不能登台。这位观众随口说：“康芷林不能演吗，那就叫他的么徒弟小宗林演嘛。”戏就这么定了。我正在后台练功，打杂师喊到我说：“么师弟，你上演《八阵图》哟。”我以为是在给我逗着玩，等到明白这是真的时，便吓得哭了起来。

师傅见我吓哭了，拍着我的肩膀，像是给我壮胆：“要你唱，你就唱嘛。”回过头来就喊晋明全：“升芳，给师弟练一下。”晋明全笑嘻嘻地对我说：“把子拿来，我给你练嘛。”离开戏只有几小时了，真比几个月还认真。热炒热卖，旧媳妇难免见公婆，我也横下了心。《八阵图》居然演完了，居然没有出大的差错。在演出中，听得出台下的笑声是善意的，包含着鼓励和希望。许久以后，我都在想这件事，像《八阵图》这样的硬功

戏，平常从未排过，到时为什么能演下来呢？

原来，师傅平时教我的，师兄们给我练的，大多是《八阵图》的基本功，无论腰、腿、扳翎子、翻跟斗、撕卡子，以及各种把子，把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出《八阵图》。另外，师傅和师兄晋明全上演《八阵图》时，我就“串”一个“吼班”，扮一个“鬼”。他们在台上演，我就在台下看。师傅和师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句唱腔，一个动作，台步、架势，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不知不觉差不多都记熟了。所以，这次演《八阵图》，虽是初次上阵，总算没有“倒彩”之声，不能不归于师傅平时严教之功。从这二十多年里，我演过无数次《八阵图》，虽都是按师傅的本子演，但由于基本功还不过硬，比起师傅来，实在差得很远，有负师傅的厚望。

功盖三庆会　名成八阵图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师傅已是盛名远扬了。

1929年秋，重庆“悦合”大舞台派人专程来蓉，重金聘请师傅赴渝演出。报酬是相当优厚的，言明包接包送，每天酬金大洋20元。师傅不为重金所诱，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并申以大义，说道：“我是三庆会一会之长，我不能丢了大家不管。三庆会在哪里，我康芷林就在哪里。”

“悦合”的人回到重庆不久，第二次来到成都，聘请三庆会全班到重庆演出。经过师生的商议，师傅答应了去重庆演。签订了为期3个月的合同，定于1930年正月初一日正式演出。

1929年冬，三庆会赴渝演出，在同行中也引起一场风波。当时，在重庆有三家大戏院，除“悦合”外，尚有“章华”大舞台，“又新”大舞台。各戏院都有军政大员作后台。“又新”是刘文辉的侄儿一个叫刘树澄的团长开办；“章华”是二十一军师长蓝文彬的妻弟章久华的；而“悦合”的后台则是潘文华师部一个叫冯石竹的什么处长。

“章华”、“又新”两家舞台，闻讯“悦合”聘三庆会要来重庆，也不甘寂寞，四处聘请名角齐集山城，准备唱对台戏。在“章华”的有张德成、彭天喜、张勋培、赵瞎子、傅三乾、陈翠屏等人，“又新”有曹黑娃、魏香庭、吴晓雷、邱小邱、罗新明、彼牡丹、肖翠碧等，真可算得上川剧





史上的一次群英盛会。

1930年农历正月初一，三庆会按期正式演出（“悦合”也于当天改名“鼎新模范”舞台），每天早晚两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连续3个月，演出盛况经久不衰。由于三庆会家底厚，剧目多，很少演重台戏。而师傅的拿手戏《三变化身》《八阵图》又是最叫座的剧目，观众纷纷要求续演。经过协商，又续订了3个月的合同。

山城的气候，一开始立夏，就十分炎热了。到了六月，正是酷暑盛夏季节，炎风扑面，酷热难当。白天坐在室内，尚且汗透衣衫；夜来的闷热，更使人难受。夜场演出后回到住地，虽已凌晨一点过，床上的竹席还烫手。那时的剧场，设备简陋，更少通风设备，场内抽烟、喝茶，闹得乌烟瘴气。演员们在台上还要穿上厚厚的戏装，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川西坝子的师傅们来说，其热可想，其苦可知。

师傅那年正好六十高龄，连场演出，热气攻心，已积劳成疾，出现病状。身体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终日感到胸中烦闷，对硬功戏已感体力不济了，不得不间断演出。

这时的“章华”、“又新”两家舞台，只要一看戏牌上没有师傅的戏，便挂出张德成、曹黑娃等名角的牌来拉观众，立刻奏效。只要师傅不演出，“鼎新”就只能卖六七成座，而“章华”、“又新”则立时客满。

“鼎新”慌了手脚，冯石竹亲自出马，前往师傅住地，一则慰劳，一则逼戏。几句套话之后，冯开门见山地说：“康芷林，你的《三变化身》《八阵图》要演啊。”

师傅早已料到对方来意，“要演，要演，等我好一点就演，等我好一点就演。”师傅对人说话习惯叠句。

师兄施春和（师傅长兄康杰三的徒弟），眼见师傅体力日渐不支，力主师傅返蓉。因场内不便细谈，乃借邀师傅去长江边看新到的大客轮，陪师傅来到朝天门码头一家茶铺喝茶。

几口茶过，师兄用试探的口气说道：“师傅，这几个月，真把你累惨了。”

师傅吸着叶子烟，眼睛望着窗外的景色，没有什么表示。

师兄认真地继续说：“师傅，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师傅……”师傅转过头来，不满意地用眼睛盯着师兄。

“我的意思是，你老人家先走一步，合同演满，我们就跟回成都。”师兄急解释。

“我宁愿死在重庆，也不会一个人背着离开三庆会！”师傅说话，很少有这么激动过。

师傅揭开茶盖，喝了两口，吸了吸早已熄了火的叶子烟。师兄赶忙擦燃火柴，给师傅接燃了火。

两人无声地坐了几分钟，师傅用一种温和的口气对师兄说道：“春和，你经常都在演戏嘛。唱词上有这样两句：‘上阵不知生与死，归来才算将一员。’三庆会下重庆，园东花了不少钱，为了啥子？还不是为我康芷林。我要走，人家答应吗？万一走不成，一翻脸，那时就不好看了。”

“可是《三变化身》《八阵图》这些戏……”师兄仍不死心。

“演！”师傅一拍茶桌，“我康芷林演了一辈子戏，我不信这一回会‘翻船’。”

当天晚场，师傅演出了《三变化身》。等到《八阵图》的戏牌一挂出，戏票就一抢而空，听说黑市票有卖到5元一张的。

师傅经过几天的调养，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登台演出，用尽了平生的绝技。只见他，翎子如风点头、太极图左右摆尾，用剑片草，腰弯触地。腿上的功夫不减当年，偏尖子、正尖子、撕卡子，矫健灵活。在表演怒发冲冠这一情节时，只见他将花枪往身后一抛，一个倒踢腿把枪踢了回来，伸手接住。头向后一甩，抛去金冠，水发直立头顶，一个亮相，一声“擒不着刘备不回东吴”的拖腔，字正腔圆，余音绕梁。功夫不减当年，台下的掌声经久不绝。师傅退至后场，早有周慕莲、冯石竹等人双手搀扶。师傅虽然汗透几重衣衫，筋疲力尽，仍能强打精神，抱拳带笑对前来祝贺的人连连打恭：“现丑，现丑，我有病，等我病好了，我还要演，我还要演。”

话虽如此，师傅回到住地后，就卧床不起了。

农历六月末，“鼎新”大舞台及山城各界设宴为三庆会饯别。师傅抱病谢辞，由周慕莲在家陪侍。席桌上，宾客坚持要师傅出席。乃由冯石竹驱车前往九龙坎师傅住地迎接，正好碰上师傅寿终正寝。冯和周慕莲二人，就成了在场给师傅送终之人。

一代名伶，就此累死山城。



噩耗传来，宴会不欢而散，大家齐赴师傅住地。只见师傅紧闭双目，面无血色，和几天前在台上那一副飒爽英姿判若两人。师生目睹此状，都忍不住声泪俱下，号啕痛哭。其情至诚，其景也哀。

为了悼念川剧戏圣，重庆各界在“鼎新”大舞台设灵公祭。重庆川剧名角张德成、曹黑娃等人举行义务演出，募捐为师傅后事筹集费用。当时，山城各界送来的挽联、祭幛不下数百幅。灵堂正中树立一块红丝绒金字玻屏，上书“戏圣”两个大字。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当时任省参议长的蒲伯英（殿俊）送来的一幅挽联：“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前来参加祭奠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后事之隆重，实为川剧艺人空前之举。

灵堂在重庆设了半个多月，决定扶柩还乡，运回成都安葬（为了防止遗体腐坏，在咽气的当日，就在腹内灌了 40 个大洋的水银）。灵柩由朝天门码头下船，沿河经泸州、叙府（宜宾）、乐山运回成都。当天，沿途及朝天门码头送别遗体及围观者上万人。灵柩运回成都，安葬在东门外三瓦窑附近的高板桥。据师傅后人言谈，至今坟茔依旧，可惜墓碑已无下落。



天籁并未疯

◎ 周芷颖

关于天籁的疯，过去传说是国民党当局在所谓“禁烟节”那天要抓一社会名流来开刀示众，以迷人耳目。天籁恰中其选，虽未过现，却因此惊惧成疾。据我所知，此事对天籁虽然不无刺激，但并未精神失常。所谓他的“疯”，倒有另外一段缘由。

在“禁烟节”大难未死之后，天籁还参加了成都各戏院为刘文辉的母亲举行的祝寿演出。地点在方正东街“刘公馆”里，戏台是临时搭的。那天他唱的是《问病逼宫》。用内行话说，这个戏是他的“心肺汤”。当时的天籁，正像俗话所说，是“赵匡胤流鼻血”——红得发紫。当天安排戏码的某后台管事对天籁心怀忌刻，故意叫扮演陈妃的演员不上场，想使天籁出丑垮台。同行中有人见事不妙，便叫琼莲芳唱《花仙剑》后不要下妆，代演陈妃一角。但又有人从中使坏，刁弄琼莲芳也不出场配戏。当时天籁正在化妆，听到此事后，先装着不知道，后来越想越气，就对一位管衣箱的说：“不要陈妃，我也要唱！这件事难不倒我！”果然出场以后，他灵机一动，急中生智，把唱词改为“陈妃子坐帐中好个容颜”，就此敷衍过去，台下观众并不觉得陈妃没有上场，而以为陈妃坐在帐内。唱到“逼宫”时，天籁怒气难忍，竟吐了扮演国太的某男性老旦演员一脸口水，以泄其愤。这折戏虽经刁难，总算应付过来了。天籁准备赴到布后街成都大戏院去唱当天的夜台戏，不料却被人要弄手段，用铁链将他锁在“刘公馆”，直到次晨才放他回家。他气愤已极，住在慈惠堂街二弟家里，从此闭门不出，于是外面便传说他“疯”了。这段经过是天籁后来对熊江湄先生讲述的。

数年后，成都银行公会成立“银联票社”，假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为某校募捐演出。天籁又应邀登台，演了一出《杀家告庙》，唱得悲恸激



昂，令人惊叹，并无一点“疯”气。

天籁平生收徒不多，除了经他精心培养而名噪成都的何莲似（翠侠）外，还收了一个徒弟名叫芳泽。因自己精力不够，特请了三栖名票（京、川、扬琴）熊江湄先生代他教徒。有一次，他演出《戏迷传》，熊江湄先生唱旦，戏中要唱京戏。熊在成都京剧票界中很有声誉，但他的家庭不准他唱，于是改由容玉（戴雪如）扮演。可是戴雪如不会唱京戏。天籁唱京戏很有功底，京剧界不少名角都与他有过交往。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曾送过他一本精装的《游历欧洲史》。

我写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天籁并没有疯。



四川梅兰芳

阳友鹤舞台生活片断

◎ 刘双江

一举成名《金山寺》

阳友鹤在“资阳河”崭露头角、拔节冒尖，已经是个开锣取胜的角色。按照常情可以稍息片刻了，但他的心思不一样：“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老在乡班子演出，总非长远之计，再是出名，也只有那么大回事。”他的一批刀马旦、花旦戏很受当地观众的欣赏，而引起外界对他的关注，乃是独出心裁的《金山寺》。不知何时，发现有两三个热心的玩友总是跟着他们的班子转，尤其对他另眼相看，接触渐多，竟成知音。其中一位姓杨的玩友帮助他修改过《锦江楼》《乡绪图》的唱词，指点过他如何吐字行腔，看样子颇为在行。一日，他们喝茶闲聊，那人看来并无深意，只是轻描淡写地提起：“要是二天把你接到重庆，我看要唱红！”阳友鹤深知那个大码头的阵仗，不无忧虑地说：“到重庆，这把水不好泼啊！”对方却好像很有把握：“不怕得，你的《金山寺》文武两全，与众不同，在重庆包打响。”几度闲聊，甚为投机。此后，他常请人念重庆出版的报纸给他听，从中了解行情。记得有篇文章说那里某人的《断桥》有“三倒”，硬是演绝了。他暗暗与自己在《金山寺》中的玩意儿作一番比较，自信不差。不久，他即由姓杨的引荐去至山城。事后方知，此人乃章华大舞台的“开报”（节目安排的主持人），难怪他对于戏那么熟悉；且是剧场经理戴团长的兄弟伙，难怪他敢拍胸口。

《金山寺》这个戏，差不多所有的班子都有，凡为武旦也少不了。阳友鹤在成都、重庆与川南一带，先后看了几十个演员舞台面貌大同小异的演出。他充分地继承和利用了前辈师傅和同辈艺人的出色创造，经过吸



收、消化、发展、创新，在武功、技巧、造型、表演上独出一格，令观者耳目一新。

阳友鹤平时极为留心舞台上各种人物的装扮，细心观察民间的年画，街上的招贴画，家庭实用器物上的装饰画，努力吸收那些古代妇女优美的装束来改进自己的演出服装。那时，常见的《金山寺》白娘子都是穿打衣，好处是动起来干净利落，不足的是一身上下光秃秃的，总嫌不大美观，给人的感受就是一般的武旦，要是演人物离了谱，简直像一个卖打的形象。他以为《白蛇传》是个神话戏，应该有异样的色彩和特殊的气氛。很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一套服装：白素贞头戴日罩子、扎泡花；上身穿白软缎做的紧袖打衣，下身是白色彩裤。打衣上面套白色云肩，打衣下面扎两层白色飘带，白色的打衣上扎白金线，舞蹈起来，银光闪动。他从头至脚用了四股雪白的长绫，踩起跷来，每当急行和急转时，借助飘带和长绫的飞动，一派仙气油然而生。驾舟上金山那一段戏，身着白印度绸的披衫，行进中开合飘动，旋转多姿，颇有乘风破浪的气势。在披衫、云肩、飘带的边缘都绣上鱼鳞甲的图案，象征着白蛇活动的环境和特定身份。总观这套服装，色调单纯而又十分醒眼，淡雅、飘逸、别致、脱俗。这在当时确是大胆的尝试，人物一出场首先就给观众以前所未见的新鲜感受。

阳友鹤在《金山寺》的演出中，以其步法的明快，上下场的洗练，每段戏之间衔接的干净和情绪饱满，气脉连贯的表演，始终保持着这个戏粗犷、炽烈的演出风格；又以倒硬人、滚禅杖和“倒椅子”的绝技，创新的“托举”……不断以各种绝招吸引住观众，确实出众。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形象塑造上，没有把白娘子当成一个武旦来演，而是准确地把握住她是一个美丽善良的“义妖”，温情脉脉的青年女子。他以“武中有文、刚中有柔、劲中带媚”的表演，不但征服了观众，也赢得了行家的赞赏。德高望重的傅三乾老先生，欣喜地为同行和他的弟子推荐介绍，说阳友鹤的表演有规矩，跷功出色，身段好，武中有文，演出了人物特点。《金山寺》连演连满，果然一炮打响，阳友鹤因之一举成名。

阳友鹤与“美术彩女”

“谁说穿彩女不重要？谁说穿彩女没出息？”阳友鹤以为他年轻的时候

演《八宝公主》满台生风，多亏那堂彩女；那堂彩女确也闻名成、渝的艺坛。过去的戏院兴挂牌子，名角、主角挂牌并不稀奇，扮演宫娥彩女、丫环女兵的配角也挂了牌的，就非同一般了。当时的川剧观众晓得“新又新”的彩女漂亮，整齐划一，多姿多彩。做班子的刘树成一来以此吸引观众，二来破格给予非常的礼遇，“新又新”在锦屏戏院演出时，特意在门口的牌上十分醒目地写着：美术彩女。按照头旗、二旗、三旗、四旗的顺序，他们的名字是：陈利华、梁子玉、彭素秋、小菊花。

这堂彩女都是中等身材，有扮相、有功夫、身段好，眉眼呼应快，熟悉传统的舞台调度，由他们来配戏，真是绿叶红花，相得益彰。阳友鹤正当风华正茂之年，许多花旦、武旦戏都离不得他们，他们也与阳友鹤处得很是融洽。“真足啊，他几个多巴我的，平时也贴得飞紧，给我配戏时他们把自己的新行头也拿出来了；我踩跷，他们也踩跷，走起身段来多美妙啊！”阳友鹤深情地回忆着这些伙伴。本来也是，演配角的一个二个都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演主角的咋个不严肃认真、分外攒劲呢！正是同台演员之间互相刺激，互相促进，造就了一台有声有色的演出。

《反延安》（即《八宝公主》）是阳友鹤享有盛名的一出拿手好戏。这出戏上下场口多，女兵们在台上有不少的队形变化，很讲究配合默契。由于这四个贴身的女兵个个英武矫健、机灵敏捷，会做戏，有感情，在台上生动活泼，戏味浓郁。比如，在延安关前一场厮杀，八宝公主（又叫双阳公主）竟将老元帅杨宗保枪挑下马，但她立刻想到此行并非斩将夺关，乃在索回自己的丈夫狄青，反而上前向杨元帅恳切陈情。当她唱到“反延安为的是狄驸马”一句时，唱腔在奔放中有节制，于细微处见情趣。他不是一气白说，而是一句透出人物内心秘密的耍腔，他羞羞答答地唱道：“反延安……哪哈咿呀哈……为的是……那个狄……”阵前落马的杨宗保本来很紧张，得胜的女将反转来求情更是莫名其妙，此时听了一个“狄”字顿时轻松下来，心里想：“哎哟，大动干戈，为的是这个事哟。”老元帅的风趣也来了，故意问：“狄啥？”双阳女更不好意思了，扯了扯自己的衣服。虽是一员驰骋沙场的战将，却带着一股像小家碧玉一样的稚气和天真，她不自觉地看看那些同她一样单脚跪地的一排女兵，意思是：“我咋个说嘛？”女兵们也感到很有趣，“噗哧”一声全都笑了。然后给她做眉眼，意思是“你照实说嘛”；她显得很难为情，连同伴也在取笑她，便指了指她



们，“该挨!”竟然不顾老元帅这一头，侧过身去朝着头旗女兵揪（音纠）了一下，在“台、台、台”的小锣声中，头旗、二旗、三旗依次揪起过去，一律的眉眼手势，一样的欢快情趣，生动地描述了双阳女和她的女兵们亲密和谐的关系，突出地展现了这位慓悍的年轻女将在白发苍苍的老元帅面前腼腆羞涩的情景。即此一例，可见阳友鹤与这堂“美术彩女”在台上的配合是多么和谐得体了。



当头棒



◎金 汤 赤 叶

编者按：原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刘成基，艺名“当头棒”。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当头棒”便以其精湛的丑角艺术，驰名省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成基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艺术上精益求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进步的多年夙愿。他于1976年12月逝世。

《当头棒》，是根据“当头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7年）的一次演出中，借角色的身份为民请命，揭露时弊，痛骂官僚，因而被特务绑架入狱的真实事件创作的。

1947年盛夏，刚刚进入三伏的头一天，蓉城的上空骄阳似火，树上蝉声不绝。成都的闹市区春熙路、商业场、总府街一带，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行走，手中不停地摇着扇子，绸缎铺、杂货铺的徒弟娃站着都在打瞌睡。突然，一阵响亮而清脆的叫喊声唤醒了半睡半醒的店员。“号外，号外，《拾黄金》名丑角锦屏斥军阀！号外，号外，《打判官》当头棒被捕入牢房！号外，号外，川剧名丑刘成基被捕入狱！号外！号外……”这喊声使人们吃惊，这喊声使行人停步。霎时间，众人一拥而上，争相抢购号外。紧接着，《新民晚报》《新民报》《华西晚报》《工商导报》《新新新闻》等报纸都在第二天报上醒目位置发了消息和文章。成都的街头巷尾、茶坊酒肆议论不休，谈论的中心题目，都是当头棒被捕这件事。不久，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也对此事发表了评论。成都各界人士声援当头棒的文章纷纷在各报上连日刊载。

当头棒因何被捕？龙门阵还需从头说起。



一

1947年入夏不久，成都便遭受了一场洪水的洗劫，锦江两岸，墙倒房塌，瘟疫四起，霍乱流行。灾民无家可归，沿街乞讨。官僚、奸商们狼狈为奸，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又造成严重米荒。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抗议，学潮、工潮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

这天中午，刘成基提着空口袋，汗流浃背，蔫蹲蹲地从火神庙米市回家，走到四维街口时，只见新南门城门洞（儿）围了一大堆人，好像在看啥子热闹？在这一大堆人的附近又是三个一小坨，五个一小堆地围在一起议论。刘成基走到一堆人旁边站定，见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正在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述说："哎呀！死得太年轻了，挨了三枪。听说这小伙子才二十一岁，连婚都没有结，是啥子照相馆的徒弟。"旁边一个商人打扮模样的问道："为啥子要枪毙他喃？""为啥子？"这位中年男子突然压低了声音："说他是共产党。"那个商人愤愤说道："哼，也只有这条罪名最撇脱。"刘成基听到这里，突然有人从背后把他肩膀一拍："刘老板！"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黄玉武。此人是中学校教师，喜爱唱川剧围鼓，小鼓打得好，在玩友中很受人尊敬。刘成基亲切地招呼道："黄先生，咋个你也来看闹热？"黄玉武笑了笑说："整个成都是又闹又热，何须专程跑来看呢，哈哈哈……哎，刘老板，你这是到哪里去喃？""到火神庙米市买米。""刘老板，前头走不通，刚才桥头上枪毙了个青年人，看的人比赶花会的还多。走走走，我两个还是先找个地方喝杯酒。"刘成基想了想："嗯……要得，那我们还是到'味之腴'去吧！"于是两人便转身往上中东大街走去。

进了"味之腴"内堂，在左上角靠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一位白胖白胖的幺师扯着洪亮圆润的嗓子喊着："呃！中二靠上来客二位！呃！当头棒老板喃！你硬是稀客，好久都没有来照顾我们啰！"说话间他熟练地将桌子一抹，从围腰口袋中抽出两双江安楠竹筷子摆在桌上："二位老板，今天对不起，只有酒和菜，没得饭。您老爱吃的甜烧白回锅也没得。沾米就缺，鱼也没有，如今农民挑鱼进城要调米，不卖钱。二位老板看……"刘成基半开玩笑地说道："胖子，你们饭店不卖饭，成了冷酒店。二大猪肉再买不到，咦，我看你胖子的饭碗就有点悬罗！哈哈哈哈……

喂！胖子，来半斤陈色，一个对镶，一份凉拌兔肉，再来个豆腐干办花生米算啰！”“要得！”胖子转身边走边喊：“中二靠上，三号的陈色半斤，对镶一盘，办兔（儿）一份，豆干办花生米嘛外加红油要麻利！”说麻利硬是就麻利，那悦耳的喊堂声才刚刚一停，酒菜就已经端上了桌子：“二位老板慢请，等下还要啥子喊一声，我就少陪了。”

刘成基边给黄玉武斟酒边问道：“黄先生，刚才新南门枪毙的那个青年人是咋个回事喃？”黄玉武放眼把周围一扫，喝了一口酒，然后把头伸到桌子中间，压低声音说道：“冤哉，无辜青年！这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是新街口桥头旁边照相馆的学徒，家中只有一个姐姐。民生打米厂遭抢时他感到稀奇，年轻人好奇而欠思忖，拿起照相机就照，结果被抓了。哪晓得上头那些人却在这小伙子身上大做文章，想借此掩人耳目，转移视线，因此就挽了圈套，说他是共产党，煽动百姓闹事。上午抓去问都没有问、审也没有审，下午就拉出来枪毙了。”刘成基听到这里，两眼射出愤怒的火光，使劲把酒杯往桌上一跺：“可耻，乱点‘鸳鸯谱’，又是在哄老百姓！”黄玉武又接着说道：“其实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哄的，那些人每回做的手足，事后都被掀了底底，久而久之，他们那些人的肠肝肚肺全部被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拿上次枪毙的新都米贩子吴花椒面来说吧，以为杀了一个吴少章就可以遮着他们的尾巴，缓和民愤。结果喃？适得其反！刘老板，你是明白人，难道说一个跑乡场、转码头的米贩子，能够左右成都，控制全省的吃饭问题吗？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掌握斩杀大权的人物。光是这场水灾霉烂的米足几百万斤，他们囤积的粮食要是拿出来，成都三个月都吃不完。听说这个（黄玉武伸出大拇指）头号人物的大儿子，就是成都最大的米贩子。你老说，这个米价咋个能平得下来？米荒又哪个能够解决？……不过，物极必反，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来，刘老板，干杯！”刘成基一双深沉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酒杯，一动不动。黄玉武将酒杯举着等待，刘成基慢慢地端起酒杯送到嘴边，一口喝干，放下杯子，掉头叫了一声：“胖子，再来半斤酒！”“啊——来啦。”刘成基拿过酒壶：“黄先生，你我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说着又满满地斟上两杯。黄玉武伸手挡着：“不能喝得太急，急酒醉英雄。”刘成基把手一摆：“你放心，我不得喝醉，不过醉了也好，醉了我就……”黄玉武赶忙说：“不妥，不妥……还不如另外打条！”“另外打条……？”刘成基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嘴角



上挂着一丝微笑，两眼闪射着喜悦的光辉："黄先生，明天晚上请你到锦屏看我演出，戏是省参议会点的，我一折《单拾黄金》，一折《打判官》。"黄玉武用手在桌上一拍："妙！我一定来，我还要约起报社记者一道来。刘老板，祝你演出成功。来，干，干！"

二

第二天傍晚掌灯之时，锦屏大戏院（今四川电影院处）门口热闹非常，8个荷枪实弹的川军士兵像门神似的贴在大门两边。戏院对门的警察分局更是紧张，分局长林得华正在对一群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训话："各位弟兄！今天是参谋处请客，参谋长和市局刘崇朴局长要亲临戏园作陪，大家要格外留心，要保证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的安全。如果发现有人捣乱，先抓起来再说。我先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今天出了问题，到时候就休怪我林某人不讲交情。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林得华将手一挥，警察和便衣特务马上分头走出了分局。

"笛笛——咔哎！"一辆美式吉普车在锦屏戏院门口停下。林得华急忙从分局门口迎上前去，欠身拉开车门："范参谋长，刘局长，请！请！"市警察局长刘崇朴一下车就问："保卫布置得咋个样？"林得华哈着腰答道："一切就绪，完全遵照局长的吩咐布置的，前后左右加堂内都有人，请局长和参谋长放心，部下敢担保不出问题。"刘崇朴环顾一下周围，满意地点头说道："好，叫弟兄们多加小心。"

过了一会儿，轿车、吉普车、私包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到锦屏戏院门口，国大代表、省参议员们在参谋处处长徐丙新和绥靖公署其他官员陪同下纷纷走下车来，门口的卫兵，不断地喊着："立正——敬礼——礼毕！立正——敬礼——礼毕！"祠堂街口看热闹的人们围了个里三层的外三层。那些没有买到票的戏迷，随着人群直往戏园门口涌。

今天的锦屏戏院里座无虚席，观众的情绪很高。刘成基扮演的叫化子刚出马门一亮相，堂子里头就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那些坐在前十排的参议员、国大代表也都跟着戏迷们在拍巴巴掌。刘成基在小锣的"呔呔呔"声中走到台前，一开口就是一段新编自子歌，只听他唱道：

哈哈！说个子，道个子，　　大水淹死我娘老子，
我名叫化子，　　我孤苦伶仃过日子，

手提要饭的破篮子，
拿一根打狗的竹棍子，
走过大街小巷子，
来到肉架子，饭馆子，
当铺钱庄的柜台子，
叫声老爷太太大婶子，
可怜可怜我叫化子，
哪怕我喊破嗓门子，
要不到一张小票子，
讨不到一粒饭渣子，
为啥子？
你来看，水淹成都这个惨样子，
到处都是垮墙倒房子，
哪还有剩余的给我叫化子。
恨只恨，那些奸商米贩子，
有米不卖拿来喂耗子，
生霉就倒在河头喂虾子，
垄断市场抬高米价抓票子，
只图赚钱买田买房子，
他们住的是洋房子，
吃的海参银耳鱼肚子，
接了几房小婆子。
雇了一群丫头老妈子，
白天打牌掷骰子，
夜晚花街柳巷逛窑子。
出门坐车子，
朝山坐轿子，
过着神仙的美日子，
哪管你穷人勒紧裤带子。
怨声载道出了乱子，
慌了后台大主子，
贼喊捉贼做面子，
假巴意思摸底子，
闹半天才是冲壳子，
结果是“人头平价”成影子。
我骂声奸商米贩子，
你拼命抓钱抓票子，
你死了拿来做啥子？
我唱到这里正要歇下子，
对面来了一个老头子，
他叫一声叫化子，
你有好大的胆子，
你敢在台上骂米贩子，
你不怕贼炮打你的背壳子？
我说老爷子，
不必担心我这叫化子，
我两袖清风怕啥子，
充其量，叫化子变成讨口子，
讨口子再变叫化子！

“百子歌”刚一唱完，堂子头掌声大作。坐在楼厢第一排的黄玉武看得清清楚楚，鼓掌的是堂厢十排以后，楼厢的巴巴掌拍得最响。坐在前十排的参议员中也有几个伙倒大家一起拍，其中有个穿藏青色长衫子的拍得尤其起劲，旁边一位穿西服留分头的斜着盯了他一眼：“你拍啥子，台子上在骂哪个你晓不晓得？”这位穿长衫的参议员把他周围看了一看，其他



那些参议员、国大代表都把脸马起，做出不安逸的样子，他的脸顿时红了一片，悄悄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黄飞武轻轻地拉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报社记者周少云："周兄看到没有？当头棒这一棒把坐在堂厢前头那些人打来闷起啰！"周少云小声说道："这些参议员、国大代表里头做米生意的就不少，揭了他们的疮疤疤，哪还有安逸的呀！"说完二人会意地笑了笑。

《单拾黄金》一完，范参谋长便掉头对坐在旁边的警察局长刘崇朴小声地说了几句。刘崇朴马上离开了座位，来到堂厢后排向分局长林得华耳语吩咐。林得华直是点头，连声答应："是，是，我马上就去，局长请放心，一个戏子还能把船翻了。"说完转身向后台走去。

三

刘成基刚跨进马门，几个穿龙套的演员就围了上来。这个说："刘老板，你这段唱词硬是编得安逸！"那个说："刘老师，百子歌太巴适了，过瘾，过瘾！"

这时，经理陈志远急忙走了过来，他气急败坏地向几个穿龙套的演员把手一挥："去去去！"然后将刘成基拉到后台一个偏僻处说："哎哟，刘老板，你咋个在台子上乱唱哟！"刘成基满不在乎地说道："我没有乱唱呀！我唱的句句合乎剧情。""哎哟老师，你还是维持到一下嘛，要是夺倒鼓架子，你我都担待不起！刚才参谋长派警察局长上来打招呼说，'如果再在戏里指桑骂槐，谨防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我难为你，下折戏《打判官》再不要别出心裁啦，出了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刘老板，我给你作个揖。"说着便双手合十，一揖到底。刘成基看到陈志远那副神情紧张的面孔，他便一语双关地说道："陈经理，我晓得你怕得罪了参议员这一伙大官儿，担心饭碗不稳当。你放心，我这一折《打判官》错不了。""那好，那好！刘老板请先休息。"

刘成基换好下折戏的服装后，坐在后台的衣箱上独自闭目思考，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涛，像那奔腾的洪水冲击着他的心。他看见：

锦江泛滥一片汪洋，灾民无家可归；

火神庙的米市上人人都拿着空口袋在焦急地等待；

军用卡车满载着生霉的大米往河内倒；

新都的米贩子吴花椒面哭诉着喊冤杠；

新南门的桥头上，一个妇女抱着被枪杀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学校停课，五个儿女齐扑扑地回到家里；

大街上，学生举着旗帜，喊着口号在游行！

他突然从衣箱上站了起来。“哼！难道就不敢站出来为老百姓说一句公道话么？”

这时，正好陈经理过来催场：“刘老板，该你上场啦，请快一点。”刘成基把袖口一甩，急步走向上马门。

《打判官》这折戏是说判官怕老婆，是个粑耳朵，每次公事完毕或外出归来，都要进入后堂，跪着向夫人一五一十地回禀所有经过。如果禀得不周，说得有错，就要挨打。

这时的戏台上，穿着判官袍带的当头棒，正跪在自己妻子戴雪如扮演的夫人面前。当鼓师发出‘课课子’的鼓点时，他便当机立断，不顾一切地唱出了新编的一段唱词：

夫人在上容我谈，卑人回禀听心间。

大清早，我在二堂看案卷，忽听得衙外法鼓响连天。

我立刻升堂坐公案，传三班，将击鼓之人带堂前。

见一人进得公堂不住喊：“老爷申冤啦，老爷申冤。”

我问他姓甚名谁住哪点，把冤情挨一挨二讲一番。

他说道：“判官爷，我歪名叫做吴花椒面，

吴少章我实实在在死得冤。小人家住新都县，

做生意，开米铺是小本钱。我是芝麻大个小老板，

在新都，只算是个小摊摊。我买一点来卖一点，

一天赚不到几个钱。硬说我操纵米市把法犯，

从成都押到重庆大田湾，判我是投机奸商敲沙罐（枪毙打脑壳）。

哎呀呀，我才冤冤枉枉死黄泉。

判官爷呀！半年前虽说米价天天变，

一斗米最高不上一百元。到而今，一斗米卖七八万，

老百姓饿得喊皇天。政府拿我来塞炮眼，

当官的才阴倒找大钱。他们让舅子老表来出面，

兄弟侄儿把线牵，垄断市场不择手段，

呛，当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





他们执法犯法无人管。
官官相护无法又无天。
判官爷，还望你重新审理我这冤案，
放我还阳回人间！我要找他们把理辨。
拉他们到南京去见国父孙逸仙！”

唱到这里，戴雪如急得把脚一跺，指着当头棒的鼻子说道：“你打胡乱说，不想活啦？”当头棒心里明白，妻子新加这句台词意在提醒他。但他却认为这句台词加得自然，很符合当时的剧情，于是便回答道：“夫人，不是下官乱说，的确是实情。”戴雪如更加气愤地用脚轻轻踢了丈夫一下，口中说道：“你大胆！”这大胆二字却把打断了的台词又连接起来。当头棒把心一横，眼睛一闭，继续唱道：

夫人啦！吴少章他越说越大胆，
吓得我脚杆都在打偏偏。我忙说，“‘哎呀呀，
你说话小声点，隔墙有耳莫乱言。
闹米荒政府并非没有管，不是还组织了个调查团？
调查结果有签呈可见，硬说是囤的军米又咋好言喃？
哎，吴少章，爷观你气血亏损脸色变，
来来来，我送你‘洋参’整三钱。
呀！我看你饿得直冒虚汗，
来来来，爷请你口子上吃碗‘赖汤元’。”
唉！夫人呀，吴少章这人才不好办，他两样东西都不贪。
他言道：“‘洋参’只能吊命当不到饭，
一碗‘赖汤元’也把肚儿盔不圆！”
他左不干来右不干，简直是个牛黄丸。
我鼻子上都急出毛毛汗……嘿！猛然一计上心间，
我一把手拉着吴花椒面，吴少章呀！你暂且把心放宽，
走走走，今黑了我请你把戏看，
到锦屏去看当头棒的《打判官》！

“哗……”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整个戏园都沸腾了。只见参谋长范白仁、处长徐丙新怒气冲冲离开座位，市警察局长刘崇朴紧紧跟在后面一起从侧门出去，走进贵宾休息室。范白仁往沙发椅上一坐，一对带杀

气的眼睛死死盯到刘崇朴。徐丙新把沙发扶手一拍："刘局长，你就是这样在管事吗？"刘崇朴站在沙发前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道："这……这……这都是怪手下办事不力。范参谋长、徐处长，我……我马上叫林得华行动，先把当头棒抓起来。"说完转身正要出门，范白仁叫了一声："转来，戏还没有完，搞什么行动呀？一个戏子公然当着两百多参议员和国大代表的面骂我们，这叫公开肇皮，难道你们也来个公开行动，闹它一个满城风雨是不是？"还没有等到刘崇朴回答，徐丙新又接着说道："刘局长，你这个当副官出身的怎么只晓得行动，不晓得动脑筋呀！"刘崇朴的脑壳点得像鸡啄米一样："是是是，我一定安排周密，做得人不知鬼不晓。"说完就急急忙忙往外走。范白仁看着刘崇朴的背影骂了一声："饭桶！"

这时的锦屏戏院已经息台。黄玉武和周少云正随着人流涌出大门。周少云小声地问黄玉武："他们会不会对当头棒采取行动？"黄玉武微微点了一下头："很可能。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骂了他们，他们还能够甘休吗？"周少云把鼻梁上的宽边眼镜往上抽了一抽："我看还是叫刘成基老板避避风头的好！"黄玉武微笑着轻轻拍了一下周的肩膀："周兄请放心，我已经告诉当头棒，叫他暂时到华西坝邹医生那里去住几天，我还专门托人在后台等到陪他一道去。"周少云听到这里，宽心地一笑："你考虑得真周到！""不，还不能说周到二字，事情的未来还不晓得如何。这样吧，明天早上我们在'绿荫阁'会面，听一听动静再说。""好，不见不散！"周少云伸出右手，和黄玉武握手告别。

天刚麻麻亮，黄玉武来到走马街口，准备倒拐出新南门往学校去，突然听到有人在喊："黄先生，黄先生！"他掉头一看，只见方明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从春熙路跑了过来，"黄先生，我刚才去你屋头找你来，刘老板他被……"方明正要把话说下去，黄玉武忙伸手挡住："等会儿再摆，你跟我来。"他拉着方明穿过春熙路，弯进了三益公旁边僻静的新街后巷子，忙问："当头棒老板他怎样了？"方明一边擦汗，一边煽扇子，他看前后无人才对黄玉武说道："我昨黑了在锦屏等到当头棒老板下完装后，他给戴老板交代了几句就和我走出戏园，倒拐从半边桥往陕西街那边走。我们刚刚走到华美女子中学门口（今成都石室联合中学），突然从黑角角头钻出四个大汉，他们一掌把我推开，把当头棒老板抓起就往皇城坝跑。等我追过去，他们已经把当头棒老板推到一部小汽车里头。我正默到要喊，



突然被其中一个大汉把我一脚踢倒在地。那个大汉喊了一声‘老蔡，快开车！’我急忙抬头一看，在月光下我认出来，老蔡就是我们隔壁给警察局开车的司机，车子是往后子门那边开起走的。”

黄玉武把方明的肩膀一拍：“好，只要晓得刘老板是哪个抓的就好办。你现在马上到兴禅寺去通知戴雪如老板，我这里马上托人去警察局打听刘老板的下落。有事晚上八点再到华华茶厅找我。”说罢立刻和方明分手而去。

夜深了，二更早已打过，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现玉带桥附近）里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牢房内，刘成基闭着眼睛躺在一张烂糟糟臭熏熏的草垫上，他已被关押5天了。

他在烂草垫上翻了个身，慢慢睁开眼睛，从小得可怜的窗口看出去，望着夜空出神。他想：这世道，哼！要老老实实的唱戏，结果是唱不成戏；为吃饭去唱戏，反而吃不到饭。像白玉琼那样有名的旦角，被逼得去跑滩卖唱；面娃娃（彭海清）在武生里头算是技艺双绝的高手，结果是流落江湖卖打药；红极一时的琼莲芳（张文卿）沿街讨口要饭；名震川西、独具一格的生角天籁（冯荫柏）因为不出堂会被整，惨死在悦来戏园的票房头；筱琼芳这样出名的旦角，活生生地饿死在猛追湾；鲁永福在小生行当里头算不错的，为唱戏得罪了地头蛇，在彭县桂花场拿给舵把子派人用刀砍成几节甩到井里头。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在唱戏，结果是啥子下场喃？我今天这个班房还算坐得值得，我总还为老百姓说了点公道话，骂了那些贪官污吏，为死去的师兄师弟出了一口气。这时候，刘成基激愤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当头棒，起来，起来！过堂啦！”刘成基被这叫声惊醒过来。他转眼一看，一个特务拿着一串钥匙站在牢门口催着，“快点，快点，跟到来！”刘成基站起身来，跟着这个特务，穿过走廊，来到前面的一间刑讯室里。那个特务上前一弯腰：“报告处长，人带来啦。”坐在审讯桌子正中的稽查处邵处长慢慢抬起头来。此人留着一口日本式的仁丹胡子，那双杀气腾腾的眼睛斜视着刘成基，嘴角挂着一丝狞笑：“当头棒，你的嘴嘴儿还肇喃，还会唱点骂人的戏，大概捧场的人多了，把脑袋给你捧昏了吧？哼、哼，狗坐鸳篼不受人抬举！老子今天要让你清醒清醒，不拿点厉害给你尝尝你是不晓得好歹的，我倒要看一看是你这根当头棒硬，还是我的……”

“报告”，一个便衣特务急促地走进刑讯室，“处长，刘局长来了，在楼上办公室，他请你马上去。”邵处长微微怔了一下：“去报告局长，我马上就来。”他立即起身离开桌子，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着刘成基奸笑着说：“哼哼！你等一下就认得王麻子姓张了。”说罢转身出了刑讯室，直往楼上办公室走去。

稽查处办公室里，市警察局长刘崇朴靠在沙发上仰着面，两眼紧闭。邵德彪轻轻地走到他跟前，小声叫道：“刘局长，您来了，是不是要亲自审讯当头棒？”刘崇朴两眼圆睁，右手在沙发扶手上啪地一拍：“尽都是些戳锅漏！事前我一再交代，要做得人不知鬼不晓，结果第二天就闹得满城风雨。”“刘局长不必多虑，一个戏子有啥了不起，我肯信他还能把船翻了？”刘崇朴唰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事情就坏在你们这些啥都不在乎的人身上！我的邵处长，你到窗口来看看吧，刚才我的汽车都差点过不来啦！”

邵德彪吃惊地看了看局长，急忙走向窗口，拉开窗帘，往外一看，呔！黑压压密麻麻的人山人海，从卡带桥到玉龙街一眼望不到头。邵德彪慌慌张张地转过身来：“局长，是不是马上叫警察出动，先抓他几个再说？”刘崇朴狠狠地用手敲着办公桌：“抓、抓、抓，一天到黑就只晓得抓人，你们还嫌闹得不够呀？枉自你在军统混了这么多年，一点政治都不懂，你看看这些！”说着叭的一声将手中的一卷报纸甩在桌子上。邵德彪走到桌前一看，《华阳晚报》《华西日报》《新新新闻》《工商导报》《新民晚报》《新民报》《蓉风三日刊》都在头版登载了声援当头棒的文章，那些醒目的大字标题“当头棒打得好”“当头棒何罪”“嘴是堵不住的”“声援当头棒”“从当头棒被捕看当今的民主”等等，清清楚楚地映入他的眼帘。他边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边自语道：“他妈的，连我们自己的报纸也在骂我们。真想不到，一个唱丑角的戏子，竟然会把水都搅浑了！”刘崇朴冷笑一声：“哼，岂止这些，就连南京、上海的报纸都登了评论文章。邓主任在南京打来电报，骂我们是胡闹，影响太大，要我们马上收场。”

“哪……局长，哪……当头棒咋个处罚喃？”

“放！”

“啊？你是说……”

“放，立即释放，这是参谋长的指示。”



“好吧，我马上叫他滚蛋。”

“邵处长！你还是学会搞点政治嘛，你就不能把你这副嘴脸收捡收捡吗？”

“是是是，局长，我懂你的意思啦。”说完匆忙下楼往刑讯室走去。

邵德彪一进刑讯室，就嬉皮笑脸地叫道：“嘿嘿，刘老板，误会！误会！完全是一场误会！”

刘成基用惊疑的目光望着邵德彪：“误会？”

“对对对，完全是场误会，事情都怪下面的人乱来，刘老板受惊了。刚才市局刘局长亲临指示，要我们马上放你出去。”

“放我出去？”

“对对对，马上就放你出去。”

“邵处长，咋个《三堂会审》都还没有唱，戏就幺台啰嗦？”

邵德彪被刘成基问得非常尴尬：“嘿嘿！刘老板不必多心，我刚才语言不周，还望你原谅原谅！来人啦，给刘老板倒茶！”

“这就不必了。”

“哪……我现在就送刘老板出去！”

“邵处长，这几天的号钱、饭钱又咋个算喃？”

“嘿嘿，刘老板硬会开玩笑，嘿嘿嘿……”

“邵处长，二天这种误会还是少来的好，免得人吃亏。”说完站起身来，“打搅，打搅！”

“刘老板不必多心，委屈了，委屈了！嘿嘿，嘿嘿嘿嘿。”

这位长着满脸横肉的邵处长又唏起嘴巴笑了起来，笑得那样勉强，凄楚，尴尬。

稽查处的黑漆大门“嘎”的一声开了，刘成基出现在门口。迎接当头棒出狱的人群一下沸腾了起来，“出来啰、出来啰，当头棒出来啰！欢迎，欢迎！”“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紧接着又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只见戴雪如领着五个儿女首先迎了上去，他们夫妻、父女、父子见了面说了些什么，一点也听不到，听到的只是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川剧界、教育界、工商界、学生代表和各界人士，接二连三地把一匹匹红绸，一朵朵红花披在刘成基的肩上，戴在刘成基的胸前。

眼见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刘成基的嘴唇在微微抖动，一颗激烈跳动

的心快要蹦出胸膛，泪水悄悄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哭了！

是啊，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刘成基迈过了四十二载，在戏台上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三十二年来，他走过了多少州、府、县城，跑过多少码头、场镇，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他受尽了多少凌辱，饱尝了多少心酸！今天啊，今天！他第一次感到有了人的尊严。





戏状元岳春

◎ 邹趣涛

七十尚能翻《坠马》，八旬犹演《做文章》；
阳春白雪怀优孟，法曲长留一瓣香。

这是清末民初，人们赞扬川剧名丑岳春的一首诗歌。尽管在封建统治与军阀混战的年代，他照例被看成是地方志不收、正史更不纳的娼优之流的戏子，但他多才多艺的素养，出类拔萃的演技，竟是那样有力地吸引着人民，像川剧四大流派所经过的成都河、资阳河、下川东、川北河的澎湃潮流一样，长流不息地激荡在广大观众的心坎里，给人以雅俗共赏的艺术感受，留下了“丑而不丑”的难忘印象。

岳春，字雪吟，咸丰年间大邑县人。出身贫寒，苦读未第，就放弃做官思想，学习川剧。先是着眼于中国历史典籍，选一些农民起义的故事作为题材，编出了《战江源》[①]《反延安》等剧本，表现了他对满清王朝的不满。同时他也钻研昆曲，把一些深奥晦涩的词句，改为通俗易懂的四川口语，谱入曲牌里。继后他就粉墨登场，专攻丑角，数年间，演遍了川南县镇乡村的草台班。经过一番勤奋曲折的实践，他很快就成为以成都为中心的上坝名角。光绪时的成都“群仙茶园”（在现王府井百货之处）成了他经常演出的舞台。他演出的至今脍炙人口的戏，如《渔父赠剑》《赠绨袍》《做文章》《坠马》《秋江》《活捉三郎》《御河桥》等传统节目，不但在观众中受到普遍的赞赏，而且也获得当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好评。哪里有岳春演戏，哪里就有一批衣冠楚楚的戏迷。

由于岳春声誉日高，资阳河道的“大名班”班主，专程前来成都，聘请他去整理这一流派的川剧。在盐都自流井，他又邂逅一个志同道合的肖遍亭

① 描写北宋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关键战役的一段故事。

（绵竹人，是一个秀才下海的怪杰，专攻正生，人称“戏中大夫”），两人密切配合，整顿了“大名班”。他们勤学苦练，善钻研，在土生土长的一套川剧程式表演基础上，吸收省外兄弟剧种的长处，加以革新创造。他们的艺术创造是多方面的，单就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脸谱而言，他们参考京剧的“白脸抹、粉壳壳”，创造成川剧特有的曹操脸谱 12 种，便于观众识别曹操青年、壮年、老年及其在各种不同历史时期、在纷争不休的政治舞台上的性格特征。这种符合历史事实的夸张，是岳春等人的一种创新。

不久，“大名班”公推岳春创办“三字科社”。由于他读过岳飞的孙儿岳柯所著的《桯史》，对南宋著名蜀伶袁三的“能文、通经、善讽”非常崇敬，就取一个“三”字来命名科社了。

他针对这个班社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科班四要则：一要科生先行练好基本功，学好基本唱腔；二要科生通晓一般，精通一门；三要科生每日凌晨于林中、水边、山上，练体力，操武功，吼嗓子；四要科生按日上文学课和历史课。经过他的辛勤筹划与严格训练，科社新人辈出，艺盖全川，如蔡三品（小生，以演《琵琶记》中的蔡伯喈驰名）、傅二乾（演文、武丑著称于川东一带，抗战时在重庆由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委会主办的戏剧节上，以七十高龄出演《双旗门》的土行孙，轰动一时）、刘三凤（与杨素兰、浣花仙齐名的小旦）、唐二春（演三国戏正生著称）、张三林（岳春婿，有“赛岳春”的评价）、彭三庭（名鼓师，当时川西流行一句歇后语：“彭师傅的锣鼓点子——抓得准”）等等。正是这批“三”字辈的科生茁壮成长，“大名班”迅猛发展，成为清末民初川剧界观众最多、名望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班社组织。

岳春不但奠定了资阳河派的基础，而且交流了成都流派的特点。无怪从此时此地起，群众就给他一个荣誉称号：“戏中状元”。同时，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赞美他是川剧“五四齐”（指高、昆、胡、弹、灯文武不挡）的一代宗师。

岳春晚年，还能演出一些大费功力的折子戏，至今就像传奇故事一样在民间流传。

他 69 岁那年，演出了《水浒》戏《活捉三郎》中的张文远，由名旦韩长春配演阎惜姣一角。演到阎惜姣手执鸾带，将忘恩背盟的张文远轻轻提起，悬在空中。这在青壮年演来，也很不容易演好的，何况是一个老翁



呢。他死后，为了纪念这个出色的老艺人，川西坝子著名的“大五彩”民间泥塑家周海云，将《活捉三郎》这折戏，彩塑在成都北门城隍庙的十殿里，成了有名的三十二折川剧彩塑之一。

“七十不出门”、“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两句话，用在老当益壮的岳春身上，就不是那回事了。岳春七十高龄，还能在邛崃固驿镇的万年台上，演出舞蹈做工极繁重的《坠马》。这天正逢场期，人山人海，有的慕名远道而来，有的来看热闹稀奇，再加各处撵来赶场的小商小贩，整个会场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他的徒弟蔡三品出场配演蔡伯喈，只唱了四五句唱词，就把闹嚷嚷的会场唱静下来。正角岳春扮演《坠马》的罗喜德，运用“趟马”的程式套子——上场、脚、腰、手都很纯熟轻捷，立刻把人心抓住了，简直看不出来是一个七十老翁。接着他唱了一段“昆头了”，字正腔圆，韵深味厚，把个第一次学骑马的穷儒又怕又喜的矛盾心理，表演得惟妙惟肖。特别是最后从高头大马上滚落下来的精彩表演，使得整个鸦雀无声的场子，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据后于岳春的康芷林回忆说：“青年时，在故乡看到岳春演《坠马》这出戏，唱做俱绝，引起我从事川剧的志趣。”后来，康芷林向岳春拜门参师，唱出了名，被人称为“康圣人”，“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的故事，至今流传。

难能可贵的是岳春八十高龄，还能登台表演。当时，他已退居老家大邑。四川制台岑春煊，通过大邑县令，相邀他来成都演戏，并指明要看他的《做文章》。这真是不可想象的难题！但经过五六十年严格训练的名丑，深信自己的艺术造诣，饱含着旺盛的生命力，毅然承诺。

他一到成都，不能不引起戏曲同行的惊异与担心，纷纷劝他：“人到情到，不如面请制台免了这台苦差戏！”但倔强的岳春毫不在乎，平静地说：“官令如山，推是推不掉的。人家既是重视川戏，演就演，没来头！艺人嘛，生于父母，死于戏台，人生一快事也！”

这折戏，又是他的得意门生蔡三品配演书童单飞英。到了唱戏那天，提前来到后台的，都是三字辈的贴身门徒，殷勤搀扶，大有北方鼓王刘保全晚年登台表演前的情景。可是，马上出现一个具体困难。我们知道，《做文章》的徐子元，是一个纨裤少年，而岳春已经满口白胡子了。老年人爱胡须，那是舍不得剃的。不剃，又不像徐子元。怎么办呢？一道来的人正在为他发愁的时候，只见他拿出了随身带来的一小罐熬得很稠的糯米

浆糊，先细心地把门须倒梳上去，一层一层地紧贴在脸颊上，然后涂好浆糊，又平又匀又牢实。接着以铅粉油彩扮成蝴蝶脸谱。这一别出心裁的办法，极有效验，台下的观众，稍不注意是看不漏的。

岳春化好妆，便要去穿高底朝元靴。有人怕他年老，穿高底靴上台摔跤，出危险，劝阻他说："脚下不比脸上，穿上平底鞋也不显眼，不必那样处处认真。"岳春很不以为然，说："唱戏有唱戏的规矩。不穿朝元靴，脚下怎么有劲？立无立像，做不好身段嘛！人总是要老的，我今天作为演员上台，就要做到老而不老，精神上不要先打败仗。凡事怕费力，想马虎，哪能行？人一马虎，乱了规矩，准会引起观众非议的。"他把朝元靴穿好后，又在腰杆上打了一层裹腿。这样一装束，腰板劲、跟子劲一点不松，不但背不见驼，而且做起戏来，洒脱大方，柔中见刚，运用自如。

为了弥补眼力不足，他先叫人带他到台上走了几圈，熟悉舞台尺寸、环境与桌椅方位。这样，舞台上的空间位置，全都在他掌握之中了。

临到岳春上场，他的贴身门徒都在马门上观看，人人提心吊胆。那天是在督院街的南苑内部演出，观众尽是深居简出的高级官员和贵妇、僚属们。他们都听说岳春是一个年逾八旬、满口银须的老叟，不料迈出马门的竟是一个腰杆笔直、步履轻快、俨然二十来岁的翩翩公子，人人震惊不已。莫说这些台下观众，就是成都川剧界的同行和爱好者，听说以后，无不感到出乎意料。岳春把徐子元那种不读诗书、胸无点墨的憨呆神态，演得来细腻逼真，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宦门公子讽刺得淋漓尽致。戏刚演完，台下掌声不绝。他被拥入后台时，只见他精神百倍，笑容可掬，似乎潜力犹足，余兴未尽。看得出来，他是情不自禁为自己在垂暮之年能演出这折唱做俱重的戏而感到极度兴奋。

这台戏演出后，制台根据长期以来流传在广大观众中对岳春的美称"戏中状元"这四个字，特制一对白纱灯笼，作为赠品，以示纪念。制台衙门还配备了一乘大轿，交由岳春的徒子徒孙们护送着返回大邑。百里之遥的成（都）大（邑）道上，一对赫然醒目、精工巧绣"戏中状元"的白纱灯笼在前面开道，后面是几十个门徒簇拥着的四人大轿，熙熙攘攘，热闹异常，真好似新科状元荣归一般。从此，"八十岁的徐子元"，一时被传为佳话。

这以后，岳春就再没有远出了，晚年在老家靠卖"附子膏"为生。据



说，这是他在跑江湖时，西充窦禅寺一个老僧送给他的秘方。每天卖够饭钱，即关门出游。人们经常看到他头披大风帽，手持邛竹杖，鹤须童颜，潇洒出尘，漫步于平云亭、子龙庙以及浅丘林泉之间，俨然画中古人。

但是，四川四大河道的新进演员，慕他的名望，爱他的才艺，仍然不断有人到大邑去取经求教。一次，有个资阳河的演员曾此君到大邑登门学艺，极为诚恳恭敬，要求与岳春合演一折《秋江》。他被这位青年远道而来、学艺心切的热忱所感动，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出演梢翁。时值冬令，不能不内穿羊皮短袄，外套渔公打扮的戏装，好在口条是出自天然的银须。这一老一少，经过一系列水上行舟的繁复表演，小伙子已累得汗流浃背了，而岳春却呼吸如常，从容不迫。无怪观众都说：岳师爷有很深的内功，所以到老不衰。

岳春死后，以“三字科社”为主力的门生故旧，为纪念这个戏中状元，给他在大邑北郊文宫之左，建了一个简雅的墓地。墓前立了一通石碑，上面浮雕着岳春生前喜爱的几折戏文中的人物与奇花异卉，人们称之为“花碑”。如此，岳春真正成了四川戏剧史上口碑载道的人物了！



成都滑稽大王

曾炳昆

◎ 刘墨雨

一日，友人约我到总府街太平洋百货商场楼上去吃美国乡村炸鸡。我们一边品尝异国风味儿，一边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我对友人说："你知道这地方在上个世纪40年代是做啥子的？"友人是一位外乡籍的作家，他回答了三个字，不晓得。我的话便多了起来，叙述了当年这里如何、如何。友人听后倍感兴趣，当场向我约稿，叫我写出来。我坦率地回答他："摆龙门阵还可以，写文章不是我的强项，害怕文不达意啊！"他说："没关系，写！"在友人的鼓动下，我大胆地握起秃笔，像婴儿学走路一样，在纸上爬行。

抗日战争后期，资本家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在当时是一流水平的书场，取名叫新世界。老板用重金聘请了当时的说唱名角，如相书大师曾炳昆，四川清音、金嗓子、外号成都周旋的李月秋，四川扬琴泰斗李德才，北方来的相声双簧娄外楼、戴质斋，山东大鼓孙大玉，四川竹琴圣手贾树三。各位大师的精湛表演轰动锦城，场场爆满，可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引人入胜。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闻讯，不顾千里之遥，前来蓉城灌制唱片，可想他们当时的名声之大，遍及大江南北。华西协和医科大学的美国洋人要用美元预买曾炳昆大师去世之后的脑袋来解剖，研究他的大脑为什么那么发达，聪明、幽默，被曾大师婉言回绝了。

提起曾炳昆三个字，当时的成都人是妇幼皆知的，老成都人有句口头语：曾炳昆的相书儿——打架煞各。这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的歇后语了。这里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相书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北方称它叫隔壁戏，四川叫相书，成都人将书字加以儿化，所以叫成都相书儿。演出时，用几根竹竿，撑一顶长方形布帐子，演员当场步入帐内，学些鸡鸣狗叫、飞机大炮、百鸟朝凤、杀猪宰羊之声，学得惟妙惟肖。这是引子，而后叙述一段完整的喜剧故事，摹仿众多人物对话（有点像现代的广播剧，不过它是一



个人完成的）。有矛盾冲突，笑料不断。故事发展到高潮，打架结束。曾大师的得意之作不少，如《老陕推磨》，要学说陕西话，还要制造推磨的音响效果。他用一个大木盆，手持一个粗瓷大碗在盆内旋转，摩擦出的声音与推磨声无异，效果逼真，该节目颇受听众喜爱。此节目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欢迎，意思是要再来一个。曾大师走出布帐，将桌上醒木一拍，开始说几段笑话，说完后观众才准他下场休息。书场老板专门安置了两盏灯，是为曾大师讲笑话而设置的，当大师一拍醒木，左右两盏灯就燃了，一是加强了亮度，二是为名角之首亮相烘托气氛，三是说明大师讲的笑话在整个演出中的分量。很多老观众都是为了听笑话而来的。大师讲的笑话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主要是针砭时弊，短小精干，语言幽默，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笑料不断。这里举出他说的“八音私包车”。私包车，北方人叫洋车（即东洋车），成都人叫黄包车，也就是人力车，其构造简陋，车行租赁给穷人，沿街等客挣钱。有钱人家将人力车通体油漆，钢铁件镀上克罗米，车身安装上两盏灯，脚下安装了铃铛。当人多拥挤时，坐车人用脚踩铃铛，铃铛发出叮当、叮当之声叫行人让道。曾大师用谐音的手法，巧妙、生动地表演了八种人坐车踩铃的情景。第一种人踩铃的音响叫该当、该当。为什么叫该当呢？他有解释：辛亥革命的同志会元老坐车。二是兴邦、兴邦，指抗日将领坐车。三是清乡、清乡，指特务头子坐车。四是心慌、心慌，指爱嫖娼的人坐车。五是蹬光、蹬光，指在安乐寺内做银元生意的奸商坐车。六是生猾、生猾，指妓女坐车。七是稀脏、稀肮，指贪官污吏、搜刮民财者坐车。八是想方、想方，指那些搞诈骗、专打烂条的人坐车。曾大师还有一个本事，能将当天的报纸新闻改编后，在台上即兴讲说笑话。日本飞机在成都轰炸投弹，大师马上编出节目在台上献演，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清音名角李月秋的拿手唱段《断桥》很受听众欢迎，曾大师用极幽默的语言将《断桥》友好地改编为《丑断桥》，在台上歪唱，娱乐性很强，叫人听了，轻松愉快，哈哈一笑。

曾大师一生创作的精彩节目，那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三友素面的老板用了近三丈的阴丹蓝布做成一顶帐子，上写“滑稽口技”，落款三友素面赠。钟水饺用锦缎做了一张桌围，上写四个字“明朗鸡声”，落款钟水饺赠。现在三友素面已改为三友凉粉。这两家都是成都的有名小吃，除了它们自身的独特风格外，与恐怕曾大师给它们作了十几年的广告也分不开吧！

钟晓帆“脱靴”

◎老 沈

清末民初，有名的评书艺人钟晓帆在成都各茶馆说评书，讲“清棚”。因他技艺高超，又善加“瓤子”，会留“门坎”，听众十分踊跃，场场座无虚席。

有一回，他在东较场附近的迎曦茶社讲《孟丽君》。当他说到“脱靴”一段：“话说皇帝察觉了他的大臣是个巧扮男装的女人，便有意召她进宫饮宴，打算把她灌醉后，即命太监脱下孟丽君的靴子，以查虚实。”说到此，醒木一拍，扎书了，留个“门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这样，今晚、明晚、后晚……说了10个晚上，孟丽君足上的靴子还没有脱下来。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可把几个“丘八”大爷急火了。原来这几个兵是东较场的驻军，每天晚上背着长官从营房翻墙出来听书。头一次回去被发现，每人“赏”了10个手心。但是他们心里挂着孟丽君足上的靴子，第二天晚上又溜出来了，结果回去又挨打。几个兵急了，来到茶馆把钟晓帆抓住问他：

“这靴子脱不脱得下来？”

钟晓帆见拳头在面前晃来晃去，连忙说：

“脱得下来，脱得下来。”

“啥时候脱？”

“马上就脱。”

“哪个给她脱？”

“我给她脱！我给她脱！”

于是钟晓帆上台去三言两语就让孟丽君脱下靴子，拆了“门坎”，评书收场，听众叹息，兵大爷回营。钟老师另觅新馆，赶快乔迁，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代宗师

李月秋

◎ 刘墨雨

老成都人有空在一起摆龙门阵，只要一提起李月秋唱的清音小调来，都是赞不绝口。有位中学教师讲："她的唱腔，硬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哈哈腔是她的独创，快节奏易，慢节奏难呀，有如珍珠落玉盘！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一位美食家说："听一回李老师的清音小调，就好比吃上一碗乌骨鸡汤挂面，挂面一定是中江银丝空心面，加嫩豌豆尖儿的苞苞儿，再撒点儿白胡椒面儿，那么安逸！"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手持佛珠，慢条斯理地说道："月秋的拿手唱段，要算《断桥》。我只听中间一句就过瘾了，哪一句嘛？'刚刚才度活，呔！你就不认我啊！'就听这个'呔'唱得太有味儿了，她把白娘子的善良，对爱情的那个……我都说不来啰！嗯，那么温柔，那么关心、体贴，又有点埋怨，埋怨得又不讨厌，总之只有那么巴适啰！"一位卖草药的老者，外号"赛月秋"，是个清音迷，他说："我只要不听月秋老师的清音，就要害病，我的草药都医不好。咋个才好得倒嘛？放一张唱片一听，精神就来了。我没得文化，说不出个啥子，记得有一回，有个虬脸胡子，和我同桌听书，他对我说：李老师的清音艺术，啥子声情并茂，炉子头的火纯青啊，高山上流啥子水呀，我一句都听×不懂！"说得众人哄堂大笑。

我也来摆一个小龙门阵。记得是在 1956 年，李月秋老师同她的伴奏——多年来的老搭档，也是她的唱段编曲者熊青云老师等人赴京参加第一届音乐周。任务完成后，乘火车返蓉，他们已进入了卧铺车厢，列车还差 4 分钟就要发车了。突然一辆小卧车急驶到车站，一人汗流满面，在车厢窗口通知他们赶快下车，有重要任务，行李只有从窗口送出。几人急步下火车，进卧车到宾馆。问来人是什么任务，回答很简单，不知道，等候通知吧！他们在宾馆一等就是月余，每天不敢外出，只好呆在宾馆内。一

日，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去演出。他们在午后 6 点钟前就做好了演出的一切准备，7 点半钟未开演，8 点、9 点，直等到深夜一点过才通知开演。因为周恩来总理临时接待外宾，把演出时间推迟了。演出正式开始，下面只坐了 3 个观众，正中坐的是周总理，左右两旁坐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演出进行中，见他们在小声交换意见，当然不知道说些什么。演出结束后，次日他们乘车返回成都。事隔将近一年，也就是 1957 年才正式通知李月秋，经审查合格，马上赴京学习礼仪，去苏联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李月秋、熊青云老师等，艺高人胆大，他们不负祖国人民的重托，终于捧回了一枚金质奖章。四川清音为祖国争了荣誉，给成都人民添了光彩。





身带三宝　无人可敌

记成都评书艺人张锡九

◎ 鄢定高　周少稷

清冷的成都街头，被报童的叫买声搅得热闹起来。

“买报，买报！看小事大新闻。‘遗老听书冲宵禁，督军无奈放小民’！”一时，取消宵禁的消息，在市民中飞快地传开了！

那时，正值贵州军阀戴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他怕川省军阀不服，唆使部下兴风作浪，便命令夜间全城戒严。殊不料成都的清代遗老“五老七贤”中的方旭、徐子休、尹仲锡等，有夜听说书的嗜好。他们去书场的路上，受到戴戡的兵丁拦阻，碰了钉子。这些前清的翰林、学台，哪受过这等怨气，便满腹牢骚，一肚子怨恨。他们借题发挥，纷纷指责戴戡“黔驴技穷”，难执川省军政，声言要他下野。戴戡也因宵禁不得人心，迫于各方压力，没两天就取消了“官兵市民人等，夜间不得通行”的禁令。

宵禁被这帮爱听书的老太爷们冲破了。那么说书人是谁？他又为什么使这帮老太爷如此着迷呢？

身带“三宝”震惊书场　口出一技轰动蓉城

其实，在当时无须打听，只要在傍晚时分，到棉花街茶社的书场听上一场评书便知分晓。那个书场，每日傍晚，就挤满茶客听众，各行各业的人众，汇集在这个“小社会”中。前排座位，照例空着，等待几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被戴戡暗中咒骂为几个“老不死的东西”前来就座。他们落座不久，就见一人，轻轻登上四张茶桌搭就的书台，向下面躬了躬身就坐下了。此人青衣小帽，面蓄短须，双目微闭，正襟危坐，神态安详。他凝神片刻，即将小帽摘下，安放桌角。顿时，全场的喧嚣声嘎然而止。有人悄声说：“张老师开讲了。”这张老师便是成都的著名评书艺

人张锡九。那时他的评书，已说到了《紫云剑》中的裴环救主一节。只听得醒木击桌，“啪”的一声，一段《西江月》道罢，便缓缓进入正文了。

张锡九用他酣畅的语言，述说家将裴环，随大爵主常梦麒走马御营，沿途所见的风情。他充分地发挥了语言的描摹功能，准确地再现出景物的形态风姿、顿歇有序，抑扬有致，铿锵起伏、跌宕生姿，随景生情，因情变声，使满屋茶客、听众陶醉在谐美的节奏之中。

突然，马声嘶鸣，人声震撼。张锡九的口声技艺，使遍座震惊，他的评书已说到“路遇灯竿危难”一段：

“街上人众一片喧哗，跑的跑，逃的逃，如同猛虎追来一般。那大爵主抬头看见灯竿裹着风声，挟着瓦片，卷着灰尘，犹如半空中扑下的惊雷，劈顶震响；又似高山危石俯冲而下，兜面而来，只骇得他大汗长流，魂惊魄落。心想：没料到我常梦麒一生忠义，壮志未酬，今天竟然在此遭遇绝路。他想拉马，马打响鼻，绊着绳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他想翻鞍，腿脚不灵，上不能上，下不能下……”

张锡九这一段书说得真可谓非极说不足摹其神，非长言不足骋其情。他用语如泼，铺陈排比，层层渲染，往复加深。说得穷形尽相，惊人耳目；讲来淋漓酣畅，撼人心弦。“啪，啪，啪！”三声醒木脆响，方使满座听众茶客回过神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听书。

接着，张锡九停顿片刻，口吐珠玉，又开新声：

“正值大家哎呀声未落，只见马后忽地窜出一个汉子，站在马前，伸出双手，犹如擎天石柱，迎着劈空而降的灯竿。他大喝一声：‘站住！’前后脚一马叉，迎着倒下的灯竿。他一启动、一耸肩、一蹬脚，但见倒下的灯竿，从他手中飞起，直端端地落在洞中。那人一手扶竿，一手向看呆的人群招呼：‘还站着干啥？快来埋竿！’惊魂方定的人们经他一喊，方才回过神来，齐声赞道：‘好神力也！’”

此时，听众那番替古人担忧的悬心才落到实处。书到这里，张锡九站立起来缓声漫语道：“诸位，你道此壮士何许人也？”场内外激奋的听众齐呼：“家将裴环！”……

半月以后，张锡九说完了他的三部长篇评书《天宝图》《玉狮带》《紫云剑》，使蓉城听众耳目一新，交口称誉。当时人们称赞张锡九“肩背《天宝图》，腰系《玉狮带》，斜插《紫云剑》，身带三宝，无人可敌”。



学技艺茹苦含辛　效前辈业精行成

成都的评书听众，大多只知道张锡九是评书状元钟晓帆的得意门生，钟晓帆曾题赠“业精于勤”的单条。但知道张锡九是怎样受益于这幅单条的人，却不多了。

张锡九拜门于钟晓帆后，含辛茹苦学艺数年，登台说书不久，就小有名气了。一日，他自恃聪慧，向钟老师讨学《玉狮带》。钟老先生暗忖：“此子可教。”但却故作声色地问道：“你要学讲这部书，有何根底？”张锡九躬身回答：“弟子随老师多年，习口声，操技艺，今日斗胆相求，务请老师应允。”钟晓帆见张锡九态度诚恳，暗自高兴，嘴中却说：“那好，你可知道我们这行‘吃开口饭’的规矩？”一句话问得张锡九语塞。钟晓帆接着说：“常言道，单凭一张嘴，说动万千人。你今天方能声出一堂，还不懂声震一里的道理。你练七七四十九天的内外功力，再说习讲《玉狮带》的事。”

从此，张锡九晨迎朝晖初照，夜送更敲三响，一哼一哈地练吞吐丹田之气的功夫。眼见四十九天就要到了，他急不可待要把老师的“打门捶”接过来。

这天，刚过四更，月华如水。张锡九绕过城角的一湾绿水，登登登地跑上东华门的城墙，照旧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苦练。他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正在操练武术，挥拳伸腿，疾如旋风，凌空落地，稳如鼎钟。张锡九在迷离中定睛看时，不禁惊呼：“老师！”原来这练武的人正是钟晓帆。张锡九暗想：“老师年迈，竟有如此功夫，真叫我年轻气盛的人惭愧。”这时，钟晓帆也发现了张锡九，说了声：“跟我来！”师徒二人便在城垛处站定，钟晓帆轻轻运气，一声“嗨——”脱口而出，那“嗨”声如波似浪，一叠一叠迭地往前赶去，掠过树梢，飞过屋脊，越过府河，时过片刻，那“嗨”的轰鸣声，还在对岸回荡不息。钟晓帆又把惊呆的弟子带到城墙边的一丛芭茅竹近旁站定，缓缓的一声“虚——”，震得七八尺开外的芭茅剑叶瑟瑟作响，芦花纷纷落地。这“嗨——”“嘘——”，看得张锡九目瞪口呆，随后对着钟晓帆倒头便拜。从此，张锡九习艺更加勤奋刻苦了。

钟晓帆在向张锡九传授《玉狮带》之前，先讲了这部长篇评书的来历：清宣统二年，钟晓帆在东较场迎曦茶社献艺时，结识了下江人李某。此人精通文墨，博览群书，不意仕途，偏爱搜集天下旧闻轶事。他喜听钟晓帆说书，二人结成友好。他花了数年功夫，写成一部五十余万字的话本，在其返归故里之时，将书稿赠给钟晓帆。钟晓帆闭门潜心整理一年有余，才使这一部作品与成都听众见面。钟晓帆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慎重地叮咛张锡九说："前辈人多年苦心，才换来今日这门艺术的盛况，你一定要继承下去，做到'业精行成'啊！"并书赠条幅一帧，以示勉励之意。

为艺术暮年重登场　逢黑暗辞讲究可哀

在四川评书的讲台上，张锡九苦心探索几十年，使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他点拨的师弟李锡林、李勋臣，受他教诲的学生李润明、张连波等人，都成了艺绝一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张锡九本人被誉为"评书大王"。晚年，他听从晚辈规劝，息书养怡，但从未把这门声口艺术的提炼、整理丢于脑后。

张锡九息书后，茶客听众们总觉得听书不过瘾。始而议论，继而敦请，最后又登报邀请张锡九再登评坛说书。其实，脱离评书讲台，本不是张锡九的初衷，今见听众鼓噪而来，使他的心又向往那三尺讲台了。为答谢听众的厚爱，他在"香泉居"挂出粉牌，重新登台。"身带三宝的张锡九又讲评书了"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吹遍九里三分的蓉城，听书的接踵而来，比肩而立，整个书场都挤爆了，境况比张锡九成名之时更胜一筹。

张锡九精神矍铄，一副敦厚的长者风度，娴熟的技艺不减当年。他绘声绘色地把人们带进艺术之宫，给人以美的享受。细微之处，眉目传情，嘈嘈切切，令人神往；激越之处，气势澎湃，八面威风，令人振奋。一场《玉狮带》下来，时人赞他"宝刀不老，珍艺永存"。

然而，时隔几天，报上突然登出一则张锡九的"敬辞登台"的启事。原来，在他重新登台不久，就发现听众中有他熟悉的同行，一打听，才知道他们的听众被自己"抽了签子"而歇业了。他悔恨自己的草率，使同业艺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加之，警察局长说他讲书，每夜招来人员过多，有碍治安，要他拿出一笔维持治安费；地方恶霸又向他讨乡里钱。于是他决



计拆书场，擦粉牌，永不再说书了。

张锡九讲最后一场书的那天晚上，听众把香泉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听众一直站着把书听完。之后，只见张锡九端正衣襟，躬身站立，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向听众作揖告别。他那白皙的脸上老泪纵横。尊敬他的听众，久久地同他相向而立，缄默无语，一直看着“身带三宝，无人可敌”的评书艺人，缓步踱下讲台，走出茶肆，消逝在深夜的黑暗中……



清代戏曲大师魏长生

◎ 蒋维明

“皇姑”之谜

成都市金堂县城隔镇绣水河畔（今属成都青白江区）原有一座“皇姑坟”，据乡民代代相传，内中安埋的是清乾隆皇帝的公主，民间尊称为“皇姑”。

“皇姑为何埋葬此地？是她下嫁到成都平原么？”

熟悉乡土掌故的老农，回答得是如此的语出惊人：“这皇姑不是爱新觉罗皇家的女儿，他是个金刚罗汉体……”

听后满头雾水：“公主怎么会是男身？”

“他在绣水河畔土生土长，姓魏名长生，一代名伶，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顶尖级大哥大。”

“大腕与皇姑，怎么能牵扯在一起？”

“当然有关联！这里，还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掌故哩。”

少年喝噜子

魏长生的人生之旅充满传奇色彩。

他原名魏朝贵，字宛卿，行三，人称魏三，生于乾隆九年（1744 年）。家贫，父早死，全靠母亲做些零活勉强维持生活。在他 10 岁左右，母亲辞世。他与流浪儿为伍，捡拾破烂，备尝艰苦；曾一度到省城成都学唱过川戏，技艺很一般。大约在学艺前后，混迹于当时下层社会边沿人物的江湖组织 喝噜子，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咽噜子是江湖哥老会的早期组织形式，始起于“南（终南山）巴（大巴山）老林”中的流民，继而传播于成都平原各乡县。据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介绍：“川中膏沃，易于存活，各省无业之民，聚集其间，结为朋党。其头目必才技过人，众共推之。择长林深谷，人迹不到之处，操习拳棒刀铳各艺，故其艺颇精。”

原金堂县川剧团老艺人中普遍传说：魏长生随一伙参加过咽噜子起义的江湖艺人流落陕西，会合一个秦腔小戏班改学秦腔。当时川、陕两省，归川陕总督治理，是一个行政区域，交往频繁。

流浪陕西之后，他在西安举目无亲，人地生疏，遭人欺侮。后因与邻街商家的学徒斗殴伤人，畏罪潜逃，亡命洛河，加入同州梆子戏班。一切退路都已断绝，环境迫使他奋发学艺，起早摸黑，唱做念打，出大汗、吃大苦。他发大愿：艺不惊人死不休。

因为有少年咽噜子那段不平凡的经历给他“垫底”，魏长生富于冒险精神，敢于挑战环境，又具有相当组织能力。十年磨剑，艺海扬帆。他的演技，先是在几百里秦川脱颖而出，继而随戏班北上京师，问鼎中原。

名震京华

清初，北京戏曲舞台最盛行的是昆腔与京腔（源出弋阳腔，亦称高腔，传至北京的称为京腔，并非后来才形成的京戏）。到了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省的地方戏曲借着给皇帝或皇太后祝寿的名义，纷纷进京献艺。“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因为剧种很多，为了“正名”，戏曲开始被分为“花”、“雅”两大部分。“雅部”专指昆腔，“花部”专指昆腔以外的包括京腔等各地方戏曲剧种。当时昆腔逐渐衰落，北京梨园中“花部”以京腔最为盛行，王府戏班皆演京腔。

乾隆三十九年（1774），魏长生挟秦云蜀栈的雄风，率领秦腔戏班初入京师。戏班的行当整齐，基本功扎实；演出剧目具有深厚的生活气息，且化装改进。魏长生创造西秦腔（西腔），“以胡琴为主，月琴应之”，有别于“以梆子为板”的秦腔，“善于传情”。所以魏长生艺帜高举，一鸣惊人。小铁笛道人在《日下看花记》中叙述道：“长生于乾隆甲午（1774年）始至都，习见其《滚楼》，举国若狂。”其时，皇族权贵礼亲王昭木连在所

著《啸亭杂录·卷八》记述："魏长生于甲午岁入都，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即翰林院　　笔者）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白，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

强劲的"魏旋风"劲吹梨园，不仅雅部昆腔更日趋没落，连花部的京腔也大为失色，竟"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燕兰小谱》）。魏长生作为戏曲史上"花部"的优秀代表，从此彪炳史册，"海外咸知有魏三"。近代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所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魏长生称颂为"旦色界辟一新纪元的天才，得写实之妙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魏长生成名后曾一度遭谗，被统治者诬以表演"淫秽"而离开京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魏长生再次入京。当时的秦腔戏班"双庆部"上座率不佳，几乎在北京立不住脚跟。魏长生挺身而出，愿入班挑大梁，力挽狂澜，并表示：入班两月之后，定要给演员们增加薪水。他再次以《滚楼》赢得了京都的观众，人气很旺，"观者如堵"。"双庆部"成了北京市民争相订票观看的戏班，演员收入大增，魏长生有了丰厚的进项。由于有了积蓄，他曾经多次资助过上京参加会试遇到困难的读书人。"少年啯噜子"疏财仗义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得以发扬。有一位病困客栈的姓高的举人得魏长生雪中送炭，后来考中进士，分发到成都府华阳县任知县，后还与魏长生在成都重逢。

皇妃认女

魏长生进京走红后，常在四川同乡会所在地四川会馆会朋友、出堂会。四川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内，馆址原是明末女将秦良玉的公馆，清乾隆年间改建成四川会馆。四川罗江籍名士李调元先后在翰林院和吏部任职，魏长生与李调元一见如故，结下深厚的友谊。魏长生很赞赏李调元为四川会馆撰写的佳联：

此地可停骖，剪烛西窗，偶话故乡风景：剑阁雄，峨眉秀，巴山曲，锦水清涟，不尽名山大川都来眼底；

入京思献策，扬鞭北道，难忘先哲典型：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行见佳人才子又到长安。



对联描绘蜀中名山胜景、地灵人杰，眷恋故乡热土的情怀，油然而生。就在四川会馆戏楼的一次演出中，来了两位特殊的观众——乾隆皇帝和他宠爱的一位皇妃。

原来，皇妃只生有一位公主，爱之犹如掌上明珠，却不料于半年前英年早逝。从此，皇妃悲伤不已，日见消瘦。乾隆皇帝为了排遣爱妃的愁郁，特地携她出宫消遣，二人乔装打扮，来看名伶魏长生的剧目。皇妃为魏长生的扮相、身段、唱功所迷，尤其令她怦然心动的是魏长生与她朝思暮想的公主，模样儿十分相似。她情不自禁地向乾隆说："万岁爷，那位扮演辽邦公主的，就像我们死去的和硕恪格格。"乾隆怕皇妃伤心，连忙说："爱卿既然喜欢，那就收他为格格，作卿的干女儿吧！"魏长生次日奉旨作辽邦公主装束，进宫向皇帝、皇妃谢恩。由于这次奇遇，民间尊称他为"魏皇姑"，长生死后埋在家乡的坟墓自然也被呼为"皇姑坟"了。

传艺扬州

饮誉京华之后，魏长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来到当时南方的戏曲中心城市——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这儿是盐运、漕运的枢纽，商贾云集；戏曲鼎盛，"花部"勃兴，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争妍斗艳，异彩纷呈。这时，盐运御史伊龄阿、图思阿奉旨在扬州设署衙机构修改戏曲剧本，编印了包括各个地方戏曲剧本一千多种的《曲海》丛书。

被誉为"野狐教主"的"花部"泰斗魏长生，在扬州又一次刮起旋风。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一个大力提倡戏曲的盐商巨富），演戏一出（春台班），赠以千金。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湖水乱香。长生举止自若，意态苍凉。"戏曲理论家焦循赋诗赠魏三："娇歌一曲令人醉，纵有金钱不轻至"，赞赏备至。"市井中……转相效法，染及乡隅"。

附近各省市、各剧种的演员，纷纷涌至扬州，一睹魏三的风姿，观摩他在"春台班"里的演出，请魏三传授技艺。苏州戏班又邀请他去昆曲发祥地的苏州。江南伶人，包括昆曲子弟也来学习他的演技和"跷工"以及创新了的化装艺术——"梳水头贴片子"。他的"善于传情、动人倾听"

的艺术奇葩，播种到大江南北的梨园，许多剧种从中得到养分的滋润。他所新创的西秦腔，“徽伶尽习之”，并对一百年后形成的京剧艺术起到了催生作用。对此，京剧大师梅兰芳等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遗惠桑梓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魏长生又遭遇仇家陷害，“以事押回原籍”（《啸亭杂录·卷八》），具体情况不明。他这次回川，购园卜居于成都东较场附近。杨燮在嘉庆初年刻印的《锦城竹枝词》中写道：

无数伶人东角住，顺城房屋长丁男；
五童神庙天涯石，一路芳邻近魏三。

诗末原有注云：“各部伶人都在东顺城街、五仙庙、东较场一带居住……（魏三）有别宅，在省城内东较场口，台榭颇佳。”魏三定居成都10年，与川剧艺人结邻而居，许多艺人原是他幼年学唱川戏的师兄弟。魏长生与他们同生活、共演出，对于川剧“五腔一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时，李调元也因蒙冤下狱后被放逐回四川罗江县故里。李调元不仅是诗人、文学家，同时又是戏曲家。他家里办有戏班，他“自敲檀板课歌童”。魏长生归里不久，曾托人带信向李调元致意。一天，李调元在金堂县衙署的筵席上接到书信，并吟成两首五律《得魏宛卿书》，其一曰：

魏王船上客，久别自燕京。
忽得锦官信，来从绣水城。
讴推王豹善，曲著野狐名。
声价当年贵，千金字不轻。

“魏王船”用曹公载妓船游的典故，借以切合魏长生的姓氏、职业，亦似间接点染魏三的“皇姑”身份。“久别自燕京”是回首当年在四川会馆的交往。“王豹”句用“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之典故，既与“野狐”巧对成趣，又暗寓对“野狐教主”（“花部”泰斗）魏长生推动四川戏曲的殷切期待。

魏长生不负故人的期望。他返川不久，成都府华阳知县特来拜访，厅堂相会。原来知县就是当年病困京师、得到魏长生资助的高举人，后来考



中进士，分发到成都府任华阳知县。其时，清初重建成都（因明末战乱、市廛变为废墟）接近完成，各行业分区规划，而梨园公会的地址尚未选定。魏长生将川戏伶人申建“老郎庙”的报告呈递给知县。几天后，批文下来，庙址选定在成都华兴正街北面，东西长 570 市尺、南北长 330 市尺。魏长生牵头倡修的“老郎庙”仿苏州梨园公会的建筑风格，内塑梨园祖师爷唐明皇——老郎。“老郎庙”清末改建为“悦来”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修，名为“锦江剧场”，今为“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锦江剧场”。两百年间，她成为川剧艺术的圣地。

“老郎庙”建成，魏长生曾在戏楼上演过他的拿手好戏：高腔《汉贞烈》（即川剧《王昭君》）。李调元观看了演出后盛赞道：“近见（魏三）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涂铅华，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此时魏三已年近五旬，但因保养得好，扮相出来仍是青春焕发、容光照人，还是“梨园佳子弟”形象。李、魏二人的交谊很深，清代四川艺坛的双子星座这次相会，被后人传为佳话。

以身殉艺

清嘉庆五年（1800 年），魏长生第三次出川，献艺北京，时年已 57 岁。这次复出，在“三庆部”挂牌主演《香莲串》《烤火》《大闹销金帐》等秦腔剧目，“声容如旧，风韵弥佳，演武技气力十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演戏仍是那么一丝不苟，武功更是炉火纯青，充分展示从少年咽噜子便炼就的拼搏精神和钢筋铁骨。毕竟岁月不饶人，他在京师红氍毹上呕心沥血地耕耘了三年，终于不支，倒在了他醉心的五彩舞台上。《梦华琐簿》记载：嘉庆七年（1802 年），“夏月搬《表大嫂背娃子》，下场气绝。”将军马革裹尸、伶人以身殉艺，壮哉！

小铁笛道人是魏长生的忠实观众，他在一代名优死后，写了两首追悼诗，情真意挚极富史料价值：

英雄儿女一身兼，老去登场志苦严。
绕指柔合刚百炼，打熊手是玉纤纤。
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
幽魂远赴绵州道，知己何人为脱骖。

魏长生成名后颇为富裕，但他淡泊钱财，乐施好善。他有一颗侠义丹心，热忱公益事业，扶危济困，帮助贫民、落难者，到他身死之日，已无多少余资。《啸亭杂录》记："壬戌（嘉庆七年）送春日，卒于旅邸，贫无以殓，受其惠者，为董其事，始得归柩于里。"

他的徒弟甚多。死后，由其徒陈银官等素车白马送回四川金堂，安葬在绣水河大石桥畔，民众称之为"皇姑坟"。

从少年咽噜子到一代名优，魏长生走完了极不平凡的59个春秋，用毕生心血在中国戏曲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周企何传奇

◎ 陈国福

周企何艺名的由来

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姓名里面包含着两个姓。1980 年 12 月，周企何赴香港演出《迎贤店》与《意中缘》。他这个姓名引起港报记者的特殊兴趣，曾为此专门作了采访。周企何回答说："我这个名字，还有一段'古'呢！"

周企何原名"圆圆"、小名"圆娃子"。1911 年 12 月 27 日（农历冬月 17 日）出生在成都市梨花街一个小商家庭。6 岁那年，父亲吸鸦片，荡尽家产，弄得穷无立锥，室如悬磬。奶奶、母亲相继亡故，姐姐嫁与他人作童养媳。两年以后，父亲又不幸逝世。圆圆孑然一身，在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和群仙茶园（今王府井商场）帮艺人买烟递茶，跑腿糊口。幸遇"太洪班"老艺人何玉山收养，才得避免饥寒，有条活路。

何玉山时年 58 岁，新招徒弟，喜得义子，乐得呵呵直笑。这个专唱"下四角"的老花脸，孤身半世，只挣下一床油渣棉絮，又烂又黑又腻。爷儿俩紧挨着睡，圆圆感受到亲人的温暖，睡得很香甜。何玉山却周身燥热，夜不能寐。他想到周、何两姓，圆圆有家不成家，自己无家难成家，这究竟是为啥子哟……

次日清晨，何玉山叫醒圆圆，从头到尾地帮他理好衣服，口里一再叮咛："我们'太洪班'很讲规矩，上台演戏，'宁穿破，不穿错'。平常时候，帽子戴正，纽扣扣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是吊儿郎当的，轻则挨骂，重则受罚！记住：'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何玉山在台上"踩得烂"。"太洪班"演出的戏，他都"包本"。三国

戏里的颜良、文丑、蒋兴、周泰、刘封、关平……总之，戴“披巾”的将军他当完啦！圆圆十分崇敬何大爷，觉得他肚子里好戏多，了不起，跟着他，一辈子也学不完。何玉山见圆圆聪明伶俐，喜爱川戏，心中格外高兴，想到自己从艺几十年，还有一个可靠的传人，也乐意倾囊相授。白天，他将圆圆双腿捆在板凳上，教他迁腿；然后，说一个戏，念一段腔。每见圆圆学艺有长进，免不了带他到隔壁小吃铺，奖励两个糖油果子。夜戏幺台，爷儿俩睡在一起，何玉山便给圆圆讲三国故事。讲到精彩处，他留个尾巴吸引圆圆，听了头回想听二回，最后等于通读了一部《三国演义》。

春节将至，圆圆跟随何玉山去嘉定（今乐山）牛华溪演出。初四那天上《花田错》，圆圆在剧中扮演书童刘永。平常时候，他穿件马衣，扮个小校，跟着“头旗”走，只在台上绕个“圆场”或站一站。这回要开腔了！刘永要说话，还要吟诗。上装以前，圆圆背了又背，角色的几句生词，好不容易在肚子里“煮熟了”。这阵守候在马门，心跳得厉害。忽然，一股煤气灯的强光射进后场，打杂师撩开门帘，招呼圆圆登场。圆圆猛被强光刺激，只觉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啦！他双腿打战，趔趄不前。何玉山十分着急，就势一掌，将圆圆推了出去，连声宽慰道：“圆娃子吔，慌不得，慌不得！”

圆圆站在台上，嘴皮哆嗦发抖，道白颠三倒四。有人往台上丢烂草鞋，抛甘蔗头。场面摆在台上，马锣“呔、呔”一敲，惊得圆圆浑身出冷汗，不觉尿流了一裤裆。何玉山哑着嗓门，竭力打气：“要沉着，跨出去！”

打杂师早已看在眼里，这类事例他见得多，忙向门帘内拍拍胸脯，示意何玉山放心，旋即奔到台口，借搬弓马椅的机会，对饰演周通的师傅送去几句悄悄话。那位大伯心领神会，亲切地招呼圆圆走上前去：“刘永哪，不要慌，慢慢道来。”

圆圆鼓足勇气，迈向前台，稍定魂魄，气也匀了，这才把戏演完。进到内场，何玉山将圆圆抱上衣箱，迅速脱下他的湿裤了，连声夸奖：“嘿！今天算你娃娃‘惊了汗’啦！对啰，对啰！”

“大爷，台上流尿还对呀？”

“惊汗心不虚，学得出来，学得出来！”



圆圆像吃了糖油果子那样，心里甜滋滋的。生活的坎坷促他早熟。以后，圆圆在《安安送米》《打猎汲水》等剧中饰演“娃娃生”，能讲、能唱、能做，受到大爷、伯伯们的啧啧称赞：“哈哈哈！圆娃子真是一个‘小精灵’，不学则已，一学就会，可以拿工价银啰！”

正当圆圆艺事大进，何玉山却不幸辞世。他对圆圆的骨肉深情和艺术熏陶，长久地震颤着圆圆的心灵。圆圆为了表达想念仰慕之意，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企何”。后来，这竟成为他的终身艺名。

“三庆会”拜师唐广体

周企何从嘉定回返成都，来到东门外的“状元楼”。状元楼大约修建于清代光绪（1875－1908）年间，乍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雅号，其实只是一家茶灶，兼营菜饭，一楼一底，有两间铺面那么大。它是川剧艺人搭班的联络场所。每逢冬、腊月间，乃是戏班演出的淡季，观众稀少，人不敷出。班主往往“扎班”辍业，整得艺人星散，四处“跑滩”。好先生有人上门相聘，吃穿不愁；更多的艺人则在状元楼“会哨”，做班子的“本家”也到此间“团人”。那些等候买主的穷苦艺人，每人提个烘笼，泡碗淡茶，眼巴巴地盼望有人找自己洽谈生意，饿了便“喊饭”，一碗豆花、一碟咸菜，一个“冒儿头”（一碗垒尖的大米饭），胡乱充饥。如果挨到腊月二十四、二十五都还“卖”不出去，穷途末路，饥寒交迫，只好把身边唱戏的“行头”（靴子、网子等物）典当出去，等到开春搭上班子，拿到预支的年钱，再来还债赎取。后来，由状元楼发展到天涯石街、鸿春里，皆属伶人住地。有杨燮于嘉庆八年（1803年）所作锦城竹枝词为证：“无数伶人东角住，顺城房屋长丁男。五童神庙天涯石，一路芳邻近魏三。”状元楼以东，是娘娘庙，相传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金堂县人，行三，俗称“魏三”）曾住此间。其时，正巧“三庆会”缺一个娃娃生，在张少华引荐下，周企何搭上这个著名川剧班社。

周企何加入“三庆会”，正值其隆盛时期。在他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这里的艺人不再为了填饱肚子东奔西走、忙碌终日，而是潜心钻研，锐意求索。每天晚上，夜戏幺台，康芷林、唐广体、萧楷臣等几根“柱柱”，以及唐德彝、鄢炳章、陈福庭、小琼芳、小漱芳等主要角

色，都要留在后台的一间小礼堂里聚会碰头，犹如众星拱北，交相辉映。周企何帮着搬竹椅，端点心，冲茶，点烟。师傅们见他人小懂事，尊敬长辈，都很喜欢他，免不了赏他一个蛋糕。他靠在倚背上，听前辈议论当晚演出的得失。相互切磋，休戚与共，充满着一种“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可贵精神。一个戏演成功了，便举行“王会”“飘兰草”（逗钱打平伙）。康芷林擅画山水、花草，尤以兰草称绝。由他先勾几撇兰草，先在根部标注金额，多少不等，然后蒙住，亮出叶尖，每人任选一撇，按图付款。当然，也有未注金额的，那便是白吃。周企何藉此机会聆听前辈教诲，长期感受“三庆会”浓郁艺术气氛的熏陶。与此同时，周企何经常“穿角”，康芷林在《祝庄访友》中饰演梁山伯，他配演四九；贾培之在《上天台》中饰演姚期，他配演姚刚；萧楷臣在《彩楼记》中的《逐婿》一场饰演吕蒙正，竟由周企何扮演丫头梅香……

周企何初随唐荫甫习小生，后因倒嗓改行，向唐广体学演丑角。唐荫甫系唐广体义子，周企何遂以“师爷”称唐广体。那时候，唐广体年逾五旬，人胖好静。他本来家住东卡龙街的拐枣树庄，平常时候很难得回去一趟，有什么事当办，便叫周企何跑腿。每逢盛夏，他尤怕炎热，常在悦来茶园的“普通”间里，找一个阴凉透风的地方歇息养神。周企何伺候在侧，有时给师爷煽扇子，有时到茶园对面的“盘餐市”切菜、端稀饭，有时还要搀扶师父进厕所，给师爷递草纸。唐广体躺在马架子上，爱打瞌睡，周企何不敢惊动师爷。见周企何人小机灵，手脚麻利，当他精神舒畅的时候，也很乐意念几句词，说两段戏。师爷说什么，周企何记什么。唐广体常常提醒周企何：“捧这碗戏饭，要紧的是多看多想，揣摩人物。”短短两句话，给周企何很大启发。他观赏师爷演出的拿手戏，诸如《柴市节》中的留梦炎，《江油关》中的马邈，《闹齐廷》中的齐桓公，以及《情天侠》（即今《迎贤店》）中的店婆，《奔途遇美》（即今《投庄遇美》）中的梅媪，皆独步当时，颇受厚誉。特别是师爷在《意中缘》中先后扮演是空和尚、风流名士、纨绔子弟、尼姑及无赖黄大监等5个性别、性格各异的人物，更是各具风姿，奕奕传神。周企何倚在马门偷师学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像牛儿吃草那样，不断地咀嚼回味，体会个中奥秘。



四处寻师演丑角

周企何艺宗唐广体，又四处寻师求教。为了亲近鄢炳章师傅，周企何常帮他打酒，裹叶子烟，又陪师傅上街进馆子。当然，每回都是周企何争着付钱。接连吃了几次，鄢炳章说话了："都是你掏腰包，我也不好意思。这样，我们打伙买口锅，垒个灶，自己动手，吃啥都方便。"

一天，鄢炳章得了观众送的一块玻璃牌，周企何藉此备下酒菜，以示祝贺。鄢炳章夹了块肉，呷了口酒，沉默许久，方才开腔："企何呀，'好'字后面还有棵黄豆芽（逗号）哩，你念断句嘛！"

"'好，不笑人。'"周企何先顿了一下才接着念，不禁笑出声来，"哈哈，念成一句，便成了'好不笑人'，意思都不一样啦！""对啰！"鄢炳章放下酒杯，点头叹息，"我这个人上台演戏，就不像那些'滑稽大王'，专卖嘞头，令人喷饭。那叫啥子戏哟！"

"鄢师傅，"周企何困惑不解地反问："演丑角戏，'不笑人'行吗？"

"我只求功夫到家，从来就不想其他。"鄢炳章将一颗花生米分两半丢进嘴里，边嚼边说，"圆娃子吔！干我们这一行，就得炼一身真功夫！"

周企何最先向鄢炳章学演《瞎子算命》。算命先生扯胡琴，背"甲子"，佶屈聱牙，十分拗口，周企何学来倒背如流，一口气到底。余何瞎了难装。在鄢师傅的指导下，周企何常去茶场酒肆，注意观察各种盲人，特别是瞎眼算命先生的生理习性、心理特征及职业特点，从中归纳出盲人的习惯动作：经常装出一副笑脸，颇多怪相；说话不看方向，声音特大；动辄伸手乱摸，以手代目。他把这些动作加以必要的程式规范，作为塑造艺术形象的生活依据。为了熟悉《瞎子算命》，周企何来到江边，找个背静地方，继续复习。不料引来一大群人，争相观看。忽然，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位老太婆，拉住周企何："俗话说得好，'富烧香，穷算命。'我老婆子还不起愿，瞎子，给我算一算命吧！"

"人家是演戏的。"有人在旁解释说。

"不，不是演戏。"老太婆将周企何上下打量一番，摆手摇头道："你们看，眼睛珠珠都没有啦，睁眼瞎嘛！你听他唱的、拉的，哪样不是算命先生？我活了几十年，见得多，见得多！"

“哈哈哈！老人家，你真的看错啦！”周企何眼睛一眨，翻出眼珠，“我正在练习《瞎子算命》这个戏哩！今晚请到戏园赏光。”

再说周企何远赴叙府（今宜宾），向自贡名丑刘安民问艺。刘安民年近花甲，在《议剑献剑》中饰演曹操，双手背剑，踢剑出鞘，矫健轻盈，独具深功；饰演《审玉蟹》中的宁欣，把富家子弟的骄横与尖酸，活脱出来，令人切齿。刘安民乐于传艺，有求必应，见周企何虔诚恳切，当即耳提面命。

几年以后，恰逢新春，刘安民上成都赶青羊宫花会。周企何闻知，特意为刘师傅安排住宿，盛情邀请到悦来茶园“客串”《审玉蟹》《议剑献剑》《西关渡》等剧。登台之日，周企何专门到商业场绸缎铺，租赁了十几匹料子，为刘师傅披红捧场。艺事之余，又为刘师傅当向导，逛花会。刘安民抚今追昔，深有所感地说：“你也是哟！那年到叙府求艺，还送我20块大洋。其实，我不缺钱花。我在自贡置有一只盐船哩！”

“有道是，饮水思源。您老人家教过我几折戏嘛！”周企何受业人室，坦诚地说，“我只要演到《审玉蟹》，就想起您老人家来啰！”

“你现在都算成都‘三庆会’的好先生了，还瞧得起外县乡班子的‘野仙’，真令人高兴哪！”

师友生平张大千

1939年，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回四川举办画展，寄住在成都骆公祠街严谷孙家里。绘事之余，他常往悦来茶园观赏川戏。一次，看了周企何演出的《请医》，惊叹、称赞，乃遣人相邀，当面晤谈。周企何素来酷爱国画，喜欢结识画界名流。闻此消息，兴奋异常，先去连升巷一家小吃店，买了一包烟熏牛肉作礼信，登门造访。

大千先生时值四旬，脸庞丰腴，胡须满腮，玳瑁眼镜后面，双眼炯炯有神。见客人驾至，忙整理长衫，拱手相迎：“哎呀，怎么让你破费呀？”

“成都风味小吃，恭请先生品尝品尝。”

“那我就不客气啰！”大千先生解开茶叶包，先看了看，便拈出一块送进嘴里，一边品味，一边点头，“色鲜，味美，化渣，不愧锦城名小吃。哈哈哈！”





周企何开始还有些拘束，主人几句戏言之后，画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千先生忽感歉意地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没有内江蜜饯（大千先生系内江人，内江盛产蜜饯）回敬你，怎么办呢？"说着，顺手拾起桌旁一柄纸扇，展放桌上，朱笔几点，一幅荷花开放池中的扇面，入目鲜明。

周企何频频吹拂扇面，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谢。望着眼前的周企何，大千先生心摩神追，兴致益浓，又缘笔染色，将周企何演出《请医》中转瞬即逝的神态美，折射到四开宣纸之上，并题诗赞曰："戏画周企何，人说严谷老。左手挟药箱，招牌是'益好'。本欲移赠君，犹恐被君恼。企何持归去，永以为家宝。"当时，严谷孙在鼓楼街开设一间中药铺，广济世人，挂牌"益好堂"。大千先生假借戏中骗钱误入的庸医温先生，与房主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当时，陈书舫在悦来茶园演出《意中缘》（饰杨云友），受到大千先生啧啧称赞。消息经周企何传到陈书舫耳里，当即央求道："周师兄，请你带我去见见他好吗？"

当天下午，周企何相约陈书舫前往。陈书舫时年17，头上扎着两根小发辫，上面系着红头绳，穿着一身整洁的素花衣服，进到画室，不待介绍，也不吱声，径直迎上画案，双手交叉，靠在桌沿，聚精会神地观看大千先生巧弄丹青。大千先生猛见陈书舫，连忙招呼客人落座，又端出一盘核桃仁招待。周企何向陈书舫介绍道："大千先生不吸烟，不嗜酒，最爱品尝家乡的核桃。快请吃吧！"

陈书舫腼腆地摇摇头，仍然倚在原处，神态可掬，竟被大千先生运用白描手法，留在尺素之间，并在画的左下角题款："辛巳（1941年）3月11日，书舫过我寓斋，戏为写影，博笑。大千居士爱。"

陈书舫正欲趋身上前接画，不料竟被在场的林君墨先生抢先接去。他反复端详，连声赞叹："莫忙！八先生（张大千排行第八）留下这么一片空白，让我找几位名家题诗，以光画面，岂不更好？"

大千先生所写陈书舫小影，当时便暂留林君墨先生处。殊不知林公溘逝，此画竟失落民间。直至1953年，才辗转传到谢无量手中，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一次，周企何陪同大千先生在峨眉山接引殿避暑，览胜观光，切磋技

艺，相处半月有余。林间采回猴头菌，由大千先生制作烂肉绍子，经他一番烹饪，遂成珍馐佳肴，但觉异香扑鼻，令人口角流涎。大千先生由烹饪言及绘事，颇有见地地说："衣当重彩，食要美味，绘画也复如此。重要的不在技巧，而在味道正否。趋时谄媚者，太俗气；草率急就者，太浮气；因袭相陈者，太匠气；若将生活中的某些丑行与恶果形诸笔墨，甚至大肆渲染，更是一股令人作呕的秽气。作画务求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去秽气。甑觚献技，我看也当如此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千先生论画谈片，使周企何迁想妙得，触类旁通。

1947 年，画家叶浅予在昆明举行画展后，偕夫人戴爱莲取道成都，拜访大千先生。两位画家住在一起，常往悦来茶园观赏蜀调巴歇。在那里，先后观看了周企何主演的《请医》、《劝夫》《迎贤店》等戏。

那时候，叶浅予正潜心钻研漫画。他看了周企何创造的庸医温德栋、潦倒无奈的破落子弟邱元顺，以及认钱不认人的店婆等舞台形象，触发情思，挥毫彩绘，将这几个角色勾画到八开大幅扇面之上。大千先生见之，爱不释手，连题四赞：

《请医》赞："药箱开，老鼠出，东西南北应诊难，请我不来真尔福。"

《劝夫》赞："救贫无方，要良为娼。归正可也，何必打婆娘！"

《迎贤店》赞有二，其一曰："青抹额，大红鞋，坐柜台，笑口开：恭喜大发财！"其二曰："能令公喜，能令婆怒，咄咄尔曹非主顾，钱不来，谁留尔等住？"

此扇由张大千、叶浅予画赠周企何，四画四赞，诗中有戏，戏中有画，戏、画、诗交辉，可算艺苑"三绝"。

造化在手意纵横

1952 年 10 月，北京将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此前，川剧以重庆实验川剧团作班底，集中各地名角，在义新剧院（今重庆剧场）排戏。周企何与阳友鹤合演的《秋江》，由贺龙、吴雪推荐，拟去北京参加会演。这个戏源自明代高濂的《玉簪记》传奇，自清末民初以来，历代名丑如岳春、傅三乾、周海波、鄢炳章等，与邓少怀、刘芷美、刘世照、陈



小燕等著名旦角，皆擅演此剧。周企何向周海波老师学演《秋江》，周海波要他先把河性、水性、船性、风性搞清楚，做到心中有河、有水、有船、有风，在熟悉川江船工行船走水的生活以后，这才传授艄翁撑篙挥桨的表演程式。周企何从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心中有物，手中求形，形中求准，准中求神。在继承前辈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周企何与阳友鹤又吸收了刘成基、李文杰、周裕祥与胡漱芳、紫莲（即邓蕖如）、秦淑惠等几组《秋江》的艺术特长。除了整理剧本、净化舞台，他俩再一次深入船工生活，力图将船工荡舟的劳动形态转化到舞台上，变异升华为优美轻盈的表演程式，使观众仿佛看到舞台上真有一叶小舟，在波谷浪尖沉浮荡漾，红颜白发，悲喜同俱，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调和喜剧色彩。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看后，很谦逊地说："我看你们演的《秋江》，底功好，做功也细腻，《打渔杀家》我们都不敢演啦！你们的变化好多哟，我们那个太简单了。"周企何因在《秋江》中非常出色地塑造了艄翁的舞台形象，荣获演员一等奖。著名京剧演员叶盛章、黄玉华最早将此剧移植为京剧，继有杜近芳、云燕铭、李维康与张春华、孙盛武、孔新垣等先后搬演出国，更将《秋江》演遍寰宇。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周企何注意从传统美学汲取营养，藉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他长期研读古典文论名著《文心雕龙》，十分重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绘画理论。大千先生曾在一本册页上留给周企何这样一段文字："画家当以天地为师，不可拘泥一格，所谓造化在手。（冯）灌父为企何作此册子，一洗百年积习，尚令观者愕然而惊，莞尔而笑，颠倒众生，游戏神通，莫测所由，岂非造化在手耶？"结合自己长期的舞台实践，周企何对此题赠深有所感，常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珠积寸累待用时"砥砺自己。一方面，他重新审视自己演过的剧目，并以一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进取精神，精雕细镂，刻意求工；另一方面，不断将自己演剧所得提炼为若干言简意赅的艺诀。在《迎贤店》的演出中，从逼讨房钱，多方讥讽，到见钱眼开，百般奉承，周企何眼睛神态的急遽变化，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喜剧纠葛，揭示得意趣盎然，令人捧腹。周企何在谈及扮演店婆的体会时说道："万物皆有神。神的贯注，重在双眼。眼之灵者，神也！神之活者，气也！气不到而神不活，神不活而眼不灵，眼不灵则情不传。面部表情，有赖于眼神传情。随

着人物的喜怒哀乐，如天上云彩，成雨而聚，遇风而散，变幻无穷，只在须臾也！”

1963年2月13日，周企何与司徒慧聪在北京演出《柴市节》。戏毕，周恩来总理健步登上舞台，紧握周企何双手，亲切地说：“我很熟悉你，你演戏幽默含蓄。这个戏我看了好几次，很好。文天祥正派，有骨气；留梦炎坏在骨子里。”

上海重开“迎贤店”

1986年3月下旬，四川与上海举行首届文化交流会。上海有关方面在虹桥机场门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周企何被围在人群之中，相机不断闪烁灯光，主客双方相互握手问候。昆剧名丑刘异龙好不容易与周老搭上话，却被《新民晚报》记者张之江接上专车，巧取专访权，第三天便以《川江长流，艺术常青》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邀请周企何、陈书舫作川剧艺术讲座。周老怕上海人听不懂某些四川方言，请我代写黑板。他一边讲解，一边表演，店婆、艄翁、梅媚等舞台形象，顿时又活跃在听众面前：“本来，演戏都是假的，但要假戏真做，才能娱人动人。这就要求演员必须做到：心明达理，眼灵传情，情真见人，人活出戏，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去把握和表现人物活动中最具有特征的动作和神态。”我看见在座的越剧大家范瑞娟、傅全香，还有昆曲名角华文漪、岳美缇等，都在认真地做笔记哩！在讲座主持者郑拾风、姚时晓、陈多等人的敦促下，周企何还与陈书舫合演了《秋江》片断。这真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不断激起全场的热烈掌声。

周老在瑞金剧场演出《迎贤店》那天晚上，场里架着3架摄像机，楼上场内坐满观众。俞振飞、黄佐临、郑拾风、范瑞娟、傅全香、袁雪芬、丁是娥等上海文艺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到场观看，众目凝注的“迎贤店”又开张啦！人们清楚地记得，1963年4月，周企何曾随成都市川剧院到上海演出，扮演店婆，蜚声沪上。如今，周老以76岁高龄，重演此剧，风采不减当年。随着剧情发展，场内喝彩声迭起。演出结束，不少观众拥向舞台前沿，向周老及全体演职员鼓掌致意。这是上海观众对演出



成功的一种礼遇，当地叫做“碰台口”。周老欲罢不能，乃于 10 日晚加演《投庄遇美》。这虽是他告别舞台的最后一次演出，然而，店婆、梅媪等神形逼肖的艺术形象，却留在上海广大观众的心目之中，同时也将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杨淑英学艺记

◎ 蒋维明

川剧四大名旦（陈书舫、竞华、许倩云、杨淑英）之一的杨淑英，能文能武，唱做俱佳。

1958年毛主席看她演出《穆桂英》后说："川剧《穆桂英》好！"

1978年冬，邓小平同志看完川戏后对邓自力说："杨淑英演穆桂英很有气魄，英姿飒爽，武打干净利落，嗓子宽厚明亮，吐字清楚，听得懂。"

杨淑英少年时备受困厄，刻苦学艺，洒遍了"奋斗的泪泉，牺牲的血雨"……

一、湖广庙戏楼是她的学园

1928年旧历六月，杨淑英诞生在四川自贡市湖广庙附近小街道的一间铺面里。

1935年杨淑英7岁。一位好心人告诉她妈，玉皇庙里有一所教会学校，孩子可以免费入学。妈妈喜出望外，杨淑英也兴高采烈。那天，妈妈给她穿上一件洗干净了的"补疤重补疤"的衣服，送她去上学。

在教会学校，杨淑英只读了一学期的书，便不得不辍学了。为了对付不断上涨的物价，帮助家里多挣一点点工钱，她只好放弃上学，回家去协助外婆、妈妈浆衣洗裳，替缝衣店加工缝锁衣服上的扣眼，或到盐井附近去捡盐巴碴碴。

然而，鬼使神差般，杨淑英找到了另外的、属于自己的学园。

这学园便是她家附近的湖广庙戏楼。

由于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及后来湖广人到自贡做生意的增多，他们仿照陕西商人修建西秦会馆那样，由湖广同乡会集资修起了飞檐翘角的湖





广庙。

庙门口，一对石狮分踞左右，雕工精细。大殿的对面有座戏楼，高约2.7米，戏楼下为进出的通道。大殿与戏楼之间，有广阔的石板院坝，两旁为看戏的厢楼。

庙里不时有戏班子来演出：有时是酬神赛会，戏班由商会行帮请来，免费演出；有时是营业性卖票演出，即使是卖票，管得不严，小娃儿可以溜进去，站在边边角角看。

只要川剧闹台锣鼓一响，杨淑英便激动了，好像有一股无形而又强大的力量，呼唤着她、吸引着她。她手脚麻利地做完家务，溜向戏楼。

舞台上进进出出的各行当角色，展现了色彩绚丽的生活画面，生动活泼的戏文，吹、打、念、唱的音响，美妙异常，撼动她幼小的心灵，她从中得到了慰藉和欢乐。有时，早台完了，守门的人要清场，杨淑英担心出去了进不来，便悄悄藏进厕所，饿起肚皮等着看午台。

从戏文里，她获得了许多的知识：历史故事，兴衰治乱，善恶美丑，人情世故，接物处事……川戏像春风甘雨，滋润着她的心田，又像一部大百科全书，满足了她求知的渴望，诱发了她对川剧的朦胧的依恋和思慕之情。

戏楼成了她的学园，川戏艺人是她的启蒙教师。

更重要的是川戏班的演出，诱发了杨淑英与生俱来的艺术感悟，得天独厚的演唱才能。她迷上了戏中人物，身不由己地模仿起来，学着台上演员的唱腔、表演，她在台下低声附和、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惹起周围的成年人的注目，笑声里含着嘉许。

二、小玩友

有些时候，庙里不演戏，仍然有她过戏瘾、偷师学艺的地方——摆“田鼓”的茶馆。

“川盐济楚”以来，盐都自贡经济比较繁荣，戏剧也随之兴盛，从清朝同治、光绪以来，便成为川剧四大河道之一的“资阳河”的中心地区。

王、李两大家族，为盐业巨富，被称为“河东王、河西李”，他们都喜好和鼓励唱川戏，并出资办戏班。在自贡，还有对川剧艺术发展殚精竭

虑的“黄氏弟兄” ——黄庶咸、黄了初、黄一良、黄像离、黄景明，他们精研川剧，组织清唱，倡导摆“围鼓”（即唱玩友）。风气所及，大街小巷的茶馆里，都有许多业余川剧爱好者自发形成的“玩友”组织，自唱自娱，或应邀去有红白礼事家中清唱。玩友中往往有唱功极好的人才，如后来参加戏班，并成为一代名伶的成都的大籁、贾培之等。

这样的艺术氛围，使特具艺术禀赋的杨淑英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婆婆带着针线活去茶馆，边做手工边听围鼓，小淑英必依偎在外婆身边，用一双明慧的眸子，投向“围鼓”，眼在看、耳在听、心在记、口在哼、手在比。回家后，会哼几句的舅舅，又加以点拨，就这样，10岁不到的杨淑英学会了《钟馗送妹》《宫人井》《截江夺斗》等几折戏。

终于有一天，她勇敢地站在围鼓边，有板有眼地清唱了《钟馗送妹》。她仪态大方，字正腔圆，不仅获得了茶客们的叫好，而且吸引来过往的行人，茶馆爆满，门口也围了个内七层外八层。老板娘、掺茶的幺师，笑得合不拢嘴来。

小玩友的名声不胫而走，人们称赞她小小年纪，执著地追求，“饿起肚皮学唱戏”。好心的人都来关照她。当时玩友中一位唱小生、唱腔优美的罗贵元主动教杨淑英学戏，按正规路子给她打磨唱腔。每逢有人家办红白礼事，邀请罗小生去摆围鼓，他都带杨淑英去配戏。虽然所得“封封”钱不多，但可以吃顿饱饭，孩子正在长身体呀。

1940年农历四月初的一个夜晚，一位来自贡演出的“维新舞台”的台柱、唱旦角的钟琼瑶漫步街头。悠扬的琴声引他来到街口的一家茶馆，只见门面外黑压压地站着一排排听众，屏息静气在听。

钟琼瑶挤不进去，站在人墙外面，听见了一副稚嫩的嗓音，唱得清脆、明畅，有板有眼，韵味醇正。

“好一块璞玉！”钟老师多年来浪迹江湖，一直在寻找可以琢磨的人才、承继自己的事业。凭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他预感到这个“小玩友”是一块碧玉，经过精雕细琢，有希望成为传世之宝。

他回去与妻子商量，妻子白卉娟也表示赞同。原来她也曾路过茶馆，感受过“小玩友”那雏莺啼谷、唱惊四座的情景。

钟琼瑶通过戏班里的李花脸找到杨淑英的家里人，征得他们的同意，正式收她为徒，并为她改个艺名，叫做“佩环”。



三、“玉不琢，不成器”

杨淑英12岁进戏班，开始了她艰苦的、孜孜不倦的艺徒生涯。

钟老师无儿无女，把佩环当作自己的女儿，巴不得将自己的全部本领，交给徒弟继承。古话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钟老师像一个琢玉工匠那样，将毕生心血用来精雕细刻碧玉佩环。

为了表现古代女性三寸金莲的姿态、婀娜袅婷的身段，川剧旦角必须练跷功。穿上长约三寸的小鞋形状的练功用具，把脚跟向上竖立；演员踩着跷，全身重量都压在脚的前掌上。有了脚下功夫，角色在台上“慢步急走”、舞蹈、武打甚至翻跟斗，姿态才优美。

练踩跷难度很大。一抬步痛得钻心，走几下满头大汗，稍不留意就站立不稳。头几天练功下来，身体像散了架子一般，躺在木板床上，脚掌火辣辣的痛。这时，夜深人静，她好想念湖广庙侧的小屋，特别想念妈妈。

妈妈是外婆捡来的孩子。抚养到能做事的时候，妈妈便开始成天脚不停、手不住地洗衣浆裳、担水劈柴、挑花绣朵、缝衣补袜。外婆烦恼窝火时，要打她几下出气；舅舅有事不顺心，或者烟瘾没有过足，也要骂她。妈妈满肚皮苦水，哑巴吃黄连，只有在沉沉黑夜、在木架床上抱着杨淑英流泪，相濡以沫。但还不敢放声痛哭，怕惊醒外婆……而今，母女分手，孤独的好妈妈，你今天又受恶气没有？女儿离娘，你向谁倾诉？

杨淑英捏紧拳头，暗暗发誓：“我一定发奋学本事，有了本事才能挣钱，挣了钱好让苦命的妈妈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到妈妈，小佩环感到再有天大的艰难，也能克服。

母爱，师恩，给小佩环鼓足了勇气。为了练成文武双全的旦角，她百折不挠，延长踩跷的时间，加大难度。她在地上摆一条长板凳，站上去，双脚从凳上往下跳。落地时除了全身重量往下压之外，又加上向下跳的冲击力，使脚掌承受的压力增大了许多。开始时，落地总是站不稳，一着地就摔倒，脚掌疼痛钻心，身上也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基础功就好像修房子筑地基，地基不牢，房子修不高。醉心艺术的佩环，为了今后能在舞台上一展才华，她咬紧牙关，跌倒了爬起来又练，反复苦练，终于掌握了其中的技巧。为了提高踩跷的功力，她吃苦耐劳，除

正规练功之外，就是煮饭挑水、抹房扫地时，她也踩着跷。钟老师对她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佩环该增加学武功了。"

钟琼瑶又拜托戏班里武行师傅杨海清教她练功。杨海清喜欢佩环勤快、有礼貌，当即满口答应，先叫她给自己的徒弟然松（李笑非）一道练"爬壁虎"（手倒立）。过几天又单独教佩环练"下腰"，让她站在长板凳上，向后下腰，先把头弯到两腿之间，再把头从小腿中间钻出来，两脚盘在颈上。

佩环按照要求，下死劲练，盘得像一个活的"滚子"。杨海清乐了，伸开粗壮的右手，拦腰把小孩提起来，像手提大锤，走向街口，对着在炉火边忙碌的小贩说："煮两碗汤圆。"师徒俩围坐在矮桌边，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她知道，这是钟琼瑶老师对他们的奖赏（由钟老师隔几天结算一次钱）。这岂止是一碗零食，这其间，有老师无微不至的爱，有严师对徒弟的期待。

四、兼收并蓄

钟老师擅长青衣旦，但戏路不很宽广。难得的是，他有自知之明，没有门户之见。

他给佩环打下牢固的基础之后，就拜托同行中的各门高手，协助他雕琢佩环这块璞玉，让佩环择善而从，跟更多的老师学艺，把他（她）们用毕生精力操练得来的拿手戏承继下来。

首先是钟琼瑶的妻子白卉娟（艺名雪艳红）。她在戏班中以唱功著称，尤其擅长胡琴戏，腔圆板正，韵味醇厚，深得同行和观众的赞赏。白卉娟的嗓音独具特色，初听时感觉略带沙哑，几句唱腔之后，嗓子唱热了，声音越来越明亮，流畅又滋润，听众为之叫绝。有人给她的这种嗓音取了个颇为形象的名称："乌云盖雪"。

佩环平时就很敬重师娘，向往师娘已经达到了的艺术境界——白卉娟是戏班的台柱之一，演出时，往往是压轴戏。名角登台之前，按照当时的时兴，舞台上要"焕然一新"。师娘演出正是这样。每当换上新的桌围、椅披、坐垫，场子里气氛更加热烈，很有一批欣赏她演唱的戏迷捧场。



佩环跟在师娘左右，台下学，台上学。一句唱腔，一处念白，亦步亦趋地模仿过来，然后慢慢“默”戏，细细吮味。经过铢积寸累的过程，她的吐字行腔，听起来颇有白卉娟的味道。何况，佩环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嗓子，乐感又好，她逐渐学会了白卉娟的几出看家唱功戏，如《前帐会》《后帐会》《三祭江》《泾河牧羊》《梅龙镇》等。

唱花旦的盖天红，教过她的搬翎子、地旋子，给她念《宫人井》。佩环学得很起劲。白鳝仙姑“耍路”，使她回忆起童年挑野菜时捕捉蝴蝶的场面。同时，她又跟武功戏唱得好的老师学《开铁弓》《九龙屿》。《九龙屿》里，口中要“吐彩”，还有“打叉”特技。

戏班里有位演员向爱君，擅长演唱《杀狗》。这是一出丑角的犯功戏，唱、做并重，还要求有武功基础。钟琼瑶拜托向爱君专门教佩环。向老师给她讲解故事、人物，启发她理解并学会这一折著名的弹戏。向爱君夸她学得快，另一些老前辈也啧啧称赞她“装龙像龙”。

还有一位盲琴师，他在戏班里拉得一手好胡琴。由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佩环常牵他走路、过街，或帮他买点零碎物件。盲琴师喜欢佩环心地善良、朴实敦厚，所以当钟琼瑶托他代教佩环时，他满口答应。盲琴师脑子里装的戏很多，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都有，由他口传心授，佩环学到了许多戏文。盲琴师还拉着胡琴伴唱，有板有眼地教佩环把胡琴戏中的《瓜子金》《人参调》等唱得滚瓜烂熟。

此外，佩环还抓紧时间看各路老师的演出。每逢跑江湖来搭班的新角演出，她都要去观摩他（她）们的精湛艺术，偷师学艺。“学然后知不足”“观千剑而后识器”，使她从中找到了差距，知道“大外有天，人上有人”，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决不懈怠。从这些民间艺术家身上体现出来的川剧艺术魅力，尤使她赏心悦目，叹为观止，更坚定了她献身川剧事业的信念。她像一只沉迷于川剧百花园的小蜜蜂，飞翔在姹紫嫣红间，采撷花蜜，兼收并蓄，乐此不疲，一往情深。这只勤劳的小蜜蜂，追逐舞台的烂漫春光，承继前辈艺术家甜蜜的事业，酿成琼浆，奉献给父老乡亲。

楹联趣事





成都武侯祠的一幅楹联

◎ 肖雪生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悬挂在成都汉昭烈庙诸葛亮祀殿楹柱两边。上款为“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算来应该是1902年年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对联下款为“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赵藩，字樾村，清代云南剑川人，在代理四川盐茶使时，游历武侯祠，瞻仰诸葛亮遗像，缅怀武乡侯政绩，撰书了这副对联。

上联从肯定着眼，赞扬诸葛亮深明韬略，善于“攻心”，以德服人，“使反侧子自消”（见《汉书·光武本纪》，反侧系指图谋不轨的人），并从而得出结论：诸葛亮正如从古以来通晓军机的军事家一样，绝非一般注重攻城略地的“好战”者可与伦比的。

下联从否定落墨，作者深感诸葛亮善于“审势”，故而大声疾呼“后来治蜀（的官员，特别是封疆大吏）要深思”，要效法诸葛亮的办法，宽严得当，才能“科教严明、风化肃然”。

诸葛亮是善于“审势”和“攻心”的。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闿、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太守高定（彝族统治者）叛乱，孟获也起兵，犯境侵掠。诸葛亮认为边区骚乱是国家大患，而且平叛降敌，必须有刚有柔，据情斟酌，非亲自征讨不可。他首先利用高定分别击破雍闿、朱褒。进军到南中（云南曲靖县）时，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耐心地与孟获作战。七次计擒孟获，又七次纵放，允许再战。孟获和他的妻子兄弟宗党人等，最后都感动得流泪，肉袒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更让他永为洞主，孟获及其宗党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这正是“攻心”





的显效。

公元214年，刘备进驻成都，诸葛亮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蜀郡太守法正主张效法汉高祖“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指出：“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闇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结果不仅法正拜服，而且军民安定，四十一州，并皆平定。诸葛亮平定孟获之乱后，长史费祎建议“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诸葛亮深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所以，不留人，不运粮，与之相安无事。这又可见他善于“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彝汉关系，政治宽和，彝汉关系得到改善，蜀汉内部也得到稳定。

这副对联除具有对联的一般特点外，运用了“对比”手法。“反侧自消”与“宽严皆误”，鲜明地表现能否“审势”“攻心”的不同效应，避去了一味直陈顺述的俗套。而联中关联词语（即过去所谓“虚字”）“能……则”“不……即”运用恰当，交代条件关系，使前后呼应，脉络清楚，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自然得出“知兵非好战”与“治蜀要深思”的结论，读起来韵味很深，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赵藩与诸葛亮殿名联

◎ 周芷颖

到成都武侯祠观光游览的人，总要驻足诸葛亮殿，审视鉴赏殿前清末赵藩撰写的那副脍炙人口、言简意深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对联客观地总结了封建统治阶级治理政务的经验，揭示了正反、宽严、和战、文治与武功等矛盾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的深邃思想，强调了统治者要善于运用攻心为上的治理艺术，正确估量形势，及时审察、把握斗争转折的关键，不一定非要用武力去夺取胜利。这副联文提供的经验，对今天仍有教益。因此，前几年络绎不绝的人云集殿前，观摩学习，研讨探索它。甚至海外游客、友邦客人，听完介绍，也忙着将这副对联拍摄下来，以资纪念。可见，一副好的联文，决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淹没，反能在新的条件下，照样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

那么，这副对联与诸葛亮有什么关系？赵藩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写这副对联呢？

赵藩是云南剑川县人，号樾村，中过功名，长期在清廷担任下级官吏，清末任过四川臬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法院院长，衙门旧址在现春熙路南段）。写这副对联时他任四川代理盐茶道使。赵藩为人正直，写得一手好字，办事公正认真。他经手办案，从不嫌烦，总是口问手录，广搜证据，反复推敲，多方调查，决不利用职权，草菅人命。在庸碌钻营、大刮地皮的封建官吏中，他颇有清正廉明的名声。由于长期在下层任职，审理过各类民事、刑事诉讼案件，颇为了解民间疾苦，对慈禧擅权祸国殃民，弄得国力凋敝、民不聊生、外侮连连的弊病体会较深，也清楚地看到各地反满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在四川，红灯教、白莲教的起义正方兴未





艾。就在这布满干柴，已燃起反满烈焰的当紧之际，清廷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任命岑春煊到四川任巡抚来了。对岑春煊，赵藩是了解的。赵藩曾担任过岑父岑毓英任云贵总督时的特聘刑名师爷（相当于省府秘书长），又是岑春煊的启蒙老师，知道这位少爷同他老子一样，遇事不问青红皂白，动辄就要杀人。而且岑春煊上任之后，果然以重兵围剿成都周围乡场的红灯教，杀害了深孚民心的农民领袖廖九妹廖观音，看样子还将对四川人民以刀兵相见，这岂不是在火上浇油么！迷信武力又会有什么好下场呢？身为岑春煊下级的赵藩，限于清廷封建礼制，官员不能指责皇帝，下级不能批评上级，可是岑春煊一味拥兵剿民终会酿出事端来。他冥思苦想了几天，终于在腊月，另辟蹊径，撰了前面所述联文，铭刻成匾，命人从城里盐道街抬出，鼓乐鸣奏，礼炮相送，吹吹打打，浩浩荡荡送到城外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赵藩的用意很清楚，借给诸葛亮送联文的机会，总结孔明治蜀的经验，对掌握一省大权的封疆大吏言谏。赵藩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春时，出帖子请岑春煊到武侯祠赴宴，让岑亲眼见到联文。

岑春煊来川后，正待放开手脚大干，不料当头挨了老师一棒。限于礼仪，公开不好对老师长变脸，只好让联文挂在武侯祠。由于他镇压成都附近农民起义卖力，很快博得“干吏”的评语，被提拔到两广总督的高位上。临走前，他以一个借口，把赵藩的盐茶道使司的差给撤了，算是对老师送对联的惩罚。不过，他到两广，板凳没有坐热，慈禧却相信太监诬告岑春煊同戊戌维新的梁启超有牵连，将其撤了职。这一跤把岑春煊脑壳摔清醒了，也悔不该对老帅太鲁莽了。因此，10年后的宣统三年（1911），当岑春煊又被起用到四川平息保路风潮时，他开始“审势”了，再也不抖以杀人染红帽顶的威风了。“审势”的结果，没有落得与赵尔丰、端方身首异处相同的下场。辛亥革命后，岑春煊比较早地从清廷营垒里分化出来，拥护共和，兴办实业，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创办了政学系。这得归功于赵藩苦心孤诣、教导有方了。

赵藩写对联虽是因时因事而发，但也针对诸葛亮的功过作了概括。这就涉及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了。

历来对诸葛亮的评价，一致公认他是辅佐刘备忠烈可嘉，治蜀有方的伟大政治家。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更被推崇为中华民

族的优美品德，激励后人争相继承。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诸葛亮志在匡扶汉室、恢复中原中，制订出具有远见卓识的联吴攻曹战略，和正确的战术，夺荆州、取益州、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整饬内政、开发边疆，使天下三分得以成为现实。这足以证明诸葛亮不仅是政治上的伟人，也是优秀的军事家。另一种看法却认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成就不大，说他“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度将略，非其所者欤!”赵藩是持后一种看法的。他认为：诸葛亮在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协助刘备夺取益州（四川）后，经过几年准备，就应该沿长江，下荆襄，配合关羽北上直指曹操大本营。事实上，当关羽水淹七军、樊城告急之时，曹操确有迁都之意，就是从许昌逃跑。但诸葛亮放过了这个战机，未能收复中原，致使孙权在219年袭荆州、杀关羽，蜀汉在荆襄再无立足之地。接着，他又未能阻止刘备出兵伐吴，招致秭归大败，伤了元气。以后尽管六出祁山，但这时蜀汉已是强弩之末，虽有小胜，对曹魏却无大碍。即使强行伐魏，诸葛亮也有失策，从祁山出兵，趋秦陇，越险山、兵疲而力竭，非用兵之策。部将魏延曾提出从子午谷派兵奇袭，直捣西安，抄近路打大城市，可一战而动摇曹操的北线，被诸葛亮拒绝。所以，魏延始终不服孔明。赵藩分析了诸葛亮的军事活动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从古知兵非好战”，指的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打的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的仗。

赵藩对诸葛亮的评价正确与否，历史早有公论。诸葛亮生前，周围也有不少反对伐魏的言论，因而他在《后出师表》中详加驳斥。如果诸葛亮六出祁山真的过大于功，穷兵黩武，耗尽民财，后世各地人民还会以各种形式怀念诸葛亮吗？他的前、后出师表也决不会成为千古传颂、堂堂浩气的名篇，诸葛亮也不可能成为妇孺皆知的高风亮节、忠贞壮烈的伟大人物。正因为如此，赵藩这副对联，几乎没有人去领会作者对孔明提出批评、却公认为是对他管理政务的政治经验的总结而给予较高的评价。

赵藩还亲自参与了民主主义的变革活动。1907年，熊克武、谢奉琦等从日本留学回四川，积极筹划反满武装起义，事泄失败。谢又到叙府（宜宾）再举义旗，不幸被捕，在狱中慷慨陈词，痛斥清廷腐败误国，从容就义。谢的英武表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使赵藩甚为感动。他曾着力营救，仍未能使谢免一死，乃愤而装病辞官，被官场斥为“疯子”“病翁”。辛亥



革命后，赵藩曾给革命先驱章太炎写信说：“你是江南章疯子（指章在革命中装疯），我是滇南一病翁，疯子不是真疯子，病翁难道是病翁……”语虽诙谐，但对推翻满清王朝的欣慰心情跃然纸上。像赵藩这样历仕宦途而能从旧营垒杀出反戈一击赞颂革命者，在晚清实为难能可贵。



武侯祠名联和岑春煊

◎市　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成都平原上，义和团、红灯照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队队义军拿起锄头、镰刀、扁担、斧头，冲州县，杀贪官，斩土豪，惩劣绅，闹得好不威风。别看省府重镇成都，外以绿营新军扼守，内有八旗满蒙兵丁设防，在“反满灭洋”口号声中，也都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四川总督奎俊，竟然下令关闭城门，不许进出。城门内墙也多设土石，以防义军轰击城墙。官府有事也不得开城门，而由绳索牵引箩筐坠下来办理要务。

这天，时交午牌，通向大同镇的大安门外，缓缓驰来三匹骏马。马上乘客，客商打扮，来到城下，停马观望。城上士兵惊乍乍地问：“干什么的?”来人并不答话，举起一张泥金片子一扬，士兵知道是官场中的官员到了。但未弄清虚实，便松开绳索放下箩筐，再拉起箩筐一看，筐内有名片和朝廷皇封公文。一个个睁大眼睛，说话声音都变了：“请大人稍候片刻。”随即敲起报警堂鼓：咚！咚！咚！比放三眼铁铳还响。

鼙鼓一敲，守卫城池的都司、游击们，慌忙丢下烟枪，从角楼、垛房后钻出来，扑向城楼。长官一看名片，忙着吩咐开城，列队出迎。待都司、游击、千总率领士兵列队以后，代理总督奎俊扑爬筋斗地同全城文武也赶到了。他们齐扑扑从刚打开的城门出来，向等候多时的骑马人打躬行礼：“迎接上差来迟，敬请宽宥。”

被称作上差的人皱眉捻须，略叹口气，便打马由官员兵丁簇拥着，绕城向东门迎宾馆走去。

上差到来的消息，一下就传遍了全城：新任总督到任了。他真胆大，竟敢轻衣简从，不带侍卫，单身赴任，看来成都城有救了。

新任的总督叫岑春煊，号云阶，排行老三，是广西的瑶族人。其父岑





毓英，曾任云贵总督。他随父在昆明督院攻读经书，以贵胄子弟进入过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他很早便踏上宦途，任过甘肃臬司。咸丰十年（186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曾散发家财募兵勤王，博得慈禧赏识，升为陕西巡抚。由于自幼跻身仕途，他刚过天命之年，正欲搏击云天、创建伟业，便接到调任四川总督的任命。行前，他翻阅了四川告急、成都求援的邸报，内心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川境有山川之险，耳目闭塞，义和团、红灯照势力并未入蜀。方今之乱，乃乌合之众仓促起事，不会成就大事。不过国运维艰，官省兵骄，王法不力，致一方有乱，八方呼应。如能电兵进剿、严加捕治，申明法典、革新吏治，何愁倡乱不平、蜀境不安？于是，他不顾旅途艰险，不听左右劝告，单身赴任，考察民情。一路上，他不惊扰沿途官府，而混迹酒肆饭铺，倒也听到不少民间议论，颇合自己心意。来到成都，在东门等了三天，待城内积土挖开，大开城门，便在鼓乐声中，声威显赫地到督院街就任了。

上任第二天，他便晓谕全城：红灯照本无中生有，再敢言者即为匪类。此令既出，明面上固然禁止再谈论红灯照之事。暗中，他却每晚亲率兵丁到街头巷尾巡查。连续几日，见城内无事，又抽调精锐马队、健壮士卒，派出城外，到闹红灯照较凶的石板滩、龙潭寺等地踏勘弹压。他密令资州、简州、仁寿等九州十八县组织悍勇团练，封闭铁器店铺，禁止买卖、打制刀剑，四出进剿义军。到第二年（1902年），在石板滩起事的红灯照首领廖九妹，曾率千人队伍攻破成都南城，进入督院街，但被岑春煊枪精弹足的新军阻挡住。随后，清军在威远捉住廖九妹，押回省城。岑春煊又是上奏朝廷，又是监押上街游行，制造了震惊省城的杀廖观音事件。

在重兵进剿义军的同时，岑春煊又使出整饬吏治的杀手锏。他奏参了几个劣迹昭著的贪官，四出张贴要严振吏治、让百姓体眷圣情、会有清官到来的榜文。他这一手弄得满城文武人人自危，不知道岑老三今天的奏折上又开了多少名字，也不知道明天有多少人被摘去顶戴身陷囹圄。

就在岑春煊操生杀大权，挥弹劾重器，威逼百姓，势压群官，积恨甚深、民怨将沸之际，急坏了他的启蒙老师、时任四川代理盐茶道使的赵藩。限于上下礼仪，赵藩不能当面规劝，也不便修书陈词，便在这年冬天做了副对联送到武侯祠去挂起。本来，赵藩以为从盐道街披红挂彩、鼓乐鸣奏送对联，仅隔几条街的督院不会不知道，即使岑春煊的耳报神不禀

报，每天上院议事的文武官员也会把对联之事送到贤弟子耳内。谁知日复一日，不见总督大人来气，到是接连有几个州县官吏被参革职。看来不当面点醒是不行了。于是，在开春后，赵藩派人到督院送去了请帖。

新春伊始，拥炉闲坐的岑春煊，听师爷报说赵藩请次日到武侯祠上香吃酒。他觉得来成都已久了，难得偷闲郊游，如顺了老师之请，在文武百官中也留下我岑某不是六亲不认的印象，便一口答应：明午打轿来。

第二天，且不说赵府管家、下人的奔波，也不道“枕江楼”包席厨子的忙碌，只说赵藩刚过巳时，立即打轿出门，邀同了学政大人，会请了藩台诸公，一同发轿，取道南门，径往武侯祠而来。虽是小酌清酒，而因总督大人亲临，大家也不敢随便放肆，亮、暗蓝色的顶戴，单眼的花翎装饰得端端正正，蟒袍补服稍事有别，倒还整整齐齐。一行人落轿后，就在武侯祠大门左首停立，静候岑春煊的到来。

午初时分，岑春煊一行的大轿打落在武侯祠门口。赵藩与众人礼毕，又与随后的岑的师爷张鸣歧打躬作揖，闲话两句。接着就在“大人请”的敦请声中依次徐徐步入武侯祠，沿幽径进入诸葛亮祀殿旁的配殿。

众人在一桌满汉全席前就座，举箸闲话，杯酒相邀，也有一番清闲自得之趣。席间，自然少不了恭维岑春煊的话，大抵不过“厘治军民，政绩显赫”“综制文武，人心思治”，凡此等等，倒是官场旧习。唯独赵藩在座，酒不多饮，话不多说，连学政大人也在私下暗暗称奇。

岑春煊见赵藩神情异样，再则酒劲初上，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烦袭上心头，当即提出暂罢酒宴，出殿一游。在座诸公，谁有几个前程敢不从命？

众人出了配殿，穿过园林，举步瞩目诸葛亮祀殿。虽说两旁松柏满叶清霜，似有肃杀之气，却感到仍有清爽眼目的东西在眼前浮动。倒是岑春煊的师爷张鸣歧眼尖嘴快，顺口诵出悬挂在祀殿楹柱上新嵌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念到这里，张鸣歧陡然顿住，而其他人方才看清上款为：“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上吉”；下款为：“权四川盐茶道使者剑川赵藩敬撰”。学政卖乖，朗声复诵，啧啧地称赞：“赵大人名士妙笔，可喜可贺啊！”赵藩矜持地拱手致谢：“惭愧得很，誉之过甚；一时兴来，戏作玷目……”只有一旁的岑春煊、张鸣歧出声不得。稍后，赵藩扭头一看，岑春煊与张





鸣歧已先后步入配殿，他也尾随而后。当他迈进配殿。正见张鸣歧蘸着杯中酒在岑春煊座前桌上指划着什么。

众人再度落座后，赵藩起首为岑春煊斟酒。岑春煊摆了摆手，脸沉沉地接过赵藩手中的银壶，向自己的杯觥细斟着。这时赵藩方才定睛看清了离那杯觥不远的桌面上、酒痕淋漓，分明是四个不大不小的汉字："志在讽谏。"赵藩知趣退下。岑春煊一边抚弄自己的胡须，一边让银壶往杯觥中长注。大家相视无言，刚才的兴头多少退了几分。"哗哗"的注酒声在静谧的配殿中长响……酒，缓缓地从杯觥中溢出；壶，慢慢地在手中倾注。片刻，张鸣歧方才提醒道："大人，酒满了。"

岑春煊猛醒过来，看看杯觥，又环顾一下众人，黄黄的脸皮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笑意，随即站立打拱道："列位大人，兄弟就此失陪了！"跟着离席迈步，走出配殿。慌得诸人赶忙撑起身子，趋步相送。张鸣歧走过赵藩跟前，连声致谢："赵大人，叨扰了！"赵藩苦笑了两声："仰仗老夫子美言了。"岑春煊、张鸣歧走后，侍座诸公，也还识趣，起身与赵藩告辞。大家兴味既已索然，赵藩也不挽留，当下就散去了。

岑春煊回署后，当即留下张鸣歧在小客厅闲话。"我这业师也未免太做大了，他的意思岂不是指我刚愎自用，为政失察吗？人老了点，做事当真就糊涂起来么？"愤愤的话语听得出岑春煊的不满。"樾村也真是，位在职下，竟当着众人，拂大人的脸面……"张鸣歧倒不是想说赵藩几句坏话的样子，因为他就认为"四川乃冲繁疲难之所，治蜀非严不可"。谁说岑春煊整吏治民的许多严厉措施不是他张鸣歧的主意呢？

事隔不久，赵藩即被除去盐茶道使职，外任永宁道去了。

后来的一些年里，川督衙门中的师爷、书办，私下还说着"师道何道？试看永宁道"这样的讽话呢。

时值满清国运日下，四川总督岑春煊倒反而交了好运。朝廷"京察"下来，以岑春煊"风厉、守清、才长、政绩"的最好"考语"，升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上表谢恩，另有保荐折子随奏。西太后照准，着吏部回批，张鸣歧也被破格跃升为广西巡抚。双双奉旨，走马上任；宦途仕运，飞黄腾达，好不得意！

岑春煊执政两广，仍循旧章，且变本加厉，参官杀民不少。殊不知两广地面，时值通商、烟禁、海禁大开，肥腴异常。清廷亲贵密集，占据要

津。这一番举动何尝不侵害皇族权益？行政不久，结怨甚多。

满清官场，本来就是演着一本“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的戏，两广的皇家亲贵自然也有他们的唱法。为了驱赶岑春煊，褫夺其宠，遂出巨金贿赂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探之慈禧最恨的人，是唆使光绪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寻得岑、梁二人底片各一帧，费尽心力，拼将合洗，相片冲出后，倒还天衣无缝。只见其上，岑、梁相坐，口讲指画，甚是投机。真像煞有介事，也难为了这般宵小们的一番苦心！

一天，慈禧宫中无事，李莲英即请老佛爷起驾赏花。一行人刚出宫门，几个太监躲闪不及，其中有人又掩藏着手中的东西。心怀鬼胎的李莲英见机厉声喝道：“大胆！”一声吆喝，吓得那帮太监颤巍巍地双膝跪下，忙不迭口地磕头谢罪。慈禧忙唤李莲英查看太监手中之物。李莲英双手呈上照片，慈禧不看则可，看则火冒三丈，狠声问道：“这不是十恶不赦的梁启超么？”又问照片左边是谁，太监们齐声告求：“回禀老佛爷，奴才实在不敢多嘴。”慈禧一反往常，发话道：“狗奴才，从实说来，赦了你等无罪。”太监们磕头谢恩，方有人说：“老佛爷懿旨询问的那人，正是当今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外面盛传，他与梁逆在广州交厚，欲从梁逆变新法，改大清天下。”这几句话，气得慈禧七窍生烟，怒不可遏。她想起了上月两个旗人军机大臣密奏岑春煊“图谋不轨”的话来。李莲英在一旁火上浇油，连呼“这还了得”，并怒声斥退那般太监“还不快滚”。其时，余怒未息的慈禧，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

后来，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岑春煊的两广总督的起花珊瑚顶戴被摘去了，九蟒五爪的蟒袍、锦鸡补服尽被剥去，参劾罢官、夺印除名。

岑春煊离任在即的一个深夜，他在寓所秉烛整理自己的往来书简，恰恰拿着了赵藩在永宁道寄与他的一封信，顿时想起了这位业师给他题的成都武侯祠楹联，竟使他深思良久。缓缓移步楼前，推南窗、望中天：繁星烁烁，银河横亘；闪闪的光点一瞬间又变成无数挤眉弄眼的面孔，嘲笑着倒运的自己。他紧紧地闭上双眼，长长地叹出了一声：“我虽误已，国事如此，也难省啊！



草堂名联轶事

◎ 濮不章

成都杜甫草堂内，在诗史堂前，挂有一副颇负盛名的对联，联文云：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有关这副对联的传闻，颇多逸趣。据《玉笙楼笔论》（未刊行）的记载，清代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偶游草堂，顿生雅兴，拟撰一联挂置堂前，以附风雅。无奈文思不佳，难得妙句，只好请其幕中名士沈寿榕代笔。沈撰好上联后，也因才思不敏，一时对不好下联。这时，丁宝桢幕僚中一位并不出名的人，姓彭名毓崧，对了下联，然后署上了丁宝桢的大名挂于草堂。此联一经挂出，就受到不少文人雅士的赞许。不料民国初年，此联毁于兵燹，1953 年，才由叶恭绰先生补书。叶先生的书法，苍劲浑厚，中外著称。此联挂出后，即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赏。1957 年，叶先生蒙受冤屈，此联曾受到牵连，一经取下，便搁置了二十余年。直到 1981 年，叶先生的沉冤得到昭雪，此联才得以重挂于诗史堂前。

此联书法的秀美，曾使不少人为之倾倒，尤其是联文的含蓄、蕴藉，更是发人深省。经常有一些中外人士，伫立诗史堂前，细加品评。然而终因“襄阳耆旧”一典，较难理解，以致各说不一。现据笔者浅见，略加阐释。

诗圣杜甫的诗歌，世号“诗史”，千秋流传。从草堂南行，在那“锦官城外柏森森”之处，即可寻到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杜甫的文章道德，实在是“一样大名垂宇宙”的。这便是上联的含意。难以理解的却是对得极妙的下联。上联是以诸葛亮比杜甫，下联亦应如此。“桥通万里”，便是用典。据《华阳国志》载：“诸葛亮送费祎聘吴，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其桥遂得名为万里桥。当时从此下船，

沿江东下，可通三吴之地（今江浙一带），实可谓万里之行也。解这副对联的关键，就在于要正确理解“东去问襄阳耆旧”中的“耆旧”，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这就不得不略加考证了。可惜的是由习凿齿撰的《襄阳耆旧记》全书早已失传，只能从《蜀志》《太平御览》等书中所转引的残篇断简为据。泛指的“襄阳耆旧”应包括周朝的郑交甫，汉朝的习郁，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司马德操、庞统、诸葛亮、马谡、马良，晋朝的羊祜等人。但就联文的内容而言，当仍是以诸葛亮的心情来比喻杜甫。因为，联文中含有诸葛亮欲由成都东下，去寻襄阳耆旧的意思。当然，能会面的也就不多了。因为，与诸葛亮同一个时代的庞统早已死于落凤坡，马谡又被他挥泪斩了，马良尚在蜀中，所以他只能和庞德公、司马德操“相忆在江楼”了。据史籍记载，庞德公之子曾娶诸葛亮之姊为妻（《汉书·庞德公传》注引《襄阳记》），庞的辈分比诸葛亮高，年龄确乎比诸葛亮大得多。司马德操比庞还小10岁，他们都隐居于阳鹿门山中，而且都长寿。所以，就是在诸葛亮晚年欲东下襄阳去寻这两位耆旧，也是完全可以寻到的。只不过令人感慨不已的是那样多的耆旧，死的死、亡的亡，还能有“几人相忆在江楼”！对联的作者用这个十分含蓄的典故来比喻杜甫晚年客居成都，也欲东下去寻他祖籍襄阳的故旧的心情，从而慨叹还能有“几人相忆在江楼”，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更何况在杜甫的诗里，也是很欣赏襄阳耆旧中的庞德公的。比如在他的秦州诗《遣兴五首》之二中就曾写道：“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又如成都诗《赠别郑链赴襄阳》中也说：“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由此可见，当年彭鲂崧在完成下联时，确实是煞费苦心的，所对的联文，不仅工整、典雅、贴切，而且巧合杜甫的诗意。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锦城旧联轶闻

◎ 陈雁翠

对联是由骈文、律诗衍生的文体，它首先要讲究对偶，对仗不工稳，读起来味同嚼蜡。好的对联，除对仗工稳外，还得音调和谐，情意深远，文句藻丽，气势豪迈。

昔日锦城，对联颇多，公共场所多有所见。其中不乏佳作，既为史实，又属掌故，一经悬挂，广为传诵，不胫而走。个人囿于见闻，所知有限，仅随笔介绍一二，以饷同好。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兴师讨袁，1916年7月，胜利进入成都。蔡在军中得暇，拟就半联：

或入园中，逐出老袁还我国

示左右来征对。繁体“国”字，中间为一“或”字，繁体“园”字，中间为一“袁”字，逐“袁”入“或”，乃得复“国”，语意双关，表明决心。此联既出，手下无不叫好。幕友某极尽思索，勉强对以：

余来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这里，把“道”字的“首”，换成“余”字，改为“途”字，从文字上讲，是对上了，但却失去蔡锷上联积极反袁复国的政治用意，所以不能算为佳对。

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各有一个卧龙岗，诸葛亮未事刘备前，曾在卧龙岗躬耕自吟。究竟诸葛亮隐居在哪个卧龙岗，两县人士一直争论了好多代。清咸丰时，顾嘉衡作南阳县令（他是襄阳人），欲为调和，制作一联悬在南阳卧龙山东武侯祠殿中：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1959年，胡耀邦同志到河南检查工作经过南阳，见此联有感，更易数字，便成为：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联文仅改数字，就注入了积极意义，对人可起一心为公、为国甘当孺子牛的教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人民，广大群众常借对联讽刺，以泄怨气。1914 年 10 月 10 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袁世凯阴谋称帝，国内各省纷纷反对。拥袁的陈宧在成都宣布戒严，人心极为惶恐。四川群报社社长樊孔周在报馆门首贴出一副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对联明白直指言论不自由，有讽刺复辟帝制之流的勇气。樊除办报外，还担任四川全省总商会总理。他 1917 年夏自渝返蓉，在简阳施家坝遇刺，身中 8 弹而死。为此有人拟成一联：

樊孔周周身是孔；
刘存厚厚脸犹存。

上联记樊之死，下联对军阀刘存厚直言讥诮。

1931 年，有人以民间疾苦写入对联，直接揭露了四川各派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景象：

米一斗六元，人一个半元，剧怜载道流亡，人价不如米价贵；
地一年八税，货一件百税，要过沿途关卡，捐钱更比本钱多。

1937 年，长寿县人士向省府控告该县县长、丰都县人江某，论其劣迹，特举一联以作例证：

纵匪殃民，休想长寿；
贪赃枉法，请回丰都。

此联文句浅短，但构思甚具匠心。“休想长寿”、“请回丰都”，可以解释为休想在长寿做官，回到你家乡丰都去；也可以解释为你再贪赃枉法，别想长寿会短命，到丰都去做鬼（传说丰都是阴曹地府，人死后的鬼魂要去报到）。短短 16 个字，语意双关，堪称佳联。

1946 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蒋帮特务刺杀，蒋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人士愤怒，成都亦开了追悼大会。会上，曾悬出一联：

十日杀两贤，天下事亦可知矣！
一手掩众目，国中人岂尽盲乎？

言简意赅，表达了革命人民的满腔怨恨。



何绍基一联赞草堂

◎ 李国瑜

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

杜甫草堂诗史堂前何绍基撰的这副名联，脍炙人口。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瞻仰杜甫已成风俗。游览草堂，人们会想到这副名联，赞叹书法精湛，联句构思精巧，对诗圣的公允评价。何绍基是谁？他的书法艺术师承何派？人日游草堂风俗因何而起？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一号蝯叟，湖南道州人，世称何道州。他家世代书香，幼承家学，少年时代就以诗才敏捷闻名远近。道光十六年（1836年）考中进士，主持过福建、贵州、广东的乡试（即在各省省会选拔举人）。由于他清正廉明，以才取人，不徇私情，不仰高官，主持考试均能选拔贤哲，号称得士，学风为之一变。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授四川学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长），主管学校的教育和考试工作。这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腐朽没落、闭关自守的大清王朝一天天衰落，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图谋瓜分中国，而中央和地方官吏大多只知搜刮民财，贪污肥私，草菅人命，荼毒生灵。何绍基身居四川学政高位，虽是管教育和选人才的官员，只要见到害国伤民之事，无不秉公办理。因此，他罢黜了一些不称职的教官和肃清了考试科举中的积弊。他还上书朝廷，弹劾地方官吏。但是，这些地方官吏在北京城都有权贵硬后台，何绍基非但未能澄清川中吏治，而自己的乌纱帽反而被摘掉了。不过，当时四川总督黄寿臣、将军乐彦亭了解性情耿直、疾恶如仇的何绍基是有真才实学的，又鉴于举子学士上书督院，挽留这位被贬的学政大人，因此，他们商量来琢磨去，邀约官商之人出资，创办“草堂书院”，挽留何绍基当主讲。何绍基心里一面领情，一面感到宦海浮沉，遂辞却聘请，由蜀入秦，

后来曾在山东泺阳书院、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潜心著述。他留下了东州草堂诗文集四十卷流传后世。

何绍基自幼喜爱杜诗，其诗作则另辟蹊径。他曾说过："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小草为大树所掩也……岂假生气于松柏乎？"他把杜甫比喻松柏，自喻为小草，主张在诗歌创作上要创新，不能依傍名家。他在学习杜诗时，用功极深，把杜甫集里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记得滚瓜烂熟，随时可以引用。清道光八年（1828年），他引用杜甫诗句编成十二首五律诗，代魏默深祝贺清朝剿平新疆准噶尔分离国家煽动叛乱的胜利。这些诗句，精选得当，切合时宜，文思绵邈，逮事精工，妙虑澄心，披华振秀，吐属尽珠玉之英，卷舒有风云之气，足见他研习杜诗之深，顿时在京城引起轰动。不少人纷纷打听、要见识这位二十八岁尚未登科的才子。何绍基爱杜甫的诗篇，慕杜甫的诗才，叹杜甫的遭遇，访杜甫的足迹，到成都当官三年，常到草堂缅怀先贤，可是却没有写过有关杜甫和草堂的诗歌。不少人知道何绍基恭慕杜甫，多次登门求诗，他始终未写。直到他离蜀入秦之际，才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解开了长期不写纪念杜甫和草堂诗篇的谜：

三年搁笔草堂诗，敢较低昂杜拾遗；
孤韵每从无意得，一生不作强颜词。
遥遥尚友归忠爱，澹澹残秋动别思；
万里桥西风景好，可无亭馆映参差。

诗中揭示他不写有关杜甫的诗，是因为不能和杜甫分庭抗礼，在杜甫面前题咏草堂。有时虽然也有一些歌咏杜甫的佳句，但不愿沽名求誉，就没有保留下来。在第四句里暗指他由于把四川存在的弊政上书清廷，忤了皇帝的旨意，被撤了学政职位。在他看来，无愧于心，没有逢迎皇帝意旨，来保全自己的职位。诗句当中浮露了他的愤慨和孤寂之感。第五句说明他与杜甫远隔千年，对杜甫忠于国家、热爱人民，无限崇敬，一种丹忱，古今默契。第六句点明季节，在秋高云淡之下，秋风吹起离愁，快要离别杜公草堂，离别川中父老，何日能够重来呢？最后两句，希望川督黄寿臣和父老乡亲对这座处在花溪环绕、林竹葱翠，水木菁华的草堂要加以爱护，添置亭馆，为江山文藻增添胜景。何绍基在离开四川前，与幕僚、学生吴寿恬、顾复初、程小松、朱眉君、黄济川等游了草堂，与杜公作别。在低回惆怅中，他写下这首诗，表露了他对杜甫的心迹和对草堂的



留恋。

何绍基不仅是个教育家、诗人，也嗜金石、精书法。他的书法，从临摹人手，数十年不懈，出于颜平原，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及南北朝魏碑．学有渊源，自有发挥．终于成为卓然大家，行草尤为一代之冠。他的书法成名之后，求他题签书翰的绢素，在屋里堆得很高。在北京时，南、西洋诸国使者、商人，将何绍基字迹当成珠宝般珍藏。清代有名书法家顾复礼对何绍基书法甚为崇拜，说何的书法艺术是“山海铸其性灵，日月朗其瞩照，风云纬其怀思，鬼神司其腕肘”，简直把何绍基说神了。

从何绍基所写草堂名联来看，笔触细腻，秀润古朴，精力弥漫，锋芒苍劲，确系书法珍品。书体系从张黑女、颜平原融会而来，一洗颜真卿的肥厚，寓张黑女于崇朴之中，加以俊丽丰腴，故能神召精洽，云姿要涉。清代书法家，很多人崇奉汉隶魏碑，何绍基也不例外。他认为晋代王羲之号称书圣，主要原因是受到唐太宗的偏爱，“一传特因天子重，千秋尽误学书人”。所有他对“兰亭帖”等的看法继承了唐代韩愈“义之俗书趁媚姿”的看法，而专攻篆籀汉隶，“每一临写，心迴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通身汗浃衣襦矣。”正是由于苦学磨炼，才能自成一家。

他为啥要写这副对联呢？何绍基到四川后，就拜谒了草堂。对这位大书法家的到来，自然会引起官场学界的恳请，希望他能留下墨宝，为草堂增色。何绍基推却不过，只好答应。不久他到南充主持考试，返回成都途中撰成此联。为了人日应景（旧时礼俗，正月初一至初七，分别为鸡、狗、猪、羊、牛、马、人，因此，正月初七日又称人日），他不回官衙，住到草堂郊外，等到初七，才到草堂写了对联。过去人们游草堂，是在正月初二日，自从何绍基名联一挂，春游草堂遂改为初七日，百多年来成了成都的风俗习惯。由此可见一副对联的功能，确能改变社会风俗啊！

西蜀人物



五老七贤

◎张达夫　吕　钟

成都老辈子经常谈到“五老七贤”，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辛亥革命后，从尹昌衡、胡景伊任四川都督起，到以后的督军、省长们，都在他们的公署内聘请过一些前清遗老、社会名流、文人士绅等做顾问。这些顾问有的有薪俸待遇，有的只是挂名，当然更没有任何具体工作可做。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军阀们知道，在适当时机，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军事斗争或政治斗争效力，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因而大家都乐于这样做。

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他聘请的顾问比他的前任们都多，除一般的顾问外，还有高级顾问十余人。现在笔者所能记忆的有：

方旭，字鹤斋，安徽桐城人，前清翰林、四川提学使；

曾鉴，字奂如，隆昌人，前清拔贡；

曾培，字笃斋，成都人，前清翰林；

陈忠信，字孟甫，富顺人，前清翰林；

宋育仁，字芸子，富顺人，前清翰林；

赵熙，字尧生，荣县人，前清翰林；

颜楷，字雍耆，华阳人，前清进士；

刘咸荥，字豫波，双流人，前清拔贡；

邵从恩，字叔叔，青神人，前清进士；

徐炯，字子休，华阳人，前清举人；

文龙，字海云，成都人，前清举人。

所谓“五老七贤”，就是当时社会上对这些顾问老人的称呼。至于他们中，谁属于“五老”，谁属于“七贤”，则是没有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加入这个行列的人数，也绝不止12人。所以“五老七贤”之名，不过是当



时对这些老人笼而统之的尊称而已。

他们有哪些活动呢？请看看下面几件事例吧。

1919年，熊克武在川、滇军发生矛盾时，初以力量不足，不便发动战争，便鼓动“五老七贤”联名发出快邮代电：“请客军出境以苏民力；请各部裁军以解民困”。这在表面上，“五老七贤”是在代表四川人民说话，而在实质上是他们说出了熊克武当时要说而又不好说的话，给熊的政治攻势帮了个大忙。所以那时的“五老七贤”就成了成都的风头人物，他们经常坐着省、督两署给他们特备的大轿，在公私宴会、红白喜事席上，总是位居首席，受人尊敬。

1922年，川军一、二两军联合排挤督军刘存厚，兵临成都城下。刘已陷入孤立，不能不抛弃成都出走。但他却故作镇静，关闭城门，作准备巷战的模样。这使“五老七贤”大为惊惶，认为成都即将遭受浩劫，便齐集北较场督署，要求刘存厚以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不要进行巷战。经过三天的奔走，这位早已备好行装的刘督军，使“俯顺民情”、体面地带着他的督军印信离开成都而去。这就给“五老七贤”的脸面大增光彩。

1924年，杨森在成都搞市政建设，要修马路，拆栅子，退街房，毁少城城墙等等。这时，“五老七贤”中，有的去世，有的还乡养老，留在成都的已为数不多了。虽然从杨森起即停止他们为顾问，但他们仍联袂晋谒杨森，要为成都的街道“请命”。谁知这位杨督理才不买这些老人的账，坚持自己的主张。碰过这个钉子后，“五老七贤”在成都的活动就销声匿迹了。但到了1935年，蒋介石借“剿共”为名，将魔爪伸入四川，与当时在四川执政的刘湘发生利害冲突。刘使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以抵制蒋的势力。蒋便指使戴季陶劝说“五老七贤”中的一位遗老、戴季陶的老师徐子休，以他个人的名义，印发一个题为《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的传单，痛骂四川军阀过去统治四川的罪恶，欢迎中央军“剿匪治川”，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鸣锣开道。这可算是“五老七贤”在四川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

丁宝桢与四川

◎ 廖上柯

清朝统治中国268年中，作过四川总督的不下五六十人，最著名的当数第一任李国英、光绪初年的丁宝桢和最后一任以屠夫著称的赵尔丰。其中治绩对四川有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丁宝桢。

丁宝桢，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人，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官。他从24岁中举到进士及第，经历10年，入翰林院被选庶吉士（实习京官）后，以丁母忧，返籍守制。其时适逢贵州遵义苗民杨龙喜起义，扰及平远。为谋自救，他仿照曾国藩在湘乡的做法：拿出家财，联络绅士募壮勇、练乡丁。初系自固，继后随官军出击。他以富于谋略，屡出奇计，邀得战功。数年之后，杨龙喜事平，贵州把他倡办乡勇、协助平乱事迹上报朝廷，破格晋为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1867年），丁宝桢调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晋级巡抚。当时太平天国虽已败亡，其余众及捻军，尚往来于苏北、皖北及鄂、豫、晋、鲁诸境。丁宝桢到山东，连续用兵6年。由于他能分别缓急，粮饷不乏，又能善待将士，推荐有功，不自矜伐，故人乐为之用，因而所至有功。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首领张总愚，拥众数万，自山西进入豫北，出清军不意，忽挥戈北指，图袭北京，越过定州，进迫保定。北京大震。清廷把宿卫师旅也调出来防堵，足见情势之紧急。这时奉诏勤王的丁宝桢的鲁军，闻警越境以一日百里的急行军，猝至张总愚军前，以阻遏其势，钝挫其锋，保卫了畿辅。嗣又转战于直隶境内的雄县、高阳、任丘一带，最后会同友军将捻军击溃于大河之北。同治皇帝在惊魂初定之后，一连下了七道圣旨，嘉奖他的武勇忠诚，赏紫禁城骑马。真是煊赫内外，誉极殊荣。京中各道衙门都敬佩其胆识而相与周旋，互为接纳。朝廷并决定：以总督存记，遇缺即补。这些，为他后来升调四川总督扎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靠有恩于慈禧的四川总督吴棠，老年昏庸，把四川弄得百业破败，兼为东乡血案所困扰，目于指视，民怨沸腾，急于求去脱祸。朝廷调两湖总督李鸿章之弟李瀚章前来接替整顿。在瀚章看来，四川虽大，未必能赶上湘鄂两省；而成都繁华，又远不如武汉三镇，且一交一接，枉费周章，内心很不愿意。不过朝命系指调干员前往整顿，又不便推辞，只得就道前往成都接任。吴棠一看，接替者是李鸿章之弟，来头不小，且其为官，精明干练，他们破绽颇多地交案，如何经得起李瀚章的审核和挑剔。如被揭出，会导致翻船，但又不敢违抗朝命，拒绝交代。于是采用软拖手法，等候情况变化：推说什么由于时间匆迫，政牍浩繁，一时赶办不及，请求稍假时日，暗地里则千方百计，从事弥缝，以期蒙混过关。与此同时，他们又施展出全身解数，动员他们的所有人事关系，特别是文恪的满洲贵族关系，找人对调，以便互相庇护掩盖。至于李瀚章这方面，由于川鄂接壤，对尚未澄清的东乡血案已早有所闻，及至到了成都，一批趋炎附势之徒，自然免不了要去逢迎游说，提供情报，宣泄事机。李瀚章一听，这原来是一个颇为棘手的烂摊子。本来，东乡血案，事出前任，和后任没有责任关系，但是事件未了，须待后任清理结案。如果用和稀泥办法，则沉冤不白，正义不伸，势必损及自己的声誉。又况众多含冤莫白及上奏直言如李经羲、张之洞等朝廷大员，岂肯随便罢休？若是为民请命，一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必然伤及慈禧恩人吴棠、满族大员文恪和与他们有关系的大批权贵。投鼠应该忌器。费力不讨好，逆势行事，智者不为。因此，他把到成都所闻所遇函报乃兄鸿章及当朝，表示仍愿回督两湖。由于李瀚章在两湖相处甚洽，两湖人正在吁请朝廷，还我使君。李鸿章趁机九鼎一言，再加上吴、文活动，朝中有关方面撮合，朝命李瀚章仍回两湖原任，丁宝桢与文恪对调……丁宝桢以山东巡抚升调继吴棠为四川总督，四川巡抚文恪，继丁宝桢为山东巡抚。朝命一下，文恪喜不自胜，迫不及待地跑到济南催丁宝桢速驾，并说他早已以护督院身份，把吴棠总督任内的交案准备妥当，请丁尽速前往成都接篆视事。丁宝桢气魄恢宏，每每大行不顾细节，在山东连年用兵，“不能上计之款甚巨”，正在煞费踌躇之时，也就乐得按照文恪之意，互相掩盖通融，奔赴成都。

成都筹备迎接新总督了。由于听说新总督是率领鲁军，飞骑北上，击溃捻军，保卫京畿而获得孔雀翎一品冠带，加太子少保衔，赏紫禁城骑马

的大员，又是敢于擒杀西太后宠监安得海的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迎候仪式务求隆重，排场务求盛大。接官厅前后，天花彩仗，布置得五彩缤纷，瑰丽堂皇。预定新总督抵达之日，全城的文武大小官员，一早就袍服顶戴齐集接官厅。欢迎行列，足有半里之长。人们一等再等，一直向东张望，希望及早发现目标。谁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总是杳无消息。大家琢磨：据说是新总督昨晚宿龙泉驿，距成都只四十五里，即使说前呼后拥，行进缓慢，现已午时一刻，为什么还不见踪影？未必……或者……？正在东猜西疑，突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大声吼道："新总督大人已莅临督院，传谕众大人回院晋见。"话音未落，震动得大家惊骇莫名，拔足就向城里开跑。一时文武大小官员以及他们的人伕轿马，幡伞旗锣，仪仗执事，乱作一团。谁也分不清、顾不上官秩尊卑，爵位高低，是否会犯抢道越位之嫌，你撞我，我挤你，铺天盖地，黄尘蔽空，气喘吁吁地向督院驰去。途间，不少人纳闷：我们齐集在进入成都城的总口子上，从没见到官轿通过，未必他从天上飞来或者传驿有误？及至跑到督院街的督院，依次进入客厅，行礼拜见之后，有的人才惊奇地发现：就在将近午时，从龙泉驿方向过来的一顶流差小轿，里面坐着一位素衣小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后面跟着一挑行李，向城内行进。老者还不时从轿窗伸出头首，向左右张望。一位值勤哨勇呵斥他们说："这里在迎接总督大人，有什么看的？"这个老者叫轿夫绕道田间小径前行。另一哨勇说：反正大人尚未到达，可以让他通过，不过应靠边些走就是了。轿中老者，始终雍容自若，任其摆布，未发一言。现在才恍然大悟，轿中的老者，正是新总督大人。新总督头上戴的红顶帽子，已在褪色，身着补服，下襦有一处破绽，虽已联好，但粗针败线，很不协调，与在座诸员熠熠生辉的华丽衣冠，形成鲜明对比。众官员正在尴尬难容的时候，丁宝桢即席吩咐：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就此散班，改日再晤。大家这才像囚犯获释一样，如卸重负地散归。

丁宝桢初仕外放，即补岳州知府大缺，继历长沙而至山东巡抚，晋级一品冠带，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得意之余，自不免大刀阔斧，忽视细节，以致临到山东交卸之时，才发现"不能上计之款甚巨"，被迫与文恪互相掩盖通融，虽尚未被揭露，总属有玷官绩，深为内疚。加之，他考虑到自己倚为臂膊的东党，正在权势日蹙，一旦时移世变，西太后重提安得海一案，或者发生别的什么差误，将来很难设想。因此，他决意改



变以往的一心锐意进取，采取稳扎稳打、谨小慎微，以图寡过而全晚节，因而演出接官厅微服到任这一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临众，不管动机如何，对当时只讲排场、不务实事、浮华时尚的四川官场，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一些大小官员，从接官厅到督院现场所见，预感到官场气候将有变化，纷纷把华丽冠服收拣起来，换上了旧袍带。没有旧袍带可换的人，立刻派人到会府估衣旧货店去收购。一夜之间，各估衣店的旧补衣、袍褂、冬帽子搜求一空。来迟了未买到的，即将新袍施以污损，然后着以晋谒。渐渐地俭以养廉，廉俭便成风气。丁宝桢上任的第一把火，确实烧中了四川政风的要害，从而取得了四川人民的信任和好感，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是不久，他却摔了个大筋斗，降了职，差点连纱帽也摔脱，原因是东乡血案。

东乡即今宣汉，地处大巴山南麓，基本上属于川、陕、鄂三省交界边陲，地瘠民贫，历为明末清初徭黄十三家流民和清中叶白莲教活动地区。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该地民众比较剽悍，激易生变。明、清田赋，本来都是县衙设户房征解，咸丰以后，因军用浩繁，清政府囿于康熙永不加赋的遗训，不愿承担加赋的臭名，迫使人民自动捐献，名之曰捐输（后来又增加了津贴和新加捐输，统名曰津捐）。为使有别于田赋正供，由知县遴选县里正绅（实际是劣绅土豪）为局士，设局经理把持其事。捐输额数，系就上面配定下达比额（任务）照户房底册所载大粮（有以七分以上为大粮者，亦有以四分以上为大粮者，各县不一）分摊。局士们常以流滥粮多，恐收不足额为借口，虚宽取窄，每有多摊浮收。局士们趁机从中侵蚀中饱。其次，无论征收田赋正供和津捐，均以银两为计算缴纳单位，不足两、钱的小数如分、厘、毫、幺等则折收制钱（方孔小钱）。当时，银与钱的兑换率市场价格通常每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二百文左右，而各地征粮收捐，缴纳尾小，恒以二千文折算，而东乡曾高达二千五百文。此项浮收，名曰羡余，规定除弥补不足开支外，可以投入地方公益事业，而事实上则多入有关人士私囊。东乡粮民，以不堪苛敛，聚众要求局上们清算公布历年浮派多收帐目。这笔糊涂帐如何算得？局士们只有软拖硬抗。加上地方派系权力斗争冲突，掺杂其间，愈演愈烈，群众大集，气势汹汹。局士们下不了台，遂怂恿、胁迫知县孙定扬向四川总督吴棠札报东乡民反，请求派兵镇压。吴棠不查事实，仅据孙定扬札报，主张示以军威。接着文

恪护院，遂札派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军数千前往“相机剿办”。李有恒本是以讨伐太平天国及苗、傜起家，拿无辜群众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一个武夫，在久闲技痒、亟思寻机剿除的时候，奉到上宪“剿办”手札，格外鹰扬。他驰赴东乡，展开剿杀烧掠，直接间接死亡数千人，造成承平时期震动全国的一个大血案。东乡人北上京控，言官交相参劾。虽然文恪怕牵连自己，一再为李有恒辩疏解脱，终以事实俱在，民愤难平，部令除给予文恪以申斥外，仍令将李有恒下狱候查，讯明治罪。

从整个东乡血案的发生和前阶段处理过程来看，根本与丁宝桢毫不相干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被深深地牵涉进去，导致摔一个大跟斗呢？这是因为：他和文恪，有不可告人的交换条件，加上他“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初期接收文恪的交案中，没有察觉文恪的预谋，一交一接，几乎都是由文恪荐给他的幕僚自买自卖，一手包办。把旧任对于未结案件，特别是对于东乡血案的定性、处理意见、办法及责任，全盘承接下来，及到后来察觉，明知其非，仍不得不被动地言不由衷地硬着头皮，背死人过河，替吴棠、文恪背黑锅。其次，从历史经历和立场的角度看，丁宝桢的起家和李有恒只有大巫小巫之别，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对东乡血案的认定，无可否认丁宝桢与文恪是存在着共同点的。尽管丁宝桢系朝廷干员，屡为清王朝立有大功，又会同文恪对查办此案的钦差大臣巨进贿赂，但是人命关天，死亡达数千人，非文、丁一手遮天，能够掩盖。又兼御史吴镇、李廷萧的揭发，以内阁中书肖宗禹为首的47位川籍京官联名检附李有恒的“剿办”布告上控，及以刚毅见称、归隐原籍东乡已卸任的两江总督李经羲的奉令如实查奏，四川提学使张之洞的据实直陈。事态闹大了，底码子硬了，息不下来，才由刑部判定直接责任者李有恒、孙定扬斩决，其他责任者分别撤职、充军外，丁宝桢亦以重罪轻拟，从一品顶戴降为四品，正印总督改为署理，以观后效。

东乡血案震动全国，后来又把丁宝桢攀扯下去，掌握全面的慈禧太后是知道的，她这个“谁要是给我不痛快，我将让他终身不得安宁”，忌刻、报复性强、心狠手毒的人，也没有忘掉安得海一案。所以在刑部派出钦差大臣查办的同时，内廷又派出了亲信满人恩承和童华前往四川摸底。行前，慈禧曾密谕二人，定要把东乡血案的来龙去脉和丁宝桢介入的程度和事实与应承担的责任，查个清楚。恩童回奏说：东乡血案之酿成，主要是





吴棠定下了要“示以军威”的基调，文恪下了“相机剿办”的手札，李有恒鲁莽贪功，草菅人命。丁宝桢初到四川，不明真相，官官相护，企图大事化小，掩护吴、文，以致重罪轻判，替人受过。慈禧明白：深加追究，吴棠、文恪罪责难逃，丁玉祯反会成为替其恩人、族人受过的义士。再则丁宝桢是清室定国安邦大员，正在为清王朝效力，不能过分纠缠过去、挫伤其积极性，所以才未深究丁的责任。

丁宝桢来到成都，地皮子也未踩热，就从一品顶戴降为四品，正印总督改为署理。他内心深处也知道对斩却安德海一事，慈禧必然迟早要拿自己开刀。要保住官位，唯有在四川干出点名堂，让慈禧不好下手。于是，他改革吏治，改变道州府县官吏遇缺时论资排班替补的办法，而是唯才遴用，选用年轻有为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少年面白尽贤才”充塞到官府，一扫暮气沉沉、昏庸贪污的局面。他还拟定川盐运销办法十五条，把川盐产供销由私商经营改为官运商销，既平抑了盐价，打击了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又为国家筹集到盐税。他改革盐税制，立竿见影，每年征收盐税由过去二三十万两白银增到几百万两，到清末已达630万余两。清朝自鸦片战争后，国库日蹙，有了四川每年这一大笔收入，慈禧对丁宝桢就算有喷嚏也打不出来了。丁宝桢革盐弊，矛头对准不法盐商，逮捕了捐款买得头品顶戴的白贡大盐商王余照，封存他千万余两家财。王命人在北京活动反告丁许多罪状，朝廷查核，证明丁为国敛资，于是又恢复了一品官秩。他还从长沙请来当时全国一流学者王闿运主持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拨款刊刻书籍，在四川提供文教，改变了清初湖广移民忙于生计文化较低的状况。在他倡导下，四川文风大盛，培植了不少经学大师和饱学之士。他的这几招，确是富国强民之举。光绪十二年，他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所，衣箱中只有白银四百两。历年盐税中他应得的1.2万两白银存在盐局，并未支用，因而死后，声威更振。在清末昏庸无为官吏中，丁宝桢也算难得的一员封疆大吏了。

女诗人薛涛

◎ 李思桢

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上面这首七律诗，是唐代诗人元稹（字微之，公元779—831年），在蜀与薛涛会晤往还中，惊服薛涛的文才和辞辩，回到京城长安以后，接到薛涛奇献的她自己制成的松花小笺一百多幅，他就用这松花小笺，题咏此诗，“赠寄薛涛”。

元稹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对于薛涛能够作出如此崇高赞誉，而且寄予无限深情，可说是元稹除为诗人杜甫作墓志铭、推尊杜甫“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的崇高赞誉而后，没有对其他的人有过这样的评价的。

还有唐代与张籍齐名的诗人王建，也有《寄蜀中薛涛校书》：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这首绝句，也同样对薛涛总领春风的风流文采推崇备至。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根本没有地位。何况像薛涛这样一个“沦入乐籍”、流为乐妓的女性，更是为人所不齿。然而她居然能得到像元稹、王建对她如此的推崇和赞誉，若不是她本身有特殊风格和优异才华，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对于这位能突破封建樊笼的唐代女诗人薛涛，我们不能不对她一生辛酸的经历和她仅能流传下来的残余诗篇，作一番探讨。

薛涛字洪度，生于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卒于唐文宗太和六年秋（公元832年）。她出生在唐代的京城长安，她的父亲名叫薛郧，因作





小官，流寓到蜀。所以，她从小随同父母家居在成都，就在成都度过她的一生，并留下了一座“薛涛坟”。

她从小由于家庭的教育熏陶，幼年就习晓音律，8岁时便能吟诗作对。有一次，她的父亲指着庭中井边一株高大的梧桐树说：“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叫她继续接下去，她立即就接着说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她的父亲由于封建天命思想的支配，马上就牵强附会地联想到他的女儿将来会成为“迎来送往、迎新送旧”的妓女上去，就愀然不乐起来。这也难怪，事有凑巧，当时还另有一位与薛涛同时有名的诗妓李冶，她也是在幼小时，作过一首“咏蔷薇”的诗，诗的末句说：“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这也惹得李冶的父亲大大生气，认为他的女儿将来必定成为“失行妇人”。

薛涛到了及笄之年，她的诗文业已见称于时。一件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那就是她的父亲薛郧由于亏空钱粮，触犯刑章，而且严重。唐代法律规定：严重罪犯，家属应受株连；株连办法是，儿子充军，妻子充院。充院就是被迫去作“院妓”。但因薛涛业以诗文见称，故被编入院妓中的“乐籍”，充当听候官府召唤陪诗伴酒的“乐妓”。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隋唐时代的所谓“妓”，根据《广韵》一书解释说：“妓，盖以歌舞悦人者，即所谓歌妓、艺妓也”。“院妓”“乐妓”“诗妓”，都是这样的“妓”。

所以，薛涛这种“乐妓”，我们认为她是一个被迫召唤陪诗伴酒称为“乐妓”的“女诗人”，决非如后代以身事人的卖淫之妓。

更由于薛涛自幼天资敏慧，从小就习晓音律，她既能辨琴，又能工诗；不但文采风流，而且书法卓越，写的字笔力俊激，无一般女子的柔媚气。尤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的笔法。常常自己书写自己所作的诗，其书法与诗句，俱为时人啧啧称誉。因而她声名远播，日益受人敬重。但她不慕华贵，不喜艳饰，常淡妆素裹，更为人赞赏，正如当时人所敬重的“薄媚娘”一样。

这样一来，就惊动了当时的藩镇西川节度使韦皋，把她召去侍酒赋诗。晤谈之后，极为赞誉。韦皋立命从人，草拟奏稿，拟请朝廷给以“校书郎”的官衔。当时座中来客，极表赞同。但是按照规定，奏章先要通过当时的护军大人认可之后，才可转上朝廷。哪知这位护军老爷官气十足，

板起面孔，认为“国家名器，不可以假人”，对卑贱的乐妓，怎能随便赋予朝廷官衔呢！更何况这是贵与兰台令史一般相比的高位官衔呢！由于这种封建的阻力，致使一场美事竟成虚话。

虽然这件要求正式任命的美事，受到无情的梗阻，可是人心所向，众意难违。护军老爷一人虽不同意，但是从此以后，一般人对薛涛，却均以“薛校书”相称。从显宦的节度使到知名的词客诗人，都是如此。王建的赠诗和段文昌为薛涛写的墓碑，都以“校书”称呼。这说明人们对薛涛的敬意，不是封建官府陋规可以阻止的。从此以后，人们还对所敬重的“妓女”以“校书”相称，使“校书”一词成为对妓女尊称的专用词，这可以说是沾了薛涛的光，使这些沦为娼妓、备受侮辱的妇女们扬眉吐气！

由于这样，薛涛的声名日益增高。官府宾客，外来的与在蜀的，都向往薛涛声名，要求与薛涛会面的贵人们也就日益增多。这就引起了韦皋对薛涛的恐惧，他怕自己在蜀专横奢侈的恶劣行为，被薛涛流露给宾客而传闻于朝廷，于他不利，便借故处罚薛涛前往松州边地，以掩其口。这真使薛涛“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种“祸从天上落”的灾难，又无处躲藏。万不得已，还是只有向节度使韦大人陈情诉苦，请求幸免。所以薛涛有《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诗文是：

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差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黠虏犹遵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

这两首小诗上达韦皋面前，竟感动了韦老爷。韦在反复吟咏之后，遂将罚边之事作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薛涛的诗才高妙。两首小诗，竟能化险为夷。所以《蜀故》就这两首诗“有讽喻而不露，深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低首；元白之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这样抬高，自然过分；但诗情的哀苦悲婉，跃然纸上，却真是值得玩味！

薛涛的家居，是在成都的万里桥边，门庭遍种枇杷与菖蒲。当时尚在京城长安的大名鼎鼎的诗人元稹，早就在京城仰慕薛涛的声名。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他为监察御史，奉使到西蜀来，就特别约请薛涛相见。初见面时，元稹意态骄横，矜持笔砚，意在考察薛涛才华，是否人如其名。薛涛从容不迫，立即走笔书作笔、墨、纸、砚《四友赞》，文曰：“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庙以休休”。元稹立即感到薛涛书法文义，俱极佳妙，而且才思敏捷，非同凡响。于是大为惊服，赞



誉备至。他们之间，因此也就相处甚适，一年过往，始终是彼此敬佩！所以后来相别时，薛涛特作《牡丹》一诗赠送元稹，以寄情怀。诗曰：

去年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一年之后，元稹便离蜀回京。元回京后，薛涛也就从万里桥边迁居百花潭上。她利用浣花溪水，专制十色松花小笺。这种笺纸称为“浣花笺”，后来又称为“薛涛笺”，历代以来，均为诗人墨客赞赏喜爱，甚为风行。咏笺之作，何止千百，这里略举一二，以见一斑。郑谷诗：“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李商隐诗：“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上玉钩。”韩浦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溪头。”司马光诗：“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手鲜。”

到了唐穆宗长庆初年，元稹在京以翰林学士，入为内廷供奉，侍直禁廷，专司制诰。薛涛眷念旧情，特将自制的十色松花小笺百余幅，献寄与元，元即就笺题《赠寄薛涛》一诗寄与薛涛。

此外，元稹还另赠寄有诗与薛涛，诗曰：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下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敧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

同时，在陈矩刻校之《洪度集》中，却混入有《十离诗十首》，说是“元稹使蜀，严司空（即严绶）遣涛往侍，因事获怒，远之。涛作十离诗以献，遂复善焉”。这十首诗，在每首的末句中，都苦诉着“不得”怎样怎样，说得来真可谓辞情凄婉，语调悲哀！兹举第一首《犬离主》为例：“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情亲客，不得红丝毯上眠！”这样的诗和元、薛唱和的其他诗相比，俨然显得不伦不类。实际上这十首诗是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时，他的幕僚薛书记所作，并非薛涛的诗。这是因为薛书记饮酒至醉争令，掷注子击伤了元稹的侄子，被逐出幕，因作十离诗上献元稹，有《犬离主》《笔离手》《马离厩》《鹦鹉离笼》《燕离巢》《珠离掌》《鱼离池》《鹰离鞲》《竹离亭》《镜离台》十首。编诗的人，

搜刊不查，以致混入《洪度集》中，必须辨明，以免以讹传讹，有伤我们这位女诗人的人品风格。

自元稹赠寄薛涛的诗以后，元、薛之间，就无来往的事迹了。为何至于如此呢？这是有一段缘故的。原因是元稹在侍直禁廷以后，就出任浙东观察使。这时与薛涛分别，已过 10 年。本来元稹正想遣使往蜀迎接薛涛，忽有浙东名妓俳优周季南之弟周季崇的妻子刘采春，从淮甸回到浙东元稹的住地来。采春善唱，不但高歌声彻云霄，而且余音绕梁不绝，真有“半入江风半入云”的深趣。采春的诗咏，虽不及薛涛，然而容华绝世，光彩照人。这就使得元稹迷恋新欢，忘却旧好，把为他素所敬爱的薛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有人批评元稹说：“元稹之平生，先后判若两人，晚年依附宦者，以得相位，尤可叹也！”

就在元稹把薛涛忘弃的这时，薛涛却正在成都显出她的捷才和巧辩。当时有一位黎州刺史，与薛涛在宴席间作“千字文”令，条件是引语须带鱼禽鸟兽。这位刺史先说：“有虞（鱼）陶唐”。涛说：“佐时阿衡”。刺史说：“你引语中并无鱼鸟等字，须罚。”涛笑说：“衡字内有小鱼，使君引语的‘虞’字，非鱼非鸟，才该罚。”使得座客大笑。

高崇文作节度使镇蜀时，令涛改一令字云：“须得一字象形，又须逐韵”。高先行令说：“口，有似没量斗。”涛接续说：“川，有似三条椽。”高说：“奈一条曲何！”涛笑说：“相公为西川节度使，尚使一没量斗，至于穷酒左三条椽，止有一条曲，又何足怪！”一座称善。

薛涛晚年，看透人情冷暖，世味辛酸，特别感到孤鸿只雁、身世凄凉。她移居到碧鸡坊里（今成都金丝街附近），著女冠服，居吟诗楼，偃息其上吟咏抒怀，以终余年。我们读她的《春望词四首》诗，一则曰：“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再则曰：“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就可看出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但由于她一生不幸的遭遇，使她种种理想，终归幻灭！

薛涛在唐文宗太和六年秋（公元 832 年）死去以后，埋葬在成都外东的桃花林。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亲自撰写墓志，并大书墓碑：“西川校书薛洪度之墓”，屹立坟前。这就是一般人所去凭吊的“薛涛坟”。

薛涛死后，除留有此坟外，另有《洪度集》诗集一卷，还有《草诗墨迹》传世。可惜“墨迹”早已佚失，现行的诗集，亦只有清代光绪年间贵





阳陈矩所辑的《洪度集》88首流传下来。至于《蜀故》所称有诗五百首之原本《洪度集》却是早已不可得见，真是可惜！女诗人薛涛一生虽然只活了47岁，但出入幕府，却共经历了11镇，皆是以诗受到敬重。这十一镇是：韦皋、袁滋（未到任）、刘辟（叛诛）、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段文昌、杜元颖、郭钊、李德裕（其中惟袁滋、刘辟、郭钊、杜元颖四镇无诗）。

当时与薛涛有过唱和的诗人名士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王建等，凡二十余人，都互有唱和。其中尤以与元稹、白居易等唱和为多。

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予无限的同情！

薛涛《洪度集》开宗明义的第一篇诗《酬人雨后玩竹》说：

南天春雨时，哪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这首诗是薛涛借吟咏风物来写照自己，不但以竹自比，而且以竹自负，突出了她一生的高尚品格，特别值得我们崇敬。在清初，就有人把环绕薛涛坟的桃花树，换种为千竿修竹，成为护墓的绿云，并发展为今天“望江楼公园”的竹园胜景。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历代的诗人墨客、名流雅士，对薛涛以崇敬的心情，留下了不少的诗词赞咏，联语挽歌；并进一步在薛涛坟附近，修建了纪念薛涛的亭台楼馆，把它臆定为“薛涛故居”，形成今天的“望江楼公园”，供广大旅游者游览凭吊，以纪念我国文坛上这位杰出的女诗人。

杨状元的故事

◎ 刘先觉等

万里长江作澡盆

杨升庵五六岁时，即以勤奋聪颖，知名于乡里。有一回，他在新都城外一条小河的堰里洗澡。适逢新都县令路过堰边，见杨升庵并无回避之意，顿时火冒三丈，要打他的板子。升庵拒不上岸。县令便叫跟班把他的衣裤挂在堰边的树上，说："我出一对，你若对得好，便还你衣裤。"随即说道："千年古树为衣架。"谁知升庵在堰里信口便对出："万里长江作澡盆。"县令一听，惊得目瞪口呆，赶快从树上取下衣裤，亲自奉还给杨升庵。

（刘先觉）

明状元变成宋诗人

正德六年，杨升庵高中状元后，不少官员登门致贺，杨乃设宴于春光明媚、湖水澄静的花园中。酒过三巡，便行起酒令来。大家议定，各吟古人诗一句，要切合园中景色，不切合者罚酒三杯。轮到一个出行伍出身，平时读诗词甚少的兵部侍郎时，只见他急得抓耳挠腮，沉思良久，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当即引起满堂哄笑。一个文官嘲讽道："大人在何处见过柳絮是红色呢？"另一人接嘴挖苦说："他老儿征战多年，想必是在战场上杀红了眼时看到的。"接着是一片罚酒声。弄得这位兵部侍郎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升庵见状，深为不平，起身踱至窗前，但见夕阳把湖岸盛开的桃花倒映水中，呈现出一派桃红柳绿的灿烂春光。即景生



情，升庵回过头来说道："兵部大人吟的是宋人佳作，它的上句是'夕阳返照桃花水'。"几句话说得满座鸦雀无声，少顷，响起了一片赞叹声：真是好诗。既工稳又别致，更切合当前园中景色。那个嘲讽人的文官，故作刚刚想起的样子说："对！是宋人的诗，我以前曾经读过，一时没有想起。"升庵一听，暗自好笑，心想：嘿，我这个堂堂的明朝状元，难道真的变成为宋代诗人了吗？

（呆木）

独占鳌头

杨升庵考上状元以后，朝廷中以江彬为首的一派佞臣不服，扬言升庵并非确有真才实学，是其父从中作弊。升庵启奏正德皇帝，愿当众面试。正德乃命升庵立于殿前石刻鳌鱼头上，让大家随意提问，由升庵对答。升庵昂首立于鳌头，对所提难题，一一对答如流。江彬暗地指使一名亲信，手提一有盖竹篮，走向升庵问道："你知我篮中所装何物？"升庵侧目微睨，哂笑道："你这篮中装的是东西。"提篮者大笑道："东为大海，西是高山，请问我这小小竹篮，如何装之得下？"升庵从容答道："我说你这竹篮，只能装东西，不能装南北。""此话怎讲？""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木与金均为实体，因而能盛于篮中。南方丙丁火，竹篮遇火，必然化为灰烬。北方壬癸水，这水入竹篮么，就像尔等今天对我的刁难一样，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升庵的聪明才智，惊服群臣，弄得江彬之流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七成）

巧计免贡米

川西坝子的成都府一带，盛产雪白的大米，那米煮的饭很好吃。这里的府官一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他为了讨好皇帝，以求加官晋爵，每年还额外从各县搜刮大量的上等白米向朝廷进贡。有一年，洪灾过后又是大旱，庄稼无收，民不聊生，但朝廷的贡米一颗也不能少。杨升庵回到新都老家，看见百姓为缴纳贡米怨声载道，便对府官说："今年的贡米由我来

筹办，不要再催逼百姓了！”府官大笑杨升庵口出狂言，冷眼观看杨升庵怎样收场。

不久，杨升庵找了些体态畸形、五官丑陋的人赶着满载“贡米”的车辆来到京城。皇帝站在紫禁城上看得清楚明白，惊奇地问杨升庵：“爱卿，怎么这些人不驼背就跛脚，不斜眼就歪嘴？”升庵从容答道：“陛下，这是他们长期吃川西白米的结果。臣的老家就在成都府，早知这米爽口，但从不吃它。”皇帝听罢，既后悔又恼怒，便叫太监传旨，从此不要川西坝子的贡米了，并将府官削职问罪。老百姓拍手称快，纷纷传颂杨状元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黄怀举）

席前行令讽钦差

某年，一位钦差大臣，奉旨巡察云南，一路上贪赃受贿，敲诈勒索。地方官吏也借机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他们上下串通，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但是，他们也怕充军到这里的杨状元与他们作对。于是，便由某官以给钦差饯行为由，请升庵与他的好友王廷表、叶端作陪，想借此修好。但席间又不便明说，只好以行酒令吟诗来作暗示。他们规定，以一有水旁的字为主，去掉水旁后加一字组成另一个新字，而且要以这一新字落韵。钦差官大，当然该他先吟。只见他，看着升庵三人开口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湘边水，加雨便成霜。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叶端一听，已知今日为何设宴。他微微一笑，吟道：“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掉清边水，加心便成情。火烧纸马铺（售香烛纸钱的商店），落得做人情。”

某官一听，觉得不妙，忙接口说道：“有水也是汪，无水也是土，去掉汪边水，加人便成夫。观棋不语真君子，酒醉无言大丈夫。”

升庵对他们往日的不法行为和今日的无耻手段，早已深恶痛绝，但日前自己是充军罪犯，无权上表弹劾。这时，他微睨着钦差，慢声念道：“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了溪边水，加鸟便成鸡。得时猫儿雄似虎，落毛鸾凤不如鸡。”



王廷表哈哈一笑接口就说："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人这时同声大笑，起身离座，不辞而去，使得钦差和某官垂头丧气，狼狈不堪。

（东木）



文坛怪杰刘师亮

◎金　戈

清末民初的时候，成都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一无功名，二无产业，军阀地主恨他，老百姓却欢迎他；文人墨客看不起他，却偏偏有那么多人要请他写对联。此人是谁？就是文坛怪杰刘师亮。

说他怪，他也真有点怪！有些对联，举人、秀才也对不起，他却能对得出来。他可真算得上是个神童。小时候，他想拜一个老师学做对子，老师给他出了一个上联："两头是路穿心店"，要对起才收他。他想了一夜想出来了："三面临江吊脚楼"。三对两、路对江，已经算是很工稳；"穿心店"对"吊脚楼"，简直是妙极了。这位老师见了，自叹不如，不敢言师。

他家里贫穷，受到军阀的压榨、地主豪绅的欺凌，他便常常写出一些亦庄亦谐的对联，既把那些军阀贪官骂得体无完肤，却又妙语横生，不胫而走。有一年军阀借口要修马路，以此敛财，对拆屋后的贫苦居民又不予妥善安置，以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刘师亮就写了一副对联：

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

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

这副对联里的"滚"、"车"，都是用的成都方言。成都过去修马路，是用人工捶成的碎石铺地，然后再用"石滚子"将路面压平。从表面看，是说碎石已铺好，问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滚路"；实际上是问他们什么时候滚蛋。"车"在成都方言中，是走开的意思，表面上是说，障碍已经没有了，希望早日通车；实际是说，坏事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应该走得了。

他写的对联，非常大众化，但绝不庸俗。有时一副对联，中间还夹杂一两句文言词语，但词不害义，老太婆也听得懂。例如：

米一斗一元，儿一个半元，剧怜载道流亡，人价不如米价贵。



田一亩八税，货一件百税，要过沿途关卡，捐钱还比本钱多！

他对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局面，深恶痛绝。他认为这两种人对人民的危害都是一样的。他写过一副对联：

军阀打仗争南北，

棒客下乡抢东西。（成都人称土匪为棒客）

他有时写得很露骨，骂军阀豪绅是跳蚤、是乌龟，所以那些人很恨他，要抓他，要暗害他。他无可奈何，就只好四处躲猫猫了（成都人称老虎为猫猫。）。



徐子休先生二三事

◎静　远

徐子休先生名炯，字子休，别号霁园。1861年（?）生于四川省华阳县，1936年病逝。他青年时期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仕途蹭蹬，并不得意，从此开始他一生教学合一的生活，直到老死。这50年中，他不断学习、不断教人，孔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足以当之无愧。他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受宋儒“理学”的影响很深；但又对明末“三先生”和颜元、吕留良等人的学说和为人衷心仰慕，所以养成他坚毅的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也使他和时代脱节，陷入时代洪流的涸流中而不能自拔。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四川绵竹人）、刘光第（四川富顺人）是先生的好友。政变前夕，先生打电报给杨、刘，提醒他们注意。那知电报还未到达，“六君子”已在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了。他得到这个消息，忿激地对亲友们说道：“这一刀砍下的不是他们的头，而是满清的国脉。”此话一点不假，戊戌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此路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十三年后彻底埋葬了清王朝。接着他写了一篇题为《古今有女祸否》的文章，对那位“圣母皇太后”进行无情的讨伐。这在如天如父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环境里，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举动。果然“老佛爷”赫然震怒，下诏抓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他在好友的掩护下，避地陕西，才得幸免。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孙中山在日本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蔡锷（松坡）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第二年进军四川。当时袁世凯派在四川的军政长官为成武将军陈宧（袁的心腹之一，袁倚之为“南天柱石”）。陈鉴于当时情势，对抗“护国军”有所不能，但要背离袁皇帝又有所不敢，心怀犹豫，左右为难。当时成都某些团体曾派出代表向陈请愿，



希望他不要为虎作伥，同“护国军”妥协、站在反袁一边。那知这位陈将军一时发作，将其中一些人“就地正法”，而且宣布以儆效尤。这时徐先生不计个人安危，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给陈写信，辨明是非，指陈利害。后来陈终于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先生的陈辞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二陈汤”也成了袁皇帝的催命符。

上世纪30年代中，四川军阀有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调子，意图割据四川，分裂祖国。徐先生对此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之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凡中国人均得而治之，非四川人所得而私云。此文一出，津、沪各报都加以转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徐先生毕竟是一位同时代脱了节的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仍然要坚持“尊孔读经”。不唯举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他在成都创办孔圣堂，招收生徒，实践“尊孔读经”的理想。这所学堂后来嬗变为大成中学时，在课程中仍然设置有“读经”一项；校门上仍然高悬着“孔圣堂”的匾额；在校内仍然保存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每逢农历朔望和孔子的诞辰，全校师生齐集殿上，在“至圣先师”和“四配”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中的一种奇观。

“三代以前，小人不敢为恶；三代以后，君子不敢为善。”这是宋朝人说的，徐先生常爱加以引用。这话并不正确反映历史的真实，是宋朝理学家偏爱“三代”及其以前的一种主观片面的见解。但是“君子”（好人）与“小人”（坏人）、“善”与“恶”的对立，却是无时无处不存在的。徐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面对“君子不敢为善”的现实，借此发出深沉的感慨，表达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拳拳之心、殷忧之感，是至可宝贵的。不同时代，对善与恶有不同的标准，但为善去恶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当今之世，在“敢与不敢”之间，仍然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刘湘返里

◎ 郑守铭

事情大概发生在民国17年（1928年）。

一天，安仁镇“三益店”茶馆内。

人们边吃茶边摆谈着一件特大新闻：四川省主席兼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省战后督办刘湘，最近就要返里探亲了。

“据说，刘甫公这次回家，带有一个营的警卫。好不威风啊！”教私学堂的张老师说。

“不光一个营，还有一个手枪连哩！听说还是清一色的德国罗汉儿，二十响的。真不简单！”头戴黑色上耳其帽的刘大爷，自以为是刘督办的自家人，消息自然要比别人知道得多。

“啥子？”这时，坐在一旁的宋三阳大爷忍不住开腔了：“带这么多人回来做啥子嘛！哼！”他边说边把拐棍儿在地上杵得“咚咚”响。大家听见刘湘的舅舅这么说，哪个还敢咂牙呐？

这天中午，听说刘督办和他手下的人些，已经从大邑出发，很快就要到安仁镇了。怪得很！宋三阳大爷，却自家个儿抬了把大圈椅，安在刘湘必须经过的地方——清官台前面的街中间。大家鼓起眼睛把他盯倒，看他到底要整个啥名堂。没多大功夫，刘湘的前卫部队到了。人些连忙向街两边闪开。一个副官见宋大爷一动不动地挡在街中间，就去叫他让开。哪个晓得，他不光不听，还大声闹了起来。刘湘听见争吵，急忙向前赶来。当他看见是自己的舅舅时，立刻跳下马来，跪到宋大爷跟前：“舅舅，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来这儿干啥啊？”

“来迎接你嘛！”宋大爷气冲冲地说。

“姪不敢！”刘湘埋着脑壳说道。

“哼，你带这么多人回来做啥子啊？抬头一看，都是乡里乡亲的。吓



人？还是招凶啊？”

他边说边把拐棍儿在地上杵得“咚咚”响。

“姪儿是……”问得刘湘一时说不上话来。

“是啥子啊？当了大官了，脑壳就大啦？连乡邻都不认啦？你说嘛！”宋大爷越说越生气，把个拐棍儿在地上杵得更响。

“舅舅，您老人家不要生气了。姪儿我马上打发他们走就行了。”刘湘边说边命令大部队从场背后绕过去，然后又亲自把宋大爷扶到马背上，牵着马绳，带起几个贴身亲兵，簇拥着到公馆里去了。

怕舅父喊街

大约是民国十几年的时间。刘湘的老妈没得那份福气，儿子当大官儿不久就得了重病，百般医治无效，终于一命呜呼了。刘湘和夫人周玉书，含着眼泪，亲自从省城护送灵柩回到了老家安仁镇。按当地习俗：死在外面的人一律不能抬进家里，更不能抬进供奉家神的堂屋。因此，刘军长夫妇只好在厅堂里停放了母亲的棺木。谁知道这件事儿却惹火了刘湘的嫡亲舅父宋二爷。宋大爷认为：刘湘两把手[①]这样做，是对姐姐的不孝，也是对家婆[②]屋头长辈的不尊重，因此高矮[③]不答应。无奈刘军长夫妇死死缠着，百般哀求。于是便不耐烦地把手一挥，气冲冲地离开了刘公馆。可他一踏进街口、就亮开喉咙，拖声拖气地喊起街来：

“大家听倒啊，刘湘的妈是打私娃子死的啊！进不得堂屋啊！大家听倒啊……”从街这头就喊拢街那头。街邻们听见喊声，都跑出来站在街门口，交头接耳，指手画脚地议论不休。

刘湘夫妇一听说这件事情，又气又急，连忙来到宋大爷家里，双双跪在舅父跟前，百般赔礼道歉，答应马上把母亲的棺木搬进堂屋里停放，才算了事。

---

① 两把手：方言，即两夫妇。

② 家婆：方言，指外婆。

③ 高矮：方言，即无论如何之意。

从军

还是光绪年间的事情了。

那年，刘湘17岁，在大邑城里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一天下午，县衙门的李老师前来视察。因为他开黄腔[①]说孔夫子是周天子的老辈子。根据是："夫"字比"天"字高出一个头嘛！刘湘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同学禁不住笑了起来。李老师很生气，就当着全体师生，责令校方罚那几个同学跪在讲台上，每人的脑袋还顶了一根板凳，板凳上还搁了满满一碗水。谁要把水摇洒一点，就用竹板劈头乱打。事后，这些同学气不过，想找机会报复。恰好那几天晚上，府里来了个戏班子唱戏。大家发现李老师每天晚上都要喝得醉醺醺地去看戏，就叽叽咕咕地商量了一阵，决定当天晚上，由个儿高、胆儿大的刘湘去干。

那天晚饭后，刘湘他们估计快要歇台[②]了，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粪档子拿起，和几个同学到厕所里舀了一档大粪，躲在李老师必须经过的地方——金巷子口口的拐角处。不多一会儿，李老师果然摇头晃脑地哼起高腔[③]过来了。刚一走拢，刘湘端起粪档子，冷不防劈头劈脑给倒在身上，和那几个同学车转身子就跑。"啊，呸，呸！……"李老师闻见一身屎臭，又见泼他的那几个人正朝学堂里跑，就明白是咋回事了。他气呼呼地对着刘湘他们大叫大闹起来："跑？哼，跑得过三十，跑不过初一！"

大家一听，晓得糟糕了，就连忙商量对付的办法。刘湘把胸脯一拍："不怕，坐监狱我去！"最后，有个同学出了个好主意：让刘湘到府上考弁目学堂[①]去。大家一听，都说很好，就逗起钱连更晓夜把他送起走了。等李老师惊得病了几天再来追查责任时，刘湘早已考进弁目学堂了。

---

① 开黄腔：方言，即说错话。
② 歇台：指散场。
③ 川剧声腔之一。
① 弁目学堂：即陆军小学。



刘文彩轶事五则

◎ 郑守铭

一、选妻

大概是民国28年那阵子，刘文彩刘总办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原先有的四个大小老婆，老的老，死的死，愿意住省上的住省上，剩下他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安仁镇的老屋头。没个贴身的人照顾不说，那么大一份家务，也没个知心的人帮手经佑。他脑壳头转来转去，最后，决心要好好挑选一房五姨太。

风一吹出去，媒婆们连门槛都给他踢断了。选过来，挑过去，开头被刘文彩看上的，是个大家闺秀、豪门小姐，论人才长得像天仙一样。可在他屋里住不到半个月，他就对介绍她的媒婆说道："简直像个货儿子[①]，讨这么个贱东西，呐？我这把老骨头，要不了几个月，恐怕就要被她抖垮啊！这东西每天都要睡到太阳照倒屁股才起床，能经佑[②]好家务？"

第二次，有个媒婆给引来了个机机灵灵的女学生。住了几天，他很满意。谁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同到外边转田坝，忽的一下，从一根豆田坎上梭出来一根花驳溜纠的菜花蛇。那女子一见，吓得"哎呀"一声，一张脸煞白。一回到家里，刘文彩就把介绍她的媒婆喊到跟前说到：

"好是好，就是胆儿太小了。胆儿太小，咋个经佑家务呐？又咋个经得住一点儿风险呐？"

过后，媒婆们又接二连三给说了好几个，可他连一个也没有看上。有

① 货儿子：即妓女。

② 经佑：方言，即管理之意。

一次，刘文彩到蔡场兴福寺收租的路上歇脚，碰见三个高高大大的、巴巴适适割猪草的幺姑娘，在一条好几尺宽的大沟边上，赌跳沟玩耍。其中有两个试了好几次都不敢跳，另一个却大大胆胆地接连跳过去好几次。谁知道最后一次，她踢了个石头到沟里，把根藏在草龙龙头的水蛇吓得窜了出来。那两个姑娘一见，扭转屁股就跑，唯独这个敢于跳沟的姑娘不仅不跑，反而随手拾起一根干柴棍棍，不慌不忙地把蛇给打死了。

“胆儿真不小，又是干人出身，拿来经佑家务，保险又经得住困难，又晓得好歹！”刘文彩指了指那个打蛇姑娘向保长问道：“是哪个的女儿啊？”

“王米花匠的嘛。”保长明白他的意思，笑嘻嘻地说道：“要是总办[1]瞧得起，包在我身上嘛！”

果真是玉麦包下锅　　一熟（说）就啃（肯）。当天，刘文彩就把她带回家里。晚上，就嬉皮笑脸地要和她睡瞌睡。可是，她说啥也不答应，并且对刘文彩说：要是真的瞧得起她，就该选上个好日子拜堂成亲。刘文彩一听，就满心欢喜的答应了。

这个幺姑娘，就是以后非常出名的、最善于管理家务的、最爱吃鸭子脚板儿的五姨太王玉清！

人们都说刘文彩是个大老粗，其实，这家伙比鬼还奸哩！

二、抢夺象牙塔

大邑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着一座大约七八寸高，雕刻得异常精致的象牙宝塔。它传说是孙中山先生，在同志会暴动成功以后，送给对革命有功的川军第三军军长、老同盟会员刘禹九将军的。刘将军很爱惜它，把它作为传家至宝藏在大邑城里的公馆头。有一次，刘文彩一看到这件宝物，做梦都想把它据为己有；可是，刘将军的地位好高，权势又大，怎么行呢？直到刘禹九死后，刘文彩便多次托人去买，去骗，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打了个烂条：找几个赌棍去抬刘禹九家少爷的毛子[2]，也没有得手。于是，

---

① 总办：刘文彩曾担任过叙府税捐处总办。

② 抬毛子：指赌博时由几个人串通去对付另一人叫抬毛子。



他便狗急跳墙，买通刘将军的一个账房先生，派出几个二股账[1]，搽起大花脸，趁一个漆黑的夜晚，冲进刘禹九家公馆，把全家老小都给捆来吊起，边打边追向象牙塔的下落，一直整到鸡叫。刘禹九家夫人年老体弱，实在受不了，才把它放的地方说了出来……宝物被抢去以后，刘将军的儿子立刻赶到省城找到省主席王陵基。王听了气愤道："太不像话了，连老前辈的东西都有人敢抢！"之后，就叫秘书责令大邑县县长限期破案。那县官通过一个土匪头子了解到被抢的情况之后，就坐起拱竿竿轿子去拜见刘文彩。刘文彩没法，只好买通县长，把那几个抢东西的土匪全部抛出来枪毙，灭了口，硬说他们卖给外商才算了事。可是，刘文彩做贼心虚，始终不敢让它现身哩。

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才把它陈列出来，让大家观赏。

三、不准改嫁

自从王玉清被刘文彩选为五姨太之后，一时之间，王米花匠竟然身价百倍，成了兴福寺、万石桥一带响当当、硬梆梆的王老太爷了。那两间鸡抓漏的茅草房，早已变成了煊煊赫赫的王公馆了。

王老太爷的老伴没有福气，王公馆还没有修完就一命呜呼了。他名下不多不少，一个儿子一朵花。王玉清下面是个儿子，排行第二，自小就叫王老二。王老二虽然长得来鱼背猴腰；但由于他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总办的拉不伸[2]，所以讨了个老婆，虽不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却也颇有几分动人的姿色。婚后不久，谁料那王老二也像他妈一样，命薄如纸，短命夭亡，不仅扔下偌大一个辉煌华丽的王公馆不去享受，而且还丢下了个出水芙蓉般的王二嫂。由于她年轻美貌，自然耐不住那乂苦又涩的寡居生活。因此，王老二死后不久，她就在王玉清和刘文彩面前多次表露，要为自己招一个汉来支撑王家的门户。贵为川西土皇帝的刘文彩，哪能丢下这个脸面，让这个寡母子改嫁？因此，他不仅不同意，反而给蔡场

---

① 二股账：方言，指土匪。

② 拉不伸：方言，指穷了。

乡乡长、保长打了个招呼：谁要是敢摸王二嫂一下，谨防他脑袋搬家！为了这件事儿，王玉清也一番五次劝诫王二嫂：

“你姐夫不同意，你就安心地守你那个女儿吧。等她长大了，招一个女婿，不也能传宗接代？”

尽管如此，但王二嫂哪能按捺得住呢？她成天打打扮扮，穿街过巷，走东家窜西家，逗得不少汉子做她的美梦。可他们一想到杀人不眨眼的刘文彩，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谁还敢采这朵鲜花？没料到，就在这些人当中，竟然出了个采花不怕死的王子舟。王子舟排行第八，是乡里有名的土匪。他早就对王二嫂垂涎欲滴了，但碍着刘文彩的面子，一时不敢下手。如今一见王二嫂整天整天地在自己面前扭来扭去，不用说心儿，就是那根根骨头也早酥了。至于刘文彩的上户[①]，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时隔不久，王子舟和王二嫂勾搭上了的消息，终于传到刘文彩的耳朵里了。刘文彩气愤地对王玉清说道：“你那兄弟媳妇儿也实在太不争气了，放下荣华富贵不享，偏偏不听我们的话，硬要去偷野汉子。你叫我这个公益协进社[②]的总舵把子还有啥面子啊？连寡母子都在偷人养汉！……哼，那王老八龟儿子也狗胆包天，连我刘文彩的寡母子也敢打来吃起！”

过了两天，刘文彩便派了几个兄弟伙，在万石桥的一家茶铺里面，把王子舟拉到街上，数说了他的“罪状”之后就当众枪毙了。此后，还对当地的公益协进社抬了个上户：五日之内，不准任何人收尸。谁知道第二天，王二嫂竟然在万石桥街上买了具棺木，不仅把王老八的尸首装殓起来；还为他披麻戴孝，又找了她娘家的人，敲锣打披地抬起棺材游丧下葬。刘文彩一听，简直暴跳如雷，立刻把王二嫂喊到公馆里骂得狗血淋头。可是，王二嫂却不服地对刘文彩说道：“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大道理。不过，我想，大哥你三妻五妾都可以，怎么就不让我有个男人呢？……我也是人呀！”

“好个不要脸的骚婆娘……”王二嫂的几句话，简直把个刘文彩气得浑身打抖。王玉清一见，连忙把他扶到房间里烧大烟去了……

---

① 上户：袍哥组织传达事情的公函。

② 公益协进社：川西最大的袍哥组织。



四、霸占屋基地

那年子，土皇帝刘文彩要扩大他的地主庄园，就托起人对他的叔伯侄子刘益山说：情愿拿三十亩油渣子田，换他的五亩水田和一亩多屋基地；屋基头的旧房子呐，可以帮他搬到其他地方新修，也可以拿安仁镇的街房换。刘文彩满以为多出倒拐带打滚的价钱，事情成不了功才是怪事哩！咦？哪个晓得，刘益山一听，比挖了他祖坟园还恼火："啥子？他都晓得我的屋基地好，我就不晓得？哼，歪，我不怕；肥，我不舔！祖宗留下来的，我不换。"

那个派去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羞妥妥地去回刘文彩的话。土皇帝一听，简直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可是，连"棒老二"都要顾倒裤脚毛，刘总办又咋个好下手呢？刘益山这个自家人，就成了羊子的脑壳——难得打整。就在这个时候，大管家薛副官走过来，挨倒他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过了几天，他把刘益山的女婿引来见刘文彩。一见面，土皇帝就笑嘻嘻地对他说："我还少个收租子的管帐先生。听说你能写会算，又是沾亲带故的嘛。你来帮帮忙吧？"刘益山的女婿一听，简直安逸进心了。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在刘文彩的庄园头，当了个拿钱不出力的、不大不小的帐房先生。刘文彩就通过这座桥，多次要他去说服刘益山两把手，谁知道，磨了一年多，他们还是死活不干。土皇帝见这条路走不通，把脸一变，就把刘益山的女婿撵了。

刘益山的这一手，简直把刘文彩气惨了！你刘益山敢这么跟我取翘啊?！刘文彩再都没想到这么棘手……一天，大管家薛副官笑眯眯地来到他跟前，叽叽咕咕地说了好一阵子。最后。土皇帝边点头边叮嘱薛副官，要刘绍武刘乡长千万小心点，不要一泡尿没有厕，就臊死一大坝草。等他一说完，薛副官便点头哈腰地答应着走了。不久的一天早晨，刘益山他老表杨六终走人户来了。刚刚坐下烧水烟，龟儿子刘绍武，就带起几个背梆梆枪的兄弟伙闯进来。横不说，竖不说的，把杨六终拉到大门口，几炮火就把他打了。车转过来，刘绍武还恶鼓拌筋地对刘益山说：

"杨六终是土匪，要等县大老爷来验过，才准许收尸。"

鬼才晓得，杨六终是啥子土匪啊！可是，在那样的年月里，没法！

这天中午，县长来验过以后，硬说刘益山通匪。两张盖得有豆腐方方的封条，架起十字就把大门给封了。临走时，还吓唬刘益山说：等过几天把事情查清楚了，再找他算帐。刘益山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跑到亲戚家藏了起来。他老娘子把心一横，天天跑到安仁镇喊街，说刘文彩串通县长，图财害命，霸占地基。刘文彩怕影响不好，就找刘益山的叔伯妹子陈大脚板儿来打圆场。后来，到底给了刘益山几亩油渣子田和几间新崭崭的街房，才算把事情压了下去。

五、收干儿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邑安仁乡有个姓官的土老肥，在地方上说不起话，受气得很。后头来，不知道谁给点了个水，要他去找个有钱有势的干大，保险没人敢欺负他。他一听，当真就在1947年元月的一天，背上腊肉、鸡蛋和点心，来到了川西土皇帝刘文彩家大门口。守门的见他那副土头土脑的样子，开始连理都不理他，后来听说是来给总办拜年的，才勉强进去通报。刘文彩听说是个乡巴佬，就喊守门的回他不在家。那土老肥真是端起刀头找不到庙门，只好蔫妥妥地回去了。隔了几天，他又背起腊肉等礼物来到了刘总办的公馆门口，结果，还是和头一次一样，回答是“总办不在屋头”。他又只得蔫妥妥地回了家。这时，那个点水的又对他说：“总办不是不在家，肯定是为了躲你。”那土老肥千思万想，后头来，就在一天早晨，藏在刘文彩上街必须经过的一个桥洞里。等他一上街，隔一丈多远就跪在他前面，爬过去拉着他的裤脚哀求：“总办，干大呀，您老人家救我一命吧！我害病差点儿死了。我女人去讨水，菩萨要我拜您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当我的干大，才能保住我的命呀！后头来，我答应菩萨才好了的呀！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您就收下我这个干儿子吧，干大！”他边说边不断地叩头，不断地喊“干大”。刘文彩被纠缠得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他。谁知道，他还是跪在地上不起来。刘文彩一见，连忙说道：“你还有啥子事嘛？起来说嘛！”那土老肥又接着要求道：“菩萨说，干大，您还得给我取个名字呀！”刘文彩笑了笑说：“你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要改啥子名字呐？”那土老肥摇了摇头说：“这是菩萨吩咐的呀，干大！”刘文彩没法，边抓脑壳边想。这时，他随行的手下人中，有人建议给他取



个“保清”。刘文彩满口答应，可说啥子也不要礼品。后来，经不住那个人的纠缠，到底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官保清不光自个儿逢年过节都要去给刘总办送礼，还带着他的几个娃儿去认了干老爷哩！说来也怪，从此以后，人们不光不欺负他了，还舔都舔不赢了呢！



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

记成都人尊敬的郑火神

◎ 唐步祺

清代，川省名医辈出，但能卓然成家，著书立说以传世的，实为少见。直至晚清，成都医林中才出了个郑钦安。他长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善用经方治病。尤其是善用大剂量姜（生姜、干姜）、桂（桂枝、肉桂）、附（生附子、熟附子）等大辛大热药救人于危而名震一时，被人们尊称为“火神”。由于年代久远，一般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医学贡献都不大了解。但我国中医学界，却根据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推崇他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

郑火神原名寿全，字钦安，道光四年（1824 年）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市）固驿镇。祖父郑守重，是乾隆时的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遂退而闭聚一个私馆，教了二十来个大小不等、程度不齐的学生。钦安是一个独子，3 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 16 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省城成都。其父因屡次困于场屋，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兼名医，号称愧轩教主的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曾赞许他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要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东汉名医，著有《伤寒论》）立法立方的要旨。到了 24 岁（1848）时，他就开始在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博览古今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总结经验。中年以后，为将医术传于后代，除诊病外，就课徒著书。同治八年（1869 年）刊行《医理真传》，列举数十余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圆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五年后，即同治十三年（1874 年）又刊行《医法



圆通》，自序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圆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枝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过了20年，即光绪二十年（1889年），又刊行《伤寒恒论》，就张仲景《伤寒论》原文，逐条一一剖析阐明，言简意赅，在前人近百家《伤寒论》注解外，独树一帜。三书刻版印行，皆得其师门刘氏师兄弟的赞助，藏版于刘氏书屋。三书流传颇广，当时即被人尊为医中圣手。

笔者每尝细读其书，服膺其学术造诣，故揣摩其精华之所在，用之于临床治疗，效如桴鼓。近年来，曾专门几次走访他的谪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现仅谈他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就不失为一则饶有意义的医林佳话！

清末同治年间，郑火神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狭窄，很少轿马往来。有一天，一个差官模样的人，从小轿下来，手捧泥金红帖，后面跟着四个大班抬着蓝呢大轿。捧泥金帖的差官，躬身向小院内一老妇人问道："郑老师在家吗？"老妇回说："郑老师已去品仙楼喝茶。"差官转身向大班吆喝："快！到青石桥品仙楼。"一行人转弯抹角，到了品仙楼外停下，语问堂倌："谁是郑老师？"堂倌用手一指，只见临窗一张桌上，围坐五人，其中有一鹤发童颜，两目炯炯有神的老人。差官立即向前，躬身一揖，捧上泥金红帖说："知府朱大人，敬请老师为夫人治病，望不吝赐驾，轿在下面恭候。"

郑火神性情孤傲，平日少与大宦之家往来。今见知府以礼来请，慢条斯理地向门徒说："朱知府他知道有我郑某吗？他既以礼来请，只好去走一趟，等我回来讲书，先不要回去。"众门徒躬身起立说："是。"便送老师下楼，眼看着老师上轿，随差官而去。

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

州、县的知州、县令，纷纷推荐该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在众多的名医中留下6人，长住府衙，以便朝夕磋商用药。

他们有的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补溢；有的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以致吐血。先用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加炒芥、藕节、茅根之类，专主滋阴降火，治之不效。继用四物、八珍、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归脾汤等方，轮流服用。每剂药都用贵重药品——高丽参。一剂药最少要二三十块银元，若是便宜了，夫人一定要闹着说："便宜无好货，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谁知还是愈医愈坏，非但无效，反而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把医生们急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郑火神当时为人治病，坚持用《伤寒方》治疗，疗效很高，受到一般医生的嫉妒。他对时医又多所贬诋。自《医法圆通》刊行，开宗明义第一篇"用药弊端说"中谓："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品药性，悬壶于市，外著几件好衣服，轿马往来，目空一世，并不虚心求理，自谓金针在握，仔细追究，书且点不过两篇，字且书不清几个，试问尚能知得阴阳之至理乎！"故一般医生对郑火神由嫉妒进一步为仇恨，总欲伺机将他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所谓"名医"，虽然说治病不得行，将知府夫人医得来饭不思、茶不饮，看来离阴间日近，距阳世愈远，但开滥条确有本事。几经密议，他们定下金蝉脱壳、移花接木、输赢都要吃糖的妙计，就串同账房舅老爷举荐郑火神来治。

账房舅老爷向朱知府说："姑太太的病，看来确实沉重，但吉人天相，一定可以治愈。城中有个医生，人们称为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此人性情孤傲，必须特别优礼延请才行。"朱知府平日亦曾听说有这样一个火神医生，感到救夫人命要紧，只得放下官架子，做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派差官手捧泥金红帖，用自己坐的蓝呢大轿去接。

当日郑火神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府衙。朱知府穿着家常便服，在内花厅相迎，拱拱手说："有劳郑老师，不恭之处，诸祈见谅。"郑火神忙答："府尊太客气了，命人来唤即可，何必用蓝呢大轿相接！"朱知府说："拙荆久病，医药罔效，舅老爷谈及郑老师人品学问，医术精湛，不胜钦佩之至，故仰仗高明，以释下怀。"彼此客套一番，知府随叫管家到上房关照一声，说有老师来看病。随后同进堂屋，老妈子打起门帘说："请里面



坐。”知府让郑火神西面凳上坐下，简略地谈了一下病情。老妈子拿了一个小枕放在床沿外，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诊脉完毕，知府便将帐子打起，郑火神的双眼炯炯发光地直盯着夫人苍白的面容。那时已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而舌质淡白、苔腻。诊视完毕，郑火神回到书房，喝茶吸烟，闭目沉思，考虑处方用药。

片刻，朱知府见郑钦安久久不说话，心里毛焦火辣的，又不敢问。稍停，郑火神说：“治下医学浅陋，既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惭愧。暂拟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请府尊定夺。”随即于拂宣纸官笺，用狼毫湖笔在端砚内饱蘸着，写下一首七绝，注明以诗代替病历：

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
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
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
人若识得长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

处方：制附片四两　炮干姜四两　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一看，瞠目结舌，乖乖，这几味药，都大火热药，逼血外溢，岂不帮阎王催命。心里七上八下，但碍于情面，口中连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老师，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郑火神笑道：“府尊明察，夫人病到这个地步，非一朝一夕的病候，服此重剂，正是救人于危啊！”

原来知府是浙江人，温病学派在江浙兴起，影响及于全国，病家皆喜服清凉滋阴药味，而恶辛温扶阳之品。故银翘、桑菊、六味盛行，而四逆、姜桂、白通则多摒弃而不用。即使虚弱用补，亦宗朱丹溪、张景岳辈。今见处方，焉有不惊之理！随后他走入内书房，与成都府属州县荐来的“名医”商议，请他们出主意是否可用。殊不知这正中他们经过密商，嫁祸于人的脱身之计。他们都说：“府尊垂鉴，此方有过人之处，非某等愚鲁所能及，请大人将郑某留在府衙，召其高徒来陪，观看夫人服药后的效果。”

朱知府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随命舅老爷亲去拣药，连忙吩咐厨房备办酒席，对郑火神说：“恕我不恭，不能相陪。衙中又无知医药的人，可否请令高徒来衙侍候。”

“好，快召徒儿们来共话，正好减我寂寞。”郑火神心中明知府中聚有几位“名医”，现在将自己留下消夜，又召唤徒儿，不过是要看服药后的效果，把我扣在这里当人质罢了。不多一时，几个门徒一齐来到。酒席摆

在花厅上，由舅老爷相陪，朱知府亦出来向郑火神敬了一杯酒。郑火神谈笑风生，频频饮酒，若无事然；徒弟们则个个焦躁不安，真是食不知味。舅老爷陪坐一阵，对郑火神说："我还要进内照料，恕不能久陪，请令高徒陪尊师作通宵畅饮，已派四个家人在此侍候。"

"这着棋真险啊！"一个门徒很有感触地说。

"不止险啊！还狠毒无比，明明是州里县里几个'名医'，给知府夫人治病下不了台，平日嫉妒老师，想借刀杀人，一棒把老师打死，拔去眼中钉。"另一个门徒接着说。

又一满脸愁容的门徒说："我们都当了人质，不知这出戏如何收场啊！"

郑火神很沉着地向众门徒说："贤契们！不要惊慌，既来之，则安之。朱知府敬重我，礼请为其夫人治病，实为官场所少有。我既敢写出止血诗，选用四逆重剂，实欲一服而止血，救人于危。收场吗？他明天早晨仍要用蓝呢大轿送我回弯弯栅子。下午，仍在品仙楼讲书。贤契们放心，且陪为师饮酒吧！"

另一间书室里，几个穿丝着绸的"名医"悄悄地说："夫人把郑火神这一剂药服下去，犹如火上浇油，真是名符其实的送终汤，应把'郑火神'改呼为'郑瘟神'了！"

他们以庆幸的心情期待着内房的哭声。

"上灯前服药，怎么二更天还没有动静？"

"三更了！四更了！怎么仍旧静静的？"

"真的？郑某有火神保佑吗？"

"管他医死医活，我们不是都脱了干系吗？如医不好，则医死知府夫人的，正是火神的一剂催命汤，我们就保住了名医的地位。"

"州里、县里哪个不知我们被朱知府请来为夫人治病呢？回去身价又高了！"

服药前，舅老爷来到上房外，悄悄对知府说："今晚是最紧要关头，先将高丽参煎汤，以防万一，晚上多派人侍候。"少爷、小姐围坐床前，丫环、仆妇远远地站立着，朱知府躺在太师椅上，直盯着床上的夫人。

药进口了，众人心情都格外紧张，焦急地望着床上。

屋内清静得听不见一点声息，檀香送出一阵阵清幽香气，一根香燃



过了。

“妈！好点了吗？”女儿细声地问。

“嗯，好点了！”

“不热吗？”

“不热，反而凉爽！”

“胸口不闷吗？”

“不闷，较舒畅！”

三更时候，服第二次药。

“妈！更好点吗？”女儿又问。

“嗯，好得多了！想吃点东西。”

丫环忙将熬好的红糖稀饭捧上。

女儿慢慢地喂了一小瓷碗。

大亮了！丫环将夫人扶起来，又由小姐缓慢地喂了两小瓷碗稀饭。

大少爷溜出房外，走向账房：“舅舅！妈病好点了，还吃了稀饭。”

舅老爷匆忙来到上房问候夫人，立即转身到外书房，躬身一揖说：“郑老师真是华佗、扁鹊再世，妙手回春，夫人已转危为安。”随即呼唤跟班打洗脸水，送茶、敬烟、摆点心，忙得不亦乐乎。朱知府梳洗毕，亦出来向郑火神拱拱手说：“郑老师，高明，高明！改日再谢。”随即呼备桥，送郑老师及其高徒回府。

当天下午，师徒们仍在品仙楼聚会讲书。郑火神即以此病作例来讲解说：“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仍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症候。血症亦不出阴阳二字，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阳虚叶血，即当升者不升，不当升者而反升，由于阳气衰弱，不能统血，阴气太旺，势必上僭，渐干清道，以致外越。古人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这是教人补火培土以治水，四逆汤力能补火，实为对症之方药，故用之无疑。”

门徒问：“为何开头即用此重剂，岂不惊世骇俗？”

“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病者已奄奄一息，真阳欲

脱，若不用重剂加逆以回阳祛阴，就不可救了。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

又问：“四逆汤原方用干姜，今改为炮干姜何故？”

“患者系吐血病，用炮干姜（黑色）以温经，血红见黑则止，合甘草又能苦甘化阴，此乃活法圆通之妙用。”

师徒问答，直至傍晚方散。

过了不久，弯弯栅子小院门口，忽然唢呐锣鼓声，噼噼叭叭的火炮声响了起来，围观热闹的人挤满了一街。只见账房舅老爷从小轿内下来，手捧泥红帖，身后八个亲兵，抬着一道黑漆大匾，一朵绸扎大红绣球花衬出金光闪闪四个大字：“医宗仲景”。四个管家抬着两抬礼品，一抬是茅台、海参等美酒珍馐，一抬是狐皮、绸缎等名贵衣料。帐房舅老爷举起泥金帖子说：“郑老师治好知府夫人重病，府台大人命我送来薄礼致谢，敬请收纳。”

一时城里城外的人们，争相传说知府大人给郑火神送匾，火神真是名不虚传啊！

郑火神一生注重医德，从无沽名钓誉之心。为贫苦人民治病，多不取钱，自奉亦很俭约，终身未买田地房屋，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因他的医术高超，辨证明，用药精，善用经方，尤其是用大剂量辛热药姜，桂、附救人于危，人们尊称他为“郑火神”。他于辛亥革命（1911年）前夕病殁，享年80岁（传说他活一百多岁是不确实的），由众门徒集资购一穴之地，葬在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墓前立一石碑：“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他的三部医学巨著长留人间。其中《医法圆通》一书，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院长服膺其学，曾为其排印出版，流传更广。他的门徒，除著名的卢铸之火神外，现成都附近地区，亦有不少中医，或为其再传弟子，研究其著述，从中继承郑氏医学。

我们从其三部著述来看，非但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至于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大黄、黄连、石膏。世人尊称其为郑火神，未免以偏概全，实应从其整个医学理论体系来对其评价，方称允当。现在中医学界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尊其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这不仅是成都中医的光荣，也是四川以至全国中医界的光荣。他的三部巨著，是值得我们继承、研究、阐扬的。



成都的花状元

◎思 甫 柳 涛

花木盆景及桩头，在成都颇具盛名，其技艺具有四川特点，形成我国盆景桩头三大流派之一的川派（又名剑南派）。

桩头，不是一般的树桩，而是经过选择的各种树木，经花匠整理，去其干或枝，再加以精心蟠扎后，整个枝干呈现古朴幽雅、神韵盈溢，既符合树木生长规律，而又显得有气有力。其姿态秀丽者，娉婷婀娜；文质淡朴者，潇洒飘逸；粗壮挺拔者，气势雄伟。既可竖之携星伴月，拂云擎日；又可曲之如虎踞龙盘，仰卧如蟠龙戏水，使人神怡旷然，意趣无穷。令你为此般巧夺天工之势惊奇，为咫尺天涯的园林奇葩而赞叹。难怪陈毅副总理赞盆景桩头是“高等艺术”，人们也称之为立体的诗、无声的画。

这“从山数百里，尽收小盆中”的桩头盆景起源于何年，有两个传说。一个传说是三国时蜀后主刘禅在位时（公元 224 年—252 年），每逢节日，令王公府第和绅士家院都用木板制成长方形条盆，上涂釉漆，盆内种花叠石，似山川峡谷或奇花异草，以示吉庆。第二个传说是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知祥（公元 934 年）的随员梅翁及其子梅雨村弃官不做，隐居在成都西郊梅家坝（现成都市营门口乡前进花木队盆景园东）时，见长方形木盆内叠石种花不尽心意，便将梅花、紫薇、罗汉松等花木置于盆内，去其枝或干，用棕丝捆绑成各自然形态成其为桩头。自此一直流传下来，绵延不绝，已有千多年了。

两种传说无证可考，却反映了成都盆景之起源悠久。刘禅时期的长方形木盆内种花叠石盆景为早盆之始，而梅翁父子的桩头成为川派桩头之始。由于梅翁父子隐居在成都西郊，并在这里发展桩头，形成花匠及艺花者在当今西郊居住而居多的原因。据了解，现营门口前进花木场，自曾祖时代（清同治、光绪年间，即 1862 年—1908 年）至今务花木的就有好

儿家。

以成都地区桩头盆景为核心而形成的川派园林技艺与广州的广派、上海的海派不同。山石盆景这三派差异在于取石材形异而不同。但桩头盆景以川派的棕丝捆缠难度大，技巧功夫深而超过广派和海派。其中川派桩头的古装式蟠扎更具特色，令海、广两派艺花者赞叹。其特点是据各树种不同而定其身法（姿态）。由于身法在蟠扎时难度较大，造型技艺深，不少花匠视为尖端。但这尖端却难不倒有心人。

清朝同治、光绪时期，成都先后出现了蟠扎桩头的花状元，其中西郊的云天合、窦禹鹏、于玉成、张彬如、陈玉山等名噪一时。他们制作的桩头不仅造型各异，且姿态古雅幽美，主干雄伟，状若武士乘骑而挥手回顾，素有“立马望荆州”之说。云天合制作的桩头曾摆满光绪末年（约1906年—1908年）成都的18个衙门内，被花匠及艺花者公认为当时的花状元。

头蟠扎共有好几个身法，云天合、窦禹鹏全部运用娴熟。可惜的是，窦禹鹏空有一身绝技而生活无着落，窦的儿孙被迫弃花经商，与人合伙开办文华食品厂去了。而当时的西郊花农陈玉山虽然已三代蟠扎桩头，但与窦的蟠扎技艺相比，尚有一定距离，未到精湛之处。陈玉山遂虚心向穷愁潦倒中的窦禹鹏请教。陈的虚心、尊师，博得窦的倾心教导。由于陈玉山悉心领教，潜心钻研，乃继承了川派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用掉拐身法蟠主干，用平枝式枝型蟠枝盘，有动有静和富于变化；他还用大滚枝式的枝型蟠扎桂花、杜鹃、茶花，枝头排列均匀，叶表一致，无凸出凹入现象而盛名卓著。陈的这几手技艺博得艺花者赞叹，被花匠及艺花者公认为继云、窦之后的花状元。继而又被成都及成都附近的温江、郫县、灌县、崇庆、新都、什邡花匠和艺花者公推为成都花木行会会董。该会订于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和七月十八日在西郊花神庙祭祀花神（传说为王母娘娘，因她住的瑶池宫内有蟠桃园，有各种异花奇草），或庆祝，或聚餐交流经验，传授技艺。聚会时，川西各县，远至乐山等地花匠及艺花者都来会，颇具盛况。聚会的一切仪式、收支均由陈玉山全权调派、处理。可是，在旧中国，特别是封建地主、军阀称霸的日子里，纵有天大本事，人民也得不到安居乐业。

陈玉山由于生活所逼，于1929年到重庆帮人，在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家



当花工，至1942年才返回成都。他继续钻研，在蟠扎川派正宗桩头方面发挥其特长，开创自然界的景色、自然类形式的桩头。1952年，陈玉山老师蟠扎的六月雪桩头，状若一对待飞的金丝雀，纤细、文弱，栩栩如生地立在游客面前，受到赞叹。

陈玉山病逝后，其子居住的西郊营门口公社前进大队十队（今金牛区花木公司前进种植场）继承了陈的手法，蟠扎的罗汉松、紫薇、六月雪、贴梗海棠、垂丝海棠等各树种桩头，就是因材而施，据其特征、形态而蟠扎成各式姿态、形状，从而使陈玉山的精湛技艺流传至今，为社会主义，为装点千里江山而发出了绚丽光彩，在国内外赢得声誉。素有花城、花市之称的广州、上海两地，从1972年起，年年向前进花木场订购一车皮桩头，转上海口岸及广交会出售。在换取外汇，装点异国他乡的幽葩奇萼中，凝聚了陈玉山子女的心血。



医林名医奇闻

◎ 李兴玉搜集整理

一、叶金针

叶金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成都就已出名。他叫什么名字，人们大多不知道，只知他凭金针医术医好了许多病人。其姓叶，故名叶金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用金针给美国总统治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由成都调到北京，专门给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上世纪 50 年代，他曾到国外为也门王太子治病。叶金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医术呢?

叶金针原是大邑县韩场人，从小家里很贫穷，书也读得不多。十多岁时，他出外去做生意，结果把本钱都蚀光了，只得沿途乞讨回家。有一天，他走山路，肚子实在很饿，见前面有座寺庙，便鼓起劲想去化一顿斋饭来吃。走拢一看，却原来是一座破庙，心想：化斋饭虽然化不到，进去喝点水休息一下也可。进庙去找膳食堂时，只听一禅房内有呻吟之声。叶金针听后，心想：只要有人在，化一顿斋饭就不会成问题。连忙走进禅房一看，有一老僧病卧在床。老僧听有人进房，忙说："施主行行好事，帮我去煮点稀饭来吃。"并指出房内放米及煮饭的地方。叶金针按老僧所说，煮出稀饭先喂了老僧，自己才吃。老僧见他老实，便留在庙中住下。叶金针心肠也好，抱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想法，便在庙中精心经佑老僧，老僧也拿出钱，由自己开药方，叫叶金针上街去拣药。不上一月，老僧的病便好了。老僧见叶诚实，脑筋又灵活，便传给他一些医术。过了一年，由于老僧年老，又患了病，叶金针照样精心护理师父。一天，老僧向叶说："此次我的病难以医治，平时我传了一些医术给你，但只是一般的。我考察你对我实无二心，特把我的金针医术传给你，望你好好学会，普救



众生；同时你有了医术，生活也就有了依靠。”叶金针听后哭道：“师父不能离我而去，我一定好好经佑师父，一定好好学习医术。”老僧把金针医术传给了他后，便圆寂西逝。叶金针安葬师父后便回到韩场家里。虽然他学到了医术，但还不敢正式行医，平时，只是义务给附近群众医病，结果医好了许多病人。因此，找他医病的人越来越多。在亲友的帮助支持下，他便在韩场挂牌名“叶金针”，正式对外医病。名声随即也就大起来。

当时，成都有个师长患了吐血病，在成都大医院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听说大邑韩场叶金针医术高明，抱着试一试的思想，特派车子把叶接到成都来给他治病，结果连药都没吃，只是扎一下针就把血止住了。观察了7天，师长的病就痊愈了。师长很高兴，送了钱给叶，叶不受，师长只得派人依然用车把叶送回韩场。但不到10天，那师长的病又复发了，只得又请叶来，扎针后就又痊愈了。如此反复几次。当时交通不便，来回费耽误许多时间，特别是新津一渡水更难渡过。于是师长干脆找叶谈，要他长住在公馆内为他治病。叶说：“我师父传我针技，主要用于拯救众生，我今独为师长治病。又耽误不到多少时辰，平白闲着无所事，怎对得起死去的师父呢？”师长觉得有理，便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师长出资帮他在成都找房挂牌行医，但必须随时为他治病。就这样，叶金针在成都正式挂牌行医。从此，他在成都便出了名，后被省医院聘去当医师，因而名声大振。

二、治癌名医高思远

高思远是新津永兴镇人，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永兴乡诊所行医，医好、医松许多癌症病人，外地区的人找他医病的很多。现择其一病例摆摆龙门阵。

1970年“文革”时期的一天，被揪出的“反动军官”医生高思远，左臂上佩戴白袖章（“文革”时的创造发明，凡是被揪出的九类人都要佩戴这一标志，以便接受群众的监督）正在扫地。忽然门前停下一辆小轿车，接着从车中下来两人，一人像是当官的，一人像是秘书模样，手提一个公文包。他们走进了医院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拿出介绍信递给乡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组长把介绍信看了看说：“我们医院只有一个姓高的医生，

自他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后，一直未看病，在扫地劳动改造。贵医院是否搞错了人和地点?”来人是省医院革委会的，只见秘书样的人把公文包打开，看了资料说：“没错。邛崃某中学教师来我院治病，经检查是食道癌晚期病症，治疗无效后，我院动员他回家备办后事。哪晓得他回家三个月后来我院复查，癌症居然痊愈了，他说是在你们这儿找高医生医好的。我们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来取经，了解医疗过程。”乡医院领导人一听，抱着不相信的态度，便大声把高思远叫进来问道：“你是否医过邛崃县某中学教师的癌症?”高思远见医院领导突然提问，且态度严厉，因被揪出的人私自给人看病要遭批斗，便矢口否认说：“我自从被揪出后，天天都按时上班打扫卫生，这是革命群众都监督看到的，哪还有时间给人看病呢？是不是把人搞错了。”乡医院领导一听，便对来人说：“该是嘛！我说的没错。”秘书样的来人肯定地说：“没错，这是病人亲自说的，这儿还有笔录。”这时，大家沉默了两分钟，还是那官样的来人会做思想工作，只见他语气温和地说：“没关系，承认了又不犯罪。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本是我们革命医生的应尽职责。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站到人民一边，党和人民是会给你出路的。”来人一番话，把高思远的顾虑打消了，他便老老实实交待了自己在家里悄悄地给人治病的过程。来人一听，高兴地对乡医院领导说：“好！好！你把这医生暂时借给我院使用好吗?”乡医院领导指着高思远左臂上的白袖套说：“他头上还戴有帽子，恐怕不合适吧……”领导模样的来人笑道：“只要你们答应，帽子问题由我院解决，并且还要增加他的工资。”乡医院领导听后，权衡一下利弊，想道，如果高思远走了，乡医院的病员就会减少，收人也会减少。他立即转变态度婉言答道：“放人的事，我院不敢做主，要先请示一下公社革委会和县医院革委会再说。”省医院来人也无可奈何，只得向高思远说：“你抽空把医治好邛崃某中学教师食道癌的处方整理一下，以后来取。”说罢，出门上车走了。这高思远是怎样医好那位病人的呢？话得从头说起。

那是1969年冬的一天，高思远被揪出正在街上扫地，只见有一滑竿抬一病人走来，滑竿后跟着一位约30岁左右的妇女。她眼红红地找到高思远说：“高医生，请你帮忙看一下病嘛!”高思远说：“对不起，我现在是四类分子，医院规定不准我看病，请另找高明吧!”那妇女恳求道：“高医



生，我们是从邛崃远道慕名而来求医的，无论如何，请做做好事医治吧！”说着便跪下了。高思远的心一下软了起来，悄悄地说：“你们抬到我家里去等着，我扫完地即回来看。”那妇人叫人把滑竿抬到高家，高思远扫完地后即回家洗手看了病人，诊了脉，询问了病情后摆摆头说：“这病已深沉了，病已到晚期，我也没把握治好，最好抬回去吧。”那妇女一听，知道高医生医术不凡，与省医院诊断一样，顿时，眼圈里流下几滴泪水，便实言告诉：“实不相瞒，我丈夫患的是晚期食道癌，在省医院住了半年院医治无效，医生通知我们回家备办后事。我们听说高医生医术高明，特抬来请求‘死马当成活马医’，请试手给他一服药吃。即使医拐了，我们绝不怪你老师，如不信，我代表家属可以具结担保。”高思远沉思一会儿说：“好！我试手开一服药给他服，如果吃后松了再来看。”病家高兴地捡药回家。服药后，原来病人一点不能进食，现在食道感觉舒服了，可以吃点葡萄糖类的水了。第二天，病人又被抬来高思远家看病，高思远见病有松，诊过脉开出药单说：“你们有没有人在中药材公司工作？”病家妇女想道：“我有一表兄在县药材公司任会计，不管什么药，可以想法买到。”高思远高兴道：“那好，我这药单可以捡来吃一周。病人吃后要发生呕吐、食道疼痛，请不要怕，药服完就可望更松。”病家根据医嘱拣好了药，病人吃了三天后，果然出现呕吐，吐的像浓血一样，病人就觉得舒服多了，想吃清汤稀饭了。一周后，他便想吃干稀饭了，再到永兴场找高思远医治，他们高兴地说：“感谢高医生救了病人的命，现能吃稀饭了，精神也好多了。”高思远又开了一个月的药给病人吃。病人继续吃药，不久，便能吃干饭了，精神也好起来了。药吃完后，妻子请人再抬去医，病人笑道：“不必请人了，我骑自行车自己去找高医生开药。”病人果真骑上自行车去，高思远开了药，叫碾成药末成丸吃一月。病人吃了一月后，感觉病已痊愈了，便上成都省医院复查，证实食道癌医好了。省医院的医生把原病历一看，惊奇地问：“你是怎样起死回生的？”病人便把到新津永兴场求医的经过谈出，以致引起省医院专程派人到永兴乡医院证实求医方。

花蕊夫人之谜

◎王　英

在我国五代十国时期，有三位被称作花蕊夫人的女性，她们不仅姿容美丽，而且能诗擅赋，多才多艺。历史上有关她们的逸事传闻很多，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谜一般的猜测。随着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才一个又一个被解开。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前蜀花蕊夫人。前蜀花蕊夫人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小徐妃，成都人，其父徐耕曾任晚唐时的眉州刺史。她还有一位姐姐，两姊妹皆为国色天香，并且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王建立国之后，徐氏姐妹皆被纳入后宫，称为大、小徐妃。

小徐妃花蕊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还颇富才情，其所著百首《宫词》享誉文坛千年。但自宋以来，百首《宫词》一直被认为是后蜀孟昶慧妃（亦号花蕊夫人）所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蒲江清先生通过大量的事例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才考证出花蕊夫人《宫词》作者当为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之小徐妃，从而使前人之谬、千古之惑于此而解。

宫词乃是我国古代文学一种独特的文体，它以七言四句的形式，专门表现宫廷禁苑中宫女的生活。这种文体创自中唐时期的著名乐府诗人王建，以后历代多有效仿者。《花蕊夫人宫词》是众多宫词中很有影响的一种，同时也是第一部出自女性之手的《宫词》鸿篇。后晋和凝，宋代朱白、张公庠、周彦质、王珪、王仲修、宋徽宗、杨皇后、胡伟等的宫词，动辄数十首或百首，多则数百首，连篇累牍，都深受花蕊夫人《宫词》的影响。

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以白描手法，真实地记述了蜀宫的生活场景，塑造了宫女的人物群像。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形象生动、清新自然和精丽纤巧。兹录二首以见一斑。



其一：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
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

其二：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
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辔把鞍桥。

从上诗可见，其写景状物如图似画，令人恍若身临其境；刻绘人物细腻传神，似可呼之欲出。总体来讲，《花蕊夫人宫词》在艺术上颇富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为宋以后历代帝王、后妃及王公贵族创作《宫词》所仿效。然而诗人王建《宫词》中所流露出的对宫中人物的人道主义同情，到了花蕊夫人《宫词》中已完全变为对后宫制度的歌颂与赞美了。因此，即使花蕊夫人《宫词》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具有较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也不能挽救它在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缺陷，其思想性的浅薄和内容的单调贫乏，又无疑是时代和个人身份的局限性使然。

后蜀花蕊夫人是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亦姓徐，与前蜀花蕊夫人属同一徐氏。宋灭后蜀，孟昶举族降宋，花蕊夫人与孟昶同行入宋首都汴京（今开封），最后客死他乡。

有关后蜀花蕊夫人的轶事传闻非常多，影响最大的有“蜀道题诗”“奉诏作诗”及“悬像祀昶”三则。“蜀道题诗”说的是花蕊夫人于国亡后，北上入宋途经葭萌驿时，感念故国灭亡，心中哀伤，作《采桑子》词上阕：“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度日如年，马上声声闻杜鹃。”书未毕，为军骑所催未成。后人续之云：“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实际上，花蕊夫人入宋路线是由眉州乘船经三峡到达汴京，并未北上经葭萌驿道，此词纯属后人虚造。

“奉诏作诗”说的是后蜀花蕊夫人入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悦其才色，让她入备后宫，并令其赋诗。花蕊夫人口诵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这首诗的原型当属后唐兴圣太子李继岌的随军王承旨（失名）的一首诗。李继岌奉后唐庄宗之命，率师伐蜀，前蜀灭亡。其一姓王的随军承旨作了一首咏怀前蜀后主王衍亡国之事的诗，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

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之诗与这首诗相比较，只略微改动了几个字词，因此它或系翻袭前人之作，或系后人虚造。

“悬像祀昶”是说花蕊夫人国亡入宋后，虽身不由己被宋太祖赵匡胤纳入后宫，但仍心不忘蜀，眷恋故国旧主，于寝室中悬挂孟昶画像朝夕祀之。如明人刘元卿《贤奕编》卷四载：“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小徐奉昶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盖不忘昶，以报之也。”还有一说认为，花蕊夫人将孟昶像诡称为蜀中宜子之神张仙。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属无稽之谈，因为从各种史料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孟昶国亡入宋后，宋太祖赵匡胤亲自接见孟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记载：乾德三年五月，宋太祖赵匡胤“宴昶等于大明殿，赐物有差……壬辰，复宴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既然宋太祖曾亲自接见过孟昶，岂能不识花蕊夫人所祀之像为孟昶，而号令天下人供奉？故清人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张仙》条中也疑云：“昶之人汴，宋祖亲见之，花蕊夫人果携其像，宋祖岂能不识别，而敢以诡词对。”综合有关花蕊夫人“蜀道题词”、“奉诏作诗”等轶闻，所谓花蕊夫人“悬像祀昶”亦属后人虚构，其目的无非是塑造一位才貌双全的烈女形象罢了。因为自古视“女人为祸水”，而花蕊夫人作为一名才貌双全、宠冠六宫的帝妃，却能在国亡之后，眷怀故园，尽节于蜀，岂不是“椒房奇宠，极芬华于生前；没贞遗烈，更流播于身后”的典型吗？

此外，还有一名花蕊夫人。据《十国春秋》记载：“又有南唐宫人，雅能诗，归宋后，目为小花蕊，其诗名皆从同。”此乃南唐之小花蕊。但其得名小花蕊，则在降宋之后，自当晚于前面所述两位花蕊夫人。



坐久香风入画栏

了觉禅师暨昭觉寺开山祖师

◎ 郑建邦

在我的书房里，挂了一幅单条，是了觉禅师的诗偈。我只要在书桌前坐下，抬起头来就看见它。只要看见它，就想起他这首诗偈怎样引起他成为昭觉寺开山祖师的情景。

了觉禅师，俗姓韩，法名休梦，是京兆万年人。在当时禅风席卷天下的时代，少年出家的休梦，去参拜极负盛名的庆诸禅师学禅。学了数年，又去向誉满全国的白丈怀海禅师参学。年轻有为的休梦，最终向神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学习。一学便是十多年，最终学得曹洞宗的精髓，并得到了良价禅师的承传。真是：走遍百城烟水，为了学道参禅。

曹洞宗的密门精髓究竟是什么？良价继承了石头禅的理论，有所发挥地认为：一切事物（事），分别显现世界的本质（“真”“理”，即佛性），理与事可以互相渗透，叫做“相应互涉”。从理事、体用关系上，既看到“事”的差别，又要看到由“理”统一下的“事”无差别。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高的觉悟。

休梦禅师在继承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休梦禅师在京兆长安弘扬曹洞宗的禅法，得到了长安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的拥戴。官员中崔安潜更是对休梦崇敬至极。这日，崔安潜特来向休梦禅师告别，因为他就要去四川任剑南节度使，并要禅师赠他几句禅悟的体会。禅师指着壁上挂的单条说：“贫僧无长物，取了去吧。”崔安潜一看单条所书：

入门松柏挺枝干，久坐香风入画栏。
秋色已浓枫树静，原来山外别有山。
——休梦　乾符元年春

崔安潜喜出望外，作礼而去。

入冬，休梦禅师忽然想起要去四川静修，便带了一个沙弥，翻山越岭，直闯剑门，入川参学。师徒二人持钵负经，徒步而行，但见一抹江山，万般娇美，巴蜀胜景，名不虚传。每至寺庙，他们都以普通挂单僧人的身份出现，讨单住下，虚心学习，认真听讲，听候差使，礼敬甚恭。所学曹洞精髓从不表露，在长安弘法之事更不提及。

路过汉州去开善寺挂单，二日客斋已满。知客对休梦说："三日客住已满，禅师愿往，还是愿住？"休梦说："贫僧欲求宝刹所属的小庙暂住一时，不知允否？"知客征得方丈同意后，对休梦说："禅师有缘，有缘！离此五里之遥的护国寺，晋代所建，近年颓废，已无产业，仅林园中有二亩土地可种。原一老僧守护，耕种而食，今老僧圆寂。禅师愿去否？""愿去，愿去！"。当下休梦满心欢喜，请知客转致方丈："贫僧深谢方丈，无以谢答，仅有手书小偈一幅，聊赠补壁，权作敬谢！"知客接过单条，送入方丈，方丈看过，书法遒劲，行笔流畅。便挂于壁上。

休梦师徒二人，农禅并举。参禅之余，开荒种地，居寺三年，从未与外人交往。

唐僖宗乾符四年，剑南节度使崔安潜到汉州开善寺小坐，见壁上诗偈，问所何来，方丈一一回答节度使。节度使又问："此僧何貌？"知客又如实相告。节度使大喜："此真休梦禅师，乃下官之师，速去护国寺相见。"

师徒相见，甚是欢心。节度使见残壁上贴一纸：

遍寻佛迹和禅关，古殿清虚柏影间。
客爱登临来此景，僧谈兴废指断垣。
忽闻溪流广长舌，坐对青灯世虑闲。
它日功成重回首，翠竹黄花异尘环。

——休梦　乾符四年

节度使读罢诗偈，转身问道："啊，师父，你不就写的眼前此情此景么？"休梦谦逊道："哪里，贫僧不能舍去余习，偶然提笔涂抹罢了。"师徒又谈了一阵禅宗大意，顺便谈到弘扬禅宗的事体时，节度使便道："成都北门外，有贞观年代所建之建元寺，庄严宏伟，吾师可卓锡（住持）该寺，一来弟子可常去闻法，二来曹洞宗的禅意可在四川得到弘扬了。"休



梦禅师一再推卸："贫僧意在克期参证，故来此潜修。"禅师经不住节度使"弘法利生"的劝说，最后道："这也是大事因缘啊，去吧！只是那'建元寺'乃纪念高宗、太宗立国建元之意，与弘扬禅法无多大关系，既欲要贫僧去昭扬启发每个人心中皆具有的觉性，我看'建元寺'可改为昭觉寺好么？"

"好，太好了！"崔安潜不断点头。

做节度使的崔安潜立即申奏朝廷，僖宗敕封下来将建元寺改为昭觉寺，休梦禅师任昭觉寺第一任方丈。这是僖宗乾符四年的事，也是昭觉寺名的由来。至今巴蜀僧人还把休梦禅师尊为昭觉寺开山祖师崇仰。

休梦禅师在昭觉寺大开甘露法筵，成为蜀宗弘扬曹洞宗的第一人。省内外，闻风而去昭觉寺学习禅法的常有几百人，昭觉寺于是名闻全国。

不久，中原动荡，黄巢起义，僖宗入川避乱，多次请休梦入行宫为他说法。

僖宗问禅师："禅的追求是什么？"

"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私欲，没有攀缘，离开一切矛盾、执着，呈现一切相对的调和，统一的心灵状态。这便是陛下应追求的禅。"

僖宗又问："什么是般（读波）若？"

"般若是智慧，是一种体悟万物皆空的智慧。这'空'不是消极悲观的虚无，而是没有执着、没有牵挂、坦荡磊落、广大自在的心境。"

"禅师，国难当头，朕心烦恼不堪。"

"一切烦恼都是主观的，因此也是空幻不实用的，用'般若'观察这种空幻，即可开悟解脱。"

起义失败，僖宗返回长安，心境好似解脱了许多，对休梦的说法非常赞赏。他派人从长安赐佛牙、紫磨袈裟、红地毯、宝物给休梦，并赠给他"了觉禅师"的尊号。

王建在成都称帝，谥他的塔墓为"真隐之塔"。

我望着休梦禅师的诗偈，又想到在他的启迪下，昭觉寺高僧辈出，悟大国师、丈雪和尚、清定大师……一一涌现在我的眼前。

成都旧闻



成都的袍哥组织

◎杜　宇

一

1634年，清朝取代了明朝政权以后，对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引起了民间“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这些起义打出“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旗号，各省各地的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会”。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逐渐流入四川，四川便通称为“袍哥”。

对“袍哥”这个名称，说法不一。读书人说，它根据《诗经》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这是读书人好拉远古，不足为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的：关二爷被逼投降曹操后，曹操奖予很多金银财帛，他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它，有事穿上，却要把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他原因。关二爷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源远流长地传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文学志士顾炎武、王船山、曾耀祖等人，暗中联合志同道合的汉族人，搞民间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这种民间组织，一直深入社会下层，蕴藏着潜在力量。

看来袍哥组织起泊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是比较可靠的。

二

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





是一一“同志军”。这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推翻清朝政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曾载文，叙述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和会党联系日益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招纳熊克武、但懋辛、余英、张石祥等人而授机宜，熊等也认为四川袍哥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宽，同盟会领导各地袍哥势力，搞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孙中山和余英接洽以后，逐渐器重，遂委他为“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等一同回川共策进行。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率效尤，借此保家。这样一来，到1911年时，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了①”。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风潮，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楠园、侯围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州的孙泽沛，灌县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万余众。起义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成都光复后，由于都督蒲殿俊缺乏创业执政本领，被赵尔丰乘机制造“兵变”，希图复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尹好大喜功，掌握政权以后，由于缺乏政治认识和领导才能，错误地认为袍哥力量弥漫全社会，抓着袍哥力量就可以稳定政权，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

三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据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上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连几天内，他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

① 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叫倥子。

行。周骏就任军政府军政部长后，在军政部门口也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这时全城公口林立，并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的人物。这些都是照戏台上的演员打扮的。各地袍哥组织，也纷纷响应成都。就在这段时间，滇、黔、湘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四

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其形式与全省其他县市相类似，是横行组织，即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联络的聚点，最初叫“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宫”）。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仁字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有几句概括特征的口头语为：“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口头语：“仁字旗上庶绅商，义字旗贾卖客商，礼字旗耍刀耍枪”。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不过其组织办法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如旧社会被认为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擦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物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他们自圆其说是“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那些是浑水袍哥干的”）。

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份子分为 10 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又叫“舵把子”，如行船掌舵之人）。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人爷”，另外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为人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誓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是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圣贤”与“剩闲”谐音）。二排中有一位“当家



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一个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范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大爷、二爷的儿子，又称“凤尾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公”和“社”，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

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其中有一段故事。康熙年间，郑成功派部将陈近南在四川雅州开山立堂时，有四排方良宽背盟叛约，暗向建昌镇告密。镇台马赉庾率兵围捕，陈近南改装逃走。后来又有胡四、李七背弃盟约，密告官府，出卖弟兄，被本山头派人暗中诛杀。他们这种叛卖行为，一直为袍哥所不容，从此便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五

哥老会虽是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但是由于封建意识恶性膨胀，一部分人的逐渐变质，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袍哥，即所谓“清水”和“浑水”袍哥。

在清水袍哥中，又要分“金带皮”和“下九流”。金带皮的含义是：金代表有钱，皮是面子，即有面子的有钱人，叫金带皮袍哥。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权势，能够“一步登天当大爷”。至于那些测字、算命、跑堂、道士、兵卒等被人视为足下贱行业的人，只能被列在“智”、“信”两堂。浑水袍哥的组织和清水袍哥一样，只是称谓上有些不同。清水袍哥的头头称“舵把子”或“社长”，浑水袍哥习惯叫头头为“老摇”（摇舵的），比老摇

低一级的叫“边棚老板”、“管事”。一般称浑水袍哥为“跳滩匠”。

六

袍哥每年有几次会期，最郑重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相传是三国时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张灯结彩，大排香案，欢宴会众，广纳宾朋。初次参加袍哥的人，必须具备“身家清、己事明”两个条件，才由引进拜兄引入会场，参见恩拜四兄（恩兄、承兄、保举、引进），接受“栽培”，确定“排行”，然后才可以称兄道弟，成为正式的袍哥。原先的袍哥，也要在这次会上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其他的集会有：正月要办“春台酒”，腊月要办“团年会”，以及不定期的“迎宾会”。在会期中，除了互相拜望、大吃大喝、大赌大抽（鸦片）之外，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

在成都，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些茶馆就是码头开设的），有的茶馆门前正式挂出××公或××社的招牌。茶馆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坐堂负责。

袍哥还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长上罪、殴打亲属罪、调戏妇女罪等等，犯了以后要受到“剥刀”、“碰钉”、“二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挂黑牌”“连根拔”和“降级”等等惩处。在袍哥的经典《海底》中还规定有“十条”“十款”“十要”“十禁”“五伦”“八德”“九章”，文字通俗，真伪莫辨。实际上，所有这些规定条款，在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中都很少执行过。

七

关于袍哥组织的经济来源，据范绍增在全国文史资料第84集《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一文中说：“…钱的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袍哥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不正当收入，五是贩卖枪支弹药武器等。”后来还产生一种“保烟帮”，专门为到山区购办鸦片烟土的帮伙保镖，安全通过关卡、到达目的地后，收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保镖费。范绍增所述均系一般来源，各地区袍哥组织情况不同，



手段千奇百怪，无法详述。但有的组织明或暗接受特务机构、军队、政府津贴，或挂出军、政某部门招牌，公开收税催捐，中饱私囊，则是明显易见的。

八

关于成都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哥老会的情况，将另文叙述。这里，着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都袍哥中最歪最恶最可恨的徐子昌、冷开泰作一介绍。

成都袍哥大、小公口（码头）十几年来在千个以上，除了“孙、吴、丁、张”和“马、袁、江、汤”之外，更为出名的有能通长江一带青、红两帮的冷开泰，有名震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总关火的马昆山，有倒插野鸡翎子的龚谓德，有八方搁平的陈俊珊……这些人的作用和毒气，确也不亚于范绍增、陈兰亭、石肇武之流。除了以上这些人之外，就要特别提出两根毒气最大的“地头蛇”，一个是徐子昌，一个是冷开泰。

我先摆谈徐子昌两个突出的故事。

徐子昌是郫县三元乡人，绰号“笑头和尚”，随时装起一副笑脸，哪怕对你恨之入骨，表面上仍然非常亲切。由于专打烂条，阴险狡诈，江湖人称其为“徐师爷”。最初，他在邓锡侯部下当排长，先后投拜在郫县袍哥总舵把子方茂山和钟次方两人名下，开始大搞袍哥活动。他大肆笼络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臭名的恶人，仿效小说中瓦岗寨的故事，邀约这些“叫鸡公”，如邓锡侯部的喻载阳、崇昌义、张北斗，田颂尧部的钟子良，刘文辉部的冷少康，以及匪首赵连玉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有了这个“为虎添翼”的组织，徐子昌成为成都地区一根大地头蛇了。

1933年蒋尚朴当成都警备司令，徐子昌当上督察长。他便自己创立了一个“西城社”袍哥码头，他当舵把子。他上对军政头目、“五老七贤”厚颜巴结，下对土匪恶棍、九流三教广为结纳，逐渐成为成都市毒气很大的人物。

成都市的治安历来很糟，大小抢劫杀人案件很少真正破案。徐子昌身为督察长，惯搞“自买自卖”，在遇到大案过不了关时，常常都是诬陷一两个腰杆硬不起的出来销案替死，表现他办案有功。1940年轰动成都市的“金城银行大抢劫案”，上面追查得很紧，徐子昌便苦心罗织，把温江一个

姓袁的纯良人诬陷为主犯，判了死刑。当法庭上捆绑袁某时，袁哭叫抗辩无效，看见徐子昌坐在庭上，他悲愤大叫："徐子昌，我在鬼门关等你！"徐子昌站起来骄傲地大声笑说："鬼门关等我的人很多，你娃娃还不容易挤进门去咧！"引起看审案的观众哄堂大笑！还有一次，桂花巷陈兰亭的亲戚被抢，陈也是个当过师长的大袍哥，警备司令严啸虎限三天内破案。徐子昌从容不迫地把一个曾经一度当过土匪，已多年不干、改邪归正的曾体仁，诬为桂花巷劫案主犯而判处死刑，使陈兰亭无话可说。

1947年蒋介石想当总统，玩了一套选举国大代表的丑剧。成都市应产生的国大代表，已由蒋中央"圈定"了孙震。孙是四川大军阀之一，当时任郑州绥靖主任，指挥着十几万兵马。他当成都市国大代表当然十拿九稳，毫无问题。殊不知黑松林跑出徐子昌，他也要在成都竞选国大代表，和孙震竞争，拼一拼高低。尽管事前成都市政当局多方派人向徐疏通，请他打个让手，他都不干。他内心仗恃拥有大小袍哥和上特务，搞十多万张选票毫无问题。他在四门组织了若干办事处，由黄业光、蒋浩澄、银剑泉等"吃铁吐火"的人主持，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他的党羽还为他筹集伪法币两亿多元作竞选费，并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为他效劳到底。他的竞选声势越来越大，把全市都闹震了。孙震为此暗地有些着急，怕阴沟里翻船，输不起这个面子。而最着急的人，还是省主席邓锡侯，他知道孙震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如果圈选的都出了岔子，他怎好向蒋介石交代？要解决这个僵局，只有向徐子昌许上一个"包袱"徐才会让步。于是叫保安处处长刘照黎，准备一个"区保安副司令"的缺给徐子昌；同时，派副官长黄瑾怀给严啸虎和几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请他们向徐子昌说情，打个让手。徐子昌认为已经抓了"耿面子"，才顺风转舵，卖个人情给邓锡侯，同时又赢得了孙震的谢意。于是，他才宣布退出竞选。

冷开泰在袍哥群中是五毒俱全、十分活跃的典型人物。虽然事隔四五十年，现在还有人写他的"文史资料"，可见其毒气之大。有关他的罪行和劣迹，已有专文记述。现在举出两件重要的事实。

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十月十八打起发"的大乱子中，冷开泰就是袍哥码头上的小老幺，亲自参加过抢"藩库银子"。十来岁时，他投靠在灌县袍哥孙、刁、宋三大首领名下，摆了很多"豪"，才离开灌县跑到重庆，住在大袍哥彭老圈家，搞贩烟贩枪的活动。回到成都后，由于以往开罪过





拜兄孙泽沛、刁青云，他不敢露面，挽请袍哥李安邦、王少武为他求情。孙等认为冷开泰跑过滩，有办法，有胆量，不但前嫌尽释，又同他联系。这样一来，冷开泰又在成都活跃起来。他全力尊捧当时老袍哥舵把子牛前初（牛范九的父亲），主要是以此抬高自己。

冷开泰嫖娼滥赌，开支很大。在重庆时，青帮头子丘伯坦邀冷到上海去活动，为他特别介绍杜月笙、黄金荣、颜家棠等青帮头子，并受到杜等的热情接待。冷便趁机大吹四川袍哥的力量，并炫耀他在四川袍哥中的声望，得到杜等的重视。当时汉口洪门（南洋一带哥老组织）首脑杨庆山也在上海，经丘的介绍，杨很赏识他，邀冷入洪门“袍大哥”。从此，冷开泰便成了长江一带嗨通了的知名人物。

其时，刘湘在上海购运大批枪弹，途经万县时，被杨森指使袍哥师长范绍增带队装成土匪，把枪弹全部抢走。同时，南京、武汉两道关口为中央所控制，不易通过。因此，刘湘购买枪弹的计划大成问题。这时，刘从云向刘湘推荐冷开泰吃得开，刘湘便派冷办理。冷赴上海托青帮购入大批枪弹，并利用法国兵舰掩护装运，又通过汉口杨庆山的作用，大批枪弹平安抵达重庆，得到刘湘的高度赏识。于是，冷开泰得到刘湘重用，从宜昌办事处副处长升为四川航检处长，最后当上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情报处长。他大权集于一身，在刘湘跟前等于是蒋介石身边的戴笠了。当时，冷的力量可以吃通长江一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蒋帮在成都做垂死挣扎，创办游干班，准备反共打游击，第五期扩大组织，广泛吸收袍哥、土匪、恶霸分子参加。冷开泰被聘为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受训的袍哥、土匪、恶霸，大部分都是冷开泰邀约的。每天下课后，很多重要分子都集中在东胜街冷开泰家吃酒宴会，也有些进一步吃血酒拜把的。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的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约两万多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军校决定分配发给受训人员，以便组织反动武装。由冷开泰转达受训人员，各人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多少人就发多少枪支。在发枪之前，军校还征询冷的意见，使拖队伍想当官的人，都奔走于冷开泰之门。解放初期各地发生的多起暴乱，确实是和冷开泰分不开的。

漫话旧成都的娼妓

◎杜　宇

一

记得旧成都老东门附近，沿着旧城墙基址出东门，有一段叫“柿子园”。这条小道是每天一两百名精强力壮的汉子，专门负责挑运全市粪便出城的必经之路，从天一亮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粪夫担起一挑挑粪便，飞奔出城。

就在柿子园这段路上，盖起了很多棚户。每当中午和黄昏时候，各家棚户门边，都站有一个穿花布短衣的女人，脸上涂了一层不匀净的白粉，用红纸涂红了两颊和嘴唇，不断地用笑脸向粪夫打招呼：“进来歇一歇脚嘛！”

每间棚户内，是一个小屋，没有床，只有一个小土台子，放有被盖枕垫，棚角边放有小炉灶和碗筷杂物。

有些粪夫很熟悉地放下粪担子，钻进棚户，很粗鲁地把花布短衣女人拥抱上炕，发泄性欲。大约经过十多分钟时间，便下炕来，从腰间摸出一串小铜钱（当时使用的方孔小铜钱）交给花衣女人说：“老规矩，一共三十二文，清一清！”

女人一边扎裤一边接钱清点，有时择出一二个说：“这是毛钱，请掉一掉！”粪夫完成各种节目后，走出茅棚，女人在门边照例说：“明天又来哈！”粪夫挑上粪担，飞奔而去。

北门北较场、武担山一带，也有一两百家穷困娼妓集在一起，简陋的情况，比柿子园稍好一点。

除了柿子园和武担山外，散处在天涯石、藩库街、五世同堂、笔帖式、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的娼妓总有一两万人之多。



般的生活，比起柿子园、武担山那就好多了。

大家都知道，清朝末季，成都有个主办警政的大员叫周孝怀（俗称周秃子）。那时还没有市政府的设置，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都归“劝业道”总管。周孝怀面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娼妓问题，大伤脑筋，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先对全市娼妓进行调查登记，把公开的“台基”和“私窝子”订为“监视户口”，并在其户门上钉上一个“监视户”的小木牌，接受保甲良民的监视。

其余大量的流娼私妓，统统集中住在天涯石街，把天涯石街改称为“新化街”，在街口建成一座岗楼，上置岗哨，维持秩序。还在岗楼上钉了一道横匾，上书“觉我良民”四个字。

周孝怀这一措施，对公开的大妓院来说，后台硬，嫖客都是达官贵人，门前车水马龙，谁敢监视？最痛苦的是“私窝子”，门口被钉上“监视户”木牌，不但家丑丢尽，有面子的熟客也就望而却步，等于砸了饭碗。

新化街的末等娼妓，人老珠黄，守株待兔，等于泡在污泥浊水里奄奄待毙。周孝怀这种讨好舆论的措施，结果是弄巧成拙。不久，周孝怀公馆大门上，有人为他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大木牌，一时全城传为笑柄。

二

1930年以后，成都进入防区制，驻军复杂，明娼暗妓到处皆有。据当时《新新新闻》名记者文枢的调查记载：省警局卫生科发给妓女的“乐女证”（政府允许卖淫的营业执照）是1—13565号，说明成都市有登记的公娼是一万三千多人。文枢说，私娼的数字，经他在各大旅舍的三乾、蓉康、普海春、春熙饭店、成都市妇女会、君平街、三桂街等地作过周密采访，大概在一万人以上；对“私窝子”他也作过详细调查，在藩库街、福字街、王家塘、大田坎、驷马桥、花牌坊、唐家花园、北城公园以及伯庄医院、四能诊所、博济医院等处统计起来，成都有妓女三万多名。

老成都妓女，很少有“个体户”，都是依靠鸨母为生。她们负有鸨母的“卖身债”，因此一切都由鸨母主宰，收人的70%交鸨母，自己仅得30%，包括化妆、医药、衣服、用具等等开支，如果在旅馆接客，茶房还

要抽三成。如果还清了卖身账，收入自然就要多些，但据妓女说："这个账永远也不容易还清的"。

在成都，出名的大台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缝"，江南馆的"吴胖婆"，揽扒街的"李老八"，冻青树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娘，御河沿街的"大周二"，青龙街的"小周二"，北巷子的袁素卿，他们各拥有漂亮姑娘多人，达官贵人趋之若鹜。

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以"成都市妇女协会会长"名分出现的何知言，出入于交际场合，非常活跃，他还用了几个"女秘书"。其中以林亚华和包三妹活泼漂亮，经常和一些党政官员打得火热，这是成都市一个隐形而又带特务性质的高等台基。

在旧妓女中，现在还存在一个叫"曾二"的，白发苍苍，若干年以前还在街上守自行车，旧相识偶尔遇见，漫谈兴亡旧事，不胜欷歔感叹！

三

刘湘防地原驻重庆、万县一带，1932 年，刘移防成都。由于抗日战争原因，京、沪、扬州一带妓女大量迁入四川，住重庆、万县一带。在刘湘移防成都以后，原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扬州台基老板、青帮头子李松寿、赵长寿、毛德周等，带起四五十家扬州姑娘来成都开辟新天地。

成都川妓旧规矩，在妓院里接客，不兴出条子，妓院设备也差；川妓不善应酬，文化低，不会吹弹扯唱，无诱人技术。扬州姑娘来成都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扬州姑娘不止在妓院接客，主要是在外"出条子"，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妓女来陪同应酬，真有"春城无处不飞花"之慨。从此，川妓台基也学会这一套方式，在市内场合大肆活动，成为一个模式了。

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的成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那时都住在旅馆里，又在市内各种场合乱串，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看不顺眼，保守的地域观念，引起了成都人对她们的嫉恨和厌恶。于是，成都有力的上绅阶级起来建议："驱逐出境"。成都市的治安机关，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夜晚，突然把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局内扣押，勒索了贿赂后，限令取保于三天内离境，并严令大小旅馆不准招留一人。



她们老板中有钱的，就自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基身份，向警察局领起正式执照，暗中继续营业。大部分无钱租房和租不到房子的人，便由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通过袍哥关系，率领一批鸨母们去沟头巷拜访本市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刘嘉兴等人请求帮助。据说青帮和袍哥自来是互不妥协、互不低头的。那一天，赵长富、李松寿见到陈俊珊还下了一个大礼，向陈请求大力解救危难。陈也很买账，马上给乐山、叙府、雅安、康定、绵阳、南充、彭县、广汉、灌县等地袍哥大爷写信介绍，恳请他们照顾，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率领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码头，继续谋生。

这本来是没办法的办法。一年多以后，她们先先后后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打伙买了房子，有的在别的台基上搭班包房，总之已不再在旅馆驻扎，自己都有了一个家了。军警机关，慢慢按川妓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他们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1937年，下江人到成都的人增多，大批妓女又涌到成都，互相攀引，除槐树街、惜字宫南街、燕鲁公所、新玉沙街、藩署街、桂王桥西街，三倒拐街各有一些扬州台基外，如是庵街竟有四十多家，书院南街也有一二十家，西御西街回春里竟全是扬州妓女的住所，全市共发展到一百五十多家。为了适合一些跑警报的阔人需要，扬州台基还在水碾河开设几家疏散区临时台基，业务相当兴旺。

1938年以后，由于战局关系，长江一带和上海的青帮组织，不断向四川发展；蒋介石派来的宪兵团官兵，多属青帮中人（宪兵团长阎春郊、郭大任都是青帮头子），由于青帮势力和宪兵团的庇护，扬州妓女在成都不再受气，业务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配合“业务”的需要，和安插家属以及扬州同乡，这些扬州台基老板又集资开办了其他一些企业，如云裳理发店，就是扬州台基在成都的第一个开山祖师鸨母“三姨妈”（名管金秀）开设的。扬州人还开设了大光明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新浴室、温泉浴室、三星浴室、三益公浴室，以及四五六酒家、大陆商行、亚洲参茸庄等等。扬州人的老、中、青

都有了优厚的收入。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扬州台基娼妓的等级问题。

成都的扬州台基，分为五个等级。头等只有资格最老的“三姨妈”一家。她是最早来成都的，住在槐树街十一号，经常有坐汽车的客人上门，交往宽、排场大，姑娘一般不到旅馆出夜条子，滥兵流氓不敢来滋事。

二等的有四五家，如燕鲁公所朱美云等，往来客人都是坐私包车的阔人，滥兵小流氓也少去。

三等的人家较多，西御西街回春里内的十几家人和一些单家独户的台基都属于这一等。他们主要是卖唱，也出夜条子，“做花头”的代价低，一个花头五十元，只要做一个花头，就可以与姑娘过夜。平常这些人家赌客多，又是变相的赌场和烟馆，下级军官、袍哥是他们的常客。

四等台基不是单家独户的院落房子，而是一家人一间的集体户，如是庵街几十家人属于这一等。他们难得有人去叫条子、打茶围，更没有人给姑娘做花头，顺客稍稍多出一点钱，当天就在那里过夜。去的多是小商小贩、小职员和店员之类，滥兵流氓经常在这里骚扰。

五等台基就是经常住在书院南街那几十家人，因为那儿开过豆浆店，一般人都仍然叫成豆浆店。他们不但是集体户，而且每家只有一间很坏的房子，自动到这里来过夜的客人也很少，他们全靠联络旅馆茶房替客人来叫夜条子。但夜条子又没把握，这些妓女只有到春熙路、总府街、东大街热闹区域，站在墙边路角“拉”客（并不是用手拉，发现有可能的对象时，鸨母或妓女本人低声乞请“到我家去玩玩嘛”，拉到一个客人，一夜只能得一两元钱）。

这五个等级的台基，除一、二等以条子、茶围、花头为日常收入外，三、四、五等台基的妓女，以廉价出卖肉体，如果一两天没有生意，就要挨打受气，大部分妓女一身都是疮毒，重病还要接客。

有一个叫做高好好的妓女，由于接客过多，身体支持不了，逃匿到一个熟人家中，被老板抓到毒打，闹到警察局。司法股长易某，要维持老板的权利，又要处罚这个妓女，高好好惨痛的悲诉道：“我的下身都肿烂了，还要我接客。”她当众脱下裤子，请长官验看，果然阴户全都肿了。激于群众义愤，才把高好好送济良所，她不久病死在所里。



五

还有一件丧权辱国的悲剧。抗战期间，蒋政权为了献媚美帝国主义，在福兴街开办了一个盟军招待所，由市府、省会警察局派员主持，征调了很多扬州妓女去供应美国鬼子发泄兽欲。这些被派去“打洋差”的，多是三等以下台基妓女，因为扬州台基总龟头是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他两人包办了这件差事。三等台基的老板比较穷，平时对这两位老太爷（鸨母、妓女一贯对他二人的尊称）孝敬不多，因而这类苦差只有落在三等台基身上，使妓女们受到极大的屈辱。美国鬼子随时拳打足踢，吃得醉醺醺的，把人当成动物来加以侮辱，姿色稍好的，便进行轮奸，引为笑乐！糟蹋一天半夜下来，所得的代价，所方抽去一半，茶房还要抽30%，落得皮青脸肿狼狈而回！

三等妓女陪伴的嫖客，多半是吸食鸦片的，久而久之，她们也染上烟瘾，一身染上疮毒，成了鬼怪一般。色相既不能卖钱，嫁人又找不到对手，只好卖唱、卖毒品，替人拉客、偷盗东西，除了拖死、病死、穷死外，只有在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

六

这里还有必要摆谈几件花絮材料。

上面已经讲过，1934年，成都曾经大肆驱逐过扬州妓女。一年多以后，这些人大部分陆陆续续得到生还机会。不料正在人人怀念旧情之际，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因病逝世。由于他平时济困扶危、助人为乐，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出葬那天，送丧的不下五六万人，36个抬灵柩的人，都是成都市各袍哥码头的舵把子，一律素衣孝帽，整齐肃穆。在灵柩后面紧随着一百多个面带悲切的素衣女郎。观众惊异莫名，认为如系死者亲属，何至都同一打扮、同一年岁的青春少妇，后来才听说是全市的扬州姑娘，她们出于感激之情，主动组织起送丧队伍，一直随丧步行到十里外的五显庙（今万年场）墓地，有些人眼泪湿透了几张手巾！

由于成都社会环境复杂，娼妓和特务、盗贼、烟毒犯、赌博犯具有共同的病源，已经成为分不开的因素。他们之间非常复杂，经常出现互相倾轧，互相谋杀的惨案，内容牵扯很宽，始终无法破案，如曾成武被杀在易

裁缝家；花老四门日青光在自己床上被人乱刀砍死，凶手扬长而去，还到银行把她的存款取走，一直没有人敢惹！

我现在把花老四之死，摆谈给你们听。

花老四，三十来岁，姿色平平，但长于交际，投人所好，故名噪一时。她原是武汉汉剧演员，抗战时来到重庆，沦为妓女，后又迁来成都，住帘官公所。她的住处富丽堂皇，厅堂曲折，花木扶疏，又专门为面子人物在附近兴禅寺街开了一道后门，辟了两间隐蔽的停车房，使过路人不易发觉，替那些军政要人顾脸遮羞。

接待客人的地方分为三等，第一等古色古香，有陈设典雅的大客厅，专门接待军政头目；第二等是陈设富丽的外客厅，接待一般客人；第三等是密室隐屋，接待胆小怕事的大商人。全院姑娘连仆人共三四十人，并聘有家庭厨师，中西兼备，招待客人的香烟是加利克、三五牌，酒是茅台、花雕、白兰地，水果是洞庭枇杷、台湾菠萝、广东荔枝、吐鲁番葡萄，极尽豪华之能事。

偌大一座妓院，这样的排场，每月开支至少也是几千万把元，但是说来也怪，那些第一等有来头的客人，花老四却定为不取钱的对象，经常不断的山珍海味和“梭梭”“海洛因”，作充分供应。你想：最高级的享受，最温馨的环境，最豪华的生活，长期不要你花一分钱，充分说明你起的作用。在花老四看来，对她的好处是相当大的。举一个小例：雷、马、屏、峨和西康一些大烟贩子，便住在这个安乐窝里，除了为花老四提成外，还要为花捎货。有一次，运来了大批烟土，被省禁烟督察处缉私队发觉，跟踪来到帘官公所花家。为首一个大队长正打算带队人内搜查，猛抬头，看见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副官魏达俊立在门口。队长走上前去向魏报告，魏望了他一眼，指着一排小轿车说：“他们天天都在这里应酬，你最好识相点，走远些，不要来撞头七！”队长吓得伸出舌头，灰溜溜地把队伍带走了。

花公馆的财源很多，如“抽赌头”的收人是相当大的，红宝、牌九、单双输赢上万，抽头在一千以上；还有为大头头找漂亮少女。有一次替一个管区司令找到一个少女，是女学生，那一次便得了一笔可观的好处。花老四在当时娼妓台基中成了顶峰人物。

刘湘死后，川局情况复杂。国民党军统特务见帘官公所花公馆每天冠盖云集，川康头面大人物都在此聚会，便想利用花老四作内线，刺探川康



情报。于是物色了一个特务中的漂亮小伙子陈祥云去接近花老四，大献殷勤。花已徐娘半老，受宠若惊，感恩知己，对陈言听计从，源源不断地把刘湘死后川康一些秘密人事问题泄露给陈。致使蒋介石趁机派了王公侠、廖昂3个军把泸县、宜宾强夺过去，瓦解了川康各军原有计划。这大大激怒了师长彭光汉，示意某副官之弟（其妻曾被花老四勾引被人诱奸）进行报复。其弟约同金堂土匪于次日晨，一同前往花老四家，把花老四从被窝里抓起来。花老四忙把保险柜打开，叫他们取钱。某副官之弟说："老子不要你的臭钱，要你的狗命！"抽出杀猪刀对着花老四的心窝喉头连杀四刀，鲜血溅满了床帐。凶手把刀在被子上搽得干干净净，从容而去。



保路死事纪念碑

◎ 周芷颖　王泽枋

还未走进成都的人民公园，远远就能望见庄严雄伟的砖石结构的高塔直插蓝天。走近了，可见由碑座、碑身、碑顶组成的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方形碑塔。塔高31.86米，碑身四面用不同字体镌刻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字样。这十个大字是四川著名学者吴之英、赵熙、颜楷、张夔阶手书。碑座上部四面，分别塑造火车头、铁轨、信号灯、转辙器及自动联结器的图案浮雕。碑座上镶嵌汉白玉石，刻有“中华民国二年，川汉总公司建”的字样。这是建塔时间的准确记载。人们进园游览，在塔前漫步留影，凭吊先烈，吟哦诗篇，挥毫作画，往往未注意建塔原因、特点及有关历史掌故。不少人对成都导游图以这座碑形图案作为成都标志也不理解。

这座碑记载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斗历程的丰功伟绩，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皇族政权的覆灭。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曾说过：“没有四川的保路风潮，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也许要晚两年。”因此，这座碑是成都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见证。

1911年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外国列强压力下，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合同”，允许外国享有铁路借款的筑路权，下令接收川、鄂、湘、粤四省铁路公司，侵吞人民的铁路筹款。清廷拱手把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四川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口号，百多个县市开展了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斗争。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罗伦、蒲殿俊、张澜、颜楷等领导人。广大群众闻讯后，到督院街制台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处）和平请愿。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成都血案”发生后，导致了



保路事件转化为全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清廷忙调驻湖北的清军入川镇压。由于武汉空虚，武昌城头才得以打响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第一枪。保路风潮实质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了纪念保路运动中的死难烈士，川汉铁路总公司于1913年修了这座纪念碑。

在清代，碑址附近不是公园，而是居住旗人的少城内3条胡同。这三条胡同是：水平胡同、永清胡同和仓房街。永平胡同，又名头甲巷子或永顺胡同。永清胡同，又名桅杆巷子，因街内有一高悬天灯作夜间照明的桅杆而得名。仓房街，又名仓房巷子，原有囤积粮食的公仓，以备少城闭城时的紧急之用，清代后期仓房已废。修建纪念碑时，政府将三条街房基地征收，建筑公园，旧有民房全部拆除。

纪念碑的设计人兼监工是王枌。王枌，字次陵，双流县擦耳岩人。幼时为县中附生，在省城人府庠。清末废科举，办新学，他应读于成都铁路学堂，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亚铁道学堂。回国后，因清廷腐败，铁路修筑大权拱手交给外人，王枌只好回到老家蜗居。在居乡期间，与友人合作，测量设计并主持了由双流县城往彭家场、擦耳岩的乡村公路工程，梓闾咸称便宜。

辛亥保路风潮事起，王枌以双流大铁路公司股东代表资格，出席了在成都岳府街举行的川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为颜楷、张澜等人所器重。赵尔丰屠杀人民后，他托同学回双流组织保路同志会，声援成都人民的斗争。辛亥革命后，铁路公司鉴于“政府假取犒军、数日辄尽”股款，张澜、颜楷等联名提议，将剩余路款给保路死难烈士建造纪念碑，并组成筹委会，聘请王枌为总监工，负责图纸设计和施工。王枌在设计中，继承了我国碑塔建筑的民族传统，同时参照国外建筑的艺术和特点，构图庄严，自然大方，熔中外文化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典雅古朴的中国气派。特别是碑身四面的书法艺术，更为碑塔增色不少。吴之瑛等四人，皆为前清翰林，南面为吴之瑛所书汉碑，一丝不苟；东面张夔阶的汉篆，笔法劲美；西面颜楷的北魏体，精气贯注，有铁画银钩之法；北面赵熙的汉碑体有骨有肉，苍劲力雄。在建筑时，除以砖石作基础外，并以青冈木棍钉下丈余深，名为梅花桩，所以坚固如同磐石。修筑历一夏而全部落成，在“成都血案”纪念日之前举行了落成典礼。

1933年8月，四川西部叠溪大地震，碑身摇动，但未倒坍。1941年7

月，日本飞机轰炸人民公园，毁坏了碑顶和碑身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保护这件文物，1952 年和 1954 年两次修缮复原。1961 年它被列为四川省重点保护文物。1980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又对该塔重新修葺，更换了碑座，装上了琉璃筒瓦，碑身粉饰一新，使全碑更加光泽夺目，雄伟壮观。1988 年，保路死事纪念碑被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都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

◎路　斯

眼下的成都市内交通，公共汽车往来如穿梭，无论旅游揽胜，或是走亲访友，都能四通八达，无不称便。若问成都市的公共汽车始于何时，当以1925年的华达汽车公司为第一家。

公司的创始人叫何嘉谟，是军阀何羽仪的儿子。1923年，何嘉谟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先是开了一家洋马车行；不久，闻听成灌马路总局招募商股，筹建长途汽车公司，便也产生兴办实业的决心。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他伙同一些经营石棉、云母的大商人，集资十余万元，于1925年到上海购回7辆美制福特汽车，在实业街开设了华达汽车公司。开始时本想在成都到彭县一段跑短途客运，因为马路没有完工，便把车子改作街市公共汽车。这在当时说来，不仅在成都是首创，在全川也是鼻祖。

成都地势平坦，行驶公共汽车本来方便，但要在这古城创办新型的交通，倒是一个大胆尝试。当时，华达公司所拟订的全城行驶公共汽车的线路，是相当周密细致的，布局也较科学。行车路线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区。东区由东门洞到西门洞，途经东大街、东西御街、将军衙门、长顺街、红照壁、磨子街、西丁字街、青石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街、提督街、鼓楼街、新开寺、北大街，设10站；西区由西门洞至东门洞，途经西大街、笆笆巷，青龙街、西府街、正府街、线香街、顺城街、皮房街、提督街、总府街、湖广馆、棉花街、沙帽街、东大街、东门口，设10站；北区由北门洞到南门洞，途经北大街、新开寺、鼓楼街、顺城街、盐市口、东西御街、三桥南街、红照壁、南大街，设9站；中区由商业场前门到实业街，设7站，经总府街、提督街、盐市口、东西御街、祠堂街、长顺街、将军衙门、实业街；又由商业场后门到槐树街东口设7站，经华兴街、小什字、忠烈祠、东西街、白丝街、玉带桥、西玉龙街、草市

街、东门街。每一站口，都钉有标志，载明经过街道名称。每站收取车费铜圆一百文，游环城收大洋五角。开车的驾驶员，都是招收的初中毕业生，经过6个月的培训，操作自如，行驶正常。在1926年元月正式开车营业。公共汽车一出现，立刻轰动全城，鹤立于滑竿、马车、黄包车之中，为古城大增异彩。远近居民，都来争相乘车作环城游览，莫不拍手称赞，欢迎这一新鲜事物的诞生。

可是在军阀横行、遗老挡道的年代里，公共汽车虽说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照样不能畅通无阻。营业不到1个月，就被当时成都的所谓“五老七贤”之流横加干预，有曾奂如、徐子休、陈孟孚、文海云、尹仲锡等人借口“一般风烛残年之人，异常胆小”，说什么“汽车隆隆其声，巍巍其状”，“形如市虎，谈虎变色”。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上书川康边务督办公署：“请禁止汽车在城内行驶”。督办刘湘立即下令禁止，于是华达公司被迫暂时停业。这年花会期间，华达公司应群众的请求，复在春熙路往南门一线开班车。“五老七贤”们又急来指责华达公司违抗命令，要刘湘实行武装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华达公司委曲求全，再次缩短路线，不走城里，改驶南门口开百花潭，勉强维持到花会闭幕。因为华达公司有车无路，迫于形势，只好投靠马路局，缴纳通行捐，改为短途客运，行驶在成都至新津一段线路上，终因亏损太大而倒闭。

尽管华达公司短命夭折，而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公共汽车交通事业，和一切新事物一样，挣扎、突破，终于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诚如杜甫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拆城门的风波

◎硝　烟

老成都通衢大道——东大街的尽头，距府河两百米远的地方，屹立着一座横空出尘的古城门楼，这就是成都的东大门。面对坦荡的川西平原，雄关陡起，近可钳制府河，远可扼守东大路。这座城门好雄势啊，齿形的垛口，半矮的女墙，伸延的梯道，灰暗的城壁，在每天金红的晨曦辉映下，分外鲜明，显得恬静、安谧、妩媚、动人。“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朝晖天天最早照射到城门。因此，从明代复建成都城墙时，这座雄关就赢得了“迎晖门”的美称。谁也没有料到，“迎晖”二字竟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把东门周围团转的黎民百姓逼得蚀财跳井，民怨沸腾啊！

话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就在报上封锁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消息，以后又三令五申：“侈谈妨碍中日邦交言论”者“示以惩戒”。什么叫“惩戒”？就是坐牢、杀头。国民党不准抗日，日本胃口越来越大，占了东三省，又占了上海，北平也沦陷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喊。直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在日寇铁蹄蹂躏东北领土七年之后，才不得不喊几声“全国总动员，抗日守土”的口号。成都东城门附近一位与“委员长”同姓的联保主任，也给弄到区公所去听了一顿训示。现刻，他满脑子还在响着区训导那鸭公嗓子“城里城外没有一点抗日气息”，“东门是进出省城咽喉，毫无抗日舆论，太不像话”。他鸡梭梭地站在东门城门洞下，偏起脑壳，左瞄右瞅、仰望俯瞰，脑子里不住地打滥条。他是袍哥出身，青天白日旗下的新进党员。用区训导的话说，哪个舅子想拉你参加党，你滚进来还不是手痒了想多捞两个么。他边看边想，忽然眼睛一亮，要有抗日舆论么，明天先往各保各甲摊派抗日宣传捐，街坊凑钱买石灰、纸张，好在城墙上刷标语，电线杆子粑红绿纸。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哼，东大街那家“口

新铁匠铺”，去年开张，才给我送了半个刀头，明天先把他招牌摘来当众烧了。他敢发杂音就捆来送师管区，告他个通日罪名。可惜铁匠铺小本生意，押了人也榨不出好多油水，石灰纸张捐也给姨太太落不下几文脂粉钱。他瘪了几下嘴巴，忽地把混浊的眼光，直定定地停在东城门门洞上方那块刻有“迎晖门”的石板上，像个哈宝样戳在地上，几分钟没有动。

这时，正是下午七点过，东大街两个甲长，端起板凳到城门洞来值岗。按照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要求，对进出城拉粪水、担粪挑的农户收“卫生捐”。他们看见蒋主任神不楞乔的样子，不晓得哪股风犯了，忙凑过来搭话说：“城楼上没得王宝钏丢绣球，别把脑壳想歪了。”“城门匾灰扑扑的，哪有姨太太粉脸好看。”

蒋主任偏过蛤蟆脸，哼了一声骂道：“都是公事人，私房话不要拿到台盘上来说。偏颈子，你认得到字，我问你，这上面是什么字？”

偏颈子甲长应声说：“迎晖门。”

蒋主任盯了一句：“你看清楚再说，驼子看清楚了没有？”

驼子甲长赔着笑说：“是‘迎晖门’三个字。”

“三个字怎么写？”

“迎，是迎财神的迎；晖，左边一个日字，右边一个军字；门，……”

“别说了。把板凳放下，随便找两个来收卫生捐。你们跟我到‘贤居’茶铺头议事。”

偏颈子和驼子甲长摸不清路数，只好跟着蒋主任进了城，到东大街“贤居”茶铺。上桌早就坐着正赌钱的四保九甲的保、甲长。原来蒋主任早就放了话，要大家来议事。

蒋主任刚落座，屁股像挨了弹簧又跳起来，嘴角一咧地嚷开了：“现在是抗日新生活，坐有个坐相，把骰子、牌九收起来。”

偏颈子“嗬”了一声：“蒋哥，咋个鸡脚神戴眼镜充正神了。你在区公所挨了张训导的碰，不该把气出在弟兄身上嘛。没有这一帮贴心豆瓣，你的联保主任座位，早就拿给人端了。”

这句话敲到锣心上。蒋主任火气消了：在座的本事不大，四时八节都不少了孝敬自己，真的骂黄了，不贴心了，二天找谁要钱去呢。他放缓口气说：“你们晓得，张训导训得好多人开不起腔。现在抗日了，科甲巷做





笑头和尚[1]的铺子，居然仍在给胖娃娃脸上画红圆圈。你们晓得么，红圆圈是日本国旗，政府喊抗日，你在画日本旗，不是犯禁吗？”

驼子甲长“哎呀”一声问：“铺子遭封了吗？”

“那个老板精灵得很，给社会局送了几封袁大头[2]，胖脸上的红坨坨改成粉红的就没事了。我们呢，张训导说是宣传抗日不力，东大街好几家铺子还在卖日货……”

偏颈子打断蒋主任的话说：“是呀，昨天我到二十四号大杂院去收慰劳抗日将士费，好几个老姆姆拉着我问，‘东三婶娘’的烟袋清到了没有。我说政府派人办交涉，交涉人都焦得绊倒了，你捐了钱，就不得绊倒了。”

偏颈子的话引起好多人共鸣，七嘴八舌地说：“就是嘛，‘东三婶’啥子烟袋那么值钱。日本人不抢金、不抢银，偏抢根烟袋？”“中日都断了交了，又咋个喊人家清烟袋，又咋个晓得没有清到呢？”

蒋主任一拍桌子：“偏颈子，你熬了干夜么，张嘴就放黄。啥子清倒烟袋、焦得绊倒哟，是青岛、烟台、胶州半岛，这都是日本人占去的地盘，东三省也是个地盘，哪里找东三婶嘛。也不是婶娘，是沈阳，跟成都一样，是东三省的省城府。不说这些了，找你们来，是研讨抗日大事。你们看，东城门城门洞怎么样？”

蒋主任的问话，把保、甲长问哑了。鬼知道城门洞怎么样。好几个保长大烟瘾犯了，直打呵欠，催着说：“蒋哥，有话你就号盘，是派捐还是催款，早说早散。”

蒋主任也发觉自己的话问得陡，别人不易理解，便喊醒说：“你们看，‘迎晖门’三个字，有没得庇漏？”

这一句，又把大家打哑了。打呵欠的保长，大张着嘴，口水顺着黄板牙往下流。你看我，我看你，打不出喷嚏来。

蒋主任高兴了，他确认自己是比这帮酒囊饭袋高明，能从城门洞上找到庇漏，捞到既发财又受奖的好处，便哼哈一声说：“现在抗日了，要时时处处想到抗日。那个迎晖门三个字的晖字是怎么写的，左边一个‘日’字，右边一个‘军’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个‘迎日军’吗？政府号召抗

---

① 笑头和尚，纸糊填色的头像。

② 袁大头：银元，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子成色足，比川板值钱。

日，你要欢迎日军进门，这还了得？”

蒋主任刚才的问话，把大家喉咙堵住了，他揭开了谜底，顿时就引来一片慷慨激昂的议论：“我早就看着那个横匾不顺眼！”“对了，日本又叫东洋，住在东方，城门那匾也面向东方，硬是通奸无疑。”“蒋哥，快写禀帖给省党部告密，查一查是哪个汉奸起的迎晖名字，是哪个汉奸修的城门洞……”

蒋主任手一摆，这一阵叽叽喳喳顿住了。他心里话不能在茶楼酒肆说，要是在姨太太烟灯旁，就会说：“张训导算老几，他抗战口号喊得比雷响，金条大头捞了一箱又一箱。老子未必吼不来抗日口号么，精神抗战，我抗战起来，比你还要精神，比你捞得还多。”他放开喉咙把如意算盘的珠子拨动开来：“迎晖门既有碍抗战，又有亲日罪名。本联保主任责无旁贷抗日第一，要亲率民众拆除东城门，断绝汉奸迎日军之望。”

保、甲长听完，一个个马起脸，又闷着脑壳不开腔。蒋主任鼻孔一声干笑，压低嗓子说：“把脑壳抬起来，这个城门一拆，你们不捞个千儿八百，就别来见我。”

这句话，比烧了大烟还来劲，保、甲长们眼瞪大了，颈项硬了，出气粗了，口水吞了，齐齐地盯住蒋主任，盼他快说下文。偏颌子忙忙递上一根“红炮台”，点着火柴小心地给对方点着说：“蒋哥，有啥生财之道？”

蒋主任鼻子喷出两道白龙说：“附耳过来。”

十来个冒着酸气汗臭的脑壳凑拢一堆，活像爬在烂肉上的绿头苍蝇在会聚。

第二天，东门内外各条街上，保、甲长们跑得脚板翻，东家进，西家出，送通知，发告示，逢家挨户把政府决心抗日、街坊责无旁贷的话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直说得嘴角上白泡子起漩漩。末尾少不了几句例行公事话：“抗日第一，有人出人挖城门，没有人就有钱出钱，挖城门要伕子，就出钱雇人呀；担土运砖要拿钱买鸳鸯扁担呀，废土倒在府河边占了地要赔偿青苗呀。”对商贾铺面的话，就因人而异了，要是跟军警政界有勾扯的铺子，保长们就会说：“地方办事，小手小脚，望宝号捐款抗战，多少不拘，表个心意。”要是平民百姓开设店铺，则是：“抗日如救火，捐税不能躲，晚交一天，加倍处罚。”老一点的人记得，蒋主任的拆城门洞的捐税名目，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水津街是个穷人聚居街道，保、甲长坐着催



捐收税，逼得好多家人卖衣裳裤子，端起破锅当钟敲啊！又逼得好多人借敲敲利[1]啊！

这边在收税，那边蒋主任又派人去一些店铺挂钩，要木器铺出款收购拆城门楼房的木料，打家具做棺材卖；要熬硝行预先出款包购城墙老土熬硝卖；要建造行把大匹大匹城墙砖垒放好拿去修公馆；要铁匠铺、针线铺垫款准备铁锄、麻绳、扁担、铁钩……所有这些，都在“全民抗日，人人有责”的口号下进行。店铺如果不买，破坏抗日罪名谁担待得了？霸王生意逼着做了，还得记住一句话：是蒋主任照顾你们铺子发财，生意做成了，别忘了跟蒋主任三七分帐。

这几天，蒋主任像喝了神仙尿，走路都是轻飘飘的，东大街酒店饭铺，常见他出出进进，还听到他打着酒嗝哼川戏：“该当我时来运转坐龙廷……”他云里雾里过了好几天，天天都有保长来报财讯，他的蛤蟆脸欢喜得快要流出油了。不料有一天，刚从“朵颐”饭铺出来，几两白兰地灌得脚板打飘飘，突然，胸口给人一把抓住，耳边响起一声炸雷：“好你个蒋发财，发到老子头上了？”

蒋主任睁开眼一看，认得是驻扎在东城门旁的师管区钟营副钟垮皮，酒都变成冷汗冒出来了。他知道抗战期间，军人见官高三分，这几天忙昏了，怎么就忘了给他上寿呢？他忙立正拱手作了三个大揖说：“钟营副，进去消消气。你哥子天天要上操，你要的货，我几次送上门都没有碰到，又不敢交给勤务兵。”

钟垮皮眼一横，咬牙一问：“啥子货？”

“黄白货[2]。”

“有好多？”

“先送上一点，开门后再孝敬你老人家。”

钟垮皮松开蒋主任，要抡皮带的右手也放下了。他又钉了一句：“师座的呢？”

“请老兄代送。”

“那你叫我百多弟兄到哪里出操？”

---

① 敲敲利：敲，读考字上声，指高利贷。

② 黄白货：指金条、银元。

“城墙拆了，空地一大片，还不够老兄操正步么?”蒋主任笑扯扯地说。钟营副带着一个连住在椒子街，每天十点过，都要集合队伍到城墙上出早操。他凑拢钟垮皮耳边说：“其实，我拆城墙，也为了老兄方便，你满可以打报告说没有操场，免出早操。”

钟垮皮照胸口给了蒋主任一拳：“货还没送过手，你又想赢转去呀?哎，师座昨天晚上在烟灯边问，你干那么件大事，向上峰备案了吗?”

“递了呈文了。听说明天就要批下来。别站着说，进去，我请客。”蒋主任边说边把钟垮皮往饭铺里边请。

过两天，蒋主任联合四保九甲公事人盖章的拆城门呈文，从区公所给批回来。在“贤居”茶社，保、甲长们正扳着指头互相计算捞了多少油水账，看见蒋主任上得楼来，脸上既不欢天喜地，也不黑脸秋风，便都凑上去问：“怎么批的?”

蒋主任不开腔，从马褂袖子里拿出大信封，抽出盖有青天白日印鉴的批文。偏颈子甲长朗朗读道：“嗯，前头几句是照例公事，嗯，这句才是：‘迎晖门’迎日军不准，城门可防日军，蒋等士员赴难心切可嘉，传令褒奖，以励其志。”

驼子甲长叹口气说：“城门可防，还拆个铲铲。妈哟，我的那些穷人户，大半还没交拆城费呢。”

好几个保长同声叫起来：“收了的捐，要喊退出来咋个办?”他们的眼睛盯住蒋主任，要他拿话来说。

蒋主任不动声色地说：“天垮了有我高脚汉，你们像个抗日公事人样么？捐，照收不误，还要加码!”

保、甲长们又“呀”的一声，个个都哑了。

“过去收的是拆城捐，现在收的是防日加固城墙捐。拆墙捐收费少，加固费工多，收得自然要高，加码收捐，不得出拐。”蒋主任到底进过党训班，肚里弯弯拐拐多，这几句话说得好些个蔫了的保、甲长又打起了精神。

“那些木器铺要木料呢？砖瓦铺要砖要土熬硝呢？我们咋个报盘嘛。”偏颈子甲长叫起来。

“告诉他们，已付的款作为购买抗日公债了，我蒋某人是抗日第一，想让他们发财的。现在么，迎晖门迎日军不准，是政府不同意嘛，他们有



屁，向政府去放。”

聚在一堆的散放汗臭气息的脑袋，一个个发出笑声，活像一些粪桶滚岩，呵呵呵地轰响。

东城门免遭蒋主任拆毁厄运，仍然立在成都东门大桥之旁。升了个啥子委员的蒋主任，常常坐着私包车走东城门门洞穿过，总爱偏着蛤蟆脸望着“迎晖门”三个字，不晓得又在打啥子滥条子呢！



黄金梦

锦江淘江公司挖金银的故事

◎ 吴绍伯

石牛对石鼓，
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
买尽成都府。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成都长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前辈传说，它指的是三百多年以前，张献忠失败离开成都时，把大量无法携带的金银财宝埋藏在一个地方，以石牛石鼓为记号，以便重返成都时挖取。长期以来，尽管有不少人怀着“买尽成都府”的野心，但总是识不破这埋金之地。岁月悠悠，人海茫茫，三百多年来，石牛和石鼓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1937年隆冬，住在陕西街的杨白鹿的心情，就像成都的天色一样的阴暗。这个曾在20年代军阀赖心辉当四川省长时担任过秘书长的清朝末季贡生，二三十年来，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桩心事，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他怕说出了这个秘密，别人发财，自己吃亏，甚至招致祸患。

这天，他请马昆山来家小酌，酒至半酣，吞吞吐吐地开腔了：“昆山兄，我有一件心事要向你说。如今抗战军兴，日寇长驱直入，国家兴亡殊难预料，如果再不动手，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白老，啥事这样严重？”马昆山惊讶地问。

“你说，究竟是献给公家去办，还是申请批准自己办？”杨白鹿叨叨不绝地说。

“越说越糊涂了，究竟是啥事嘛！”马昆山问。

“说来话长，我先给你看件东西。”杨白鹿从内室取出一个檀木匣子，反问马昆山：

“昆山兄，你还记不记得‘石牛对石鼓’那首歌谣？”



“记得，记得！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

“这埋金银之地的秘密，就装在这个匣子里。”

“白老，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听我从根根给你说起嘛！”

杨白鹿慢条斯理告诉马昆山一件三十年前的往事：有个流寓在彭县　杨白鹿的故乡——的一个旧官场人物，在生活上曾受过杨白鹿的接济，当他要离开彭县回原籍去的一天晚上，脸上挂着眼泪，双手捧着一个檀木匣子，对杨白鹿说：“老友，快分别了！多年来，承你关照，铭感心中，无以为报。现在把我这件珍藏多年的东西奉献给你，希望善为运用，一定会有收获。”说完以后，他郑重其事地把匣子打开，取出一块用黄绫紧包的东西，又解了两层，最后拿出一张破旧的黄纸，上面写满了字，还画有图样，说这是若干年前，有个佣人献给他父亲的。这佣人的高曾祖父，是个世传石匠。张献忠离成都时，由水路起程，船少人多，大量金银财宝无法携带，在莹华寺（望江楼对岸）上船时，下令把金银集中起来，在石佛寺侧面挖一个大坑埋藏起来。为了防止泄露秘密，经手埋金银的人被全部杀掉。有个石匠漏网逃了出来，把埋藏金银的地点和情况写在纸上，交给他的孙子携带离乡逃跑了。后来几经辗转，落到他父亲手中。他认为关系重大，便装在檀木匣子内珍藏起来。他虽知道是无价之宝，但自己无法挖掘，又不敢献给官府，只好赠给杨白鹿了。

马昆山原是赖心辉部下的一名团长，赖心辉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以后，他脱下军装，以袍哥的身份，在商业场与人合伙经营二仙茶座。“七七事变”前不久，他到下川东去投奔范绍增，在范绍增新组建的八十八军里，当了一名师长。不久，八十八军出川，被蒋介石收编。他和他的军座范绍增都成了编余人员，被解职回到成都。杨白鹿讲的故事，使他越听越兴奋，好像堆积如山的金银，已在眼前闪闪发光。他埋怨杨白鹿说：“你呀，好糊涂呀！你得到这个檀木匣子，为啥一点风声都不露，赖心辉当省长的时候，你就该拿出来挖嘛！”

“刚打算向赖心辉说，他就垮台了！”杨白鹿不无后悔地说。

马昆山急不可待地从匣子里取出那张黄纸，轻轻理开，看了又看，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

“格老子，干！”

“咋干？”

“请范绍增牵头，自己干！”

“政府那边……”

马昆山胸有成竹，斩钉截铁地说：“如今抗战军兴，政府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趁此机会，报请政府批准，就说挖出金银，大部分献给国家，作抗日军费。到时候名利双收的，还是咱们！”

一席话说得杨白鹿愁眉舒展。马昆山赓即去找范绍增。范绍增人称“范哈儿”，其实他一点也不“哈”，对这飞来的横财，兴趣更浓，他立即拿出两万块袁大头（银元）作为开办费。经过紧张的奔走商磋，邀股筹措，拼凑机构，很快，一块冠冕堂皇的招牌——锦江淘江公司，在学道街挂出来了。消息传开，整个成都市轰动了！

公司的大股东，除范绍增、马昆山外，还有熊玉璋、蔡玉斌、吴毅候、刘升平、罗祖南等人，推选辛蜀峰当总经理，杨永思担任设计工程师。他们从《成都县志》和其它书籍上，旁征博引地找出许多足以证明张献忠埋藏金银的诸多史料，在报刊上广为宣传，招股集资。他们一面根据原始资料所提供的线索，勘测埋金银的地点；一面招收工人，购置公物工具，向外地电购抽水机、探测器等机器设备，筹备工作全面展开了。股东们个个信心百倍，认为这是坛子里捉乌龟——手到擒来了。杨永思和辛蜀峰更是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要打折扣了。他们率领勘探人员，根据那张破旧纸上所提供的材料，精心计算，终于求出埋金的地点是锦江下游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江中。于是决定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争取挖到明年夏季涨大水之前把宝贝拿到手。

正式开工那天，四川省主席王治易领着副官长和应请的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工大典。八九十人的劳动大军，兴高采烈地把流水撇向左边，亮出开工点，顷刻间，挖土声、抽水声、喊号子声，响成一片。从此，每天到锦江两岸看稀奇的人川流不息。政府除了出告示严令保护外，还派出特务团驻扎在白塔寺的黄度、陈西华营，负责维持工地治安。

几天后，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挖出大石牛了！股东们个个信心百倍，大天请公司的职工们打牙祭，香烟一包一包地散给大家。加油打气的工夫果然没有白费，又过了几天，竟然把大石鼓也挖了出来。这还了得，“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元”，一点也不成问题了，成都府三州十六县，不





久的将来，都要滚进股东们的私人腰包了。你看他们，一个个信心百倍，雄心勃勃，私下里作出了买田、置地、修公馆、建别墅的行动计划。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九里三分的成都大街小巷。人们成群结队，涌出东城门，直奔九眼桥，顺着锦江河道，赶到施工现场。倚！看那胖嘟嘟的石鼓，通身沾满了稀泥，还鼓起大肚子，向着观光的人群嬉笑。那昂首挺立在坑边的大石牛，比公司的股东们还要傲慢，也斜着双眼，似乎在问："你们当初为啥不入股呢？现在后悔了吧？"

淘江挖银的工程进展得更加神速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转动，拖泥带水的卵石，一筐筐的挖起，一担担的挑出，坑子越挖越深了。公司的股东、经理、工程师天天都要跑到工地上观察情况。一天上午，安置在坑边上的金属探测仪突然响动了！他们也顾不得脚下是泥是水，跑到探测仪旁恭耳细细听，听得心花怒放。响动了，真真切切的响动了！这比先前挖出石牛、石鼓更加令人欢欣鼓舞。顷刻之间，公司上上下下，立即紧急动员起来：挑金银的箩筐、扁担，大批大批地购置进来了，向重庆订购起重机的电报拍发出去了。这天下午，淘江公司里股东们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极端兴奋状态。

第二天，坑里果真挖出金属来了！但它不是什么金子银子，而是已经锈合成块的小铜钱。把这四箩小铜钱取走之后，探测器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信号了！

扑不灭的怒火

成都教案

◎陶　一

一

公元1895年5月，中华大地又进入了多事之夏。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胃口，也没有灭熄中日战争的火焰。5月27日，日寇又派大军分两路大举进犯我国的宝岛台湾，台湾军民与侵略者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浴血抗战。就在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二天，成都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有名的“成都教案”。

5月28日，适逢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节日的成都，天空晴朗，气候炎热。一群群、一伙伙青年男女，换上了节日的盛装，胸前挂着五颜六色的香袋，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成都东北角的较场上，用古老的传统游艺——撒李子，来欢庆节日。你看那青年男女，口中哼着小曲，手中拈着半青半黄的李子，庄严而又慎重地寻觅着他（她）要抛打的对象，然后羞涩而又大胆地向意中人撒出一个个的李子。你抛他拾，你掷他抢，你追他逐，你跑他赶，东较场上，飞出一串串欢声笑语，扬起一阵阵灰土烟尘。

在东较场东、北两面的城墙高坡上，挤满了装饰华丽的看热闹的人群，其中有四川省督署各司的贵妇人，也有成都府、县衙门的娇小姐，还有将军、提督衙门的阔少年。他们随着高潮迭起的撒李子游戏的进展，时而惊呼，时而鼓掌，时而雀跃，时而叹息。当然，哪家老爷近来贵体欠安，哪家小姐许配给哪家公子，哪位夫人在麻将桌上连和三次满贯等等，也是他们不离口的话题。

“妈呀，你看嘛！那个高个子就是四圣祠教堂的美国赫裴秋牧师，那



个瘦老头是桂王桥天主堂的法国神父，叫杜昂。”胸前佩戴着十字架的成都知府周承烈的女儿，用手指着东较场北面城墙高坡上的几个外国传教士说。

“我才懒得看呷！鹰钩鼻子蓝眼睛，丑死了。乖女儿，你可别叫啥子耶稣迷了心窍。听说，金河街有个小孩叫教堂骗去抽了脊髓，做长生不老的药吃。所以那些洋婆娘，长得又白又嫩。”

“我才不信呷！你生病的时候，还不多亏赫裴秋牧师送的西洋参。”

“周小姐，听妈的话，叫我看那些洋和尚不是好东西，从来不把我们老爷子放在眼里，还霸占老百姓的房产地产。天涯石北街的老百姓都把他们告了。”华阳县知事黄道荣的夫人也帮助周夫人劝周小姐。

这时，在北面城墙上的传教士们也在窃窃私语。

“赫裴秋先生，总督府这张布告对我们可是一个灾难啊！”杜昂主教对赫裴秋牧师说。

“刘秉璋总督的布告，完全使用的是煽动性的语言。什么‘外国人利用虚伪手段来收买中国的土地，今后一律禁止永租’。请问，按照这个规定，外国人不能在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购置地产，禁止永租，我们岂不是没有立锥之地了吗？”

“杜昂主教先生，这张布告是想把去年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人民中间产生的仇恨外国人的思想，集中在我们身上。什么外国人拐骗中国的小孩，取他们的眼睛制药嘞，什么外国人留居成都，这里就不下雨嘞，等等，已经成了茶馆里闲谈的资料了。”四圣祠教会诊所的启尔德说。

“启尔德博士，我愿意忠告阁下：虽说你的医刀在西洋大炮无能为力的成都已经劈开了大门，但还是要用机敏和智慧来操纵。你们从母腹里挖胎儿制标本，做得太不明智了。希望你再不要干这种加剧中国人反洋情绪的事，把这头睡狮激怒了是会把我们活活吃掉的。”杜昂不无顾虑地说。

“您说这些愚昧无知的老百姓吗？他们还不是听从他们的官府摆布。倒是那张布告，我们的田贝公使已经注意到了，来电报说要我们认真对付。贵国政府有什么指示吗？您不希望在成都签订第二个‘望厦条约’吗？”当赫裴秋说这话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东较场上的人群已经三三两两地散去。这些传教士们也夹在人群中间离开了东较场。

赫裴秋和启尔德经过城隍庙街回四圣祠，忽然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在五世同堂街口拦着他们的去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说："求求你们，行行恩德，放我的孙孙小三子回家吧！他是个无爹无娘的苦命孩子啊！"

19世纪末叶的成都人，很少见过外国人，像这样一个老太婆跪在洋人面前要求放她的孙子回家，更是稀罕事，过路的人们无不停下脚步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特别因为东较场撒李子的集会刚散场，多数人要经过这里回家，所以人越聚越多，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你快回去，叫司蒂文孙守住大门。"赫裴秋叫启尔德挤出人群走后，拍着老太婆的肩膀，哇哩哇啦叫唤了一阵，谁也没有听懂，他就夹着尾巴溜走了。

二

这个阻挡洋人去路的老太婆名叫尤庚女，家住桂王桥街。前几年闹瘟疫，儿子、媳妇相继死去，给她撇下一个七八岁的孙子，全靠帮人洗洗浆浆过日子。自从1892年美国的基督教美道会和美以美会的教士赫裴秋、何忠义、启尔德、司蒂文孙在四圣祠北街建堂传教以来，尤庚女经人介绍替传教士们洗衣服，挣钱维持祖孙二人的生活。赫裴秋和其他几个传教士对她倒还十分客气，她也把自己如何命苦，絮絮叨叨地摆给传教士和他们的洋婆娘听。他们告诉她，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只有基督耶稣才能救她脱离苦海，走向新岸。于是她便经常到教堂去做礼拜。赫裴秋还告诉她，对主要忠诚坦白，不论在街头巷尾听到什么大事，都不能对主有所隐瞒。她当然不会知道赫裴秋是美帝国主义派到四川的情报机构的总头目，四圣祠教堂是情报中心。赫裴秋和启尔德等，通过传教和行医等手段，一方面和上层人物拉关系，一方面把触角伸向民间，将窃取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美帝的驻华公使馆。

半个月前，尤庚女的孙孙小三子发烧，头疼得厉害，她就领他到教堂的诊所，找启尔德和司蒂文孙看病。他们给了几包白药片，回家吃下去不见什么效验。第二天，小三子见奶奶忙着洗衣服，便说自己去诊所看病，回来以后说洋大夫给他打了针，烧是退了，就是耳朵里像钻了一个小虫虫，在里头"吱吱吱"的直叫唤。过一天，小三子又一个人去诊所，竟再



也没有回来。她到教堂去找过几次，都说从来没见小三子来诊所。她把所有小三子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不见小三子。当她听到教堂拐骗小孩的传闻，更是急坏了，几乎天天都沿着东较场一带的街道，疯疯癫癫地喊："小三子，你快回来呀！小三子，奶奶想你呀！"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上赫裴秋，更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的人来围观，询问她的遭遇。

尤庚女把小三子的失踪经过对大家诉说了一遍，几个年轻人早已义愤填膺了。

"早就听说洋和尚拐骗中国小孩，我还不信，原来是真的。"一个叫王长水的青年说。

"我的姑姑得了肿病，就是叫洋大夫治死的。"李青山说。

这时，一个叫罗天华的高个青年说："洋鬼子太狡猾了！张幺爸，您知道天涯石北街的洋教堂，是在我家祖传的宅基和菜园地上盖起来的。开头他们要买，我爸说，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不能出卖给外国人，再穷也不干这大逆不道的事。后来他们托人找我爸商量租给你们，没想到契约上写的是永租，永租还不同出卖一样吗？我爸觉着对不起祖先，活活气死了。"

你一言我一语，无形中在大街上开起了控诉会，大伙越听越气愤。这时，只见一个高个子青年，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唰一声把汗褂撕开，一把拉起尤庚女说：

"大娘，走，到县衙门去告他们。"

"去告他，咱们大伙一齐到县衙去替大娘讲理。"高个青年的倡议，立即得到大伙的响应。

"朱瑞亭，去不得！"张幺爸赶忙拦着高个青年说："衙门和洋教堂是通的，不信你问罗天华。"

"我爸到县衙门连告三状都被驳回来了，要不他老人家还不得那么快就死了。"

朱瑞亭转身问大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洋人把小三子拐走整死吗？"

"不能！"群众一齐答应。

"到教堂去把小三子要回来！"罗天华高声倡议。

"好！叫洋鬼子看看，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有种的跟我来吧！"朱瑞亭振臂一呼，浩浩荡荡的人群，齐向四圣祠北街拥去。

三

四圣祠北街是一条很宽的巷子，群众一进街口，马上把它挤得满满的。当朱瑞亭、罗天华、王长水、李青山等青年搀着尤庚女来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天已薄暮。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何忠义同他的女儿吉洛丁站在门外，笑容可掬地挡着大家。启尔德和司蒂文孙双手抱着膀子，斜靠在左右门框上，尖起嘴唇吹着口哨，还满不在乎地抖动着细麻杆腿。只要看见那副流氓像，就叫人恨不得扇他几耳光。朱瑞亭按捺着火气上前一步对何忠义说："我们来找小三子的，半月前他来你们教堂看病，一直没回家。"

"啊唷唷，太遗憾了，我们从没见过什么小三子，请到别处去找好吗？"何忠义边说边走，竟跨过街道走到他的住宅门口。吉洛丁站在家门外，举起胳膊撑了几撑手，尖声尖气地说："古德白！"一转身同何忠义钻进家门，反手把门闩上了。启尔德和司蒂文孙趁机往教堂里钻，准备把群众关在门外。罗天华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揪着启尔德的衣服后领。就在这一瞬间，司蒂文孙拔出了手枪，"啪，啪！"连放两枪。罗天华一惊，松开了启尔德。这时启尔德和司蒂文孙一齐跳到街中央，望着向后退去的人们，狞笑一阵，又举起枪顺着街道连发几枪，子弹带着火光，呼啸着从人群的头上飞过。

"洋鬼子开枪杀人了！"

"洋鬼子开枪杀人了！"

这呼声划破了成都的夜空，这呼声震动了成都的千家万户。成都人是不会被洋鬼子的枪弹吓倒的，他们呐喊着，呼叫着，向教堂拥来。朱瑞亭早已跳到教堂门外，挥动拳头敲击紧闭的铁门。

"把开枪杀人的凶手交出来！""把小三子交出来！"朱瑞亭和罗天华怒吼着。这时，李青山和王长水已经抬来一根木桩，朱瑞亭和罗天华顺手抱着木桩的一端，领头"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十几个青年随着号子声，一齐用力将木桩对准教堂的大门撞去。刹那间，教堂的大门"哗啦"一声被撬开了，人流拥进了教堂。

启尔德和司蒂文孙双双跪在院里，像捣蒜一样地连连磕头，哀求饶命。王长水刚喊出："打死他！"就被朱瑞亭挡住了。

"咱们中国人是讲理的！只要他们把小三子交出来，就饶他一条狗



命!”朱瑞亭的话，得到大家的拥护。启尔德和司蒂文孙吓得连滚带爬地跑进内室，抬出来一只大箱子。他们战战兢兢地打开箱子，里面竟装的是骨瘦如柴的小三子。一个活蹦乱跳聪明伶俐的孩子，已经变成一个又聋又哑的呆子了。

当赫裴秋和启尔德被尤庚女挡在五世同堂街口，又聚拢那么多人围观，立即敏感到大事不妙，急忙窜回教堂先把小三子藏在箱子里，再吩咐他的三个助手到门口想办法阻挡群众冲进教堂，并交待他们在必要时可以鸣枪示威。布置停当以后，他就逃之夭夭了。

尤庚女一见小三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抱着他呼天号地地哭了起来，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

正当尤庚女抱着小三子痛哭的时候，驻扎在东大街的城守营游击向兹和华阳兼成都县知事黄道荣，同时接到总督刘秉璋传下来的确保教堂和外国人的安全，严惩袭击教堂的肇事祸首的命令。他们分别率领一队兵丁、皂隶，飞也似的赶来教堂。向兹指挥着兵丁、皂隶，挥舞棍棒皮鞭，驱散教堂内外的群众；黄道荣亲手把跪在朱瑞亭脚下的启尔德、司蒂文孙扶起来，连声赔礼道歉：“对不起，本官来迟一步，叫你们受惊了。”然后高喊：“抬轿侍候!”不一会儿，4乘官轿已经停在教堂门口，黄道荣和向兹毕恭毕敬地把这两个凶手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齐请上官轿，往县衙门抬去。

朱瑞亭、罗天华等被捆上了绳索，投进了科甲巷的大牢。伫立在教堂里的群众一个个气得浑身打战，紧握拳头，悲愤地喊道：“苍天啊，苍天!公理何在呀!”

四

四圣祠燃起的反帝怒火，不是屈膝媚外的清政府所能扑灭的。第二天，群众又自发聚集起来，先后捣毁玉沙街、正通顺街和陕西街教会诊所。很快又得到远近许多州县的响应，驱杀洋鬼子的揭帖、告白，遍布各地。六月起，嘉定（乐山）、叙府（宜宾）、保宁（南充）三府和新都、新津、眉山、彭山、邛崃、什邡、仁寿等十多个州县的群众蜂拥起来捣毁教堂，继而又蔓延到名山、雅安、灌县、阆中、大邑、冕宁等县，全川40所天主教堂、30所基督教堂先后被捣毁。

正当这股反帝的风暴席卷全川的时候，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上蹿下

跳，他就是帝国主义分子赫裴秋。他从成都溜出来以后，先蹿到重庆，顺江而下，经宜昌，过汉口，直抵上海。一路上，他诡秘地约集各地的传教士，密商拟定了一份意见书，到北京晋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去了。

盛夏的北京，火辣辣的太阳，烘烤得人们焦躁而又烦闷。坐落在京郊西山，幽闭于浓阴深处的田贝公使的别墅，与其说它是幽静的，倒不如说它是阴森的。田贝在别墅里接见了赫裴秋。

“受惊了！我们正殷切盼望你的到来！”

“您急于了解成都方面的详细情况吗？公使阁下！”

“不，不！您不是命令何忠义及时向我们汇报吗？四川方面的一切情况，国务院了如指掌。”

“国务院有什么指示？”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奥尔赖国务卿指示我们，要迅速拟定一个尽力使中国恢复理智的方案。恢复理智，我的理解就是恢复基督耶稣的本性。就是说，打了他的左脸，他自愿再把右脸伸过来让你打。”

“公使阁下，我一路上同各地教士们商定了一份意见书。您有兴趣过目吗？”

田贝接过赫裴秋的意见书翻了几页，露出不屑的微笑：“赫裴秋先生，你被大巴山的雾瘴遮住了眼睛，看不清甲午战争之后的大势了。”

赫裴秋不解地问：“阁下的意思是？”

“中日之战使中国完全失败之后，这个灾难把中国各阶层仇恨外国人的情绪都刺激起来了，因此单单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恶棍，对整个中国人来说，还不能发生恐吓的效果，更不能达到使他们恢复理智的目的。”

“阁下，我们还提出了惩办地方官吏。”

“小小的知州、知县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拿一些高级官吏来做榜样。”

“您是说要向四川总督问罪吗？”

“为了预防排外暴乱的再度发生，必须采用这种手段，虽然这个刘大人只是疏于防范而已。”

“您看应该给他们什么处罚呢？”

“依我看嘛，不单是革职而已，必须永不叙用，还要按照罪行的轻重，



依据中国的法律，科以死刑、徒刑、没收财产、流放或其它刑罚！”

“公使高见。还应当派一个调查团到四川去监督执行。”

“那是不言而喻的。哈哈哈！”

五

从7月到9月，美国国务院和驻华公使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政府展开了强权外交活动。首先向清廷发出照会，提出：承认美、英、法等国在四川的一切应有权利；惩办地方官吏和排外斗争的首领人物；撤掉刘秉璋的一切职务，永不叙用，充军边地，并将惩办的命令及原因在京报上发表；允许派调查团入川监督中国政府的执行等等。中国政府在派调查团问题上有小有争议。9月11日，美国副国务卿奥蒂在接见中国驻美公使杨儒时，威胁说：“美国认为中国的表现，纯系不友谊的表现，可能由此而引起美国采取保护美侨时解除美侨苦难的一切自由行动，后果概由中国方面负责。”

同时，美国又命令它的亚洲舰队的炮舰“彼特列尔”号和“迈齐业斯”号开进长江口，长驱直入，在上海和汉口之间，来回巡逻示威；又将刚下水的巡洋舰“奥林比亚”号调来中国沿海，虎视眈眈的炮口对准了水深火热中的神州大地。

9月15日，田贝气势汹汹地到中国总理衙门下“哀地美敦”书，说：“美国政府的一切要求，你们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必须立即作出明白的答复。”在美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威逼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了。9月19日，完全接受了美帝所提出的包括同意美帝派调查团入川的所有要挟条件。

9月29日，清廷发出谕旨，颠倒是非，自欺欺人，说：“……本年五月间，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毁东较场教堂，省城外各处，旋又屡出教案。该督刘秉璋督率无方，厥咎甚重，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其余办理不善之府道等官，著鹿传霖确切查明，分别参办。”10月14日，清廷又传下谕旨，将四川爆发过教案的府、州、县地方官吏，通通加上“办理不善”的罪名撤职查办。成都知府周承烈、华阳兼成都知县黄道荣和城守营游击向兹也“著撤去差使，交部议处”，他们为虎作伥，仍无一人幸免。

六

10月5日的夜晚，凄风苦雨中的天津，在“奥林比亚”巡洋舰上傲然昂视的大炮监视下，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馆内，灯红酒绿，管弦齐奏。佩带着校、尉军衔的海军军官和脱掉了黑色袈裟换上西装革履的传教士们，一个个拥抱着浓妆艳抹的金发女郎翩翩起舞。满面春风的田贝公使，挽着夫人滑腻的胳膊，向调查团的领队、驻天津领事汪道尔，赫裴秋教士和狄司特海军中校敬酒。

“尊敬的领事阁下，明天您就要率领由我们的海军军官和传教士组成的调查团，向四川进发了，祝你们为宣扬我们美国的国威马到成都而干杯！”

汪道尔和赫裴秋、狄司特同时举起酒杯说：“让我们为祝贺公使阁下运用铁腕取得的胜利干杯！”

田贝得意洋洋地说：“应该为大美利坚合众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干杯。”他首先一饮而尽，又接着说：“我还希望你们能深刻领会国务院为什么叫调查团从保定、太原、西安这条路入川呢？就是要叫那些腹心地带的大小官员们都知道我们美国的厉害。让他们明白，如果敢于对保护侨民之事稍有怠惰，以至酿成事端，我们一定会叫中国政府从严惩办，包括他们的将军、总督、巡抚，一概不予轻饶。”

第二天，调查团由军乐队作前导，吹吹打打地从天津出发。一路上摆不尽的威风，享不尽的款待。

强盗调查团耀武扬威向四川进发的同时，清廷命令成都将军恭寿和新任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成都的反帝爱国人民举起了屠刀。

10月底的上午，从科甲巷到落虹桥，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没有叹息，没有呻吟，没有哭泣，也没有眼泪。他们的心上像压着千斤磐石，喉管中像堵满了破棉败絮，挂满血汗丝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乌云滚翻的天空。

“咣，咣，咣，”一声声开道锣响，把每个人的血肉之躯都震得发战惊抖；“呜嘟嘟　　”一阵阵长号哀鸣，把每个人的五脏六腑都撕得绞疼滴血。啊！过来了，过来了！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过来了！敢于煞洋鬼子威风的人过来了！敢于为中国人出恶气的人过来了！一个、两个、三



个……整整24个好青年啊！走在最前头的是朱瑞亭、罗天华、王长水、李青山，他们一个个颈项上带着木枷，背上插着亡命幡，圆睁着喷火的双眼，拖着沉重的镣铐，迈着稳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刑场走去。镣铐声声像铁锤叩击人们的心扉，人们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向落虹桥聚集。

三声号炮烟火射向天，闷雷似的炮声震撼着大地，这是午时三刻已到的号炮。炮声响过，刽子手们战战兢兢、含着眼泪举起了屠刀。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罗天华仰天高呼，声裂行云。

“赶走洋鬼子！”朱瑞亭扭头对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最后的号召。

痛哭失声的群众，设酒祭奠的亲人，擦脸擦泪，发出了众口一声的怒吼：“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反洋灭教，保我河山”……

落虹桥畔的吼声似战鼓，如号角，像惊雷，响彻巴山蜀水的上空。它与为保卫台湾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喊出的“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交相呼应，震醒中华，威慑列强。



梦断洋场

记川剧首次赴上海演出

◎ 刘宗林口述　傅柏林整理

梨园百花争艳，
川剧盛况空前。
推陈出新春满园，
听取掌声一片。

梦断洋场十里，
魂归幽冥九泉。
悲号扼腕问苍天，
引来辛酸无限。

这首“西江月”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川剧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扶持下，百花争艳，春色满园，多次出省、出国演出，载誉而归的盛况，以及1935年首次出川到上海演出的得失情景。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有次，会见周企何师兄，言及川剧界同人正在奋发图强，为振兴川剧争作贡献，又勾起我对川剧首次到上海演出的回忆。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或许会对川剧界同人，特别是青年演员起到一点激励作用。

一

1935年，上海“百代”公司派人来川，在重庆邀请成、渝两地川剧名角“灌唱片”。当时参加录音的川剧名角及录制的剧目，有张德成、筱桐凤（即阳友鹤）的《别宫出征》；肖楷成的《淫恶报》《刀笔误》；天籁、薛艳秋的《长生殿》；魏香庭、筱桂芬的《情探》；贾培芝的《出棠邑》《逼霸》；曹俊臣的《林冲夜奔》；肖克琴的《三巧挂画》，等等。上海“胜利”公司又特邀唐广体、黄佩莲、白玉琼等人专程去上海录音，这在川剧



史上可算首开先例了。

唐广体在上海录音期间，一位在上海有“银耳大王”之称的川商，和唐商议，邀请“三庆会”师生到上海演出。条件优厚，工资比在川时提高两倍，供给往返旅费，包接包送。面对如此重酬，唐当即满口应允了下来，并签订了为期3个月的合同。

当时，“三庆会”会长康芷林病死重庆不久，“三庆会”戏班辗转于重庆、合川一带演出。唐广体回到重庆便召集全体师生开会，按照我们川剧艺人的行话，叫“坐公堂”。在会上，唐介绍了在上海订约的情况，一时群情激动，议论纷纷。大多数师生，特别是年轻人，感到川剧出川不仅是“三庆会”的荣誉，也可以借此将川剧介绍给外省，扩大影响，开拓眼界，名利双收，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因此，力主出川。但却遭到当时任正、副会长的肖楷成、贾培芝等一些老成持重者的反对。

肖楷成力排众议，说道：“唐广体，你想过没有？四川到上海几千里路，相隔好几省。‘三庆会’到重庆，演了6个月，就累死一个康芷林。他死在重庆，尸体倒还盘回了成都。你把我们弄到上海，要是死在那里，这坨肉不是臭在那里吗？”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

唐广体见“三庆会”的当家人首先反对，感到十分恼火，不得不赶紧解释，不外是名利双收之类的话。肖楷成见唐坚持己见，大多数师生也从旁怂恿，众意如此，不便强人意志，乃冷冷地说了一句：“好嘛，你们要去，我就不去。”

贾培芝、唐荫甫也表示说：“我还是不去。”

其实，肖、贾、唐等人不愿出川，实为全体师生切身利害着想。他们考虑到，要是到了上海，演出失败，东家悔约，回不了四川，几十个人流落异乡，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失败，受尽了磨难，出尽了“洋相”，拖了整整一年才勉强回到四川。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肖楷成、贾培芝几位老师的深谋远虑了。

至于唐广体，也有他的苦衷。唐不仅为当时名丑，誉满成、渝各地，并且为人老练，善于外交。“三庆会”出外演出，大多由他办理联系工作，减轻了师生们许多后顾之忧。因此，他在师生中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为自己办成的事应当受到支持。哪知道去上海这样一桩美事，眼看就要成泡影。一想到在上海时与人订了合同，签了字，划了押，那是“黄”不得

的。信誉不说，单是经济损失就无力赔偿。

唐心急如焚，气得捶胸顿足，极为气愤地说道："气死我！气死我！你们当会长的，只晓得绷老资格。外头你们不去联系，事情弄'归一'了，你们又不干，我还搞啥子喃！气死我，气死我！"话刚说完，一下晕倒在太师椅上。

唐广体身材肥胖，在此以前，每因有事争执不下，常猝然晕倒。因此，大家习以为常，劝了他几句，便东走一个，西走一个，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晚上十一点散会，直到凌晨一点过，唐一人仰卧在太师椅上，伴随他的是堂上的太子菩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更增添了几分凄凉气氛。这时，有几个人出来相劝。有的说："唐老师，天不早了，快回房休息，耽心着凉。"有的说："今天没有弄好，明天再商量嘛。"边说边伸手去扶。那知，一触身上，浑身冰凉，再一摸鼻孔，已经没有气了。大家手忙脚乱，等到把医生找来，一诊断，早已气绝，说是死于脑充血之类的病症。

唐广体死后，"三庆会"去上海之事，就此冷了好几个月。

"三庆会"去上海一事，被重庆的几个资本家知道了。他们认为有利可图，是一个淘金的好机会。于是乘虚而入，邀约了成、渝两地的川剧名角，加上场面及其他人等共八十余人，组织了一个赴上海演出的班子，并美其名曰："成渝旅行促进社"。在成、渝两地定制了全套行装，并派人去上海联系，准备即时出发。

这些资本家邀约川剧艺人去上海的目的，除了做做淘金梦，想发一笔横财外，还想借机挖垮"三庆"会。因"三庆会"的师生，除肖楷成、贾培芝、唐荫甫、黄开文等十余人决意不去，傅三乾也因年事高没有去外，大多数人都加入了这个促进社，"三庆会"立即面临解体的危险。

这时留在成都的"永庆乐"班（"三庆会"的一个分支），以周企何、周慕莲为首，重建"三庆会"，欢迎肖楷成、贾培芝回成都主持会务。资本家妄图挖"三庆会"的阴谋没有如愿，"三庆会"又经历了一次考验。

二

1936 年农历六月，成渝旅行促进社一行八十余人，分乘法国商船"福源"和民生公司"民贵"两轮离开重庆去上海。当时去上海的名角有张少



华、姜尚峰、白玉琼、薛艳秋、杨云凤等。我当时在成都“新又新”搭班，经白玉琼邀约，也一同去上海。轮船驶出三峡，天宽江阔，师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经过5个昼夜1个早晨，终于抵达上海，早有人接至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栋楼房住下。设备倒也不差，一楼一底，不仅可容一百余人住宿，且水电设备齐全（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了），几个月来的不安，现在好像吃了一碗定心汤元。

师生们首次出川，初到上海，面对这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禁眼花缭乱。在上海休息了几天，定在“新光大舞台”正式演出。园东事先大事宣传，剧场门外红绿霓虹灯广告闪烁不息，倒也异常热闹。

开戏的头天晚上演出了《灵官镇台》《大贺戏》《尚书问婿》《醉打山门》《御园小宴》《三祭江》《黄沙渡》七个折子戏。观众进场以后，鼓师喻绍武袖子一挽，鼓签子用力一点，一时鼓锣齐鸣，好不热闹。因为是开台戏，场面越打越起劲，锣鼓声震动整个剧场。哪知一把粉撒在后颈窝，台下都喧哗了起来。原来下江人听戏，听惯了小锣沪鼓，面对川剧的这种大鼓大锣，许多观众不禁皱眉苦脸，有些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胆小的年轻女人，竟倒在身边的男人身上，显出一副既怪又怕的神色。这些效果，是师生们绝不可能料及的。

场内好不容易静了下来。头两折戏倒还顺利，第三折卢草庭和张少华的《尚书问婿》，因为是高腔，场面上一帮腔，一齐呐喊，又加上都是男角帮腔，观众们不明原因，以为后台发生争吵，大家纷纷站起来，偏着身子往场面上观望，互相询问：“啥事体?”一时秩序混乱。当时在场看戏的人中，有不少四川人，或云、贵、湖北各省的观众，熟悉川剧的内容，他们出面作义务宣传，解释帮腔是川剧的一种演唱形式，才使场内安静了下来。当晚演出的剧目中，只有赵瞎子的《醉打山门》，是南北相通的昆腔，效果较好。

开戏的第一天就不利，以后的后果是可以料及的。观众一天比一天少，再好也不过七成座。当时在上海的京剧名演员梅兰芳，亲到剧场，一来观摩，二来助威，并到后台和师生们见面，道乏致意，但也收效不大。梅博士的招牌也没有扭转演出的厄运。

就这样苦拖硬演，混了一个多月。但由于收入少，开支大，后来连园

租费、宣传费都负担不起了，继续演下去已无法维持，最后，托梅兰芳出面说情，园东才同意解除合同，停止了演出。

几个东家仍不死心，经过奔走，又在一家大商场的屋顶花园上，订了一个只能坐六七百人的小剧场演出，但仅够开支和糊口而已。就这样，又拖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落个收刀拆卦的下场。

东家到上海的一场淘金美梦，就此云散烟消。

三

戏一停演，“促进社”的师生们就惨了！

初来上海之时，一日三餐，虽不说酒醉饭饱，但总不至于饿肚皮。日子一久，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菜食逐渐减少，倒也不在话下，干饭变成稀饭，三餐改为两顿。停演后不几天，连伙食也干脆不开了。

这时，东家东走一个西躲一个，不知住在哪家饭店？藏在何处公寓？问既问不到，找也找不着，师生们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

离开重庆之前，东家曾对师生言明，预支一月包银。临走时，就有人提出向东家要钱，被他几句花言巧语骗过去。东家向师生们解释说：“四川的钞票在上海用不脱，上海用的是‘申卷’，钱都给你们汇去了，到上海就发现钞。上海的印度白大绸才一角多钱一尺，比四川的土布还便宜，到上海大家好制新衣服。”这样，轻信的人只带了一身换洗衣物，老成一点的人虽多带了几样夹衣夹裤，也不过仅够自身换用。

这时，已近深秋，天气一天天凉了起来。面对着眼前的饥饿和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威胁，只好仰天长叹，听天由命了。

事情还不只此。一天，几个短打扮的工人模样的人，不声不响地走进住地，挽起袖子，二话不说，咔嚓、咔嚓，几钳子剪断了电源线，拆下了水龙头，封闭了水表，一扭头走了出去。究其原因，原来是没有交付水电费。这样看来，还不知哪一天要被逐出门外，倒卧街头。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心头慌。师生们几天来都是东一顿、西一餐地糊糊口，没有吃过饱饭。身在千里异乡，举目无亲，求亲无路，告贷无门，身无余物，腰无半文，望着室外灯红酒绿、豪喝痛饮，顾影自怜，真不知哪一天要成路边的冻尸饿殍了。



晚上，大家睡在床上，思绪万千，饥肠辘辘，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竟有那些乐观的人做起打油诗来。记得其中的几首是这样的：

其一：成渝旅行促进社，
东家心肠比炭黑。
只顾你的包包满，
害得老子好造孽。

其二：喝碗凉水当晌午，
老子要笑也不哭。
报纸当作被子盖，
席子就是肋巴骨。

“报纸当作被子盖”，这句话在川剧界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去上海，盖的是报纸，总算开了‘洋荤’了。”

为了不致饿死异乡，大家只好各安生理，自找出路。能当的当了，能卖的卖了，混一日是一日，过一顿算一顿，谁也不知将来怎样收场，是个什么结果。当完、卖完了，只好四处当小工，有的甚至上街头卖打药，跑“老海”。如唱小花脸的蓝吉元，不知哪里弄来些什么药粉，用纸一包，就在租界的街头上，脱了衣裳，露出赤膊，拉开架势，打了几套拳术，然后扯开嗓子宣传，什么“祖传秘方，专治风湿麻木”。但由于他说的四川话，音重语快，围观的人听了半天也莫名其妙。有人怀疑他是精神失常，报告了租界巡捕，押进捕房关了两天。后来查清楚他是四川到上海唱戏的，才把他放了出来。说也可怜，虽然关押了两天，身不自由，但毕竟混了两天伙食，比在外面“强”多了。

我到上海时，只带了一套换洗衣物。这些东西，不要说卖，就是送人也不见得有人要，因为实在太旧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找白玉琼老师求助，谁知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出于关心，他给了我一件上衣。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变成钱。于是，我走进一家当铺内，把衣裳往高柜台上一抛，刚抛上去，就被丢了下来。我以为帐房先生失手，再次把衣服丢了上去，又被甩了下来。就这样，我往上头丢，他往下头甩。最后帐房先生站起身子，伸出头来，指手画脚，嘴里叽哩咕噜地说了些听不懂的上海话。看脸色，是嫌衣服太旧，也许还夹杂些什么骂人的下流语，反正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走出当铺大门，一时打不起主意。后来一想不如去卖，但又找不到卖旧货的地方。这时，灵机一动，随手在地上拣了根谷草，挽了个圈圈，插在衣服上。我提起衣服，一路走，一路注意有没有买主。哪知这种在四川卖东西的方式，在这里吃不开，无人问津。正在燥闷之际，迎面走来一位“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手提一根“猫棒”，走到我面前，红不说，白不说，拦腰就给我两棒。我边躲边跑，仔细一看，才明白是糊里糊涂走进了英租界。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连走路的权利都没有，那是什么样的世道啊！

衣服当不了、卖不脱，腹中饥饿难忍，不知不觉走到一家大餐馆门外，闻着那些扑鼻的菜香，更增添了几分饿意。但，不要说腰无分文，就是有几个钱，像我这样一身打扮，一到餐馆大门就会被轰出来。

我在餐馆门外一边徘徊，一边叹气，也在暗打吃饭的主意。这时，只见从餐馆一前一后出来四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一个穿西装的人已经走下台阶，后面三个人却站在餐馆门口交谈着什么。走在前面穿西装的人，向那三个人喊了一声：“李主任快走啊！”

我猛一惊，喜出望外，原来是四川口音，啊，他乡遇故人了！这时，我思潮起伏，矛盾重重。本想上前哀怜求讨，但不知哪位是李主任，主要是想：一求讨，岂不成了“伸手大将军”了么！

但是，转而一想，眼前的事也顾不得许多了。伍子胥落难时，尚且只箫求食；韩信不得第之时，他曾乞食于漂母。我一个唱戏之人，流落异乡，还绷的什么面子。于是，心一横，走上前去，对着那四人冒叫了一声：“李主任。”

这时，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立时站住，带着微笑和诧异的目光问了我一声：“啊！你是四川人咧。”

我赶忙声明：“我是四川人，到上海来演出，是唱川戏的……”

不等我说完，这位李主任把头点了两点，表情倒也和善，“哦！我晓得了。”边说边拉开皮包的拉链，随手给了我一张五元钱的“申卷”。旁边一位穿西服的人，也摸了十多个毫子（硬币）。我赶紧双手接住，李主任立即补充说：“这位是王经理。”

我操着刚学会的一句夹生的上海话连声致谢：“阿拉夏夏侬。”（我谢谢你）



我拿到这五块多钱，其高兴的程度，无异于《花子拾金》。一时精神也来了，走过一个小摊，摸了几个零钱，买了两块油糕，拿在嘴边正要下口。这时，迎面闯来五个不速之客，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走至我身边，操着上海话，示意我举起手来。我误以为是搜查什么违禁物品的暗探，一只手拿着油糕，一边解释："没有啥！没有啥！"几个人在我身上摸了一遍，时间不过三五秒钟，便嬉笑着扬长而去。等我回过神来，身上一摸，五块钱和十多个毫子全部被搜走，只剩下手中两块还未来得及吃的油糕。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遭遇。当时出过"洋相"的人确也不少，这里不尽述了。

四

一天上午，一个姓卢的资本家来到住地，大家喜出望外，以为是解决问题来了。哪知他来的目的，是想把戏装运走。大家一见此情景，几天来的怨气一齐迸发了出来，一拥而上，围住了衣箱，七嘴八舌地闹开了。有的说："你们把我们弄到上海，演不能演，走不能走，现在还想把衣箱盘起走，莫得那么简单，今天不说清楚，你也走不脱。"有的说："你今天不解决问题，我们把衣箱拿去卖给京剧班，梨园子弟是一家，人家一定会帮忙，卖了钱大家好回四川。"

赵瞎子指着卢某的脸说："卢经理，你的心也太黑了，你把我们弄到上海，现在想撒手不管，今天不说清楚，你是走不脱的。"

卢见群情激奋，还强词夺理地说："我的钱（指股金）是拿出来了的，他们没有拿，有我啥子相干？"边说边上了黄包车，准备一溜了事。

这时，唱老旦的苏福三，颤糠糠地上前一把拉住车子，一面哀求："卢经理，你走不得呀！你走了，我们不得了呀！"卢不顾大家的阻拦，吩咐拉车的快走，苏福三两手死死拉住车把不放。到底是上年纪的人，三拖两拽，没有拉车人的力大，一跤跌倒在地，就此一病不起，后来病死在途中了。

赵瞎子见苏福三摔倒，一下跳到车上，面对大家说道："他今天不解决问题，我们大家就不放他走。我赵瞎子向大家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我们七行的当家人（指生、旦、净、末、丑的主角）千万要齐心。我们这些人

要走还不困难」要是一走，丢下几十号‘下四角’（次要演员的俗称）怎么办？在四川讨口还要得到饭嘛。在上海要饭，语言不通，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有我们七行的当家人在，还可以慢慢想办法嘛。”

卢见众怒难犯，一时慌了手脚。走，走不脱，又不愿解决问题。这时，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卢经理，你只要把我们送到汉口，沿途我们演戏作盘缠回去。”

卢思考了几分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一来花费不大，二来戏装和班子拖回四川，以后还能再来捞本。于是，胸口一拍：“好！三天答复。”

这次倒还“守信”。第三天姓卢的果然来了，解决的办法不过是“用唱戏人骨头熬唱戏人的油”。

原来，他和上海一家唱片公司又达成一笔交易，要大家灌 20 张唱片，每张两百元，一共就有 4000 元。一半分给大家做路上的伙食零用，一半用来买到汉口的船票。大家想到只要能够回川，也就不顾其他了。

临走前，爱多亚路“陶乐春”饭店的一个四川资本家，见大家衣着褴褛，送了几十套白号衣（饭店招待人员穿的工作服），一色白斜纹长衫，上面还印有号码。大家穿上这清一色的白衣，愧然如送丧队伍！

1936 年秋，经过两个多月磨难，全体师生终于乘“沙市”轮离开上海去汉口。

到了汉口，倒还顺利，一连演了 7 天，沿途的开支总算凑够了，于是又乘船前往宜昌。

在宜昌演了几天，准备回四川。那知由于长江水枯，客轮进不了三峡，要等明年水涨季节，才能通航。事出意外，急也无法。就这样，只好在宜昌、沙市一带演出，直到 1937 年的夏初，才经万县回到重庆。老旦苏福三、打小锣的洪明发，先后病死途中。

满怀希望到上海淘金的“成渝旅行促进社”，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周折，回到了重庆，真可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



玄奘灵骨的纠葛

◎ 王治平

在成都文殊院内，玄奘法师的顶骨，被作为佛门圣物珍藏着。别看它只有一片指甲那么大，在这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纠葛，直到1958年，才由文殊院收藏。

玄奘本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就出家为僧。他的二哥陈素，也是一个和尚，法名专捷。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他们兄弟二人一同来成都听道基、宝暹二法师讲经。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他在成都受戒。在这三年研究佛教经典的过程中，他深感汉文佛经译得不全，决心到天竺（印度）取经。当时，朝廷和突厥有边境之难，规定私人暂时禁止出境。途中虽不像《西游记》所说的遇到那样多的妖魔鬼怪阻拦，但所经历的艰难险阻，若不是有很大勇气和魄力，那是无法克服的。他为了学习印度文化，在印度住了14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印度摩羯陀国那烂陀寺留学的6年，学习了当时在印度已濒临绝灭的学术巨著《瑜伽师地论》，最后并把这部一百卷的巨著介绍到中国来。玄奘在印度曾辩论战胜了当时96家学派的著名论师，博得印度人对他的最高崇敬。印度最大的国家（那时印度分为18个国家），摩羯陀国的戒日王，和另外一个国王鸠摩罗王，陪伴着他骑在大象背上，周游全印度，以示光荣。在他经过的地方，妇女们跪在路旁，把头发铺在地上，让他们所骑的大象从上面踩过，表示对他的崇敬。他回中国时，戒日王派兵护送，把他所取得的经卷，驮在象背上运回中国；并派外交使节，到中国来递交国书。唐太宗李世民也派使节到印度回访。直到今天，印度还悬挂玄奘像来纪念他。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至今还是研究印度中古史的必读之书。他回国后，唐太宗见他以一个和尚身份竟在印度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非常尊敬他，特地为他在长安（今西安）修建大慈恩寺，让他住在里面，翻

译他从印度取回的经典。死后，他的遗骨保存在大慈恩寺内，被后人作为珍贵的纪念品珍藏着。

传说北宋靖康年间，金朝起兵攻打宋朝，把皇帝徽宗、钦宗父子二人俘虏走了。九皇子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此时，天下大乱，北方人纷纷逃到南方。长安慈恩寺的和尚，也捧着世代珍藏的至宝　　“玄奘法师灵骨”跑到南方，安放在杭州灵隐寺内供养。

这个灵骨在灵隐寺内安放了几百年。到了明朝，朱元璋得了江山，建都应天府（南京）。那时，有个会看坟地的“堪舆家”（俗称阴阳），向朱元璋建议说，雨花台的龙脉风水很好，如果陛下在雨花台上建造一座宝塔，可保大明江山万年不衰。朱元璋听信了这个话，马上命令建塔，并且按照佛教建造宝塔一定要在塔下放菩萨或高僧的灵骨“舍利”的习俗，把玄奘法师灵骨，从杭州迎请到南京，埋在雨花台的宝塔下面。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清朝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南京，清军又杀回南京。在战火纷飞当中，雨花台的宝塔被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玄奘灵骨的下落。其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雨花台修筑工事，有一个日本军官稻田大佐，发现从雨花台地下挖出的一个石匣，长约二尺，宽约一尺，三寸多厚，四周刻有花纹，上面刻有“玄奘法师灵骨”几个字。稻田又惊又喜，马上呈报上司，随即由专人送回日本珍藏。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南京，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和反对。汪伪政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派白隆平到日本去办交涉。白到了日本，谒见日本外相重光葵，申明要取回这个石匣。重光葵专横强辩说：“中、日两国本是一家，无分彼此，放在日本和放在中国是一样的，又何必一定要取回去呢？何况日本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这个骨匣我们供养得很好，就不必取回去了！”白隆平再三交涉，重光葵勉强答应将匣内灵骨分为两份，一份留日本，一份交白隆平带回中国。不料在分取灵骨时，日本官吏只准白取3块灵骨，不准多拿，白只好带了3块灵骨回来。

抗日战争胜利，汪伪政权垮台，这三块玄奘法师的灵骨，由北京的巨赞法师迎请了一块到北京建塔供养；广东的虚云老和尚迎请了一块到广东曹溪南华寺建塔供养。还有一块顶骨，由能海法师迎请进川，准备重修彭县隆兴寺残存的古塔，把它放在里面供养，但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完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海法师被中国佛教协会请到北京任职，建塔的事也停了下来。于是这块灵骨就被存放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会址大圣慈寺内。1958年后，这块顶骨才转放到文殊院中。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垮台多年，中、日两国人民又缔结了新的友谊。离开了祖国一千多年的鉴真和尚，又从日本“回国探亲”。这同当年日本军阀掠夺玄奘法师灵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必将由两国人民培育得绚丽多姿，光彩夺目。



藏经楼上的秘密

◎ 李金彝

清代道光年间，一个秋天的下午，成都鼓楼北街一带，人往人来。忽然远处传来了几下“道锣”声，接着一乘官轿，在一些官丁衙役护拥之下，朝着这个方向走来。轿里坐着一位翎顶辉煌的官员，大约五十上下年纪，他就是手握重兵、威镇全川的提督。忽然，他那炯炯目光，停留在夹在人群中的一个僧衣破旧、手提竹篮的老和尚身上。提督大人将这老和尚仔细打量一番之后，马上叫道：

“来人哪！”

轿子一停，一个身佩腰刀的侍卫，立即赶往轿前，躬身问道：

“大人有何吩咐？”

提督轻声地向他说了一句，这位侍卫立即走向手提竹篮的老和尚那里，谈了两句话，便转来复命：

“禀大人，是文殊院的。”

提督毫不犹豫地说：“转道文殊院！”

“是！”

当传令的来到文殊院的时候，全院僧众大吃一惊。特别是方丈，心头更是七上八下，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他勉强镇定心神，吩咐全院大小和尚赶快披上袈裟，来到文殊院门口，排成两行，躬身合掌地来迎接这位大人。

大轿一到，即由方丈领路，带到客堂坐下。献茶之后，方丈上前两步，躬身合掌问道：“大人驾临小院，不知有何训示？”

这位大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请方丈通知全院僧众，请他们一齐出来，我想见见他们。”

文殊院的和尚，这时袈裟还未脱下，听说要集合，便一齐来到客堂，





在屋檐下边一字排着，低头合掌，听候吩咐。这时方丈合掌道：

“禀大人，全院僧众已经到齐。”

这位大人一抬头，把僧众逐一扫视一遍，随即问方丈：

“人未到齐吧！”

方丈赶快进言：

“禀大人，全院僧众就只有这些了！”

这位提督大人稍一沉吟之后，便回头对站在身后的侍卫说：

“你到全院查看一遍，看有无遗漏！”

“嗻！”

不一会，侍卫转来回话：

“禀大人，厨房里还有一个和尚在烧火煮饭！”

“他？”

“回大人，就是他！”

“叫他来一下！”

“是！”

这位烧火的和尚来到客堂，排在最后一个位置上，躬身施礼说道：

“小僧参见大人。”

这位赫赫官威的提督，一边说“免了”，一边又仔细打量这位烧火的师傅几眼，回头对侍卫说了两句，侍卫就立即告诉方丈：

“大人今晚要在院内藏经楼上借宿，请方丈马上派人打扫！”

“是！”方丈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突然集合？为什么要清查人数？为什么要住在藏经楼上？一连串的问题，使方丈心头的疑云越积越厚。他一面安排众僧扫楼一面想，今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该怎么应付。以至小沙弥来问他挂不挂蚊帐，他都没有听见。等到诸事已毕，提督已经上楼了，他才稍稍定下心来。今天总算没出事，但明天会不会出什么事情，确实有点蹊跷！到底是吉是凶，还很难判断……突然，刚才那位侍卫又来传叫他：

“大人有令，叫烧火大师傅楼上答话！”

“是！是！”

方丈答应得很快，疑问就越多。他想：我是方丈，是一院之主，有事为什么不找我，偏偏要去找他！何况这个和尚，性情执拗，我说过他多

次，他会不会在大人面前，去奏我一本！当他把烧火师傅引到藏经楼下的时候，只见警卫森严，站有许多兵丁，一律佩带腰刀，好像戒严的样子，不由暗吃一惊。他把烧火师傅交给那位侍卫后，轻轻地退了出来。一路走，一路想，用一个什么办法，来打听一下这件事情的内幕？从正面去是不行的，刀光剑影，何等吓人；从经楼两边去，怎奈又有人把守；经楼后面，到是一块空地，可是楼太高，恐怕听不见，但又别无办法，也就只好去试一试了！

九月的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深夜古寺显得格外静寂。除了藏经楼上的窗口还可以看到一点灯光外，到处都是黑沉沉的。这位方丈，是一院之主，平时随意在院内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何曾尝到过今晚这个每走一步都得环顾一下，害怕被人家瞧见的滋味。他从后面来到藏经楼下，倾耳细听，可是楼太高，楼上说话声太小，简直听不清楚，有时偶然听到一两句，什么“旋头风吹得紧啊”、什么“黑狗黄狗”之类的话，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有时又听见一两句“阿弥陀佛”这类佛门语言，使他更加惶惑不解。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楼上人哭起来了！他马上心里一震，是在告我的状么？但仔细一听，又好像是两人都在哭。他想：这就怪了！这位提督大人富贵荣华，样样占齐，还有什么值得哭的？道理还未想通，哭声霎时收住。他想，收得好快喃，怎么一下子就刹住了？抬头望望楼上，灯火依旧，一点异样的情景都没有。忽然楼上人又笑起来了！笑声跟哭声一样，也是一来就刹住，和一般人的哭笑大不相同。方丈带着一脑袋疑问离开了那里，不仅没有窃听到这件事的内幕，反而使他心头的疑虑越来越多。

第二早晨，这位提督大人临行之前，又召见方丈，除了几句例行的官腔外，并没有说什么。态度是那样温和，举止又是那样安详，好像昨晚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送走这位提督之后，方丈心中仍在盘桓：把烧火的师傅找来问一下，不是就可以找到一点线索么？于是就派人去把这位烧火师傅请来进行试探：

“你和大人原来认识么？”

“不认识。”

“他找你是为了要了解我院的情况么？”





“不是，是问问我的情况。”

方丈问不到要领，心里有点不耐烦了。他很想单刀直入地问他一句：“你们笑什么？哭什么？”但害怕露出马脚，提督大人追究起窃听罪来，岂不惹火烧身？于是，他只好旁敲侧击地再问一句：

“大人对我院有什么责备吗？”

“没有听见大人说过。”

这一下，他心头有点底了。管你笑也好，哭也好，只要不抓我的漏眼就好。

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那位提督大人带着几名随身的侍卫，又来到文殊院，单独和方丈进行了一次谈话：

“文殊院已经如此破旧，怎么不重新培建？”

“小院经济困难，所以不敢动工。”

“老方丈年事已高，何不传给下一代，也可稍事休息？”

“久有此心，奈无适当人选。”

“我替你推荐一位如何？”

“那很好，谢谢大人，但不知是哪一位？”

“你院的那位烧火师傅如何？”

方丈不听则已，一听却暗吃一惊。他想：折腾了半天，原来就为这事呀！但在这位声威赫赫的提督面前，却又不敢说半个不字。于是他只好委婉地说：

“啊！本圆么，人倒很好，只是资历太浅，恐怕难以服众。”

“这没关系，只要老方丈向僧众特别推荐一下就行。至于培建寺院的一切开支，由我全部承担。我本人自愿捐献白银一千两，不足之数，由我代募。老方丈可以不必操心，今后就坐享清福吧！”

方丈一听，虽然觉得事出意外，但听见这样的安排，不论对寺院还是对自己说来，都是有利的，所以就顺水推舟地说：

“大人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捐献巨款，定当石柱刻名。至于推荐本圆的事，那就按照大人旨意办理好了。不过方丈继任，小院的传统戒规是‘三鼓传法’，不知大人届时可愿动驾？”

“一定来参加盛典！”

到了“传法”的那天晚上，说法堂上灯火通明。本院僧众穿着整齐，

依次就座。那位提督也准时到来。老方丈心头有数，和尚们却是摸不着头脑。他们想：为什么提督大人半夜三更来看我们传法？尽管满腹疑云却又不敢交头接耳。

老方丈击鼓三下之后，传法的仪式开始了。使和尚们更加吃惊的是继承衣钵的新方丈，不是百分之百的众望所归的大师兄，而是意想不到的一向担任烧火煮饭的本圆和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看老方丈和本圆，在传法的过程中，表情都很严肃。特别是本圆，态度非常安详。他们想：一个烧火的和尚，在这样大的场合中，在翎顶辉煌的提督大人面前，居然不惊不诧，真是有两下子。但为什么不传给大师兄而要传给他，所有的和尚都百思不得其解。

等到仪式一完，把提督大人送走之后，和尚们立即围着方丈，七嘴八舌地问道：

“怎么要传给本圆？”

“大师兄不是资格很够么？”

老方丈只好解释：“本圆是个人才，可惜我们过去没有发现他。他今后担任方丈，一定会弘扬佛法的。”

这些话不仅没有把众和尚说通，连老方丈心里也始终存在一个疙瘩，想把它打开而又无法打开。还是到了本圆方丈圆寂、提督病故之后，才从那位提督的家属那里，打听到一些消息，弄清了这件事情的秘密。

原来这位烧火的师傅，本来的姓名叫王三槐。因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官府残酷剥削，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王三槐是义军首领。他在川北一带活动，对抗清廷。后来寡不敌众，退守山寨，山寨又被包围。王三槐在一个风冷月黑的晚上突围跑了出来。为避免清廷的捕捉，先在西充蟒禅寺削发为僧，法号四圆。后来又转到成都文殊院来。因为只是个普通和尚，所以担负了一些扫地煮饭的工作。这位提督又叫罗思举，当年在义军中是王三槐部下的一名士兵，不过他们两人关系很好，情同手足。当山寨被攻破之时，罗思举就成了清廷的俘虏，被编在新兵营当兵。他后来逐步升迁，最后升到四川提督。尽管他官高禄厚，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王三槐。他明知被杀的王三槐是假的，所以长期以来，四处打听，但都无着落。那天，他突然在鼓楼北街看见了王三槐，又是穿的破旧僧衣，马上派人去问，知道王三槐在文殊院出家，便立即到文



殊院去找他。找到王三槐之后，约他在藏经楼上会面。为了不泄露秘密，所以藏经楼下戒备森严。开始他们说的是在抗清斗争中的暗语，所以方丈听不懂。当罗思举告诉他，当年起义弟兄遭到清军屠杀的惨状时，王三槐不禁痛哭失声，罗思举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跟着哭起来，所以方丈听到的是两个人的哭声。但他们都很机警，一哭就收住了，所以把方丈弄得莫明其妙。后来罗思举又告诉他，清军为了谎报战功，说把王三槐抓住了，并且就地正法，还领了一笔奖金呢！王三槐听了，不禁破口一笑。所以方丈听到哭之后，接着又听到笑声。当他们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罗思举又关切地问：

“大哥今后作何打算？”

“起义军未成大事，全军瓦解，弟兄们遭到残杀，还有什么说的！今后决计遁迹空门，了此一生，决不为清廷出力。石烂海枯，此志不灭。这就是我的肺腑之言了。”

罗思举听完双手一拱，极端诚敬地说：

“大哥心迹，小弟深知。今后一定按照大哥的意愿，作好安排。不过这种黄卷青灯的生活也很难排遣哀思，一切望大哥保重。”

王三槐也双手一拱地说：

“好！老弟保重，为兄今晚就告辞了！”

这些从侧面打听到的消息，就是那天晚上的实况。后来还有一位不知名的词人，写了一首《西江月》来述说这件事情：

长夜青灯古寺，难抒幽恨重重。连年苦斗竟成空，谁知老僧隐痛？
不意街头巧遇，那堪经楼重逢，凄凉往事泣残红，纵有雄心何用？

自从本圆担任文殊院方丈以后，文殊院便大兴土木，一座陈旧的寺院，变得焕然一新。特别是后殿的一排通天石柱，把这座庙宇装饰得更加庄严宏伟。石柱的上端，刻有一些捐款人的姓名。前排右边的石柱上，还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刻有“罗思举”三个字的痕迹，这就是老方丈说的“定当石柱刻名”的证明。要是你遇到文殊院在大殿挂出历代祖师画像时，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有一幅浓眉虎目的祖师，便是清廷想杀而没有办到、后来却由一个烧火师傅一变而为继承方丈衣钵的王三槐。

冯汉骥与王建墓的发掘

◎ 马文彬

古往今来，人世间多少事，往往人云亦云，光怪陆离。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历史真相被湮没。在成都西郊三洞桥西北不到三百米处，有一矗立的小山丘——王建墓，就曾有过各种传说，引起历代许多人的好奇和猜疑。有人说它是西汉司马相如的“抚琴台”，有人说是三国蜀汉诸葛亮的“抚琴台”。究竟是什么，直至抗战期间，20世纪40年代初，才拨开迷雾，始见历史的真相。

1940年秋天，原天成铁路局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所谓“加强防空设施”的号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选择了人称“抚琴台”的这一“理想”之地，安排了一些民工在此挖防空洞。工程进行数日，竟被几块巨大的石条所阻。于是敏感的人们才仿佛察觉小山丘像是墓葬之类的东西，工程当然暂时停止。当时正值筹备四川博物馆，冯汉骥先生被荐为筹备处主任。

冯汉骥，字伯良，湖北宜昌人，生于1899年。冯先生早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念书时，就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老师介绍到福建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由于冯先生工作勤奋，于1924年升任主任。这时，恰好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两人交往甚密。冯先生还亲自为鲁迅先生在图书馆安置寝室。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冯先生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31年夏，冯先生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深造，又特别向布朗和斯派塞尔两教授学习亚洲考古知识。由于冯先生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1936年夏，获得人类学、哲学的博士学位。

时至抗日战争前夕，冯先生怀着报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毅然抛弃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灿烂前程，从欧洲绕道回国。事前，冯先生也曾收到



原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邀请信。当时兵荒马乱，冯先生历尽艰辛，从香港经广州到达武汉。谁知中央博物院已内迁，留守处有关人员打着官腔对冯先生宣称，事已如此，无法作人事安排。冯先生满腔热忱，报国无门。正当他进退两难、心情极度苦闷时，竟意外地受到四川大学的聘请。于是，冯先生在1937年11月来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加之冯先生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后代理该系主任。

冯先生听到“抚琴台”的发现后，立即奔赴工地，察看现场。经过仔细观察，他估计是古墓葬。抗战期间，西南偏安一隅，各界文化人士在成、渝两地云集。四川博物馆又初酝建立。这一重要发现，使冯先生兴奋异常。但是，冯先生在兴奋之余不免又忧心忡忡。在那个时期，要发掘一个较大规模的古墓葬，真是谈何容易！且不说各方面的干扰，单就发掘所需要的经费从何而来？这位驰名西南的学者，只好可怜巴巴地去找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请求援助。还好，郭有守先生是个较有民族自尊心和对文物考古有极大兴趣的人。几经交涉，终于达成协议，用教育经费来资助“抚琴台”的发掘工作。冯先生喜出望外，随即便组织好发掘班子，由冯先生亲自主持，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郑伯昆、林默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的刘绍和、刘复章等人。1941年11月正式开始发掘。

当发掘工作刚进行不久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以人称“吴边花”为首的一群地痞流氓，怀着挖金夺宝发横财的心理，趁机生事。他们借口挖墓没有施工执照，也没有向乡公所和他们打招呼，便挥舞着几支破枪，耀武扬威肆意捣乱。性情耿直的刘绍和上前申辩几句，竟被他们抓住殴打。一向息事宁人的郑伯昆上前劝阻说：“诸位，我们是通过了教育厅的，是有手续的。至于执照吗，马上派人去取来，好说好商量嘛，还是化干戈为玉帛才好……”一个流氓横不讲理地吼道：“啥子干锅魁湿锅魁，老子认不到那么多！你们几爷子想到我们兄弟伙的码头上来挖金娃娃，没得那么安逸的事，滚，滚！”不由分说地将刘绍和强抓去乡公所。吴边花还扬言：不准放跑一个！郑伯昆和林默均二人气得目瞪口呆，在围观的好心人的掩护下连忙逃走。冯先生刚好有事又不在场，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刘复章连忙赶去报告冯先生。这真是学者遇“烂眼”，清水要搅浑。一时间，

成都西门谣言四起，说什么有人在抚琴台挖金娃娃，还有高鼻子外国人来参加盗宝（动工前，曾请华大一名叫苏立文的英国人来搞过测绘，故而产生此说）。为此，国民党警察局如临大敌，出动大批军警，遍布抚琴台四周，缉拿所谓逃犯。

冯先生闻讯后大怒，他一反学者风度，在屋内烦躁地来回踱步，嘴里反复念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忠厚善良的刘复章一想到还关押在乡公所受难的刘绍和时，忍不住伤心地落下泪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冯先生才冷静下来，决定马上去见郭有守，要求他出面干预，并提出条件：一，立即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刘绍和；二，必须重申并给予发掘的权力。经过冯先生多方奔走和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声援，也由于郭有守先生的努力，最后通过省高等法院和警察局出面，受尽凌辱的刘绍和才被释放出来。而肆意制造事端，掀起轩然大波的一伙地头蛇却安然无恙。由于这次干扰，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近一年之久。

直至1942年9月，在冯先生的邀请下，南京中央博物院历史考察团的吴金鼎、王振铎、王文林先生和前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淳等先生，参加再次发掘。冯先生也亲自上阵，和诸位先生齐心合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历近一年的时间，整个发掘工作才胜利完成。通过发掘清理，才发现小山丘乃是一座豪华的古代帝王陵墓。出土的文物有：玉大带、谥宝、玉册、铁猪、铁牛以及金银等物。经过专家考证，最后确定它是五代前蜀高祖皇帝王建的陵墓。历代相传什么司马相如、诸葛亮的琴台等说，纯属误传。王建墓室早年曾被盗过，若不是冯汉骥等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这千年古墓可能还湮没在荒草乱土之中，千年文物仍有继续落入盗墓者手中的可能。事后，国民党要员、当时任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的张群前往视察。郭有守先生和知名学者如梁思成、陈寅恪等也前往现场参观。他们无不为墓内出土的稀世文物和墓室的宏伟建筑及精湛的石刻艺术所倾倒，并一致认为，这是研究晚唐五代建筑、雕刻、绘画以及音乐、舞蹈的珍贵资料。王建墓的发掘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成都平原。王建墓当时的出土文物曾先后在成都皇城坝的明远楼和少城公园展出，前往参观的群众数以万计。连远在重庆的郭沫若先生，于1942年和1943年写给友人的两封信中，也曾表示对王建墓发掘的极大关注。信中这样提道："的确，抚琴台的发掘是值得注意的事，这件事体，若是发生在和平时代，或是欧





美学界，想必已经轰动全世界了……”“听说冯先生是人类学者，在发掘工作上极为严谨，是值得庆幸的……”从郭老信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冯先生在发掘王建墓时，所作的巨大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物工作备受党和国家的重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朱德、贺龙、邓小平、陈毅等同志，曾先后到王建墓参观。特别是陈毅同志，在参观结束，得到王建墓管理处的同志赠送的有关王建墓的文物照片时，更是爱不释手，曾要求再送他一套，以便带回北京去转送给周总理。在1961年由陈毅同志主持的国务院文物工作会议上，王建墓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令人难忘的是1967年的上半年，郭沫若同志在王建墓参观时，一再对王建墓管理处的同志讲道：“要保护好玉带、谥宝这些文物，要多注意周围的地下文物。”由于文物工作者的细心保护和群众的热情支持，王建墓在十年内乱中才免遭劫难。

如今，每当在王建墓参观之余，望着保护完好、修葺一新的文物陈列室，望着那些在幽静别致的园林里悠闲漫步的游人，不由使人万分感慨。他们哪里知道在几十年前此地所发生的一切。当年参加王建墓发掘，除了现在北京的王振铎、莫宗江两先生和成都的刘复章老人尚还健在外，冯汉骥等先生已先后作古。当年参观过王建墓，现在台湾的张群诸公，如重返故地来王建墓参观，亲睹故里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亦会感慨万端吧！

桥是弯弓塔是箭

◎ 刘西源

张献忠打仗，阵势没个定规，总是神出鬼没，惯会出奇制胜。他甲申年打成都，朱明守军弄不清他要从哪座城门攻城，他的大将也猜不透他要布什么阵呢。

这年十月，八大王兵围成都。前年，他曾带着人马在城外虚晃了一枪，把藩王和文武官员吓得半死。这一次，张献忠刚从灌县青城山出发，成都城门就紧闭了。任凭义军叫战，也不出城接火。义军们个个摩拳擦掌，兴高采烈，只等八大王下令，就要攻下成都，建都立国。

连着几天，张献忠领着大将，围住成都转圈，看地形，查河道，寻找攻城的口子。成都城，立在平原地坝，墙高四五丈，千斤砂石作底，斗大卵石筑城，百斤青砖砌面，险巍巍，孤雄雄，周围有府河、南河环绕，河内波涌浪急，易守难攻，占尽天时地利，难怪历史上九个朝代在此建都立国，硬是块风水宝地啊！

张献忠骑马先看北门。一些将领围上来说："八大王，邓艾偷渡阴平进西川，就在北门外接受阿斗刘禅投降的。北门外地势开阔，天旱河浅，正好用兵。"张献忠摸摸胡子点头说："好，好，快造战车吧。"

张献忠骑马转到西门。一些百姓拥过来说："八大王，大顺国李顺从青城山下来，就是从西门杀进成都坐皇位的，西门外地势一展平，城门通大街，正好冲皇城。"张献忠摸摸胡子点头说："好，好，快借门板，好搭浮桥。"

张献忠骑马转到南门。一群弟兄围上来说："八大王，东汉光武帝活捉公孙述，就是从南门攻进成都的。城外正好屯兵，万里桥好过，城墙虽高，挡不住云梯。"张献忠摸摸胡子说："好，好，快买木料，好造云梯。"

张献忠骑马转到东门，站在护城河岸望江楼上往西一看，不禁倒抽一



口冷气。河岸下的南河，汇集了府河和流经城中金河的河水，河面宽阔，涛声喧嚣。陡峭的西岸，只有一道窄窄的驿马快道，平地而起的东门城墙，显得又高又陡。仗着天险卫护，城楼城墙上站的兵丁，比那三个门少得多。

几员大将望着河岸为难地说："就算渡得了河宽浪急的南河，城墙外只有巴掌大地皮，摆不开部队呀！"

张献忠摸着胡子眯起眼思索着。猛地，他睁开了眼，只见顺江岸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回澜塔，塔影映入开阔的江面，拉得很长很长，塔影正好从横跨南河的拱背九眼桥正中穿过，正对城中。张献忠心中一动说："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好，好。"说完，他吩咐只留少数人围城，其余的部队拔营增援西、南、北门部队造云梯、搭浮桥、建碉楼。

接连几天，守城官兵只见城外义军唱着歌谣，拉着大锯，绑着木材，云梯造得又高又快，浮桥门板连得又宽又好，东门外却兵少人稀没啥动静。眼看南、西、北门外仗火快打响了，忙把守东城的兵丁调了好多来支援这三个城门。

当天是个月黑夜，东门城楼接二连三有人倒地，千斤铁门悄悄打开了。守城官兵好多还在梦中，就给冲进城的八大王义军抓了。

天亮了，成都四门都打开了。张献忠骑着高头大马进了城，在庆功宴上，张献忠说穿了他打东门的诀窍。东门有险可防，守军必然大意；撤走围住东门的部队，让敌人中计撤兵；趁月黑风高派水军从水门铁板桥进城，打开了东门，就轻轻巧巧地拿下了成都，打开了皇城，活捉了藩王。

在庆祝大西政权成立的日子里，义军押着明朝的文官武将游街，让他们边走边敲破锣边扯开嗓子吼："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朱明气数尽，流民坐江山。"

后来，吴三桂投降清朝领着大军杀来了。张献忠撤离成都的时候，父老乡亲在东门外合江亭摆酒饯行，耽心地说："八大王一走，要来癞皮狗。"

张献忠摸摸胡子说："不怕。我走了，射金銮殿的弓箭还留着呢。"大家抬头看，回澜塔影穿过九眼桥洞，正对着城中呢。

吴三桂进了成都，走到哪里都听到"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的儿歌。他本想在成都割地称王，听到歌谣，心头不踏实，跑到望江楼上一看，魂都要吓掉了。他派人把回澜塔拆了，还杀了好多唱儿歌的娃

娃。杀到后来，连唱儿歌家的大人、邻居都杀，又杀又烧，成都快变成焦土了。

到康熙年间重建成都时，总督想把督院建在皇城，占个好风水。师爷说："街上娃娃都晓得'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怕不吉利啊！"总督一听，气了："都抓来杀了。""成都人杀得绝么？再说，听说张献忠把箭留在东门，还是谨慎为妙！"

总督一听不敢怠慢，忙带人赶到东门，到望江楼上一看，只见太阳从东方升起，照得南河满江金晃晃的，巨龙似的九眼桥卧在江面，穿过桥洞，像有无数只金箭直射城内皇城方向。他越看心中越发打抖。回城后，叫人赶紧把总督衙门修在今天的督院街，皇城再也不敢设为衙门了。不过，"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的儿歌，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





尹昌衡杀赵尔丰

◎ 蒋维明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宣告四川独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但仍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卫队，盘踞在督院。他暗中仍不死心，授意他在川边的心腹傅华封向成都进兵；又通过他的爪牙，制造了12月8日的“东较场兵变”——乱兵打“启发”，四处抢劫、放火。蒲殿俊、朱庆澜仓皇逃命，只有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力挽狂澜，单人独骑驰往凤凰山，借兵平乱，后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第二任都督。罗纶为副都督。

尹昌衡，字硕权，号太昭，四川彭县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与唐继尧、刘存厚、李烈钧、阎锡山、李书城同学。他们学成后乘轮船归来，尹昌衡曾在风浪中述志：“行则霖雨济苍生，藏则著书教万世。”回川后，任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屈居人僚。但在一次宴会上，却敢于当面顶撞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赵尔丰之兄），为川籍军官扬眉吐气。陶泽琨那时任绿营管带，便与尹昌衡结交，反正之后，他在尹身边负责警卫。

为了巩固政权，必须除掉困兽犹斗的赵尔丰，消除隐患。1911年12月21日，尹昌衡与罗纶、周骏、宋学皋等会议，商讨军事部署。当晚以两千精兵埋伏于督院四周——东边的南打金街，西边的走马街，北面的东大街；只留下通向下莲池的一道口子，仅设守兵，不作阻击，特为网开一面。另派陶泽琨率敢死队在半边街集结，待命袭击。

尹昌衡先已命令卫士马忠，通过袍哥关系，在“知音”茶铺与督院卫队中晦了袍哥的弟兄接触，将尹昌衡的一封亲笔信，秘密交与他们传阅。信中写道：“大汉四川军政府以精兵数万包围督署，铜墙铁壁，插翅难飞。所仇者惟赵逆一人，诸君归汉，必保无虞。能生擒赵逆，赏金两万。不

然，可从下莲池撤出，必不加害。”

22日凌晨，尹昌衡来到半边街。在一座小巧庭院里，敢死队员们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昌衡望着众队员，手抚陶泽琨肩背说：“胆大心细，活捉赵尔丰。”

“都督放心，弟兄们一定不辱使命。何况，都督先已寄去密信，其效力如同刘高祖在垓下奏起的‘四面楚歌’，足可把楚霸王的子弟兵吹得无影无踪！”

“好。我还得赶往东门去，指挥发炮，炮声就是号令！”

尹昌衡来到被命名为“迎晖门”的东门城楼上，炮队发射了10枚炮弹。

成都历史将记下1911年12月22日的隆隆炮声，记住这个大快人心的日子。

炮弹落在督院的庭院里、仪门内外。4个月前，这儿屠杀了几十名请愿的群众。血虽然被水从地面冲洗掉了，但它仍凝结在人们的记忆里，包括下令开枪的赵屠户。

凌晨的炮声，把赵尔丰从梦中惊醒。

昨晚他做了他此生此世中最后一个梦，是他近五年生活的剪影，让他重温了“经营川边”的辙迹：乡城稻城的战斗；“改土归流”；护送大清陆军进藏；援波密，定三岩；处死叛弁张占彪……宣统二年冬天，他率领巡防军从牛古渡过金沙江到巴塘。除夕，他援行省例，率领钦差行辕及驻巴塘文武官员举行朝贺。朝贺地点是在关帝庙内，“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就供在关帝庙的正殿上。庄严隆重的朝贺仪式于宣统三年（1911年）元旦清晨举行。忽然，殿梁上降下黄绫一幅，血书藏文。他命通事（翻译）译成汉文，系“赵尔丰杀气太重，辛亥年大为不利。阿弥陀佛。”他听后骇然，贺礼不欢而散。不过，也是在这天下午，他漫步在金沙江边时，却意外地拾得一块径寸的晶莹奇石：纹理纵横，悉成文字，真、行、篆、籀、蝌斗、甲骨文、清文、梵文皆有，凡217个字，只是文字内容似偈似忏，一时莫解。几个月后，他奉旨护理四川总督，由巴塘起身回成都，关帝庙前礼炮轰鸣……

炮声，惊醒了赵尔丰，然而已非巴塘的礼炮，吓得一阵心惊肉跳。“出了什么事？”想翻身起来，却又惫倦极了。持重，镇定，督院里有3营



巡防军守卫，战斗力很强。

赵尔丰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是：巡防军、卫队中参加了袍哥的人数将及一半，在传阅尹昌衡的密信后，鉴于时势大局、民心已失，各人都考虑寻后路。就像当年项羽的8000子弟兵一样，大难来时各自飞，早已丢下武器，趁黑溜出大门，往下莲池方向潜逃出去了。

陶泽琨带领200名前锋，不费吹灰之力进入督院大门。陶泽琨命令战士散开，包围内宅，搜捕赵尔丰。他和几位兄弟，穿过大堂向内宅走来，恰与赵尔丰之子赵老四、赵老九碰头相遇。

赵氏兄弟是在听到炮响后慌忙穿衣起床的，各人手里持了一柄宝剑。

昏暗的灯光下，陶泽琨挥起雁翎刀向赵老四砍来。赵老四用惊鲵剑一挡，刀光剑影，斗狠争雄，搅成一团。

赵老九恐兄不胜，拔剑助战，却被陶泽琨手下两名弟兄截住厮杀。

赵老四、赵老九心中纳闷：怎么不见卫队的踪影？心里先自怯战。再则二人平时酒色过度，鸦片烟瘾又要发作了，正想虚晃一剑拔腿逃跑，不防陶泽琨以飞燕掠空之势，聚力于刀尖之上，白光缠绕一砣，赵老四早已身首异地。

在陶泽琨率领一队士兵押解下，赵尔丰由6名彪形大汉用手“软抬”在肩上，向皇城方向奔去。

赵尔丰身不由己，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顷刻间成了囚犯，动弹不得。在摇摇晃晃、刀光剑影之中，经受凛冽的霜风一激灵，他的思绪意外地集中在一点：已届花甲的一生中，伴随他的永远是摇摇晃晃、刀光剑影，无论是在轿舆里、车辇里、马鞍上、八抬大轿中，或是今天的“软抬”……

记忆之丝，把他牵系到童年时代。那时，父亲赵文颖（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分发山东调任阳穀县（当年武松打虎的地方）知县，正逢太平天国大军北征山东、直隶的时候。文颖在风声鹤唳中，登泰山焚香，题诗述志：此行不了封侯业，愿把顽躯窃比君。以泰山自誓，决心临危受命，作大清朝的忠臣。不久，太平军至，文颖割袍袖写血书诀别父母，怀揣大印，驰入义军营垒决斗、战死。赵尔丰和哥哥赵尔巽在祖父母的庇护下，乘坐轿舆，仓皇逃命。天旋地转，隆隆炮声，常惊醒他童年的梦。

同治“中兴”，尔丰受到恩遇，由盐运大使调任山西，护理河东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晋边，山西巡抚锡良调尔丰任营

务处总办，侦察防范。赵尔丰乘坐车辇日夜奔驰在五台山麓，洋枪洋炮曾使他魂动魄惊。锡良任四川总督，推荐尔丰，调四川永宁道。永宁地处川南边远地区，地方势力间发生械斗，骚乱不止。赵尔丰骑着乌骓马驰骋山谷间进行弹压，捕杀“哥匪”数百名，以至赢得了“赵屠户”的绰号。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英军入侵西藏，达赖 13 世入京陈述，请求派兵入藏。清廷先后委派张荫棠、联豫任驻藏大臣，凤全任帮办大臣。达赖 13 世经由印度，准备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收买，转而派员阻挠帮办大臣凤全由川入藏，从而发生了巴塘戕杀帮办大臣及其随员 200 余人的惨案。1906 年 6 月，清廷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处理此案。赵尔丰兵临康区，既施行野蛮镇压，又努力垦殖、开发边区、兴办文教，冰川雪域磨砺了他强悍的个性，藏区的雪崩冰裂没有吓唬住他。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轩然大波，却使他沉没，面临灭顶之灾。他在 6 双巨手“软抬”下，心里充满恐惧和悲凉。荡荡悠悠之际，眼前恍惚又出现今年中元节横尸督院的场景，血肉模糊的尸身，倏地翻身爬起来，向他索命：“赵屠户，还命来！”

雄鸡长啼，他乂才清醒。不远处，高挂的红灯，映出崔巍的皇城轮廓。这儿将是他生命的终点。他镇住纷驰的神思，仰望天空，寻找紫薇星座。星空昏暗，星相衰飒。他为清朝社稷的倾颓，为自身的末日，偷弹了两行清泪，泪水被晨风一拂，冰凉之极。他心中出现撒手尘寰的澄定，耳际萦绕着一个声音：“临危勿苟免，虎死不倒威！”

辛亥年冬月初二（19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从皇城坝到皇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荷枪实弹的卫队簇拥着尹昌衡、罗纶，来在“至公堂”宽敞的廊檐下，这儿临时安有桌椅，作为审讯赵尔丰的公堂。赵尔丰暂押至明远楼下一间小室里。他却也顽强，闭月凝神想吟咏一首绝命诗。可是，不知怎么，一下想到一个月前在资中被革命军杀死的端方。大概是物伤其类吧！赵尔丰后悔不该跟端方争夺四川总督的官位。当时为拒绝端方入成都，还示意田征葵电告他：“如来省，将以督练公所招待之。”这里的“招待”，当然是软禁的代名词。端方进退两难，惟有死路了。唉，要是当时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恐不至糜烂至此。他还想到，端方是一个收藏家，随身带进四川的有好多挑古玩、玉器、善本书，听说还有一部脂砚斋评的全本《红楼梦》手稿，这些稀世之珍，遭此浩劫，定然玉碎珠沉了……他还想



到，张德魁是一个义士，慧姑是一位烈女，有这样好的亲随，可惜平日没有好好照顾他俩……

正想到这里，几名革命军人推门进来，将赵尔丰架至明远楼的台阶之下，接受审判。

在至公堂与明远楼之间，是一溜平的青石板院坝。尹昌衡站在廊檐口，居高临下地问道："赵尔丰，你知罪么?"

"本督捍卫西陲，孜孜求治，无负于川民。"赵尔丰抗声答道。

"赵屠户，你以川人之血，染红了顶子。远的不说，7 月 15 日督院血案，你就欠下数十条命债。你今天恶贯满盈了!"

涌入皇城的数千群众愤怒高呼："赵屠户，还血债来!"

尹昌衡火上加油："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说该怎么办?"

霹雷千钧："杀!"

罗纶："赵尔丰，还有何说?"

"给我红毡一块。"

罗纶命卫士在明远楼东廊檐下铺上红毡。

赵尔丰强自撑持，跌坐在红毡之上，脸朝北方，默默祝念道："老佛爷、先皇帝、今上皇帝，恕微臣回天无术了……"转过头来，一变他端重沉雄的大臣风度，在极度的愤懑和绝望的煎迫下，睁大一双充满血丝的暴眼，血口喷人地骂道："尹昌衡，王八羔子，你装赵老子的桶子哟!"（装桶子：设置圈套之意）

"你罪有应得!"尹昌衡连忙截住他。

赵尔丰疯狂般把心里话全都抖了出来："尹昌衡，你曾以晚辈之礼，进谒于我，商定秘密协议。你说，天下大乱，未知鹿死谁手。将来如果清朝倒下去了，尹某保全大帅；如果民国没有成功，大帅庇护昌衡，我才将 3000 巡防军交给你指挥。谁知你施行诈术，翻脸不认人!"

尹昌衡满面通红，急中生智，大声吼道："自古兵不厌诈！何况你并未遵守协议：迅速回到炉关（康定）之外，经营川边。你胆敢煽动兵变，洗劫成都。今日罪有应得！非昌衡不能容你，乃川人皆云该杀……"

尹昌衡向陶泽琨递了一个眼色。陶泽琨上前一步，向赵尔丰脑后一拍，待赵缩颈之顷，他肘下雪亮的大刀猛然劈下，顿时咔嚓一声，血花四溅，一代枭雄身首异地。

跑警报

◎ 刘西源

“跑警报”是抗日战争中成都一句家喻户晓的方言，意思是听到防空警报响声，立刻迅速离开没有掩蔽的处所，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跑警报，是死亡、毁灭、苦难、愤怒的代名词，是成都人用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口头语。

1937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不到一年，华北沦陷，广州、武汉失守，半个中国陷入敌手。蒋介石带着人马撤到西南，退守一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成为日本侵略者打击的重要战略目标。在对华战争中，日本吸取了希特勒抢占制空权席卷欧洲的经验，进攻时总是先派轰炸机作先导，袭击、轰炸城市、港口、机场、军营等重要目标，以炫耀武力、震慑对方，取得优势，并进而占领军事要点。

成都在 1934 年前，是川系各派军阀轮流坐庄。国民党在 1934 年虽以政令、军令统一了四川，但派驻中央系军队不多。因此，抗日战争开始后，成都仍是不设防的内陆城市。周围虽修有机场，但设施极为简陋，飞机数量少，机种落后，航速慢，火力不足。地面防空的高射炮、探照灯少得可怜。防御城东的东较场城墙上仅有 4 挺单管高射机枪，还是买的国外淘汰的旧货。成都地貌属冲积平原，浅表水层丰富，挖土一尺即可见水，很难挖防空洞。因此，日本侵略军头目曾趾高气扬地狂叫：在重庆、成都，天皇空军可以任意起飞降落。而国民党对防空宣传又很不力，老百姓对空袭的严重性认识不足。1938 年 11 月，日本飞机 18 架，第一次飞临成都外北机场，经过成都上空盘旋，向机场投弹后降落，拔走国民党旗帜一面。这次轰炸造成的损失虽然不大，却敲起了日本飞机会炸房杀人的警钟，“跑警报”就流行成时髦语言。

日本帝国主义对成都的轰炸，从 1938 年 10 月起至 1941 年 8 月止，先



后派出战斗机、轰炸机418架次，空袭13次，轰炸9次，给成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其中，1939年的“六·一一”，1940年的“十·三七”，1941年的“七·二七”三次大轰炸，大片街道被炸燃烧，夷为平地，几千人员伤亡，上万百姓流离失所，侵略者的暴行罄竹难书。

成都在1939年初已在城墙四周安装了警报器。警报笛声按声音长短和间隙，分为预备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听到警报，不论白天黑夜，都得熄灭火烛，收拾行李，迅速转移到安全位置。紧急警报响后，仍然在外行走的，军警可以开枪警告、拘留或就地正法。不过，当时国民党通讯不灵，常对日本派到内江、宜宾、泸州等地侦察、轰炸的飞机判断不准而误发警报，以至有时每天响两三次警报，闹得人心惶惶也是常事。

我在四五岁时，常被家人从梦中唤起，在揪心断肠的警报声中，父亲不敢点亮油灯，摸黑用背带把我缚在背上，提着包裹，出门汇入逃离家门的人流中，向城外跑去。跑警报的众人不敢大声吆喝，跌倒了也不敢大呼小叫。成都的城墙又高又厚，光靠几座城门不可能很快疏散跑警报的人。1939年后，在四城不少地段挖了疏散通道，府河、南河上架了木桥。跑警报的人们，出城后分散在城郊农户、竹林、树丛、河道周围，就地躺卧。不少次很久都未听到解除警报响，大人急、小孩哭，一片凄惨；也有的人老病加急，死在跑警报途中；受冻挨饿，惊吓成疾的也屡见不鲜。

1939年6月1日刚入夜，日本分两批派出飞机54架，轰炸重庆、成都。其中，27架飞机对成都轰炸两次，在闹市中心盐市口一带，投掷燃烧爆炸弹数十枚，炸毁、焚烧提督街、盐市口、沟头巷、交通路、顺城街、九龙巷等二十余条街巷，被炸区域成为火海。四十里外的双流、郫县、温江等地都能看见成都半个天空的火光。由于消防设备不足，灭火的水靠从水井提水为主，火势又猛，无法扑灭，火舌冲天，浓烟滚滚。空袭警报虽早已发出，不少人家不愿逃跑，炸弹在竹木结构的房屋区爆炸，很多人连家门也未逃出就倒在血泊火海中。事后，国民党中央社在缩小了的报道中说：“敌机27架，在盐市口等地投弹三四十枚，焚烧民房多家，伤亡平民数百人。我神勇空军起飞还击，击落敌机三架云云。”

这次大轰炸，让成都人民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凶恶的嘴脸。在掩埋同伴尸体、擦干脸上血泪的同时，掀起了更大的反日浪潮：呼抗日口

号，散发控诉传单；不少人自发到东较场向开炮射击敌机的邓锡侯二十八军的将士慰问；捐钱捐物的人在华兴街消防总队前排起长队；市民在听到防空警报时，相互拍门关照或敲击铜盆呼喊：跑警报啰！

1940年下半年，成都人在跑警报时，青壮年手上大多提了根木棒或童子军棍 — 是准备打汉奸的。

每次日本飞机来成都空袭，总有汉奸朝天上打信号弹，指示落弹点。这事被新华日报揭露并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防特经验后，成都青年人在跑警报时，总要提根木棒。到疏散位置后，四方观察，随时准备投入围歼汉奸的行列。

1940年10月27日，日本飞机36架次，在白天飞抵成都，在市区俯冲投弹，向人丛扫射。在东较场至猛追湾一带，就有百多位群众和部队士兵、执勤警察倒在机枪扫射中。当天，成都市区东南、西南的糠市街、春熙路、顺城街、油篓街、走马街、祠堂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西玉龙街、锣锅巷等街道，东较场兵营，都遇到轰炸和扫射。少城公园内的防空壕，躲藏不少来不及出城的群众，被日本飞机轮番扫射，炸中民众教育馆、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等处，伤亡数百人，血水染红了水池，到处是残肢断骸，惨不忍睹。上次大轰炸，以燃烧弹为主，这次轮番轰炸民房，反复扫射奔逃人群，掌握城市制空权数小时。东较场因上次开炮还击，这次被反复扫射，炸坏城墙多处。我们全家当天恰好从东较场拐角缺口跑警报，躲在离城五里的踏木桥树林中。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作十字交叉向东较场轰炸发射，冲过我们上空时，连机上的膏药标志都清晰可见。轰炸间隙，时时可见红红绿绿的信号弹从地面升起，而每有信号弹划过天空，总会听到人们“抓汉奸”的呼声。当天，据说在猛追湾，就有一个汉奸死在愤怒群众的木棒之下。在踏水桥附近沙河河湾竹林，曾有一串信号弹升空，被不远疏散的人群发现，“打鬼子，抓汉奸”的响声此起彼伏。我父亲也拿起挑行李的扁担，追向桥边碾米坊。我和别的跑警报的小孩，虽互不认识，却挤在树林边，同大人一道，用目光祝福沿田坎飞跑追逐的大哥哥们，咒骂着挨千刀挨万刀的东洋鬼子。

抗日战争胜利已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应当永远记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我更要把跑警报的经历告诉下一代、下两代，让他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丧国的历史教训，更加热爱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抓壮丁

◎ 游力行

旧华阳县国民兵团，隶属成茂师管区。县长黄功隆兼任团长，副团长肖龙主持团的工作。为避日机空袭，由成都正府街迁驻中兴场。该团下辖壮训中队、自卫中队、常备中队各若干。1940年秋，壮训中队开始分期轮训各乡壮丁，每期20天，前后轮训过三期。自卫中队的任务是警卫县政府和维持全县“治安”。常备中队则专门接收各乡送来入伍的壮丁，集中交成茂师管区，经一定训练，补充抗日前线的野战兵团。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在征集壮丁方面也出现新的情况，兹作点滴介绍。

县兵役科将应该征集的壮丁数额，分别下达各乡。各乡把壮丁送交国民兵团常备中队，由常备中队出具收条，各乡拿收条同兵役科结算入帐，办事程序和手续一环紧扣一环。由于当时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优抚工作均未落到实处，加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许多人都不愿当兵，逃避当兵，故各乡征集壮丁，一是抓，二是买。

抓壮丁的目标是穷人。而有些穷人往往是豪门士绅的佃户，有的为了逃避抓壮丁，临时参加袍哥，成为封建把头的拜弟。故本地人能抓到的，并不很多。加上“老鹰不抓窝下食”的观念，那时就把抓的对象对准了过路的远方人。沿府河各乡，则抓过路的船工。绳捆索绑，送交常备中队。永安附近有个徐昆良，是武林高手，还有一群徒弟。当政者就请他为抓壮丁成员。1939年，他们在新开河截得行船一只，徐飞身上船，动手抓人。谁知船上的“挨头斥”轻轻一挥手，就掐住了徐的咽喉，并喝道：“要死的吗要活的?”抓壮丁的人看这船工武艺较徐高强，只得求饶告退。此事一时传为笑柄。有的船老板有一定势力，抓了也要奉还。因此，抓壮丁完不成任务。后来就产生了买壮丁，抓和买同时并举。

当时有规定，适龄壮丁都要服兵役，并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的抽签制。中签者，必须当兵。但实际上谁也没抽过签，谁中与不中，全由乡保人员说了算。说你中了签，你又不愿去当兵的，一般要交三石黄谷作壮丁费；也有的实行“遍地开花”，每家每户都交点，作为买壮丁的款项。当然，如果抓到了壮丁，这笔钱就落入了私人腰包。

关于买壮丁的对象，一种是自愿卖身当壮丁的“飞机”。这类人非常狡黠，人伍后有机可乘他就“飞”了，再去卖身当壮丁，如此循环往复。他们把常备中队叫做“洄水沱”。在“洄水沱”里，他们一般是不“飞”的，以便下次再来。另一种是“赶网子”送交的。“赶”者，吆赶也；网者，网罗也。当时有不少逃荒来的穷人，找不到活干，流落街头，他们就成了“赶网子”的对象。以介绍工活等名义进行拐骗，威胁利诱，把他们吆赶到常备中队。当时华阳县三圣乡收购壮丁，每个壮丁25元，只要有常备中队开的收条，就可往三圣乡取钱，随到随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当时常备一中队驻中兴场附近的东寺，二中队驻西寺，三中队驻老百姓家。一中队队长陈怀任，上尉军衔，四川屏山县人。中队下面有三个分队长、一个特务长、一个姓陈的师爷，还有几个直接管理壮丁的班长。自卫中队派了一个班的兵力任警戒。陈师爷掌管中队公章、中队长私章。送壮丁来，主要由陈师爷接收，班长们帮助体检搜身，体检搜身完毕，陈师爷才开具收条。壮丁身上搜出的钱，由陈师爷保管，只给本人留少许零用。这是防止壮丁逃跑的办法之一。也有壮丁逃过这关的。他们先把钱放在叫“锅魁”的烧饼夹层里，或者放在旱烟把子里。体检搜身时，把“锅魁”或烟把子公然撂在陈师爷的写字台上。这招叫“免蹲险地”，很奏效。

东寺庙宇宽大。在正殿两侧十八罗汉脚下，垫上稻草，用土坯砌沿，做成连肩铺。壮丁晚上就睡在上面。壮丁入队后失去自由，晚上点名就寝后不得随便起来，大小便也须批准。一天晚上，一壮丁呼叫肚疼，其声凄楚。管理人员却吼骂：“不准闹！忍着！”后来，呼叫、哀求声渐弱，最后没了声息。天明一看，这个壮丁已经死硬了。热天，铺草里跳蚤成团，一到下午就发出急促而细微的嚓嚓声。有人端盆热水放到铺上，跳蚤误认为是人，纷纷跳进盆里，不一会儿水上就浮了一层跳蚤尸体。尽管如此，壮了们还是得睡在上面喂跳蚤。壮丁伙食，每人每天半斤大米，缺少油荤。特务长从中克扣，壮丁饿得难受，往往托采买炊事兵代买些食物充饥。特务长发现这条门路，干脆开了个贩卖部，卖香肠、牛肉、烧饼之类，售价



很高，获利甚厚。分队长们眼红，主张利益均沾，后来就轮流主办。壮丁生活悲惨，许多壮丁变成了瘦丁，热切盼望早日离开。所以，成茂师管区补充兵团来接兵时，一个个瘦丁昂首挺胸，显得精神百倍，终于被一批批接走了。

前面说过，陈师爷写了盖有印章的收条就可到“壮丁收购处”取钱。陈师爷印章在握，自然可以写些空头收条去取钱。他因此发了财。他的顶头上司陈怀任中队长也因这条门路成富翁。钱的作用很大，东寺后面一个名门闺秀竟放弃学业当上他的太太。曾经在一本残书上读过这样一首诗：

二十世纪有谁不低头拜黄金，
有了钱可赎回你已逝的青春。
不信且看那街头来往的少妇，
一个个挽着年老的富翁同行。

这首诗就是他们夫妇的真实写照。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陈怀任进了监狱，这位太太落了个独守空房。原因是，各乡拿常备一中队的收条去兵役科结算人帐，收条人数与实际人数不符，弊端百出，露了馅。加上陈怀任没有事先上下“打点”，而是吃了“整笼心肺”，以至进了监狱。



刘湘拍卖皇城

◎ 曾成志

1933年7月18日，刘湘正式在隆昌通电宣布就任蒋介石委任的四川“剿匪”总司令，并于7月20日进入成都。他召集在川各军将领，各绅耆及工商法团代表40余人，于督署会商筹措“剿匪”军费办法，预计3个月内消灭红军，所需军费400万元。决定全川各县共分担250万元，以增税为手段。其具体分摊方案是：二十一军新防区负担55万元，旧防区负担100万元；税捐增收55万元，其余200万元，除由区负担100万元外，还有100万元无着落。会上有人提出：将皇城拍卖，可得100万元凑足“剿匪”经费。刘湘认为此办法很好，为此特设“官公产清理处”，委派李春江为处长，冯均逸为副处长，负责拍卖皇城事宜。

当时皇城为四川大学校址。刘湘拍卖皇城之举，遭到四川大学师生员工的竭力反对，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电呈教育部请予制止。教育部致电刘湘，请维护教育，勿变卖四川大学校产——皇城。刘湘电称：“拍卖皇城，建设商场，化无用为有用，以皇城地价救黎民。四川大学校址，另觅适当地点。”后据督署高级官员透露，拍卖皇城势在必行，另在望江楼附近划拨四川大学校址，皇城拍卖之后，再拨给一笔修建费。但四川大学师生坚决反对，校长王兆荣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四川大学决不允许拍卖皇城，皇城乃四川大学校产，任何人无权卖它。”10月19日、20日，四川大学师生连续集会，声讨拍卖皇城，并由向仙樵草拟抗议变卖四川大学校产——皇城的宣言书，发表在报刊上。10月24日，“官公产清理处”表示要与四川大学协商，但川大态度强硬，无商谈之余地，因而拍卖皇城之事未能实现。但四川大学后来迁到望江楼附近却实现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成都掌故 （典藏版）
作者=
页数=467
SS号=0
出版日期=
Vss号=99447379